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 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1931—193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编

17

中共党史出版社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十七卷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 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1931—193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 1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9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ISBN 978-7-80199-607-7

I. 共… II. 中… III. ①共产国际—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料—中国—1931—1937 ②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料—中国—1931—1937 IV. K260.6 D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9883 号

书 名: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7)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1931—1937)

编 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责任编辑:姚建萍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140mm×203mm 1/32

字 数:457千字

印 张:19.25

印 数:1—11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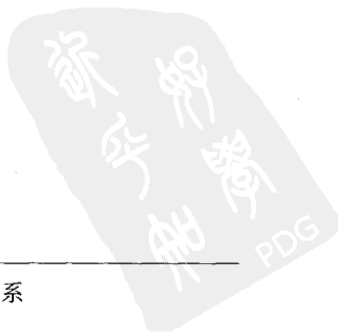
版 次:2007年9月第1版

印 次:2007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199-607-7

定 价:298.00元 (共五卷)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82517249,82517244



丛书编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主 编 黄修荣
副主编 马贵凡 刘宋斌

学术指导

李 新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廖盖隆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向 青 (北京大学 教授)

杨云若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刘桂生 (北京大学 教授)

张注洪 (北京大学 教授)

宋洪训 (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 研究员)

A. M. 格里戈里耶夫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教授)

K. B. 舍维廖夫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高级
研究员)

丛 书 前 言

联共(布)^①、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等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广大史学工作者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开动脑筋、积极探索,在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研究领域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而推动了中共党史等有关学科的研究,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但由于所能看到的档案资料还比较匮乏等原因,这些研究只是初步的,有待进一步深入。因此,积极开发利用各种文献档案,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俄国政治体制的变革,俄罗斯国家档案管理机构和管理办法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从1993年开始实行《关于俄罗斯联邦档案馆馆藏及档案馆库管理的基本法》。随着这一法规的颁布,大量罕见的档案资料首次开放并陆续出版。其中最使我国学术界感兴趣的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俄罗斯现代历史

^① 苏联共产党的名称有一个变化的过程: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式成立;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12月,党的十四大决定将俄共(布)改称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又决定将联共(布)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联合编辑的有关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大型系列档案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9)》。

为了把这批从未公布过的重要档案资料介绍给我国史学界和广大读者,我们根据与俄方签订的协议,组织有经验的学者独家翻译这套档案文件集,并聘请中外专家进行译审、校阅。与此同时,我们还将历年来在我国各种报刊、杂志、图书上发表的其他重要中文文献资料编成多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49)》。这套文献资料选辑将与前述档案文件集组成《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陆续在我国出版。

毋庸置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是一套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档案资料。它的问世,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重点、目标及其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脉络,而且还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各军事、政治集团和重要人物的态度和策略,更具体地弄清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苏联驻华使节及顾问在华活动情况以及他们之间的共识和分歧,从而进一步深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中苏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以及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

这套档案资料丛书在编译、出版过程中得到多方帮助。值此丛书问世之际,谨向关怀、支持过这项工作的有

关领导和部门,向为编译、出版这套丛书辛勤工作的专家学者及出版社的有关同志,致以深切的谢意。

黄修荣

2005年11月

于京郊自得园

编 者 说 明

本书系《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第17卷。本卷汇集了除本丛书第13、14、15卷所收档案外的有关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与中国革命、共产国际与反对战争和争取和平、共产国际与中共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共产国际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等六个专题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资料散见于其他中文图书报刊之中,包括以前已由外文译成中文的文献资料*。

本卷所收的文件主要是1932年至1937年之间的文献和档案。它们包括:一、共产国际发表的有关声明和通过的纲领;二、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指示和电报;三、共产国际代表大会讨论中国革命的会议讲话和发言记录;四、共产国际领导人发表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章和日记;五、联共(布)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章;六、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委及其领导人的报告;七、中共中央贯彻共产国际执委指示精神所制定和发布的指示。

本卷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研究员刘宋斌同志负责选编。

* 译者稿酬按有关规定支付,请与本卷编者联系。

目 录

一、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与中国革命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前的情况·····	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 大会议事日程的决议(1934年5月28日)·····	58
季米特洛夫就代表大会第二项日程给委员会的信 (1934年7月1日)·····	60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935年7月25日)·····	64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主席团和各委员会的 选举·····	66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词 (1935年7月25日)····· 威廉·皮克	70
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贺词 (1935年7月25日)····· 周和生	78
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摘录) (1935年7月26日)····· 威廉·皮克	82
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 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摘录) (1935年8月2日)····· 季米特洛夫	95
到群众中去!(《真理报》社论)(1935年8月2日)·····	106
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结束语(摘录) (1935年8月13日)····· 季米特洛夫	110

《论共产国际在帝国主义者准备新的世界大战的情况 下的任务》(摘录)	
(1935年8月13日—14日)	陶里亚蒂 130
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统一、反对 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摘录)	134
论共产国际在帝国主义者准备新的世界大战的情况 下的任务(摘录)	136
在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报告时的发言(摘录)	
(1935年7月28日)	(日本)冈野进 139
在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报告时的发言 (1935年7月29日)	142
在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报告时的发言 (1935年7月30日)	149
在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报告时的发言 (1935年7月31日)	157
在第二十三次会议上讨论季米特洛夫报告时的发言 (1935年8月7日)	161
在第二十四次会议上讨论季米特洛夫报告时的发言 (1935年8月7日晚)	167
在第二十七次会议上讨论季米特洛夫报告时的发言 (1935年8月9日)	185
在第三十一次会议上讨论季米特洛夫报告时的发言 (1935年8月11日)	190
在第三十一次会议上讨论季米特洛夫报告时的发言 (1935年8月11日)	193
在第三十二次会议上讨论季米特洛夫报告时的发言 (1935年8月11日晚)	196
在讨论陶里亚蒂报告时的发言(1935年8月15日)	197

在第三十七次会议上讨论陶里亚蒂报告时的发言 (1935年8月16日)	198
在讨论陶里亚蒂报告时的发言(1935年8月16日)	199
共产国际“七大”与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 (1936年3月20日)	张闻天 200

二、共产国际与反对战争和争取和平

争取工人阶级团结统一的纲领(《真理报》社论) (1935年8月6日)	209
争取和平(《真理报》社论)(1935年8月19日)	21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言《打倒战争》 (1935年10月7日)	21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声明《争取世界无产阶级行动的统一》 (1935年10月16日)	22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战争危险问题的决议 (1936年4月1日)	22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国际和平代表大会总结的 决议(1936年9月9日)	236

三、共产国际与中共成立 15 周年纪念

十三年来的中国共产党(1934年11月)	王 明 243
中国共产党 15 周年纪念(1936年7月)	季米特洛夫 265
英勇奋斗的 15 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 15 周年纪念 (1936年)	米 夫 269
伟大的十月革命和中国(1937年11月)	米 夫 343

四、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

-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关于
和平解决西安冲突的必要性问题
(1936年12月16日) 361
-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
——关于中共领导在西安事变之后的方针问题
(1937年1月19日) 362
- 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
(1936年12月19日) 364
-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
(1936年12月19日) 367
- 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致周恩来
(1936年12月21日) 369
- 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1936年12月27日) 371
- 关于西安事变的三十四份文电
(1930年12月—1937年2月) 373
- 中国发生事变(《真理报》社论)(1936年12月14日) 406
- 中国的抗日运动(1936年12月15日) Ar·哈马丹 410
- 国际述评(1936年12月17日) 415
- 为在中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1935—1937)(摘录) A·C·基托夫 417

五、共产国际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 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八一宣言(1935年8月1日) 423
-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瓦窑堡会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1935年12月25日通过) 429

关于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

- (1936年4月20日)……………洛 甫 448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
阵线宣言(1936年4月25日)…………… 457
- 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1936年5月5日)…………… 459
- 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6年6月20日)…………… 461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处的电报(1936年8月15日)…………… 465
-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1936年8月25日)…………… 470
- 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
(1936年9月17日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通过)…………… 477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
电报(1937年1月20日)…………… 483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
电报(1937年2月5日)…………… 484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就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事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
(1937年3月5日)…………… 485
- 中央关于同蒋介石谈判经过和我党对各方面策略方针向
共产国际的报告(1937年4月5日)…………… 486
- 中共中央关于与蒋介石第二次谈判情况向共产国际的报告
(1937年6月17日)…………… 492
- 中央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方案问题致彭德怀、任弼时、
叶剑英电(1937年6月25日)…………… 495
-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1937年7月15日)…………… 498
-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

讲话(1937年8月10日)	50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援助中国和西班牙人民的决议”节录(1937年10月3日)	50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1937年10月10日)	51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言(摘录) ——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20周年 (1937年11月7日)	513
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 (1937年12月13日通过)	517
季米特洛夫日记(摘录)	518

六、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苏区少年先锋队给中国团的信(1932年6月1日中国共青团中央收到)	541
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的总结和青年共产国际支部争取劳动青年群众的任务的决议(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十二月扩大全会通过) (1932年12月17日—28日)	548
巴黎世界青年反战和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宣言(节录) (1933年9月22日—24日)	551
附:青年共产国际纲领	555
库西宁关于青年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对战争危险斗争的报告(节录)(1935年8月)	561
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1935年9月25日—10月11日)	563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1935年12月20日)	57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青年争取和平、自由和 进步运动参加世界青年和平大会的决议(节录) (1936年1月31日)	576
世界青年保卫和平大会致全世界青年书 (1936年2月29日—3月1日)	578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为“五一”国际劳动节宣言 (1936年4月)	582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举行第二十二个国际 青年日活动的决议(节录)(1936年8月)	586
中国共青团中央关于国际青年日工作的决定 (1936年8月19日)	588
第一次世界青年和平大会(1936年8月31日—9月6日) ...	590
中国代表陆瑾的讲话(1936年9月1日)	592
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致巴黎世界学生联合会、 日内瓦世界青年和平大会及各国青年团体的通电 (1937年4月14日)	59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世界学联内共产党团迫切 任务的决议(节录)(1937年6月2日)	597
支持西班牙和中国人民的斗争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为第二十三国际青年日 发表的宣言(节录) (1937年8月27日)	598

一、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 大会与中国革命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前的情况^①

甲、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 各机构的决议的资料

一、从稳定的动摇到革命与战争的新阶段

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之后的六年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国际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根本变化。

这种变化的产生，首先是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取得了坚决彻底的胜利。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主要是：完全结束了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开展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工作；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经济的作用和比重及其对私有经济的影响，不断增长；发展了农民的合作化事业，特别是开始大规模地采用集体使用土地的形式和建立新的国营农场。

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的这个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决定性阶段，从而根本改变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面貌。巨大的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使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它在技术上和经济上不依附于资本主义世界，独立的地位逐年在增强和扩大。苏联解决了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之后所面临的一个艰巨的任务，这就是通过技术

^① 本资料是根据苏联党出版社 1935 年出版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前的共产国际》(资料)编译的，文末所注页码是原书页码。——原编者

改造把个体的小农经济变成大集体经济,并通过全面集体化消灭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富农。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中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在苏联整个国民经济中已成为独占的主导因素和唯一的决定性力量。集体农庄制度和苏维埃一样,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最伟大的成果之一。

公有制的胜利所带来的是消灭产生剥削和整个阶级差别的一切根源,是消灭阶级本身和建立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

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因素,实行国家的工业改造,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基地,消灭贫困和失业现象,大大提高苏联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大规模进行文化建设,增强苏联国防力量——这一切,大大加强了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基地的苏联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同时,资本主义的内外矛盾尖锐化了,资本主义的腐朽过程加快了。资本主义的稳定宣告结束。资本主义总危机开始进入资本主义世界新的革命危机时期,即进入迎来革命与战争新阶段的时期。

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提纲指出:第三时期“必然通过资本主义稳定中的矛盾的进一步发展,导致资本主义稳定的进一步动摇,导致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急剧尖锐化”。

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指出:

“技术的突飞猛进(在某些国家近似一次新的技术革命),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过程的加速,大托拉斯以及‘全国性’和‘国际性’垄断组织的建立,托拉斯与国家政权融为一体,以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还是不能克服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世界经济分裂成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市场缩小,以及殖民地开展反帝运动,使得战后在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极端尖锐化了。技术进步和工业合理化的另一面,是许多企业倒闭和破产,产量受到限制,劳动力遭到残暴无情的剥削,这就造成前所未有的大批工人经常失业的现象。甚至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

国家里，工人阶级的状况也逐渐极端恶化起来。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竞争的加剧，经常存在的战争危机，以及日益紧张的阶级冲突，为资本主义总危机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到新的更高的阶段创造着前提。”

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预断。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出现的资本主义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危机，促使并加速了资本主义暂时和相对稳定的终结。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会（第十次全会）指出，帝国主义的国内外矛盾急剧尖锐化，尤其是美国标榜一时的“繁荣”已告破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扩大会议（1930年2月）指出，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动摇不定的稳定崩溃了。

在经济危机尖锐化时期，资本主义世界遭受了危机史上未曾有过的严重减产。由于危机发展得很不平衡，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一般约在1932年中期生产锐减时，远远后退到战前的水平。在附属国和殖民地国家，危机具有更大的毁灭性。经济危机导致了国际信贷和货币制度的崩溃，引起了世界贸易的锐减，使资本输出几乎完全陷于停顿，使外债、特别是战时债务停止偿付。

第十二次全会（1932年9月）指出，总危机的情势使资本主义难以使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通常的办法来摆脱经济危机；同时，全会对这样一种观点提出了警告，说什么这次危机是最后一次危机，它会导致资本主义的自动崩溃。共产国际指出，现在和将来资产阶级都要通过对工人阶级的无情剥削和使广大农民群众破产（尤其是在农业国和殖民地国家）、对城市小资产阶级掠夺、对销售市场和势力范围的激烈争夺等办法，甚至采用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手段，来寻求摆脱危机的出路。各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使工人群众做好准备，以便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摆脱危机。

第十三次全会（1933年12月）指出：最近期间，有些国家的个

别工业部门(冶金、化学和纺织工业等)的生产已开始复苏,军事工业特别景气。共产国际不同意这样一种观点,说什么资本主义工业的产量,在经过三四年急剧下降之后所以会出现某种增长,纯粹是由于军事情势、通货膨胀、行情之类的人为因素。共产国际指出,除了这种因素之外,资本主义的内在经济力量,也对工业情况发生作用。

共产国际的一系列文件再三指出,业已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萧条是一种特殊的萧条,它不会导致工业的繁荣,但也不会使其倒退到极度衰退的境地。第十三次全会以来的势态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论断:在资本主义总危机日益加剧、国内外市场进一步缩小的情势下,资本主义经济所经受的不是繁荣,而是迅速的、寄生性的腐朽。

第十二次全会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稳定的终结,就是这一稳定在对外政治关系上的结束,就是对外政治关系的极端尖锐化。

帝国主义阵营中力量对比的变化,打破了帝国主义者之间为世界大战之后重分世界而缔结的种种协定。一些国家中法西斯主义的猖獗,对于疯狂准备帝国主义战争,首先是反苏战争,乃是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法西斯德国准备发动复仇战争,违反凡尔赛条约建立了强大的军事机器,拒绝参加东欧互助公约,准备对苏联进行十字军东征。法西斯军国主义日本,撕毁了关于不得侵犯中国的华盛顿协议,占领了满洲,侵入了华北,在“亚洲属于亚洲人”这一口号下准备完全奴役中国,并准备进军苏联。波兰帝国主义企图侵占苏联领土,支持德国的反苏军事阴谋。

在目前苏联这样强大的情况下,这些法西斯战争贩子若是没有估计到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首先是英国)有一部分资产阶级会给予公开或秘密支持的话,他们是不敢对苏联进行这种挑衅性的武装侵略的。苏联一贯坚定不移地实行符合整个劳动人类切身利益的和平政策,它的日益强大的实力,以及广大劳动群众的革命气

概,使资产阶级感到他们如果发动战争就会遭到毁灭——所有这一切,使战争延迟到今天都未能爆发。但是,国际无产阶级应当认清,法西斯战争贩子不会停止任何的挑衅,他们随时会把战火抛向国际矛盾的火药库。

尤其是坚决把重分世界的问题公开提到日程上来的德日两国的政策,不但加速了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矛盾的尖锐化,而且也加速了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矛盾的尖锐化(日内瓦裁军会议的破产,日本撕毁限制海上军备的协定,太平洋上的斗争日益加剧,法国、小协约国和其他当前不热衷于发动战争的国家同追求复仇政策的德国之间的矛盾尖锐化,整个帝国主义世界的商业战和货币战,等等)。

共产国际在自己的各项决议中,向劳动群众指出了帝国主义战争、首先是反苏战争日益增长的危机,揭露了每个时期的主要战争挑拨者,发动了劳动群众警惕地对待本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战争计划和阴谋诡计,揭穿了社会民主党领袖和工会官僚的和平主义假面具,事实上他们大多数是为本国帝国主义的军事大本营服务。

这些决议向各支部提出的任务是,在帝国主义战争尚未爆发的今天,就要有步骤地准备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同时提示各支部,必须鼓动群众开展实际的行动,必须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把群众的行动组织起来,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准备工作。“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者对苏联进军的威胁,这是共产国际各支部空前的最为重要的任务。”(1930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扩大会议)

在过去的这个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即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之间的阶级斗争,大大尖锐起来。第六次代表大会在指出当前这些内部矛盾(工人阶级群众趋向左倾,阶级斗争尖锐化,殖民地运动日益增长)尖锐化时曾预示,“资产阶级

在危急关头会利用某种条件搬出法西斯制度”。第十次全会认为，“在战争日益迫近和工人阶级急剧贫困的情况下，第二国际各大党目前都已组成政府，这就会使社会民主党在无产群众中间发生深刻的危机”，“这种危机的表现，就是加速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激进化”。在刚刚出现经济危机时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扩大会议曾指出：这次危机“加速了资本集中的过程和中小资产阶级的破产，大大加剧了基本农民群众的贫困化（特别是在殖民地），而且，空前加强了由于实行资本主义合理化而采取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形式，因而极其有力地加深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矛盾”。

事实上，垄断资本在把世界危机的重担转嫁到工人、农民和劳动群众的身上。约4000万工人被抛出生产部门。由于企业大批解雇工人，肆无忌惮地削减工资，限制和取消各种社会保险和国家补贴，更加广泛地使用低工资的女工和童工，以及开工时间缩短，工人阶级的收入乃不断下降。

这种特殊的萧条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一方面是大垄断资本家大发横财，而另一方面是工人群众失业、贫穷和困苦。尽管工业衰退的低潮已经过去，但是，由后备变成常备的失业大军，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实际上并没有减少。最近几年，工人阶级遇到的一种新情况是，在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中涌现出各式各样的强制性劳动形式，而实际工资却由于物价飞涨而大为降低。

农业危机和工业危机交织在一起，使城乡小资产阶级遭到破产。农业的衰退并不仅限于殖民地，而且也席卷了那些具有先进机械化农业的国家。去年的歉收，以及资产阶级在提高农产品价格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改善了地主和富农的状况，然而却加速了基本农民群众的破产。

工人阶级以群众斗争的方式回击了资产阶级对其生活水平的进攻。它通过实践驳斥了关于危机时期“不能”罢工的机会主义理

论。据极不完全的统计,从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到1933年底这一期间,各资本主义国家中罢工人数总计为16741700人,因而损失了2.62亿个工作日。随着萧条的到来和在企业中加紧执行所谓“危机合理化”制度,罢工浪潮又汹涌澎湃地出现了(特别是1933年至1934年,在美国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群众罢工浪潮)。

成千上万失业工人的示威游行,以及他们高呼“实行失业保险”、“反对削减保险金”、“发给失业工人及其家属补贴”等口号的抗议活动,发展成为同资产阶级武装部队的公开冲突。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垄断资本家和高利贷者的盘剥而破产的农民群众,多次自发地行动起来,反对不堪忍受的苛捐杂税、债务和地租的重担。

第十二次全会指出,尽管运动发展得不平衡,但“无论是在帝国主义国家,或是在殖民地国家,革命高潮都在不断增长(声势浩大的、坚持不懈的罢工,革命性的游行示威,工人同警察及法西斯分子的激烈冲突,农民群众的战斗行动,等等),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分子的斗争日益增强”。

革命危机的成熟和广大群众对资本统治的愤懑,使资本家根本无法借助于议会制和资产阶级民主制来维持自己的专政,因而不得不采用公开的恐怖专政。资产阶级乘人民群众正在酝酿而尚未下定决心去冲击资本主义的时候,就力图通过施行法西斯专政和疯狂的进攻来击败工人阶级。因此,共产国际认为,法西斯在德国的胜利,不仅是工人阶级力量薄弱和社会民主党背叛工人阶级的结果,而且也是资产阶级软弱无力的表现,因为资产阶级为维持其专政不得不采用恐怖的统治手段和战争的政策。

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社会民主党人、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兰德勒叛徒,因为他们试图把法西斯主义说成是小资产阶级专政或流氓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一种似乎不仅超越无产阶级、而且也超越资产阶级的“超阶级政权”。一些中欧国

家实行法西斯专政的沉痛体验向群众表明,法西斯主义这个工人阶级最凶恶、最残暴的敌人,是极其反动、极端沙文主义的帝国主义的金融资本家公开实行的恐怖专政。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衰落的产物,它使人民群众遭受极大的痛苦,所以它不能制止人民群众走上革命的道路。

由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在加速崩溃,社会民主党同资产阶级合作政策日益破产,而且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处境发生了变化,所以第二国际中出现了深刻的危机,许多妥协的政党垮台了。

苏联社会主义取得了具有世界意义的胜利,以及资本主义的衰落,使许多社会民主党的队伍发生深刻的分化,使社会民主党工人越来越愿意在广泛统一战线的基础上,与共产党人一起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进攻和战争危机,同时,也引起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的渴望。

第六次代表大会已预见到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即将结束。第十二次全会已能指出:“世界正向着阶级之间和国家之间发生大规模冲突的新阶段过渡,正向着革命与战争的新阶段过渡。”

第十三次全会已能更为确切地指出:“……革命危机的客观前提已经成熟,目前世界已更加临近革命与战争的时期。”

许多国家革命危机的进一步成熟,证实了这个有预见的论断。在奥地利,尽管以奥托·鲍威尔为首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直到最后关头还千方百计地寻求与道尔弗斯政府达成协议,但是,社会民主党于1934年2月还是发动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工人即保卫队员同共产党人一起进行了反法西斯活动。

在西班牙,不久前参加资产阶级联合政府的社会民主党中,有很大一部分党员于1934年10月同共产党人一起开展了反法西斯的武装斗争,在个别地区,这一斗争发展成为争取建立苏维埃的武装起义(阿斯杜利亚)。

在法国，工人阶级首次运用了总罢工这一武器，并通过群众游行示威动员了自己的力量，因而于1934年2月粉碎了法西斯的第一次大袭击，同时，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全国广泛开展了强大的反法西斯的人民运动。

在德国，共产党的英勇斗争及其秘密组织威望的提高，使共产党员能够在希特勒统治时期极其艰难的地下活动的条件下找到联系群众的途径。

甚至在资产阶级政权动摇得比欧洲各国要小一些的美国，在1933—1934年间也爆发了多次反对降低工资、保卫工会和争取罢工权利的罢工斗争，参加斗争的人数及其革命程度都是绝无仅有的，工人群众开始在政治上与资本主义政党划清界线。

在中国，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帝国主义者、封建主和资产阶级联盟，使无产阶级和农民遭到了严重的失败。现在，虽然蒋介石有世界帝国主义的支援，但是苏维埃政权和中国红军在抗击国民党反革命“围剿”的英勇斗争中得到了巩固。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日益广泛地吸引了千百万群众，它对于整个殖民地世界的被压迫人民来说，是一个生动的范例。

反对法西斯主义、战争危机和资本进攻的统一战线运动，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里，以不同的速度和各种形式向前发展着。这一切可证明，资本主义总危机在一些国家中开始进入革命危机日益增长的时期。

(第7—14页)

二、各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

1. 为各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

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革命高潮的出现（群众中已酝酿成熟要向资产阶级冲击的思想），形势日益迫近革

命与帝国主义战争的第二阶段——这一切，在战后资本主义危机的第三时期，要比以往更加尖锐地提出各国共产党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问题。

要想利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动摇和终结所造成的新形势，首先必须加强共产党，即扩大和巩固它对群众的影响，其先决条件就是要反对一切离开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布尔什维克路线的倾向，并要同对待这种倾向的任何调和主义态度作无情的斗争。

反革命托洛茨基主义的被粉碎，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为实行“阶级对阶级”策略而进行的斗争，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就已保证了各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加强。

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和大会以后，极其坚决地进行了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为捍卫布尔什维克路线，既要反对作为主要危险的右倾，又要反对“左的”宗派主义倾向和对这两种倾向的调和主义态度)，以便保证共产国际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

右派在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和大会之后所持的观点，大大违背了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实际上它是与第二国际的观点相一致的。右派的代表人物力图否定资本主义稳定业已动摇这一事实，他们断言这种稳定似乎有其牢固的基础。在美国，右派和调和派提出了美国在其资本主义发展方面有其特殊性的论点。

右派否认业已出现革命高潮，不承认工人群众和劳动居民阶层趋向左倾这一事实，他们攻击“阶级对阶级”的策略，企图阻挠共产党在劳动群众的日常斗争中成为主导力量。

右派不是通过革命的行动和群众性的革命工作来组织工人统一战线，而是坚持服从改良主义的工会领导，极力从基层破坏统一战线，阻挠无组织的工人参加革命工会联合会。右派否认战争危机的增长，并在一些国家中坚持本国资产阶级无帝国主义性质的论点(瑞典、瑞士)。在波兰，他们否认波兰资产阶级具有向东扩张

的帝国主义性质。

同右派的斗争是一场艰巨而持久的斗争，这首先是由于各种调和派对斗争进行干扰。这场斗争的速度、激烈程度以及斗争的成果、斗争的方式，取决于共产国际各个支部的力量、成熟程度和政治经验。在联共(布)党内，右派从一开始就胆怯气馁，而且他们在党内又被孤立起来，因而以斯大林同志为首的党的领导乃显示出威力。在德国共产党内，右派曾企图瓦解党的领导，并想借助于调和派来夺取党的领导权。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右派和调和派的这个图谋遭到了反击：右派领袖被清除出党，调和派领袖被撤销党内的领导职务。在一些比较弱小的共产党内，这个斗争开展得比较缓慢，而且困难重重。在英国共产党内，由于领导干部思想比较迟钝，右倾被无原则地掩盖起来，很晚才被揭露，直到1929年，党才撤换了机会主义领导。在瑞典共产党内，基尔比姆取消派集团，直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之后才被开除出党，而且这一集团被清除出党时还殃及了很大一部分党员。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领导了各国共产党为捍卫布尔什维克路线而斗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曾对各国共产党发出一系列指示，在指示中向全体党员群众揭露了领导机关的机会主义倾向和错误，并向各国党提出了保证执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路线的任务。它分别写信给瑞典、波兰、英国、中国和匈牙利共产党，指出它们所犯的错误。在信件的指导下，党员们被发动起来去克服右倾和清除右倾集团。清除右倾集团的工作，大部分是在党代表大会上完成的，同时，根据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选出了新的领导机关。

右派还企图通过共产国际领导机关中的调和派来维护自己的观点。

右派和调和派被击溃了。他们大名鼎鼎的领袖(意大利的谢拉、美国的劳斯顿、捷克斯洛伐克的伊列克、瑞士的安贝尔—德罗、

德国的爱维尔特和苏联的布哈林),早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之前,就或明或暗地反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议,而在他们反对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的行动纲领被揭露以后,乃被清除出党,或被撤销党内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的领导职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的决议指出,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与继续留在共产国际的行列,是互不相容的。这个决议是反对右派的一项重要措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这一决议中指出,在右派和叛徒被清除以后,调和派竟跳出来维护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因此,向调和派提出如下要求;要么他们完全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同右派划清界线,真正和右派展开斗争,要么他们违背这一要求,将被清除出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采取这一决定性步骤的结果是,在共产国际大多数支部中,首先是德国支部中,调和派投降了,其中有一部分人倒向右派,被清除出党。在法西斯政变之后,一些调和派分子又搞起他们的反党活动。

各国共产党清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过程,大体上持续到1930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共产党内,一些取消派工会领导人曾企图利用赤色工会来反对共产党。然而,这种企图大都被彻底粉碎了。

在联共(布)党内,右派反对社会主义全线进攻、反对集体化、主张保存小农私有经济、鼓吹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等等论调,是与他们对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估计有密切关系的。他们的表现是,坚信资本主义健全,认为资本主义有组织性,否认革命高潮的出现,支持各国共产党中的右派和调和派。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粉碎联共(布)党内的右派,也就给了共产国际其他一切支部中的右派以致命的打击。

联共(布)及其布尔什维克中央,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通过对右派进行全面、无情的揭露,通过对右派的观点进行坚决、毫不留情的斗争,通过坚决捍卫党的列宁主义总路线(正如对托洛茨基

主义所做的那样),为共产国际各支部作出了怎样同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倾向作斗争的光辉榜样。

但是,右派集团被粉碎之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并没有终止。不相信革命高潮的到来,悲观地估计国际形势,对社会民主党抱调和主义态度,屈从于工会运动中的改良主义——这一切,在许多共产党内过去是、今天仍然是主要危险。捷克斯洛伐克的古特曼纲领和法国的多里欧纲领,表现出最露骨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在德国,希特勒上台后,麦列勒和纽曼两位同志坚持了这种观点,但他们后来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左倾”机会主义,尤其是共产党内的宗派主义,首先表现为轻视争取群众的重要性,实际上是忽视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任务。离开和歪曲共产国际路线最突出的“左倾”表现,是破坏和拒绝在改良主义工会中进行革命工作,致使我们多次失掉我们在改良主义工会中已经占领的阵地,并且阻碍了赤色工会发展成为群众性的组织。

改良主义工会是“培育资本主义的学校”这个论点,是根据这种错误的推论得出的:既然革命工会的反对派和赤色工会执行独立领导经济斗争的方针,那么老实说,改良主义工会也就只是企业主所需要,对企业主有用了。由此乃产生德国梅克尔之流的观点,他们认为,企业中的社会民主党工人是一些“小恶棍”,改良主义工会会员全是反动家伙。所有这一类的观点导致了革命工人对改良主义工会的真正抵制,阻碍了统一战线的建立。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关于建立赤色工会的前提的决议中所提出的那些条件还不具备时,轻率地、匆忙地建立赤色工会,以及轻视那些有组织的工人的影响和作用,只会有利于共产党队伍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改良主义工会官僚。基于这种论点,一些党组织都拒不实行同社会民主党工人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同这种论调密切关联的,是把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等同起来的观点。

这种观点阻碍了社会民主党工人和参加改良主义工会的工人摆脱其领导的影响,也妨碍了从思想上揭露法西斯主义。

“左倾”机会主义观点还表现在“一遇到法西斯分子就将其处死”这个口号上,表现在对法西斯主义采取机会主义的消极态度上,认为在向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的过程中法西斯主义是个必然的阶段。

在中国共产党内,1928—1929年间这种“左倾”宗派主义思潮特别严重。这种思潮的表现是,过高估计革命高潮的速度和盲动主义的倾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经常不断地帮助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机关克服1933年中期以前出现的(尤其是在中国和西班牙出现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

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所进行的两条战线的斗争,虽然多数共产党内在思想战线上暴露出很多弱点,但毕竟提高了党员群众的思想水平。这一斗争的锋芒不仅是针对思想意识方面的一切偏向,而且也针对组织工作方面的一切偏向,这样,就着重地抓了加强党纪的工作。通过两条战线的斗争,各国共产党更加统一、更加团结了,建立了团结一致的领导机关,并以工人更换和充实了党的干部。

把那些具有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分子和集团清除出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的队伍,使得整个党内生活和党的工作健全起来。但是这个反对党内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斗争,即反对社会民主党近邻的日常影响的斗争,至今还没有完全消除社会民主党的整个影响。共产党通过建立工厂支部的办法来进行改组时还遇到阻力,这也可以说明应当重视这个斗争。

虽然如此,但是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全会之后,“左”、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布尔什维克路线的一切图谋,均告破产。这一事实可表明,共产党通过两条战线的斗争,在实现布尔什维克化方面已取得无可辩驳的成就。在捷克斯洛伐克

共产党内，古特曼企图建立派别组织，结果被粉碎了，党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同样地，在法国共产党内，多里欧企图使党离开布尔什维克路线，也未能得逞。在公开实行法西斯专政以后，德国共产党内的情况更能说明这一问题。尽管德国共产党受到残酷的迫害，遭到广泛的污蔑和谣言攻击，尽管它已转入极其秘密的地下状态，但是，它与德国社会党相反，保持并进一步加强了自己队伍的内部统一和团结，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得到了巩固。所有这一切都说明，通过思想上和组织上两条战线的斗争，特别是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以台尔曼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年来领导的同右派和调和派的斗争，德国共产党经受了布尔什维克的锻炼。

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成就，还表现在这一点上：许多共产党（波兰、匈牙利、奥地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希腊）内的旷日持久的派别斗争结束了，这些党团结一致了，党内的纪律也恢复了。

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及其发动的国际性运动，对于各国共产党思想上的布尔什维克化，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围绕斯大林同志《论布尔什维克主义历史的几个问题》这封信，共产国际各支部大张旗鼓地开展了进一步深入反对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残余和提高党的思想水平的运动。共产国际为卡尔·马克思逝世50周年举办的纪念活动，为列宁逝世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被害每年举办的纪念活动，翻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以及大量发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同样也使各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得到了加强。在共产国际的内部，正以空前团结和空前巩固的姿态迎接第七次代表大会

.....

3. 各国共产党的群众组织和群众工作

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各国共产党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成就,是在不断加紧迫害共产党人的极端艰难的情势下取得的。群众工作的领导艺术,在报告所指时期虽说存在一系列缺点和不足,但还是有所提高;在这一时期,干部坚强起来,而且政治上成熟了,各国共产党的人员和组织都有所增加,这一切总括在一起,可证明各国共产党在实现布尔什维克化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共产国际的许多支部(法国、德国、波兰、中国、日本、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已成为拥有群众影响的政党。在美国、波兰、中国、奥地利、英国、匈牙利和荷兰,共产党胜利地领导了失业工人的群众运动,领导了罢工斗争和反帝斗争。

.....

共产国际的一些支部——中国(特别是苏区)、德国、美国 and 英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成立了短期的党校;在西班牙、波兰、德国、法国和中国,举办了地区党校。但是,共产国际各支部的党校,大都是为期一两周的短期学程。在有些国家里,特别是在英国,为新党员和非党工人举办了学习班,但是这种学习缺乏具体的规划。

.....

(第 25—28 页)

4. 共产国际各支部的组织工作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机构,在报告所指时期以前,以及在报告所指期间作出的关于把全党工作和群众工作的重心转到重要的工业中心、大企业和所有企业中去去的决议,许多支部至今仍然远远没有贯彻执行。法西斯恐怖所造成的情况显然表明,只有工厂支部最适应地下工作条件,它们是最具活跃能力、最坚强的党组织形式。最近期间,某些情况可证明,在德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国家,企业中支部的组织工作有所加强,现有支部的积极

性也有所提高。

关于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的重心转到企业中去中的决议所以没有贯彻执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对党员、特别是对那些在这个问题上尚未根除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工作人员没有讲清在企业中进行工作的重要性和工作方法。

正值世界经济出现危机之际,共产国际各支部的党员人数开始增长起来,这反映出革命的工农运动已开始高涨。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增加了将近 30 万新党员。

.....

德国共产党在它转入地下之前,发展很快。在 1928—1929 年,德国共产党有 12.1 万名党员,到 1932 年底,登记的党员已达 36 万人,其中经常交纳党费的有 25.2 万人。在 1933 年,即地下时期,德国共产党有 10 万党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以后,据中共中央统计,中国共产党员的人数已发展到将近 10 万人;到共产国际第十三次全会时,中国共产党员已达 41.6 万人(苏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目前,由于红军撤离江西,情况发生了变化,党员的数字无法统计。

.....

在报告所指时期,通过同“左”、右倾机会主义两条战线的斗争,通过实际革命工作,多数共产党干部经受了很好的锻炼。在德国、波兰、南斯拉夫、意大利、保加利亚、匈牙利、奥地利、日本、中国等等共产党内,无数共产党员在法西斯白色恐怖下牺牲了,这可证明共产党干部具有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希特勒上台以后,德国共产党的干部遭到了重大损失。据意大利共产党的报道,由于流放、屠杀和逮捕,往往每三四个月就得重新建立区党委会和地方党委会。匈牙利、特别是南斯拉夫的情况,也是如此。长期以来,在这两个国家中,党的优秀工作人员一经被捕,就毫无例外地惨遭杀害。在中国共产党内,第六次党代表大会所选出的中央委

员,目前还活着并有自由的,以及正在积极工作的,仅有三分之一的同志,其余的中央委员全都被逮捕或被捕后惨遭杀害。在法西斯专政国家中,我们看到的大多数秘密共产党的情况,几乎都是如此。

各国共产党不管遭到怎样的损失,仍然不断地补充自己的干部,能够很好地继续组织阶级斗争,这一情况表明,它们学会从参加斗争的工人中吸取新的力量。

有些共产党采取了系统地清查和考察干部的措施。由于改进了一些对干部的清查和考察工作(虽说还很不够),共产国际各支部大都能揭露出异己分子并把他们清洗出去(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和中国等支部)。

(第 31—33 页)

五、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危机而斗争

.....

第十次全会认为,反革命的反苏战争危机继续增长。全会指出,8月1日反战日的筹备工作进行得软弱无力,这一情况乃是机会主义倾向的表现,而这种机会主义倾向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对战争危机估计不足,对这个问题抱听天由命的态度。第十次全会同时指出,反苏战争威胁不仅来自西方,而且也来自远东,因为在远东出现了挑动反苏战争的图谋。张作霖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暗中支持下,曾对苏联远东地区发动军事进攻,遭到了红军的沉重打击。战争挑拨者应从这一事例中认识到,进攻苏联是非常冒险的事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扩大会议,研究了各国共产党在这一紧要关头对事态应抱怎样的态度的问题,同时认为,第十次全会所指出的各国共产党反战工作中的缺点,至今还没有克服。

.....

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的入侵,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

再次进军的开端，而且也是接二连三地试图挑起对苏战争的信号。在占领满洲的同时，一些欧洲国家更加法西斯化了。

此外，法西斯化的新浪潮表明，反动的资产阶级集团扔掉了爱好和平的假面具，从以和平主义为掩饰的备战断然转向赤裸裸的公开备战。固然，资产阶级依靠法西斯走狗能够煽起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情绪，但另一方面，在社会民主党工人和小资产阶级队伍中，恐惧新战争的情绪却增长了，反对战争组织者和准备者的意志也增强了。

亨利·巴比塞和罗曼·罗兰这些进步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人物，呼吁 1932 年召开反对战争威胁的代表大会，他们的呼吁得到了所有工人组织和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同盟的普遍响应，这一事实特别明显地证明了反战情绪的增长。根据这一呼吁召开的阿姆斯特丹反战大会，共有 3000 名代表参加，其中大都是决心同战争危机进行斗争的和平主义者、社会民主党工人和政治活动家。共产党的代表们积极动员群众支持这一大会，他们通过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的讲坛得以阐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列宁主义斗争原则。第二国际不准自己的组织参加这次大会，并企图使社会民主党的大、中、小组组织的代表，在来自 30 个国家的 3000 名代表中不占太大的比重，但结果未能得逞。共产党人在代表大会上以及随后掀起的运动（首先在法国、罗马尼亚、希腊及其他国家）中采取的策略是，同真心实意拥护和平的真诚和平主义者团结起来，阐明革命的反战路线，引导他们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之后，许多国家分别在伦敦、蒙得维的亚（整个南美洲国家）、哥本哈根（斯堪的那维亚国家）、荷兰、保加利亚、纽约、上海（整个远东国家）、墨尔本（澳大利亚）和布拉格召开了各国阿姆斯特丹反战运动大会，随后又召开了法国代表大会、瑞士代表大会，以及阿姆斯特丹运动所引起的世界青年代表大会、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和世界大学生代表大会。通过巴黎代表大会掀起

的反法西斯运动,同阿姆斯特丹运动结合到一起了。这种结合使反对战争威胁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得到加强。

第十二次全会是在战争危机进一步增长的气氛中召开的。全会的决议中指出,世界正向着阶级之间和国家之间发生大规模冲突的新阶段过渡,正向着革命与战争的新阶段过渡,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已成为直接的危险。

第十二次全会认为,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相对稳定时期即将结束;帝国主义列强重分世界的问题已提上日程;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吞并满洲)意味着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开始。随着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尖锐化,靠牺牲苏联来解决矛盾的趋势日益加剧。因此,保卫苏联和中国革命,以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已经成为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中心任务。

第十二次全会指出,各国共产党在动员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筹划反革命的反苏战争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同时着重指出了日本和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行动。除此之外,全会认为,各国共产党不善于通过革命行动来阻止向中国派遣军队和给日本输送军火,不善于发动军火企业和运输部门的广大工人群众起来斗争,这是各国共产党在反战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同时全会向各国共产党提出了要经常在思想上反对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任务。全会号召各国共产党要更加机智地反对对苏联的挑衅,更加尖锐地揭露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并强调指出,必须向群众说清,“逐渐进入”战争这种情况对于劳动人民的危害。全会号召共产国际各支部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举行经过缜密准备的抗议备战的罢工,重视失业者、青年、妇女和农民中间的反战工作,在帝国主义国家的陆、海军中开展大规模的政治宣传工作。

.....

首先必须指出,日本共产党也和中国共产党一样,面对业已爆

发的战争，经受了布尔什维克式的考验。

日本共产党在极其艰难的地下状态，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帝运动。它在日本国内的军队中和派往中国及满洲的远征军中，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工作。在这一工作中，《战友报》这个士兵的报纸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三菱军用造船公司的4000名工人竟然举行了罢工，后来罢工扩展到许多军火企业，首先扩展到军需品企业。其中有一个军火企业，工人们拒绝为海军和空军征集款项，相反地却为上海反战大会捐了款。

1933年1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确认，世界已经迫近革命与战争的新阶段。全会指出，新的世界大战危机的进一步增长（德国和日本是这次战争的主要策源地），乃是一系列国家中建立公开法西斯专政的结果。第十三次全会规定各国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主要任务是，把革命力量集中于各个关键性的备战部门，在军火企业、铁路和海运部门的工人中间进行群众性的革命工作。

第十三次全会再次指出，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国际支部，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危机的斗争中，显得软弱无力。尽管日本和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作出了布尔什维克工作的榜样，尽管法国共产党发动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声势浩大的运动，但实际情况仍然是：各国共产党的反战工作没有促成十分广泛的群众运动，那些尚未由党和反战组织直接掌握的劳动居民阶层，几乎都没有参加到这一斗争中来。

.....

（第58—62页）

六、农民工作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强调指出，争取无产阶级的主要同

盟军——劳动农民这个任务,非常重要。大会指出,大多数共产党不重视农村工作,因而责成执行委员会“采取一切措施开展农民工作,特别是在农业国(罗马尼亚、巴尔干各国、波兰等),以及在法、德、意等国”。大会接着指出,必须使非党的农民革命组织活跃起来,并给予它们全力的支持。最后,鉴于绝大多数国家中的农民是军队的基本群众,资产阶级利用种种特殊组织和宗教信仰从思想上和实际上培训农民去打仗,因而代表大会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危机的提纲中,要求各国共产党特别重视在农民中进行反帝工作。在报告所指时期,这一任务的意义更加重大,尤其对于那些遭受法西斯打击的共产党来说,更是如此。

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由于发生了世界经济危机,特别是农业危机,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农业工人和劳动农民的境况严重恶化了。这次农业危机,席卷了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涉及一切农业部门,因而大大加剧了对劳动者种种形式的剥削。在法西斯专政的国家中,农民遭受奴役和贫困的情况异常严重。由于农产品价格猛跌,农民无力缴纳强征的各种苛捐杂税、地租和贷款利息,出现了大批农户变卖家产的现象。地主把农民抢劫一空,把他们从土地上赶走。大垄断组织也利用农业合作社掠夺农民,使用投机商的种种欺诈手段廉价收购农民的农产品,而以高昂的垄断价格向农民出售工业品。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农民普遍破产和贫困的情况日益严重。在最先进国家的农村中,都出现了一支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民失业大军,更不用说在落后的农业国和殖民地国家的农村了。

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革命高潮迅速地扩展到农村,虽然发展得不平衡,但日益广泛而深入地席卷了所有的国家。

在西班牙,在推翻君主制度的同时,爆发了有广大农业工人和农民群众参加的声势浩大的土地运动。随着农民对资产阶级社会民主主义土地改革的幻想的破灭,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积极性的增

长和共产党领导作用的加强，这一运动的发展成为革命的发动。

波兰成了大规模农民发动的场所，其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群众抗拒判决的执行，集市罢业，甚至举行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民族压迫的农民武装起义等（1930年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农民起义，1933年西乌克兰的农民起义）。

随着农业危机的加剧和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农民运动也席卷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法国、美国、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农民示威和罢工，引起了同警察的武装冲突），更不用说在农业国了（罗马尼亚、爱尔兰和巴尔干国家），那里的农民骚乱和暴动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在法西斯的意大利，自发的骚乱以及为抗捐抗税和反法西斯恐怖而举行的农民群众示威活动，日益频繁。在日本，在极其深刻的农业危机的影响下（帝国主义者的军事冒险更加重了这个危机），农民和佃农日益具有革命情绪，他们积极地抵制了强制性的移民，参加了捣毁粮仓等等的活动。

中国苏维埃革命在占领区实行了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广大地区正在进行土地革命。

在满洲，数以万计的农民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

（第 64—65 页）

七、东方的革命运动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全面而详细地分析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在民族革命日益成熟和发展的情况下阶级力量的配置和斗争。同时，大会确定了东方各国共产党战略与策略的主要基本原则。在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中，根据库西宁同志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学说所作的报告，制

定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共产党的主要工作任务。这个提纲已成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机构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一段时期的工作依据。

第六次代表大会是在形势发生剧变的时期召开的,中国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势力取得了暂时的、极不稳固的胜利。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1926—1927年的起义遭到镇压之后,还没有完全恢复元气。这次起义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共产党人犯了极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而造成的。在印度,消除各派别组织(它们极力反对共产国际关于建立独立的共产党的方针)造成的严重后果这一任务,刚刚被提上日程。在印度支那以及其他许多殖民地国家中,共产党还没有建立起来。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认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建立和发展共产党,消除客观革命形势和主观条件不足之间极不适应的状态,乃是共产国际头等重要的任务之一。”在实现这个任务时遇到了一系列的客观困难,这是同这些国家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结构有关的。由于这些国家的工业不发达,所以工人阶级还很年青,而且人数较少。第六次代表大会指出:“殖民地国家没有社会民主主义传统,但也没有马克思主义传统。我们的年青的党必须在斗争的过程中,在党的建设过程中,克服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残余,以便找到布尔什维主义的道路。”

在中国革命的战线上粉碎了反革命托洛茨基主义和陈独秀取消主义,这对于东方共产主义运动在思想教育上和组织上具有重大的意义。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是声势浩大的反帝运动和工农斗争,它把群众切实地引进苏维埃阶段,它显然地表明,殖民地的共产党怎样在争取群众的实际斗争中和两条战线的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在第六次和第七次代表大会之间这段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到40多万党员,成为公认的中国苏维埃和红军的组织者和带头人,成为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

中国事态的发展过程明显地证实了共产国际路线的正确性。中国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共产主义先锋队的领导下,通过英勇的斗争建立了广阔的苏维埃政权区域,在那里实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

看看中国、印度、印度支那、日本、朝鲜和土耳其的罢工统计数字,就可以确信:在东方,真正的无产阶级干部已经成长起来,并且日益坚强起来。

年份	中国、印度、印度支那、 日本、朝鲜和土耳其的罢 工人数
1928	967,000 人
1929	1,384,000 人
1930	732,000 人
1931	1,637,000 人
1932	1,422,000 人

同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五个帝国主义国家相比较,这六个东方国家(包括帝国主义日本在内)的罢工人数,在 1921—1924 年间,仅占上述 11 个国家罢工总人数的 11%;在 1925—1928 年间,占 30.5%人;在 1929—1932 年间,占 38%。仅仅在中国一个国家,1933 年就发生了 412 次罢工,罢工人数达 660500 人。

在报告所指时期,由于经济危机的尖锐化,以及绝大多数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中革命浪潮的高涨,东方共产主义运动得到了发展。由于世界工业危机同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特殊形式的农业危机交织在一起,因而导致了下列情况:1. 殖民地农业经济的整个基础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动摇;2. 千百万殖民地生产者在帝国主义者、地主和高利贷者的盘剥下纷纷破产,农民完全丧失支付能力;3. 帝国主义资本和当地民族资本疯狂进攻工人阶级的生

活水平;4. 由于危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与殖民地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局部尖锐化起来,但与此同时,在相当大的一部分殖民地资产阶级中间,通过共同掠夺群众的办法,出现了按买办原则加紧勾结帝国主义的趋势。

东方各国共产党是在各不相同的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不容置疑的是,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时期是工人运动(首先是农民土地运动)和反帝运动在数量上和质量上迅猛发展的时期。

在印度,1930—1934年的革命高潮,是1928—1929年孟买纺织工人的罢工斗争促成的。这次罢工斗争为印度无产者建立独立的阶级组织奠定了基础。在印度支那,刚刚形成的共产党,在极短的时期内就已成为整个民族舞台上的重要因素。在安沛起义被粉碎之后,由于遭到镇压,由于领导这次起义的印度支那国民党内部腐化,印度支那共产党人在反帝运动中的作用乃开始增长。印度支那共产党善于推动工人运动向前发展,善于把反帝斗争的口号同农民土地运动的口号结合起来,否则,在印度支那就不能建立起第一批苏维埃。

在印度尼西亚,1927年起义被粉碎之后,多年来群众革命运动始终处于低落状态。但是,极其严重的农业危机和帝国主义的压榨,导致了新的革命浪潮的高涨,“七省号”军舰起义是个明显的例子。

在阿拉伯国家,这一时期的共产主义运动正处于政治思想觉醒和组织形成的阶段。

最后,对于我们所分析的时期来说,非洲(特别是南非联盟)黑人劳动居民中间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很重要的。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特别强调指出,在民族解放运动和农民运动中,必须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党的领导。东方各国共产党遵循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制定了一系列意义重大的纲领性政治文件,这些文件必定会

起到巨大的组织作用，并且已经在各国共产党的发展过程中显示出威力。这些纲领性文件的制定，促进了各个共产主义派别和政党思想上的团结，向它们提出了认真从事实际群众工作的任务，即通过捍卫那些与革命斗争最终目的有关的日常切身要求，把从事斗争的工农群众联合起来。

在印度，共产党制定了行动纲领，这个纲领成为团结党内各派别的极为重要的因素。长期以来，由于派别斗争，脱离群众，因而未能实现党的团结。荷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制定的关于荷兰劳动者和印度尼西亚劳动者结成统一战线的文件，极其有力地帮助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恢复活动。印度支那共产党的行动纲领，使1930—1931年才经受初次战斗洗礼的党掌握了武器。由于法国帝国主义猛烈地镇压了年青的共产主义先锋队，由于忽视当地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对群众的民族改良主义影响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所以，这个纲领对于印度支那共产党来说，是特别有用的武器。这类例子可以举出许多来。

关于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问题，关于共产党人实行各种不同阶级的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关于对待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的问题，以及关于巩固党和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问题——所有这些任务，始终都摆在各国共产党的工作日程上。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党，在1932年上海保卫战时期以及在1933年一年中，它在运用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面作出了布尔什维克的榜样。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到群众中去，提出了如下口号：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武装中国人民来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华苏维埃政府提议同任何武装部队停火，要求它们停止和红军打仗，承担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职责，保证国民党军队统治区的人民群众能够自由地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以抗击日本侵略者。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这一建议，使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反革命蛊惑宣传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因为他们执行的是背叛民族利益、向日

本帝国主义屈膝投降的政策。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反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借助骗人的鬼话(说什么共产党人反对南京政府就是破坏中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者,就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并在继续发动对苏区的“围剿”。

中国共产党认清了这一形势,并考虑到国内各个地区革命发展得极不平衡,认为必须争取领导全国规模的反帝运动。假如在这之前,共产党未曾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帮助下克服“左倾分子”李立三及其同伙的盲动机会主义(他们故意忽视了中国各个地区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性),那它就不可能在这方面有这样明确的认识。由于粉碎了罗章龙右倾机会主义取消派(他们力图使党投降国民党反动派),党也得到了巩固。

在上海保卫战时期,共产党提出了反帝口号,因而在发动群众起来抵抗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反帝战线的群众工作中,党表现出一些由于党内缺乏无产阶级骨干而产生的弱点和错误。党的弱点特别表现在不善于从组织上巩固自己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没有充分利用它在国民党统治区反帝工作中的合法条件。尽管这些弱点和错误还没有彻底消除,但是应该指出,中国共产党通过极其复杂的环境中的严酷斗争考验,已经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并在当前苏维埃阶段的复杂情况下,运用着列宁和斯大林关于反帝斗争的战略与策略。

与中国共产党的光辉范例相反的是巴勒斯坦共产党的情况。这个犹太人占多数的党,脱离了当地阿拉伯居民中的劳动群众。这种情况可说明一部分巴勒斯坦共产党人为什么对1929年阿拉伯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暴徒及其犹太复国殖民主义者靠山的起义持十分错误的态度。巴勒斯坦共产党的领导认为阿拉伯运动是通常的“蹂躏犹太人的暴行”,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因而遭到了共产国际的严厉指责。共产国际坚决主张巴勒斯坦党阿拉伯化。而该党领导中的机会主义分子曾企图规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

这一决议。这些分子已被党撤销了领导职务，但巴勒斯坦共产党目前还处在实现真正布尔什维克化的初级阶段，因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与它的阿拉伯化是分不开的。

.....

(第 70—74 页)

民族改良主义首先要争取控制工人的工会组织。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曾经明确指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共产党人当前最重要的共同任务，除了发展共产党外，就是工会工作了。”遗憾的是不得不承认，虽然有这项决议，但工会工作恰恰是东方共产党人工作中最薄弱的环节。东方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遭到一系列的严重失败，首先是由于对整个工会工作、对民族改良主义分子所领导的工会中的工作，采取了不够严肃的态度，采取了非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尽管工人们（特别是其中“左”翼工人）已在摆脱民族改良主义的影响。甚至中国共产党内，这种低估工会工作的情况，也还没有消除。

印度的许多同志，对参加民族改良主义所控制的工会的群众抱有宗派主义的隔绝情绪，这显然地造成了有害的后果，有助于鲁伊卡尔、坎达尔卡尔和卡尔尼克之流实现其分裂计划。同时，由于过迟地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这部分印度同志乃采取一些因错误认识而产生的错误步骤，他们认为实行统一战线似乎是放弃了对“左”的和右的民族改良主义者的切实批评。

除了对改良主义工会内的工作采取违背共产国际所有决议的否定态度之外，往往还仓促地勉强成立只有几十个成员的赤色工会。

两次代表大会之间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的农民土地运动更加空前高涨，这是世界经济危机的发展促使殖民地农业危机尖锐化和深刻化的必然结果。在印度支那、缅甸、

印度、刚果、法属赤道非洲等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在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首先在处理土地问题上的种种试图,都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江南各省的农民土地运动,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发展苏维埃运动的一个起点和基础。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1930年6月的决议中指出,必须在新区扩大“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并强调绝对必须迅速地组织中国工农苏维埃政府,同时还指出,“临时革命政府的任务是:在坚决铲除封建制度和军阀制度、压制富农和高利贷者的基础上,把农民行动联合起来,并且最大限度地使农民行动协调一致”。决议接着写道:“党应当集中注意力于解决土地问题。土地革命不应是富农的,而应是贫农和中农的土地革命。这个革命的动力应当是雇农和贫农,同时他们应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并应保证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必须坚决制止富农的各种企图,党应当对富农反其道而行之,没收一切地主、寺院和其他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把这些土地平均分配给贫农和中农,但没收的原则不适用于富裕农民。同苏区土地革命任务密切相关的任务是,要组织雇农和农村无产者工会,以及组织贫农团,其目的是要把中农团结到自己的周围,使苏维埃机关的一切设施都有利于贫农和中农。因此,就必须力求实行苏维埃机关的充分选举制,取缔富农、豪绅和半地主的选举权。党应当把农村苏维埃看作是农民群众的基本组织形式,并应在苏区采取使农会逐步融合到农村苏维埃中去的方针。”

当中国苏维埃运动刚刚形成并取得初步胜利的时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30年的决议,就十分明确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新的苏维埃阶段的任务。这个决议根据列宁和斯大林关于共产党人在殖民地革命中的战略与策略学说的原理,制定了苏维埃运动的重大的任务和组织形式。

在苏维埃土地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包庇小地主和豪绅的右倾机会主义行为,即对以牺牲雇农和基本农民群众的利益

来姑息小地主和豪绅利益的行为，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同时，党还同侵犯中农利益的“左”倾机会主义行为进行了斗争。

中国部分地区所实行的苏维埃土地革命，虽然在某些地方存在着种种实际的缺点，但使东方各国共产主义运动获得了革命经验，并具体地表现出无产阶级争取领导农民运动的有效措施。

此外，正是由于实行了共产党领导下的贫农和中农的土地革命，才为中国的苏维埃和红军的建设奠定了牢固的、真正人民群众的基础。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其他共产党在农民运动方面的成就，和中国共产党在几个省内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在1930—1931年间，领导了夺取地主谷仓的农民群众运动，初步地把反帝运动与农民夺取地主土地的斗争结合起来。在阿拉伯各国，和在印度一样，共产党人只是开始同日益革命化的农村建立联系。在南非，共产党摆脱原先的机会主义领导之后，对农民群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参加了一些农民运动。为农民提出部分要求，并围绕这些要求来宣传和发动群众——这将逐渐成为共产党日常活动的有机部分。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所有共产党中，中国党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线上取得了最大、最牢固的成绩。中国苏维埃及其红军已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因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1931年所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中写道：“党在苏区的政策，应当以进行资产阶级民主的土地革命，并把这个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为依据。目前，在日益发展的苏维埃运动的过程中，工农已在创造中国向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过渡的前提，这些前提是：由土地革命发展而来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和工农红军队伍，已成为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专政的机关。革命人民正在创造新的国家机关，这个机关可提供被压迫阶级、工人与农民中最觉悟的、最活跃的一部分先进分子的组织形式，‘因而，它是这

样一种机关,被压迫阶级的先锋队可以通过它去发动、教育、训练和领导这些阶级的广大群众……’(列宁语)。”

决议接着指出:“无产阶级在初级状态的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日益巩固,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萌芽与过渡阶段。”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指出:“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的国家形式,它可以保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等)。”

中国苏维埃运动在殖民地树立起苏维埃旗帜,为各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作出了开展反帝反封建的苏维埃革命的榜样。苏维埃在安南即在印度支那的出现,虽然为期甚短,但应当把它看作是中国苏维埃对其他国家民族解放运动产生影响的结果。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1930 年 6 月所通过的决议,对中国殖民地民族革命的发展条件和前途作了精确的估计。这一决议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同布尔什维克党在 1905 年革命的条件下设想的民主专政,有很大的区别。这种区别首先同中国革命所处的国际环境有关,同存在着苏联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有关(它正在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另一方面,中国目前的形势可以指望共产党将成为政府中的多数。无产阶级凭借这一点,就可以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国家政权上实现对农民的领导,同时必须考虑另一情况,即中国革命不仅要同封建制度进行残酷的斗争,而且要同中外资本家进行残酷的斗争。中国的民主专政必将没收那些属于中外资本的企业,因而不得不采取一些极其重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步骤。存在着社会主义成分,这就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特点。中国革命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同十月革命相比,要经过更多的过渡阶段,但它可大大缩短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时间,而且由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向社会主义阶段的过渡,远比根据 1905 年革命的条件所设想的这种过渡快得多。”

这个分析使中国共产党人在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共产党的领导的斗争中明确了方向,增强了信心。同时,这一决议,对那种空谈“超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任务的“左”倾冒险主义的企图,对共产党人规避按苏维埃方式解决这种任务的偏向,对以行政命令方式去建立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意图,乃是一种警告。决议指出,中国革命采取一些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将直接牵涉到冲击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命脉,将直接关系到苏维埃运动在全民族、全中国范围内的胜利。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集团,正是企图从这方面攻击共产国际的路线,而他们鼓吹的是机会主义的投降主义路线,主张无产阶级不去领导解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的各项任务,从而帮助了富农维护其半封建特权。

中国革命工农在拥有数千万人口的广阔领域内取得了胜利,确立了苏维埃制度,实行了土地革命,并且已把这些地区变成模范的苏区,这是非常诱人的有力因素。

国民党统治区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众,已有可能把捍卫劳动人民利益的苏维埃制度同反革命官僚的残暴统治加以实际对比。共产国际的领导在给中共中央一系列的指示中,曾多次着重指出模范苏区所作的生动而具体的榜样的重要性。

.....

(第 70—81 页)

乙、关于共产国际各支部活动情况的资料

.....

中 国

1925—1927 年中国大革命失败之后,遭到惨重打击的中国共

产党,在过去六年中不仅恢复了元气,而且发展成为团结一致、坚强的党。现在,它领导着苏维埃国家、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非苏区广大工农群众的斗争。六年来,中国共产党经受了一系列严酷的历史性考验。它在这些年里的发展过程,可分为如下三个主要时期:

1. 从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到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开始(1928—1930年)。

2. 从新的革命高潮开始到中共四中全会(1930—1931年1月)。

3. 从中共四中全会到现在。

1928—1930年这一时期,正如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切断定的,是中国革命运动两个高潮之间的时期。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其《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决议中,规定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如下:

“目前,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时期,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群众,即在工农中间进行群众工作,重建他们的各种组织,利用各种不满情绪来反对地主、资本家、军阀、外国帝国主义分子,以便开展革命斗争。为此,必须千方百计地巩固党的本身。群众起义的口号应变为宣传口号,只有在群众真正准备就绪,革命新高潮已经到来的时候,这个口号才能在更高水平上,在以苏维埃为基础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旗帜下,重新成为直接实践的口号。”

中国共产党正是遵照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这一指示,把争取群众与巩固党本身的工作结合起来,从而在较短的时期内做好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准备。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前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新的革命高潮的初步征候(虽说还不十分明显)已经出现了:

“最先可以说的,便是经济斗争的群众罢工已经有复兴的现

象。工人群众对于国民党的幻想迅速地消灭。……再则，反帝国主义运动又在生长，不但激起工人群众，而且还有一部分革命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起来参加。”

决议进一步指出：

“……至今保存的苏维埃政权的根据地(南方各省)及其少数工农革命军,更要成为这一新的高潮的重要成分。”^①

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选出的新中央委员会,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项指示。

在争取群众方面,党首先着重于保存和巩固当时还很小的第一批苏维埃根据地,以及为数不大的红军部队和赤色游击队。正因为如此,虽然困难很多,敌人的力量占相当大的优势,而且湖南、湖北、江西和广东等省许多县的农民发动屡遭失败,但是红军和赤色游击队的部分精锐部队不仅在这些省里保存了下来,而且还逐渐加强和扩大了。这些成果是由于下列原因取得的:

1. 这些部队一直处于正确的、强有力的共产党领导核心指挥之下。这个核心的领导人是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黄公略(1931年8月第三次反“围剿”时牺牲了)、贺龙等同志,他们都是年青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富有才干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2. 这些部队的大多数战士是无产阶级的骨干:安源大煤矿的矿工,武长路和平汉路的铁路工人,景德镇的瓷器工人等等,他们是在革命失败后由于遭到迫害而到农村参加农民游击队的。

3. 这些部队的领导基本上实行了正确的政治措施:首先,尽量满足劳动群众的切身要求;没收地主和土豪劣绅的粮食和财产,

^① 见:《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0页。——原编者

并将它们分给农民和贫民；废除租佃、捐税和高利贷等的盘剥性契约；尽量把从地主武装、警察和敌军那里缴来的枪械武装劳动人民；废除反动政权，建立苏维埃等等。这些部队的领导还实行了巧妙的战术：以小部队形式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尽量避免同优势敌人作战，选择有利时机和地形打击敌人；对敌人进行突然袭击；发挥自己部队的最大机动性；竭力保存和加强自己的有生力量等等。

同时，在中国的大城市中，共产党的工作路线首先是极力扩大党在工人群众中的政治影响，恢复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由于组织了各种形式的工人阶级日常经济斗争（从参加请愿到组织群众性罢工），由于把工人的经济斗争同政治要求结合起来，首先是同反帝口号结合起来，以及由于在企业中进行了耐心而细致的工作，以争取部分工人甚至个别工人，党终于在较短的时期内，在最大的工业中心，首先是在上海及其他城市，恢复了自己的战斗阵地。为庆祝 1929 年“五一”节，成千上万的上海工人举行了罢工和示威游行；为纪念 1925 年上海五卅惨案四周年，上海及其他城市数以万计的工人和学生举行了游行示威；在许多城市和乡村，工人、农民和学生以英勇的上海无产阶级为榜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战斗性的示威游行，他们高呼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推翻国民党政权、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等口号（1929 年 7 月 16 日和 1929 年 8 月 10 日等示威游行）；罢工斗争迅速地发展起来（1928 年参加罢工的人数为 30 万人，而到 1929 年已将近 70 万人）——所有这些事实无可辩驳地表明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战斗积极性已开始恢复，它的共产主义先锋队 in 革命严重失败之后已得到加强。

党不仅抓住一切重大事件（例如：日本进攻山东、中东铁路冲突等等），而且还抓住帝国主义分子残暴屠杀中国人民的个别事件（例如：美国驻沪海军陆战队杀害开老虎灶的老板张学良，日本驻汉口海军陆战队杀害人力车夫水杏林等等）来发动和组织群众性

的抗议，举行群众集会、示威游行和罢工，以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国民党政府的民族背叛行为。党在反帝工作和反帝斗争中，始终把群众的局部要求同党的基本口号联系起来，因为没有人民的武装起义，就不能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不推翻中国的军阀制度，就不能真正解放中国人民。党以群众的切身体验使他们懂得，必须坚决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军阀、地主和资产阶级。

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和教育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党深入到群众的一切生活领域，并积极地参加了群众的斗争，各个苏维埃根据地和红军部队的斗争同游击运动和非苏区城市工人及小资产阶级先进阶层的群众革命斗争相互配合——这一切，毫无疑问地加速了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中国共产党在争取群众方面能取得成就，是党极力争取巩固自身的结果。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在短时期内向前迈出了一大步。由于革命的惨重失败，在某些党组织里，那些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当中的动摇分子非常慌乱，不知所措，悲观失望。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为中国共产党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聚集力量打下了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党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进行严肃的斗争。党把斗争锋芒首先指向各级党组织在理论与实践普遍存在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这种倾向的具体表现是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个人恐怖行为和国民党式的对待群众（命令方式）。当时，这是一种使党脱离群众的极其危险的倾向，它在客观上有助于反动派反对革命群众的斗争，使党难以完成争取群众这一主要的任务。党同这种敌对无产阶级组织纪律性的“左”的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种倾向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党费了很大力气才克服了这种倾向。

与此同时，很快地明显暴露出右倾机会主义倾向，这是党的主

要危险。它的表现是：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不相信新的革命高潮会到来，坚信反革命已取得“完全胜利”和“革命已彻底失败”，希冀非法的战斗性的共产党变成适应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制度的合法的政党，对群众革命斗争抱悲观态度。这种失败主义的论调，首先在陈独秀主义的残余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应声虫中得到了支持。一部分党的负责人企图把党拉向公开的右倾机会主义立场。他们用国民会议的口号来代替苏维埃的口号，用“工、农、兵、学、商联盟”的口号来代替“工、农、兵和贫民联盟”的口号。党对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展开了无情的斗争，认为这是公开的取消主义倾向，是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同时，党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以便在企业、农村、兵营和学校中恢复原有的支部和建立新的支部，在大城市和重要农业区恢复原有的党委会和建立新的党委会，教育新老干部适应新的秘密条件下的工作，即在工作中采取新的方法、严守秘密并尽量利用合法机会。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内不断地在两条战线上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党的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才得到了巩固。这种党的力量的团结，乃是党在争取群众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一个基本条件。

顺利进行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和党的力量迅速聚集起来，其具体表现是：中国共产党在1929年中东铁路冲突事件中出色地经受了考验。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党揭露了国民党沙文主义的恶意宣传，反击了托洛茨基陈独秀分子（他们公开反对“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已被清除出党）反革命取消主义的行为，在各种群众活动场所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在这一口号下，党号召并组织群众对“本国”（即中国）军阀和国民党这些帝国主义的仆从和走卒展开英勇的斗争，因为帝国主义者企图利用中东铁路的冲突事件挑起反革命的反苏战争。中国共产党在中东铁路冲突事件中的活动，作出了真正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榜样。这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革命运动史上，而且也在共

产国际和国际工人运动史上是极其光荣的一页。

年青的、缺乏经验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路线，但在这一时期，在个别问题上也犯了一些右倾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有些领导人和有些地方组织曾有过联合富农的理论和做法；不愿意在那些参加国民党工会和黄色工会的工人群众中进行工作；过高地估计资产阶级和地主之间的矛盾；错误地估计军阀战争的性质等等）。

第二时期，从1930年起至1931年初止，这是中国新的革命高潮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左”倾李立三路线和右倾反革命罗章龙路线的斗争中争取建立和巩固正确政治领导的时期。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1929年6月）指出，中国革命新高潮的条件已经成熟。1930年春夏两季，革命解放斗争开始迅速而明显地发展起来。工人阶级和农民再次起来进行斗争，提出了开展土地革命、消灭帝国主义统治、推翻反革命国民党政权的口号。

苏维埃根据地、红军部队和赤色游击队开始迅速发展起来。在华中和华南各省的许多县中，农民纷纷举行起义。但是，在中国，这一新高潮的发展情况是不平衡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新的革命高潮最初大都在1925—1927年有了革命基础的地区成熟起来，后来才逐渐地扩展到其他地区。

这种情况也表明运动在革命新高潮的最初阶段具有一定的弱点，进行斗争的群众当时还不能控制各工业中心。因此，斗争双方力量的一般对比，最初不利于工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是依据下列情况分析这一斗争阶段的：虽然在中国一些地区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新的革命高潮，但是还不具备全国范围的客观革命形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浪潮还没有汇合到一起，总的说来，它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冲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制度。根据对形势的这样分析，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任务规定如下：1. 建立和加强战斗力

强大和政治上坚定的红军;2. 在红军所保卫的坚强根据地上建立临时中央苏维埃政府;3. 在苏区广泛组织工人工会、雇农工会,组织贫农团;4. 在非苏区大力开展反帝反国民党的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

党在苏区和非苏区的斗争和工作,被看作是两位一体的任务。后来所有的事件都证明这种观点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在中国革命极其严重的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部分领导人却采取了与这一观点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

早在党的机关刊物《红旗》和《布尔什维克》的四月和五月号上,就登载了李立三的纲领性文章。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这些文章,通过了一项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体现半托洛茨基主义的李立三政治路线的决议。

李立三路线的实质是用“左”的词句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表现。在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应同时胜利这种“左”的句子的掩盖下,李立三否认中国革命能够战胜帝国主义。在中国革命现阶段属于“社会主义”性质这种“左”的句子的掩盖下,李立三把解决极其复杂、困难而现实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即苏维埃革命、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的任务,从日程上一笔勾销了。

在党要军事化、力量要集中化这种“左”的句子的掩盖下,李立三分子取消了群众性的革命组织(共青团、赤色工会等等),而间接地也就是取消了党组织。党内出现了极不正常的情况——没有任何自我批评,搞派别活动等等。

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革命形势已同时成熟这种句子的掩盖下,李立三分子否认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性,对红军布置了为时过早而且不能胜任的任务(攻打各大中心城市),强迫地方党组织接受他们冒险性的盲动主义策略(把城乡武装起义当作儿戏)。

李立三路线反映了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情绪,因为他们不堪忍受帝国主义和中国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的残暴统治,但是,当斗争

遇到困难时，他们就会动摇和投降。由此可见，这种倾向或者叫做冒险主义和政治上的歇斯底里狂（希望不仅在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立即取得革命胜利），或者叫做投降主义（如果革命这条路走不通，就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作出任何的让步）。

“现在人人都明白立三同志反共产国际的路线，给了党极大的损害……最主要的实际恶果是：党对于群众的影响和联系是削弱了。党动员群众的能力是大大缩小了，一切群众团体的行动是削弱了，我们的职工运动是向后后退了……罢工运动……远远的后退了。

“……立三同志对于拥护共产国际路线的同志，实行压迫的制度，引导了党内生活到完全非常状态的地步……一方面使托洛茨基陈独秀派的行动，另一方面使党内右倾分子的行动，都得以乘机活跃起来。”（摘自中共四中全会《关于政治形势和党的总任务》的决议）^①

李立三及其拥护者坚持抵制共产国际的路线。1930年9月召开的中共三中全会（由瞿秋白同志主持），非但没有纠正党领导的错误和贯彻共产国际的路线，反而对李立三路线采取了调和主义的态度。为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了告中共全体党员的公开信，揭露了李立三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同时，党内反对李立三分子的斗争也完全粉碎了他们继续执行其路线的一切试图，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李立三分子才放弃了他们的反党立场。

中国共产党终于铲除了李立三路线，在炮火连天的严酷战斗中，在极其秘密的地下环境中，当时已经造就和锻炼出一批以陈、

^① 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3页。——原编译者

秦、王、沈、何等同志^①为首的坚强而又正确的共产党干部,当党的中央机关刊物上出现李立三的纲领性文章时,他们就起来同反共产国际的、非布尔什维克的李立三观点展开了斗争。

由于共产国际反对李立三路线,加上共产党内部的布尔什维克干部也反对这条路线,中国共产党乃得以顺利地纠正自己的路线,党的工作也就纳入了正常的布尔什维克轨道。

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个发展时期,从1931年初到目前,这是共产党迅速布尔什维克化的时期,是苏维埃革命在大片领域上不断取得胜利的时期。

1931年4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确认,中国已进入革命危机时期。第十一次全会指出:“在中国,革命危机表现为在拥有数千万居民的地区内已经组织了苏维埃和红军,从而使中国跃居于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的首位。苏维埃和红军的成立,使无产阶级能够在民族革命运动中,在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运动中,顺利地实现其领导权,而这一领导权,已在萌芽状态的国家政权中得到巩固。”

最近几年,在中共四中全会新选出的政治局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和巩固苏维埃革命的胜利方面,以及在团结自己的队伍及其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四中全会之后,新政治局为实际解决党所面临的各项基本任务,实行了一系列具体的政治措施和组织措施;恢复和加强了苏区的领导(在中央苏区设立了中央委员会中央局,在其他所有苏区设立了党中央的代表机构等等);加强了红军的无产阶级骨干和共产党员骨干(从上海及其他城市派去将近200名有军事素养的共产党员,其中大都是工人);改进了红军中党的教育工作(建立和改进了红军中的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制度,并加强了他们的工作);准备

^① 原文未写全名,此处照译。——原编译者

了苏区立法方面的基本资料,通过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经济政策和工农红军建设的基本条例的决议;为第一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做了筹备工作;恢复并加强了实行李立三路线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涣散了的党组织、共青团、工会及其他群众性组织;在工农群众中开始有步骤地经常进行工作,以便组织他们去进行反帝反国民党的斗争;最后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为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克服李立三路线和罗章龙路线的残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在1931年间基本上能够完成三位一体的任务:1. 牢牢掌握相当大的根据地并继续扩大根据地,借以建设和巩固红军;2. 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由这个政府在自己统治的领域内彻底实现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的基本口号;3. 开展非苏区的群众革命斗争——这是共产国际在英勇的红军粉碎了蒋介石第三次对苏区的“围剿”,粉碎了苏区的地主富农残余势力的多次反革命暴乱之后,向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任务。共产党1931年所取得的成就,为进一步开展更大规模的斗争,为中国苏维埃革命以后几年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1931年9月发生满洲事变和全国出现新形势的情况下,共产党提出了符合当时党的主要任务的新策略性口号:1. 用武装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去反对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者,以保卫中国的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2. 推翻卖国、辱国的国民党政府是胜利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条件;3. 只有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才是为彻底争取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斗争的唯一的政府和军队。

共产党在争取实现这些口号的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成就。红军粉碎了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19路军士兵和上海工人进行了英勇的上海保卫战,满洲的抗日运动和游击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蓬勃高涨起来(参加罢工和冲突的人数达1214700人)——所有这一切,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1932年9月)估计中国形势时确认,那里“已出现革命形势,

而且在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土上,苏维埃革命已取得胜利。”在1933年,苏维埃革命继续取得了胜利——红军粉碎了蒋介石对苏区第五次大规模的“围剿”,在四川和陕西两省建立并巩固了广阔的新苏区(这对全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共产党在满洲、热河和华北群众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影响日益增长;而同时,帝国主义为最后瓜分中国加紧进行扩张(日本占领热河、山海关和华北的一部分,英国进攻川边和云南,法国占领南中国海的九个岛屿等等),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国民党内部进一步分裂,19路军与蒋介石之间爆发了公开的战争——这种情况使中国出现了“战争、武装干涉和革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的决议)的形势。

1934年1月22—27日,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不但有来自各苏区、各大城市和中国主要省份的代表,满洲和热河抗日人民革命军和抗日游击队的代表,而且还有来自朝鲜、福摩萨、印度支那和爪哇的代表。大会提出了下列中心工作任务:要顺利地组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世界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为推翻国民党统治并在全中国建立独立、统一的苏维埃共和国而奋斗。大会完全一致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大会又一次实际证明了世界无产阶级领袖斯大林同志的这一十分正确的指示: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使之彻底摆脱混乱和贫困。在矿山、丝织和纺织工业部门,在开滦煤矿,在上海、天津、芜湖和杭州等城市,罢工浪潮持续不断,工人武装反抗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的警察、军队和宪兵的事件层出不穷,在满洲,抗日游击运动和群众性的农民起义迅速发展——这一切都说明了中国非苏区的革命运动已取得新的胜利和发展。

具有重大意义的辉煌成就,是中国红军在反对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中取得的。在这一时期,红军经受了苏区第六次大规模的“围剿”。在这最后一次,即第六次“围剿”期间,战斗特别持

久而又激烈，因为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在帝国主义者的全面援助下，调动了装备精良的 50 多万大军集中进攻中央苏区。

目前，对苏区的第六次“围剿”可以说已经结束了。这次“围剿”的结果怎样呢？

丢掉相当大的一部分中央苏区，这是十分显然的损失。但是，这种地域上的损失，不仅应看作是暂时的事情，不仅红军在其他省份夺占的地域能予以补偿，而且第六次反“围剿”的一系列积极的成果要比它大得多，这就是塞克特将军和蒋介石的计划，即战略包围和歼灭中国红军的计划破产了。尽管敌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他们没能达到这一目的。红军非但在人数上没有减少，而且在激烈搏斗的过程中大大增加了有生力量，红军部队反而增强了。

还不止如此。过去，红军主力主要是在中央苏区内进行防御战，而现在，已能采取更为积极的机动战术了。红军主力与红军其他部队已能更好地协同作战，红军把相当大的一部分力量分成许多游动部队，它们能够各自单独行动，以保卫某一固定的地域。此外，过去多年以来，中央苏区处于不断内战的环境中，不得不连续遭到六次大规模的“围剿”，而现在，它已经有了建立更加稳固、更加可靠的中国苏维埃政权根据地的条件。

第七军团和第十军团已成为抗日救国军的先锋部队，华中和华北各省都以它们为榜样纷纷成立这种部队，这就更有可能把群众动员和组织起来，由武装的人民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

第六次反“围剿”以后，在中国为建立苏维埃而进行的武装斗争出现了极为有利的前景。目前，中国红军进行胜利斗争的条件和前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优越。

最近几年，共产党不仅在苏维埃和红军的英勇斗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而且在非苏区的革命工作中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共产党在非苏区取得的重大成就,首先表现在下列几方面:1. 群众性的反帝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有些地方竟发展到对帝国主义进行武装斗争的程度,共产党在运动中迅速地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影响;2. 共产党和赤色工会在工人群众的罢工斗争中的势力日益增长;参加国民党黄色工会的工人有所转变;3. 在原先群众革命运动发展得很差的地区,共产党的影响日益扩大,无产阶级对农民群众的领导不断加强。例如,在华北五省中,一年里(从1932年年中到1933年下半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了至少25次农民起义,其中一部起义取得了胜利;通过这种起义,在四川、陕西、河北、山东等省升起了苏维埃政权的旗帜;4. 尽管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但共产党在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当中的影响显然迅速地增强了;5. 共产党进行工作的结果,南京军队中多次爆发了反对国民党的兵变,士兵纷纷倒戈,投奔红军,这类事件屡见不鲜。

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胜利和成就,乃是共产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进一步加强以及党本身的进一步发展的直接结果。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时,中国共产党已拥有党员41万人,其中6万人在非苏区。

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绝不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它是通过两条战线上的毫不调和的不懈斗争,即在反对一切背离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总路线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非苏区,党对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否定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对革命工会运动持取消主义态度,在上海保卫战期间不愿意武装工人等等)和宗派主义(不愿意和不善于在那些加入国民党黄色工会的工人中间进行工作,不善于建立工人群众的统一战线等等),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某些党和工会工作人员轻视在黄色工会中工作的现象,目前还没有完全克服。在反帝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党反对那种认为不能开展民族革命战争、特别是认为战争不能取胜的想法,同时也反对那种阻挠建立广泛的抗日、反帝统一战线的意图。在农民运动中,党反对

随随便便举行地方起义，同时也反对那种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不愿组织游击战争的倾向。在苏区，党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坚持了对国民党进行反“围剿”的路线，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论调。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曾叫嚷红军无力战胜优势的敌人，提议把红军正规部队分散为零星的小游击队，不战而放弃牢固的根据地。同时，党也反对了那些“左”的冒险主义分子，他们总是把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看作是“僵尸”，说什么“红军还没有遇到过强大的敌人”。

在土地问题上，党反对不断重新平分业已分配给基本农民群众的土地，因为这种做法会损害农民的利益，会挫伤农民经营家业的热情；党还反对拖延没收地主土地和阻挠把地主土地分给农民这种机会主义的叛卖意图，这种意图反映着地主残余势力力图保住自己的土地。

在工会运动方面，党反对那种轻视苏区工会开展日常经济斗争（其目的是改善工人群众的物质状况）的保护性职能的态度，同时，党还反对那种把局部的、暂时的和部分人的利益同工人阶级（苏维埃国家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的根本阶级利益对立起来的倾向。

在党和苏维埃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党反对各级党组织忽视党在苏维埃机关中的领导作用，同时，党也反对党组织代替苏维埃组织的倾向。

除了对形形色色的动摇和倾向开展思想斗争外，共产党还采取了一系列组织措施，以巩固党的队伍和提高党的战斗力。其中主要的措施如下：1. 增加党员中的工人成分（1930年工人党员占5%到7%，现在已占20%到25%）；2. 提拔、培养和正确使用一批在国内战争和阶级搏斗中锻炼成长起来的新干部；3. 恢复和发展支部的活动，以便使企业中的党支部变成团结广大群众的核心；4. 发挥地方党组织工作中的独立性、主动精神和实际效果；5. 加强实际有效的领导（首先是指导等等），减少书

面指示和发布行文;6. 改进党的秘密出版工作,充分利用一切合法机会来进行宣传和鼓动,利用“左翼”自由派的机关刊物,甚至利用最反动的报刊杂志;7. 改进地方党组织和苏区的党团工作,以便使它们与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加强它们在苏维埃、红军、工会和贫农团中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特别是最近几年的发展道路,是为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而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现在已成为共产国际最优秀、最强大的支部之一。中国共产党近几年来所做的一切,已具有世界性的历史意义。

以苏维埃政权形式建立了工农革命民主专政。今天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不是资产阶级国家,仅就它的领域内已没有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权利这一点,就可以显然地看出来。但是,对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来说,还不能提出、也不可能直接提出消灭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尽管它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苏维埃国家,而且由唯一的执政党共产党实行绝对的领导,但它还不是无产阶级国家。这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在目前条件下建立这样的国家困难还很大,因为苏维埃革命不但没有取得全国性的胜利,而且现有的苏维埃领域也还没有连成一片,并且没有起决定性作用的工业中心。

苏维埃中央政府领导着所有地方苏维埃。它依靠着正规的工农红军、赤卫队、赤色游击队和青年卫队。它设有维护革命秩序所必需的国家机关,如革命人民法庭、工农警卫队和国家政治保安局的武装部队。它根据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律来管理国家。按宪法规定,苏维埃政权的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是由选举产生的,并定期进行改选,它们是在所有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参与之下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在苏维埃选举中享有某种优先权。实行男女平等,帝国主义的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已被全部废除。地主阶级通过农民土地革命而被消灭。资本家和富农受到限制。按土地法规定,农民获得了从地主、军阀、土豪、劣绅那里

没收来的土地。按劳动法规定,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并有权监督生产,对失业者实行社会保险和国家救济。在苏维埃领域内,废除了国民党军阀和官僚的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所得税;允许贸易自由,但受一定的限制,其目的是防止资本家投机倒把、怠工破坏,以保障红军和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除允许对工业企业(在苏区通常是小型的、手工业工场之类的企业)和商业自由投资之外,还广泛地发展居民的合作社事业,组织国营的苏维埃企业。所有这些措施,可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使农业、商业和运输业得到发展,以保障苏区的供应和对付敌人的经济封锁。由于广泛地组织了春耕和秋收运动,国家帮助农民解决了肥料、耕畜和种子问题,所以苏区的收成与革命前的水平相比,增加了20%到30%。广泛建立了苏维埃工农银行以代替高利盘剥的银行,及时地用低息和无息贷款来帮助工人和农民。除了使用旧专家之外,还造就了自己的苏维埃工作干部;尽管在军事和经济方面困难重重,但苏维埃政权还是广泛地建立了人民教育机构,有些地方兴办了高等学校(共产主义大学、军政大学等等),92%的学龄儿童进了人民学校,即所谓列宁小学。

中国苏维埃政权已扩展到拥有数千万居民的领域上。全世界实际上已承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存在。而中国某些军阀政府在法律上也已予以承认。随着进一步占领全国的工业中心,随着无产阶级和贫农组织性的加强,随着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巩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将逐渐转变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巩固新型国家(苏维埃形式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经验,具有伟大的世界性的历史意义。这一经验显然地证明:苏维埃政权确实是世界性的制度,它不仅适合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而且也适合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它不仅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而且也是在无产阶级及其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形式。中国共产党的经

验,不仅使殖民地国家的劳动者懂得怎样去进行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怎样去建立苏维埃政权,而且还有助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者和劳动者在苏维埃的旗帜下去争取自己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的第二项成就,就是在组织反帝民族革命战争和反对本国地主资产阶级政府(卖国辱国政府)的斗争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在非苏区,中国共产党乃是人民群众反对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者的唯一领袖和组织者。1931年春夏,接连不断地发生日本向中国人民挑衅的事件(蹂躏和大批屠杀旅朝华侨,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万宝山地区中国农民的土地,因而发生了中国农民与日本军警的武装冲突,等等)。国民党声称,所有这些事件是“偶然的、地方性事件”,建议日本人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些问题,并禁止举行任何群众性的反日运动。共产党组织了群众集会、示威游行和罢工,以抗议日本帝国主义蹂躏和侮辱中国人民,并向群众指出,这些事件决不是偶然的行动,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过精心策划、一手制造的,其目的是要进一步扩张和占领满洲以及中国的其他领土。日本占领满洲之后,共产党无视国民党极端可耻的“不抵抗”政策,一方面动员了党自身的力量,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组织了人数众多的群众集会、示威游行、罢工和抵制,以反对日本占领满洲;另一方面,积极地把群众发动起来,使得国民党和黄色工会所召集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也采纳了共产党提出的战斗口号——反对日本侵略者,反对国民党卖国贼。1931年10月10日,共产党组织了上海工人、学生和城市贫民6万人的示威游行。共产党在南京组织了以北京大学学生为首的来自全国各大城市的10万学生的示威游行。率领北京大学学生的是英勇的共青团员杨同志,他在学生与蒋介石宪兵的街垒战中牺牲了。在这次示威游行的同时,学生们痛打了南京政府的部长和国民党中央委员蔡元培和陈铭枢,解除了南京卫戍部队的武装,捣毁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同军队进行了

街垒战。1932年1月初，上海的工人、学生和城市贫民举行了7.5万人的示威游行，抗议刽子手蒋介石在南京屠杀学生；这次示威游行以后组织了审讯上海市长吴铁城及其他国民党凶手的“革命人民法庭”，捣毁了国民党市党部。所有这些示威游行都是共产党组织的，党的口号是：“武装民众，把日本及其他一切帝国主义者从满洲和整个中国赶出去！”“打倒卖国辱国的国民党政府！”“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的中国人民的唯一领袖共产党万岁！”“拥护工农红军，工农红军是为保卫我们祖国而血战到底的唯一的人民军队！”“中苏工农兄弟联盟万岁！”“打倒帝国主义强盗联盟——国际联盟！”等等。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对中国进行掠夺战争，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日益严重，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建立反帝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浪潮与日俱增。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集团，为了掩盖其卖国贼的真面目，乃利用群众对帝国主义暴行的理所当然的愤怒，一直千方百计地设法把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诬蔑为“民族团结”的障碍和“民族自卫战”后方的捣乱者，一直拼命地反对共产党和红军，叫嚣什么“攘外必先安内”这一蛊惑人心的口号。

满洲事件一发生，共产党就针对蒋介石实行的不抵抗政策，立即提出了这一战斗口号：“人民武装起来，把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赶出去。”在上海保卫战期间，当南京政府和19路军指挥官公开出卖这次英勇保卫战的时候，中央苏维埃政府正式宣布了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神圣的民族保卫战争。

当日本侵占了山海关、蒋介石发表“必须肃清赤匪，这是武装保卫华北的条件”的“示威性”声明时，中央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告全国军民书，中国红军准备同任何武装部队和任何军队订立武装抗日的作战协定，其条件如下：

1. 停止进攻红军；
2. 保证人民享有一切民主权利和自由：出版、结社、言论、罢

工、示威等自由；

3. 保证人民享有武装和广泛组织抗日义勇军的自由。

当日本占领了热河和华北，蒋介石和汪精卫公然宣称中国贫穷无力、不能武装抗日的时候，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团体乃向千百万群众广泛宣传了组织和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拯救祖国的纲领。在这一严重的对敌斗争中，共产党不只是提出了总的方针，而且还在动员、团结和组织群众去同帝国主义作斗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苏区，它废除了一切帝国主义特权，教育红军和群众做好同日本及其他一切帝国主义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战斗准备。在上海保卫战期间，共产党实际上做出了布尔什维克的反帝工作的榜样。共产党除了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尽力支援参战的士兵和工人外，还动员了党的积极分子、普通党员、工人、城市贫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到前线和敌人大后方去，拿起武器同日本的海空军、重炮兵和步兵进行战斗，共产党在上海和全国各地组织了群众性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在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这样做。多伦和察哈尔的英勇保卫战，并不是冯玉祥或方振武进行的，而是受共产党影响的那些部队违背其最高指挥部的意志进行的。在满洲和热河，共产党一直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只有共产党组织和领导了反对日本侵略者和“满洲国”政府的广泛反帝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一切力量。中共中央在发展满洲抗日游击运动问题上，做出了建立战斗性的统一战线的榜样。中共中央1932年初给满洲各级党组织的信中，不仅提供了一般的正确策略方针，而且对于实际运用这一策略也作了具体的指示。

同时，除日本帝国主义外，英、美、德、意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强盗也日益加紧他们对中国的扩张。英帝国主义借助其西藏的代理人武装侵占了整个川边省，藏军继续向云南和四川边境推进，并极力设法打算占领新疆。法帝国主义占领了南中国海中的9个岛屿，并加紧准备武装占领云南和广西。美帝国主义以“同情中国人

民抗日斗争”为掩护，千方百计地企图加强它在中国最富饶地区的势力，并为夺取整个中国和太平洋沿岸的霸权加紧准备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德、意帝国主义者，除供应军火外，还为蒋介石派遣了敌对中国人民及其红军的军事技术专家，力图在中国推行以蒋介石为首的法西斯运动。国际联盟以“在技术上援助中国”为掩护，推行着国际帝国主义监管中国和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真正政策。蒋介石集团和国民党所有派系都是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代理人和工具。只有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者奴役中国的每一步骤，号召中国人民起来以革命方式推翻一切帝国主义者在华的统治。因此，共产党现在已成了一致公认的、唯一的中国人民领袖和组织者。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准备并实行民族革命战争，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保卫中国的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正因为这样，党揭穿了国民党的骗人伎俩，终于把自己的口号变成群众的口号。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成了远东力量对比中的巨大因素，成了世界政治生活中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中国共产党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它的工作中还存在着许多严重的弱点和错误，这首先表现在党在非苏区的工作方面。共产党在建立广泛的反帝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中，还不够积极，不够灵活；党在工会运动方面的工作有不少弱点，在敌人的群众性组织中，首先是在黄色工会内部，争取这些工会的会员群众到我们方面来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党在敌人武装部队中的工作，还非常薄弱；在进攻苏区的国民党部队的后方开展群众性的游击运动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党中央看到而且认识到党的工作中的这些缺点，正在为克服这些缺点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以争取在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伟大国家中获得苏维埃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的彻底胜利。

丙、青年共产国际

中 国

中国共青团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根据当时中国急剧变化的形势和任务,重新安排了自己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它积极地帮助了共产党粉碎陈独秀分子的思想体系和实际活动,使革命的口号深入到群众中去。中国共青团始终为实现党的路线而奋斗,它反对先锋主义,反对所谓共青团必须“年青化”的论调,即把它变为少年组织的论调,同时它在严酷的秘密条件下运用了布尔什维克的工作方法,因而能够同工农青年建立并扩大联系,使共青团在争取建立苏维埃的斗争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到1929年底,据不完全的统计,中国共青团在白区已拥有团员1.8万人到2万人。

李立三路线严重地阻碍了共青团的发展,大大削弱了共青团本身。李立三领导集团对共青团采取了公开取消主义的立场,并说什么“俄国没有共青团是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一个优点”。中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是李立三路线的积极拥护者,因此,共青团一度成为孤立的、互不联系的组织。其结果,中国共青团的团员人数日益减少,群众性的附属组织几乎全都取消了。在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积极干预之下,更新了共青团的领导,充实了一批能进行布尔什维克群众工作、能对曲解党的路线进行斗争的新干部(主要是工人干部)。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第十一次全会讨论了中国问题(1931年4月)。在这次全会以前,共青团的工作已经取得初步成就:动员青年工人参加红军,提拔和培训工人干部,开展军阀部队中的工作,领导青工的经济斗争等等。为了加

强苏区的共青团工作,在各重要地区设立了中央执行部,并且派出了许多同志到红军活动区去开辟和进行共青团工作。共青团经常募集志愿兵补充红军部队。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部队增添了一个少共国际师,这个师是根据共青团的倡议,由共青团员和非党青年组成的。中国共青团经常募集钱款、大米和布鞋等等,给红军以物质上的大力支援。有些地方,共青团员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来帮助红军家属。由数十万人组成的群众性的辅助组织“青年近卫军”,积极地参加游击活动,它是红军的预备队。在苏区,共青团大力协助党巩固苏维埃政权和打击阶级敌人。共青团还专门做捍卫青工利益的工作。在苏区,共青团是真正群众性的组织,它拥有 20 多万名团员。

共青团大力协助党发动群众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参加筹建反日民众同盟,组织该同盟的青年支部,吸收劳动青年的整个集体(学校和俱乐部等)参加到青年支部中来。在上海保卫战时期,共青团发动了青年参加工人义勇军,并到 19 路军的士兵当中进行政治工作。共青团在组织群众性的学生反日运动中,也起了重大的作用。最近几年,共青团在开展青工的经济斗争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就(1931 年上海举行了 20 次青年罢工,1932 年举行了 40 次纺织工人罢工,1933 年参加了多次罢工斗争)。但是,中国共青团所组织的罢工,一般只限于在小企业中。随着共产党和共青团在青年当中政治影响的生长,没有及时吸收青年参加党、团组织,不善于掌握新入团的青年,以及反帝斗争与日常经济斗争配合得不够——这一切,是中国共青团在白区工作中的重大缺点。

(第 536—537 页)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关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 大会议事日程的决议

(1934年5月28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为了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的决议^①,在1934年5月28日的会议上通过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下述日程:

- 1)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的总结报告。报告人皮克同志。
- 2)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报告人季米特洛夫同志。
- 3)酝酿中的帝国主义战争与共产国际的任务。报告人陶里亚蒂(埃尔科利)同志。
- 4)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结。报告人曼努伊尔斯基同志。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于1933年11月28日至12月12日在莫斯科举行。全会讨论了库西宁关于法西斯主义、战争危机与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皮克关于德国共产党的活动的报告,波立特关于英国统一战线的策略的报告,并且通过了关于在1934年下半年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给法西斯主义下了如下的定义:它是金融资本极端反动、极端沙文主义的帝国主义分子的公开恐怖独裁。全会在研究反战斗争问题时得出的结论是:无产阶级进行斗争就能够“制止并推迟战争”。全会的结论使得各国共产党能够比较正确地制定反法西斯政策和进行防止战争危机的斗争。然而,全会决议中有一些不正确的观点。虽然法西斯进攻使条件发生了变化,但全会还是肯定地认为,整个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甚至在法西斯国家中也是如此。

5) 选举共产国际的领导机构。

载于《共产国际》1934 年第 16 期第 64 页。

季米特洛夫就代表大会第二项 日程给委员会的信

(1934年7月1日)

从附上的报告提纲草稿中,你们可以看到我是怎样考虑大会第二项日程的报告特点的。此外,我还想提出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社会民主主义问题

1) 笼统地把社会民主主义说成是社会法西斯主义^①, 是否正确。这种观点往往阻碍我们去接近社会民主党工人。

2) 认为社会民主党无论在哪里, 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 是否正确。

3) 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左翼集团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主要危

① 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 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文献中普遍地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是“社会法西斯主义”。出现这种看法是由于工人阶级先锋队对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奉行同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的反应而引起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参与了资产阶级政府反民主的反动措施, 帮助它镇压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 从而在客观上为实行法西斯主义扫清了道路。右翼社会党首领们的这种政策, 使劳动群众产生了仇恨和蔑视, 引起了部分觉悟了的工人阶级的强烈抗议和反击。社会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就其目的、社会本质和群众基础来看, 是互不相同的。把两者等同起来, 阻碍了组织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统一行动, 增添了孤立右翼改良主义首领的困难, 阻碍了顺利进行反对法西斯和战争威胁的斗争。阶级斗争的实践, 特别是在法国、奥地利和西班牙开展的反法西斯运动, 有助于克服这种错误的观点。季米洛夫的信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它是共产国际领导中主张克服宗派主义错误的第一次完全而详尽的表态。

险,是否正确。

4)笼统地把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工会的全体领导干部都说成是工人阶级自觉的叛徒,是否正确。要知道,可以预料到,在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工会中,目前有不少负责人也会在斗争过程中同社会民主党工人一起转而走上革命道路。想方设法使他们易于实现这一转变,从而也就使社会民主党工人更快地转到我们这边来,这对我们是有利的。

5)不向改良主义工会的会员明确提出把这些工会改变成为无产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个任务,而总是议论是否可能争取改良主义工会的问题,这类无益的空论,难道不是到了抛弃的时候了么?

6)关于把革命工会和改良主义工会联合起来,而不把承认共产党的领导权作为先决条件的问题。

二、关于统一战线问题

1)由于局势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统一战线的策略也必须加以改变。我们不应当把统一战线的策略仅仅当作揭露社会民主党的手段,而不认真地设法在斗争中建立真正统一的工人队伍;我们应当把这一策略变成开展反对法西斯进攻的群众性斗争的有效因素。

2)必须抛弃那种认为统一战线只能在下面实行的观点,同时必须不再把向社会民主党领导发出的一切呼吁看成是机会主义。

3)必须发挥群众的战斗主动性,共产党不要对统一战线机构采取凡事包办的态度;不要装腔作势地谈论共产党的领导权,而要在实际上实现共产党的领导。

4)在我们的整个群众工作中,以及在宣传鼓动中,必须根本改变我们对社会民主党工人和无党派工人的态度。必须不只是笼统地谈论社会民主党的叛卖行为,而是要具体地、耐心地、有根有据

地向工人们说明,社会民主党同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会导致、甚至已经导致了怎样的后果。不要把一切责任都推到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身上,也要指出社会民主党工人自身的责任,促使他们想一想自己的责任和寻求正确的斗争道路,等等。

三、关于共产国际的领导问题

考虑到莫斯科要在一切问题上有效地领导处于各种不同情况下的共产国际的65个支部,是不可能的(有些党在宗主国,有些党在殖民地;有些党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国,有些党在农民占优势的国家内;有些党是合法的,有些党是非法的;等等),所以必须改变共产国际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必须集中注意力于:对共产主义运动实行总的政治上的领导;在基本的政策和策略问题上给予各国共产党以指导;在各地建立起共产党的坚强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以精简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庞大官僚机构来加强各国共产党的工作人员。

必须大力开展布尔什维克式的自我批评。由于害怕自我批评,有时对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现阶段的危机问题,所谓战争和通货膨胀的情势问题,对奥地利事件^①的评价及其教训,等等),都没有加以阐明。

如果不更新一部分共产国际工作干部,就不能改变共产国际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共产国际领导同联共(布)政治局保持紧密联系是十分必

^① 这里讲的是1934年2月奥地利无产阶级同法西斯分子和政府军队发生的武装冲突。为了反击法西斯分子和警察2月12日对林嗣工人宫的进攻,社会民主党工人组成自卫队进行了武装抵抗。维也纳和奥地利其他城市的工人接踵而起。战斗一直延续到2月15日。在这次战斗的过程中产生了共产党人和普通社会民主党人的统一战线。奥地利无产阶级的反法西斯起义遭到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工人阶级的失败是由于社会民主党的首领在法西斯进攻面前无所作为而造成的。

要的。

载于《苏共历史问题》1965年第7期第83—85页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

(1935年7月25日)

开幕式

今晚七点半过后不久,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开幕了。

进入莫斯科工会大厦,在举行大会的圆柱大厅里,人们感到一种发生了历史性事件的气氛。大厅的正面,悬着一幅巨大而醒目的被灯光照耀着的标语牌,以16种文字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走过装饰着鲜花的主楼梯,代表们来到长长的走廊,沿着走廊的墙壁上,各个地区以艺术的形式展示出他们工作中最重要的一段活动,以及他们各自国家工人阶级的斗争情况。

在旁边,一个大厅已经改成展览革命书籍和一般革命报刊的堂皇的展览厅。

代表们在装饰辉煌的圆柱大厅里就座。主席团背后的墙上悬挂着巨大的红旗,红旗上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画像附有标语:“伟大的不可战胜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旗帜万岁!”

横贯两边墙壁的是横幅标语,以六种文字写着:“反对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进攻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背后墙上的横幅是“中国苏维埃万岁!”

掌声停息之后,威廉·皮克同志在肃穆宁静中开始致开幕词。开幕词立即被翻译出来,并通过精制的听音器传给代表们。来自

五大洲的几乎每一个国家的代表——白种人、黄种人、棕种人、黑种人的代表，欧洲人、美洲人、澳大利亚人、黑人、印度人、中国人、日本人——都怀着一个意愿：推翻可憎的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建立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生动的先例，他们正在这里的苏维埃祖国亲眼目睹。这是一个真正的国际，而不是白人工人贵族们的协会，那些工人贵族们，正如人们在第二国际的大会上所看到的那样，嘴里说几句中国话，炫耀他们是来自欧洲的贵族。在这些代表中，可以看到取得胜利的苏联共产党的领袖们。人们看到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英雄们，特别是季米特洛夫的杰出的形象；人们看到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干涉的战士们，其中有精神饱满的马蒂。人们看到了苏维埃中国的战士们，以及来自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血腥国土的大批代表。各国无产阶级最优秀、最重要的领导人都出席了这次会议。

伟大的时刻来到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始了它的工作，为全世界的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的斗争开创一个新纪元。

（摘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主席团和各委员会的选举

科普林尼格同志以几个大的代表团的名义提议将 42 人选进主席团。他的动议受到鼓掌欢迎,并被一致通过。

于是,科普林尼格念了建议选入主席团的 42 位同志的名单。在念到杰出的同志时,每次都受到暴风雨般掌声的欢迎,当念到斯大林和台尔曼的名字时,掌声转入长时间热情的欢呼。

所提议的名单如下:

1. 卡尔·阿恩特同志
2. 伯杰同志
3. 勃朗科夫斯基同志
4. 白劳德同志
5. 比诺同志
6. 加香同志(大声欢呼、掌声)
7. 坎贝尔同志
8. 查扬同志
9. 克拉克同志
10. 季米特洛夫同志(暴风雨般的掌声)
11. 多勒利斯同志(大声欢呼、掌声)
12. 陶里亚蒂同志(掌声)
13. 斐迪同志(掌声)
14. 弗洛林同志(掌声)
15. 福斯特同志(掌声)

16. 弗里尼同志(掌声)
17. 安东尼奥·加西奥同志(掌声)
18. 戈尔基克同志(掌声)
19. 哥德瓦尔德同志(掌声)
20. 亨德森同志
21. 科克勒同志
22. 康生同志(掌声)
23. 科普林尼格同志(掌声)
24. 科瓦奇同志(掌声)
25. 库西宁同志(大声欢呼、掌声)
26. 拉塞尔达同志
27. 连斯基同志
28. 林德罗思同志
29. 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暴风雨般的掌声)
30. 马蒂同志(大声欢呼、掌声)
31. 冈野进同志(大声欢呼、掌声)
32. 彼得科夫同志
33.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暴风雨般的掌声)
34. 皮克同志(暴风雨般的掌声)
35. 波立特同志(大声欢呼、掌声)
36. 拉姆赛同志
37. 雷蒙德同志
38. 斯大林同志(暴风雨般的持续的掌声,热情欢呼,并呼万岁!)
39. 台尔曼同志(暴风雨般的持续的掌声,热情欢呼,并呼万岁!)
40. 多列士同志(暴风雨般的掌声)
41. 周和生同志(暴风雨般的掌声)

42. 王明同志(暴风雨般的掌声)

所提议的42位同志被一致选入主席团。被选同志登台。当斯大林同志出现在台上时,会场以暴风雨般的掌声、热情的欢呼声和高呼万岁声欢迎他。乐队奏乐。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一再为斯大林而发。代表们唱国际歌的头两节,又一再出现暴风雨般的、连续不断的欢呼声。多列士同志好不容易才说了几句话,又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他以法国、意大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和南美洲共产党的名义提议选举恩斯特·台尔曼同志为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名誉主席。

接着选举编辑委员会,委员会由下列同志组成:达特、亨利科夫斯基、杰克逊、诺林、科拉罗夫、孔、林铎森(音)、拉梅特、斯威尔玛、塔尔以及乌布利希同志。

下列同志被选入资格审查委员会:安加利蒂斯、博尔舍斯、考克斯、达勒姆、德拉加诺夫、格林、朱索夫、孔原、克拉杰夫斯基、拉卡萨·路易斯、利·奥塔尔、米多尔、皮亚特尼茨基、普鲁希杰克、塞拉诺、谢尔曼、多列士以及沃卡尼克同志。

然后,大会一致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所提议的议事日程,如下:

1. 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的报告。报告人,皮克同志。

2. 关于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的报告。

3. 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报告人,季米特洛夫同志。

4. 帝国主义的战争准备与共产国际的任务。报告人,陶里亚蒂同志。

5.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报告人,曼努伊尔斯基同志。

6. 共产国际领导机构的选举。

所提议的会议议事规则被一致通过。

接着是向大会致贺词。第一个取得发言权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大会致敬的是周和生同志。他受到暴风雨般掌声的欢迎。

（摘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词

(1935年7月25日)

威廉·皮克

此刻,当我们这些欧洲的、亚洲的、非洲的、美洲的和澳大利亚的劳动者的代表们聚集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思念,第一句话,第一个祝愿,是向着苏联,向着它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胜利建设。我们还向工人和农民,向有着奋勇前进的突击队员的苏联致敬。首先和最主要的是,向我们伟大的导师苏联共产党,向它的布尔什维克中央致敬。我们向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的组织者,向全世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一切劳动者的领袖,向我们的斯大林同志,致以最热烈的问候。(长时间热烈的掌声,欢呼“万岁”)

苏联劳动者在苏联共产党和我们的朋友与导师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奋斗所取得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已把多年的社会主义理想变成了现实。为了实现这种理想,全世界的无产者还在斗争着。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使全世界的劳动者提高了对自己力量的信心,使大量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转变到与共产党人联合起来进行反对资本主义进攻和帝国主义枷锁的斗争,以及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对准备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使冲击资本主义堡垒的概念在群众思想中成熟了。

我们向千百万无产者表示思念和敬意,他们不顾死亡的威胁,

正在从事反对惨无人道的法西斯专政的斗争，这种法西斯专政剥夺了劳动人民最后一点最基本的人权；我们特别要向恩斯特·台尔曼表示思念和敬意（热烈鼓掌），他在最反动、最沙文主义、最无人性的法西斯专政之下，身陷囹圄。他象征着整个反法西斯斗争，是德国劳动者的领袖。我们向格拉姆奇同志表示思念和敬意（热烈掌声），他在意大利法西斯的地牢里已有十年之久，身体已在衰弱下去；向拉科西同志表示思念和敬意（掌声），他在匈牙利法西斯监狱中已有多年；向市川正一同志表示思念和敬意，他为日本君主专制所幽禁。我们还向被监禁的西班牙社会党领袖拉尔戈·卡瓦列罗同志致敬（掌声）。我们向一切被投入监狱的战士们表示思念和敬意，他们由于在刽子手面前勇敢无畏，由于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突出的伟大献身精神，已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

社会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这就是人类面临的问题。或者是社会主义，那么就要废除人剥削人的制度，文化社会突飞猛进，社会就会出现新的前所未有的进步，人民就会自由、幸福与和平。或者是法西斯主义，那么在若干年的凶残压迫和残酷的法西斯恐怖之后，就是劳苦大众的苦难与贫困，人类巨大的宝贵文化遭到野蛮的破坏，以及各国间出现新的流血战争。这样就在资本家的营垒中提出了问题。劳动者领导了为无产阶级革命而进行的斗争，领导了为进步、为反对加给整个人类的资本主义重负而进行的文化斗争。但只有我们的道路，为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道路，才能把人类从奴役中和困扰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事件中拯救出来，并把人类引向自由。

18年前，在上次流血战争的可怕条件下，俄国的无产阶级与劳动农民结成联盟，在列宁同志和他的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剥削阶级的统治，以胜利的十月起义展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引起人类历史根本转变的情况下，在旧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两种制度之间的斗争的情况下，革命立

即在全世界继续发展起来。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全世界的革命在继续进行,这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命运,对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发展,对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都不断地产生着影响。资产阶级由于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极端恐惧,开始在一些国家采用血腥恐怖手段来反对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利用了无产阶级阵线组织上的薄弱,在意大利法西斯专政的建立中,他们对劳动群众的打击达到了高峰。

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未能取得胜利,是因为我们共产党还弱小,经验不多,因为我们还不能打破社会民主主义的重大影响,这个影响阻挠着群众参加斗争。

因此,资产阶级在巩固它的政权方面部分地取得了胜利。

但是苏联的无产阶级是胜利了。当革命的浪潮平静下来时,苏联仍继续存在,它向劳动群众指明了摆脱资本主义给他们造成苦难与奴役的道路,指明了获得较好的生活与真正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这是给予资本主义的一个打击,它已无法从这种打击下恢复过来。

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给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的浪潮指出了方向,为夺取政权的斗争铺平了道路。

苏联及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给全世界劳动者证明,工人阶级不但能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能建设起新的经济,无产阶级有能力改善工农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能够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引导劳动农民群众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苏联的胜利已经证明,即使是贫穷的、文化落后的国家,也能够把政权掌握到无产阶级手中,也能使经济上落后的国家进入最进步国家的行列,赶上和超过最先进的国家。

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有困难为理由,用内战和饥饿来吓唬群众。然而,当资本主义世界发现自己面临着资本主义的衰退和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日益增长的巨大困难的时

候，苏联却已经克服了恢复时期的困难，粉碎了剥削阶级的反抗，提高了劳动群众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试图破坏群众对苏联不断增长的同情，企图利用这一事实：无产阶级专政一开始还不能向苏联群众提供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使工人中的一个阶层得到的那种较高的生活水平。

然而，当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的境况变得日益无法忍受时，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却使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就有助于说明一个情况：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越深刻，群众的境况越困难，无产阶级转向社会主义的人就越多。资产阶级知道，群众这种向着无产阶级革命方向发展的激进化，意味着对他们的致命的危险。这就是为什么德国的资产阶级建立了对无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并使后者遭受了严重的失败。然而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工人阶级由于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政策而分裂了，因为社会民主党本身拒绝反对法西斯主义，并能够通过它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阻止他们参加这种斗争。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胜利鼓励了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使他们进行同样的活动，并掀起对劳动者进行法西斯进攻的第二次巨大的浪潮。

但资产阶级知道，法西斯恐怖和法西斯蛊惑宣传并不能使他们的统治维持多长时间。因此，他们求救于重新瓜分世界的新战争，以使用掠夺外国和外国人民、吞并外国领土的办法保证资本主义的生存。

日本帝国主义早已开始了对世界的新的重新瓜分，占领了中国的一省又一省。

意大利法西斯正在进行反对阿比西尼亚人民的战争。

德国法西斯正在组织重新瓜分欧洲战争，威胁着一切不希望有战争的国家，威胁着许多真正独立的弱小民族，并且正在准备对我们大家共同的祖国苏联的国土进行罪恶的进攻。一切国家的

法西斯都在武装反对以狂风暴雨般之势向前推进的共产主义,而且正在组织反对苏联的战争,因为只要苏联在发展,在强大,而且不断取得胜利,工人运动就不会被打垮。法西斯准备摧毁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所采用的、并且还能指望得到群众支持的民主自由的最后一点残余。今天的资产阶级害怕无产阶级利用这种自由的一点可怜的残余来准备一场无产阶级革命。

然而法西斯主义越是武装,资产阶级越是疯狂地武装起来准备进行新的战争,劳动群众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意志,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意志,也就发展得越快。

劳动群众看到,只有在苏联才有真正的自由,只有在苏联,人民的文化和生活福利才在不断地增长。因此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反映了劳动者日益广泛的阶层的思想和心情。人民知道,只有苏联才一贯遵循和平政策,由于这种原因,而且只是由于这种原因,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才尚未爆发。因此,凡是不要战争的人民群众都团结在苏联的周围,把它看作是和平的保障。

人民知道,资产阶级民主是破了产的,但他们也不要法西斯主义。他们认识到,他们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只有与苏联这个反对世界反动势力的堡垒联合起来,才能取得胜利。

我们共产党人确信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而且是它的强烈的信奉者。正是因为这种原因,我们才对法西斯主义,对反动分子各种形式的剥削进行殊死的斗争。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在哪个国家存在哪种政治制度,并不是不重要的。我们是关心保卫劳动群众的利益的。

在那些还存在着议会政治和民主自由残余的国家,尽管有资本主义制度的沉重压迫,无产阶级还有为自己的利益组织起来公开进行战斗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不大。而在法西斯专政占优势的国家,无产阶级的一切权利都被剥夺,没有可能(哪怕是微小的可能)为本阶级的要求而进行合法的斗争。所以我们共产党

人要为任何一点民主自由竭尽全力进行斗争。我们要与一切准备保卫这种自由的人携手战斗,以便在此基础上为争取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民主,为保证废除人对人的剥剥而进行斗争。我们共产党人是人民的民族利益的真正捍卫者。压迫各民族的统治阶级无权代表他们讲话,只有我们反对资本统治与经济压迫的桎梏、捍卫各民族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才有权代表他们讲话。我们共产党人一贯赞成民族自决,承认每个民族,甚至是最小的民族,都有民族自决权,并在将来继续为此而斗争。

劳动群众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资本主义世界的劳动群众知道法西斯专政将给他们带来什么。他们从苏联的事例中看到,无产阶级如果在革命政党的领导下勇敢坚决地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他们就会获得胜利。在过去几年阶级斗争的影响下,并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工人群众,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已经转向反对资本进攻、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对战争的斗争。在所有国家,强大的统一战线运动都在发展,这表明了工人阶级从改良主义向革命斗争的转变。在一些国家,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为保卫劳动群众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而进行合作已经取得了成就。对统一战线行动和加强此种行动的伟大动力,是季米特洛夫同志在莱比锡审判中所表现的英雄行为,他在这次审判中使整个工人阶级反法西斯主义的旗帜迎风招展,捍卫了共产主义事业,并把审判变成了对法西斯主义的控诉。统一战线运动是共产国际取得更大胜利的一种保证。

同志们,经过世界各地七年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之后,我们在这里举行共产国际的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在这七年当中,我们目睹了巨大的罢工运动,在实现和领导这些罢工运动中,有我们一份伟大的工作。在这七年当中,失业者在我们的口号下,在几千次示威游行中进军,向资本主义的国家要求维持生计。在这七年当中,无产阶级掀起了多次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伟大群众政治斗争。

同志们,请记住德国劳动者英勇斗争的那些英雄们,记住英国海军水兵的罢工,记住美国退役军人的运动,记住波兰的农民暴动和惊心动魄的政治罢工,记住奥地利和西班牙无产阶级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英勇斗争,记住中国的红军,它在多次战役中击败了蒋介石的雇佣军。

我们向发展壮大中的中国革命致敬,它正在使为数达四亿之多的人民行动起来。(热烈掌声)最后,请记住强有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掌声)它于2月6日在法国举行了强大的示威活动,并于2月12日在巴黎投入了总罢工行动,以及1935年7月4日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示威游行,它是迄今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示威游行都无法与之相比的。(掌声)

过去几年中,阶级斗争的这种巨大高涨表明,国际工人阶级正在与资本主义政权进行的决定性斗争中兴起,革命危机正在全世界发展,轰击资本主义堡垒的概念正在群众的思想中成熟。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的时代正在接近结束。第二国际正经受着深刻的危机。在整个国际工人运动中,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时代已经开始。我们共产国际面临着加强斗争、把工人们争取到革命方面的任务,而且面临着领导这些斗争的首要任务;我们正在使群众准备进行不久的将来即可开始的这些斗争。我们的大会必须制定出策略,这种策略将使劳动群众与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和反对新战争准备的斗争相结合,并将使我们能够从法西斯主义的败退中转向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我们必须重新检验我们过去几年的工作,必须揭露我们的弱点和错误,必须吸取必要的教训,以便能够以比迄今为止较快的速度前进,完成我们的革命任务。

自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以来,死亡已从我们中间夺走了我们一些最好的战友和同志。(代表们全体起立,乐队奏哀乐)

为了给这些去世的同志以荣誉,我们特在此对他们表示敬意。

他们人数太多,我不能一一提到他们的名字。我要提出怀念的是我们已故的克拉拉·蔡特金,怀念我们的基洛夫同志、奎布舍夫同志和片山潜,以及千百个因革命活动而被资产阶级所杀害的政治活动家。我们还要怀念约尼·谢尔、菲尔斯特、萨莱以及其他无数的同志。我们思念着德国共产党正在监狱里衰竭下去的数万个同志;我们要为他们的生命,为争取释放他们而战斗。我们将通过革命斗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使他们获得自由。

我们的道路是各国人民反对压迫者和剥削者的革命。我们的意志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意志。我们的目标是全人类实现社会主义。我们的主要口号是建立苏维埃政权。在大会的这个讲坛上,我们号召劳苦大众和遭受破产威胁的广大农民,号召全人类不分种族和肤色的人们:同志们,兄弟们,起来反对你们的剥削者,紧密地团结在唯一能够领导你们斗争的阶级的周围。团结在全世界共产主义政党共产国际的周围。共产国际万岁!一切被压迫被剥削者的领袖斯大林同志万岁!

(长时间的、持续的热烈掌声)

(西班牙的同志们一起欢呼“万岁”)

(日本代表团起立用日语欢呼“万岁”)

同志们,我就此宣布今天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开幕。

(乐队奏国际歌)

(全体起立,60多个国家的代表以他们各自的语言同声歌唱这个无产阶级的战斗歌曲)

(选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贺词

(1935年7月25日)

周和生

亲爱的同志们，一项光荣而重大的任务落在了我的肩上。我被授权代表党的中央委员会、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军和中国战斗着的一切劳动群众，向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转达我们的敬意，向今天聚集在这里的为自由而斗争的人类最尊贵的代表们致敬。

同志们，我们中华民族目前正经历着空前的苦难。它的机体正被帝国主义侵略者弄得支离破碎。国民党军阀，那些社会上卑鄙无耻的渣滓，正在出卖着人民至关重要的利益。然而他们的这些罪恶行径是逃不脱惩罚的。中国人民不容许自己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伟大的国家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永远不会让自己降到亡国奴的地位。

这是有正在发展壮大和蔓延全国的反帝斗争的巨大高涨作保证的；这是有游击队在帝国主义占领的一切地区所进行的不顾一切牺牲、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英勇武装斗争作保证的；这是有中国红军的发展和巩固作保证的。红军在与国际帝国主义的国民党雇佣军的一切冲突中，总是经常取得胜利。

中国红军不得不在困难条件下进行作战。敌人大规模地使用大炮、飞机和毒气反对我们，而我们的军事装备却非常低劣。我们没有弹药。迄今为止供应红军部队的弹药，唯一的来源是在战斗中从敌人手中得来的战利品。不是所有部队都有军服穿。我们缺

乏粮秣。但是我们有劳动人民的热情支援，而群众这种至高无上的热诚就是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主要源泉。全体劳动群众从红军身上看到了把他们从帝国主义可憎的桎梏中，从各种无法忍受的敲诈勒索中，从军阀的压迫中，以及从地主和高利贷者的束缚中解救出来的救星。

中国苏维埃的一切经历都使劳动者确信，以共产党为首的中国无产阶级是能够解决重大历史问题的，它能够彻底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能够彻底摧毁地主所有制，扫除高利盘剥的邪恶，一劳永逸地结束对群众公民权的剥夺，能够从根本上改善工农群众的状况。现在，当中国红军主力在四川省完成了英勇的进军，为苏维埃运动创建了一个新根据地的时候，我们有各种理由展望未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雇佣军斗争的胜利发展。

我们向共产国际保证，中国共产党将尽一切努力，团结全国所有的反帝力量，并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国民党的斗争中领导他们胜利前进。我们相信，在列宁和斯大林所创建的强大的共产国际的领导下，我们将取得彻底的决定性的胜利！

同志们，现在请允许我在这个国际讲台上向伟大苏联的无产阶级和集体农民表示热情的敬意，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引起了全世界工人农民的羡慕。由于苏联工人和集体农民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工厂的生产计划、播种和收获计划，以及发展学校和铁路运输的计划，由于在空中、地面和地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们不仅空前地提高了群众的福利，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繁荣了文化，同时也光荣地完成了他们的国际义务。他们理应荣获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突击队的称号。战斗的红军向英勇的苏联无产阶级和集体农民致敬，由于他们的英雄业绩，他们充满了无比的光荣！（掌声）

我们感谢光荣的布尔什维克队伍在苏联所取得的工农的世界

历史性的胜利,这支队伍曾经在列宁主义的共产党的战斗中受过训练,与千百万工人和全体劳动群众有着最牢固的联系。这支队伍在这样一个人的领导之下,他的名字久已彪炳史册,他有着最深沉的智慧,无比的勇气,无穷的精力,以及对劳动人民不朽事业的无限热爱和献身精神,这个人就是伟大的斯大林。

战斗的红军向苏联共产党,向全世界劳动者的领袖和导师斯大林同志致敬!

同志们,国际局势把严肃而重要的任务摆在了你们的面前。但必须说,能够解决这种重大任务的力量已经成长起来,特别是在最近。德国无产阶级反对野蛮的法西斯的英勇斗争,去年2月在法国和奥地利所发生的二月斗争,以及随后在这些国家实现统一战线所取得的胜利,西班牙无产阶级10月份的武装斗争,日本共产党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军警君主政治的勇敢献身斗争,中国的苏维埃运动、反帝斗争和游击战争,以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风起云涌的解放斗争,所有这一切都相当雄辩地证明了共产国际力量的急剧增长,证明全世界布尔什维主义的党已转化为历史的强大因素。(掌声)

我们对共产国际中有像季米特洛夫、台尔曼、毛泽东、拉科西和市川正一这样的英勇旗手而感到骄傲,他们在一切情况下都高举共产主义的伟大旗帜,并且保护和捍卫它,在列宁斯大林所创建的共产国际的旗帜下,领导群众走向胜利。

我们可以向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保证,大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将不会停留在纸上,像中国一样,所有国家都有布尔什维克,他们将不顾任何困难和障碍,不惜任何牺牲,毫不犹豫地把这些决议付诸实施。

全世界劳动者的目光都注视着共产国际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际帝国主义的奴隶们正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充满了信心,只有共产党人能给他们指明从残酷的剥削和殖民奴役

中解救出来的道路。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们，由于他们具有斗争的严酷经验，确信只有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略和策略，才能引导他们取得战胜法西斯反动派和资本主义残暴者的胜利。

这就是全世界一切国家的一切劳动人民把这种伟大的希望寄托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原因。他们期待着我们的决议，这些决议将像探照灯一样，为一切国家的共产党照明把工人阶级和被压迫国家劳动者的大多数争取到他们一边的道路，这些决议将促进他们为在全世界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准备进行决定性的战斗。

我们认为这些希望都是正当的。愿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一切工作都充满斯大林注重实际的精神，充满斯大林的智慧和斯大林对我们事业正义性的信念，以及斯大林对夺取胜利的意志！共产国际万岁！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万岁！我们的领袖和导师斯大林同志万岁！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摘录)

(1935年7月26日)

威廉·皮克

一、革命运动新高潮的发展

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以后立即发生的一些事件,证明了我们对于革命运动前景所作的分析是正确的。我们说过,中国革命的发展,印度尼西亚的起义,欧洲和美洲为反对处决萨柯和樊塞蒂而举行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1926年英国的总罢工,1927年维也纳的七月事件,以及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自1927年开始的罢工运动的蓬勃发展——这一切乃是开始出现革命新高潮的标志。我们说对了。我们曾预言革命高潮将继续向前发展,而革命高潮与革命危机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所以我们也就预言革命将进一步向前发展。代表大会向共产国际各支部提出一项任务:组织并领导劳动人民反对剥削阶级的日益激化的斗争。

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

第六次代表大会结束以后几个月,欧洲各国就掀起了很久没有出现了的经济罢工浪潮。在罗兹市开始了波兰工人运动史上纺织工人最大规模的罢工之一,罢工发展成为罗兹无产阶级的总罢工,在鲁尔区,20万工人为争取提高工资而斗争了五个星期。在法国北部,纺织工人参加了罢工斗争。在德国、波兰和法国的议会选举中,共产党人得的票数大大增加了。这表明生气勃勃的政治

局面逐渐出现了。

这次新的革命高潮绝不仅限于欧洲各国。中国的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印度的民族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都出现了高潮。

运动表明，广大劳动群众在 1921—1923 年失败以后已经恢复了元气，他们不愿忍受生产合理化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给他们造成的境况的进一步恶化。虽然资本主义生产在迅速上升，但工人阶级的境况却明显地恶化了。虽然一部分就业工人现在得到了比战后头几年较高的工资，但合理化所造成的剥削也难以想象地加重了，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工人被排挤出生产过程。

社会党人高谈“繁荣”，但失业人数却增加了。社会党人高谈“经济民主”，但企业中对劳动的剥削却变得使人无法忍受了。社会民主党人侈谈能克服本身内部矛盾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但阶级矛盾却一天天加剧了，导致了阶级斗争的尖锐化。

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完全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利益服务。它们从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已取得的成就中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经济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景。由此它们创造出—套理论，说什么可以“永久繁荣”、“没有危机地发展”、实现“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和“经济民主”，说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和企业主在解决经济问题时是“平等的双方”。在一些国家里，社会民主党人把这叫做“建设性的社会主义”。根据这一理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似乎应当通过议会民主和联合政府来导致社会主义。

从这种论点出发，社会民主党力图靠拢资产阶级政府，而在德国、英国和丹麦，它们则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况且，社会民主党从资产阶级那里获得了监督委员会的职位，乃同托拉斯的上层人物同流合污了。其必然的结果是：社会民主党赞成限制阶级斗争，拥护经济和平，而且设法不许工人罢工。一切涉及工人阶级经济利益的问题，要由国家仲裁法庭来解决。

由于社会民主党领袖采取这种立场，而且资产阶级对工人阶

级占有统治的地位,自然就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如果共产党人不断地开展阶级斗争去反对社会民主党同资产阶级的合作,如果对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不试图建立革命的领导,那么无产阶级就会遭受资产阶级的任意摆布。

正如1928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所指出的那样,鉴于必须保卫劳动群众的切身利益,必须增强他们反对日益加重的剥削与压迫的斗争能力,必须团结群众去进行斗争,这就向共产党人提出了一项任务:要更明确、更尖锐地提出一条“自己的特殊的政治路线,无论在所有一般的政治问题(战争问题,对待苏联、中国、印度、埃及等国的态度问题)上,还是在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问题(反对仲裁,反对降低工资,反对延长工作时间,反对实行有利于资本家的生产合理化,反对所谓‘工业和谐’等等)上,都根本不同于改良主义者的政治路线……”^①

共产党人的这条政治路线,体现在“阶级反对阶级”(即无产者阶级反对资产者阶级)这一口号的策略上。

“阶级反对阶级”这一策略是针对社会民主党同资产阶级的联盟的,是打算用来摧毁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同资产阶级的联盟的。这一策略并不针对共产党人为反对资产阶级而同社会党人结成的统一战线,相反地,这一策略要求结成统一战线,其目的建立对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革命领导。

二、在危机极端尖锐化的年代的革命运动

1929年秋,美国开始了工业危机。这一危机同农业国的农业危机以及殖民地的危机交织在一起,它非常迅速地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这场危机给劳动群众带来了巨大的苦难。千百万工业工人和

^① 《共产国际文献汇编》,莫斯科1933年版,第757页。

职员遭到企业、矿山和事务所的解雇。根据国际联盟劳工局的通报资料,仅 34 个工业国的失业人数,就从 1929 年的 653.8 万人增加到 1932 年的 2904.2 万人。根据官方资料,1932 年美国的失业人数达 1200 万,而根据哈密尔顿研究所的资料,失业人数竟达 1700 万。根据官方资料,德国 1932 年的失业人数达 700 万。

所有各国产业工人的工资都在减少。千百万工人每周不能上满全班,因而相应地降低了工资。技术熟练的工人被贬低为普通的工人,有工作的沦为失业者。

根据国家统计部门的资料,德国工人、职员和官吏的工资总额,从 1929 年的 445 亿马克缩减到 1932 年的 260 亿马克。美国的工资总额,从 1929 年的 172 亿美元缩减到 1932 年的 68 亿美元。

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个工人或职员对明天抱有信心。千百万人注定要受饥寒交迫之苦。千百万人沦为乞丐,无家可归,露宿在公园、广场、桥下。创造了当代社会全部财富的工人阶级,却遭到了空前贫困的袭击。

劳动农民也在经受同样的贫困折磨。垄断资本、托拉斯和银行为了掠夺广大农民群众,在保持工业品原价的同时,压低农产品价格。银行无情地追索贷款的利息和抵押的债务。苛捐杂税的负担越来越重,而国家对破产的银行和托拉斯却给予补助。

这一掠夺农民的政策加速了农民经济的衰退,使数以万计的农户彻底破产,使千百万农户陷于挣扎度日的悲惨境地。在许多国家里,封建制度的因素得到恢复和巩固。穷困的农民阶层成为高利贷者的牺牲品。法警成了农民家里的常“客”。饥饿袭击着波兰和日本东北部的整个农业区,以及乌克兰的喀尔巴阡地区。贫困成为很大一部分美国农场主的不可逃脱的命运。

更加令人胆颤心惊的情况是,各国仓库里堆满了粮食,用粮食作机车的燃料,把咖啡倾入大海,而这些产品的生产者——农民,

却在忍饥挨饿……

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境遇也是如此。托拉斯和大资本家利用小资产阶级的贫困化来抢占他们的财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日益严重地丧失生存的可能性,成千上万的教员、医生、律师,尤其是工程师和农艺师,过着失业者的可怜生活。如果资本家不能从知识和才能中获取利润,那么知识和才能就会失去任何的意义。

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人民处于更加绝望的境地。在帝国主义垄断组织的压力下,在工业品价格高昂的情况下,由于过分地压低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劳动产品的价格,这些国家简直濒于灭亡的地步。殖民地数亿农民在忍饥挨饿。过去认为已绝迹的瘟疫又流行起来,不断地从肉体上消灭那些精疲力竭的居民。中国、印度、印度支那和非洲的失业者,得不到任何救济,他们饥饿贫困的情景是难以描述的。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根本不把饥饿的群众放在眼里。他们的贪婪行为激起了劳动人民反对剥削者和压迫者的日益高涨的运动浪潮。这个运动对于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统治,日益造成巨大的威胁。

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在战争和法西斯主义中寻求出路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不能仅限于掠夺本国及其侵占的殖民地的劳动群众。阶级斗争尖锐化、利润减少、破产、外贸额下降——这一切推动他们去准备战争,以便通过侵占和掠夺别人的土地来增多自己的利润。这种备战也是为了、而且首先是为了消灭苏联,因为苏联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策源地、根据地和堡垒。于是,疯狂的军备竞赛开始了。

日本侵占满洲是为了建立反苏战争的进攻基地,它把无产阶级聚集地——上海近郊闸北区夷为平地,是为了使中国屈服于它。巴拉圭和玻利维亚之间的战争爆发了。

……

在中国，掀起了以苏维埃形式表现出来的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的新浪潮，并且建立了一支庞大的红军队伍。

在印度支那，爆发了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起义。

帝国主义制度的大动荡，也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中表现出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早在1931年春就已指出，在德国，革命危机的先决条件正在成熟；在波兰，革命危机的因素日益增长。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在1932年秋指出，资本主义局部的、暂时的稳定已经结束，正在向革命与战争的新阶段过渡。

第十二次全会指出这一点的依据是：革命高潮在继续向前发展，德国和波兰的革命危机日益成熟，中国和西班牙爆发了革命，日本开始进攻中国。此外，全会还依据了下列情况：凡尔赛体系崩溃了，打败德国的各国的协议垮台了，英、日、美、法关于共同掠夺中国的协议破产了。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日益迫近，而苏联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却在不断增强。

资产阶级不能削弱群众的斗争意志

德国（这是国际阶级斗争最重要的战略据点之一）无产阶级的失败，在一段时间内使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缓慢下来，波兰的革命危机暂时停止了激化。德国的失败使国际反动派的气焰嚣张起来，加深了战争危机，增大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压力，促使其他国家也力图建立法西斯制度。

正当法西斯分子向德国劳动人民进攻的时候，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却取得了一系列巨大的胜利。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南京政府对红军实行军事“围剿”时，中国人民群众表现了英勇奋斗和忠于革命的崇高范例。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进攻，而南京政府却拒绝抗日的情况下，中国苏维埃举起了拯救中国人民、使其免遭日本奴役的旗帜，举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的旗帜，从而使日本帝国主义难以向中国

内地推进。中国苏维埃在短期内成了一支在帝国主义者的国际政治中不容忽视的力量。

.....

消除工人阶级分裂的途径

争取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结成统一战线的运动有着深刻的根源。这一运动的发生,是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对广大工人群众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在这一胜利的影响下,冲击资本主义的思想在群众的意识中日益成熟),是由于资本主义各国的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德国失败的经验、奥地利和西班牙武装斗争的经验、法国统一战线总罢工的经验)造成的。工人阶级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要对资本主义进行斗争,必须走统一战线的道路,必须同苏联结成紧密的联盟。

从群众斗争的亲身经验中得出的这一结论,导致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工人运动中最大的转折。

同志们,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运动,要比两个工人政党的力量按算术计算法加在一起大得多。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阶级,大部分尚未组织起来,而且在许多国家里,他们还跟着资产阶级政党走。工人运动的统一战线意味着运动的力量增长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它能有力地把那些至今尚无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群众吸引过来,使他们摆脱资产阶级政党的影响,参加到阶级斗争中来。

.....

中国苏维埃在胜利前进

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采用苏维埃形式的中国革命是一个突出的事件,它使战后时期的整个殖民地世界受到深刻的影响。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产生和胜利发展,具有非常巨大的世界历史意义。享有不朽荣誉的中国红军的英勇斗争,成了整个殖民地世界劳动人民的榜样。国民党军阀在国际帝国主义者的全面

支持之下，为镇压苏维埃运动已经发动了六次“围剿”。尽管中国人民的敌人为此目的动员了大量资金和力量，但是，中国工农红军还是粉碎了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革命剥削阶级的一切进攻。对苏区发动的六次大规模“围剿”，一次接一次地都以国民党军阀的失败而告终。

第六次“围剿”以后，虽然中国红军为避免遭到国民党部队的包围，不得不离开江西省原中央苏区，但是，它却粉碎了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军阀企图围歼中国红军的计划。红军的武装力量在残酷斗争的过程中大大增强了。中国红军的主力出色地完成了向四川省的转移，这可以表明苏维埃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广阔前景。中国红军武装斗争的经验最好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人民，通过革命战争能够胜利地对付优势的敌人和武装到牙齿的国际帝国主义，而劳动人民的迫切需要在革命战争的过程中会逐步得到满足。

中国苏维埃的成就出色地证明了，依据列宁的殖民地革命学说制定的共产国际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国苏维埃的这些成就体现了开辟人类社会历史新纪元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强大影响。

中国的民族革命解放斗争在世界史上第一次产生了具有充分权力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在世界史上第一次以争取建立苏维埃的斗争形式来进行。因此，实践证明了在殖民地国家建立苏维埃政权是可能的。在这里，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国家形式，它可保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革命成为第一个殖民地革命的范例，在革命中实现了无产阶级思想上的领导和初级形式的国务上的领导。以中国工人阶级为代表的殖民地无产阶级，实际上证明了自己能够解决一些伟大的历史性问题，能够捍卫国家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完全独立，能够彻底消灭封建残余，废除地主的土地所有制，铲除高利贷祸害，实

行胜利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改造。

中国苏维埃的政策及其所实行的能使工农境况得到显著改善的实际措施,有助于激发广大劳动群众去积极参加政治生活,有助于迅速提高他们的组织性和政治觉悟。中国国民党统治区的劳动居民处于极端无权、经济破产、忍饥挨饿的境地,而且国民党制度注定了他们要继续遭受殖民奴役,因而他们深信,只有苏维埃才能拯救中国。中国广大的劳动群众日益清楚地认识到,只有苏维埃才是能够捍卫中国领土完整、独立和统一,击退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进攻,保障彻底改善劳动群众状况的力量。

中国苏维埃运动的顺利发展,鼓舞着整个殖民地世界的劳动人民去进行革命斗争,中国苏维埃成了他们进行革命解放斗争的典范和旗帜。

同志们,对斗争三个阶段的分析,就到此结束。让我们对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以后这段时期的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况作个总结。

难以忍受的经济压迫,在资本主义领域内没有任何改善群众状况的希望,显然存在的战争危机,资产阶级对仅有的一点民主自由和议会制度的疯狂进攻,以及越来越多的国家企图建立血腥的法西斯恐怖制度——这一切,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一月比一月更高地掀起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浪潮。

苏联日益成为劳动群众所向往的中心。这意味着,在群众的意识中,必须建立自己的苏维埃政权的思想正在成熟。

经济情况的任何暂时性变化,以及“左翼”和社会民主党政府的任何手法,都不能改变国际工人运动的这一总的发展趋势。

工人运动的发展,以及群众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坚强意志,表明全世界的革命危机日益成熟。

现在我来谈谈报告中有关我们各支部情况的部分。

.....

共产主义战士的英勇队伍

各国共产党，由于党内团结一致，由于在斗争新阶段中取得了经验，由于认真地对待干部教育问题，所以已发展到新的、更高的水平。中国红军的英勇斗争可以证明这一点。站在红军前列的是农民、雇农、大学生，他们七年来受到了党的教育，成了群众的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成了无产阶级的国务活动家。

德国共产党及其基层干部的工作可以证明这一点。尽管中央领导机构经常遭到法西斯秘密警察的破坏，尽管笼罩着可怕的中世纪的恐怖，但是，这些干部善于在复杂的政治问题上独立地掌握方向，发行了数以千计的地下报纸，并且组织了工人反对纳粹分子的斗争。法国共产党的巧妙策略可以说明这一点。法共的策略导致了统一战线的建立，并且在反对法西斯进攻的斗争中使广大的人民群众团结起来。西班牙的十月战斗可以说明这一点。五年前，西班牙只有一个不大的共产主义者宣传小组，领导权掌握在半托洛茨基分子（后来他们竟同共产国际断绝了关系）的手中，但是最近几年，西班牙创建了坚强的共产党，它领导了阿斯土里亚斯省大部地区的武装斗争。

最近的七年向世界表明，凡是劳动群众为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反对金融资本、银行和托拉斯掠夺劳动人民而进行斗争的地方，凡是劳动人民奋起保卫各族人民自由和人类文化的地方，共产党人都是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七年来，全世界已经确认，共产国际的干部是坚强而又英勇的，他们无限忠于为解放一切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而斗争的事业。

想一想季米特洛夫同志在莱比锡法庭上的讲话，想一想对匈牙利拉科西的审讯、对芬兰安蒂凯年的审讯、对德国费特·舒尔采的审讯，想一想瞿秋白（斯特拉霍夫）同志的英勇就义，想一想吕特根士、科法切也夫，最后，想一想世界各国伟大的解放斗争的无数

英雄和烈士。

在报告所指时期,有些党或者几个党一起经常主动地采取国际性的行动来声援失业者,来反对法西斯和战争。这种情况具有特殊的意义。比较强大而有经验的党给予比较弱小的党以指导,为它们制定纲领和文件;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经常帮助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人进行工作,而且无论是在巩固内部方面,还是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方面,都给予比较弱小的党以帮助。这个事实也具有特殊的意义。

近几年来,广大工人群众的意识,特别是社会民主党工人的意识,发生了变化,因而共产党有极其广泛的机会把工人群众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我们的口号在愈益广大的工人阶级各阶层中,以及在社会民主党的内部,开始备受推崇。

许多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开始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的国家形式、没收生产资料并实行国有化、用暴力推翻剥削阶级的政权,这大概是因为他们在群众中的地位已经大为动摇了!共产国际的口号和思想的胜利表明,在稳定时期,共产党的影响传布得非常之慢,没有能够压倒比较有威望的改良主义政党的影响,而现在,共产党在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方面,却有了迅速发展自己的影响和不断取得成就的一切前提。

资产阶级企图阻碍共产党进行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工作,因而限制共产主义宣传的自由,取缔共产党的合法工作,以恐怖手段对付共产党人,并以各种资产阶级政党的、半法西斯和法西斯政党的口号来对抗共产党的口号。

.....

共产国际各主要支部

.....

现在我来谈谈我们的几个主要支部的情况。

过去七年里,各国共产党学会了掌握千百万群众,取得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在所有国家,共产党的作用都大为提高。我们各支部也都强大起来。

德国共产党……

奥地利共产党……

西班牙共产党……

我们满载荣誉的中国共产党,在过去七年里,战斗在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斗争的前哨阵地上。^① 它拥有 30 多万党员。^② 它创建了红军,并在中国相当大的区域内夺得了政权。它的成就表明,只有共产国际的口号才是殖民地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指路明灯。不过,我们的中国党尚未争取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多数劳动者。它还不能把各先进工业中心的无产者组织起来,它面临着一项重大而

① 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经常关注其政策的制定)在这一时期,在动员本国劳动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方面,有过重大的功绩。但是,它的政治路线常常出现严重的错误。30 年代初,在中共党内,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占了上风。共产国际对这一路线进行了极其尖锐的批评。从内战政策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反对日本侵略者又反对蒋介石)政策转变为联合一切反帝力量的政策,这在中共党内是有过抵触的。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代表的积极参与下,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制订 1935 年“八一”宣言,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团结一切反帝力量的口号;红军表示决心停止反蒋的军事行动,并主动要求共同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武装斗争。但是,中共领导 1935 年 8 月初在毛尔盖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一项肯定老方针、忽视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必要性的决议。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说:“我们的许多同志过去不理解,现在也还是不理解中国近几年出现的新形势。他们不懂得怎样按新的方式提出中国反帝统一战线的问题。”(王明:《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以及共产党的策略》,莫斯科 1935 年版第 17 页)

幸亏共产国际给予帮助,才使中共转而采用了卓有成效的反帝统一战线政策。(这个原编者注是有意标榜王明的。——原编译者)

② 中共党员人数为 30 万,是根据中共领导提供的资料。这个数字并没有把中国共产党在 1934—1935 年期间突破敌人封锁、向东北进军中的重大损失全部计算在内。遭到这种损失之后,中共党员人数大为减少。

又艰难的任务：在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和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把苏维埃革命扩展到全中国。

印度共产党的建立是殖民地革命运动发展中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法国共产党……

英国共产党……

美国共产党……

在非同寻常的严重恐怖下工作的日本共产党，按布尔什维克方式组织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斗争，给予了中国劳动群众以重大支持。然而，政府的恐怖手段和陷害行动大大削弱了党。为了进一步取得成就，日本共产党人应当坚决地根除宗派主义残余，切实地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去为工人阶级的日常利益而斗争。这也是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党的先决条件，以便领导劳动群众去进行反对反动派的斗争。

波兰共产党……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

译自皮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莫斯科 1935 年版）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 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 斗争中的任务(摘录)

(1935年8月2日)

季米特洛夫

.....

二、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同志们,资本主义各国的千百万工人和劳动群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防止法西斯取得政权,怎样才能推翻已取得政权的法西斯?共产国际的回答是:首先必须着手建立统一战线,在各个企业、各个区、各个省、各个国家以及全世界确立工人的统一行动。全国规模和国际规模的无产阶级统一行动,是一种强大的武器,它不仅能使工人阶级进行有效的自卫,而且能使工人阶级对法西斯、对阶级敌人进行胜利的反击。

统一战线的意义

共产国际和第二国际这两个国际所属政党和团体的拥护者采取联合的行动,能使群众易于击退法西斯的进攻,而且能增大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况且,两个国际所属政党实行反法西斯的联合行动,其影响并不仅限于目前的拥护者——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这也会对

天主教的、无政府主义的以及没有参加组织的工人队伍,甚至对那些一时成了法西斯蛊惑宣传的受害者,产生强大的影响。

此外,无产阶级强大的统一战线,也会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所有其他劳动人民阶层产生巨大的影响。统一战线会使那些动摇的阶层信赖工人阶级的力量。

但这还不是它的全部意义。对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来说,不仅本国的劳动人民,而且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被压迫的民族,也能成为自己的同盟军。只要无产阶级在国家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处于分裂状态,只要一部分无产阶级支持同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特别是支持资产阶级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压迫制度,这就就会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疏远工人阶级,因而会削弱世界反帝阵线。帝国主义宗主国的无产阶级,在联合行动的道路上朝着支持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方向每前进一步,都意味着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力量变成世界无产阶级的主要后备军之一。

最后,如果我们考虑到无产阶级的国际统一行动要依靠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不断增长的实力,那我们就会看到,无产阶级在国家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实现统一行动将具有多么广阔的前景。

必须在工人阶级大多数团结起来为推翻资本主义和胜利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之前,就建立各部分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而不论他们属于哪个政党和团体。

在某些国家和全世界实现无产阶级的这种统一行动是否可能呢?是可能的。而且现在就有可能。共产国际对统一行动不会提出任何其他条件,除了一项基本的、所有工人都能接受的条件之外,即:统一行动的目的是反对法西斯,反对资本的进攻,反对战争的威胁,反对阶级敌人。这就是我们的条件。

统一战线反对者的主要论据

统一战线反对者反对什么，又是怎样进行反对的呢？

有些人说：“统一战线的口号，只不过是共产党人要的一种手腕。”我们回答说：既然是一种手腕，那你们为什么不真诚地加入统一战线，以此来揭露“共产党人的手腕”呢？我们公开声明：我们要实行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是为了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壮大起来，是为了无产阶级在今天为维护自己的日常利益而反对资本进攻、反对法西斯的时候，能为明天自身的彻底解放创造先决的条件。

另一些人说：“共产党人在攻击我们。”但是听着，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声明过：我们不攻击任何人，无论是个人、团体或政党，只要他们拥护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反对阶级敌人。然而，为了无产阶级及其事业的利益，我们有责任批评那些阻挠工人统一行动的个人、团体和政党。

第三种人说：“我们不能和共产党人结成统一战线，因为他们的纲领和我们的不同。”可是，你们自己也确认你们的纲领不同于资产阶级政党的纲领，但这一直也没有妨碍你们同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

反对统一战线和维护同资产阶级联合的人说：“各资产阶级民主政党是比共产党人更好的反法西斯盟友。”可是，德国的经验说明了什么呢？要知道，社会民主党人就曾经同这些“更好的”盟友结盟。而结果如何呢？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如果我们同共产党人建立统一战线，那小资产者就会惧怕‘赤祸’而投向法西斯。”难道统一战线对于农民、小商人、手工业者、劳动知识分子是一种威胁吗？不，统一战线威胁的是大资产阶级、金融巨头、容克地主以及其他剥削者，这些人的政体才会使上述各阶层陷入彻底破产的境地。

有些社会民主党的首领说：“社会民主党主张民主，而共产党人主张专政，所以我们不能同共产党人建立统一战线。”但是，难道我们现在向你们提出建立统一战线是为了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吗？要知道，目前我们并没有提出这一点。

“只要共产党人承认民主，起来保卫民主，我们就准备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对于这一点，我们的回答是：我们主张苏维埃民主，劳动人民的民主，世界上最彻底的民主。但是，在资本主义各国，我们现在捍卫、而且将来也要捍卫遭受法西斯和资产阶级反动派侵犯的每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因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要求这样做。

例如，英国工党的领袖们说：“小小的共产党加入工党组织的统一战线，是不起任何作用的。”请回忆一下，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对小小的奥地利共产党也是这样说的。可是，事实又怎么样呢？正确的不是以奥托·鲍尔和伦纳为首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而是小小的奥地利共产党，它及时地发出了奥地利出现法西斯危险的警告，并号召工人进行斗争。要知道，工人运动的全部经验表明，共产党人，即使人数较少，也是无产阶级积极战斗的动力。此外，还不应忘记，无论是奥地利共产党，或是英国共产党，它不仅是那几万名拥护党的工人，而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是共产国际的支部，而领导共产国际的政党是一个取得了胜利的、在地球六分之一土地上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

“可是，统一战线并没有阻止法西斯在萨尔的胜利。”这是反对统一战线的人们提出的一种反对意见。这些先生们的逻辑多么离奇！最初，他们想方设法使法西斯取得胜利，而接着又为他们在最后时刻加入的统一战线没能引导工人取得胜利而幸灾乐祸。

在各国政府中任职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说：“假如我们同共产党人结成统一战线，那我们就不得不退出联合政府，而反动政党和法西斯政党则将参加进去。”好吧，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否参加了联

合政府？参加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是否参加了政府？也参加了。西班牙社会党人是否同资产阶级一起参加了政府？他们也参加了。在这些国家里，社会民主党参加资产阶级联合政府是否阻止了法西斯对无产阶级的进攻呢？没有，没能阻止。这就是说，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并不是法西斯的障碍，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共产党人独裁，他们想对我们发号施令，并强使我们接受一切。”不，我们不发号施令，也不强使别人接受一切。我们只提出自己的建议。我们深信，实现这些建议是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的。这不仅是所有代表工人的人所应享有的权利，而且也是他们的义务。你们怕共产党人“独裁”吗？让我们把全部建议，我们的和你们的，都一起提交给工人，和全体工人共同讨论，并选择那些对工人阶级事业最有利的建议吧！

这样看来，所有这些反对统一战线的论据都是经不起任何批评的。这些论据不如说是社会民主党反动领袖们的托词，因为他们宁愿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而不愿同无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

不，这些托词是站不住的！国际无产阶级尝到了工人运动分裂的苦头，因此日益深信，无产阶级在一国和国际范围内的统一战线和统一行动，既是必要的，又是完全可能的。

统一战线的内容和形式

现阶段统一战线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而且应当是什么？

保卫工人阶级直接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防卫工人阶级免受法西斯迫害，这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和主要内容。

我们不当只限于提出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空洞口号，我们应当依据群众的切身需要，依据现阶段群众的战斗力水平，来寻求和提出一些斗争口号与斗争形式。

我们应当向群众指出,他们今天应该怎么做,才能防卫自己免遭资本主义掠夺和法西斯蹂躏。

我们应当借助不同派别的工人组织的联合行动来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保卫劳动群众的切身利益。

这就是说:

首先,要进行联合斗争,以便把危机的后果真正转嫁到统治阶级身上,转嫁到资本家、地主身上,总之,转嫁到有钱人的身上;

第二,要进行联合斗争,以反对各种形式的法西斯进攻,保卫劳动人民的成果与权利,反对取消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

第三,要进行联合斗争,以防止日益迫近的帝国主义战争危机,进行能阻碍战争准备的斗争。

我们应当毫不放松地培训工人阶级,使他们能在形势变化时迅速变换斗争形式与斗争方法。随着运动的发展和工人阶级团结的增强,我们应当继续前进——采取组织群众性的政治罢工的方针,准备从防御转向对资本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吸引该国各主要工会参加罢工,乃是群众性的政治罢工的必要条件。

当然,共产党人一分钟也不能、而且也不应放弃自己在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组织和动员群众等方面的独立工作。但是,为了使工人们走上统一行动的道路,必须同时与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工会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组织达成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采取联合行动的临时协议或长期协议。同时,必须特别重视由基层组织通过地方性协议在各地开展群众性活动。我们将忠实地履行同它们签订的各项协议,同时,我们将无情地揭露加入统一战线的个人和组织对联合行动的任何暗中破坏行为。对任何企图破坏协议的行为(这种图谋可能会发生),我们将诉诸群众以作回答,同时为恢复遭到破坏的统一行动而继续进行不懈的斗争。

当然,各个不同国家实现统一战线的具体方式是不同的,采取的形式也各不相同,这取决于工人组织的状况与性质,取决于它们

的政治水平，取决于该国的具体环境，取决于国际工人运动的进展情况，等等。

例如，可能有以下这些形式：有时由于具体的缘由、个别的要求，或根据共同的立场，商定工人们采取联合行动；在一些企业或生产部门中协商采取一致的行动；在地方、省、全国或国际范围内协商采取一致的行动；在组织工人的经济斗争方面，在组织群众性的政治行动方面，在组织反对法西斯进攻的联合自卫方面，协商采取一致的行动；在声援被捕者及其家属方面，在反对社会反动势力方面，协商采取一致的行动；在维护青年和妇女的利益方面，在实行合作化和文化、体育活动等方面，协商采取一致的行动。

如果只是满足于签订联合行动的公约，只是满足于由参加统一战线的政党与团体建立联络委员会，就像我们在法国所看到的那样，那是不够的。这仅仅是第一步。公约，这是实现联合行动的辅助手段，它本身还不是统一战线。为了易于进行联合行动，共产党和社会党领导之间的联络委员会是必要的。但它本身远不足以真正发展统一战线，远不足以吸引广大群众参加反法西斯的斗争。

共产党人和全体革命工人应当争取在各企业、失业者、工人区、小市民以及农村中建立由选举产生的（而在法西斯专政国家，则由参加统一战线运动的最有威望的人们当中挑选）党外统一战线的阶级机构。只有这种机构才能吸引大量无组织的劳动群众参加统一战线运动，才能有助于发挥群众在反对资本进攻、反对法西斯和反动派的斗争中的主动性，并在此基础上培养统一战线所必需的广大工人积极分子，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培养千千万万的非党布尔什维克。

有组织的工人的联合行动，这是开端，是基础。但我们不应忽视，无组织的群众占工人的绝大多数。如在法国，有组织的工人（共产党员、社会党员、各派别工会会员）共约 100 万人，而工人总数却达 1100 万。在英国，参加各派别工会和政党的人约为 500

万,而工人总数达3800万。在其他许多国家里,比例也大致如此。在“正常”时期,这些没有参加组织的群众基本上置身于政治生活之外。可是现在,这些数量极大的群众日益行动起来,投身于政治生活,出现在政治舞台上。

建立党外的阶级机构,这是在广大群众的最底层实行、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的最好形式。这种机构又是防止统一战线的反对者破坏工人阶级统一行动的最好支柱。

反法西斯人民阵线

在动员劳动群众同法西斯进行斗争方面,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是,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新人民阵线。无产阶级整个斗争的成就,与无产阶级同劳动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基本群众建立战斗同盟有紧密的关系,因为甚至在工业发达的国家,这些基本群众也占居民的多数。

法西斯希望把这些群众争取过去,所以在宣传中企图把城乡劳动群众同革命的无产阶级对立起来,以“赤祸”恐怖吓唬小资产者。我们应当倒转锋芒,向劳动农民、手工业者和劳动知识分子指出,威胁他们的真正危险来自何方;向他们具体指出,是谁把苛捐杂税的重担加于农民身上,对他们实行高利盘剥;又是谁尽管占有最好的土地和大量财富,但还是把农民及其家属从他们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赶走,使他们遭受失业和贫困;向他们耐心地,坚持不懈地具体解释,是谁以苛捐杂税、高额租金以及无法忍受的竞争,使得手工业者破产;又是谁使广大劳动知识分子失业,流落街头。

但这样做还不够。

为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主要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点,就是革命无产阶级坚决地行动起来,维护这些阶层(其中包括劳动农民)的要求,维护那些符合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要求,并在斗争过程中把工人阶级的要求同这些要求结合起来。

在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时，正确地对待那些有很多劳动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基本群众参加的团体与政党，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类政党和团体（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大都尚处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而且是跟着资产阶级跑的。这类政党和团体的社会成分是不纯的。其中既有富农，又有无地的农民，既有大商人，又有小店主，但他们的领导权属于第一类人——大资本的代理人。这种情况要求我们对这类团体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因为考虑到会员群众往往不了解其领导人的真正的政治面目。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努力把这些政党和团体或其中的某一部分吸引到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中来，尽管它们的领导是资产阶级。例如，法国的激进党、美国的各种农业团体、波兰的“人民党”、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农民党、保加利亚的农民联盟、希腊的农民党等，今天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不管有无可能把这些政党和团体吸引到人民阵线中来，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策略都应把加入这些政党和团体的小农、手工业者等拉到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中来。

因此，你们看到，我们应当全面消除我们实践中经常遇到的现象，即对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各种团体和政党采取忽视、蔑视的态度。

.....

反帝统一战线

由于国际和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在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反帝统一战线问题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时，首先必须考虑到群众进行反帝斗争所处的各不相同的情况、民族解放运动不同的成熟程度、无产阶级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共产党对广大群众的影响。

在巴西,这个问题就不同于在印度、中国和其他国家。

在巴西,共产党建立了民族解放同盟^①,从而为发展反帝统一战线奠定了正确的基础。共产党应竭尽全力进一步扩大统一战线,首先要把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动起来,着手组织完全忠于革命的人民革命军和建立民族解放同盟的政权。

在印度,共产党人应当支持、扩大和参加一切群众性的反帝行动,包括那些由民族改良主义者领导的运动。他们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独立性的同时,应当积极地在那些参加印度国大党的团体内进行工作,使这些团体中形成民族革命派,以便进一步开展印度各族人民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

在中国,人民运动已经获得了成果,在相当大的区域内建立了苏区,并且组织了强大的红军。日本帝国主义强盗般的进攻,以及南京政府的叛卖行径,使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民族生存遭到威胁。中国苏区是为反对帝国主义者奴役和瓜分中国而斗争的团结核心,是集合一切反帝力量进行中国人民民族斗争的团结核心。

因此,我们赞同英勇的兄弟的中国共产党这一倡议:同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

我宣布,我们代表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向中国各个苏维埃、向中国的革命人民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敬礼,我相信这可以表达我们整个代表大会的思想和感情。我们向经过成千上万次战斗考验

① 巴西民族解放同盟成立于1935年3月,它联合了国内各民主政党和团体。共产党在其中起主导作用。普列斯捷斯是同盟的名誉主席。同盟提出以下纲领:摆脱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把外国企业收归国有,没收大地产,实行社会生活民主化,取缔法西斯组织和建立人民革命政府。1935年7月,瓦尔加斯政府查封了同盟,因而引起了许多大城市7月间爆发武装起义。起义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同盟虽遭失败,但其活动具有重大的意义,它表明了工人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日益增强。

的英雄的中国红军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敬礼。我们向中国人民保证，我们坚决支持他们争取从一切帝国主义强盗及其走狗那里彻底解放出来的斗争。

.....

译自《季米特洛夫选集》第1卷(莫斯科1957年版)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到群众中去! (《真理报》社论)

(1935年8月2日)

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讨论威廉·皮克同志的报告——《关于执行委员会工作的总结》——已经六天了。在讨论中,有46个国家的60位代表发了言。大部分发言都充满布尔什维主义的自我批评和批评的精神。经过如此细致的全面分析之后,第七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完全赞同执行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实际活动。

大会通过的决议经过每一个代表团的仔细讨论。因此它是整个大会集体工作的成果,它也有力地证明了在共产国际内部居主导地位的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的精神。

大会一致赞同执委会关于同各国社会民主党采取统一行动反对法西斯、反对资本的进攻、反对战争的政策。这项政策已经在一系列国家取得初步的效果。如果说共产国际的努力还没有取得充分的成功,那这不是它的过错,而是因为第二国际拒不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和呼吁。

在所有代表的发言中,占中心地位的是关于争取工人阶级统一行动,关于建立反对法西斯和反对战争的统一战线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项决议的核心。

大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当前,在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危机日益成熟。共产党人最重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任务在于:不满足于既得成就,继续前进以争取新的胜利,扩大同工人阶级的联系,取得千百万劳动者的信任,把共产国际的各个支部变成为群众性的政党,使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处于共产党的影响之下,从而保证

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创造必需的条件。”

这是第七次代表大会给共产国际所有支部的极其重要的指示。

从讨论中至少可以看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有四个特征。这些特征表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政治上、思想上团结一致，在意识形态上坚强巩固，组织上坚如磐石，紧密地团结在领导机关周围。宗派主义残余已经消除，共产国际最危险的敌人已被揭露和驱逐出去。过去的七年再次证明国际的路线是正确的，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和策略是正确的。大会指出了国际若干支部存在的严重缺点，也承认共产国际对这些支部的政治帮助太迟了。

在讨论中，在皮克同志的报告和总结中，自我批评和批评的火力指向在争取建立统一战线的斗争中出现的“左”的宗派主义机会主义的对国际路线的歪曲，也指向右的错误。大会有力地打击了宗派主义“理论”、害怕群众的情绪，以及忽视广大劳动群众要求和日常利益的非无产阶级倾向。克服相沿成习的宗派主义的残余，在当前形势下就是为顺利建立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和劳动者的反法西斯人民战线创造重要前提。彻底粉碎宗派主义，就是使所有各国党都准备好当国际工人运动进入消除分裂时期进行争取最广大群众的斗争。

此外，讨论还说明：共产国际的各个支部已经大大地成长和巩固了，它们的领导机关也已经十分成熟，它们能够在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斗争的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明辨方向。差不多共产国际所有支部的人数有所增长，而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则成长得更快。它们比七年以前更加接近群众，固然，它们还没有充分利用一切客观条件扩大自己的影响。

最后，讨论又一次表明，共产国际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世界党，它是工人的伟大国际团体，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和列宁、斯大

林事业的胜利。

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和反法西斯人民战线，借以击退法西斯的进攻和防止战争的危险。在工人群众中，在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中，已经出现了从改良主义转向同共产党人联合斗争的趋向。

资本主义世界的整个形势、各国共产党在团结自己队伍和改进工作方法方面所进行的大量工作，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世界历史性胜利，都为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国际的口号在群众中取得巨大胜利准备了土壤。

大会为执行委员会规定了今后工作的基本原则。大会在这方面的出发点是：当前局势的复杂性和各国共产党在领导日益革命化的群众运动方面的不断增强的作用和责任，迫切要求国际的每一个支部都能进行干练有效的领导。大会建议执行委员会“把自己活动的重心转移到为世界工人运动制定基本的政治和策略方针，在解决一切问题时都从每个国家的具体条件和特点出发，并一般应避免对各国共产党的内部组织事务进行直接干涉”。

仅仅这一点就要求每一个支部的领导机关有能力“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和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各项决定的基础上，在事态发生陡然转折时，独立地迅速找出解决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和策略任务的办法”。这项决议证明，共产国际不仅是工人和劳动者最强大的国际组织，而且也是最严密最民主的组织。

虽然充分认识到共产国际的力量，但是大会还是告诫所有支部不要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已经取得的成绩只不过是各国共产党反对法西斯进攻、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危险的艰苦奋斗的开端。决议提醒全体共产党人，“日益成熟的政治危机能否转变为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完全决定于各国共产党的力量和它在广大无产阶级群众中的影响，决定于共产党人的革命干劲和自我牺牲精神。”

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大大前进了一步。各国共产党取得

了巨大的胜利。它们培养出了和正在培养着无限忠于工人阶级事业的战士，并高举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共产主义的胜利旗帜，奋勇前进。

(乌传袞译)

(摘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二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 所做的结束语(摘录)

(1935年8月13日)

季米特洛夫

为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反对法西斯主义而斗争

.....

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是反法西斯人民阵线

有些同志白白地在下述问题上伤脑筋:从何做起呢?是从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做起,还是从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做起?

有些人说:在组成牢固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之前,不能着手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

但是,另外一些人说,因为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在许多国家里遭到社会民主党的抵制,所以最好直接从人民阵线做起,然后在此基础上发展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

显然,这两种人都不懂得,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和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是在实际斗争中辩证地联系在一起,它们互相交织着,在反法西斯的实际斗争过程中互相转化,并且在它们之间根本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要知道,真不能设想,在没有组织工人阶级本身的统一行动的情况下(工人阶级是人民阵线的领导力量),就可以真正实现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而同时,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所以能进一步发展,在

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它转变为反法西斯人民阵线。

同志们，请设想一下，有这么一位公式主义者，他面对我们的决议，以十足的书呆子劲在设计他的公式：

先在地方上自下而上地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

接着，在省的范围内自下而上地建立统一战线；

然后，也经过这么几个阶段自上而下地建立统一战线；

接着，统一工会运动；

此后，吸引其他反法西斯政党参加；

然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扩大人民阵线；

接着，应该把运动提到更高的水平，使之政治化、革命化，等等。

同志们，你们会说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我同意你们的意见。但糟就糟在这里，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表现的这种宗派主义的胡说八道，在我们的队伍中还经常能听到。这是令人遗憾的。

而实际情况又怎样呢？当然，我们应当到处争取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斗争的全民阵线。但在许多国家里，社会民主党的反动分子在抵制无产阶级斗争的统一战线。如果我们不能通过动员群众去粉碎它，那我们就只能是泛泛地议论人民阵线了。首先，英国的情况就是这样。那里的工人阶级占居民的多数，工人阶级的基本群众跟着英国的职工大会和工党走。比利时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情况也是这样。那里，与人数不多的共产党相对抗的，是强大的群众性工会和人数众多的社会民主党。

如果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只是泛泛地议论人民阵线，而放弃为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而进行的斗争，那他们就会犯极大的政治错误，因为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参加，就不能建立人民阵线。为了争取在这些国家建立真正的人民阵线，共产党人应当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大量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他们应消除这些群众的偏见（这些群众把其改良主义的群众组织看成是无产阶

级团结的体现);应说服群众使其相信,同共产党人建立统一战线意味着这些群众转到阶级斗争的立场上来,唯有这种转变才能保证顺利进行反对资本进攻和反对法西斯的斗争。我们用不着向自己提出更广泛的任务,借以克服所面临的困难。相反,我们在争取消除这些困难的时候,也就实际上(并非口头上)为建立反对法西斯、反对资本进攻、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真正全民斗争阵线进行了准备工作。

在像波兰这样的国家里,问题就不同了。那里,除了工人运动外,还开展着强大的农民运动;农民群众有自己的组织,这些组织在农业危机的影响下激进起来;民族压迫日益激起少数民族的愤懑。这里,全民斗争阵线将同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并行地向前发展,而且在这种国家里,全民阵线运动有时甚至可能超过工人阵线运动。

让我们以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西班牙这样一个国家来作为例子。能不能说,因为无产阶级在组织上分散,就需要在建立反对莱鲁斯和西尔·罗布赖斯的工农阵线之前就完全统一工人阶级的斗争?如果这样提问题,我们就会使无产阶级脱离农民群众,就会实际上取消土地革命的口号,就会有利于人民的敌人而把无产阶级和农民分开,使农民与工人阶级对立起来。谁都知道,这就是工人阶级1934年在亚斯土里亚斯省的十月战斗中遭到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有一点不应忘记,即在所有无产阶级人数较少、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阶层占多数的国家里,更需要全力以赴地建立工人阶级本身的牢固的统一战线,以便使工人阶级能取得对全体劳动人民的领导地位。

因此,同志们,在解决无产阶级阵线和人民阵线的问题时,不能对所有国家和所有民族实际生活中的各种情况都采取千篇一律的方案。这方面的普遍主义,即对一切国家采用同一方案,请允许

我说,这是无知。而这种无知,应当受到打击,尤其是当它以一种普遍适用的形象出现的时候。

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及其对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态度

同志们!从我们的策略任务着眼,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社会民主党是不是资产阶级的主要支柱,它在哪些国家是资产阶级的主要支柱?

有些参加讨论的同志(弗洛林、杜德)谈到了这个问题,但由于这个问题很重要,所以有必要对它进行比较详尽的解答。这是各派别工人(特别是社会民主党工人)会提出的、而且不能不提出的问题。

必须注意到,在一系列国家中,社会民主党在资产阶级国家中的地位及其对资产阶级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或正在发生变化。

首先,危机从根本上动摇了工人阶级各阶层的地位,甚至也动摇了最有保障的阶层、即所谓工人贵族的地位。谁都知道,社会民主党主要依靠的是工人贵族。连这个阶层也日益开始改变其原来的观点,即他们曾认为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的政策是适宜的。

第二,我在报告中已指出,在一些国家里,资产阶级本身不得不抛弃资产阶级民主制,采取恐怖的专政形式,它不仅剥夺了社会民主党在国家金融资本体系中的原有地位,而且在某种情况下也剥夺了社会民主党的合法地位,对社会民主党进行迫害,甚至予以消灭。

第三,在德国、奥地利和西班牙工人失败(这主要是社会民主党奉行同资产阶级阶级合作政策的结果)的影响下,另一方面,在苏联社会主义胜利(这是实行布尔什维主义政策和应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结果)的影响下,社会民主党工人日益趋向革命,他们开始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所有这些原因,使社会民主党继续保持其资产阶级支柱的角色更加困难了,而在某些国家里,则简直是不可能了。

在那些法西斯专政剥夺了社会民主党合法地位的国家里,不了解这一点是特别有害的。从这一角度来看,那些德国同志所作的自我批评是正确的。他们在发言中指出,必须不再拘泥于涉及社会民主党的那种过时的公式和决定,不再忽视社会民主党的地位所发生的变化。显然,这种忽视会使我们实现工人阶级统一的路线遭到歪曲,会使社会民主党内的反动分子易于暗中破坏统一战线。

现在,虽然在所有国家里,社会民主党内都出现了革命化过程,但是它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不能这样设想:趋向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工人会立即大批地转向彻底的阶级斗争的立场,而经过任何中间阶段就直接同共产党人联合起来。在许多国家里,这将是一个比较困难、比较复杂而又长期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在任何情况下大都取决于我们的正确政策和策略。我们甚至应当估计到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些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组织在从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的立场转向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立场时,会有一段时间作为独立的组织和政党存在。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把这些社会民主组织或社会民主党看成是资产阶级的支柱。

那些社会民主党工人在数十年内已养成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的思想。不能设想,仅仅由于客观原因的影响,他们就会自动抛弃这种思想。不会的。帮助他们摆脱改良主义思想的控制,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职责。应当同志式地、耐心地解释共产主义的原则和纲领,而且要适合各个社会民主党工人的政治发展水平。我们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批判应当更具体、更系统,应当根据社会民主党群众自身的体验来进行批判。必须注意到,首先要根据同共产党人肩并肩地反对阶级敌人的共同斗争体验,这才能够而且必

然会加速社会民主党工人在革命道路上前进。为了消除社会民主党工人的动摇和疑虑，没有比参加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更为有效的办法了。

我们将千方百计地设法，不仅使那些社会民主党工人，而且也使那些真诚希望转向革命的阶级立场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组织的活动家，易于同我们一起进行反对阶级敌人的工作和斗争。然而，我们要声明：那些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家、一般专职人员和普通工人，如果继续支持社会民主党反动头子的分裂活动和反对统一战线，因而直接或间接地帮助阶级敌人，那他们在工人阶级面前将承担不亚于那些曾支持社会民主党阶级合作政策的人所应承担的历史罪责。阶级合作政策在欧洲许多国家葬送了1918年的革命，并为法西斯扫清了道路。

对待统一战线的态度问题，乃是社会民主党的反动部分和趋向革命的阶层之间的分水岭。我们越加强反对同资产阶级结盟的社会民主党反动部分的斗争，我们也就越有效地帮助了趋向革命的那一部分。共产党人越坚决地争取与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左翼阵营内部的一些人的自觉性就提高得越快。阶级斗争的实践和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统一战线运动的事实表明，谁是这个阵营的口头上的“左派”，谁是真正的左派。

关于统一战线政府

如果说，社会民主党对待真正实现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态度，一般说来是每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或其某一部分在资产阶级国家中的原先作用是否发生了变化，以及发生了多大变化的主要标志，那么，社会民主党对待统一战线政府问题的态度，就是一个更加鲜明的标志了。

当建立统一战线政府的问题作为直接的实际任务提上日程时，在这种情况下，它将成为决定性的问题，它将成为该国社会民

主党的政策的试金石;或则同法西斯化的资产阶级一起反对工人阶级,或则同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起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反对法西斯和反动派。这个问题,无论在统一战线政府成立期间,还是在它执政以后,都将不可避免地提出来。

同志们,关于统一战线政府或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政府的性质,以及建立这种政府的条件,我认为在报告中已谈到为确定总的策略方针所不可缺少的一切。如果希望我们除此之外,再拟定出建立这种政府的一切可能形式和全部条件,那就意味着瞎猜了。

我们预先提出警告,在这个问题上不要犯简单化和公式化的毛病。实际生活要比任何公式复杂得多。比如,说什么统一战线政府是确立无产阶级专政道路上的不可缺少的阶段,这是不对的。这个错误,同过去认为在法西斯国家中不会有任何中间阶段,法西斯独裁必将直接为无产阶级专政所代替这种错误,是相同的。

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无产阶级本身是否准备在决定性时刻直接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政权,能否保证自己在这关键时刻得到同盟者的支持,而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和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运动,在此阶段只能镇压或推翻法西斯,而不能直接取消资产阶级专政。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只是因为不能直接取消资产阶级专政而放弃建立和支持统一战线政府或人民阵线政府,那就是不能允许的政治上的短见,是一种不严肃的革命政策。

在并非法西斯当政的国家里建立统一战线政府,同在法西斯专政的国家里建立统一战线政府,不是一回事。理解这一点也不难。在法西斯专政的国家里,只有在推翻法西斯政权的过程中才能建立这样的政府。在那些正在开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国家里,人民阵线政府可能会成为工农民主专政的政府。

我在报告中已指出,共产党人将全力支持统一战线政府,因为它将同人民的敌人真正展开斗争,它将允许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自由活动。关于共产党人参加政府的问题,这完全取决于具体的情

况。此类问题将个别解决。没有任何现成的方案可以事先提出来。

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态度

连斯基同志在其发言中指出，波兰党在动员群众反对法西斯侵犯劳动人民的权利时，“仍然害怕正面提出民主要求，担心这样会在群众中产生对民主的幻想”。对正面提出民主要求怀有某种恐惧心理的，不仅仅是波兰一个党。

同志们，这种恐惧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来自对资产阶级民主态度问题的不正确的、非辩证的提法。我们共产党人是苏维埃民主的坚定的拥护者。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提供了苏维埃民主的伟大经验。正当资本主义各国取消资产阶级民主最后一点残余的时刻，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宣布，在苏联实行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不记名的投票选举。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绝大多数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苏维埃民主的先决条件。这种民主并不是最终形式的，它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发展，随着无阶级社会的建立，以及随着经济中和人们思想意识中资本主义残余的消除而不断地向前发展。

但是今天，生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千百万劳动群众，必须对资产阶级在各国所采取的各种统治形式决定自己的态度。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所以对国家存在哪种政治制度，是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的资产阶级专政（哪怕只有极不充分的民主权利与自由），或者公开的法西斯形式的资产阶级专政，不是漠不关心的。我们虽然是苏维埃民主的拥护者，但我们将保卫工人阶级经过多年顽强斗争而得来的每一分民主成果，并将坚决地为扩大民主成果而战斗。

英国工人阶级在争得罢工权和职工大会合法地位之前，在争得集会 and 出版自由以及扩大选举权之前，他们作出了多大的牺牲！

在 19 世纪的法国,数以万计的工人为了争取基本权利,为了能合法地组织自己的力量去进行反对剥削者的斗争,在革命战斗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全世界无产阶级为赢得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流了多少鲜血,所以他们将竭尽全力为维护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而斗争,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对待资产阶级民主的态度,并非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一样的。例如,在十月革命时,俄国布尔什维克同一切打着保卫资产阶级民主旗号来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布尔什维克对这些政党进行斗争,是因为当时资产阶级民主这面旗帜已成为动员一切反革命势力来反对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旗帜。现在,资本主义各国的局面不同了。现在,法西斯反革命正在侵犯资产阶级民主,力图建立最野蛮的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制度。现在,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里,劳动群众必须马上,不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民主之间,而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与法西斯之间,具体地作出选择。

此外,目前的形势不同于——比如说——资本主义稳定时期。当时法西斯的威胁,还不像现在这样迫在眉睫。当时在许多国家里,革命工人面临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的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把主要火力集中在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上。在德国,他们曾反对魏玛共和国,这倒并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共和国,而是因为它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它镇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尤其是在 1918—1920 年和 1923 年。

但是,当法西斯运动开始抬头,如 1932 年德国法西斯分子组织和武装了数十万冲锋队员反对工人阶级的时候,共产党人是否还能停留在这种立场上?当然不能。许多国家、特别是德国共产党人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没有考虑到已经发生的变化,继续重复几年前曾经是正确的口号,停留在几年前曾经是正确的策略立场上,尤其是在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已具有现实性的时候,以及在

魏玛共和国的旗帜下(如 1918—1920 年所发生的情况那样)聚集了德国全部反革命势力的时候。

今天还不得不指出,在我们的队伍中存在着害怕正面提出民主要求的情况。这只能证明,我们的同志对待十分重要的策略问题,还没有掌握马列主义的方法。有些人说,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会削弱工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回忆一下列宁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说的,不是无益的。列宁说:

“如果认为,争取民主的斗争会使无产阶级离开社会主义革命,或是妨碍、削弱社会主义革命等等,那就根本错了。相反地,若不实行彻底的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取得胜利,若不为民主进行全面、彻底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也就不能准备战胜资产阶级。”

我们全体同志应当牢牢记住这些话,要知道,历史上一些保卫工人阶级基本权利的不大的运动往往发展成为伟大的革命。但是,为了能把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同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首先就得在对待保卫资产阶级民主这个问题上放弃公式化的态度。

.....

干部问题

.....

正确的干部政策问题,对于我们的党,对于共青团,对于一切群众性组织,即对于整个工人运动来说,都是一个最迫切的问题。

什么是正确的干部政策?

第一,必须对人有所了解。我们党通常对干部缺乏系统的考察。只是近来,法国共产党和波兰共产党,以及东方的中国共产党,才在这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德国共产党在转入地下以前,也曾考察过自己的干部。这些党的经验告诉我们:一旦着手考察,就会发现以前没有显露头角的工作人员;而另一方面,党就能肃清那

些在思想上与政治上有害的异己分子。不必多说,就拿法国的谢劳拉和巴尔伯两人作例子吧。这两个人,用布尔什维克的显微镜一照,原来是阶级敌人的奸细,于是被清洗出党了。在波兰和匈牙利,由于对干部进行了审查,也发现了一窝子奸细,发现了竭力隐藏起来的敌人的爪牙。

第二,必须正确提拔干部。提拔干部不应是临时性的事情,而应当成为党的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如果单纯从党的工作来考虑干部的提拔,而不考虑被提拔的党员是否联系群众,这是不好的。提拔干部时,应同时考虑被提拔的人是否胜任党的某种职务,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如何。在我们党内,在提拔干部的工作上有过成效显著的例子。例如,大会主席团里的西班牙女共产党员多洛雷斯同志,两年前还在基层工作。她在与阶级敌人头几次交锋时,就表现出是一个出色的鼓动家和战士。后来,她被提拔到党的领导机关工作,成为一个十分称职的领导人。

在其他一些国家里,我也能举出不少类似的例子来。

但是,提拔干部的工作,多半缺乏计划性,只是临时决定进行的,因而不尽取得效果,有时甚至把一些显然对工作有害的议论家、清谈家和空谈家提升为领导者。

第三,必须善于使用干部。要善于发现和利用每个积极分子的长处。尽善尽美的人是没有的;要使用现有的人,纠正他们的弱点和缺点。我们看到,在我们党内存在着不能正确使用优秀而忠实的共产党员的情况,这是不能容忍的。如果把这些人派去担任更加适合于他们的工作,那他们一定会作出很大的贡献。

第四,必须正确地配置干部。首先,要把那些联系群众的、从群众中产生的、积极主动而又坚定沉着的人安排在运动的主要环节上;要适当地把这种积极分子配备在最大的中心城市里。在资本主义国家,干部的调动是很不容易的,往往会遇到许多阻力和困难,其中也包括经济与家庭等方面的困难。要考虑和设法解决这

些困难，可是我国的党却一向不这么办。

第五，必须系统地帮助干部。这种帮助就是对干部进行细心的指导，同志般的督促，纠正缺点和错误，给予日常的具体的领导。

第六，必须注意保存干部。必要时，要善于及时把干部调到后方去，派新干部来接替他们。我们应当要求各国党（尤其是处于秘密状态的党）的领导极端负责地保存干部。为了正确地保存干部，还必须极为认真地组织党内的保密工作。在我们有些党内，许多同志认为，只要党按照规定的框框正式进行了改组，那就算是准备就绪，可以安然转入地下了。其实，只有在党转入地下活动以后，在受到敌人的直接严重打击时，才谈得上真正的改组，为此，我们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你们要记住：德国共产党转入秘密活动时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那些今天还是合法存在，而明天就会成为非法的共产党，应当把这个经验当作严重的警告。

只有实行正确的干部政策，我们党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和利用现有干部的力量，才能从群众运动的巨大宝库中源源不断地发掘优秀的积极分子。

我们应当依据哪些基本准则来选拔干部呢？

第一，对工人阶级事业无限忠心，对党忠诚，并在战斗中、监狱里和法庭上经受了阶级敌人斗争的考验。

第二，与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时刻关心群众的利益，体察群众的情感、情绪和需求。我们党组织的领导者的威信，首先在于群众是否把他们当作自己的领路人，是否从亲身体验中确信他们胜任领导工作、在斗争中果断和有自我牺牲精神。

第三，在复杂环境中能独自把握方向，敢于对所作的决定负责。谁要是怕负责任，谁就当不了领导者。谁要是不能发挥主动性，谁要是只想：“我只执行指定的任务”，谁就不是布尔什维克。只有在失败时不惊慌失措，胜利时不骄傲自满的人，只有百折不回地执行决议的人，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领导者。当干部必须独

立完成具体的斗争任务,并认为自己对这项工作要负完全责任时,他们就容易提高、容易长进。

第四,在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中,以及在与一切背离布尔什维主义路线的倾向作不调和的斗争中,遵守纪律,经受布尔什维克的锻炼。

同志们!我们尤其应当着重指出,必须坚持上述正确选拔干部的条件,因为实际上有些人往往宁愿用那种只会写漂亮文章、说漂亮话,但不能做事、不能进行斗争的人,却不愿提拔那些写得没有那么好、说得没有那么漂亮,可是意志坚强、有独创精神、联系群众、敢打敢拼,并能带领其他人去斗争的人。宗派主义者、清谈主义者、教条主义者把忠实的群众首领、真正的工人领袖排挤掉的事实,难道还少吗?

我们的领导干部不仅应当知道该做些什么,而且要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精神、革命品格和意志去做这项工作。

同志们!在讲到干部问题时,请允许我说一说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在工人运动干部问题上所应发挥的巨大作用。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组织,对被监禁者及其家属、对政治避难者、对被追捕的革命者和反法西斯战士,给予了物质上与精神上的援助,使各国工人阶级成千上万宝贵战士的生命和战斗力得以挽救和保存下来。我们每一个坐过监牢的同志,都直接体会到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活动所起的极其巨大的作用。

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做了这许多工作,因而博得了千百万无产者、革命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爱戴、怀念和深深的感激。

目前,由于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横行、法西斯主义日益猖獗、阶级斗争不断加剧,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作用就更加增强了。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当前的任务,是使自己成为资本主义各国(法西斯专政国家也在其中,但要注意这些国家的特殊情况)劳动人民的真正群众性组织,就是说,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和反法西斯

人民阵线的“红十字会”，即成为反对法西斯、为和平与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劳动阶级大军的“红十字会”，这个组织应包括千百万劳动群众。为了顺利地完成任务，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应当有千百万自己的积极分子，有大批自己的干部，即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干部，他们的品格和能力都要适应这个非常重要的组织的特殊使命。

这里还必须十分尖锐地、直截了当地指出：如果在一般工人运动中，官僚主义，即对人漠不关心的态度，是十分有害的话，那么，在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活动中，这种态度就等于犯罪。在刑讯室和集中营里受尽折磨的工人阶级战士，即被反动派和法西斯迫害致死的人，以及政治避难者及其家属，应当得到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最大同情与关怀。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应当更好地了解和执行自己的任务，去援助无产阶级运动和反法西斯运动的战士，尤其要保证工人运动的干部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安全。加入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组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人，应当时刻意识到他们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国际所负的重大责任，担当起胜利完成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的任务和使命。

同志们！大家都知道，在斗争过程中，在克服艰难险阻中，以及通过正、反两方面事例来培育干部，乃是最好的办法。我们有数以百计的事例，可以表明在罢工和游行示威时、在监狱里和法庭上的典范行动。我们有成千上万个英雄，但是，遗憾的是，我们也有不少意志薄弱、动摇不定，甚至临阵脱逃的人。而有些人却常常忘掉这两种事例，没有以这些事例来教育干部，没有向干部表明应当仿效什么，应当摒弃什么。要对同志们和工人积极分子在阶级冲突中、在警察局受审时、在牢狱和集中营里、在法庭上的表现进行考察。要从中找出正面的事例，树立学习的榜样；要摒弃那种腐朽的、非布尔什维克的、庸俗的东西。自从莱比锡案发生以来，我们

看到,我们的同志在资产阶级和法西斯法庭上发表了一系列讲话。这些讲话表明,我们一大批干部在不断成长,同时也表明,这便是布尔什维克在法庭上所应有的表现。

然而,就连你们这些大会代表,不是也有许多人并不十分了解罗马尼亚的铁路工人案^①、德国法西斯分子杀害菲特·苏黎支案^②、英勇的日本同志市川正一案^③、保加利亚革命士兵案^④,以及其他许多堪称为无产阶级英勇斗争典范的案件吗?

要大力宣传这些无产阶级英勇斗争的典范,使我们队伍中和工人阶级队伍中的那些意志薄弱、市侩习气和各种腐败、软弱的行为相形见绌。要极其广泛地利用这些范例去教育工人运动的干部。

同志们!我们党的领导同志经常抱怨说,没有人:做宣传鼓动工作的人不够,办报的人不够,做工会工作、青年工作、妇女工作的人都不够。人不够用,人不够用,没有人。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引用列宁的一段为时已久、但永远适用的至理名言:

“……没有人,而人又很多。人很多,因为工人阶级和愈来愈多的社会阶层都一年比一年提拔出更多的心怀不满、愿意反

① 指1933年2月对格利维斯铁路工人罢工的领导人和许多参加者的审判。乔治乌·德治、基伏·斯托伊卡、平蒂列及其他被告人在开庭时的讲话,是利用资产阶级法庭进行革命斗争的典范。科罗列夫法庭判处二月战斗的领导人和积极参加者以多年苦役。

② 菲特·苏黎支是德国现役军人协会的组织者之一及德国共产党汉堡支部的领导人。1935年1月10日被法西斯法庭判处死刑。1935年6月6日执行。

③ 1931年6、7月间,在东京组织了对43名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和东京支部党员的审判。共产党员们利用审批机会宣传革命观点。日本共产党中央领导人市川正一在法庭上为共产党的政纲和策略辩护。他的讲话后来发表了,标题是《日本共产党斗争简史》。市川正一于1945年3月15日死于狱中。

④ 1933年,保加利亚当局在驻防部队的士兵和海员中破获了地下革命组织。在1933年一年内,保加利亚当局对被捕士兵和海员进行了12次审讯。结果,54人被判处死刑,11人在审讯期间被杀害,大批人被判长期监禁。

抗……的人，……但同时又没有人，因为……没有擅长于组织的人材来进行广泛而且统一的、严整的工作，使每一分力量，即使是最微小的力量都得到运用。”^①

列宁这段话，我们党应当深刻领会，并把它当作日常指示去执行。人很多，不过需要在罢工和游行示威期间，在我们的组织内部、在各种工人群众组织中、在统一战线机关内物色；要帮助他们在工作 and 斗争过程中成长起来；要适当地安排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能真正致力于工人的事业。

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是讲求实际的人。我们面临的任务，就是进行下列实际斗争：反对资本的进攻，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推翻资本主义。为了完成这些实际任务，共产党干部必须用革命理论武装自己，因为理论能给实践指明方向、指明前途，能使我们在工作中增强信心，相信我们的事业必胜。

但是，真正的革命理论，是和形形色色空洞的推理、各种各样玩弄抽象定义的无谓把戏水火不相容的。列宁再三说过，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种理论才是我们的干部所必需的，正像日常生活中需要粮食、空气和水一样。

谁真心想根除我们工作当中死气沉沉的公式主义和有害的烦琐哲学，谁就应当与群众一起并带领群众进行实际有效的斗争，就应当孜孜不倦地领会强有力的、富有成效的和具有权威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说，以期将这类东西彻底消除。

因此，我认为，你们必须特别注意党校的工作。我们的党校不应培养书呆子、清谈家和引证专家。决不培养这类人！从党校毕业出去的人，应当是为工人阶级事业奋斗的先进战士，也就是说，他们不仅要比别人更勇敢、更有自我牺牲的决心，而且要比普通人看得更远，更明确劳动解放的道路。共产国际各支部应当认真

^① 见《列宁全集》，第5卷，第438页。——原编者

办好党校,使它成为锤炼这种骨干战士的熔炉,而不应迁延耽搁。

我认为,党校的基本任务在于:教育在校的党员和共青团员学会将马列主义方法运用到该国的具体环境中去,运用到具体条件中去,运用到反对当前具体的、而不是“笼统的”敌人的斗争中去。为此,就必须学习列宁主义的活的革命精神,而不要停留在字面的理解上。

在我们的党校里,可以用两种方法来培养干部。

第一种方法是:用抽象的理论来培养干部,力求给他们灌输一大堆枯燥无味的知识,使他们能起草像样的提纲和决议;而涉及该国的问题,即该国的工人运动及工人运动史、该国共产党的传统和经验时,则一带而过。

第二种方法是:要求学员在学习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时,必须实际研究本国无产阶级斗争的各种根本问题,以便以后回去做实际工作时,能够独立地把握方向,能够成为独立的实际组织者,能够带领群众同阶级敌人进行战斗。

并不是我们党校所有的毕业生都是有用的人材。有的人空话连篇,满脑子抽象概念和书本知识,学究气十足。而我们所需要的,却是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布尔什维克组织者和群众的领导人。我们今天所迫切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即使这样的学员或许还不能起草令人满意的提纲(尽管我们也很需要能起草令人满意的提纲的人),但是,他必定能做组织和领导工作,不怕困难,并能克服困难。

革命的理论是革命运动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共产党人不仅要把国际工人运动其他队伍过去的经验、而且要把它们目前斗争的经验认真地运用到自己的国家中去。然而,正确运用经验,决不是机械地把现成的斗争形式和斗争方法,由一种情况搬到另一种情况中去,由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中去,而这种机械照搬的现象,在我们党内却是屡见不鲜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就连苏联共

党的工作方式和方法，也不可以机械地模仿、简单地抄袭。不管你主观愿望有多好，这种做法可能是有百弊而无一利，正像过去实践中所常遇到的情况那样。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经验中，我们应当学习的东西是：从每个国家的特点出发，灵活而具体地运用在反对资本主义斗争中的统一的国际主义路线；毫不留情地摒弃、鄙视和公开耻笑说空话、墨守成规、咬文嚼字和学理主义等恶习。

同志们！要学习，要经常学习，要处处学习，在斗争过程中、在自由的时候、在监狱里都要学习和斗争——斗争和学习！……

※ ※ ※

同志们！现在我们看到，全世界社会舆论对我们这次代表大会表现出多么浓厚的兴趣，这是以往任何一次共产主义的国际代表大会所没有过的。说句实话，没有哪一种重要报刊，没有哪一个政党，没有哪一个稍为庄重的政治家和社会要人，不密切地注视着大会的进程。

千百万工人、农民、城市平民、职员和知识分子、殖民地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都在注视着莫斯科，注视着国际无产阶级的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国家的首都。这个事实表明，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所讨论的问题及其所作出的决议具有重大而迫切的意义。

各国法西斯分子，尤其是疯狂的德国法西斯分子的狂吠，只能证明我们的决议打中了敌人的要害。

阶级敌人竭力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群众束缚在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和法西斯主义统治的黑夜里，而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的国际性政党——却如同一座灯塔巍然耸立着，给全人类指出摆脱资本压迫、摆脱法西斯野蛮制度和帝国主义战争灾祸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建立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是这条道路上的有决定性意义的阶段。是的，要把工人阶级各派组织的行动统一起来，要把工人阶级各方面的活动和阶级斗争各方面的力量团结起来。

工人阶级要努力实现自己工会的统一。由于共产党参与了统一工会的工作,由于共产党在工会内部成立了党团,有些改良派的工会领袖就极力恐吓工人,说什么工会民主制这下子可要被取消了。这真是枉费心机!把我们共产党人说成是反对工会民主制的人,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们维护而且彻底维护工会自己解决自身问题的权利。只要是对工会统一有利,必要时,我们甚至可以放弃在工会里建立共产党党团。我们正准备商讨统一工会不依附于一切政党的问题。但是,我们坚决反对工会对资产阶级的任何依赖,我们决不放弃我们的原则观点,这就是:对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工会不能采取中立态度。

工人阶级应当设法把一切青年工人力量和一切反法西斯青年组织都统一起来,并应把受法西斯和其他人民敌人的腐朽影响的那部分劳动青年争取过来。

工人阶级应当争取,并且能争取到工人运动各方面行动的统一。我们共产党人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工人,越是坚决果断地真正贯彻执行代表大会在国际工人运动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上所确定的新策略方针,工人运动各方面行动的统一就实现得越快。

我们知道,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存在着许多困难。我们的道路并不平坦,我们的道路上并没有撒满玫瑰花。没有!工人阶级不得不克服重重障碍,其中包括自己队伍内部的障碍;它首先要彻底消除社会民主派反动分子的分裂活动所造成的后果。在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和法西斯打击之下,工人阶级将会有很大牺牲。它的革命航船,将要越过重重暗礁,才能到达救生之岸。

可是,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已经不是1914年帝国主义大战开始时的工人阶级,也不是1918年大战结束时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已具有20年英勇斗争和革命考验的丰富经验,以及许多次(例如,在德国、奥地利和西班牙)失败的痛苦教训。

工人阶级面前摆着社会主义已经获得胜利的国家——苏联的实例。这个实例鼓舞着工人阶级，向它表明，如何战胜阶级敌人、建立自己的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资产阶级已经不能完全统治全世界了。取得胜利的工人阶级统治着地球六分之一的领土。中华苏维埃政权已在伟大中国的广阔地域上建立起来。

工人阶级有坚强的、团结的革命先锋队——共产国际。

同志们！整个历史发展进程都有利于工人阶级。各种反动分子、法西斯分子、全世界资产阶级企图扭转历史车轮，这显然是枉费心机。不行！这个车轮正不断朝着全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方向转动，一直转动到社会主义在全球获得最后胜利。

资本主义各国工人阶级有一点不足之处，这就是它的队伍还不统一。

因此，我们在这里要更加响亮地向全世界发出共产国际的战斗号召——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号召：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摘自《季米特洛夫选集》第1卷第453—484页
(莫斯科1957年版)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论共产国际在帝国主义者准备新的世界 大战的情况下的任务》(摘录)

(1935年8月13日—14日)

陶里亚蒂

.....

二、苏联的实力、日本的侵略计划和法西斯的进攻

.....

现在,我们看看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

最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大国,显然就是日本,因为它在狂热地备战,并已揭开战端。自1931年起,黠武的日本帝国主义就已着手用武力重新瓜分世界。武装侵占满洲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着手占领华北,公开暴露出它想使整个中国处于它的庇护之下的意图。在出卖中国人民和背叛中国人民争取独立和民族解放斗争的国民党走狗的支持下,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准备继续向华中挺进。

日本帝国主义所追求的目的,不仅是在远东、而且是在整个东亚和太平洋西岸地区建立霸权,这一点连日本的政治家也直言不讳。为达到这一目的,日本首先需要为本国重工业建立原料基地。日本军国主义之所以要侵占满洲和华北,是想以此作为进攻苏联边境的桥头堡,为其军队发动这次进攻提供一个大后方。

大家都知道,目前远东力量的对比,使日本难以发动一场反苏战争,就连一部分日本军阀对这场战争的结局也很不乐观。但是,

从另一方面看，由于苏联和红军的实力不断加强，最富侵略性的日本军阀乃极力反对推迟战争，想尽快地利用一切机会和寻求帮凶，以便今天就能发动战争，而不要推延到明天。

让我们看看 1934 年 10 月日军总参谋部出版局出版的一个轰动一时的小册子《国家防卫》上是怎样写的：

“所有这一切（即考虑到苏联军事实力的不断加强），使我们不得不深思苏联的图谋。如果日本帝国目前不着手充实自己的军备，尤其不着手加强自己的空军，以对付如此强大的红军，那么，等到明天再动手，就很难办了。

“至于强调必须增加集结在满洲国的兵力问题，也就根本谈不上了。”

促使远东局势紧张，是日本整个政策中的主导部分：日本拒绝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在外交上阴谋勾结战争贩子和苏联在欧洲的敌人；日本军阀现正加紧在满洲的战备；在满洲大肆修筑新铁路和战略公路；加紧在亚洲大陆、在满洲建立日军控制使用的工业基地；日满侵略军经常在苏联边境寻衅，并屡次企图挑起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冲突。

这个侵略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整个内外形势的产物。同志们！我们不要忘记，现代的日本是一个阶级分化最严重、最剧烈的国家。一方面是对饥饿的农民群众的半封建压迫，另一方面是最无耻的资本主义剥削。整个国家生活都受到备战的影响。通货膨胀和军事订货刺激着生产的发展和军火商利润的增加，而实际工资却在不断下降。单单通货膨胀一项就使得实际工资下降了 20%。农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则下降了 66%。日本工人每天工作达 14 到 18 小时。在农村，饥馑农户不下 200 万，即 800 万至 1000 万人。日本资产阶级侵略集团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苏联人民物质福利与自由的日益增长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他们的挑战，这种看法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存在及其革命的胜利，使得日本强盗更

加紧了他们的侵略步伐,因为在1亿人口的土地上建立了苏维埃制度,并拥有一支100万兵力的军队,这是资本主义世界新出现的一个巨大的缺口,是横在日本强盗实现其掠夺计划的道路上的一个大障碍。日本帝国主义者、日本军阀自认为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先锋,他们在策划和挑起反苏战争,因而视苏维埃中国为死敌,无论如何也要消灭它。

日本军阀推行的扩张政策,是最反动的阶级政策。日军的刺刀首先、而且主要是对准革命。但是,革命力量必定会团结起来,以极大的毅力和热情进行战斗,以便粉碎这些罪恶阴谋。

同志们!四年来,战争越来越威胁苏联远东边境的安全,如果说,尚未酿成一场战争,那是由于苏联实行了卓有远见和极其坚定的和平政策。我们欢迎这个政策。同时,请允许我以代表大会的名义向守卫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远东边境的光荣的红军战士致以热烈的敬礼!

远东红军同志们!如果日本强盗发动进攻,你们就坚决奋起反击敌人,使一切帝国主义强盗再也不敢进犯我们。你们要知道,全世界千百万劳动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必将全力支持你们的斗争,帮助你们打败我们的阶级敌人。工农红军和国际无产阶级结成联盟——这是任何人永远也无法战胜的力量。

.....

三、帝国主义大国的立场

对于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阀变本加厉的战争叫嚣,帝国主义大国采取何种政策?

必须指出,反苏战争并不是德国纳粹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唯一目的。它们都在争夺自己的霸权。它们对苏联的进攻,只不过是它们整个扩张与侵略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力求重新确定势力范围的计划,同现存的整个利害关系发生冲突,这样一来,

欧洲,乃至全世界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就更加尖锐化了。

日本占领满洲及其旨在夺取全中国的侵略动向,加剧了帝国主义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的竞争。日本进犯中国,既直接触犯了英国,又直接触犯了美国。英、美之间的矛盾是导致资本主义世界分裂的一切矛盾中最为深刻的矛盾,因为英、美之间的矛盾在全世界均有所表现,而这两个国家在世界各地发生冲突时,美帝国主义总是要设法打破英国的殖民优势和海上优势。虽然近几年来美国的军事装备猛增,但是,它的军事实力和它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地位,仍然不能适应美国经济力量和本身发展的需要。

.....

摘自《陶里亚蒂论文与演说选集》第1卷第115—189页
(莫斯科1965年版)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在争取 工人阶级统一、反对法西斯的 斗争中的任务(摘录)

(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作出的决议，
1935年8月20日共产国际
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

.....

五、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反帝阵线

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人民反帝阵线。为此，必须吸引广大群众参加民族解放运动，以反对帝国主义日益加剧的剥削、反对残酷的奴役、驱逐帝国主义者、争取国家的独立；积极参加民族改良派所领导的群众反帝运动，力求在具体的反帝纲领的基础上，同民族革命组织和民族改良组织采取共同的行动。

在中国，必须扩大苏维埃运动和加强红军的战斗力，同时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民反帝运动。在运动中要提出如下口号：武装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反对帝国主义奴役者，首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仆从。苏维埃应成为联合全中国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中心。

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为求得自身解放，应竭尽全力支持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解放

斗争。

.....

译自《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莫斯科 1935 年版)

论共产国际在帝国主义者准备新的 世界大战的情况下的任务(摘录)

(根据陶里亚蒂的报告作出的决议，

1935年8月20日共产国际

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

一、一场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在准备中

世界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稳定的终结，使得一切国际关系动荡不定。由于经济危机，世界市场大大缩小，而世界市场上的激烈争斗终于发展成为残酷的经济战争。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实际上已经开始。

日本帝国主义以其在远东的战争揭开了重新瓜分世界的序幕。武装占领满洲与华北，意味着华盛顿协议已名存实亡，这个协议本来是为调整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和它们在太平洋地区的关系而签订的。日本的掠夺战争业已削弱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使英国和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地位受到威胁，并且酝酿着一场反苏的反革命战争。

凡尔赛条约中保留下来的，只有国界的规定和殖民地托管权的分配了。由于希特勒政府停止支付赔款和恢复全国义务兵役制，以及英国与德国签订了航海条约，凡尔赛条约最终被废除了。

主要战争贩子德国法西斯分子，竭力想建立德帝国主义在欧洲的霸权，他们想通过战争和损害邻邦的利益来改变欧洲边界的现状。德国法西斯分子的冒险计划包括的范围很广，打算对法国

实行军事报复，打算瓜分捷克斯洛伐克、并吞奥地利、消灭波罗的海沿岸各独立国家，使它们成为进攻苏联、夺取苏联的苏维埃乌克兰的战略基地。他们为了攫取殖民地，极力制造有助于爆发一场重新瓜分世界的世界性战争的气氛。野心勃勃的战争罪魁祸首的这种种图谋，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使得整个欧洲动荡不安。

在欧洲，德帝国主义物色了波兰法西斯作为自己的帮凶。而这个帮凶也千方百计地想染指捷克斯洛伐克、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苏联，以扩大自己的领土。

英国资产阶级领导集团支持德国扩充军备，以期削弱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并使德国武装力量的矛头从西方转向东方，使德国的侵略目标转向苏联。英国力图用这个政策在世界范围内与美国相抗衡，并极力加强德国以及日本和波兰的反苏倾向。英帝国主义的这一政策，成为加速爆发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一个因素。

意大利帝国主义直接发动了对阿比西尼亚的侵略，因此，各帝国主义大国之间的关系又重新紧张起来。

帝国主义营垒中的主要矛盾是英美之间的矛盾，它们对世界政治中的一切矛盾都有影响。在南美洲，英美之间敌对利害关系的冲突最为剧烈，这个矛盾导致了两个大国在南美的仆从国之间的战争（玻利维亚与乌拉圭，哥伦比亚与秘鲁），在南美洲和中美洲，也有进一步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

德、波、匈、意等法西斯国家格外露骨地力图重新瓜分世界和改变欧洲边界的现状，而其他一些国家则倾向于维持现状（原状）。目前世界上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在欧洲则首推法国，而且，这两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维持原状的意图，得到了许多小国（小协约国与巴尔干协约国，波罗的海沿岸某些国家）的支持，因为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着它们的独立。

德国纳粹主义（一种最反动、最富侵略性的法西斯主义）的胜

利及其战争挑衅,促使各国军人政党(它们代表着最反动、最富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加紧在本国夺权,加紧使国家机器法西斯化。

法西斯德国的疯狂备战,尤其是恢复义务兵役制,以及大肆加强海、空军,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引起了一场新的、规模更大的军备竞赛。尽管出现了世界经济危机,但军事工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繁荣。在备战上走得最远的国家(德国、日本、意大利、波兰),国民经济已纳入战争的轨道。除正规军外,还培训法西斯特种部队,以保障后方的安全和在前线充当宪兵;在各资本主义国家,连少年也要参加应征入伍前的训练。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教育与宣传工作,得到了国家的资助和多方面的鼓励。

虽然目前由于帝国主义种种矛盾的激化,难以形成反苏集团,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法西斯政府和军人政党,仍然力图加害于一切劳动群众的祖国——苏联来解决这些矛盾。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危险时刻威胁着人类。

.....

译自《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莫斯科 1935 年版)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在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 报告时的发言(摘录)

(1935年7月28日)

(日本)冈野进

过去四年远东所发生的事件,充分证实了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所指出的“新时期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的前景。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占领了中国最富饶的一个地区满洲。起劲地贯彻其征服全中国计划的日本军事集团,开始进攻上海,但在中国人民英勇抵抗的压力下被迫退却了。在上海失败之后,日本军队开始更加疯狂地攫取华北的一省又一省——热河、察哈尔,以及内蒙的其他地区,现在我们亲眼看见它是如何在攫取北平地区和天津,并试图强行夺取中国广阔领土的整个北部,直到黄河故道。

从地理上看,日本对中国领土的攫取,也就是说,日本军队一个接着一个地占领靠近中苏边境和中蒙(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境中国各省这一事实,清楚地说明,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目的是准备反对苏联的战争,征服中国领土就具有为这种战争建立军事基地的目的。

到目前为止,日本帝国主义在实现这种计划方面并未成功。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在西方的矛盾加重了。但打乱日本帝国主义这种计划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活动的发展,日本帝国主义者担心他们的后方,另一方面是苏联

红军力量的发展壮大和苏联的和平政策。

日本军事集团利用一切办法把我们日本工人和农民变成他们反对苏联的工具,变成达到他们反革命掠夺目的的炮灰。如果这一切还未发生,那么我们日本的工人和农民必须感谢苏联,感谢苏联在所有各国劳动者的伟大朋友斯大林同志领导下所贯彻的坚定不移的和平政策。

然而我们日本共产党人一刻也不忘记,日本人民的压迫者并未放弃他们反对苏联的反革命战争计划。为了在远东保持和平,苏联作了相当大的让步,并同意出售中东铁路。这无疑使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国内为发动战争制造理由感到困难。日本军国主义者依然保持着原来的立场,这可以用陆军省大臣林銑十郎将军毫不含糊的声明来说明,他说:“出售中东路并未改变远东的局势。”

1935年2月5日,我党中央委员会在对日本劳动者的宣言中指出了这一事实。宣言说:

“为了便利在最近的将来向苏联进攻,日本帝国主义想把中国军队清除出整个华北,并利用这片领土作为军事作战的基地,反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反对苏联,反对中国的苏区。这就是日本军事强盗集团的战略计划。

“切不要以为日本帝国主义在完成出售中东路的谈判之后要与苏联建立和平关系。毫无疑问,日本帝国主义将策动一个又一个挑衅。”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最后号召劳动者:

“保卫所有各国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祖国苏联!

“保卫中国苏维埃,并与中国工人农民共同战斗!

“推翻将战争强加于群众并使我们遭受饥饿的冈田地主资产阶级政府!”

……

1931年9月18日本占领沈阳之后的第二天,我们党向日本

的工人、农民和士兵发表了一项宣言，中央委员会在宣言中指出日本这次在满洲军事行动的真实意图和目的之后，发出号召：

“同志们，工人、农民和士兵们，与中国工人农民团结起来，以革命的名义团结起来进行斗争！”

“要求立即从沈阳和一切被占领地区撤回军队，要求立即从中国和满洲撤回日本军队和军舰！不要输送一个士兵！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军事措施！向帝国主义战争的新危险展开斗争！”

“为保卫苏联而斗争！打倒帝国主义的日本！为苏维埃日本而斗争！”

尽管有野蛮的警察恐怖，我们党还是进行了反战、反君主政体的广泛的革命宣传和鼓动。战争期间，党组织了多次革命的反战示威游行。我们的党员正在陆军、海军和军需工厂的群众中进行着革命的启蒙工作。即使在农村，在农民当中，我们的党也已经能够建立反战运动的中心。

……

（第 1276—1279 页）

（摘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在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报告时的发言

(1935年7月29日)

周和生(中国苏区代表):

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的时候,中国的苏维埃运动还处在胚胎时期,游击运动只不过是刚开始。1930年,当一个新的革命高潮在中国开始出现时,许多省份建立了小的苏区。

在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之下,中国的苏维埃运动在过去七年间有了巨大的发展,并取得了重大胜利。今天苏区占有的土地有200多万平方里,人口有5600万。(热烈掌声)

苏维埃运动不仅包括永久的苏区,而且还包括邻近约有5000万居民的游击区。

第六次大会时,中国红军是由微不足道的游击部队构成的,武器低劣,缺乏战斗力,最大的游击部队也不超过几千人。现在这些小游击部队已经成为完全处于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工人阶级干部的正规红军,这支红军主要由那些因土地革命满足了要求而愿意献身革命的战士所组成,他们拥有现代化武器,已成为在统一指挥下的强大的有实力的军队。现时的红军有50万人,此外还有100多万人加入了游击部队。红军击退了帝国主义者、军阀和国民党的六次“围剿”,挫败了法西斯将军冯·塞克特领导下精心制定的计划,进军3000公里,英勇地完成了捍卫苏维埃的任务。

中国苏维埃政府不但创建了一支红军,而且也武装了人民,剥夺了地主资本家建立武装的权利。

1931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

会宣告临时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并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同时组成了以朱德同志为首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从此，一个新的苏维埃国家产生了——这在世界上是第二个，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国是第一个苏维埃国家。

苏维埃政府向全世界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发出呼吁，宣布：它毫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者、本国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对中国人民的奴役，它正为中国的民族独立和自由，为改善群众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而战斗。

为了实施中国人民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政策，中国苏维埃政府公布了根本大法（宪法），发布了有关土地、劳动、选举权、经济政策、民族政策、婚姻等方面的法令。

把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应用于中国的实际，是中国人民沿着解放和胜利的道路前进的根本。因此，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每一个胜利，都是列宁和斯大林教导的胜利。（热烈掌声）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苏维埃政府在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

中国实际上是个半殖民地国家，是世界帝国主义、首先和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剥削对象。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中国东北的几乎全部领土都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中国人民面临着灭亡的危险。关于九一八事变，各个地区的苏维埃（当时中央苏维埃政府尚不存在）曾向全中国人民发出联合宣言，呼吁人民群众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击退日本陆地、海上和空中的军事力量。

当上海民众和19路军的士兵一起在上海进行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时候，中国苏维埃政府曾号召全苏区群众游行示威，支持上海民众和19路军的士兵。在苏区，展开了一个筹集资金支援上海战斗者的广泛运动。如果当时不是国民党四面包围苏区，红军就会在上海同抗日群众及19路军一起，共同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

1932年4月，当南京国民党政府出卖上海的保卫者们时，中

国苏维埃政府对日本宣战,号召全中国人民进行民族解放战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

这时,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缔结了淞沪停战协定,开始惩罚 19 路军英勇的战斗者们。在福建省开始对红军展开进攻,以延缓红军北上。中国苏维埃政府不顾这一切,在 1933 年 1 月的一项宣言中再次向全中国人民发出呼吁,宣言提出以下三点作为全国人民抗日联合斗争的必要条件:

(1)停止进攻红军;

(2)给人民以一般的民主权利与自由:出版自由、结社权利、言论自由、罢工和游行示威的权利等;

(3)给人民以武装和广泛组织反帝义勇军的权利。

然而,南京政府不但不接受这三项条件,反而更加加紧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并集中白军力量对苏区和红军进行总进攻。红军又胜利地击退了这次“围剿”,歼灭了蒋介石的几个师。

中国苏维埃政府立誓要领导全中国人民斗争到底,决不容许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强盗的奴役。(热烈掌声)

苏维埃政府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有一个环境,使每个工人、农民、贫农、雇工和知识分子,不分性别和民族都能享受选举权。

在苏维埃的地区选举之后,各方面的代表都隶属于一定的民众团体。由于这种缘故,苏维埃与群众之间就建立了密切的接触。城市和乡村苏维埃的成员都按地域分成小组。苏维埃有永久的机构和临时机构。每半年举行一次选民会议。苏维埃的成员如犯有严重错误,有必要将他罢免,只要有十个选民动议,并为全体选民的半数所接受,即可罢免。

中国的民众主要从事农业。农民首先需要土地,而中国 80%的土地是在大土地所有者(地主)手中。地主通常把土地租给农民,收取农民收入的 60%至 80%做为地租。因此苏维埃政府从一开始就把它的主要任务放在解决土地问题上。

1930年，在福建西部和江西省开始分配土地；此后所有其他苏区也进行了土地分配。经验表明，单是分配土地还不够，在土地分配之后有必要开展一个复查运动。复查证明分错了的土地，再分给未分得任何土地或分地过少的农民，但并不是进行土地的普遍再分配。

1933年中央苏区复查运动的结果，发现有一部分地主设法保住了他们的土地。地主的317539石田被没收。有些土地所以能够保留在地主手中，是因为他们的影响尚未消除，而且他们压迫农民，农民不敢告发他们。各处都有地主渗入到苏维埃机关进行破坏。

在复查运动期间，反动地主被暴露出来，并受到苏维埃法庭的惩处。土地革命的成果现在已完全被贫农、中农和农业工人所享受。

中国的农业处在衰落中。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已深深地渗入到农村，并造成了农村的破产。这种现象在全中国是普遍的，不过在苏区，又被来自国民党军阀的经济封锁和可怕的蹂躏加重了。

尽管有这一切情况，苏维埃政府仍能把农业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它给农民以经济上的帮助，使他们能够买到耕牛。它特别帮助那些耕种已变得荒芜了的土地的农民，并豁免对他们的税收。同时苏维埃政府采取一切措施，改善劳动组织：组织社会劳动互助，建立妇女劳动队，组织垦荒队，组织修渠队和灌溉监督管理队等等。

实行这些措施的结果，不仅克服了国民党压迫者造成的困难，而且收成也大为增加。中央苏区1933年的农业产量与1932年相比，增加了150%。1934年，国民党统治的一切省份洪水泛滥，饥民达到一亿人，而苏区的农业生产增加了100%。国民党报纸也被迫承认，“匪”区的土地耕种进行正常，苏区一些地方木材和果菜

园的经营比他们所辖的地区好得多。

为了与经济封锁作斗争,改善群众的供应,苏维埃政府正以很大的注意力致力于工业和对内对外贸易的发展。由于为私人资本所有的工商企业在苏区国民经济中起着主要作用,苏维埃政府公布了一条法律,规定条件,使私人资本可以向工商业投资。

我们以很大的力量致力于国营企业。这些国营企业包括两个盐场,一个外贸企业联合组织,还有国营百货商店,国营钨矿开采加工联合企业,一个生铁冶炼联合企业,以及造纸联合企业,等等。建立这些国营企业,主要是为了与经济封锁作斗争,减轻苏区的经济困难,改善民众的生活,决不是立即采用国家垄断的方式,反对私人资本。

农民得到了土地。工人的工资得到提高。民众的购买力也有很大提高。当国民党区域的工商业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走向彻底破产和垮台的时候,苏区的经济发展却走着相反的道路。

许多国民党区域的商人,由于对南京政府的封锁政策不满,对于与苏区发展贸易关系是有兴趣的。他们从事广泛的违禁贸易。

不用说,为了抵补消费,苏维埃政府必须依靠它征税所得的收入。现时苏区有三种税收:关税、商业税和农业税。课税是累进的,主要税收负担落在了富有阶级的身上。

在苏区,已基本上采用了八小时工作制,集体劳动合同已在订立,广泛实行了劳动检查制,并建立了劳动保险组织。为保护工人的利益,苏维埃政府公布了劳动法。设立了专门法院,处理劳资冲突,与雇主方面违犯劳动法的行为作斗争。在苏区,没有失业,而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失业者面临的是或者当土匪或者忍受饥饿的抉择。

苏区正在推广免费普及教育。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文化与教育机构完全处于地主资本家的控制之下,学校只教育他们的子女,而工人和农民,既无权利也无机会接受教育。他们的教育政策在

于教育人民放弃对日本的武装抵抗。

我们报纸的发行量也可以证明中央苏区文化事业的发展。我们有 34 种报纸，每种的发行量都达到好几万份。

苏维埃政府建立了一所大学，一所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共产主义大学，几所列宁师范学校，一所医科大学，一所交通学院，一所红军军事学院，一所艺术学院，一所中央农业学校，等等。苏维埃政府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工作者给予特别待遇。

尽管苏维埃所占有的地区是落后的，尽管有国民党反复的疯狂进攻，苏维埃政府还是能够在极为困难的战争情况下完成巨大的工作。

中国人民目前正经历着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日本军国主义者不断地攫取华北的领土，而国民党政府却屈辱地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在国民党控制的地区，经济败落占支配地位，注定了民众的失业、破产、饥饿和死亡，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以自我牺牲的奋斗精神，向外国干涉者及其代理人国民党进行斗争。中国苏维埃政府确信，有四万万中国人民的支持，它一定能够击败压迫中国人民、蹂躏中国领土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它将能为中国人民赢得独立和自由。

中国苏维埃政府表示，它准备与支持中国独立的任何国家恢复友好关系。

我们真诚地欢迎日本兄弟党正在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对满洲的占领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它正在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统治的斗争作出光辉的榜样。

中国革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重要因素，保卫中国革命和中国苏维埃，就是为世界革命的胜利而进行的斗争，就是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而进行的斗争。我们相信，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工人、每个革命者都知道落在他们肩上的伟大的国际主义任务，并将拿出最大的决心。（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全体起立向周和生同志

欢呼)

(第 1290—1291 页)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在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 工作报告时的发言

(1935年7月30日)

康生：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完全赞同皮克同志关于共产国际工作的报告，特别强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六大和七大之间的这段时期内给予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帮助。

大家无疑都记得，六大时我们的党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正经历着一个异常困难的时期。那时，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在中国正在发狂，我们的许多党组织被破坏，工会被解散，工人运动进入了低落阶段。然而就是在那时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其决议中指出中国革命失败的暂时性，并指出在我们国家不久的将来不可避免地要出现新的革命高潮。以后中国事态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共产国际的预见。尽管托洛茨基分子的反革命预言坚持说，中国的“资产阶级政权要稳定若干年”，但新的革命高潮还是开始迅速成熟了。六大时，革命处于退潮时期，而现在我们国家局势的特点是，反帝斗争已强有力地兴起，工农运动迅速发展，红军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有了巨大的增长。

现在我们党有40多万党员，已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因素。

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是由南京的地主资产阶级集团加速促成的，它加重和加深了产生1925—1927年革命的那些基本矛盾。外国资本家因中国革命的失败和他们的走狗国民党的效劳而受

到鼓舞,并被世界经济危机所驱使,向中国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发动了野蛮的进攻。结果,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破产和贫软化大为加速,其数量之多,空前未有。工人阶级的状况已令人不能容忍。大量的失业和饥饿已使几千万劳动者走向慢性和痛苦的死亡。

国际帝国主义的经济扩张很快就被公开的军事干涉所补充。但落到中国人民身上的最令人无法忍受的苦难,还是来自日本帝国主义开始进行的以掠夺为目的的战争。1931年9月18日,日本对满洲实行了军事占领,满洲的面积三倍于日本本土。在过去几年中,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华北攫取了一省又一省。

背叛人民的国民党政府,不用说,并未作出任何努力来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瓜分。难怪南京政府已成为民族背叛和民族屈辱的象征。

帝国主义的进攻,日本军阀对中国人民的掠夺性战争,以及国民党政府的无耻叛卖,这一切给党提出了极为艰巨而又责任重大的任务。

斯大林同志曾经说过:“如果认为帝国主义的所有这些罪行都不会有结果,那是可笑的。”我们党的任务,就是组织群众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征服计划。党,只有党,能够保证中国劳动者为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而进行胜利的斗争,而我们党实际上确实在发展和指导反帝斗争中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活动。党努力把群众日益增长的义愤引向以武装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国民党内的同伙的道路。大家知道,我们党的这种活动并不是没有结果的。

因此,为了响应我们党的呼吁,反日罢工的浪潮在我国的所有工业中心汹涌澎湃。沈阳和安东的工人们宣布了罢工。1932年,上海日本企业的工人宣布了总罢工,这次总罢工持续了几个月之久。工人和学生的群众示威游行遍及北平、上海、南京及其他城

市。这些游行示威的参加者常常有几万人，结果导致和政府军队发生流血冲突。1932年初英勇保卫上海时，我们党的活动具有很大的重要性。

在国民党中国，我们迄今还没有从组织上巩固我们党对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有反帝倾向者的日益增长的影响。我们的任务是：克服一切障碍，巩固人民反帝阵线，真正团结全国一切反帝力量，为此目的要利用即使是最不稳定的和暂时的同盟者，以便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这里不妨谈谈著名的上海保卫战中非常富有教益的经验教训。尽管上海的共产党组织竭尽全力，英勇斗争，但并未能预先制止国民党叛卖的发生，未能成功地抵抗日本武装干涉者，保卫上海这个最重要的工业中心。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原因是上海党组织与企业之间的联系薄弱，上海无产阶级组织的状况显著不佳。在此期间，无产阶级的行动和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发的性质。同时，缺乏无产阶级强有力的中坚力量，这也不能不削弱反帝民族解放运动的气势和实力。当无产阶级在反帝斗争中不仅显示出它的坚定和决心，而且充分表现出组织良好的威力时，这种运动是能够胜利的。但是如果无产阶级队伍中没有团结一致，没有工人阶级真正的群众组织，这是不可能的。

中国工人群众悲惨状况的急剧恶化，必然在工人中造成对中外资本家进攻日益增长的反抗。而且事实上，在过去几年中，中国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也表现出了它的广度。下列数字雄辩地证实了这一点。1929年，中国参加罢工斗争的工人总计75万人；1930年35.7万人；1931年73万人；1932年，120万工人卷入罢工斗争；1933年69万人；1934年，据非常不完全的资料，50万以上的工人参加了劳资冲突。在这方面需要强调工人们在这种斗争中显示的不断增长顽强精神，以及罢工时在不断扩大的与军警发生的流血冲突中所表现的战斗性。特别使人高兴和最为重要的是苏区

附近地区的罢工情况,工人们在那些地方的活动保证了我们红军的胜利进军。

我们所引用的这些数字,足以说明我国罢工运动的磅礴气势。在一些情况下,罢工的领导权在我们党的手中,特别是有些铁路工人、煤矿工人和纺织工人的主要罢工,是在我们党领导之下进行的。但我们必须承认,大多数的罢工是自发地爆发和发展的。这种事实表明,在罢工斗争中,我们在组织和独立领导方面的成就还是微不足道的,特别是我们在这方面还具有格外有利的条件。

我们必须结束我们在工会运动中的宗派主义;我们必须断然克服我们对于在黄色工会和国民党工会中进行工作的轻蔑态度。我们已经丧失了太多的时间,现在必须尽各种努力,克服我们在工会工作中的一切缺点。我们的任务不在于建立平行的、在多数情况下是小的工会,而在于把我们的一切注意力集中于现有的大工会。我们必须保证无产阶级队伍的统一和坚定的团结。这将不仅无可估量地扩大和加强无产阶级为日常要求而斗争的地位,而且将扩大和加强它为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斗争的地位。

关于我们在农村的工作,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已经亲眼看见了农民运动的巨大高涨。群众性的农民起义,在中国已成为几乎是日常的事件。这没有什么值得惊异的。农民群众以前已经无法忍受的状况在最近几年中更加恶化了。帝国主义的枷锁已变得更加沉重,地主不断增加的劳役,军阀日益加重的过高课税,以及农村迅速破落的过程——所有与帝国主义统治和国民党现存政权相联系的这些因素,导致了农民群众的不断的斗争。被弄得极端悲惨并被激怒了的农民,正在投入不断增加的群众斗争当中,对地主资产阶级政权进行武装斗争。这种斗争正在采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尖锐的形式,并且将逐步实现与工农红军和苏维埃运动相结合。迄今为止,我们远未能对所有的农民起义进行指导;但没有人否认,我国的农民运动已经表现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的性

质。农民群众已经奋起进行革命斗争的事实，是苏维埃运动在我国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不妨强调的是，事实已经证明我们党能够领导农民群众的斗争沿着苏维埃、反帝和土地革命的道路前进。

南京政府正在实行的对苏区的经济封锁以及苏区工业品的严重短缺，造成了一系列的经济困难，因而使苏区的经济生活更为艰苦。连绵的内战不可避免地要使经济局势恶化。因此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必须特别注意解决苏区的经济政策问题。这就要求党制定和实行一系列的措施，实现和促进农业生产的扩大和工业生产的发展，并恢复市场关系和商品周转。党通过苏维埃机关贯彻了一项决定，规定如无充分的和正当的理由，禁止反复分配土地。这项法令除作出抑制出租和购买土地，以及雇佣劳动力的规定之外，还有助于促进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土地耕作的改善。苏维埃机关以增加播种面积，改进农业技术，以及组织群众使播种和收获以尽可能好的方式进行等办法，帮助农民群众进一步改善了生活。中央苏区一年内收成增加了20%至25%。同时，苏区采取了一些刺激手工业生产和促进合作运动进一步发展的措施。与普遍存在于国民党地区的逐步走向经济崩溃的状况相比，我们党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显得特别明显。

但是我们一定不能满足于已经取得的胜利。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正在苏区贯彻的经济政策，必须在苏区的生活状况和工人农民的工作状况上，与国民党地区劳苦大众的状况相比，表现出一个根本的区别。我们必须一刻也不放松自己的努力，进一步提高苏区劳动群众的福利。我们不能看不见在这条战线上还有很大的困难这个事实，而只有克服了这些困难，我们才能保证中国亿万劳动者对红军进一步的英勇支援。在中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引用下列事例说明劳动群众对红军的态度：

“……在这些地方的广大工农群众，以手执武器保卫苏区与发展苏区为自己神圣的责任，而大批的不断的涌向前线去。其中如江西的长冈乡，16岁至45岁的全部青年成年男子407人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去了320人，留在乡间的87人，去的与留的成为80%与20%之比。福建的上才溪乡，全部青年成年男子554人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485人，留在乡间的只67人，去与留的比例为88%与12%。”^①

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将来为苏维埃、为反帝和反对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而进行的斗争中，保证全体劳动人民能继续和最积极地参加红军。

现在我来谈谈军事斗争的问题。我只谈最后一次即第六次反“围剿”的经验。国民党军队进攻苏区的这次战役，是最持久、范围最大、最具有凶猛顽强战斗性的一次战役。这次战役持续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由于有国际帝国主义的全面支持，我们的敌人才得以集中一支60万人的庞大军队，单独进攻江西的中央苏区。在反对红军的斗争中，蒋介石投入战斗的飞机有一百多架。敌军逐渐包围了苏区，但我们苏区的军队成功地突破了这种包围，向贵州和四川进军。

我们的主力从中央苏区撤出这一事实，给国民党报纸的新闻记者造成了一个机会，他们把这说成是红军的失败。在国民党夸张宣传的影响下，甚至在我们的队伍中也有某些懦夫，倾向于以失败主义的观点来评价第六次反“围剿”的结果。现实早已证明这种评价是愚蠢的。

红军是否能够继续保卫中央苏区？当然能够。不过这种保卫本身并不能开创任何给敌军主力以毁灭性打击的前景。这个目的只有我军以具有反攻性质的更为积极的作战才能达到。另一方

^① 《红色中华》1934年1月26日，第三期，第4期。——原编译者。

面，继续保卫中央苏区，将一天天加剧敌人对我军主力全部包围的危险。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必须非常严肃地考虑这种情况。这些机关必须以对中国革命命运的充分责任感作出决定。

大家知道，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和革命军事委员会通过了并在其后实行了把红军主力从江西转移到四川的计划。红军在转移途中所取得的胜利，与红四方面军的联合，一个强有力的苏维埃根据地在四川的建立，红军最近几个月的机动作战和积极的反攻作战的顺利发展——所有这一切就是这种决定的正确性的最好证明，表明红军具有进行进一步斗争的特别有利的条件，这种条件是红军最近行动的结果。

同志们，我们党在这些年里经受了严重的考验；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走过了一条漫长的道路。我们国家迅速变化的局势使党碰到了又一个又一个困难问题。同时还要记住，我们党必须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开展工作。我们数以千计的同志成了国民党恐怖的牺牲者，但是我们党经受住了这些考验和无数的困难。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不可调和的斗争过程中，党锻炼了自己的队伍，并使它布尔什维克化了。

党在思想上已经成熟了。它拥有经过考验与战争锻炼的干部。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并为我们党的每一个胜利感到欢欣鼓舞，因为我们坚定地相信，一个强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存在，是中国人民在为他们的根本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最好保证。我们决不低估自己的力量，但我们也意识到自己的弱点。我们向第七次代表大会保证，中国共产党将继续顽强地、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以便不愧为布尔什维克国际的一个支部。

（长时间暴风雨般的掌声，代表们全体起立，欢呼）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在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 工作报告时的发言

(1935年7月31日)

孔原(中国):

我简略地叙述一下我们党在国民党地区的工作,我们党所取得的胜利,我们的缺点以及从中要吸取的教训。

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的一个时期是中国革命不断发展的时期,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和国内外一切敌人向中国革命进行猛烈进攻的时期。“文明”的帝国主义者和出卖中国人民的国民党匪帮,在共产党所领导的苏维埃和红军反帝斗争的巨大胜利面前发抖。众所周知,一名德国法西斯将军,一名社会民主党的警察头子,日本的军事顾问们和美国的飞行员们,都在蒋介石的总参谋部工作着。大家知道,蒋介石在反对红军的战役中所使用的最新式武器装备,是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中最大的军火工厂制造的。

所有这些反革命的顾问和将军,不仅在主要中心城市,在苏维埃和红军中,而且也在非苏区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群众反帝和反国民党的英勇斗争中,清楚地看到了革命的危险性。这就是“后方行动计划”成为反对苏区的第六次“围剿”计划的组成部分的原因。按照这个计划,中国一切大城市和乡村地区的一切反革命力量和组织都被动员起来,并建立了一批新的反共团体。因此,例如在上海一地,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就建立了40多个专门组织,其任务就是“扑灭共产主义”。国民党高价雇用了2000多名职业密探、无赖和煽动分子,他们散布在一切工厂、大学、街道和通衢大道,与蒋介石的“蓝

衣社”组织一起,侦察、逮捕和杀害共产党人。即使是普通的罢工者和反日斗争的一般参加者,也有遭到逮捕甚至被杀害的危险,更不用说共产党员了。在中国过去的两年中,已有一万名以上英勇的共产党员,其中有领导人也有普通党员,惨遭杀害或被逮捕。仅南京一地,就有 7000 多人被杀或被捕。

在这种空前白色恐怖的条件下,我们党一直在百折不挠地工作着,并以布尔什维克的自我牺牲精神组织广大群众抗日救国的英勇斗争,组织示威游行、罢工等等。

我们党根据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的经验,在“人民自我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下,在中国的一切大城市参加和领导了工人、学生、店员、职员等广大群众的罢工和示威游行。

在英勇保卫上海期间,党组织了沪西日本纱厂 4 万工人的反日罢工;组织了工人学生前线义勇军,与 19 路军的士兵共同战斗;在抗日战争中,党在后方组织了广泛的群众支援,援助前方战士;并在 19 路军的士兵中进行了广泛的工作。

所有这些事实都向四万万中国人民表明,共产党是拼死战斗挽救国家的唯一政党,共产党人是为了救国斗争到底的最坚定的战士。

近几年来,发展中的工人罢工运动的主要推动力量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赤色工会的工作。从康生同志的讲话中大家已经知道,最近几年的罢工浪潮已经达到了中国大革命时期罢工运动的水平。

在这种革命浪潮高涨的时期内,共产党的工会工作无疑是没有赶上客观可能性所需要的步伐,但在许多重要的大罢工中,共产党和赤色工会还是起了领导作用的。

我们的工会工作在工人当中的影响可以用下列事实来说明:在贵州省的偏僻的城市赤水,当红军接近该城市的时候,500 名兵工厂的工人在共产党支部的领导下起来暴动,解除了国民党一营军队的武装,并帮助红军占领了该城市。起义者夺取了兵工厂的全部弹药。

在农民运动中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最突出的成就是在陕北，该地农民群众在我们党组织的领导下，夺取并分配了土地，建立起包括十个县的新苏区，并组织了红二十七军。

我所提到的只是我们在国民党地区艰苦工作的几个最突出的事例。尽管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实行恐怖，他们还是没有达到消灭“赤匪”的目的。相反，我们的党由于实行了布尔什维克式的领导，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正在成为唯一被普遍承认能够拯救中国的革命领导者。

我们在苏区和白区都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并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和胜利。但我们并不因胜利而冲昏头脑。我们清楚地看到我们工作中的弱点和错误，尤其是在白区。

在我们反日反帝群众运动的广泛发展中，我们至今还未能表现出足够的主动性和灵活性，甚至还犯了一些“左”倾宗派主义的错误。许多错误是党和赤色工会在工厂和黄色工会的工作中犯的，尤其是在无产阶级联合行动的问题和其他问题上犯有这种错误。

我们在敌军中的工作仍然薄弱；我们至今还未能阻挠和成功地破坏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打击。

贫苦农民群众和盐矿工人的暴动乃至武装起义，正在全国爆发，但我们未能将所有这些行动充分置于党的控制之下。尤其是在国民党军队向苏区进军时，我们未能发展广泛的游击运动。

也要看到我们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工作的严重弱点。在日本刚占领满洲之后，当小资产阶级学生和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丧失了继续求学的机会并发现自己处于失业的境地，当一个时期对学生进行审查和推广强迫军训，当凶残的法西斯恐怖和反对“赤匪”的“运动”在大学里开始推行的时候，这时在他们当中显然出现了一种赞成革命的决定性的转变，而我们当时在这方面的的工作并没有增强，反而削弱了。

我们党在白区的工作落在了客观可能性的后面,没有赶上苏维埃和红军发展的步伐。我们党充分估计这种情况的严重性,正决心为克服这种缺陷而斗争。

我们的党已经成了一个真正群众性的党。它现有党员 40 多万。尽管一再遭到逮捕,党在白区还能保持 7 万党员。虽然在白区现有条件下扩展党组织极端困难,许多地方组织还是发展壮大起来了,而且增加了党员。如果我们以今天的党员数目与我们党在四中全会时党员的数目相比,我们就会发现,五年中增加了 100%,这在白区现存条件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同时还应强调,在白区,党迄今还未从内部组织工作的不少严重弱点与缺点中摆脱出来。这种缺点和弱点的存在,首先是由于这种事实:起源于 1925—1927 年大革命时期的老传统还被保留着。

不错,四中全会时曾在组织机构上作过某些变动,但这些变动还不足以应付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

另一个严重的缺点是,在我们党内,培训干部的政策还未被大家所清楚地理解。

同志们,毫无疑问,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学习和运用了兄弟党广泛的经验之后,将能够在国民党白区开展一个革命运动,使白区工作与发展巩固苏维埃和红军的斗争协调起来,并在列宁斯大林的战斗旗帜下,在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支援下,领导全中国人民走向全国苏维埃革命的胜利。

(第 1341—1342 页)

(摘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在第二十三次会议上讨论季米特洛夫报告时的发言

(1935年8月7日)

王明(中国代表团团长)在会上作了讲话。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王明受到格外热情的欢迎。因为表示国际战斗团结的热情,是一种风气,王明受到以各种语言高呼“苏维埃中国万岁”的欢迎。唱过国际歌后,王明开始发表长达数小时的庄严演说。首先,他谈到反法西斯斗争和为建立统一战线而进行的斗争,法国共产党的成就和德国无产阶级反对法西斯野蛮暴行的英勇斗争。他指出,需要利用从波兰共产党斗争中得到的经验,阿斯图里亚斯英勇斗争的经验,奥地利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以及奥地利式马克思主义破产的经验。他赞同英国在建立反法西斯和反帝统一战线的斗争中所采取的策略转变。他对意大利共产党在应用统一战线策略方面所做的转变略加论述,并对季米特洛夫报告中的政治路线和策略路线表示无保留的赞成。

然后他转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问题。帝国主义在东方、拉丁美洲和非洲加强进攻已经导致了这样的后果:对一些半殖民地国家民族生存的威胁,殖民地农业经济的彻底破坏,几千万农民因饥饿而死亡,新建立的民族工业的深刻危机,劳动群众不断增加的匮乏与悲惨状况,仅在中国每年就有数百万人自杀身亡。另一方面,群众的愤怒正在高涨,在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之间,在帝国主义阵营内,对抗越来越尖锐;民族改良主义的影响正在衰落,在许多国家的组织中,左翼正在形成,无产阶级及其政党

的威信正在无可争辩地增长着,如菲律宾、泰国、秘鲁、巴拉圭、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巴拿马、波多黎各、海地等国新建立的共产党。殖民地的革命力量正以强有力的群众行动和武装起义的形式成长壮大。各黑人国家的革命斗争正在发展。十月革命的胜利,两个五年计划的胜利,以及一些先前被压迫国家的繁荣昌盛,都因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对革命力量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反帝统一战线就成为首要的问题了。

由于日寇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一系列空前的背叛行为(甚至低劣到按照日本的命令解散它自己的许多组织),中国的民族危机已经使挽救祖国危亡的斗争成为每个中华民族的儿女最神圣的职责。除了动员全中国人民,在反帝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策略的基础上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斗争之外,没有别的出路。

王明说:“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维埃政府应当发表一项声明,向一切政党、团体、军队、群众组织和著名政治家说明情况,请他们准备参加进去组成一个统一的国防政府。(掌声)我在这个国际讲坛上宣布,共产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准备在组成这样一个政府的谈判中采取主动,并愿与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人们,在大家都能接受的纲领的基础上,为了挽救我们的祖国,撇开在其他重要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共同参加这个政府。红军准备战斗在这个联合的军队的最前列,与其他一切军队携手并进,唯一的条件是这些军队停止进攻红军,真正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中国共产党在纲领、战略和策略上首先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但同时,在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斗争中,它又是全中华民族的政党。(掌声)它是代表中华民族的民族希望和民族光荣的唯一的政党。”

王明借助于一幅大地图,表明红军最近的胜利和巨大的进展。然后他继续说:我们的建议不仅建立在客观形势的基础之上,同时也是建立在红军和苏维埃中国力量发展壮大的基础之上的。中国红军和苏维埃新的历史性胜利,以及共产党本身的发展,使他们比

以前更有力量挺身而出，成为全中国人民联合的中心。

在苏区，共产党不仅受到工人大多数的支持，而且也受到民众大多数的支持。在东三省、热河、华北以及国民党统治的一些省份，它作为革命阶级斗争的唯一领导者，正在空前的困难和巨大的牺牲中进行着斗争，从最原始的请愿运动到武装行动，以各种方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

受过严峻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锻炼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列宁斯大林路线的基础上，已经培养出成千个天才的人民领袖，他们不怕艰苦，知难而进，决心克服一切困难……王明演说的下一部分，详细地描述了最优秀的政治军事领袖人物，许多英勇无畏的革命战士，他们（常常是英勇牺牲的）一生的英雄业绩，已经为共产党赢得了中国人最好的声誉。他的话句句都伴随着整个大会热情的掌声和欢呼声，表明大会对中国共产党人英雄的勇气精神的衷心赞赏。

“那些认为我们的统一战线建议只不过是一种政治手腕的人，不了解共产党在人民的利益之外并无其他利益这一简单的真理，中国是我们的祖国。中华民族——我们共产党人、红军，以及我们民族的所有儿女，都属于中华民族。共产党是不同于国民党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的，它总是言行一致的。”

王明演说的下一部分专门谈到巴西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斗争。在巴西，一个有共产党参加的广泛的民主组织“全国自由联盟”已经成立，甚至有许多陆军和海军军官也已参加。在多次会议上，巴西人民的英雄，我们的普列斯捷斯同志被选为这一联盟的名誉主席。（热烈鼓掌）在瓦尔加斯政权期间，当人民的权利和一切自由都在帝国主义的直接命令下遭到践踏时，普列斯捷斯同志代表全巴西人民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全国自由联盟”的口号。

作为该联盟夺取政权的部分任务，巴西共产党必须加强努力，促成全国的统一战线，必须克服某些个别共产党人的宗派主义，并

向夺取政权斗争的最高形式前进。争取农民群众和进一步扩大反帝人民阵线是取得胜利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一运动所能导致的一个全国自由联盟的政府还不是工农革命民主专政,但最重要的是,它将是一个反帝的政府。共产党人要在其中为民族独立而斗争,但同时他们必须利用它作为一种手段,为工人、农民和城市中产阶级的利益达成广泛的社会法案。巴西同志所完成的工作证明是走向组成反帝统一战线的一种很好的开端,我祝愿并希望他们胜利地完成这一艰巨任务。

主席宣布中午休息,并说王明以后还要继续发言。

(第 938—939 页)

当天下午,王明在会上继续发言。

王明继续他上午的演说。他谈到拉丁美洲某些共产党在建立反帝人民阵线中所完成的工作,强调了它们的胜利,并批评了它们的错误。他专门讲了墨西哥和阿根廷共产党的问题。再往下他详尽地谈到印度的局势和那里的共产党的任务。印度同志长期以来一直犯有宗派主义的错误。去年 12 月,他们向“议会”提出要求,作为反帝阵线的初步条件,应当建立苏维埃政权,无偿地没收地主土地,并宣布总罢工,这是不应用反帝人民阵线策略提出过左要求的一个生动事例。只是在最近几个月,共产党才采取了趋向于正确的反帝政策的第一个步骤。这种转变正开始在共产党与议会社会主义者结成统一战线的基础上结出第一批果实。

王明劝告阿拉伯共产党人应与一切阿拉伯国家的反帝运动协调一致。

共产党参加反帝人民阵线,并不意味着对于它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和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有任何削弱。然而,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和共产党自己在革命斗争中作适当的准备工作,苏维埃政权是建立不起来的。恰恰是正确而勇敢地应用反帝阵线策略,才能使

共产党比较容易赢得群众的信赖，才是革命向较高阶段即苏维埃阶段发展所必需的。

在反对法西斯运动(这种运动在殖民地和附属国采取了特殊的表现形式，自希特勒攫取政权以来，这种运动在那些地方已经发展起来)的斗争中，必须避免两种错误：一方面是低估法西斯主义的错误，另一方面是夸大法西斯运动，并把不是法西斯的运动当作法西斯主义来对待。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主要的任务是：组织真正的群众反帝革命斗争，以巧妙的方法揭露法西斯的蛊惑宣传，并加强反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

王明说：“不幸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党都理解殖民地革命的作用和重要性。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当中，在必要的范围内对中国革命真正而有效的援助，只从日本兄弟党那里得到过。日本共产党正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保卫中国人民而英勇战斗。美国的兄弟党已着手为中国红军筹集资金，而其他共产党则把自己的工作主要局限于宣传鼓动。中国革命迫切需要巨大的物质援助和精神援助，尤其需要一切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援助。(掌声)一个体现战斗团结的英勇事例是由一位日本士兵表现出来的，他开着一辆满载军火的卡车驶向抗日游击队通常聚集的地点。他在那里等候了几小时。但当游击队未来而日本军队已快开到的时候，他自杀了，留下了一封遗书，这封遗书落到了我们手中。”王明在会议大厅的听众们的屏声敛气中读了这封遗书，这位士兵写道：

“我给你们送来了一份小小的礼物，六万发子弹，许多手榴弹和炮弹。我个人要向你们倾诉日本共产党和日本劳动人民对于我们一起向帝国主义强盗共同进行斗争的中国人民和光荣的中国兄弟党所抱的热爱、相互团结和尊敬之情。”“他并且说，他已不能返回日本部队，并决心自杀。”全体代表起立，向这位国际团结的英雄致敬。

“这种行动不是偶然的,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我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但对日本人民充满着爱。(长时间的掌声)光荣永远属于日本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他们给了我们一个如此伟大的儿子,对于他,全世界无产阶级都感到骄傲。(长时间的掌声)”

“低估殖民地革命是社会民主主义偏向的一种残余,一切共产党人和进步工人必须最后结束这种现象。在当前国际阶级斗争的条件下,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实现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与整个殖民地世界被压迫民族之间团结战斗的革命阵线。实现这种团结革命阵线的一切前提都已具备。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纲领和一个共同的战斗目标:社会主义;我们有世界革命的共同的战略和策略;我们有世界革命的共同的堡垒:苏联;(掌声)我们还有共同的导师:伟大的斯大林。(长时间的掌声,全体代表起立)”

“这种团结战斗的阵线一经建立,正如列宁告诉我们的,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无可争辩地有了保证。我们现在正向着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新的历史性胜利进军。”

王明的结束语博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新的欢呼声一再爆发。代表们以各种语言高唱革命的战斗歌曲。

(第 941—942 页)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在第二十四次会议上讨论 季米特洛夫报告时的发言

(1935年8月7日晚)

王明(中国):

有些人认为:中国苏维埃革命既然在一部分领土内得到了胜利,同时阶级斗争已经非常剧烈,所以反帝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在中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无疑义地,这是一种很大的错误观点。事实证明恰恰相反。事实已经证明而且正在证明:在目前的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不仅具有头等的意义,而且我可以说,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

为什么?因为中国正逢着空前的民族危机。这种空前民族危机的来源,首先就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在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不断实行进攻和侵略,同时,由于南京政府对这种侵略采取不抵抗的政策。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不到四年工夫,差不多半壁河山,一部分已被日本帝国主义所侵占,一部分实际上已在日本军阀的监视之下。由东三省而热河,由热河而长城各要塞和山海关,由长城各要塞和山海关而所谓“滦东非战区”,由“滦东非战区”而实际上武力监视河北、察哈尔等省。田中奏折中所规定的灭亡全中国的计划,正在有系统地实行着。

近几年来,黄郛、杨永泰、王揖唐、张群、汪精卫等,以“不抵抗”政策,断送了我们国家的广大领土;以“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宣传,接受了日寇的一切无理要求。以“等待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了再说”的谬论,强迫中国人民坐以待毙。同时,更以“攘外必先安

内”这类公开祸国殃民的主张,来进行反对本国人民的流血战争,来镇压一切同胞的抗日救国运动。而最近以来,有些汉奸卖国贼,在“中日亲善”“中日满合作”等口号之下,实行着古今中外空前未有的卖国投降政策。

日寇要求由华北撤退于学忠、宋哲元等部队,这些军队便立刻奉命南下西开去进行内战了;日寇要求撤销某些军政长官,某些军政长官便立刻被撤职了;日寇要求河北省政府迁出天津,省政府便立刻搬到保定了;日寇要求封禁某些报章杂志,那些报章杂志便立刻被封禁了;日寇要求惩办《新生》等杂志主笔和新闻记者,《新生》主笔和许多新闻记者便立刻被逮捕监禁了;日寇要求在中国学校内实行奴化教育,所有进步刊物便立刻被焚毁,而许多不愿做亡国奴的有志气的男女青年便立刻被逮捕,而且其中有许多人被枪毙了;日寇要求中国一切国家机关聘请日本顾问,南京政府的军政财政各机关便立刻出现日本侦探了;甚至日寇要求解散所谓蓝衣社组织,蓝衣社北方负责人曾扩情、蒋孝先便闻风潜逃了。

如果长此下去,眼看长江和珠江流域各省以及其他各地,均将被日寇所吞蚀。中华五千年文明古国将完全变成殖民地,世界上最伟大的四万万中国人民将完全变成亡国奴。

同志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能不能就这样忍受国亡族灭呢?不能,绝对不能!请看,1200万阿比西尼亚的人民尚能努力武装反抗意大利法西斯的侵略,以保护自己的祖国和同胞;难道我们四万万中国人民不能为民族生存、为国家独立、为领土完整、为人权自由而战吗?当然,中国人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要为达到这一切目的而进行战斗的!

现在问题是非常直截了当的:要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那么,我们国家和人民就能生存;如不抵抗外敌,那么,我们国家和人民就要死亡。因此,抗日救国早已成为我国每个国民、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在民族危机日甚一日的条件之下,除了我们的伟大民族全体总动员去进行坚决的、无情的反对日本帝国主

义的英勇斗争而外，别无其他的救国方法；同时在共产党方面，除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策略而外，没有其他的办法能动员全体中国人民去与日本帝国主义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斗争。

不错，近几年来，中国共产党已经应用而且正在应用反日统一战线的策略。例如：（一）中国共产党在红军的斗争中应用了这个策略。中国红军屡次向一切军队提议订立战斗协定，以便进行共同的武装斗争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红军再三宣言，只要任何军队实行下列最低限度的、极为切实的条件，即停止进攻苏区，给予人民以民主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示威、罢工等自由），红军便立刻与之亲密携手去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事业。（二）1932年初，当上海实行英勇的抗日防御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曾经应用了这个策略。那时候，共产党员与19路军战士以及上海居民在前线携手作战；那时候，共产党员组织了沪西一切日本纺织工厂工人的总罢工来援助19路军；那时候，我们的上海党部组织了工人和学生的武装义勇军去参加前线的战斗，同时，并组织了运输队、交通队、侦察队、接济队、救护队等等，去帮助作战和保证后方；那时候，中国苏维埃政府，不顾自己财政状况的非常困难，而汇了几万块钱来帮助上海工人的反日英勇罢工。（三）在中国北部许多次英勇的反日战争中（山海关之战，察哈尔之战等等），共产党也应用了这个策略。那时候，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与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孙殿英等军队，手携手地在前线上作战。（四）在东三省和热河，中国共产党曾应用了而且正在应用着这个策略。近几年来，在东三省和热河，共产党员到处都出来作反日统一战线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共产党员到处努力把一切游击队和民众力量统一起来去反对共同的死敌——日寇的军队。正是由于共产党这种策略的结果，近几年来，东三省热河各地的许多涣散的游击队，才与共产党员所领导的游击队结成联盟，建立了联合的军事领导机关（如抗日联军总司令

部等等)和政治领导机关(如联军政治部和各地反日会等)。正因为如此,东三省和热河各地一切游击队的战斗力量在民族英雄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周保中、谢文东、吴义成、李华堂等领导之下,日益加强和扩大起来。最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种反帝斗争中,例如抵制日货、反帝示威、反帝罢工当中,都应用了这个策略。

然而,应当指出一个严重事实,就是中国共产党直到现在,在实行这个策略时,还不能十分彻底,还不能不犯错误。

例如,在英勇的上海抗日防御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本来应当与一切拥护 19 路军反日作战的人,结成极广大的反日统一战线。但是我们党的个别领导同志认为“工、农、兵、学、商联合”的口号是不能容许的,因此采取了不正确的立场,以致真正广大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建立起来。同时,当时中国共产党本来应当建立一切工会(赤色工会、黄色工会等)和一切工人(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反日统一战线,以便组织全上海反日总罢工,并达到武装工人抗日的目的。但是,只因为我们的工会工作人员实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怠工,并犯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以致总罢工的口号没有实行,武装工人上前线去参战的任务,执行得异常不充分。

第二个例子。中国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在 1933 年春曾向全中国人民和一切军队,发出订立共同武装抗日战斗协定的号召(当时一切中外报纸曾不得不公布这个宣言)。这一宣言对在江西战线上的国民党军队起了很大的影响,当时一部分将领曾率领所部向蒋介石先生要求“停止剿共”,共同抗日。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本来应当向江西前线军队并向一切其他愿意抗日的军队提出更加具体的建议,以便达到共同抗日救国的目的。同时,在这种情形之下,共产党本来应当继续坚持并发挥自己的主张,以便在军队和民众面前,追究国民党对抗日问题究竟采取何种态度。可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当时没有彻底实行

自己的政策，没有进一步想出具体的办法，以致没能收到使国民党军队与红军共同抗日的实际效果。

第三个例子。在福建事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本来应当估计到这次事变是红军向国民党一切军队提议订立共同抗日讨贼作战协定的直接结果，因此应当十分郑重地去对待 19 路军和福建政府，应当把它们看作是自己的同盟军。可是，由于我们党的个别领导同志机械地理解“反对第三条道路”（即中国发展的非苏维埃的和非国民党的道路）的理论，所以中国共产党对于福建事变的意义就不能给予确切的和应有的估计，因此就产生了我们当时在军事策略方面的错误。当时中国红军的领导机关，把自己的部队从最重要的江西和福建的东北战线上调到西南方面去袭击蒋军后方，以致当南京军队实行对 19 路军总攻击时，红军已经来不及给 19 路军真正有力的帮助。

最后一个例子。当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孙殿英等部队，在北方起来抗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本来应当动员北方以及其他地方所有的力量来拥护他们的义举。可是由于我们北方的和上海的工作人员轻视和不了解这些事变的意义，以致不能在北方形成反日的新阵地。

现在谁都明白了：如果中国共产党在上述各种事变中，能真正地、彻底地和正确地执行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地，中国今天的政治环境已经形成了一副新局面，而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斗争到今天也应该有了更大的成绩。

如果要问：这些错误发生的来源在什么地方呢？那么，我们可以答复说：这些错误之所以发生，首先是由于我们许多同志过去和现在都还没有了解近几年来中国所形成的新条件和新环境。因此，他们不了解，怎样用新的方法在中国提出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

这些新条件是什么呢？在我看来，有以下各点：

一、日寇的不断侵略,引起了中国人民的空前的民族危机,因此,全中国人民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抱着满腔的义愤,因此,广大民众的民族解放怒潮日益增长起来,因此,很多的中国军队,都抱有愿与人民一起去进行神圣的民族防御战争的情绪。

二、近几年来,中国红军已经发展成全中国的一个强大军事因素。同时,只有中国红军自始至终公开提出抗日救国的主张;而且红军能够不断地冲破敌人的“围剿”。正因为如此,所以一切反日的政治派别和军队——不管他们是根据真正爱国的和民族解放的动机也好,或者简单地由于为自己的一己利益也好——当他们感觉到日寇的威胁时,都不能不把红军看作是反日武装斗争中的一个极强大的军事因素。

三、要真正组织和顺利进行抗日救国的民族革命战争,那么不仅要有工农红军参加,不仅要有的一切革命的觉悟的劳动者参加,而且要有各种政治力量和各种军事力量的参加——哪怕参加这个战争的有一部分力量是暂时的、不可靠的和动摇的同盟者也不要紧;广大的和各种政治的和军事的力量参加民族革命战争这件事,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和必需的。

我认为:在目前的时候,考虑到我们过去好和坏两方面的经验,考虑到目前中国的形势,考虑到我国人民的民族生存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我们的党应当继续发展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应当把这个政策极彻底地、极大胆地、极广泛地和极坚决地运用起来,以便把全中国人民在极短期间内真正联合起来,去进行抗日救国的共同战斗。

中国共产党应当怎样向前发展这个政策呢?据我个人的意见,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体的意见,我们现在实行抗日救国政策的具体步骤应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维埃政府共同向全国人民,向一切政党、派别、军队、群众团体以及一切政治家和名流们提议,与我们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

的抗日联军。

同时，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完全负责地公开声明，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同胞们，一切愿意保国卫民的军官和士兵兄弟们，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神圣事业的党派和团体们，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真正爱国爱民的热血青年们，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中国境内一切受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压迫的民族（蒙、回、韩、傣、苗、黎等等）的兄弟们，中国共产党竭诚欢迎你们与苏维埃政府一起参加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同时，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完全负责公开地声明：一切愿意手拿武器去救国的军队，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战争的官兵和将领们，中国共产党竭诚欢迎你们与中国红军以及东三省、热河、北方各地反日人民革命军和义勇军一块去参加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此外，我可以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全中国的民众面前，在全世界的舆论面前，正式宣称：

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国苏维埃政府愿意做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愿意根据抗日救国的共同纲领，来与中国的各党派、各团体、各地方军政机关、各名流、各政治家，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的问题，不管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与其他党派、团体和个人之间，在过去和现在，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在今天大家都应当一致对外。

二、中国红军决计首先参加这种抗日联军，以便与一切军队手携手地在前线上为抗日救国而战。只要任何部队停止进攻红军，只要任何部队真正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武装斗争，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不同的意见，不管这些军队是否与红军进行过战争，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立刻与他们联络一起去实行抗日救国。

此外，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民众面前明显地提出国防政府的性

质问题,即是提出这个政府的基本任务在于抗日救国。因此,国防政府的政纲,应当是能代表全民共同利益的下列各点:

一、抗日救国收复失地。

二、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三、没收日帝在华一切财产,充作对日战费。

四、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粮食、土地,交给贫苦同胞和抗日战士享用。

五、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发展工农商业。

六、加薪加饷,改善工农军学各界生活。

七、实行民主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八、实行免费教育,安置失业青年。

九、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护侨胞在国内外生命、财产、居住和营业的自由。

十、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众(日本国内贫苦民众,高丽、台湾等民族)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作盟友,与一切对反日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

有些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这一提议,不过是一种宣传鼓动的东西,绝不能产生实际的结果。同志们,这是完全不正确的观点。

我们党的这种提议,有充分的客观条件作根据。中国的客观形势,明显地证明我们党这种提议有实现的可能。关于这一点,我可以举出许许多多事实来证明。这些事实可以明显地表现出目前中国的整个实际情形。从这些实际情形当中,可以明白地表现出中国各阶级力量关系方面所发生的变化;从这些实际情形当中,可以证实,必须抗日救国的思想已普及于很大一部分国民党的军队及其军官,以及中国许多政治家和名流学者。

关于这一点,我可以举出下列具体事实来证明:

(一)1932年初19路军的淞沪抗战。大家都知道,19路军原来也是国民党军队的一部分。在上海事变前,在两三年期间内,19路军也曾再三地进攻过红军,并且被红军打败过好多次。然而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尤其是当日本帝国主义者进攻上海和民众反日运动空前高涨的时候,第19路军在其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翁照垣等领导之下,违反了不抵抗的命令而实行武装抗日。结果,19路军便在中国民族解放斗争史上写下了最光荣的一页。

(二)1933年底和1934年初的福建事变。第19路军的官兵和将领们,从自己的切身沉痛经验中,认识了南京政府的当时政策的真面目(例如,上海战争时,曾有人派遣军队去解除第19路军的武装,但是这些军队自动地转变到19路军方面去,共同抗日,以致这些人的计划才未能实现),同时,对于南京政府和国民党把百万大军专用来反对本国人民及其红军,表示悲愤;因此,1933年末和1934年初,19路军乃在蒋、蔡、翁等将军领导下,与红军订立了抗日讨贼的战斗协定,同时它不仅公开宣布反对南京国民政府,而且公开宣布脱离国民党,并组织了独立的福建人民政府。此外,陈铭枢、李济深等高级将领,都参加了福建事变。

(三)1933年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孙殿英在北方举行抗日的武装斗争。这些军队及其一部分军官激进化的最好证明,就是吉鸿昌的行动。吉鸿昌是国民党军队的第33军军长,他遵照蒋介石的命令,在鄂豫皖战线上与红四军作战两年以上。吉鸿昌赞叹红军及赤色游击队在解放斗争中所表现的英勇,同时,痛恨南京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因此他开始觉悟到要与人民携手去抗日救国。蒋介石探知吉鸿昌情绪改变,立即将吉撤职并资送出洋。吉鸿昌在欧洲观察的结果,便是更坚定地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的中央接收了他入党。在入党以后,吉鸿昌便忠实执行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任务,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工作,执行党的一切指示和

命令。吉鸿昌主动地为了革命和人民的事业花费了自己的金钱，并出卖了自己的财产。他在抗日救国的目标之下，努力团结军队和民众的力量，当他的抗日救国工作震动整个北方的时候，卖国贼便在日本帝国主义帮助之下，派人暗杀吉鸿昌。吉鸿昌被刺未死，帝国主义在天津法租界医院逮捕了吉鸿昌，同时，并将吉鸿昌解至北平去处死。据中外一切报纸报道，吉鸿昌及其同事任应歧将军，虽然在重伤的情形之下，但在法庭上和临刑时，都表现了至死不屈忠心不二的民族英雄和人民战士的气概。他们在法庭上慷慨激昂地列数国民政府卖国殃民的滔天罪恶；他们在临刑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等口号。

卖国贼们曾利用吉鸿昌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件事情来做宣传，他们不仅利用这件事情来证明吉鸿昌同志是“赤匪”，企图以此证明他们残杀吉鸿昌同志的命令是正确的，而且他们利用这件事情来宣传说：看啊！中国共产党不是反对军阀吗？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内也有将领和军阀啊！

是的，按照自己的战略和策略的性质来说，按照自己的政纲和目的来说，中国共产党首先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可是同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全体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政党。因此，中国共产党不仅不以其队伍内有吉鸿昌这类著名将领为耻，相反的，它恰恰以此为自豪。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自豪，因为这更足以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全体人民的民族之望和民族之光；这更足以证明，只有在我们共产党内，才能够把中国社会各阶层中最先进的、最优秀的、最爱国爱民的分子团结起来；只有在我们共产党内，才能把一切不忍坐视中国同胞沦为亡国奴和变成饿死鬼的我们民族真正的优秀代表们团结起来。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以此自豪，因为这可证明我党的威信和影响有多么大，甚至于国民党的将领和高级军官，一旦觉悟到必须救国救民的时候，就把中国共产党看作是唯一的出路和希望。最后，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以此自豪，还因为这恰好证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力量和影响，中国共产党教育感化党员的力量多么大，甚至于旧将领和新党员吉鸿昌同志，都能成为杀身成仁和舍身取义的革命家，都能够表现出他是不愧为党、不愧为阶级和全体人民所信任的真正共产党员。

(四)1934年宋庆龄等人签名公布《中华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的目的在于组织抗日救国的民族自卫战争，这个纲领包含有下列的具体条款：

一、全体武力总动员——一切海陆空军立刻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立刻停止一切内战，立刻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

二、全体人民总动员——各界同胞动员起来去参加抗日救国神圣战争的前线和后方工作。

三、全体人民总武装。

四、采取下列办法解决抗日战费：

甲、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一切财产，同时停付日债一切本息。

乙、没收一切卖国贼的财产。

丙、国库一切收入，都用作对日作战的经费。

丁、实行征收财产累进所得税。

戊、在国内人民和国外华侨及一切同情中国人民的人士当中进行广大的募捐运动。

五、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同时设立地方分会和下层组织。

六、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日本的劳动民众，高丽人，台湾人等等)作友军，同时与一切对中国人民武装抗日表示同情援助或守善意中立的国家和民族，建立友谊的关系。

在这个纲领上签名发起的，有各界人士著名的代表，有许多名流学者，如何香凝、马相伯、李杜、章任琢、胡汉民等；拥护这个纲领

的有东北人民革命军和义勇军领袖,如杨靖宇、李延禄、赵尚志、王德泰、周保中等,有 19 路军名将如翁照垣等,有著名政治活动家如叶夏声等,签名赞成这个纲领的有欧美各国的侨胞和团体。从这个纲领的性质和其发起人及赞助人的成分看来,这个纲领显然是全民抗日救国热忱的具体表现。

由于中国民族危机的继续加深,毫无疑问地,中国社会中所有优秀的和所有纯洁的分子,一定都要起来,为救国救民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同样,毫无疑问地,在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和军官中,以及在黄埔军官学校和其他军事学校以前和现在的军官学生中(有许多人把这些学生都看作是不革命的或是法西斯分子,这当然是错误的),一定有不少纯洁的热血青年和爱国志士,日益明了中国的正确出路,日益了解与人民合作救国的必要,日益了解与苏维埃和红军合作去抗日的必要。

中国共产党的提议之所以能够实现,不仅由于中国客观形势的需要,而且还由于革命主观力量的增长,首先就是红军与苏维埃力量的增长。

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以来,在这一年半的时间内,中国红军又获得了新的胜利。以前赣闽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在中共中央和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领导之下,不仅顺利地冲破了敌人将近百万军队的战略上的包围网,而且早已击破了敌人在西南方面的战线,实行英勇的西征。中国红军主力行经将近十省,跨过了许多崇山峻岭,经过了许多羊肠小道,渡过了许多号称天险的河流(乌江、扬子江、金沙江、大渡河等等),一方面应战,一方面行军,共计走了六七千里以上,这样,中国红军主力就表现了国内战争历史上空前的英勇精神和战斗艺术。西征红军主力现在(7月16日)已经与另一个基本部队(红四军)会师于成都附近(天全),并与红四军一起在四川、西康、甘肃、陕西等省的一部分领土内,建立了广大的和巩固的新苏区。

在一切苏维埃区域里，在近年来艰难困苦的战斗中，红军的主力都能在最困苦的环境中保存着。

此外，以前红军大的集团（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军团以及其他军团），除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外，都分散在各地，彼此没有联系。现在它们或者已经在地域上联合起来，或者彼此之间已经有了游击队的和其他的联系。从前红军主力是在闽赣省的区域内，这个区域，由于长期战争和国民党封锁及破坏的结果，在经济上形成空虚贫困，同时经常受敌人各方面的包围。现在红军主力已占领四川、西康、甘肃等省的广大领土，在这些地方，红军的给养和战士的补充来源，比以前要大得多；在这些地方，红军的攻守行动要便利得多。同时，在这些地方，敌人要实行其包围封锁的军事计划，要比以前困难得多。

中国红军和苏维埃这种新的有历史意义的胜利，使得它们愈加成为中国全体人民在抗日救国武装斗争中的推动力量和中心力量。

证明革命主观力量加强的事实，不仅是红军和苏维埃力量的增长，而且是共产党力量的增长。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数十万党员的政党，同时它在苏区内不仅夺取了工人的大多数，而且夺取了民众的大多数到自己方面来。中国共产党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很好地领导了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共产党在东三省、热河、北方和一切国民党区域，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积极起来组织和领导群众的革命斗争，从斗争的原始的和消极的形式起（如请愿、怠工等），直到斗争的最紧张的形式（如群众的政治罢工和总罢工，武装抗日讨贼等），在革命斗争中去维护最广大民众的利益和权利。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的列宁斯大林路线，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战斗中，锻炼出了成千成万忠于革命事业的战士，培植出了许多忠勇善战和智勇双全的干部，这些干部不仅不怕困难，而且善于克服困难。在这些战士当中，有这样出色的党内领袖和国家

人材,如毛泽东同志、项英、周恩来、张国焘、张闻天、廖成云、赵容、博古、任弼时、王稼祥、董必武、邓发、林祖涵、吴玉章、徐特立等同志,在这些战士中间,有这样著名的军事将才和英勇战士,如朱德同志、彭德怀、贺龙、林彪、叶剑英、徐向前、董振堂、陈昌浩、肖克、罗炳辉、刘伯承等同志。在这些战士中间,有这样的民族英雄和阶级战士,如彭湃、杨殷、蔡和森、罗登贤、瞿秋白(他们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中夏(中共中央委员)、恽代英(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国青年的领袖)、陈元道、何子述(党的最好的中坚干部,反立三路线的著名领导者)等同志,这些同志在被捕后遭受敌人非刑拷打和非人待遇时所表现出的布尔什维克坚定性和对党对革命的无限忠诚,这些同志的慷慨就义和英勇牺牲,不仅成为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的模范,而且引起了全国人民的赞叹和同情。在这些战士中间,有这些大无畏的英勇战士,如黄公略(中共中央委员,红五军军长)、沈泽民(中共中央委员)、鲁易(红二军政治委员)、寻淮洲(红七军军长)、何叔衡(中共党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工农检查院院长)、贺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红五军政治委员)等同志,这些同志为苏维埃和红军的事业而奋斗到最后一滴血。在这些干部中间,有这样著名的民族英雄,如孙小宝、傅维玉等同志,这些同志在上海抗日战争的时候,组织了工人义勇军,担任了义勇军的队长,他们在最重要的战斗关头牺牲了性命。在这些干部中间,有这样著名的抗日烈士,如童长荣、伯阳、何思美等同志,他们在东三省抗日游击战争中,身经百战,在日寇屠刀下牺牲了头颅。在这些战士中间有中国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总司令方志敏同志。方志敏同志在中计被俘以后,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受尽了虐待和凌辱,受尽了严刑和勒询,表现出至死不屈的节操和为国尽忠的义气,方志敏同志的肉体虽被摧残了,但方志敏同志的抗日救国精神,将如日月经天,江河亘地而永垂不朽。

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成长的原因,就是由于

它是受到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的领导，由于它能利用共产国际一切支部的经验和赞助，首先就是利用共产国际的领导支部联共（布）的丰富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发展和成长，就是由于它忠实于伟大的斯大林同志的学说。斯大林同志在列宁逝世以后，向前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策略，其中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斯大林同志在理论上奠定了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基础。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发展和成长，就是由于它进行了无情的斗争去反对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和陈独秀的取消主义，就是由于它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去反对盲动冒险的李立三路线和反革命的罗章龙派。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种正确的两条战线斗争的基础上发展和巩固起来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发展和成长，就是由于它积极参加和领导人民的各种各样形式的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英勇地领导人民斗争这个基础上发展和巩固起来的。而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增长，所以我们才能够勇敢坚决地按照新的内容提出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

有些人以为中国共产党这个提议，不过是一种通常的政治手腕，而不是实际的政策。这种见解也是完全不正确的。

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不了解：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共产党再没有其他的利益。难道抗日救国这种事业不符合于中国人民的利益吗？自然是符合的。中国是我们全体同胞的祖国！中华民族，就是共产党员、红军以及我们祖国的一切同胞们！救国的事业，就是拯救我国全体人民使之不当亡国奴和不当饿死鬼的事业。这种事业是全体人民非常迫切的事业，当然就是中国共产党刻不容缓的事业。这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之所以有力量，共产党与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个主要不同点，就是共产党经常是言行一致的，而不像他们那样言行不符。

.....

然而中国革命却真正需要帮助,首先需要一切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工人方面的帮助。因此,我可以代表中国人民感谢季米特洛夫同志,因为他在我们这次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曾正式切实声明,共产国际下了极大的决心,拥护中国人民的斗争,以便使中国人民从一切帝国主义强盗及其中国走狗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共产国际大会的代表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代表,他们对于季米特洛夫同志的这种声明,表示了热烈的拥护和完全赞同,中国人民正迫切期待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实际的同情和援助。

.....

我在上面已经讲过: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员都真正了解和估计到殖民地革命的作用和意义。关于这一点,下述的事实也可证明。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作的有些共产党员,把殖民地的革命看作是无关痛痒的事情,或者至多把它看作是世界革命中无关紧要的辅助的力量。其实,这是一种完全不正确的了解。他们不了解新时代——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殖民地革命所起的作用和所存在的意义;它们不了解:据列宁斯大林的估计,殖民地革命正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

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员必须了解,殖民地革命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占全地球人类的绝大多数;殖民地革命事业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殖民地民族中的大多数是真正的劳动者;殖民地革命事业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有一部分工人阶级及其共产党存在着和斗争着,而且因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占实际统治地位的,正是在帝国主义国家内被广大人民反对的公敌。轻视殖民地革命的意义和作用,是由于在共产党员和进步工人中间还有社会民主主义影响的残余,这种残余应当毅然决然地加以消灭!

在目前国际阶级斗争的严重形势之下，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建立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与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真正战斗的、全世界的、革命的统一战线，以便对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建立的反革命的统一战线。

我们有一切基本前提来办到这件事情。我们有共同的仇敌——帝国主义，我们为社会主义和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共同政纲和目的，我们有世界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我们有革命斗争的共同堡垒——苏联，我们有统一的世界性的政党——共产国际，我们有共同的导师和领袖——伟大的斯大林同志！（全体起立，鼓掌。）

同志们！应当永远记住列宁最后的一篇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列宁对于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对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斗争的前途，给了很明确的一种估计。同时，对于殖民地革命在社会主义世界与资本主义世界决战中的作用和意义，给了一种估计。列宁在这篇论文的末段写道：

“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大多数的人口，最近几年来也非常迅速地卷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来，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来，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①

是的，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有了保障，尤其是在现在。现在无论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无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被压迫民族，都起来进行共同的斗争，去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都起来进行共同的斗争，去争取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去争取民主自由和民族解放。

同志们！让我们前进，高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旗帜，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710页。——原编者译

高举共产国际的旗帜,去迎接世界革命的新胜利!(暴风雨般的掌声。代表们发出欢呼致敬声。中国代表团唱国际歌,整个大会同声歌唱,并同唱中国红军进行曲)

摘自王明《论反帝统一战线》,1935年8月。据《国际新闻通讯》1935年第1488—1547页王明发言,在内容上有删节。

(选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在第二十七次会议上讨论 季米特洛夫报告时的发言

(1935年8月9日)

梁朴(中国):

在过去几年中,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和领导群众罢工斗争中,取得了许多胜利。1932年上海纱厂的反日大罢工和上海丝织厂女工的总罢工,尤其值得注意。1933—1934年间所发生的突出的罢工,即天津纱厂的大罢工,上海美亚十个丝织厂的总罢工,所有中国轮船水手的总罢工,上海两千多失业者在拒绝付房租问题上的斗争等等,都是共产党和赤色工会领导的。

开滦煤矿五万矿工著名的三次罢工,也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进行的。

为什么我们能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下领导这些斗争?

我们及时地提出了符合工人需要的最关键的要求,并吁请各工人团体联合起来进行反对资本进攻的共同斗争。

我们利用了包括广大工人群众的各种罢工委员会,作为统一战线的领导机构。

我们为进行总罢工而缔结协约。党向其他各工厂提出建议,通过它在这些工厂的机构,缔结团结罢工的协约。在上海战争期间,所有纱厂的一次总罢工就是以这种方式下令举行的;在“美亚”各丝织厂罢工期间,建立了一个包括上海所有丝织企业的罢工领导委员会,该委员会在这些企业中组织了一次总罢工。

我们利用独立的、手工业的和其他各种旧式的和半封建性的合法群众组织,利用黄色工会激进职员的不满情绪,团结工人,进行反对国民党的命令和规定的斗争。

这些事例证明,如果我们在组织劳苦大众的经济斗争中具体运用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就有可能取得胜利。然而,如果以为我们已经彻底运用了统一战线的策略,那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我们还有若干严重的宗派主义倾向的组织,它们坚持认为,与组织在黄色工会中的工人进行联合斗争,会削弱我们的独立领导作用。

虽然我们在罢工中建立了统一战线的机构,但我们还未能把它变成工人统一战线的永久性机构。相反,有些地方党组织认为,我们利用合法的可能性作掩护,建立包括广大工人群众的各种组织,是合法主义和机会主义。

我们当前的任务是要消除一切宗派主义倾向,不组织排外的地下工会,因为这种工会只是由少数几个会员组成,不利用一切合法的和半合法的可能性,也不以主要精力注意那种真正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组织。

不能否认,我们党在黄色工会内部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在这种工作中也有某种程度的转变。

我们所以取得胜利,主要是由于我们实际上已渗入到被黄色工会吸收的工人群众中,因为我们已开始在这些工会中活动,并根据工人至关重要的需要和要求,正确地运用了统一战线的策略。

但应当指出,我们在国民党黄色工会中的工作迄今还只是走了第一步,在这方面还存在着许多缺点。

在我们争取黄色工会普通会员并与他们建立统一战线的斗争中,仍然强烈地感到宗派主义的影响。

这些严重的错误与缺点延缓了我们工作的决定性的转变;同时这也说明,为什么国民党黄色工会的无数破产瓦解事件和不断

发展的驱逐国民党黄色工会官僚的斗争，尚未导致我们自己广泛的、真正群众性工会组织网的建立。

这就说明，为什么我们当前的基本任务是对这些错误进行果决的斗争，勇敢地进入现有的国民党工会，在这些工会中工作，并把它们转变成阶级斗争的机构。

自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我们党进行了一场果决的斗争，以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并巩固无产阶级在这一运动中的领导权；在这方面的的工作中，我们取得了若干胜利。应当特别强调的是，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武装进攻上海期间，党提出了武装人民保卫上海的口号，并组织抗日同盟，在上海工人和民众的协助下拯救国家；领导了上海数万市民的反日游行示威和日本企业雇用的六万名工人的反日罢工；领导了上海工人的反日罢工；组织了工人武装纠察队和义勇军；勉励和鼓舞19路军士兵与上海工人及全体民众一起进行英勇的斗争，这一斗争持续了八个月之久。19路军撤离之后，六万上海工人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继续进行了两个月的罢工。党由此证明，只有无产阶级才是一贯的反帝先锋，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民族革命解放斗争的唯一领导者。

北平和天津被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部队所包围时，我们党提出了武装人民保卫这些城市的口号；党召开了所有企业的工人和北平黄色工会会员的广泛的会议，在会上，召开各阶层民众代表紧急会议等问题，也作为保卫国家的具体措施进行了讨论。国民党黄色工会的官僚为反对我们的口号，提出组织“工人团体消灭共产主义”和防止“赤匪”破坏活动的建议。群众一致接受了“团结一切反帝革命力量保卫和拯救国家”的口号，断然拒绝了国民党的反革命建议。

同志们，我们为什么在反帝统一战线上能够取得这些成就？为什么在保证这种统一战线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我们能够成功？

第一,因为我们正确地估计了特定的具体形势,提出了在群众中建立统一战线的具体口号。

第二,因为我们利用主要企业和工厂作为中心,在那里组织了普通群众抗日统一战线的牢固基地。

第三,因为我们广泛而勇敢地适应群众的要求,并与一切抗日爱国的工人和市民建立了统一战线。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广大群众争取过来,并把他们吸收到统一战线中来。

但我们必须强调,宗派主义对于我们建立统一战线的努力,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

最后,我要说说苏区工会与国民党地区工人的联系和对他们的影响。不可否认,与苏区工会对国民党地区工人不断增长的政治上、物质上和其他方面的支援相一致的是,这些工会的影响和领导作用也增加到了相当大的程度。例如在上海工人反日大罢工、中国矿工罢工以及“美亚”公司工人罢工期间,苏区工会不仅发表了声明,发去了带有重要指示的致敬电,而且进行了一次募款支援白区罢工斗争的群众运动。目前,苏区工会正在努力工作,为白区工人建立罢工基金等等。另一方面,白区工人也加强他们对红军的直接帮助,促进红军的斗争,以此作为报答。例如中生兵工厂的工人们故意生产无用的炮弹,作为对进攻苏区的抗议;赤水兵工厂工人领导了赤水劳动群众的起义,等等。

不过我们必须强调指出,在发展和领导白区工人的斗争中,苏区工会尚未成功地利用一切可能性,把劳动群众的这种斗争提高到更高的水平。

只要党加强它在企业中的工作,只要我们巩固、积蓄并爱护我们在工厂中的力量,争取新的力量,并训练我们的干部,只要我们从根本上改变群众工作的方法,最终克服我们队伍中的宗派主义,这些任务是能够完成的。

同志们,我们坚信,我们将毫无疑问地克服一切困难和缺点,

胜利地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任务。(掌声)

.....

(摘自《共产国际相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在第三十一次会议上讨论 季米特洛夫报告时的发言

(1935年8月11日)

欧阳生(中国):

国民党为阻止其阵营的分裂以及在国内和对外政治事务方面的破产所作的努力,已导致了許多法西斯组织的建立。这些组织中活动力最强的是蒋介石领导下的公开的恐怖组织蓝衣社。这些法西斯组织用国家主义进行蛊惑宣传,谈论什么新的国家革命,什么中国的独立,等等。他们在“新生活运动”的口号下鼓吹两千年前的道德准则,把中国人民拉回到不开化的蒙昧主义之中。他们的拥护者是大资产阶级,一部分城镇中产阶级和一部知识分子。到目前为止,他们争取工农群众的努力是不成功的。他们使用了两千年前中国皇帝使用的、显然也被希特勒效仿的残忍的严刑拷打方法。

(第950页)

沈元生(中国):

我想谈谈中国的法西斯运动问题。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暂时获胜促使法西斯运动开始在中国发展。这一运动在中国兴起的主要和直接的原因,是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破产。

众所周知,国民党政权使国家陷入了空前未有的民族危机之中。整个国家经济的下降又带来了领土和中国人民主权的丧失。这一政权注定要使中国人民失业、贫困、倾家荡产、饥饿和灭亡。

另一方面，在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内外政策全部破产的形势下，中国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和加强，中国红军的成长和胜利，以及全中国人民反帝、反国民党的民族革命斗争的兴起，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对国民党政权不断增长的反抗。这必然导致地主—资产阶级军国主义的国民党的进一步瓦解，以及反革命政权的进一步垮台。目前这一政权依靠老办法再也不能统治下去了，因而有了法西斯运动在中国的生长。

法西斯运动在中国起了什么作用呢？在国民党手中，这一运动是一种新的欺骗手段，国民党试图借助它阻止其内部纷争，重整队伍，争取小资产阶级和人民中处于绝望境地的落魄分子，以便动员一切力量对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国民党运动以及它的主要力量苏维埃和红军进行更残酷的镇压，试图以这种方法挽救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地主政权。

中国的法西斯运动最初的表现形式是一个以“蓝衣社”的名字著称的公开的恐怖组织。

这个法西斯运动代表了中国反革命阵营的新特点，它成为已破产的反革命政权手中的一张新王牌。因此它采取了新的策略和计谋，诸如在“新生活”运动的堂皇幌子下散布孔孟之道：尊敬父母、关心兄弟、忠于统治者、忠于朋友，以及所谓礼貌、诚实、慷慨。

“新生活”运动实际是一个力求过颓废的旧生活的运动。它正把中国人民拖入最黑暗、最野蛮的中世纪的思想之中，它妄图使中国文化的历史车轮倒退到最落后的封建主义时代。

为了执行这项方针，法西斯分子实行了疯狂残忍的白色恐怖。

过去国民党使用的是当众斩首、枪毙和绞刑这些处死刑的方法。目前人们看到国民党使用的方法大有发展，即更加残忍，除了当众砍头以外，国民党还广泛地使用了暗杀、绑架、活剥皮和活埋等等手段。

据南京卫戍区头目谷正伦的报告，仅南京一地就枪杀了7000

多名共产党员和杰出的革命战士,而这一数字还不包括那些被特种法西斯组织秘密杀害的人。

中国的法西斯分子不仅屠杀革命战士,而且还屠杀所有反蒋团体的领导人。

中国的法西斯运动同国民党以前所用的所有策略伎俩一样,是不可能解决中国的任何民族和社会问题的。因为它不能坚持独立的政策,不得不执行一条以帝国主义的意志为转移的、符合帝国主义利益的政策。

目前群众反法西斯运动的巨浪正在中国兴起。它表明群众是勇敢的,是决心同法西斯主义做斗争的。群众正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斗争,为达到这一目标运用了一切可能的方法。

我们必须使群众的利益同法西斯主义组织的方针对立起来,从而破坏它们在群众中的影响。我们必须用事实证明法西斯主义是全体不愿作帝国主义奴隶的中国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

我们相信,全体中国人民必将在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为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国民党法西斯走狗而斗争。

在第三十一次会议上讨论 季米特洛夫报告时的发言

(1935年8月11日)

王荣(中国):

(全场以热烈的掌声欢迎)

在中国,革命的统一战线问题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是重要的,而且在目前是空前急迫的。反帝的人民统一战线在中国则更加重要,因为那里的民族危机已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群众对于日寇的不断进攻和南京政府不断地退却投降所表现的愤怒,目前尤有急剧的增长。

为了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和打倒它的走狗,中国人民需要举国团结一致。但是谁能把这些不愿作日本帝国主义奴隶的革命群众组织进统一战线并领导他们摆脱民族危机呢?最近几年发生的事件表明,只有中国苏维埃和中国红军能够完成这一任务,因为只有他们能够组织和团结人民。

中国苏维埃和红军自成立以来,在为反帝统一战线而奋斗中做了些什么?又取得了哪些成就呢?

当日本帝国主义夺取山海关,并向热河推进时,中国苏维埃和红军为扩大反帝统一战线向中国各军队发出呼吁,号召他们根据以下三个条件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这一呼吁在蒋介石攻打红军的前线军队的士兵中间引起了波动,并迫使高级指挥官陈诚和其他将军要求蒋介石“加派部队抗日”。

曾经在 1932 年 1 月为保卫上海而战的 19 路军,于 1933 年 9 月响应了苏维埃的这一呼吁,并同苏维埃政府订立了抗日反蒋协定,结果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了。这是统一战线的第一项成就。

目前红军主力已抵达四川、陕西和甘肃各省。由于这次征战,苏维埃政府管辖下的领土有了很大扩展,红军已增加到近 50 万人。这种形势给人民大众带来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同国民党进行斗争的更大勇气。

这一激励人民大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并有利于拯救国家的斗争形势,在国民党阵营中引起了更大的动摇和分裂。苏维埃和红军表示,为了进一步扩大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甚至要联合那些动摇的、不可靠的、暂时的追随者。例如,当红军进抵成都附近时,国民党指挥官邓锡侯,像报上所报道的那样,同红军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而且在 5 月份,当他接到蒋介石进攻红军的命令时,他没有执行命令,而是撤退了,因此使红军得以占领非常重要的战略关隘土门。这种特殊类型的反国民党统一战线是特别重要的。这是统一战线的第二项成就。

所有这些成就都证明了这样的事实,即苏维埃和红军能够正确地应用统一战线策略。这就是他们之所以总是得到广大劳动群众的支持,能够成功地粉碎敌人不断发动的战役的原因之一。

但是党在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时也犯了许多错误。王明同志已十分详尽地谈到了这些缺点和错误,并进行了布尔什维克式的批评。我们犯这些错误是由于我们的某些同志尚未认识到中国已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的社会基础已大为扩大,等等。这些同志害怕实行统一战线的一贯政策,坚持残留的旧宗派主义倾向。因此,反对宗派主义倾向和反对所有其他倾向的斗争,就成为成功地实行统一战线策略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世界已迫近战争与革命的新阶段,革命危机日益加深。就中国来说,在那里革命形势的出现已达四年,即反对战争和干涉的形

势,目前又出现了某种新的局面,即日本强盗的攻势变得更加猛烈,国民党的统治已遭到彻底失败,民族危机已达顶点。我们的党、苏维埃和红军必须以大无畏的精神促进广泛的反帝、反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为建立一个指挥神圣民族革命战争的国防政府而奋斗。

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力量,一切有爱国天良的官兵们,一切愿意参加神圣救国斗争的党派和团体,一切热爱祖国的侨胞们,中国的一切被压迫民族——蒙古族、回族、朝鲜族等等,以及一切有民族意识的国民党的热血青年们,都应当联合在一个民族战线之中!
(掌声)

(第 1666 页)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在第三十二次会议上讨论 季米特洛夫报告时的发言

(1935年8月11日晚)

王荣(中国):

(全场以热烈的掌声欢迎)

为建立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人民统一战线而进行斗争的中坚力量是中华苏维埃。它所发出的组成联合反帝政府的呼吁,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在国民党军队的官兵当中唤起了广泛的共鸣。从反对蒋介石的六次“围剿”中取得的经验以及满洲游击队整整一年的抵抗表明,我们有一切可能得到最广泛的群众支持,并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掌声)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在讨论陶里亚蒂报告时的发言

(1935年8月15日)

李光(中国):

远东的这场战争标志着新的世界瓜分的开始。蒋介石的军队中有来自帝国主义军队的专家,德国参谋部的塞克特将军制订了消灭中国红军的计划。红军突破了包围圈,跋涉数省,行军3000公里,一路奋战,并建立了新的苏区。蒋介石试图使这次战略退却看去像是红军的失败,但是以后的事件表明,中国红军粉碎了蒋介石的计划,并建立了新的活动基地。新的军事战术的运用,创造了打败蒋介石以及使红军处于新的攻势地位的必要条件。

我们胜利的秘诀在于中国红军懂得为什么打仗,在于它的政治训练,以及它是一支中国工农的军队,而不是一伙外国雇佣兵。在中国红军作战和前进时,人民都通过扰乱蒋介石的进攻行动来支援他们。尽管巨大的困难摆在红军斗争的面前,但是可以自豪的是,勇敢坚定的党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身先士卒,站在红军的最前列!(掌声)

从战略上讲,红军目前的地位比以前要好得多。虽然以前红军被分割,在各处受到封锁和包围,处于守势地位,但是目前它集结在广阔的苏区,正在封锁蒋介石的军队,处于攻势地位。红军斗争的胜利万岁!苏维埃在中国的胜利万岁!(热烈的掌声)

(第1027页)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在第三十七次会议上讨论 陶里亚蒂报告时的发言

(1935年8月16日)

赵毅敏(音,中国):

日本帝国主义想使中国的东北各省成为它对中国苏区和苏联作战的近便的物资供应地,因此残酷地压迫这四个省的人民。当地人民被驱赶着进行强迫劳动,军队看管着工厂和农村,一切武器都被没收——不下300万支步枪——任何人反抗都遭枪决。人民不断地展开反抗日本压迫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游击运动也在发展。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仅沈阳一地发生的军队和游击队的冲突就达一千多次。反日的群众支持游击队,并推崇他们为民族英雄。

(第1030页)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在讨论陶里亚蒂报告时的发言

(1935年8月16日)

宋一平(中国):

中国青年团正积极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解放斗争。在苏区,青年人形成了红军的骨干。青年人的“少共国际师”共有2000人,在第六次反“围剿”中,少共国际师把南京部队的四个师阻挡了20天,使红军有可能在前线其他战区取得胜利。红军中的年青人提供了成千个英勇斗争的榜样。中国青年团在红军青年中开展着巨大的文化工作。在国民党地区,共产主义青年团不顾白色恐怖,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青年当中做了很多工作。上海战争期间,青年人支援了19路军。在东三省的游击队中有1000多名青年。在国民党地区,中国青年团表现出宗派主义的缺点,为了动员全体青年参加解放斗争,它必须做群众工作。

(第1032页)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共产国际“七大”与我党 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

(1936年3月20日)

张闻天

共产国际“七大”决议中特别重要的，一是集中力量反战反法西斯，二是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反战的统一战线，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殖民地的人民统一战线。决议中关于欧洲的问题讲得多些，我们应该使之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从这些决议看，中央以前的决议基本上是同这些决议相符合的。

一、世界大战的危险与争取和平的斗争

“七大”关于战争决议，是去年8月通过的。8月到现在，发生了什么新的变化呢？首先，日本继续侵占华北，并且废弃海军协定，开始了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破裂了由华盛顿条约建立起来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平衡。其次，意大利去年10月初开始了侵略阿比西尼亚的战争。这也是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它使欧洲发生了变化。第三，德国公开废除凡尔赛条约的有关条款，进军莱茵非武装区。这三个国家公开破坏平衡，是主要的挑衅者。三国之中，

* 这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收入《张闻天选集》时略有删节，标题是《张闻天选集》的编者拟的。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山西隰县大麦郊镇附近的上益千村（今属交口县）举行，主要讨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

德、日酝酿签订军事协定，意、德则开始接近。

由于日、意、德三国的上述行动，使帝国主义内部发生了很大的变动。英国从前与德国签订了海军协定，意阿战争以后，它同法国开始接近。法国则通过了法苏协定。美国重新宣布了中立法，英美开始接近。

总之，一方面，德、日、意接近，另一方面，英、法、美、苏接近。这种形势表示，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險增加了，其一触即发之势时刻威胁着人类。世界革命运动（工人运动，殖民地人民运动）的发展，和平运动的发展，使帝国主义发动大战较为困难，但同时也使帝国主义急于在战争中求出路。

正因如此，争取和平的斗争更加重要了。全世界的群众，不但工农，而且小资产阶级分子，都反对战争。和平的口号可以团结最广大的群众为反战而斗争。资产阶级的许多派别攻击我们不要和平，现在我们正可以揭破他们，从而争取最广大的群众。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是和平主义者。我们是进攻苏联和侵略殖民地的战争的反对者。要为世界和平斗争，就要反对侵略者。

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拥护世界和平，反对进攻苏联，反对日本侵占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尤其是中心。我们要以民族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世界和平，而坚决反对日本的“和平”和蒋介石的“和平”，因为这是侵略者与卖国贼的和平。

我们现在主张国内和平，联合对日。这种国内和平是必要的。同这一口号相联系的，是联俄联共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这是群众的口号。在中国劳苦群众面前，这个问题是十分明白的。日本的所谓三大原则之三，就是中日“满”联合反对赤化，即反对中国红军与苏联。蒋介石想在日本同中国红军、苏联之间“渔翁得利”，是办不到的，只能是或者联日，或者联俄联共。在中国，甚至一些反革命分子都想找出路来联俄联共抗日。有些人可以去幻想中间道路，但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我们提出这一口号,是否挑衅,使日苏打起来呢?当然不是。不能因为拥护苏联而连这个口号也不提。我们要继续团结全国力量,联俄联共来反对日本。李德的意见,依照我们的分析,全是无稽之谈。

总之,我们的和平政策是战斗的,动员的,是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

二、国内形势与统一战线

现在的情况证明,中央决议是正确的。

日本在继续进攻。东京事变进一步完成了法西斯的统治,日本政府采取更积极的侵略政策。

南京政府仍在继续出卖,它承认了广田三原则。冀察政务委员会成为第二傀儡,德王、卓什海正在活动“独立”。

全国反日运动,特别是学生反日的壮烈运动,到处在酝酿。

反革命内部即南京政府内部和一些军阀也在与我们接洽谈判。

现在有许多派别在抗日口号下表现活跃。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一)地主买办集团,但处于另一帝国主义影响之下者(如广东);(二)分裂出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正在发挥其民族改良主义;(三)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生。这些派别要与我们接近,有些积极,有些动摇。但地主买办集团坚决反共(如广东),资产阶级有的主张联俄联共,有的不主张。这种分化很明显。

红军东征获得胜利,苏维埃影响正在扩大。

以上事实证明,爆发民族革命战争的局面正在形成,尤其在华北。那里成为所有矛盾集中的地方,是首先爆发民族革命战争的地区。

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准备开展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目前的关键,是建立统一战线——抗日的

人民统一战线。现在证明，这种统一战线对我们是完全有利的。

我们的方针是：

(一)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时，应与群众切身利益联系起来。国际决议说，不应当只是号召群众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而是要告诉群众，今天应做些什么。我们要根据不同的环境，提出群众迫切的要求，并使这些要求与抗日联系起来。如只喊抗日，不联系切身利益，就不能吸引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

(二)必要而且可能与各种政治派别进行上层统一战线，首先注意那些有群众的、有实力的、抗日的派别。订立协定时也应考虑今天所需要的是什么，先订部分的、地方性的协定。这些协定可以是公开的或秘密的，但一定要着眼于争取广大群众。

(三)不论统一战线是上层的，下层的，或上下同时进行的，统一战线的协定如能公开，就一定都要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讨论。即使是秘密的，将来也要公布的。我们不订立那种不讲原则的“拉拢”的协定。

(四)订立协定后，我们忠实遵守这种协定，以取得同盟者尤其是其群众的信任。只有如此，才能对于违反协定的领袖进行批评以至斗争，并迫使玩弄“左”倾言辞的空谈者不得不表示态度。

(五)不放弃对同盟者的立场进行严肃的批评，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唯一正确的主张。

(六)对最反动的法西斯分子进行最坚决的斗争，而不是迁就，如对蒋，这样可以使动摇者倾向我们。

(七)成立统一战线的组织与机关，使其愈民主愈好。吸收“左”倾分子，发挥其积极性，排斥不好的分子。

(八)在各种问题上实行统一战线，不限于抗日。利用每个小的要求(如工资、抗捐、民主自由的要求)，利用每个事变，在各种阶层以至各种反动阶层中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没有死板的公式。

(九)不要进行没有胜利把握的斗争，学习从防御到进攻的各

种斗争策略,学习巩固力量,以及必要的有组织的退却。掌握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的联系。

(十)朝统一战线的政权(抗日联军、国防政府)的方向发展。

国际决议提出,要力求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或反法西斯的人民战线的政府”,这种政府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但采取坚决措施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动势力。可以说,这是某种“第三种政府”。这种政府的产生,国际决议指出需要三个条件。

在中国,有两点不同。一是革命的发展不平衡,二是已经有了苏维埃,所以有可能在某些地区中首先建立这种政府。条件也是三个。这三个条件现在还没有得到。因此,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现在还未产生。它们要从斗争中得来。消极与等待是不能使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自动来到的。

三、准备大规模抗日战争与东征

苏维埃与红军要在实际行动中充分表示它们是抗日的先锋队。

(一)发展的方向,应该对着日本前进的方向。我们向华北发展,不仅因为它是矛盾的集中点,而且因为这是直接指向日本侵略军。

(二)以组织抗日斗争、抗日团体为中心任务。

(三)争取红军对日直接作战,直接对抗。这不是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而是准备这一战争的重要一步。

党的东征决定充分体现了这个方针。东征的目的是要在这一行动中进入山西,发动抗日,争取对日作战。这个方针,是使苏维埃和红军发挥抗日先锋队的作用。

现在应该特别注意于扩大红军、游击队和抗日根据地。扩大与巩固。现在应该特别着重于扩大,这是必要的。运动愈是大胆,就愈能巩固,如在狭小地区中与敌人作战,则巩固也困难。军事上

政治上都是如此。政治方面出现了新形势,是利于发展的形势,所以政治方面的要求也是如此。只喊巩固,什么行动都害怕,局促于一个地区,这是保守观点,结果并不能巩固。中央苏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土地革命与抗日斗争联系起来的方式应随环境而异。这种联系也不是公式,是要根据环境而采取的。在统一战线已建立的地方,要实行国防政府十大政纲。我们要细心的了解当地情况与群众需要。

政权是抗日政府,这正确不正确?是正确的。应该告诉群众,中心任务是抗日。

四、党内问题

为了彻底执行建立广泛的人民战线,要反对“左”的关门主义倾向。

不分析反革命派别中的各个人,视同一律,就不能有统一战线。

不用策略而只是背诵教义,就不能有统一战线。

国际决议说,“在广泛地应用统一战线策略时,右倾危险将会增长起来”。这对我党来说也是正确的。右倾主要表现在对形势估计不足,消沉的不积极的不满意的各种情绪都产生了。这与“左”倾实际上是互相联系着的。

我们要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求得党内布尔什维克的一致。

(选自《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二、共产国际与反对战争和 争取和平

争取工人阶级团结统一的纲领 (《真理报》社论)

(1935年8月6日)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代表讨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卓越报告已经第四天了。讨论的问题是全世界无产者、全体劳动人民至为关切的紧迫问题。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面临无法回避的抉择：法西斯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和平还是战争，自由还是奴役，面包还是饥饿。

只有无产阶级和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在反对统治阶级反人民阴谋的革命行动纲领的基础上组成统一战线，法西斯的进攻才能被击退，法西斯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内的胜利才能被制止。团结统一，这是时代的要求！共产党人是推动所有反法西斯力量团结的动力，他们正在努力克服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加强工会的团结，加强国际无产阶级的统一行动。

季米特洛夫同志详细地分析了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和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前提和困难。德国工人阶级的挫折和法西斯在德国取得统治地位的事实向劳动群众表明，原先德国社会民主党宣扬的和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首领现在还在宣传和奉行的阶级合作政策将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与此同时，全世界劳动群众面前有苏联这样的榜样，他们亲眼目睹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又把人们引向何方。

工人群众开始从改良主义转向同共产党人联合进行斗争。如果说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和反法西斯人民战线至今还未能有所

有国家都建立起来,那主要只是因为第二国际及其各支部的首领进行抵制的缘故。季米特洛夫同志详细地剖析了反对同共产党人建立统一战线的意见。每一个正直的工人,每一个劳动者,每一个反法西斯战士都会相信,这些反对意见是毫无根据和强词夺理的。

共产国际对于采取统一行动不提出任何条件,唯一的条件是:这种统一行动指向法西斯,反对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反对资本的进攻。

只要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共产党人承认有可能和必须成立统一战线政府,成立同人民敌人作斗争的政府。共产党人也不反对统一战线的其他形式,而唯一不可更改的条件就是:统一战线必须反对法西斯,反对战争危险,反对资本的进攻。共产党人不怕承担责任。他们要求同工人阶级的敌人作斗争。他们要求统一战线的任何一种可以接受的形式都要有助于吸引最广泛的劳动群众参加同法西斯作斗争。

共产国际公开宣称,它主张实现工人阶级的政治团结,主张在革命纲领和革命策略的基础上,在社会民主党放弃同资产阶级合作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各国共产党面临着一系列的任务,这些任务决定着它们为争取群众而斗争的实质、性质和方向。每一个党都面临着这样一个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接近群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努力在所有群众组织(不论这些群众组织是由谁建立的和为什么目的而建立的)中开展工作。

妨害扩大与巩固共产主义先锋队同广大劳动群众联系的一切障碍都必须加以清除。影响共产国际把群众吸引到自己一边来的最大障碍是宗派主义的残余和传统做法。季米特洛夫在自己的报告中正是对这一切进行了无情的抨击。

同时十分清楚,绝没有任何争取群众的现成药方和固定不变

的公式。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根据工人阶级斗争每一阶段的不断变化的特殊条件,完成这项中心任务,这就是对每一个领导人,对每一个共产主义战士提出的要求。

劳动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绝没有现成的公式和千篇一律的规格。凡是使劳动群众焦虑不安的事,共产党人都不应视为与己无关。关心劳动群众最日常的、看来最细小的利益,善于认真地倾听群众的情绪,教育群众并向群众学习,这就是当前对一个共产党人的战斗力和革命性的检验。

共产党人知道,资产阶级民主不可能有效地保证无产阶级和劳动者的任何利益。他们知道,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只有苏维埃政权能保证工人阶级摆脱剥削的枷锁,摆脱资本主义的野蛮行径。苏联的经验也证明,只有这条路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

但是,作为人民的真正朋友,共产党人反对由垄断资本的公开的恐怖专制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反对它将给劳动群众带来的新的灾祸和苦难。

客观形势有助于共产国际提出已得到群众广泛响应的口号取得胜利。人是起决定作用的。无怪乎大会对于季米特洛夫同志下面一段话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他说:现在,每一个党应当善于在阶级斗争的汹涌浪涛中游泳,而不是在岸上以观察员和记录员的身份等待好天气到来。每一个党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跟着你们走的群众在那里?能否表现出你们善于引导这些群众前进,取得他们的信任。现在,一个党政治上是否成熟,是否有力,是否取得了成就,全在于此。

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报告是战斗的行动纲领,它将在新的形势下更有力地推动共产国际的各个党面向群众,它将引导各个党走上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的康庄大道。这个纲领已经经历过战斗的检验。它一定能够实现。胜利必将取得,因为这次胜利将决定

工人阶级的未来,社会主义的未来,人类的未来。

(乌传袞译)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编》第二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争取和平(《真理报》社论)

(1935年8月19日)

共产国际是在反对战争的斗争中诞生和得到锻炼的。忠于布尔什维克传统和列宁斯大林学说的共产国际一贯告诫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说：一定要记住最近一次帝国主义战争！

煽动战争的法西斯分子举着点燃的火炬在资本主义欧洲的火药库上伺机肇事。日本帝国主义则在亚洲大陆借助武器实现其掠夺计划。非洲的战争策源地任何时候都有可能爆发，并能迅速引起又一次世界性的大屠杀。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在准备反对苏联的反革命战争。

千百万无产者和劳动群众惊恐不安地提出一个问题：上一次大战的惨祸莫非真要重现，人类莫非真要再一次被送入帝国主义的绞肉机器？！

对于这个问题，共产国际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出路是存在的。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指明了这条出路。出路就在于布尔什维克反对战争的斗争，在于把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力量团结起来，在于组织起最广泛的反对战争反对法西斯的人民战线。

埃尔科里^①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上所作的那篇在分析问题的深刻程度上十分卓越的报告，对当前国际形势作了确切的说明，也提出了各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中的任务。

^① 即陶里亚蒂，时为国际执委会委员，执委会书记。——原编译者注

罗曼罗兰在上一次世界大战中战争最为炽烈的1916年11月间曾经写道：“血在流，要把它喝下去。直到喝得大醉为止，文明世界！不过，当你喝得心满意足，当和平来临而你面对着成千上万的尸体从自己的卑劣狂热中清醒过来时，你会回心转意吗？”

德国法西斯想再次重复这种流血的狂妄。法西斯和文明是互不相容的。德国法西斯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法西斯集团使全人类面临新的灾祸和灾难。

只有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它的共产主义先锋队能够保护各国劳动人民使其免受新战争的灾难，使其摆脱腐朽的资本主义的枷锁。“只有无产阶级革命能够防止文化的毁灭，使它作为人民的文化，作为具有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的文化，达到高度繁荣的水平。这一点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我们眼前已经实现了。”(季米特洛夫)

大会代表对苏联，对我们党和人民群众的各位领袖，对警惕保卫苏维埃边界的英勇红军的暴风雨般的欢呼，大会代表对苏联和平政策的胜利表示的热烈赞许，有力地证明国际无产阶级对自己社会主义祖国的忠诚。

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引向凶残的法西斯主义，引向新的资本主义战争。共产国际的道路，列宁斯大林的布尔什维主义道路引导地球六分之一的地区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共产国际告诉全世界无产者和劳动群众说：看一看苏联的成就吧！众多的敌人反对它。他们动用枪炮、反革命破坏分子、消极怠工，企图动摇它的威力，消灭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国家。他们没能做到这一点！在列宁斯大林党的领导下，苏维埃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击退了敌人，给予他们以毁灭性的打击。苏联捍卫了千百万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获得自由、幸福、富裕生活的可能性。如果不存在苏联，人类可能早就面临着新的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了。

苏联的成就是和人民群众及优秀科学家代表的美好愿望联系

在一起的。在苏联召开的国际生物学家大会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在欢迎国际生物学家大会代表的演说中，莫洛托夫同志强调指出，“在当前，科学的利益和和平的利益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險现在已经迫在眉睫。新战争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准备正在每个人的眼前进行。某些国家的统治阶级企图通过挑起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使自己摆脱国内的困境。与这一切相抗衡的是苏联一贯坚持的和平政策，是苏维埃政权为保证普遍和平而进行的坚定斗争。苏联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特别是苏联力量的不断增强是捍卫和平的强大力量。”

求得各国人民和各民族的兄弟情谊、自由和独立，是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原则。苏联坚持不懈地为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而斗争，不断揭露帝国主义战争挑拨者的侵略阴谋。

在自己争取和平的斗争中，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依靠着苏联的不可摧毁的威力。争取和平的斗争有取得成功的一切可能性。

共产国际高举争取和平，反对法西斯和战争的旗帜。大会全体代表一致赞同埃尔科里同志在报告中提出的共产国际的中心口号——为和平而斗争。这说明，这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的口号符合资本主义国家广大群众的意愿。

野蛮的法西斯主义用沙文主义毒害群众，妄图挑起侵略战争，并借助于武器重新划分世界地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无产阶级争取和平的斗争是反对法西斯出于为帝国主义强盗行径效劳目的而煽起的野蛮战争、民族纷争和种族争执的力量。

共产国际宣称，保卫和平的最好方法是支持苏联为保证各国人民和平安全所做的努力。保卫和平的最好方法是无产阶级的团结，所有反战、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共产党人应当捍卫受到好战的德国法西斯威胁的小国的民族自由。

共产国际过去和现在都主张为反对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为

争取所有各国人民拥有完全的、自由的自决权而进行坚决的斗争。革命的无产阶级是群众在积极反抗威胁各国人民的法西斯暴行时可以依靠的唯一的进步力量。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显示了共产国际空前的思想统一和团结。兄弟的共产党提供了反战和反法西斯斗争的一系列英勇奋战的范例。

正当群众的愤怒变得日益深化,正当“发起攻击的思想在群众意识中不断成熟”之时,资产阶级加强了战争准备。

战争挑拨者想要重现 1914 年。他们忘记了,世界大战爆发二三年之后,在各交战大国的前线和后方都兴起了士兵和居民的起义。这种情景未必不会再次出现,而且时间会更快。

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以及殖民地和被压迫各国人民能够找到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和法西斯反动统治噩梦的道路。

更广泛地组织起反战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法西斯就是战争!社会主义就是各国人民间的兄弟情谊与和平!

(乌传袞译)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编》第二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6 年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言 《打倒战争》

(1935年10月7日)

各国工人和工人组织!

一切反对战争和拥护和平的人们!

不希望1914—1918年世界大战重演的各国人民!

资本主义大国,首先是英国和意大利,围绕着阿比西尼亚展开的帝国主义争斗,导致了意大利法西斯对阿比西尼亚人民的进攻。意大利飞机在轰炸阿比西尼亚的和平城镇与村庄。

英帝国主义打着关心阿比西尼亚“独立”的幌子,准备向意大利开战,以争夺阿比西尼亚。英国海军整装待发。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和英国一起要求对阿比西尼亚实行保护,似乎这是为了恢复和平。另一些国家的战争贩子则表现出狂热的积极性。法西斯德国竭力利用在非洲进行的战争,准备进攻立陶宛。德国、波兰和匈牙利在拼凑东欧侵略集团。奥地利问题再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欧洲的军事纠葛使得日本帝国主义者得以在远东放手大干,以便武装侵占中国其余领土,大肆加强对苏联的侵略活动。意大利法西斯对阿比西尼亚的战争,可能成为新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前奏。

9月25日,即军事行动开始前八天,共产国际就向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提出了共同反对战争的建议。

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对我们的建议至今没有给予肯定的答复,因为它内部矛盾重重。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中那些同本国资产阶级

结成联盟的成员,对本国统治阶级的帝国主义利益的关心,远远超过对维护和平的关心。因此,他们竭尽全力阻挠工人阶级在各个国家和国际范围内实现统一的行动。

值此千百万人性命攸关的非常严重时刻,工人阶级有权提出:不管统一战线的敌人如何反抗,我们也要为声势浩大的无产阶级团结统一的事业扫清道路。我们确信,社会主义工人国际队伍中拥护统一战线的人,必将尽一切努力设法采纳共产国际的建议。

一分钟也不能浪费!为了孤立和制裁法西斯战争罪魁祸首,一刻也不能推迟一切工人组织和各国拥护和平者实现统一的行动。

共产国际号召所有支部立即着手组织全体劳动群众,开展浩浩荡荡的反战行动。共产国际向社会主义工人及其组织和政党紧急呼吁,虽然至今仍然存在着分歧,但也要并肩反对法西斯战争贩子。共产国际号召各国工人及工人组织(不分派别)、所有反战分子、所有拥护和平者,以及不愿世界大战灾祸重演的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制止意大利法西斯发动的掠夺战争,给意大利法西斯以沉重打击,并且支持意大利人民的解放斗争。共产国际号召各国工人阶级,对本国帝国主义政府的政策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共产国际号召劳动群众防止战火向其他国家蔓延,阻止意大利—阿比西尼亚战争向新的世界大屠杀演变。

各国无产者和劳动群众!

要立即在一切企业、组织、工会、合作社、体育和文化教育机构、自治市政府和议会,即在一切地方采取统一的反战行动!要举行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其他形式的有效群众行动。要向意大利法西斯表明,你们决不容许它进行战争挑衅!要向统治阶级显示你们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的威力!

一切工人组织,首先是运输工人、铁路工人、海员、码头工人组

织,要采取统一行动,不让任何一列火车、一艘船只为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战争效劳。如果实行这项战斗措施,意大利就会陷入孤立境地,它所发动的战争就会遭到失败,而一切准备步意大利法西斯后尘的法西斯战争贩子,也将因而受到制裁。

一些在国际联盟里有代表席位的资本主义大国的政府,再次使国际联盟变得软弱无力。帝国主义列强的利己主义,妨碍国际联盟采取有效的反法西斯战争罪魁祸首的集体行动。摆脱战争灾难,取决于国际无产阶级及其组织,取决于它们是否采取强有力的联合行动。苏联是唯一一个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一贯执行和平政策的国家。它的和平政策,在国际无产阶级不断开展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争取和平的斗争中,是一个最强大的支柱。

在大难临头的时刻,共产国际号召: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任何一列火车、一艘船只都不为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的战争效劳!

孤立法西斯战争贩子!

不准侵犯阿比西尼亚人民!

打倒帝国主义战争!

苏联的和平政策万岁!

和平万岁!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载于《共产国际》杂志 1935 年

第 28—29 期第 59—60 页

(选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声明 《争取世界无产阶级行动的统一》

(1935年10月16日)

1935年9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提出了关于建立统一行动以反对意大利法西斯对阿比西尼亚人民的进攻的建议。10月7日,当战争已成为既定事实的时候,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同志以共产国际名义再次提出了这个建议。

10月12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决议,拒绝了共产国际的建议。

针对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委会的这项决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如下:

1. 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必然会使全体工人大失所望,因为他们指望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尽一切可能促成国际无产阶级行动的统一)作出决议以后,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建议会被采纳。虽然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委会会议上,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代表希望能采纳共产国际的建议,然而,由于五个政党的坚决反对,此项建议遂被否决。首先对此负有责任的是英国工党代表(科姆普顿、J·达拉斯、G·达利顿、V·吉利斯),荷兰社会民主党代表(I·V·阿尔伯特、K·福林克),瑞典社会民主党代表(策特·霍格伦、R·林德斯特列姆),丹麦社会民主党代表(V·克里斯坚先)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代表(F·索乌库普、I·斯季文、A·舍费尔)。这些人在社

会主义工人国际执委会会议上满足了反动资产阶级向那些正在谋求部长职位的社会民主党领袖提出的要求。为使资产阶级保持信任，他们牺牲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和为和平而斗争的利益。

2. 正当阿比西尼亚战争激烈进行、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和世界大战危险不断增长的时刻，这些人破坏了两个国际行动的统一，从而助长了各国战争贩子的气焰，我们要把他们的一切作为交给国际无产阶级去裁判。在这五个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压力下，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委会第三次拒绝了共产国际关于统一行动的建议，从而使最反动、最尚武的资产阶级分子得以为所欲为。1933年3月5日共产国际关于共同反对法西斯的建议^①遭到拒绝，使得法西斯恐怖在德国甚嚣尘上，没有受到制裁。1934年10月10日（阿斯土里亚斯战争期间）共产国际的建议^②未被采纳，因而在西班牙出现了大肆镇压工人群众的情况。目前，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委会的决议也是一样，它不仅会助长意大利法西斯，而且也会助长德国法西斯、日本军阀及其他战争贩子的军事侵略。

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委会顺应五个政党代表的反动意图，丝毫不谴责他们肆意违背工人阶级利益的分裂立场，这样一来，就把维护与资产阶级的联盟的反动意图置于国际工人运动的切实利益之上了。

3. 鉴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委会在自己的决议中指出，10月12日在与国际工联代表的联席会议上通过了决议，要“采取一系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1933年3月5日宣言中提出的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共同反对法西斯的具体纲领，包括下述建议：针对法西斯和反动势力对工人的政治、工会、合作社等组织的进攻，组织反击；组织对法西斯匪徒武装进攻的反击；建立联合自卫队；一致行动，反对降低工资、削减失业补助等等。

② 1934年10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向社会主义工人国际领导指出，立即共同援助战斗中的西班牙无产阶级。

列措施,以便有效地反对意大利法西斯进攻阿比西尼亚,反对欧洲战争危险”,共产国际执委会不得不遗憾地指出,根据它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委会所得到的情报资料,这些措施只不过是口头上保证支持国际联盟的和平政策,只不过是对国际联盟提出一些要求和希望而已(主要指制裁方面)。把希望寄托在国际联盟采取措施上,这实际上表明,英国工党领袖力图使国际工人运动追随英帝国政府的对外政策。然而,认为国际联盟会尽一切努力保障和平,因而人民群众可以安然坐等的想法,乃是荒唐可笑的。切勿忘记,在国际联盟内部,帝国主义国家因利益上的矛盾展开了争斗,这样一来,国际联盟就很难起到保障和平的作用。事实表明,在保卫和平上,国际联盟至今没有做出一件像样的事来,而在国际联盟内部,某些帝国主义强国却企图就瓜分阿比西尼亚达成协议。然而,即便把国际联盟当作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战争爆发的力量,那也决不意味着国际联盟的政策可以代替无产阶级的斗争。相反,为了推动国际联盟也采取某些有效的反战和消除战争危机的措施,工人以及一切真诚拥护和平的人就必须采取独自的、联合的群众性行动。

4. 此外,共产国际执委会满意地指出,赞成采纳共产国际建议的社会民主党代表的人数,较之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前几次会议时有所增加,这标志着实现无产阶级统一的思想必将取得胜利。共产国际执委会希望,那些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领导机构中主张无产阶级统一行动的社会民主党,要立即着手在本国建立或巩固统一战线,更何况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委会的决议中已授权社会民主党“自行决定它们是否愿意同本国共产党采取统一行动”。共产国际执委会责成共产党员要尽己所能来帮助完成这一刻不容缓的任务。

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在英国、荷兰、瑞典、丹麦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内部,拥护无产阶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人,

也在急速增加。这一点可以从英国工会许多领导人所采取的维护国际行动统一的行动中，从瑞典著名社会民主党人格奥尔格·勃朗廷格等人所发表的赞成采纳共产国际建议的意见中，得到证实。

由于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危险日益增长，共产国际执委会从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工人坚决要求统一的愿望出发，号召各国工人粉碎统一战线敌人的进攻，结束在反法西斯和反战斗中力量分散的局面。

根据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共产国际随时准备就统一行动问题进行谈判的声明，共产国际执委会号召各国共产党要极力争取建立统一战线，并要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队伍中一切拥护统一战线的人建立密切的合作，以便共同进行反对法西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资本进攻的斗争。

国际无产阶级伟大的统一事业万岁！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载于《共产国际》杂志 1935 年

第 31—32 期第 56—58 页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 战争危险问题的决议^①

(1936年4月1日)

1. 目前出现了自1914年以来最为严重的世界大战危险。

在日本占领满洲,意大利法西斯进攻阿比西尼亚之后,欧洲大陆上的主要战争贩子德国法西斯,把它在莱茵河上的军队一直推进到法国边境^②,从而使法国和比利时直接受到战争的威胁。德国法西斯准备消灭捷克斯洛伐克这个独立国家,吞并奥地利,占领默麦尔(现称克莱彼达)和立陶宛,并竭力使波兰卷入战争,站在自己一边,在东部建立进攻苏维埃国家的战略基地。

在远东,日本法西斯军阀竭力想成为亚洲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它一块接一块地侵占中国的领土,悄悄地把手伸向英国的殖民地印度,企图占领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准备进行一次决战,以夺取太平洋的霸权。日本军阀与德国法西斯沆瀣一气,直接威胁苏联边境,并且准备着一场反对美国和英国的战争。

存在着两个战争策源地。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战争危险问题的决议,是在1936年3月23日—4月1日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通过的。会议期间发言的有季米特洛夫、曼努伊尔斯基、多列士、陶里亚蒂、哥特瓦尔德、皮克、波立特和连斯基等人。

② 莱茵河不设防地区,包括莱茵河左、右两岸的德国领土。根据1919年凡尔赛和约,德国不得在此地区驻扎军队。破坏不设防地区的规定,应视为对凡尔赛和约签订国的敌对行动。希特勒政府于1936年3月7日重新武装莱茵河地区,这是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步骤。

由此可见,西方与东方的战争贩子竭尽一切可能支持对方的侵略计划,威逼世界各国卷入残酷的、毁灭性的战争。

法西斯主义通过反对本国人民群众的內战,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现在又用战争直接威胁世界各国的安全。它在奴役本国人民之后,正举着战争火把向其他国家的人民发起进攻。因此,制裁法西斯战争罪魁祸首,维护和平,乃是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现时的中心任务。反法西斯斗争的成败,取决于人民群众目前开展的反对法西斯军事侵略的运动规模。为了维护和平,无产阶级不仅要保卫各国人民,即全人类的利益,而且要加速法西斯的失败,保证自己的彻底胜利。

各国共产党要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为指针,发挥最大限度的主动性和刚毅精神,要考虑到本国工人运动的具体条件和情况,找出胜利完成国际无产阶级这项中心任务的必要途径和方法。

2. 帝国主义体系种种矛盾的尖锐化,使得战争危险日益增大,战争已迫在眉睫,其原因如下:没有及时阻止德国法西斯上台;德国法西斯的战争准备(实行全国义务兵役制、装备空军与海军)是在资本主义大国的纵容和英国政府的直接帮助下进行的;英帝国主义者暗地里赞助德国法西斯的侵略野心;国际联盟对日本进攻中国和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抱消极、动摇态度,从而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使其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然而,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阀之所以进一步加紧侵略,首先是由于国际工人阶级未能粉碎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工会联合会的反动领袖们的抵制行动,因为他们反对建立统一战线以对付战争罪魁祸首^①。

^① 指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领袖拒绝共产国际执委会在1935年9月25日和10月7日文件中提出的建立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统一战线的建议。

第二国际的反动领袖们,支持本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政策,不赞成无产阶级采取独自的反战联合行动,而且,群众对国际联盟抱有幻想,认为它会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来维护和平,这一切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反战运动,并减轻了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政府的压力。

3. 人民不要战争,人民渴望和平。建立反对战争罪魁祸首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法国和西班牙无产阶级的经验表明,无产阶级若能以自身的团结争取其他阶层的劳动群众去反对法西斯主义,那么,是可以阻止法西斯发动新的战争的。假如无产阶级能在本国和国际范围内建立起强大的和平统一战线,那么,也是可以制止战争贩子的行动和维护和平的。

“现在起来维护和平的,不仅是工人阶级、农民和其他劳动者,而且,还有被压迫民族和弱小民族,因为新的战争威胁着它们的独立。甚至个别资本主义大国,由于害怕重新瓜分世界会损害它们的利益,在现阶段也希望摆脱战争……现在,世界无产阶级在反战斗争中不仅像1914年那样拥有群众性行动这个武器……而且还有苏联的国家影响……因此,可以由工人阶级、一切劳动者和各国人民结成一条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危险的战线……法西斯、帝国主义战争贩子能否在最近燃起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烈火,或者他们的毒手能否被强有力的反战阵线的利斧所砍断,将取决于这条和平战线能否建成和它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无产阶级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成为这种和平战线的组织者和动力,才能尽一切可能把维护和平的斗争开展起来。无产阶级只有联合起来,才能使人民群众在各国反对战争罪魁祸首及其走狗与帮凶的斗争中,粉碎法西斯侵略者的力量,迫使资本主义政府采取维护和平的措施。

当前各国共产党在本国社会与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开展最积极、最顽强、最广泛的维护和平的运动，是国际无产阶级反对战争贩子的统一行动中的决定性步骤。共产党人应当开展这一运动，不要等待与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签订共同行动公约之后才进行，但是，这个运动一定要在争取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统一行动的口号下进行。共产党人要尽一切努力战胜社会民主党反动领袖对统一战线的抵制，要尽一切可能巩固各地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在联合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建立的关系。这种运动会有力地促进两党工人的接触，会吸引广大社会民主党群众参加维护和平的斗争，因而不仅在本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能使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活跃起来，变得更加团结。而无产阶级统一战线运动的发展，将有力地推动城乡其他劳动者阶层、小资产阶级群众、农民、知识分子以及一切拥护和平的人投身到运动中去。这一切必将使各国人民迅速组成坚不可摧的反对战争罪魁祸首的战线。

4. 为使工人与广大人民群众能够通过统一行动真正顺利地进行维护和平的斗争，各国必须把锋芒指向国际舞台上直接的战争罪魁祸首和国内直接或间接帮助他们的那些力量。因此，各国共产党应具体制定自己的维护和平的策略路线。例如，在英国，共产党人就要坚决反对英国政府赞助希特勒制度及其侵略行径的政策（借款、海军协定、妥协性勾当）。在法国，共产党人既要反对希特勒的入侵威胁，又要集中火力打击本国的希特勒走狗与帮凶，并且动员群众起来反对法国政府打算牺牲法国人民及其他各国人民的利益与独立，来接受德国侵略者的要求。在美国，共产党人要揭露那种以中立口号为掩护，实际上赞助战争罪魁祸首的政策。他们要求政府支持一切旨在反对战争罪魁祸首和维护和平的措施。在波兰，共产党人要坚决主张废除波德军事同盟，因为这个军事同盟会使波兰卷入战争、遭到瓜分，

会使波兰人民遭受民族压迫^①。共产党人要极力促使波兰同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签订安全条约。

而那些直接遭到法西斯战争贩子侵略威胁的国家的共产党人,则要把保卫祖国的问题同扩大工农民主权利和维护其切身利益的要求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其出发点是:只有制度民主化,军队民主化,把法西斯分子及其他反动分子从军队里清除出去,满足工农群众的迫切要求,才能加强人民抵御法西斯进攻的能力。共产党人是积极保卫本国人民和祖国免遭法西斯奴役的忠诚战士,他们不能不关心反对侵略者、保卫祖国的问题。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始终是以工人阶级的利益和真正保卫祖国与人民为依据的。共产党人在每个具体情况下,都要拥护和设法实行那些能使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的对外政策施加压力的建议和措施,这也正是对政府在国防问题上的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再者,共产党人要赞成一切阻碍资产阶级政府投降法西斯侵略者、出卖国家独立和人民自由的措施。要经常强调,只有无产阶级政权才能保证可靠的国防和国家的独立,因而,在遭受法西斯侵略者直接威胁的情况下,共产党人要力争建立一个人民阵线政府,以便对国内的法西斯和反动分子、对战争罪魁祸首的走狗和帮凶采取坚决的措施,使有组织的群众得以对国防实行监督,从而帮助人民提高防御法西斯侵略者的能力。当前是资产阶级政府执政,它不会保证真正维护国家的利益,它要利用国家的武装力量来对付劳动人民,因而,共产党人对这种政府的防卫措施不能负任何政治上的责任。所以,共产党人要反对政府的战争政策和全部军事预算。但这并不

^① 波兰—德国合作协定,于1934年1月26日在柏林签订,为期十四年。苏联曾指出,这个条约既危及波兰本身的安全,也危及欧洲的普遍和平。希特勒德国利用1934年波德协定巩固了自己的国际地位,破坏了集体安全政策,掩盖了它在进行的侵略准备。1939年4月,德国宣告废除波德协定,并于1939年9月1日进攻波兰。

排除共产党人在某些具体情况下,对那些阻止侵略者进攻的防御性措施(例如,巩固边防)投弃权票,以及对那些旨在保卫居民免遭战争涂炭的措施(防毒掩蔽部、防护面具、医疗救护等等)投赞成票。

在法西斯战争罪魁祸首掌权的国家里,共产党人在群众反法西斯独裁的斗争中,要着重地揭露沙文主义的蛊惑宣传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战争准备,并要动员一切力量防止法西斯把人民投入战争灾难。

全力支持法西斯国家的人民群众(尤其是德国人民)为摆脱法西斯独裁、为防止法西斯对其他国家人民的军事侵略而进行的艰苦斗争,乃是国际无产阶级和一切拥护和平者的神圣职责。德国、意大利等法西斯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为反对法西斯统治及其军事侵略而斗争,这不仅是为了自救,而且是为了维护和平,为了各国人民和全人类的利益而进行的斗争。

5. 法西斯利用某些国家工人阶级的政党和组织的不同立场而发动军事进攻;社会民主党反动领袖在关心“维护和平事业”的虚伪言词的掩饰下支持法西斯;他们在无产阶级内部制造隔阂,以至于为维护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损害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所有这一切,迫切要求各国工人运动实行一项统一的国际工人阶级政策,以利于维护和平。

这个统一的国际工人阶级政策要求:

(1)恢复与巩固国际无产阶级的真正团结,以维护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使社会民主党坚决背弃本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利益。

(2)全力支持坚决保卫各国人民和平相处的无产阶级国家苏联的和平政策。这就首先要求工人政党坚决反对反动派的图谋,因为他们企图把苏联的对外政策同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混为一谈,把作为和平支柱的苏联红军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混为一谈,这种图谋只对法西斯战争贩子有利。

(3)当前要集中力量打击法西斯侵略者,揭露任何抹煞法西斯国家与非法西斯国家之间的区别的企图,要把侵略者一方与遭受侵略者进攻的另一方区别开来。

(4)无产阶级维护和平的斗争是独立进行的,既不受资本主义政府控制,也不受国际联盟支配。那些加入国际联盟的帝国主义政府在幕后操纵的工人运动,不在此列。

6. 共产党人要针对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工会联合会的伦敦会议决议,表明自己开展联合斗争的决心,以争取普遍签订互助与安全条约(包括苏联在内)、裁减军备,并采取反对战争罪魁祸首的有效措施。要知道,共产党人不能对下述事实置之不理:由于内部矛盾而陷入四分五裂的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工会联合会伦敦会议^①,在反动右翼的逼攻下作出退让,避而不谈无产阶级必须尽快在国内和国际上采取统一行动的问题;会议没有号召工人群众按自己的口号进行独立的活动,而只号召他们支持国际联盟的政策;会议没有表示要保卫遭受日本进攻的中国;会议丝毫也没有谴责那些为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政策辩护、用“维护和平”的花言巧语来掩饰自己对希特勒奴颜婢膝的工党分子和社会民主党领袖。

7. 要在国内和国际上建立和平统一战线,就必须批判英国工党领袖以及斯堪的纳维亚等国的社会民主党领袖的立场,因为他们主张采纳希特勒提出的同西方各国签订条约的假和平建议,并借以为德国军队开到法国边境和德国法西斯的进一步侵略计划辩护。共产党人应向群众指明,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人曾以自己的投降政策为法西斯扫清道路,同样地,那些今天维护希特勒

^① 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联席会议于1936年3月19—20日在伦敦召开。会议发起人是英国工党和英国职工大会,议题是讨论法西斯德国把军队开进莱茵河不设防地区所造成的后果。会议通过的宣言谴责了希特勒政府的这一行动,指出两个国际都主张建立集体安全体系。但是,宣言中没有制定具体的反法西斯和反战争的措施,把主要希望寄托在国际联盟身上。

方针的人，在对外政策方面打着虚伪的和平主义旗号，现在不断巩固德国法西斯的阵地，他们实际上在帮助德国法西斯实现其侵略目的，在欺骗群众，使群众对日益逼近的战争危险丧失警惕性。

8. 必须进一步告诫无产阶级，首先是告诫共产党人，要提防社会民主党的反动领袖目前可能企图提出重新分配原料产地、殖民地和托管地的问题，这是一种牵制性的破坏行为，其目的在于转移群众对反对战争贩子的具体斗争的注意力。

其实，提出这个问题的背后意图是，把殖民地分给德国法西斯，这样一来就必然会进一步加强德国法西斯的军事地位。无产阶级决不赞成这种或那种为帝国主义者分配殖民地或殖民地托管权的主张；无产阶级的任务是支持殖民地人民为自身的利益与权利、为彻底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而进行的斗争。尤其是今天，无产阶级、一切工人政党、首先是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坚决保卫中国人民，因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卫国斗争，不仅是他们求得自身解放的神圣职责，而且是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反对战争罪魁祸首、维护和平的世界统一战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

9. 共产党人要争取广大群众参加维护和平的运动，同时要在他们当中不断进行宣传工作，以揭露那些右的与“左”的改良主义者的虚伪的和平主义。这伙人大谈特谈和平问题，利用种种口实千方百计地破坏反对新的世界大战真正罪犯的斗争。对这些可卑的和平主义者为此目的而提出的种种论点，必须通过雄辩有力的、原则上正确的论证加以分析，并要耐心地向群众说明事情的真相，尤其重要的是揭露假和平主义者的下列论据：

(1) 一些人人为希特勒政府辩护说：“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要战争”（英国工党领袖埃特利）；另一些人（例如，英国独立工党领袖）则断言，各国政府都要承担准备这场战争的责任。他们甚至引用列宁在1914—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期间说过的话。列宁当时十分正确地驳斥了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这一论据——“我们自卫，是因为我

们遭到侵犯”。那时,世界分为两个帝国主义军事同盟,它们都力图建立自己的世界霸权,都在准备和挑起一场帝国主义战争。那时还没有一个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国家,没有一个法西斯专政的国家。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现在已有这样几种国家:第一种是无产阶级国家——最大的和平堡垒;第二种是明目张胆的法西斯侵略者(德国、意大利、日本);第三种是一系列直接遭受法西斯侵略者进攻威胁,并有丧失国家与民族独立危险的国家(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等等);第四种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法国、美国等等),它们目前对维护和平事业表示关注。因此,现在把所有国家都说成是侵略者,那是完全错误的。只有那些想庇护真正侵略者的人,才会歪曲事实的真相。

(2)另一种说法是:“既然我们拥护建立普遍的和平,那我们就应该也同希特勒德国就和平问题进行谈判。”然而,希特勒政府并不要和平,它疯狂地准备对一些国家发动战争,它想同另外一些国家的政府进行谈判的是战争问题,而不是和平问题。为了维护和平,必须对希特勒政府的侵略行径加以阻止和制裁,而不要私下里和它勾勾搭搭,为虎作伥,从而纵虎为患。

(3)这些人的论调是:“我们主张和希特勒签订条约,我们反对制裁,因为制裁会增加战争危险,会导致战争。”恰恰相反,纵容侵略者才会增加战争危险。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参加集体安全条约者越多,在人民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它们在赞同真正实行集体安全措施方面表现得越齐心、越坚决,则德国法西斯发动战争的决心就越小,因为这样做,它就要冒更大的风险。

(4)最后,有些人提出“中立”的论点:“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声明,我们既不介入战争,也不参与对德国的对外政策的制裁和抵制,我国将奉行这一原则来防备战争”。然而,这个决定也是错误的。战争威胁着每个国家的安全,因为在目前帝国主义矛盾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法西斯侵略者所发动的战争不可能是局部战争,它

必定会发展成为一场世界性的大屠杀，中立的立场是对侵略者的姑息与纵容。而坚持中立立场的国家也决不可能摆脱战争危险。能够拯救世界和平的，只有各国人民反侵略的国际战线，而不是向战争罪魁祸首投降。因此，必须使各国劳动者坚决表明：“我们将始终站在遭受法西斯进攻的人民一边。”法西斯侵略者必定会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将起来反对他们。

10. 共产党人要始终如一地拥护和平。作为拥护和平者，他们赞成一切能够促进和平和打击侵略者的措施。制裁是一种反对侵略者、反对想破坏和平的人的有效手段。所以，共产党人既要坚持无产阶级独自开展维护和平的斗争，又要始终拥护国际联盟和某些国家真正维护和平的措施（互不侵犯条约、反侵略互助条约、集体安全条约、财经制裁条约）。因此，共产党人要向群众无情地揭露国际联盟的动摇态度，尤其要加紧反对那些出于自私自利目的而帮助侵略者破坏维护和平的措施，靠损害小国人民的利益来满足帝国主义大国利益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劳动群众的利益，必须坚决要求资本主义政府采取维护和平的有效措施，并坚决反对国内妨碍实行这些措施的势力。

谁要和平，谁就要反对法西斯。在财政、经济上坚决实行制裁（完全拒绝贷款、停止贸易和提供原料），不仅能给法西斯制度造成严重的困难，而且必然有助于德国人民摆脱法西斯制度的压迫。和平局面是对法西斯的致命打击，因为这将增加它的内部困难，并导致法西斯制度的覆灭，而法西斯制度的覆灭必定会巩固和平事业。

今天德国法西斯之所以向全世界人民挑衅，就是由于它有恃无恐，因为没有对日本实行制裁，因为对意大利的制裁遭到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破坏，因为德国法西斯往法国和比利时边境派遣军队时，预先就断定英国资产阶级会阻挠对它的制裁。

11. 尽快在各国和在国际范围内实现工会的统一，这对实现

国际无产阶级反战统一行动具有重大的决定性意义。假如西班牙劳工总联合会^①,尤其是法国总工会能主动开展促进国际工会统一的广泛运动,能主动与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会建立直接的联系,能主动动员全世界的工会共同反对战争贩子的话,那么,它们在这方面对劳动群众的贡献就会更大。

12. 为了开展一场反战运动,共产党要号召劳动群众进行坚决的斗争,以反对欧洲的战争贩子希特勒的政府,全面支持德国人民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把日本占领军驱逐出中国,争取建立一个民主的日本;把意大利侵略者从阿比西尼亚赶出去,把意大利人民从法西斯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争取建立工人、农民以及一切拥护和平者的反对战争罪魁祸首的国际战线。

※ ※ ※

“战争有可能骤然爆发。现在的战争是不宣而战。战争确实在发动之中。”(斯大林语)这就要求共产党人首先要认清战争危险的程度及其性质,使各个党组织明确维护和平的斗争方向,向党员群众说明本决议的基本原则,动员全党自上而下地正确执行本决议的指示和方针;要动员非党积极分子把我们的影响带到群众中去;要巧妙地组织宣传鼓动,不给敌人以任何可乘之机;企业、工会和各群众团体中的共产党人,要经常不断地大力开展宣传鼓动与组织工作;要大胆主动地选择适合本国工人运动具体情况的斗争形式。必须在议会和自治市政府中揭露和反对战争贩子及其帮凶的每个动向。必须吸引青年一代和广大妇女群众参加反战运动。共产党的报刊每天都要用具体事例来提高群众的警惕性,使他们

^① 劳工总联合会于1888年创立。这个工会联合会受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1935年,会员约五十万人;西班牙民族革命战争期间,会员接近二百万人,曾加入人民阵线。1939年佛朗哥建立独裁政权后被取缔。

的愤怒指向那些靠供应侵略者军火而发财致富的战争投机商和军火商。

共产党人要通过互换工人代表团和人民集会演讲员的办法，使反战运动具有尽可能广泛的国际性。必须使一切国际组织齐心协力地为反对法西斯、反对战争、争取和平而斗争。必须使无产阶级重视对外政策问题，并把对外政策问题与国内生活和本国工人运动的迫切问题结合起来。必须在今年五一节组织一次广大人民群众争取和平、争取自由、争取面包、争取社会主义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载于《共产党人》杂志 1969 年
第 2 期，第 3—11 页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 国际和平代表大会总结的决议^①

(1936年9月9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听取了什维尔尼克和什麦拉里同志关于布鲁塞尔国际和平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对国际争取和平运动的重大发展和代表大会的圆满结果表示满意。

战争危险迫在眉睫,法西斯的军备和武装挑衅日甚一日,法西斯干涉西班牙,法西斯进攻阿比西尼亚,法西斯重新武装莱茵河区,日本侵占上海,建立法西斯战争集团的趋势日益增长,凡此种种,使一切一贯维护和平者的保卫和平的任务成了直接具体的日常斗争任务。

争取和平和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斗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是团结广大的和平力量,并建立一个常设世界中心来协调它们的行动:把工人阶级与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并尽可能把那些一向拥护国际争取和平运动四项原则(遵守条约、限制军备、保障集体安全、巩固国际联盟)的资产阶级民主力量、和平主义力量,甚至是非民主派的反战力量组织起来。布鲁塞尔国际和平代表大会,应像为准备这次大会而发起的运动一样,成为广泛聚集保卫和平力量的开端。

① 国际和平代表大会于1936年9月3日—6日在布鲁塞尔召开。各种反战代表:共产党人、左派社会党人、和平主义者和保守分子参加了代表大会。大会成立了全世界争取和平联合会,选出了总理事会、执行委员会和书记处。大会提出了广大居民阶层和保卫和平运动各派别所能接受的争取和平运动的纲领。但是,在大会的决议中并没有具体点出法西斯战争贩子的名字。

要把那些能利用其直接的国家影响促进和平事业的政治集团及个人吸收到维护四项原则的斗争中来,使争取和平的群众性运动和群众性示威游行同这些集团及个人的行动相配合,以阻挠法西斯军事侵略计划的实现。

布鲁塞尔国际和平代表大会在这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积极的成果:

1. 大会具有群众性,大多数代表是经过正式选举产生的;而选举大会代表的运动本身,又多半与报刊、集会和群众大会上的群众性运动有连带关系,这就使得大会成为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意志的一次大检阅。

2. 大会成立了一个协调和平力量行动的常设国际机关。

3. 大会把那些过去曾经反对运动纲领和拒绝参与运动的集团及组织吸引到运动中来,以便为实现运动的四项原则而斗争(在美国、英国、奥地利、保加利亚和波兰部分地区等等)。

4. 大会使和平运动在波兰、奥地利等国(法西斯大国企图变这些国家为它们的帮凶或附庸)有了发展。

5. 大会使运动真正具有世界性。以前一直没有与欧洲和平团体采取共同行动的美国一些大的和平团体,以及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印度等国)的代表们,都被吸收参加了运动。

6. 虽然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执行局没有派正式代表出席大会,但大会仍然吸收了大多数工会组织和许多国家的社会党参加。

7. 在大会过程中(尤其是在各委员会里)建立了一系列新的联系,以便在一些国家里争取建立广泛的拥护和平者阵线,从而为顺利举行各个国家争取和平运动大会创造了先决条件。

8. 大会的结果,争取和平的运动真正形成了。大多数组织以前只是形式上参加运动,而现在成了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宣传者。

大会的这些成果,必将有利于和平事业,必将阻碍法西斯军事

侵略计划的实现,必将进一步大大巩固国际和国内的和平运动,使得国际争取和平运动变成一种巩固国际联盟和集体安全的有效的社会斗争手段。

一切一贯拥护和平的人们,为了实现争取和平的这些重大任务,应设法采取下列直接的实际措施:

1. 要进一步扩大和平运动,普遍建立和平委员会,争取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各个支部参加和平运动,争取天主教团体和 ФИДАК^① 的退伍军人协会回到运动中来,争取那些没有出席大会或者仅以观察员身份列席大会的国际组织与国内团体(国际合作同盟、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英国工会总理事会、美国劳联等等)参加和平运动。

2. 要顺利召开各国争取和平运动的代表大会,精心做好大会的准备工作,制定一条适合本国具体情况的政治路线。对于那些在建立庞大和平团体、开展全民投票运动^②及其他类似运动方面具有重要经验的国家(例如英国),建议第一阶段就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3. 要认定争取和平运动的四项原则是本国代表大会的基本纲领。在直接遭受侵略者进攻威胁的国家里,那些始终不渝地为和平而斗争的勇士,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尖锐地具体点出侵略者来,而且决不要对运动的范围作任何限制。

4. 要大力加强各国和平委员会的工作,尚未成立本国和平委员会的地方,要尽快成立;吸收本国一切重要的和平团体的代表为本国和平委员会的成员;加强各国和平委员会与国际争取和平运

① ФИДАК 是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退伍军人协会的国际性联合组织。

② 1934年底,和平主义者组织《国际联盟协会》及其他一些社会团体在英国组织了争取和平全民投票运动。1935年6月公布了投票结果。虽然政府、保守党和反动报刊反对这个运动,但绝大多数参加者拥护集体安全、裁减军备和有效地制裁侵略者。

动总理事会的联系。

5. 要根据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一些委员会的决议,成立常设的各专业国际协调中心,在总理事会下面设立专门机构领导此项工作、组织国际经验交流和加强那些尚未决定建立这种常设机构的部门的国际联系(例如议员们的联系),以免代表大会各委员会的工作落空。

6. 必须积极吸收各种政治倾向的工会参加和平运动(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设法使它们在本国和平运动委员会和工会国际组织中、在总理事会有常任代表,还要保证总理事会派往美国的代表团中有工会的代表。

7. 要吸收广大妇女群众参加和平运动,这对胜利进行反战斗争至关重要;尤其要吸收现有的各种妇女和平团体、和平主义者同盟、基督教妇女团体等参加运动。

8. 各国要按章程规定派出全权代表来加强总理事会;要贯彻执行总理事会关于书记处组织机构的决定,以加强总理事会书记处。

9. 要通过本国和平委员会和国际和平运动机构,同一切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团体及其他团体建立广泛的联系,因为这些团体一直未能积极协助本国和平运动委员会开展工作(例如,国际联盟拥护和平者协会、退伍军人团体、各种宗教团体等等)。

10. 要进一步吸收殖民地各国人民的代表参加国际争取和平运动,使他们能与欧美和平团体一起,共同为实现运动的四项原则、反对法西斯侵略者(法西斯侵略者准备对所谓低劣人种的殖民地人民实行新的掠夺)而斗争。

11. 要开展争取和平的全民投票运动,必须注意做好这一运动的准备工作,尤其在法西斯影响较深的国家里,更是如此;要使全民投票运动成为一个长期性的运动,要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吸引到运动中来,使全民投票运动成为浩浩荡荡的争取和平、反

对侵略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为在国际上举行全民投票运动打下基础。

12. 要保证大会所议决的一切国际和平运动(国际和平日、“和平戈比”运动、巴黎国际展览会上的和平馆等等)获得成功;要在国际范围内贯彻执行那些能动员群众起来捍卫和平的布鲁塞尔大会各委员会的决议;要在报刊上广为宣传国际争取和平运动;要尽快安排几批国际知名和平人士到欧美各国进行巡回讲演与宣传。

译自《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反法西斯反战斗争》,莫斯科1975年版,第444—448页。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三、共产国际与中共成立 15周年纪念

十三年来的中国共产党*

(1934 年 11 月)

王 明

在共产国际成立 15 周年纪念的时候,在我们伟大领袖列宁逝世 10 周年纪念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列宁主义共产国际的最好的、最有力量的、党员人数最多的和最有战斗能力的支部之一了。中国共产党是联共(布尔塞维克)以外的第二个政党,这个政党胜利地领导着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

中国布尔塞维克底党,在斯大林同志为首的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领导之下,从成立到现在这 13 年期间,已经使苏维埃革命在中国得到部分胜利,在中国六分之一的领土内,已经建立了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

在这个比较短促的时期内,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使自己队伍达到布尔塞维克化,列宁主义为什么在中国能够得到胜利呢?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达到布尔塞维克化,首先就是因为它学习了联共(布尔塞维克)底经验,经常不断地为列宁主义总路线而斗争,它用列宁主义底精神争取党内思想上的一致和组织上的统一,它用斗争的方法去克服党内的总分歧。

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发展上有一个优点,就是它一开始就是在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领导之下,它一开始就能应用布尔塞维克党的胜利经验。

* 又名《中共布尔塞维主义化的道路和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在先进的工人和知识分子中产生(1919年)共产主义运动不久之后,个别的共产主义小组,在1920年年底,经过共产国际执委远东书记处代表,便已经与共产国际建立了直接的组织上的联系。1921年7月在上海所召集的各种共产主义小组和集团(即在中国几个最大的中心城市——在上海本市,在北京,在广州,在长沙,以及国外,如在法国等地已经存在的共产主义小组和集团)底第一次代表大会,便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集中组织和正式形成底基础。不久,在1922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便正式成为共产国际底中国支部了。

(一)

中国共产党发展底第一个时期,包括从中国共产党产生到变为真正群众政党的时期。就是说,从1919年到1925年五卅事变这个时期。这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唯一政党——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逐渐形成和巩固的时期,这是革命高涨开始的时期,或者更正确些说,是革命力量准备作当前决战而预先总动员底时期。

当时中国政治状况是怎样呢?

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一方面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胜利底影响,另一方面受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完全奴役全中国(日本在1915年要中国接受著名的“二十一条”要求)底影响,受美、日、英和其它帝国主义列强划分中国势力范围(即所谓“华盛顿的九国条约”)底影响,以及受世界帝国主义大战时期中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影响。由于这些原因,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很快地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两个新的重要因素了。

中国广大民众一批一批地被吸入反军阀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1919年5月4日由北京学生所发动的著名的反日和反军阀的五四运动,不仅在全国的学生和智识界中,而且在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中,都得到了广大的响应。

由北京学生和大学教授等发起的反封建和反孔教的“文化革命”运动，以及他们所号召的“到民间去”的运动，迅速地传布到全中国。著名的反帝国主义的香港罢工（1919年4月至1921年正月），工会组织和工人中共产主义小组底发展，京汉铁路工人争取工人阶级结社自由的英勇的政治总罢工，武汉、广州和其他各城市工人举行许多大罢工和示威游行，京汉路工人与吴佩孚军队和宪兵的流血冲突（著名的1923年的二七事件），上海、青岛和其它各城市日益增长的罢工浪潮，——所有这些事实，无疑义地证明工人阶级在政治斗争中的积极性和作用日益增长，所有这些事实都证明工人阶级日益走上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斗争底前哨。

1920年，是共产主义集团和小组蓬勃发展底一年，是为按俄国布尔塞维克党形式来建立共产党而进行初步原则斗争底一年。在这个时期，共产主义集团底内部，关于基本的原则问题进行了斗争：赞成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赞成或反对集中的和有纪律的政党。斗争的结果，与无政府主义底共产主义者发生了组织上的分裂，并把他们（以及自由派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张东荪之流等）驱出共产主义组织底队伍之外。这样便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形成底基础，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正式形成了。

1921年，主要地是共产党形成和进行严重的原则斗争反对“公开马克思主义”和孟塞维主义的一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成立大会上（1921年7月），关于党和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斗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或是主张资产阶级民主制，主张建立战斗的工人政党和建立职工会或是建立宣传员、学生、大学教授底政党及和平研究马克思主义底理论，主张秘密的铁一般的革命职业家底政党或是主张与军阀统治和平共居的党。

这种斗争底结果，党便开除了那些暂时附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戴季陶，不久又有陈公博）——民族资产阶级底思想家。这是党走向布尔塞维克化道路上的第一步。

1922年,是中国共产党从宣传工作进到群众的革命鼓动和革命活动的初步尝试底一年。1922年举行的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意义,正是在于它着重地指出了半殖民地中国反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斗争底一切伟大意义,并责成党要积极参加这种群众的革命斗争,同时要获得无产阶级在这一斗争中的领导权。

1923年,是党在基本上拟定了党在革命的主要政纲原则底一年,是党决定了无产阶级先锋队对各阶级和各阶层底策略关系,以及对孙中山国民党底关系底一年。我们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基本政治立场,在1923年召集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根据共产国际执委底指令拟定了。

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拟定对国民党的策略关系时,是以共产国际执委下列的指令为根据:

“只要国民党进行着客观上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便在民族革命战线上底一切运动中帮助国民党,但同时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不应与国民党合并,无论如何不应隐藏自己特殊的旗帜。”

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也预先料到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员,对于民族统一战线底策略,会有不正确的解释和了解;因此,它对于反帝国主义民族革命和工农的阶级斗争间相互关系的问题曾给以明确的阐明,它曾着重指出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特别的重要性,它曾着重指出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对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曾给了以下的指令:

“(一)中国的民族革命和反帝国主义战线底建立,将必然同时发生农民反封建残余的土地革命。只有能够吸引中国人民底基本群众——小农——参加运动,这个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二)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为全部政策底中心问题。无论根据什么理由来摆脱这个基本要点——这就是不懂得社会经济基础底全部重要性,然而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进行胜利的斗争,去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去彻底消灭中国的封建残余”。

中同共产党执行了共产国际关于在反帝斗争中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关于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革命合作的指令。同时,它又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去反对个别共产党员在这个问题上所曾表现的右倾和“左”倾。对民族资产阶级投降的右倾分子,曾企图在反帝斗争中利用无产阶级来谋自己的利益,他们曾把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和联盟这个任务,了解为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并,并曾提议共产党把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以及工人组织的一切领导,交给国民党。“左”倾分子则否认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必要。他们借“左”的词句为饰掩,实际上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脱离当时扩展起来的广大民众底反帝运动,这在实际上就是取消无产阶级在民族统一革命战线的阶段上在反帝革命中的领导作用。

正因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拥护共产国际列宁主义的路线和实行这个路线,所以我们的党(在产生之后不久)便在 1923 年著名的京汉路二七事变中,在与国民党的谈判和国共合作中,在国民党改组和召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1924 年在广州举行),已经成为公认的、中国无产阶级唯一的独立的政党了。

在 1925 年革命前夜召集的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曾继续进行了斗争,去反对个别的党工作人员,尤其是党领导者(例如陈独秀等等),对于中国民族统一战线革命真正的性质,对于党一些最重要任务和反帝运动及革命群众斗争底扩展,对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正确关系等等问题的“左”右倾向。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党在 1925 年上海的五卅事变中,才能立即站上正确的立场并成为革命民众底首领。

(二)

中国共产党发展底第二个时期,是从 1925 年五卅事件起,到 1927 年 12 月 11 日广州公社止。这是中国 1925 到 1927 年革命的时期,这是中国共产党从小的政党变为大的群众政党的时期,这

是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从希望变成事实的时期。大家都知道,中国1925到1927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基本上曾经经过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阶级力量重新配合,每个阶段上中国共产党策略都有一定的改变。

第一个阶段——这是所谓广州阶段,这个阶段是从著名的省港罢工和1925年11月30日广州国民革命政府成立起,到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举行反革命政变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的这个阶段上,中国政治状况决断的和基本的特点,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基本的特点,就是民族统一的革命战线。工人和农民底革命运动,在这个时期虽然也发展了,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完全扩展起来。因此,民族资产阶级,主要的是工业资产阶级,还与革命一同走,还留在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联盟之内,与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一块。可是,同时革命与民族资产阶级利益间的矛盾,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在争取领导权斗争中的矛盾,却日益加厉起来了。

究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这个阶段上的基本任务和策略立场应当是怎样呢?基本任务和立场就在于:“必须实行使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的这个路线”,“来使民族资产阶级底代表(右派)孤立起来,利用他们来谋革命底利益,推动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左派)向左走,把农民和城市贫民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斯大林:《论反对派》,第622页)。

共产国际执委当时正是根据这种立场给中国共产党指令。

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运动,在这个时期的运动中,达到了很大的成绩。主要的成绩可以归纳以下几点:因为国民革命军北伐大胜利,革命领土就从广州扩大到扬子江流域;因为在国民革命军占领的一切领土内,工农团体可以公开组织和存在,开始广大的组织无产阶级(工会,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等等)和农民(农民协会);共产党员加入军队等等。正是在革命这种胜利发展的基础

上,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在这个短期间内,从小的共产主义体团体(在1925年五卅事变以前,全国总共有900共产党员)变为真正的拥有数千党员的政党。

第二个阶段,这是所谓武汉阶段,这个阶段是从蒋介石公开投到反革命方面起,到武汉政府叛变和1927年8月1号贺龙、叶挺南昌起义止。在革命这个阶段上,中国政治状况的基本特点究竟是什么?基本的特点就在于:从民族的联合战线革命开始转变到千百万工农群众底革命,转变到土地革命,而土地革命则加强和扩大反帝国主义、反豪绅封建地主、反军阀和反蒋介石反革命派底斗争。在这个阶段上,蒋介石和民族资产阶级投到了反革命底营垒,革命运动底中心从广州移到武汉,而无产阶级底同盟者是农民、城市贫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这个阶段上的基本任务和策略路线究竟是什么?

这个任务和路线,就是在于工农和小资产阶级联盟,进行坚决和无情的斗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张作霖的联盟,以及反对蒋介石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共产党应利用武汉的根据地,来组织和动员群众去反对反革命,“以便推动它(即武汉的国民党——王明注)向左走,并把它变为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底核心”(见斯大林:《论反对派》,第623页)。

共产国际执委当时正是本着这种立场给中国共产党指令。

在这个短期间内,虽然党底领导有很大的机会主义错误,但因为下级党的组织和党员群众进行了英勇艰苦的斗争,所以中国共产党还能获得很大的成绩。在这个时期内,共产党从五六千党员的政党,发展为大的真正群众的政党,并获得了在革命中公开组织工农群众的可能,职工会发展成了巨大的群众组织,约有三百万会员,在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之下。农民初步的组织,发展成了巨大的农会,有几千万会员。农民运动发展到成为中国革命运动的最

中心的地位。共产党成为土地革命底领导者,这样就使无产阶级底领导权开始从希望变成事实。

共产国际对1925年到1927年中国革命的列宁主义路线,是从以下两个基本原则为出发的。

第一,共产国际根据列宁直接的指示,主张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在一定的阶段上(即民族资产阶级还是革命的时候)和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主要的条件是保证“无产阶级运动独立性,即运动处在最原始的形式上也应如此”)必须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但同时,认为在发展底条件改变之下,在阶级力量重新配合的情形之下,这种联合必须破裂,必须与过去的同盟者进行坚决的斗争等等。

在广东时期和北伐时期,直到蒋介石叛变这个时期的情形确实就是这样。蒋介石的叛变,就是民族资产阶级从革命营垒转到反革命营垒的表示。在这个时期内,不仅中国共产党发展了,而且工农运动也非常加强了,产生出工农底群众组织。在革命发展底这个阶段上,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确是促进了工农力量底增长。

第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路线,不仅是从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这点为出发的,而且还根据中国是封建残余是压迫底主要形式的国家为出发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共产国际还在1923年,就将农民问题提出作为中国革命的全部政策底中心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发展第二个阶段上的路线,自然是坚决扩展土地革命,坚决反对已经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尽量武装工农,使武汉国民党尽量民主化,以便把它变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民主专政底核心。

在革命紧急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的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彭述之、谭平山等曲解和直接反抗这个列宁主义的路线,同时,中国共产党没有能够进行充分的斗争,来反对他们,来实行共产国际列宁主义的路线,这就是革命运动在武汉阶段上受到很大失败底主要原因。

当时在联共(布)内的托洛茨基反对派,以及它在中国少数学生分子中的信徒,对中国革命问题,是站在失败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上,同时,用嚣张的“左”倾辞句来掩饰这个立场。以斯大林同志为首的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底斗争,为完全消灭托洛茨基底斗争,对于中国共产党底成绩,对于把中国共产党变为领导最广大劳动群众阶层的群众的共产党,是非常必要的前提。

陈独秀派底路线,是从他们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问题底孟塞维克式的立场产生的,特别是从他们把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对立这种立场产生的。这个路线的出发点,是认为在战胜帝国主义以前,在中国统一以前,必须在发展底一切阶段上,无论如何要保持包括资产阶级的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为着达到这点,便不惜实行一切和任何的让步(如 1927 年 3 月陈独秀汪精卫公开联名宣言,说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底发展不是必要的;阻碍土地革命并反对土地革命,阻碍工人运动并反对工人“过分的要求”等等),以免“吓退资产阶级”或“吓倒小资产阶级”。

在革命的武汉阶段上,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是否作过反对陈独秀派机会主义路线底斗争呢?

是的,曾经作过斗争。

1927 年初,在收到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状况的决议之后(决议是 1926 年 12 月通过的),在两派中央委员之间,发生过严重的斗争。一部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当时是曾拥护(虽然是不彻底)共产国际执委这个决议的,他们并指出彭述之底策略路线与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全会路线相矛盾。另一部分以陈独秀和彭述之为首的中央委员,虽然没有公开地反对共产国际执委底这个决议,但实际上在革命中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

要是没有这种党内斗争,蒋介石在1927年2月想在南昌建立新的反革命中心这种企图,就不会破产;而在武汉成立新的革命中心的事变也不会发生。要是没有这种党内斗争,当时还非常幼稚的共产党,在陈独秀机会主义领导之下遇着有组织的和投降到帝国主义及封建残余方面的资产阶级底进攻,就会弄到思想上完全解除武装和组织上发生动摇。

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1927年4月到5月),也进行过拥护共产国际路线和反对陈独秀主义底斗争。

但是,这种斗争,无论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前,无论在开会时期,以及在大会闭幕之后,都进行得非常不充分的。

在这个争论中主要的缺点和错误,就是下面几点。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之前,斗争没有超出最狭小的领导机关范围之外,没有深入到党的群众中去。虽然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差不多全体代表都批评了陈独秀为首的中央底错误,都起来拥护了共产国际底路线,但是代表大会没有做出必要的组织上的结论(陈独秀、彭述之、谭平山等等仍然留在党内主要领导机关内)。这就使得在第五次代表大会闭幕后,在各省代表和许多中央委员回到各省之后,陈独秀等仍能继续自己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并在革命最紧急的时期执行了背叛革命利益的政策。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之后,关于在大会上发生的原则斗争,并没有通知全党,中央也丝毫没有设法使全体党员群众都了解第五次代表大会底路线。陈独秀及其信徒们仍旧执行背叛革命利益的政策。

因此,革命受到严重的失败。因为陈独秀派领导实行了机会主义的和背叛革命的政策,使党暂时发生严重的危机。党和革命的群众组织(特别是在最大的城市和农民运动各基本区域里)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党和革命群众的大批干部,在空前的白色恐怖之下牺牲了。同时,党的许多地方组织,许多领导工农运动的共产党员,依然英勇地继续为革命事业而斗争。但是,这些战士们从当时

共产党领导者——在革命紧急时期犯了极大罪恶的机会主义错误的陈独秀、彭述之等等——方面，既得不到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方针，也得不到实际的领导和帮助。

究竟我们的党怎样脱出了这种最危险的状态呢？

在这个紧急关头，共产国际对我们党给了极大的帮助。

中国共产党的八七紧急会议（1927年8月7日举行的）底伟大历史意义，也就在于：这个由共产国际执委提议召集的会议，虽然其决议案中曾有过个别的错误（对于土地问题没有充分的明确性，对“左派”国民党还有幻想的残余等），但能把纠正党的政治路线这个历史任务完成了，它给了陈独秀机会主义一个致命的打击，它把土地革命提出来作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口号，它决定了用工农兵武装起义底手段来推翻反革命国民党政权这个总的政治路线。它根据新的路线来动员群众作革命的斗争，它宣布了清除党内机会主义分子，它把陈独秀等从中央领导机关驱逐出去，这样，就把党从机会主义领导底泥坑中挽救出来，重新把党引上革命底道路。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它在使党布尔塞维克化事业中，具有伟大的意义”（见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案）。

1927年下半年（从8月到12月），中国工农在共产党员领导之下，表现出惊人的英勇精神，为反对国民党和争取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政权作了许多武装斗争。

广州公社的失败，使它在客观上成为革命退兵时的一战，但它还能表示出中国民众在争取苏维埃政权斗争中惊人的英勇精神，它还能成为有全世界历史意义底事件，并开辟了苏维埃革命底阶段。只这一点，便足以证明共产国际和中央指明革命转变到新的苏维埃阶段底完全正确了。

广州公社在实际上证明了：斯大林同志和共产国际断言的正确。斯大林同志和共产国际断言：武汉国民党的叛变，只是使革命

受到了暂时的失败,只是使革命丧失了所谓国民党左派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但是它更密切地把农民和城市贫民底广大群众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并使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广州公社在实际上证明了并第一次实现了列宁关于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建立苏维埃政权这种天才的思想,在实际上证明了中国无产阶级能够在革命斗争中夺取领导权,证明了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工农和城市贫民底联盟是可以实现的,而且这种领导权和已经联盟开始在苏维埃的国家形式中表现出来。广州公社在实际上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为列宁主义路线和反对机会主义而斗争的过程中,已经布尔塞维主义化到这种程度,即能采用武装起义底手段在自己完全独立的领导之下建立工农兵底政权。广州公社底火星燃烧起此后中国苏维埃革命光明的火焰!

(三)

中国共产党发展底第三个时期,从广州公社失败的时候起,到1929年止,这是中国革命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当中,政治状况当中最基本的最有决断意义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呢?这是革命底前一个高潮因革命暂时失败而已经结束,而新的高潮却还没有到来。当时革命处在前一个高潮和新的的高潮之间的阶段上。对于我们的党,这是最艰难困苦底时期。

一方面,由于革命底暂时失败,我们党内最不坚定的阶层直接受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底影响。而另一方面,我们党内的一部分领导人和党员中间,首先便是从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一部分人,表现出了动摇不定、无组织性和无纪律性,表现出“革命的急躁性”和冒险主义。由于这样,在我们党内,同时就表现出右倾和“左”倾。以陈独秀为领导的右倾分子,对于中国当时的政治情况的估计,是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和整个反革命势力得到了完全胜利,认为革命与共产党已完全失败,肯定地说中国已经开始了反动势

力胜利底长久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资本主义将猛烈地发展下去。因此，他们曾向党提议取消苏维埃的口号，而代之以“国民会议”的口号。右倾分子主张要党“放弃”争取群众的艰难的革命斗争，而只在国民党合法范围内进行工作，这在实际上便是图谋取消我们的党，使其不成为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无产阶级战斗的政党，也就是图谋把我们的党变为国民党的附属品。“左”倾分子，有一个时期曾盘踞在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和地方领导机关里，他们对于当时时局估计底出发点，便是所谓“中国革命不断地高涨”这个庸俗的理论，说中国到处都还可以掀起武装起义，他们曾蔑视群众工作，而尤其是工会的工作。这样他们便在实际把起义当作了儿戏，并且走上了最危险的冒险主义，走上了最危险的脱离群众的道路。在革命力量暂时退却的时候，在收集力量来准备革命新高涨的时候，这对于党是特别有害的。

八七会议基本上取消了党内领导中的右派底主要代表，而站到了党领导地位的却主要地是“左的”盲动派的首领瞿秋白同志等，所以“左的”盲动倾向，在1927年末和1928年初，得到了特别广泛的散布，它薰染了很多共产党员和党的地方组织。这曾使党和革命运动受到莫大的害处，盲动主义在客观上使反革命势力易于破坏党的许多组织和工农底革命群众团体，在客观上使反革命刽子手易于杀戮革命的干部。

在暂时失败以后走到极端秘密地位的我们的党，在领导方面犯了这样盲动的错误，同时，又有右倾取消派进行小组织斗争来危害党，这样一来，就使党陷入了比武汉阶段失败时更艰难和更危险的状态。

共产国际在这个时候也给了中国共产党莫大的帮助。

在1928年初，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提纲，对于当时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底基本问题给了一个详尽的布尔塞维主义的指示，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对于中国革命性

质问题给了下列的估计：

“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无论从经济的观点(土地革命与消灭封建关系)看，或从反帝国主义民族解放运动的观点(中国国家底统一与独立)看，或从政权底阶级性的观点(工农专政)看，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都尚未完成。”

正是根据对中国革命性质这种布尔塞维主义的分析，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对于时局的估计，便作出正确的结论；即是认为中国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时期，同时，指出最可能的前途，是在比较短的期限内将有革命底新高潮来代替革命底暂时失败。

根据这个分析，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便指明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任务是：

“党应从事准备新的革命潮流的广泛的高涨。这种高涨一定在党的面前提出以组织和实行群众的武装起义为直接的实际的任务。因为只有用武装起义推翻现有政权底方法，才能解决革命底任务。但是正是为着这点，所以目前党整个工作底重心，在于夺取千百万工农群众，在于政治上教育他们，在于把他们组织在党及其口号(没收地主土地，八小时工作日，中国底国家统一和脱离帝国主义底压迫，推翻现在政权，工农专政，组织苏维埃)底周围。目前整个环境中最大的危险在于：工农运动底先锋队，因不正确估计目前环境和轻视敌人力量的结果，就可以脱离群众，向前跑得很远，分散自己的力量，而给敌人以各个击破的机会。”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举行于1928年夏)底伟大历史意义，正是在于：这次代表大会整个地和完全地走上了共产国际执委决议(共产国际执委第七、第八、第九三次全会底决议案)底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上面，详细地总结了1925年到1927年革命中最丰富的经验，无情地指责了陈独秀机会主义、瞿秋白盲动主义和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一切理论系统和实际的罪恶行为，确定了本

阶段上中国革命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的苏维埃革命,且有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第六次代表大会对于当时革命运动底阶段,曾估计为旧的高潮与新的高潮之间的时期,并且在党的面前提出了正确的革命的任务,即指明党必需进行斗争来夺取群众,来集聚力量,以便准备和加速必然到来的革命新高潮,以便在新高潮到来的时候,将武装起义底口号从宣传口号,重新变成党底行动口号。第六次代表大会定出了土地革命和反帝革命底基本口号:推翻帝国主义底在华统治和地主与资产阶级联盟——国民党——底政权,而代之以苏维埃形式的工农民主专政。

只是由于执行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底总路线——以共产国际底路线为根据的总路线,我们的党才能迅速地团结了自己的队伍和工农底力量,才能顺利地经受了最艰难的锻炼,才能在最重要的历史关头(在中国军阀在帝国主义者指挥之下,实行武装进攻中东路和苏联边境的时候)坚决地实行了自己的光荣任务——为武装保护苏联口号而斗争,同时,顺利地击退了陈独秀派与托洛茨基派之反革命联合底进攻。托陈派这个联合,当时是在以下的取消主义的和反革命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的:(一)共同反对中国共产党底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二)共同反对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布)和苏联;(三)共同认为国民党反革命势力得到了长期的稳定,中国革命底新高潮已推到遥遥无期等等。党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能够肃清了自己队伍里这一切有害的分子(陈独秀、彭述之及其信徒们),这样就在实际上加速了新高潮在较短期限(总共只两年)内成熟,使党顺利地走上了全国政治舞台,成为中国苏维埃革命底唯一领袖和组织者。

(四)

中国共产党发展底第四个时期——从1930年到现在——是苏维埃阶段上中国革命新高潮日益增长底时期。大家知道,最近

的四年,是革命浪潮增长底时期,而且同时还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增长和继续布尔塞维主义化的时期,同时也是苏维埃革命得到部分胜利的时期。中国在这四年来的情况,共产国际和党作了下列概括的估计:在1930年,中国成熟了革命高潮,在1931年,中国存在了革命危机,在1932年,中国有革命形势,而且苏维埃革命在中国一部分领土内得到了胜利,而在现在的中国的形势,是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中国共产党之增长和继续的布尔塞维主义化,这是无疑义的事实。只要举出这几年来党发展的数字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在1930年,差不多13万党员,在1931年,有20万以上,在1932年,差不多有30万,而在1933年,则有410600党员。这几年来,苏维埃革命不断地扩大和增长:在1930年因为许多赤色游击队和个别红军小队英勇斗争的结果,中国南部和中部的个别苏维埃区开始极快的增长;在1931年,红军胜利地击退了蒋介石底三次“围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成立(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1932年到1933年春,红军顺利地击退了国民党与帝国主义第四次和第五次反苏维埃的“围剿”,许多基本的苏维埃区域扩大了,有些苏区巩固了和统一了,苏维埃革命底胜利,扩大到了四川以及中国北部和西北部的个别区域内,并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继续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更加形成和巩固了;而从1933年夏到今天,红军进行着比前几次更困难得多的战斗,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去反对蒋介石大规模的第六次“围剿”,同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有极大的发展;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革命已经成了世界革命底巨大因素和世界政策决断因素之一。

我们的党和中国革命,最近几年来,在什么基础上和用什么方法达到了这些成绩呢?得到这些成绩的基础,就是我们党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之下,真正执行了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的路线,保障执行这个路线的方法,就是我们党在中央领导之下,在党内进行了无情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来拥护这个列宁主义的路线和反对脱离

这个路线的一切机会主义倾向。

1930年夏,中国存在着新的革命高潮,成了无可争辩的事实。苏维埃运动因红军个别队伍和许多农民游击队的发展,在江西、湖南和湖北三省许多区域内得到了初步的胜利,同时,罢工运动已带有广大的群众性质。当时共产国际执委根据列宁关于革命军,临时革命政府和建立革命根据地(起初那怕是在全国一部分领土内)具有莫大意义底指示,根据斯大林同志关于武装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与优点之一底指示,同时,根据中国1925年革命之广东阶段和武汉阶段极丰富的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应完成下列的最重要的战斗任务:立刻建立以工人充当指挥干部的、有坚强的共产党员为骨干的、有可靠的领导者和铁的纪律的真正的工农红军;立刻建立以共产党员占多数,同时能尽量吸收最好的非党的工农兵参加政权机关的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府;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并进行真正的革命的群众工作,本着布尔塞维克的精神组织苏维埃区域的群众,在非苏维埃区域内,开展群众底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在这个斗争过程中来组织群众。

但是,当时我们党的中央政治局里的一部分委员,在李立三同志领导之下,曾坚决地拿自己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路线来反对共产国际这个列宁主义底路线。李立三同志及李立三主义者,不去执行共产国际执委在党面前所提出的迫切的战斗的革命任务,而造出自己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系统。立三主义者因为害怕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斗争底困难,便在“全世界革命同时胜利”的“左”倾词句掩饰之下,来否认中国革命有战胜帝国主义的可能;立三主义者由于害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解决中的许多困难,由于害怕在中国革命底目前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这个道路上所摆着的困难,便在中国目前阶段革命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这种“左”倾词句掩饰之下,企图马上开始在当时苏维埃区域内过早地强植社会主义(没收一切私有财产,企图立刻建立集体农

庄、苏维埃农庄等等),同时在实际工作中蔑视进行土地革命去反对地主阶级这个中心任务;立三主义者在“全国革命形势一齐成熟”和否认革命不平衡发展弱点这些“左”倾词句掩饰之下,引导许多地方党部在中心城市实行盲动冒险,同时,使新起的青年红军解决他力不能胜任的任务;立三主义者在“争取全国革命同时胜利”的“左”倾空谈掩饰之下,在实际上拒绝执行争取几省和一省区域内的革命首先胜利底战斗任务;立三主义者在“客观形势与主观力量没有关系”、“党和群众组织实行‘军事化’、‘成立行动委员会以统一领导’”等等“左”倾词句掩饰之下,在实际上不仅取消了青年团和职工会,而且甚至取消了党是一切群众革命组织的领导中心底作用。这样,立三主义者就给了党与革命以重大的损失。

但是我们的党,受了1925年到1927年大革命斗争和失败底艰苦经验的教训,受了秘密工作的阶级战斗的锻炼,更加领会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所以能够给李立三等一个当头的回击。当1930年四五月份的党中央机关报(《红旗》及《布尔塞维克》)上,李立三同志发表了纲领式的论文时,党的一部分工作人员(何、陈、秦、王等同志)马上就指出李立三同志这个不正确政治立场底莫大危害。而当时李立三同志等,不顾这些同志底抗议,在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根据李立三同志论文里所包含的原则上的立场,而通过了关于中国政治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时,——这些同志就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范围内扩展了关于整个原则问题和策略问题的严重争论,证明这个决议案在原则上是与共产国际底路线冲突的,并坚决要求取消这个决议案。反李立三路线的斗争,起初是在上海发生的,后来就蔓延到其它大的城市和区域去。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会上(1930年9月),政治局底一部分委员,以李立三和瞿秋白等同志为首,在“共产国际路线与立三路线没有什么原则不同”这个口号掩护之下,又通过了调和主义路线的决议。这样一来,三中全会便实际上

阻碍了共产国际路线在中国革命中实现,并且在党内造成了思想紊乱。但是,上海党组织内一大部分先进积极分子,在上述那些同志领导之下,又能够及时地和坚决地揭穿了三中全会底原则上的错误,并要求政治局取消它的一切错误决议,(从6月11日起一直到三中全会底决议止)并回到共产国际底布尔塞维主义的立场上来。

在党内已经形成了真正的布尔塞维克干部,这些干部还在未得到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致中共信以前,就已经能够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开展了坚决的原则斗争,来反对李立三同志的反共产国际的路线,来反对瞿秋白同志等对立三路线调和的态度。但是,只在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国共产党那封关于立三路线问题信公开发表后(1936年11月25日),李立三同志及其拥护者才完全地宣布向共产国际和党投降。只是在共产国际执委这个直接帮助之下,中共四中全会(举行于1931年1月7日)才能顺利地解决了它的极其重要而且极其困难的历史任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会之莫大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正是在于它不仅对于李立三“左”的冒险主义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及其调和派宣布了死刑,而且对于当时正抬起头来的那个罗章龙右倾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路线,也给了坚决的打击。负李立三路线责任的那些主要分子,被取消了领导地位,革新了政治局底人选,在其中吸收了共产国际路线坚定的拥护者,同时,不许右派罗章龙等参加党的领导机关。四中全会在两条战线上进行了真的布尔塞维克的斗争,这样就开辟了我们党历史发展底新阶段。四中全会所提出的“对共产国际底列宁主义路线应无条件百分之百的忠实”的口号,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旗帜与胜利底保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会,在使中国共产党继续布尔塞维主义化的事业上,作了最严重的一步”(见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在1931年关于中国共产党底任务的决议案)。

章士钊先生(过去北洋政府底司法总长,陈独秀底老朋友)在南京法庭上为陈独秀彭述之等辩护时,对于托洛茨基派在中国目前所起的作用,直接了当地给了一个很好的和正确的估计。章士钊在自己的辩护词里直接说道:

“清共而后,独秀无日更与国民党提携奋斗,而以己为干部派摈除之故,地位适与国民党最前之敌人为敌,不期而化为缓冲之一团;即以共产党论,托洛茨基派多一人,即斯大林派少一人,斯大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相辅为用,谓托洛茨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更无可;即此以论功罪,其谓托洛茨基有功于国民党也,且不暇给,罪胡为乎来哉”。(见1933年4月22日《申报》)

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群众组织(首先便是青年团,红军等等),清洗自己的队伍以后,便在极短期限内补偿了李立三路线和罗章龙派使党所遭受的损失,并且在苏维埃中国得到许多极大的胜利(如1931年内红军底胜利,冲破国民党底三次“围剿”,成立中央政府等等),在非苏维埃区域内,也达到了好些成绩(党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以及罢工运动中所进行的巨大工作等等)。从中国共产党队伍里驱逐出去了托洛茨基派和罗章龙右派,转上了积极地反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底反革命道路。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曾企图用全力来破坏红军。

上述的这些胜利保证了中国苏维埃革命底向前发展,保证了无产阶级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种形式的工农民主专政中底领导权之开始巩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13年来布尔塞维克主义的历史——这是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列宁主义的路线在整个世界共产主义革命战线最重要环节之一上获得胜利的历史。

我们看见,在列宁逝世10周年纪念的时候,在共产国际第15周年纪念的时候,以列宁最好的学生和世界无产阶级最亲爱的首

领斯大林同志为首的联共(布),正在伟大的苏联里实际上胜利地实现着列宁主义底思想——解决建设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极伟大的任务。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在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里,正在为造成在革命继续扩大和加深的过程中进到建设社会主义任务底前提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发展底历史,这是为布尔塞维主义和党布尔塞维主义化的斗争史。

中国共产党这样迅速布尔塞维主义化和列宁主义在半殖民地中国获得这样伟大胜利,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有以下的主要原因:

一、中国无产阶级受到帝国主义、本国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三层的压迫和剥削。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对压迫剥削者及其在工人阶级内部的奸细——共产党内底机会主义者,就发生莫大的革命仇视。因此,中国无产阶级有莫大的战斗决心和勇敢牺牲的战斗精神,来为推翻反动势力统治和建立自己的工农政权而斗争。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中国最近十年来的伟大战斗和国内战争火焰中,已积聚了丰富的经验,并锻炼了自己。

二、中国共产党能够得到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直接的和经常的领导及帮助,同时,中国共产党能应用联共(布)最丰富的经验。

三、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统,社会法西斯蒂对中国工人阶级的腐化影响极端薄弱。

在列宁主义的道路上,在为共产国际列宁主义路线而斗争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在 13 年内,从小的智识分子的共产主义小组(在党底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它总共只有 44 个党员)发展成了强大的、群众的、真正布尔塞维主义的、列宁主义的党,这个党现在有 41 万党员,有坚强领导的中央,这个党已经培养出来许多精明能干的党的和群众的工作人材,这个党已经造就出来许多著名的管理国家人物和智勇双全的红色指挥官。

在列宁主义的道路上,在为共产国际列宁主义路线而斗争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在 13 年奋斗当中,已经成为中国千百万群众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底唯一的公认的领袖了。

在列宁主义的道路上,在为共产国际列宁主义路线而斗争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中国一部分广大领土上,获得了苏维埃革命的胜利。很明显的,今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按着这条道路发展,将在全中国获得苏维埃革命有决定意义的和完全的胜利,并在实际中胜利地实现列宁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即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这种天才的思想。

载《共产国际》第 5 卷第 11 期

(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一九二八——一九四三),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中国共产党 15 周年纪念

(1936 年 7 月)

季米特洛夫

中国共产党在 15 年以来,经过中国革命的锻炼,已经发展成为强大的革命政党,已经成为共产国际最好的分部之一;它创立了苏维埃区域和革命的武装力量——红军,中国红军表现出奇特的英勇,打破了敌人六次“围剿”。

中国共产党是在极端困难的环境当中得到这些胜利。它与其他国家共产党区别的地方,就是它同时担负了两重任务:在苏维埃区是掌握政权的党,而在不断地进行武装斗争反对中国人民内部敌人的环境中行动着;同时在另一部分的中国区域上,在秘密条件之下,组织群众与领导他们的斗争反对军阀制度的统治。四分之三的党员,在多年来没有放下过武器而且经常处在战线上。成千成万的中国人民最好的子弟,首先是共产党员与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为解放中国的伟大事业而牺牲了。很大数量的中国共产党员被反动军阀囚禁着。

虽然有这样困难的环境和巨大的牺牲,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发展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这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有根深蒂固的联系,不屈不挠地拥护中国人民的利益,由于它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武装起来了,维护党的统一有如生命,不害怕以布尔塞维克的态度来揭发自己的错误,在错误中学习并适时地改正这些错误,不允许在自己的队伍中混入着异己分子,把各种各色的投降者和阶级敌人的奸细驱逐出党。

但是,正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真正的布尔塞维克党,因此它很明白了解,不管它现在已经达到了多么伟大的成绩,可是这只是走向中国人民解放的第一个严重的步骤。因此,它现在正用一切力量来解决现在阶段上自己的最严重的历史任务,就是要使共产党成为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先锋,联合现在还很分散的中国人民的力量,使中国不遭受分割和完全被奴役的命运。

中国共产党尽力于停止内战和与国民党和一切政治派别以及一切武装力量合作来组织抵抗日本侵略的事业,正得到全世界中国人民之友的赞许、同情和拥护。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华民主共和国作为目前条件下团结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反对其最凶恶的敌人——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最好方法,这就证明中国共产党善于估计实际的环境和确切地提出适合于中国解放斗争在现阶段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便利,在苏维埃区域政策上实行一些必须的改变,同时继续巩固苏维埃,因为苏维埃在现时是国内的唯一的民主政权机关和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可靠的支柱,这就证明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所进行的方针——团结中国人民一切力量的方针的坚定性与彻底性。

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有重大的困难。因为中国人民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不只全副武装,而且是奸险狡猾,它善于分散中国的力量,它善于利用中国内部一切斗争来实现它的掠夺的目的,要与这种敌人作斗争,就必须全中国人民——首先是共产党作最巨大的努力。

党要在全中国人民面前揭破一切日本奸细的阴谋,揭穿日本的一切毒计,要把日本奸细与一切真正愿意保护自己祖国独立自由的爱国者分别清楚。

党要依靠着民众的意志来系统地为进行与国民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这不是一个轻易的任务,因为许多国民党的领袖

和它的军事的政治的行动家一味仇恨共产党人，以致陷入日本的圈套，不去与共产党和红军一起反对日本强盗，反而将武装力量消耗于犯罪的“剿共”战争和军阀内战。共产党要动员全国的舆论，使一切真正爱国者都拒绝这种亡国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要更巩固与工人、农民、一切劳动者和拥护民众利益的知识分子的联系，坚决出来拥护他们起码的权利和迫切的利益。在“驱逐日寇出中国”的口号之下来动员他们进行斗争。

党要继续不倦的巩固红军，提高它的战斗力，因为红军愈加强大，就能更快地创立全国联军（抗日联军），就使中国人民能更顺利地抵抗有新式武装的日本军阀的进攻。

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道路上还会遇到内部的困难。它要克服关门主义分子的抵抗，这些分子不懂得在现时条件之下解放中国人民的唯一道路，就是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它同样要反对机会主义者投降派，这些分子预备牺牲党与红军政治上与组织上的独立性，并把它们与其他的组织和其他的军队混合。中国共产党将光荣地、忠实地执行一切反日协定的义务，可是它不愿意盲目地相信同盟军和不愿走上投降的道路。

特别在现在环境之下，敌人加倍努力侵入到共产党内来进行破坏党并妨害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时候，中国布尔塞维克完全懂得克服这些困难的基本条件是巩固自己的党，巩固党的统一和铁的纪律。

中国共产党在 15 年来已经证明它忠实于中国人民的利益，并证明它善于为中国人民的利益和解放而斗争，毫无疑问地，中共一定能克服一切的困难与阻碍而实现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民族统一战线。

全世界无产阶级都非常注意中国的事变。它再三地表示对于奋斗中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同情。但是，当中国直接受到完全殖民地化危险的时候，这样一般的表示同情是不够的。必须

对正在进行解放斗争的中国人民予以亲热的爱护和真正精神上、政治上的拥护。必须采取积极的方法来影响各国——首先是英国、法国、美国政府和社会舆论,使它们拒绝一切直接或间接对于日本军阀侵掠计划与行为的帮助。必须继续不断地指斥日本法西斯军阀与德国法西斯的同盟,指斥这种为分割与奴役中国及进行新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同盟,是反对和平、反对文化与反对民主的最可恶的阴谋。

希望中国共产党成立 15 年的纪念,成为动员国际无产阶级的力量去帮助中国人民的巨大推动力,这个伟大的中国人民正在全世界反法西斯主义与反战争战线的的一个最严重的阵地上进行为自己民族独立生存的斗争。

载《季米特洛夫文选》第 190—194 页

(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一九二八—一九四三),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英勇奋斗的 15 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 15 周年纪念

(1936 年)

米 夫

第一章 半殖民地的中国

一、一般的状况

中国为一地大物博的国家，其幅员之广大，仅次于苏联；全国面积约 1100 万平方公里，超过全欧各国面积的总和；而其人口之众多，则为任何国家所不及，总数约在四万万五千万人以上。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其中有伟大的思想家，卓绝之军事家及出色之发明家，有异常丰富的典籍文艺，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工业。远在纪元前两千年间，中国已有指南针的发明；而火药的应用，亦远在欧人以前。2 世纪时，即有纸张的出现；7 世纪时，已有刻板印刷的发明，到 11 世纪时，则更有活字印刷术的使用。其他如华美精致的金属品及光泽美观经久的染料，亦为中国自古著名的特产。而爱国热忱及勤苦耐劳精神，尤为中华民族向来的特色。可是，中国虽有如此显著的优点，而现在却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

中国为一半殖民地的国家，其一般状况即以此而定。伟大中国人民，备受帝国主义宰割与欺凌。千百万劳动群众，备受国际帝

国主义残酷的剥削,其穷困饥饿,流离死亡的苦境,非笔墨所能形容。

国际帝国主义者为了巩固其在华的统治,更多方维持和加强中国封建制度的残余,使几万万农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的地位。大部分土地,尤其是肥沃的土地,概由地主所占有。封建地主之压迫,苛刻佃租之繁重,军阀苛捐杂税之压榨,高利贷借之盘剥,以及帝国主义之奴役及剥削,凡此种种,都使中国农民处于完全破产的地位。

二、经济之落后

中国为一土地丰富的国家,但绝大部分土地,皆未加以利用,耕地仅占总面积十分之一。当然,不是所有的土地,都宜于耕种,但是就适于耕种的土地而论,现有的耕地也不过占有四分之一而已。而且耕种面积不仅未增加,反在日益缩小中。很多田地,往往因河道不修,水利毁坏之故,日益化为荒土。陷于破产之农民,无力经营,往往抛弃土地,流离四方。耕地之减少,遂成为有加无已之趋势。

中国为一农业国家。但说也奇怪,本国粮食反不够供给,非从外国输入不可。即以麦子而论,每年尚须输入8%,方能糊口。中国虽本是一物产富庶的国家,但本国农产原料,尚不能供给本国不甚发达之面粉制造业和纺纱业,非从外国输入不可。

中国为一富源极充足的国家,但天然财富的开发,则甚属有限。如煤的蕴藏,几乎遍地皆是,且极便于开采,总数共达930亿吨,但每年产煤总量,却不过2800万吨。(其中有1200万吨之煤,产于东三省与热河境内)铁矿蕴藏,多至10亿吨,但每年产铁总量,却不过250万吨,而且,大半为生铁,并不用以发展本国国民经济,而是为人作嫁,向日本输出。

中国经济落后之另一表现,则为85%的棉纱,40%的生丝,仍由旧式织机制造;用新式织机制造之棉织品,只占国内所用棉布二

分之一。就煤炭及铁矿开采而论，由中国小企业用旧式方法开采之产量，亦在 25% 至 30% 左右。极称丰富之富源，如水力（江河）、石油，以及各种蕴藏有色金属等等，几乎未能完全开发及采用。

中国人口虽占全世界人口约四分之一，其天然富源，虽极称丰富，然其各种生产在全世界生产总量中所占比重，则非常薄弱。例如：

煤	0.6%	铅	0.1%
铁矿	0.5%	锡	5%
铜	0.22%	纱锭	3%
生铁	0.35%	生丝品	15%

从这些数目字中，便可以明白看出中国工业落后的情形。

外国资本极力阻碍中国生产力之各方面的发展。可是，无论其阻碍作用如何，而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却终于因国际帝国主义之侵入而随着发展起来，中国工人阶级亦随着增长了。现在中国约有 275 万大产业工人，而手工业工人及家庭工业工人则约达 1200 万以上。中国工人阶级已成为一个强大的势力了。在外国企业中，中国工人阶级有其最集中的部队。极长的工作时间、最低微的工资，经常的失业，最受压迫的地位，没有任何劳动的保护，以及民族的压迫——这就是中国工人所遭受的悲惨的命运。中国工人受着国际资本双重的压迫，残酷的剥削与民族的压迫。正因为如此，所以正在中国全民解放运动中的中国工人阶级便成为最团结的力量，成为最坚定的最彻底的战士。

三、帝国主义之束缚

国际帝国主义，既将中国一切经济命脉攫为己有，遂多方阻碍和紊乱中国经济的发展。他们垄断所有一切重要工厂企业，监督和管理中国的铁路航运及空运，利用自己的银行及其强迫中国接受的债款来支配中国的财政，直接把持中国的关税及盐税。帝国

主义者,借助中国本地的地主,高利贷者及商人,多方束缚中国农民群众,使其无法逃出他们的残酷剥削的罗网。他们破坏中国向来极其重要的农作物——茶丝,使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完全适合于帝国主义的利益。此外,他们又竭力维持和利用中国封建残余的势力,使中国农村经济陷入延绵不断的危机。

除经济的束缚外,国际帝国主义者,还对中国施行政治的统治;用炮舰手段奴役中国的人民;在中国人民自己的领土内任意残杀中国人民。他们在用暴力夺去的中国领土内,即所谓“租借地”内,实行毫无限制的统制。他们是所谓“租界”里的主人。他们在中国领域内自由驻扎自己的军队,施行所谓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总之,帝国主义者尽力削弱中国政治的独立,将中国人民化为备受凌辱之半殖民地的奴隶。他们还极力培植和利用中国封建军阀的割据局面,这就给中国人民造成绝对无法生存的形势。

国际帝国主义之如此凶残的压迫与剥削,结果便引起中国人民之强有力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国广大的劳苦群众,日益深刻感到为中国政治经济的完全独立而坚决斗争之必要。成千百万民众,便在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与肃清封建残余口号之下而日益团结起来了。特别是欧战以后,因俄国伟大十月革命胜利之影响,当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最坚定彻底的战士——走上中国政治斗争舞台的时候,这——民族解放运动便特别汹涌澎湃地发展起来了。

本书以下各章,就要叙述中国民族革命解放运动在欧战以后发展的经过,以及中国共产党之产生和其发展的简史。

第二章 欧战后的中国 中国共产党之产生

一、1919年之凡尔赛会议

当欧战时,中国民众抱有很大的幻想,以为协约国的胜利,即

可解脱帝国主义对华的束缚,以为在欧战之后,不平等条约就会修改与废除。大家知道,中国系参战国,且系战胜国之一,那末,在凡尔赛和平会议席上,要求归还德国在山东所侵占的各种权利与胶济路及青岛(在大战中已为日本所攫夺),无论如何是有充分理由的。同时,在凡尔赛会议之初,美国威尔逊总统亦曾声言:“一俟国际联盟机关成立,即将竭力赞助中国由半自主的国家变为真正独立的国家”。

但结果却适得其反,威尔逊之诺言,原来是不兑现的支票,而中国民众之预期,不过是痴人的幻想。凡尔赛条约(156—158条)完全赞成日本占领中国领土的行动,明白规定所有德人在山东的一切权利概交日本接替。原来,凡尔赛会议,不仅是战胜国掠夺战败国的会议,而且是帝国主义者公然利用中国的衰弱而实行更加瓜分与奴役中国的会议。

二、1919 年之五四运动

自凡尔赛和会侮辱中国民族之消息传入中国以后,一时全国义愤如火如荼;各地广大民众,闻风奋起,反对签订凡尔赛条约,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安福系亲日政府之卖国政策。1919年5月4日,北京一万五千学生举行了壮烈的游行示威,闯入东交民巷,向协约国驻华公使要求各国政府主持“公道”,同时复包围政府机关及要人住宅,痛殴著名卖国汉奸——安福系内阁部长及外交官吏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

为反抗北京亲日政府的取缔与压迫,北京各校当即一律宣布罢课,组织学生会,广泛的开展反日斗争与提倡抵制日货运动(日本对华贸易,因抵制日货结果,骤然减低40%),中国资产阶级因感觉日货减少,大于华资有利,于是对于反日运动,特别是抵货斗争,亦表示同情和赞成。另一方面,当时,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初期,英美帝国主义者亦曾企图利用学生反日运动,以削弱日本在华的

势力。但无论中国资产阶级和英美帝国主义者有如何的企图，反日运动的范围终于日益扩大，斗争形式，亦日趋激烈：许多工业中心，都发生政治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以及工人罢工斗争，立即普及全国。群众游行示威，更属日益强大。

安福系亲日政府因迫于广大群众运动之压迫，终于不得不作相当之让步，不得不拒绝签订掠夺中国的凡尔赛条约与接受学生群众罢免曹陆章的要求等。不久，安福系祸首段祺瑞亦因此离职。1920年8月，北京直奉联合政府宣告建立（直系当时为英美帝国主义走狗，而奉系则为日本帝国主义走狗），后因直系军阀曹吴势力加强的结果，北京政权遂于1922年6月完全转入直系军阀之手。

五四反日运动汹涌发展之初期，国民党丝毫并未参与。孙中山氏领导之国民党，虽有相当群众的影响，但其当时的组织与活动，尚多带军事阴谋的性质。因此，当学生会派遣代表赴粤直接求助于国民党时，孙中山氏则借口无能为力而表示拒绝。

三、伟大十月革命之影响

俄国伟大十月革命之胜利，曾给中国反帝运动以极大的推动，开始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使中国民众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斗争，也开辟一个新的纪元。它使中国无产阶级日益觉醒与团结，它给了中国革命分子以思想的武器，使之相信自己胜利的前途，鼓舞他们去为中国人民根本利益而作奋勇坚持的斗争，俄国红军之驱退帝国主义干涉者与打破白党军阀的斗争，素受俄皇高压之弱小民族之彻底的解放，俄国苏维埃政府之自动废除俄皇时代对华一切不平等的掠夺条约——凡此种种，都使中国人民对俄国苏维埃政府发生无限的同情和敬仰。

固然，关于俄国革命事变的消息，并未及时传到中国，高尔察克的白党军阀，捷克斯拉夫及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者，截断了中俄

的联系,约达一年半之久,直至红军驱退帝国主义干涉者与消灭白党之后,中国方得到关于苏俄革命真实的消息。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对中国人民发表有历史意义的宣言,宣布取消俄皇时代奴役中国的一切秘密条约,苏维埃政府放弃俄皇时代在华所攫夺的一切利益和特权,同时,俄国苏维埃政府主张根据绝对的平等原则,与中国建立友谊的邦交。

1920年9月27日,俄国苏维埃政府复向中国政府重申前议,表示愿以完全平等与尊重利益为基础,迅速树立中俄两国友谊的关系。在这次宣言中,苏维埃政府更加发挥了1919年宣言的原则,具体提出了协定谈判的基本要点,苏维埃政府重复声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宣布,以前俄国政府历次同中国订定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

俄国苏维埃政府两次对华的宣言,在中国确实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备受中国先进人士之欢迎。受帝国主义操纵的北京政府,曾竭力拒绝与苏联进行谈判,直至1924年9月30日,北京政府才签订中苏关于解决两国一切悬案原则的协定。在这个协定中,完全反映出苏维埃政府在1919年和1920年两次对华宣言中所持之原则。中苏两国以完全平等原则与真正友谊精神所签订的这一个条约,博得中国人民热烈的拥护,因为这是中国与他国第一次按完全平等及真正友谊精神所签订的唯一条约。

四、中国共产党与职工会之形成

自1919年起,中国罢工运动,有特别长足的进展。例如1918年参加罢工的人数仅6500人,而1919年,罢工人数(据不完整的统计),即达91500人,而至1921年,罢工人数更达10.8万人,在上海及其他各地都发生罢工运动,大半的日本企业,都卷入罢工的

潮流。工人的要求获得部分的胜利,初期的工人组织亦开始发展起来,1920年,上海职工会第一次在中国举行了“五一”纪念。

同时,在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中,到处产生着各种名称的小组及团体,如《新潮》,《新青年》,《新中国》等。同时,新文化运动,也广泛发展了;欧美作品及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本,风行一时了;新的杂志刊物,陆续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苏俄问题讨论会,工人夜校,俱乐部,政治训练班等等,到处组织起来了。

1920年初,由北大教授陈独秀发起,在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的小组,参加者共七人。这一小组开始出版工人报纸,并进行职工会的组织。至1920年夏,这一小组的组员人数在上海已增至54人。不久,在上海又成立了机器工会,印刷工会和纱厂工会。此外,与上海小组同时产生的尚有李大钊、张国焘等同志在北京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以及毛泽东等同志在湖南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恽代英,陈潭秋,董必武等同志在湖北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等。1920年冬,在中国其他许多重要城市以及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也相继成立共产主义的小组,最初,这些小组均带着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可是正是在这些小组内,形成了和锻炼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批干部。

五、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7月,于上海召集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计13人。大会代表不全系共产主义者,其中也有无政府主义分子,合法的马克思主义分子,基督教社会主义分子,以及暂时和偶然混入共产主义运动的同路人。提交大会讨论的纲领,本来是很温和的。可是有几个代表则尚认为太激进,因而发生很大的争论,(特别是关于纪律,集中主义与共产党最终目的问题)。但经过长时间讨论以后,大会终于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并以组织工人夺取政权为其最终的目的。

自中国共产党最初成立之日起，在党内就发生了严重的事件。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者”，立刻就分裂出去了；北京原有的共产主义小组仅余二人；而在广州方面，整个党的小组，都完全操在无政府主义派手中了，只是经过一些时间以后，广州方面的共产主义小组才又建立起来。同时，为清洗本身队伍起见，党又开除了暂时附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陈公博及戴季陶（不久以后，戴季陶便成了国民党右派的思想家）。思想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则深受苏联胜利斗争的鼓励，坚决为有纪律的集中的布尔塞维克党而奋斗，为革命的阶级的工会运动而奋斗。在上海由中国共产党指导成立的劳动组合书记部，不久便成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核心。当时，湖南的毛泽东同志（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方的李大钊同志（他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绞杀于北京），和张国焯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以及董必武同志（中华苏维埃政府最高法院主席），陈潭秋同志（中华苏维埃政府粮食人民委员部部长）等，在各地进行了特别努力的工作。当时国内一般政治环境，工人斗争的发展与反帝斗争的高涨，更加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工作的进步。

六、1921年9月12日之华盛顿会议

苏联对中国民众威信的提高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迅速的增长，大大震撼了国际帝国主义者在华的统治。同时，由于日本在华势力的巩固与不断的伸展，使英国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在远东的利益感受着直接的威胁。为削弱日本在华势力，为向中国汹涌高涨的解放运动表示相当的让步，为对抗苏联影响的增长，以及为保存中国人民对于美国资本在华“特殊”使命的幻想，美国乃发起召集华盛顿会议，（1921年9月12日—1922年2月6日）。

出席华府会议的共有九国（英美法意日比荷葡中）。在此次会议上，美国达到了局部的胜利；英日同盟盟约废除了，英日海军军

备受到部分的限制,同时,日本不得不承认将青岛归还中国,并承认交回胶济铁路,但中国须付以 5300 万金马克之代价。同时,华府会议并在原则上允许中国提高入口的关税 2.5%。但这一问题之最后解决,仍有待于召集特别的关税会议。

在美国压制之下,华盛顿会议承认对华维持“门户开放”的原则。各国并不许在华划分势力范围之共同声明。但很明显的,无论英国或日本,在实际上都并未受华府会议诺言之约束。而“门户开放”的原则,不过仅是美国反对其竞争者的一种法宝而已。美国在华并没有如英日一样的势力范围,所以它不得不用经济的力量或以外交的方法,来使中国服从自己的利益而完全变为美国殖民地。美国因依靠于自己经济的威力,采取比较巧妙的帝国主义政策,粉饰以自由主义的辞藻。

这就是华府会议的决议,在这些决议中对于中国有实际意义的,仅仅由山东撤退日军一项而已,但这一决议并未妨碍今后日本帝国主义重新出兵山东或其他省份的行动。从中国人民利益上看来,华府会议所给予中国的结果,殊属可怜。而美帝国主义者则竭力吹嘘其“恩惠”,以求巩固其在中国人民中多年造成的幻想——以为美国资本是真正“赞助”中国的。虽然过去有许多人曾渴望帝国主义列强对于中国的“援助”,但自凡尔赛会议和华盛顿会议以后,不满与失望的心理却日益普及中国更广大的社会阶层;而与一切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正相反的苏联对华亲善政策,更加速了这一转变的过程。

中国无产阶级首先打破了对于帝国主义列强“援助”的幻想。随着工人组织的发展,无产阶级日益坚定对于自身力量的信念,而在其斗争的痛苦经验当中,更开始认清了中国解放运动的朋友和仇敌。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日益扩大的影响之下,日益扩大的罢工运动,历经残酷阶级斗争的锻炼,而日益坚定走上为全民利益而斗争而革命的道路。

七、香港海员大罢工

最足以表示这点的，恰是在华府会议时期爆发了著名的反帝国主义的香港海员大罢工。1922年2月12号，香港海员在苏兆征同志领导之下（兆征同志当时虽未加入中共，但已为香港海员所公认的领袖）宣布伟大的罢工，以增加工资为罢工主要的要求。至1月底，罢工人数，已达3万以上。停泊香港而无法行驶的轮船，共达166只（总吨数达28万吨）。不久，罢工运动就扩大到其他工商业部门了。最初，罢工只带经济的性质，但很快就转变成中国劳苦群众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了，当时孙中山氏之广州政府，对于海员罢工表示了公开的援助，在中国南部中部以至全国各大城市里，都举行了募捐援助罢工工人的运动，香港政府用尽了各种压迫欺骗的方法，以图镇压工人的斗争，但因罢工工人坚持到底的结果，经过55日伟大的战斗后，香港政府及船主终于不得不与工人进行谈判，并接受罢工工人的条件。在香港政府和船主3月5号所签订的条件中，实际上承认了海员工会（送还工会招牌）的存在，允许增加工资15%至30%，以及发给罢工期间一半的工资。香港海员英勇罢工的斗争，充分显示有组织的工人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具有何等伟大的力量。中国劳动群众第一次光荣的反英帝国主义的胜利，显然是整个中华民族胜利的代表。香港海员罢工的胜利，大大推动了中国工人运动与职工会组织的发展。

香港海员罢工之后，接着便发生了上海海员，纱厂，烟草及邮局工人的罢工，所有这些罢工，都获得了胜利的结果。其他如汉口钢铁厂工人的罢工，安源一万五千矿工的罢工，亦均获得胜利的成绩。1922年8、9、10三个月内，中国各大铁路工人亦相继举行了罢工。1922年5月1号，在广州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更加促进了伟大工人运动的高涨。而中国共产党底工作，亦在这个全国工人运动高涨中顺利进展了。

八、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于1922年7月。参加大会的代表,共20人。大会决议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为其正式支部,并通过党的政治行动纲领,在纲领中规定:(一)打倒封建军阀;(二)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争取中国民族和国家完全的独立;(三)建立统一的联邦民主共和国;(四)保障中国境内各民族——蒙回藏等的民族自决权;(五)争取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罢工的自由,争取普遍平等直接不记名选举制;(六)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其他各种改善工人生活的条件;(七)取消厘金及苛捐杂税,规定统一的所得税及固定的低度租金;(八)力争妇女平权及改良教育。在这一纲领中,以及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其他决议中,完全反映出党在当时的弱点:尚未充分了解农民问题的伟大意义,没有认识为争取自己对农民群众的领导的必要。

在这一时期中,党的基本工作,就是宣传革命理论,组织职工会,首先是组织铁路工人,海员以及纺织工人等等工会。同时,党在青年群众中,也进行了极大的工作。1922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国青年团在广州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大会,当时,全国已有4000团员,党在工人中间的影响,日益增长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已有几十个职工会,会员人数,约在15万以上。中国工人经济斗争与革命斗争的发展,使中国上层资产阶级,封建军阀,特别是国际帝国主义,惊惶万分了。他们专等适当的时机,以图打击和摧残革命的工人运动,结果便发生京汉铁路二七流血的惨案。

九、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自1922年10月起,资本家已升始向工人举行进攻了。在这时期中,上海纺织和烟草工人底罢工,遭受武力的压迫,工会亦被

解散。在极短的时期以内，单在上海即先后封闭了 11 个工会。开滦五矿 4 万工人的大罢工，发生了两次流血的冲突，结果，开滦工会同样也遭受了摧残。但最大的惨案，还是 1923 年 2 月流血的事件（著名的二七事件）。

京汉铁路工人决定于 1923 年 2 月 1 日在郑州举行京汉路总工会成立大会。1 月 31 号，军阀吴佩孚突令禁止集会，调派军警占领工会，并实行驱逐来到郑州参加会议的代表，为反对军阀的强烈压迫与摧残，3 月 4 号京汉路各站工会一致宣布罢工。6 号晚，驻汉各国领事与湖北军阀及京汉铁路当局，共同集议于汉口，决定以武力镇压罢工。于是 2 月 7 号在长辛店、郑州、江岸等处，军警实行大批枪杀和逮捕罢工工人。反对复工者概遭残杀毒打，工人组织亦尽被封闭。而在这次罢工斗争中，林祥谦同志（京汉路工会江岸分会主席）和施洋同志（著名律师）之英勇行动与光荣牺牲，深得全国各界民众之称赞，并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的斗争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二七事件中，京汉铁路罢工工人，虽极端坚定壮烈与一致的斗争，而“二七”的大罢工终于失败了。但从这一失败中，中国无产阶级获得了很大的教训。流血惨案打破了工人对于吴佩孚的幻想，在“二七”之前，尚有些工人组织，相信吴佩孚之所谓“保护劳工”与赞助“劳动立法”的谎话。而在“二七”之后，则每一个工人都明白看出，吴佩孚完全是帝国主义忠实的走狗。中国工人在自己切身斗争经验中，相信了自己的经济斗争是不能不与政治斗争联系的；是不能不与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军阀——的斗争联系的。同时，每个工人也更深刻感到。只有建立自己坚固的组织，方能争得真正的自由与真正改善自己的生活。

十、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二七”以后，中国职工运动，表面上似很沉寂，但实际上在

1923—1924年,职工会虽处于秘密状态,仍继续顺利进行其在工人群众中的组织工作,并将全国各重要城市与产业中心的大部分工人,都组织起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全国各地也有普遍的发展,党员已增至400人。党已开始由小组——由狭隘的宣传团体变成为群众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一方面实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次代表大会于1923年6月举行于广州。无论第二次代表大会或1923年2月的西湖扩大会议,都不能肯定解决关于反帝统一战线和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而第三次代表大会,则根据共产国际执委1922年1月12日的特别决议而解决了这一个问题。共产国际执委在决议中写道:

“国民党是现时中国唯一强大的民族革命组织,他以民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学生和工人为依据。

因为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属薄弱,因为中国目前的一切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华代理人——中国军阀,尤其是因为解决民族革命问题,直接有利于工人阶级,而现时工人阶级又尚未充分分化成为完全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委认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合作是必要的”。

共产国际一面号召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中央工作,但同时又要求中国共产党保持自己政治的组织的独立性,而不应依附于任何其他政治派别:

“只要国民党客观上进行着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在民族革命战线上一切运动中帮助国民党,但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不应与国民党合并,无论如何不应在这些运动中,隐藏自己特殊的旗帜”。

于决定国共合作问题中,第三次代表大会曾遇到“左”右倾分子的抵抗。“左”倾分子轻视民族革命解放运动的意义,而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右倾分子则以为实行国共

合作,就是取消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中的独立性与自己的政策。第三次代表大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反对“左”右的倾向,且终于通过了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决议。大会决定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但同时完全保存党的组织及党的政治独立性。中国共产党以变国民党为真正广泛的民族革命群众组织,为自己的重要任务。

此外,第三次代表大会又修改了党的纲领。这个纲领比以前的纲领,更加扩大了关于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与封建军阀压迫的要求。但不论旧的纲领或新的纲领,却都不曾提出农民群众的根本要求。而这一缺点,是应特别指出的,因为国际执委在其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特别的指示当中,曾着重指示:正确决定农民问题,具有第一等重要意义;并明白指出土地革命的基本口号,首先就是“无代价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口号。在该指示中说道:

“为要发展民族革命与建立反帝战线,就必须同时发展农民反封建残余的土地革命。只有能够吸引中国农民基本群众——小农——参加运动,这个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就应力求工农联盟的实现。而达到这一目的之唯一办法,则就只有不倦的宣传和实际上实现土地革命的口号;如没收地主土地,没收寺院庙宇的土地,无代价的交给农民;取消苛租,取消现行税则,取消税卡,取消包税制,取消官僚制度,建立农民自治机关,以处理已被没收之土地等等”(共产国际执委1923年5月给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

共产国际执委这一重要指示,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中,显然没有任何的反映。

十一、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1925年1月所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心问题就是党底群众工作问题。此时共产党员已经加入国民

党,并开始在国民党内部发展自己的工作。第四次代表大会对于党底任务,曾有确切的说明。大会通过了党章以及关于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等问题的决议;这些决议除总结了工作经验外,并规定改善今后党底宣传鼓动与组织工作的方针。关于应如何把反帝斗争与工农及小资产阶级之日常的局部的争取迫切利益的斗争配合起来的问题,大会亦有详细的讨论。第四次代表大会并着重指出工人阶级经济斗争的重要意义。在决议中说道:

“忽略工人经济斗争,不仅要使工人阶级本身受到损害,而且必然要减弱民族解放运动”。在农民问题上,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制定农民部分要求的纲领中,将农民底部分要求提的太不充分,且未能与无代价的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根本口号联系起来。这显然是一个根本错误。其所以犯这一错误的主要原因,则是由于对中国革命阶段有着不正确的了解。如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革命运动的提纲中曾说:“在民族解放运动统一战线阶段之后,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一来,实际上,就把继续反帝革命并为反帝革命强固基础的土地革命阶段,完全抹煞了。

第四次代表大会时,中国共产党全国共有党员约 1000 人。青年团员则约有 9000 人,青工占 30%。其余大部分则为先进知识分子,特别是学生,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劳动群众中的影响,日益发展。中国共产党底进步与成绩,反映出中国革命运动迅速的开展,而且成为革命势力增长的标志。

十二、革命根据地的广州

在第四次代表大会时,革命根据地的广州已大大巩固了。国民党在过去几年中,曾经过了不少严重的危机,在 1922 年,陈炯明实行倒戈(陈炯明曾为广州国民党政府主要军事人物),他反对国民党干预北方政府,他反对孙中山赞助群众运动的政策。在吴佩

孚与英帝国主义者帮助之下，陈炯明曾一时占据广州。孙中山氏并于 1922 年 6 月 20 日被迫逃亡。但不久，孙中山氏又收集势力，战胜陈逆炯明。不过南方政府过去所属五省（广东、广西、湖南、贵州、云南），因陈炯明倒戈叛变结果，完全陷于解体状态。陈逆主力，亦未被彻底击溃，而退据东江威胁广州，为时甚久。可是孙氏则终于在 1923 年 2 月 21 日，恢复了广州的国民党政权，更加坚决赞助群众运动，采取更加彻底的反帝立场，并于这时期内，从帝国主义手里夺回广州海关的主权。

1924 年 1 月，孙中山氏为确定新政策起见，乃于广州召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正式决议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合作，并通过了改组国民党的各种办法，使其变为真正群众的民族革命组织。因此改组的结果，当时的国民党便成为四个阶级（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之革命联盟。

1924 年冬，广州反动买办大商陈廉伯等，在广州举行反革命暴动以反对国民党改组及其新政策。他们有 3 万武装的“商团”，得到英帝国主义积极的帮助；英帝国主义甚至公开表示：倘若国民政府实行以武力镇压商团，那末，英国军队就不惜炮击广州。但是，广州政府元首——孙中山氏终于不顾英帝国主义者此种威胁，而彻底实行其革命措施。英帝国主义者之公然干涉行为，更引起广州广大群众的义忿。1924 年 10 月，在广州革命军与商团之间，发生严重战争，双方激战，经数日之久；在广大群众帮助之下，由于共产党员积极的参加，国民党军队完全歼灭了商团叛军；再过不久，盘踞东江之陈炯明残余势力亦被广州政府完全歼除了。

在这些战役中，黄埔军校起着莫大的作用。因广东革命军作战胜利的结果，蒋介石底威望亦日益增高起来。1923 年，当蒋介石任广东军参谋长时，广东军在反陈炯明反桂系军阀各次战争中，都连战皆捷；广西政权，不久复转入广东政府之手。1924 年蒋介石转任黄埔军校校长，他曾参加指挥镇压商团叛变与消灭陈炯明

残部等战役；正由于这些战役胜利的结果，加以蒋介石又善于利用广东军胜利以提高自己个人的地位，及至 1925 年时，蒋介石升任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

因广州政府军事胜利的结果，广州完全成了民族革命运动发展的巩固根据地。共产党与国民党在中国南部，特别是在广州之伟大胜利，给予全国民众反帝国主义运动之高涨以莫大的影响，曾给予全国工农运动以莫大的兴奋与鼓舞。

十三、北方政局之变化

在这时期内，全国工人运动的勃兴，罢工运动的发展，除中国南部革命胜利的影响外，北方政局之变化亦有极大作用。在不久以前，直系军阀尚称雄一时，其实际的首领——吴佩孚，尚为权威无上的独裁将军。1923 年，吴佩孚经过御用国会公开贿选曹锟为大总统，并凭借武力消灭和镇压任何工人的组织与斗争；假借“武力统一中国”的名义，在北方进行反奉的斗争；在南部则进攻广州革命政府。

但至 1924 年秋，北方政局大变，由于冯玉祥实行倒戈并联合奉作战的结果，直系势力大遭失败，曹锟被迫下野。当时，一方面冯玉祥在华北一带，编制国民第一军，完全采取独立的政治立场，而奉系军阀一时亦尚无充分实力以独揽北方政权；而另一方面，直系残余势力，又未完全消灭；因此之故，强固的中央政府，遂无法树立。临时革命执政的段祺瑞（日本走狗及奉系代理人）乃不得不拉拢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并邀请孙中山氏北上；并声言北京政府为一临时机关，一切国事，均须听由国民会议解决。但因段祺瑞企图以御用的军阀官僚的所谓“善后会议”，代替真正中国广大群众要求的国民会议，孙段谈判，便公开分裂；任何协商，均无完满结果。而在全国各大城市，国民会议促进会的运动，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普遍发展起来。

段祺瑞的执政政府，虽不比过去任何军阀政府民主一些，可是正因为他软弱无力，且不敢（至少是在第一个时期）公开采用军警屠杀方法来镇压群众运动，于是便为工会工作，罢工斗争以及国内全部政治生活，客观上造成了顺利发展的环境。民族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之北上，及其在北方各地推进的广大宣传工作，以及国民会议促进会运动的发展，非常增加和扩大了各地国民党的组织。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北方的工作与活动，同样也获得了显著的成绩。

十四、孙中山之逝世

正值此时，中国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与世长辞了。孙氏为谋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奋斗至 40 年之久；首先反对满清专制，继而反对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终身长期艰苦的革命工作，把他的身体消磨了。他于 1925 年 3 月 12 日死于北京。他一生革命的光荣历史，特别是晚年的精神和主义，是异常伟大的。他因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及领会十月革命的教训，在争取中国民族革命解放斗争中，日益坚决依靠于广大民众的力量。

孙中山在其临死时致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里写道：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病，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

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指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尽之业，移交与能续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

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

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既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孙逸仙(签字)

孙中山临死时所给予其手创之国民党的政治遗嘱，也是充满这样的精神。他的革命政策，“联俄，联共与赞助群众运动及反帝革命”，这便是孙中山底遗嘱，也就是国民党在其尚进行革命斗争时的旗帜。可是自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等先后叛变革命以来，国民党已完全叛变了孙中山先生的遗教。

第三章 中国革命第一阶段中的中国共产党

一、1925年之五卅事变

孙中山氏不幸死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重新进入特别高涨的时期，前此备受高压之中国工人阶级，在全国政治环境稍形顺利时，即奋起而作更加积极的斗争。

加之，1925年初，国内之工业危机十分严重，纺织业之生产，特别停滞，工人生活，因而异常恶化，当时的资本家对工人日常生活利益实行残酷的进攻，结果，工人组织的反抗斗争，非常扩大。1925年2月10号，上海沪西小纱渡日本内外棉纱厂首先发生群众罢工，上海其他20个日本纱厂之工人，亦立即闻风响应，参加罢

工人数约达 4 万以上。罢工时间继续半月之久，结果工人获得局部胜利。4 月间，青岛、广州、汉口各地纱厂工人，同样举行罢工。5 月中旬，上海纱厂工人因愤资方拒绝履行 2 月罢工结束之所允诺之罢工要求，重新举行罢工。罢工要求，多为经济性质。

正在这个时候，著名之上海流血惨案，骤然爆发，而 1925—1927 年的大革命，且即以此为起点。5 月 30 号上海市之工人及学生群众，在南京路一带举行伟大示威，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劳苦群众，特别是反对日本监工屠杀中国工人领袖——中国共产党员顾正红同志。当时，租界英巡，公然枪射示威群众，当场死伤数十人，被捕者则约在 600 人以上。帝国主义者底野蛮屠杀，立时激起上海全体中国人民的义愤。自此时起，全国反帝斗争，遂进入澎湃高涨的阶段。

五卅事变，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狰狞面目。“五卅事变，把我国真实情况完全显露出来，任何人都可以看出帝国主义者野蛮残暴的真面目，”（见《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外宣言》）。当时上海广大群众之反抗怒潮，如火如荼，高涨万分。到处举行集会讲演，实行罢课罢工罢市。各厂工人相继罢工。至 6 月 12 号，罢工工人已达 50 万人。上海商人为响应工人总政治罢工，亦于 6 月 1 号宣布全体罢市。6 月 1 号所有中国银行一律停止营业。上海整个经济生活遂完全陷于停顿状态。

上海学联会，除组织各校学生出发讲演并联合工人团体及各界市民举行示威游行外，复派遣代表到全国各重要城市活动。6 月初，为声援上海工人学生斗争，武汉学生及工人群众亦举行罢课罢工，实行游行示威。6 月中旬，在汉口因英巡枪杀示威工人及学生，罢工斗争，更有扩大为总罢工之形势。同时，九江示威群众焚烧日本台湾银行。而全国各地，如北京、青岛、南京、广州、开封以及其他城市，无不闻风响应，实行同情罢工斗争。帝国主义者为制止和镇压上海事变继续发展起见，立即集中军舰 30 余艘于上海一带。

在力争民族解放,打倒帝国主义,要求取消不平等条约,改善中国工人政治经济地位等口号之下,工人、学生及抱反帝情绪的资产阶级分子之英勇斗争,蓬勃发展起来。而6月5日在上海成立之工商学联合会即为整个运动之领导中心。

二、上海五卅事变之发展

中国资产阶级很快就退出五卅事变所掀起的民族革命斗争。工业资产阶级,很快就借口提倡国货而要求华资工厂复工;上海工人只得表示让步,并于6月15日宣布华资工厂一律复工。过数日后,上海商人的罢市,亦宣布停止;而中国商人当时则借口说,彼等以前宣布罢市,只在表示其爱国,表示其对死难同胞之同情,与对惨案凶手之愤怒而已;现因继续停业,既于彼等利益有害,而对外人利益又无大损失;权衡轻重,故非宣布复业不可。

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战线,削弱了民族解放运动,使五卅事变后所爆发的伟大的民族革命斗争,遇到新的考验。中国军阀实行帮助国际帝国主义而镇压群众的革命斗争。奉系军阀派张学良率兵南下,摧残上海工人学生的组织,禁止一切群众的集会与示威游行,逮捕积极革命战士以至封闭一切工会。虽然客观的环境如此艰难,上海无产阶级仍完全依靠于自己的力量,英勇继续反帝斗争,坚持奋斗,计达三月之久。

最后,估计到几个月来环境的改变,工人群众乃不得不使一般的反帝革命斗争,转变到部分经济斗争。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上海职工会方开始与雇主进行谈判。结果,上海工人实行了有组织的复工,(日本企业于9月间复工,英国企业则延至10月间,方行复工),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上海五卅事变实起着极巨大的作用。它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反帝国主义群众政治斗争的学校。在五卅事变的发展中,中国无产阶级表现出它是最英勇最彻底的反帝战士,它变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它日益争得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权。

五卅事变使中国工会组织有着空前有力的发展。在事变一经开始时,在上海一处,就组织了72个职工会,上海总工会亦于此时正式成立,实行领导以后上海工人一切的罢工运动。上海五卅事变对于以后中国反帝国主义革命斗争的发展,以及对于广州革命根据地的巩固,都有极重大的影响。五卅事变在全国引起了广大民众反帝反军阀的斗争。

三、香港大罢工

五卅惨案所掀起的全国民族革命斗争的怒潮,在广州表现得尤其高涨。由于广州“六二三”惨案,乃更促进了这一运动的开展。6月23日广州群众为响应和援助上海反帝斗争,曾组织了广大的示威游行。当示威群众走近沙基一带(广州的外国租界)时,沙基租界英巡大批枪射中国示威群众。死伤直达数百人之多,为反抗帝国主义者新的野蛮兽行,有名的香港大罢工在中国共产党最忠勇的战士苏兆征、陈延年、邓中夏、杨殷、罗登贤诸同志领导之下开始爆发了!香港所有的中国工人一律离港返省(广州)。罢工工人在国民政府赞助之下,组织了自己的宿舍,设立了自己的食堂,并找到了各种社会工作。罢工工人组织了武装纠察队和革命人民法庭,以镇压帝国主义和走狗工贼。同时由于广州工人苦力仆役车夫英勇的罢工与坚决拒绝为英日人服务,因之所有居留广州之英人和日人,亦不得不离开广州。香港罢工坚持达十余月,使英帝国主义所受损失超过五万万万元以上。

香港罢工引起全国民众广大的同情,各地所有重要城市均实行募捐以救济和援助罢工工人。同时香港罢工委员会正式成立工人纠察队,严格进行抵制英货运动,积极巩固广州国民政府的地位,继续促进反帝革命斗争之开展,并努力推动全中国的工人运动以至吸收千百万元的农民到革命斗争中来。正由于香港十万罢工工人之支持,广州国民政府之基础,大形强固。国民政府对于香港罢

工工人所给予的赞助,亦使国民政府的威信大大提高。中国各地劳苦群众日益倾向和同情于广州革命政府。

因著名共产党员之积极参与与领导香港罢工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广大民众中的威望及影响,便迅速增长了。

1925年夏季之上海香港无产阶级的英勇斗争,使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内部发生了转变。在民族革命运动初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曾是反帝国主义斗争战线的最积极参加者。当时斗争的主要方式,为学生之示威游行与群众集会,以及抵制外货等等。只是在上海香港总政治罢工之后,民族解放运动,方走上真正群众的反国际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上海香港无产阶级不怕牺牲的英勇战斗,成了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起点。

四、1926年之3月20号事变

但革命运动之发展过程,并不平衡,1925年末几个月以及1926年上半年,革命浪潮显有一时之降落。中国反动势力在帝国主义赞助之下,开始了全线的进攻。山东军阀张宗昌占领了上海,取缔与解散所有的工人组织。北方各重要工业中心,工人群众组织亦遭受同样的命运,罢工运动显然削弱了。

当时,北方郭松龄之反奉倒戈,由于日本的积极干预,遭到了失败,吴佩孚与张作霖重新联合起来,且实行军事同盟,共同进攻冯玉祥当时所领导之表示赞助广州革命政府的国民军第一军。在直奉武力压迫之下,国民第一军不得不退出北京、天津、张家口等地,而暂时在内蒙西部一带保持自己的实力。吴佩孚在河南亦利用农民红枪会组织的赞助,击溃了刚成立不久的国民第二军与国民第三军。

但最重要的事变,则为广州的3月20号事变。广东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于1926年3月20号,实行驱逐和排斥汪精卫及其他当时的国民党左派领袖,逮捕与撤换广东军队中的政治工作

人员，以及撤销所有共产党员在军政机关中负责的位置；甚至在右派怂恿之下，蒋介石且要将共产党员从国民党中开除出去。“1926年3月20号蒋介石要将共产党员从国民党中开除出去之企图，就是民族资产阶级镇压革命的第一次最严重的企图”。（见斯大林：《论反对派》，中文版第254页。）蒋介石在广州之反革命行动，大大助长了各县的反动势力。广东的地主豪绅高利贷者，到处向农民协会实行残酷的进攻。

但蒋介石之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当时并未能完全实现。他当时只能采取了一些限制共产党活动的办法。当时，民族资产阶级还不敢同无产阶级实行分裂。因为共产党当时在一切群众运动中，占着完全领导的地位，所以国民党仍然只得继续实行联共政策，经过这一个短期间的反动时期以后，新的更强大有力的革命高潮，便又接着到来了。

五、中国革命之性质与任务

中国革命汹涌澎湃开展起来了。它的性质和任务如何呢？

斯大林同志关于这个问题，曾给过下列的指示：

“决定中国革命性质的基本事实是：（甲）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和帝国主义的财政经济的统治；（乙）因军阀和官僚的压迫而加重的封建残余的压迫；（丙）千百万工农群众日益发展的反封建官僚压迫、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丁）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性，它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性，它对革命运动规模的畏惧；（戊）无产阶级日益增长的革命积极性，无产阶级在千百万劳动群众中的威信的增长；（己）中国邻邦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

中国革命生长扩大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帝国主义的统治与封建残余的压迫，完全危害着中国底独立发展和扩大民众生存的需要，因此，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是：一、将中国由国际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使之达到政治上、经济上的完全独立；二、以革命方

法统一中国,解决土地问题,废除地主土地占有制以及社会制度中所有的封建残余;三、推翻反动军阀官僚政权,建立工农革命民主专政。

中国革命所有这些基本任务,都互相联系着,要真正解决其中任何一个任务,都非同时解决其他各任务不可。而为要解决所有这些任务,却非巩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不可。换言之,只有中国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城乡千百万劳动群众,战胜民族资产阶级底抵抗,打破它在群众中的影响,方能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达到胜利;而这一胜利在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与苏联存在的条件之下,又开辟中国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我们现在来看看当时中国事变发展的实况。

六、北 伐

自1926年7月起,中国政治环境发生着很大的变化。有名的北伐,即于此时开始。广东国民革命军向北进展,节节胜利,不数月而占据了湖南、江西、湖北、福建等省。广东国民政府之领域,大大扩展,包含人口至一万万五千万人之多。国民革命军之部队,也日益扩充。原有的6万国民革命军队,至1927年初,即增至17万人了。因为革命借以扩充之主要来源,乃是被击溃的或转变到革命方面来的军阀部队,加以优良的政治教育工作,尚很缺乏,革命部队之战斗能力及政治水平,当然相当降低了。

然而,因共产党员及左派国民党员英勇积极的参加,国民革命军终于完全击溃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势力。且使有名军阀孙传芳的反动部队,同样遭受严重的失败。中国军阀势力之覆灭,显然使国际帝国主义者在华的统治,也遭受巨大的打击。而且,因北伐军之胜利发展,在北方一带,国民革命军的部队,也随着形成。冯玉祥所指挥之国民第一军自得援助以后,遂转守为攻,由岳维峻所督率之国民第二军,也把吴佩孚在陕西的势力驱走了。

1927年1月1号,国民政府由广州迁都武汉,除上海以外,武汉三镇(汉口、汉阳、武昌)为中国最大之工业政治中心,国民政府之迁都武汉,更加提高了劳苦群众的革命热情与积极。

如果没有工农群众积极的帮助,北伐军是不会得到胜利的。在反动势力后方之工人罢工与农民斗争,大大便利了北伐军底进展。同时,劳苦群众也利用了北伐军的进展,利用了革命势力的扩大,利用了当时的民主环境,以便展开为自己的切身需要的斗争,展开为建立和扩大自己的组织的斗争。

七、群众运动之发展与统一战线之破裂

在国民政府所有的领域以内,到处爆发着强有力的罢工运动。在汉口的外国企业内,工人群众用罢工手段获得了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及组织职工会的权利。同样,在北伐军所克服的其他城市里,工人也获得巨大的胜利。民族解放斗争一般的高涨,扩展到所有中国其他的省份,罢工运动也随之发展起来。差不多所有的城市工人群众,都一起加入职工会的组织。如1923年职工会的会员为23万人,1926年为126.4万人,而1927年则已达280万人。

农民运动也日益发展。初开始时,农民多半从事减租与取消苛捐杂税的斗争。及至运动愈向前发展。卷入斗争的农民群众愈加众多,因而运动亦更加带着革命的性质。在有些地方,农民直接夺取和分配地主的土地,驱逐地主与高利贷者,而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在北伐军占领的区域内,农民协会发展得特别迅速。1927年3月时,湖南农民协会的会员,已达数百万。其他如广东,广西,湖北等省之农民协会,亦有极广泛的发展。当时,在国民政府领域以内,农民协会会员的总数,多至1000万人左右。

当时,中国共产党已获得伟大的成绩,党的组织扩大了,党的刊物之销行份数激增了,党的中央机关报《向导》销数,已达5万余

份。党的区委省委所出版的杂志报纸群众刊物之销行份数，亦大形增长。中国共产党已成为群众的党了。他在中国工农解放斗争中的领导地位巩固起来了。由于广大群众革命的觉醒，1927年1月3号，汉口九江的革命群众，自动收回了汉浔的租界。不久，经过两次武装起义失败的上海工人，于1927年3月，又举行了胜利的第三次武装起义，给予了北伐军占领淞沪区域以直接的影响与援助。

国际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革命顺利的发展，进行着积极干涉的斗争。1926年9月，曾有英舰炮击四川万县事件的发生，死难者有227人，伤者约达数百人，帝国主义对于广州始终实行封锁的政策，同时并以隐蔽的武装干涉方式，给予北方军阀以极大的帮助。革命运动之向前发展及国民革命军之占领上海，使国际帝国主义者更加积极起来。1927年3月下旬，帝国主义者向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提出哀的美敦书，并实行炮击南京。由于革命伟大的发展以及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族资产阶级转入反革命营垒去了。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实行了四一二的反革命的政变，他派兵占领和封闭工会，包围和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并命令以机关枪向反抗的工人实行大规模的扫射。继蒋介石之后，广州国民党军阀李济深，也举行了四一五的惨杀。蒋介石在南京组织自己的“国民政府”，以与武汉政府相对立，在南京统治区域以内，到处实行屠杀和摧残工人农民学生以及文化的团体。共产党被迫而转入极端秘密的状态了。

蒋介石的叛变，结束了中国革命第一阶段——广州阶段。中国革命第一阶段底特点，就在于它是全民联合战线的时期，民族资产阶级赞助革命运动，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这是全民联合战线的时期，可是这并不是说民族资产阶级与革命之间没有什么矛盾，而仅仅是说民族资产阶级赞助革命，企图利用革命以达到它自己的目的；企图使革命以扩张领土为其主要的目

标,而限制革命的发展”。(见斯大林:《论反对派》,中文版第254页。)

民族资产阶级转到反革命的营垒,并不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中国无产阶级为自己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所进行的斗争,引起了中国资产阶级莫大的惊恐,以致使之最后走上反革命道路。这一阶级力量的分化,虽相当的混乱了革命队伍,可是终于开辟了革命斗争更加猛烈高涨的新阶段。

八、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第一阶段中的路线

在中国革命第一阶段中,共产国际的立场如何呢?它向中国共产党指示以何种策略路线呢?共产国际在规划其路线时,估计到中国革命之民族的特点。它决定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任务,均以中国为一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作出发点。共产国际估计到在中国主要的压迫形式为封建残余,以及封建残余与帝国主义统治的联系,共产国际并预见到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封建革命所必然经过的各种不同的阶段。

在中国革命第一阶段中,共产国际曾认为:当民族资产阶级在进行反帝国主义斗争时,当它不阻碍以革命精神教育和组织工农群众时,则联合资产阶级会使工人阶级与农民底力量易于发展起来。在反对强大的敌人——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利用甚至临时的不可靠的同盟者都是必要的。这就是共产国际策略的出发点。但这一策略所要求的,是为着革命利益利用民族资产阶级,而绝对不是使工人阶级迁就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如此,所以共产国际,始终着重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保持工人运动的独立性,必须最大限度发展群众运动与为争取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而奋斗。

共产国际已预先见到中国革命第一阶段必然会转入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中,主要对象,是反对帝国主义,且得到民族资

产阶级底赞助,而在第二阶段中资产阶级则退出革命战线,同时,土地革命便成为主要的内容。在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这种阶级力量分化的必然性,共产国际是及时预告了中国共产党的。

正因为这样,所以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土地革命运动风暴般的发展,对于中国革命是有决定意义的。共产国际以为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真正胜利,只有彻底实现为反帝国主义斗争之基础的农民土地革命,才有可能。1926年11月,斯大林同志对于所有那些否认农村革命的可能,或者害怕农村革命的发展的中国革命分子,曾予以严厉的反驳。斯大林同志说:“中国农民愈是迅速而彻底的加入革命,则中国反帝战线亦将愈为坚强而有力。”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1926年12月)的决议中,又同样着重指出这个意思,在决议中说:“现时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完全依靠于土地革命。”

九、共产国际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共产国际为着自己基于列宁学说的唯一正确路线,而坚决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陈独秀、彭述之等等,有着很厉害的机会主义倾向,完全不了解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一种暂时的有条件性的联盟。他们不顾共产国际底指示,不向群众预先解释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却曲解统一战线的策略,说这个策略是要把工农的解放斗争,服从资产阶级底利益。因之,在有名的3月20号事变当中,共产党并未曾给蒋介石以应有的抵抗。在北伐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当时的领导者陈独秀等,且甘愿限制罢工与组织工人纠察队的权利。共产国际对于这些机会主义的错误,曾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它并依靠于中国党内的布尔塞维克分子来进行这一斗争。

另一方面,与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问题底立场相反的,则有

托洛斯基——季诺维埃夫反对派。他们否认封建军阀压迫的重大作用,不了解中国土地革命运动的决定意义。他们说:中国革命之所以带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仅仅是因为中国资本主义要求关税自主。因此,托洛斯基——季诺维埃夫反对派,简直是拥护了中国资产阶级地主和军阀分子的观点与利益。

托洛斯基——季诺维埃夫反对派,还在中国革命开始的阶段中,即要求中国共产党须退出国民党,即要求破裂与资产阶级的联盟,同样也是等于替资产阶级和地主分子服务,他们这些要求的实现,只有破裂革命的势力而已。

在北伐时期,正当国民党在群众中的威望空前提高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员如退出国民党,那就只有脱离群众,那就恰恰是为国民党右派及一切反动分子所玩弄(所有这些反动分子皆是企图开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这样,也就会使共产党失却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并无法组织工农群众与领导工农斗争。

托洛斯基主义之特质,在托洛斯基——季诺维埃夫反对派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立场上,清楚的表现出来了。托洛斯基主义完全抹杀中国革命底民族特点,忽视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忽视土地革命,不了解中国革命之资产阶级民主性,否认伟大土地农民运动之前提,轻视农民作用以及不相信无产阶级有领导农民的能力等。

正由于共产国际底正确策略,方保证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异常重要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中国革命第一阶段(广州阶段)中与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联盟,是为着扩大革命的领土,变为群众党,取得公开组织无产阶级的可能,以及开拓接近农民的道路……民族资产阶级转入反革命营垒了,可是它同时却失掉与广大民众的联系……只有这样的正确政策方能获得这样的结果,这难道还不清楚吗?只有这样的正确政策,方能提高无产阶级的战斗力,这难道还不清楚吗?”(斯大林)

第四章 中国革命第二阶段中的中国共产党

一、革命中心的武汉

蒋介石的叛变,就是表示民族资产阶级转入了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地主的反革命的营垒,“蒋介石的叛变,就是说中国革命已发展到自己的第二阶段,已经开始由全民联合战线发展到千百万工农群众的革命,发展到土地革命,而土地革命,将更其加强和扩大反帝国主义,反豪绅封建地主,反军阀以及反蒋介石反革命派的斗争”(《论反对派》)。

因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结果,中国南部形成了两个政府,两个中心——武汉的革命中心与南京反革命中心——对立的形势,双方政策,完全相反,南京政府即刻同帝国主义者实行妥协,无情镇压群众反帝运动,而在武汉政府领土以内,群众反帝革命斗争,却空前高涨起来,南京政府实行与苏联断绝关系,而武汉政府,则仍采取更加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亲密合作的政策。

在南京政府领土以内,实行摧残工农组织,到处枪杀领导群众运动的共产党员,而在武汉,中国共产党却仍然公开的广大发展自己的工作;共产党员加入了武汉政府,农政部长、劳工部长、内务部长均由共产党员充任,规定了加强广大劳动群众监督政府机关的办法,例如:对于省代表会议的召集,当时曾有极广大的准备工作,以便建立民主选举的政权机关,湖南之省代表会议,并预定于5月20日召集。

当时,武汉政府统治有湖市、湖北、江西以及河南之一部,同时,武汉军队更向北进展,胜利地反对奉系反动军阀而企图与冯玉祥部——当时冯氏一再声明他始终是忠实于武汉政府的——会师于郑州。

中国革命第二阶段之主要特征,就在于武汉政府统治区域的

群众运动,空前高涨,罢工浪潮汹涌发展,所有工人群众几乎全体都加入了职工会,武装工人纠察队亦已组织起来,工人斗争更容易强迫企业主满足其斗争要求了,农民协会继续迅速扩大,单在湖北一省,1927年3月农民协会的会员为80万人,而在同年5月15日已增至200万人,几乎到处的农民协会,都成了乡村的实际政权机关,革命的农民,自动地开始废除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度,农民协会在许多地方逮捕农民群众最厌恶的地主豪绅,并加以审判,没收他们的财产等。农民武装自卫队亦在很多地方建立起来。土地革命如风暴般的高涨起来。

二、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这种环境之下,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乃于1927年4月27日,在武汉召集(共继续半月之久),这时党已获得伟大胜利,已成为群众的党,成为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强大因素。自第四次代表大会到第五次代表大会党员已由994人,增至57967人,工人同志占53.8%;中国青年团团员已增至3.5万人,其中青年工人占41%,青年农民占34%;儿童团团员达12万人以上;党的机关报《向导》周报亦由7000份增至5万份了,党领导着包括千百万群众的职工会农民协会,在这些群众组织中,党的影响,日益扩大。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完全公开环境中举行的,武汉国民党领袖汪精卫、谭延闿、徐谦等均以来宾资格参加开幕典礼,并向大会致词祝贺以表示国共两党亲密合作。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举行于革命斗争极端高涨的时期,其任务是在总结过去工作的经验,指出中国革命今后发展的前途与确定党在最近期内的任务。大会议事日程第一项,就是讨论中共总书记陈独秀所作的中央政治组织报告,经过讨论之后,大会指出:在这一时期以内,党的领导机关,因误解民族统一战线之故,

犯了不少错误,夸大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及革命性,并未充分保障劳动群众的利益,在北伐时期党“并未充分注意到,在革命领土扩大时,必须加深革命的社会基础”。(“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土地问题,党的领导未曾提出激进的要求,因之也就不能巩固工农的联盟,以及工人阶级在工农联盟中的领导地位。大会驳斥了陈独秀机会主义的理论,大会关于中央报告所通过的决议,大部分是与共产国际立场相符的。

第五次代表大会所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大会完全和一致接受了这一提纲,未加丝毫修改。

大会议事日程上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大会对于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却并未给以明确的彻底的解决,后来不久,根据共产国际之指示,中国共产党修改了这一个决议,更加彻底地走上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立场。

大会之继续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央总书记,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陈独秀是中共发起人之一,而且在这次大会上,又表示赞成大会关于斥责他的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于是大会又继续选举他担任最负责的工作。五次大会前及在大会上,瞿秋白同志等,曾在理论上进行过反对彭述之、陈独秀等右倾机会主义政策的斗争,可惜这种斗争未能充分彻底的进行,而且只限于上层同志范围之内,以致未能引起全体同志和广大群众的注意和参加,因此也就不能及时地真正的给陈独秀、彭述之等机会主义错误以致命的打击,于是,在后来事变发展过程中,由陈独秀所独揽的党的实际领导,却使党遭到了极严重的令人痛心的结果。

三、武汉国民党领袖的右倾与叛变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闭幕不久,武汉环境即顿呈恶化。虽然武汉军队在北伐前线上,迭获胜利,尤其是有名的豫南战役。

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员团长蒋先云同志等统率所部士卒，奋勇杀敌，卓著战绩，并为革命利益，捐躯疆场；可是武汉的政治环境却日趋严重，日趋复杂。国际帝国主义，向武汉实行经济封锁，资产阶级亦实行各种怠工，于是武汉政府领土内的经济生活，遂陷于紊乱与破坏不堪的状态，资劳冲突，因而更形剧烈，剥削阶级对于武汉国民党的压迫，也日益加强；而尤其有重要意义的，则为当时猛烈发展的农民土地革命运动，土地革命强大的展开，使国民党的无产阶级领袖日益惊惶失措，而终于转入反革命的营垒。

后方反革命的暴动的发生，更加速了武汉国民党这一右倾的过程。自夏斗寅部叛变后，武汉政府即陷于日趋瓦解的状态。夏斗寅部乃武汉政府当时用以防止四川军阀部队侵入武汉的队伍，但 1927 年 5 月中旬，夏斗寅却公然接受蒋介石的指示，率部叛变武汉政府，联合四川军阀，使四川军非常容易占领了鄂西的区域，并共同造成威胁武汉的形势，为时不久，夏部叛军，即为共产党员叶挺所辖部队击溃，而叶挺在北伐战役中，即以英勇善战著称。

正在这个时候，在湖南长沙复有马日事变发生（1927 年 5 月 21 日，许克祥在长沙所举行的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实行武力解散国民党左派省政府，封闭工会及农民协会，围缴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以致大批枪杀群众领袖百人以上，并组织湖南反动政府。

不久，江西在实际上也与武汉脱离关系，这里反革命政变，也是在那些与地主豪绅有联系而为土地革命所惊恐的反动军官领导之下举行的。南昌之反革命政变，即为朱培德所组织，他驱逐（礼送）自己部队中的共产党员，解散农民协会，禁止共产党的公开活动，并开始以武力摧残和镇压工农革命运动。

最后，冯玉祥也背叛了武汉政府，1927 年 4 月 18 日，冯玉祥被任为武汉革命军的总司令，同年 6 月初，复被任为河南省政府主席，与豫陕甘三省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主席，但至 6 月底，他却同

蒋介石完全妥协了,并坚决要求武汉国民党领袖实行反共的政策。

因经济危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深刻的阶级矛盾的压迫,因反动军官先后叛变与暴动的影响,武汉国民党领袖开始日益动摇起来,武汉国民党日益显然由赞助劳动工农群众而变为反对工农群众的力量了。武汉政府对于许克祥朱培德的叛变,不仅没有给以任何的制裁,反而走向这些反动军官投降的道路。

自1927年5月底起,武汉政府即颁布保护剥削阶级与限制工农团体活动之各种法令,限制军队中政治部工作之特别法令,同时湖北两个最大的县农民协会亦被武汉政府所封闭,但所有这些步骤,当然不仅没有阻止反动分子之进攻,而且是更助长了他们的反动。

在7月中旬,武汉国民党领袖已完成其右倾的过程,公开发布他们与共产党破裂宣言,从此以后,在武汉便形成极端反动的局面,一切革命群众团体,工农学生团体,尽遭取缔与摧残,共产党员及大批先进青年遭受屠杀,武汉国民党的领袖完全走上了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南京政府实行联合的道路。

四、武汉时期中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左”倾

在中国革命第二阶段中,共产党的任务,就是在于利用自己在群众中广大的影响与参加武汉政府的机会来尽量发展土地革命与最大限度的开展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共产党人应当为转变武汉政府为工农革命民主专政而斗争。共产国际正是基于这原则,对于中国共产党发出自己的指示,在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体会议(1927年5月)的决议中曾说:“目前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发动千百万农民来自动从下层用(平民)革命方法解决土地问题……必须迅速,勇敢而坚决执行武装工农群众政策。”

但是中国共产党当时的领导者——陈独秀、彭述之、谭平山等,并未遵照这些指示,却公开采取了机会主义的立场。当时他不

仅没有去尽量发展群众运动，反而迁就国民党及反动军官的压迫，实行阻止群众的斗争；不仅没有反对反而赞助武汉政府关于限制工农团体活动的各种措施；不仅没有利用共产党员参加政府的机会以组织群众实行土地革命的斗争，以及树立民众与政权机关的联系，却反而把共产党参加政府，当作官僚政客上层拉拢的手段；他们袒护了开始右倾的武汉国民党之反工农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中央陈独秀、彭述之、谭平山等之机会主义之领导，不仅未曾设法武装工农反而在武汉国民党领袖开始动摇时，即公然决定自动解散所有武汉的职工会的纠察队，并自动解除武装。当时本该如斯大林同志所指示的那样“吸收那参加土地革命的农民和革命工人来编制许多可靠的军团……并使其成为武汉革命政府的支柱”。可是陈独秀、彭述之等机会主义的领导，则采取了投降政策，不仅没有加强党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势力，反而削弱了自己的势力，甚至对于长沙许克祥的叛变（马日事变）和南昌朱培德的叛变，以及其他地方所发生的叛变，陈独秀、彭述之等机会主义的领导，也都未曾采取任何抵抗的步骤与方法。且为表示自己忠实武汉政府起见，陈独秀、谭平山等，且实行禁止农民自卫军对于反动军官所进行的英勇积极斗争。

中国共产党当时的领导人陈独秀、彭述之、谭平山等所犯的深刻的右倾机会主义性质的政治错误，乃成为中国革命失败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但在另一方面，在这一革命时期中，托洛斯基——季诺维埃夫反对派所积极宣传的观点与口号，也丝毫不减于这一右倾的危险。武汉时期刚开始，反对派即重新主张，中国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并提出立即组织工农苏维埃的口号；但实际上，这一口号，就是推翻武汉政府的口号；而武汉政府当时还是革命政府，如继续广泛开展反帝国主义的土地区革命。比方在武汉政府势力所及的范围内，现在就组织工农代表苏维埃——那就是说造成两重政权，提出推翻左派国民党而建立新的苏维埃政权的口号；（斯大

林 1927 年 5 月)即刻组织苏维埃的要求,正是一种冒险式的向前跳进的要求,就是说要进行反对武汉国民党革命政权的斗争,而这正是蒋介石所希望的,也正合乎他的利益,因为他恰巧企图推翻武汉政府与打破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的合作。

五、斯大林同志与中国革命

在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上,在共产国际反对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左”的错误的斗争上,斯大林同志起着极大与显著的作用。根据中国革命之实例,斯大林同志在理论上发展和充实了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乃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之组成部分学说。

斯大林同志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给了极端确切的分析;他指出中国商业资本的发展与封建残余的统治有相互错综的关系,这个指示对于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异常重要的,他揭示了中國革命反封建任务反帝任务互相密切关联的联系。

斯大林同志且根据中国特殊环境而非常明白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两个巨流及其发展的阶段。斯大林同志曾说:“谁不懂得任何革命都有其发展的阶段,谁不懂得中国革命在其发展中,经过了三个阶段;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中国问题。”

斯大林同志,在为唯一正确的列宁主义路线之纯洁性而进行的两条战线斗争中,根本粉碎了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取消派的反革命的托洛斯基的思想。

斯大林同志在理论方面关于反帝统一战线的言论以及在其他策略问题上的言论——如关于军事因素问题,关于革命军队问题,关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具体斗争道路问题,关于共产党的建设问题,关于苏维埃问题,以及关于中国革命前途及其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问题——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千百万劳动群众

在其反对国际帝国主义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斗争中，在其为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斯大林同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著作与言论，乃是对于马克思列宁革命学说宝库的最珍贵的贡献。不深刻研究斯大林同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一切著作和言论，要想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是不可能的。

六、中国共产党之八七会议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给了年青而未充分成就的中国共产党克服党内右倾机会主义与“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以巨大的帮助。中国共产党之八七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事业上，作了一个伟大前进的步骤。1927年八七紧急会议，是根据共产国际的要求，背着陈独秀及其他机会主义领导分子的意志而召集的。八七会议，异常严厉地斥责了过去领导机关陈独秀等人机会主义的政策，认定他是公开的取消主义的路线。

在八七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中说：我们欢迎共产国际之坚决的干涉，正因为共产国际坚决干涉的结果，我们才得以揭穿以前中央领导机关错误而挽救我党于危急，我们坚决指斥以前中央所执行的机会主义的非革命的政策，我们认为必须根据过去的教训来根本改变党的政治路线。

八七会议认为：以前陈独秀、彭述之等所领导的中央，不仅执行了极其错误而使中国革命遭受失败的政策，执行了自动取消与实行投降的路线，而且坚决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与国际领导机关的指示，他们甚至自觉违背国际的纪律与义务，敢于不向全党公布共产国际的决议与指令，使全党无法了解问题与表示自己的意见。八七会议撤换了过去机会主义的领导，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口号作为劳动群众斗争的基本核心，它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上，起了历史转变的作用。

七、南昌(八一)起义

当八七会议时,环境已十分严重,白色恐怖正异常猖狂,由于武汉反动派胜利的结果,已完全被赶入极端秘密的状态了。武汉国民党的叛变正是表示中等资产阶级以及上层小资产阶级,转入了资产阶级地主底反革命营垒。可是工人和农民并未不战而退,他们并未丧失自己保持与巩固革命胜利的信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他们经过许多以武力坚持和继续革命事业的尝试,而南昌起义,便是这种英明伟大的尝试之一。

参加这一起义的,为中国共产党员贺龙、叶挺所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的部队人数约在2万以上,1927年8月1日晚上,他们占据了南昌,他们在解除了当地反动部队的武装,没收了银行的财产,向南昌资产阶级征缴了款项之后,随即实行南征,企图夺回广东。

1927年9月24日,叶挺部占领汕头,但10月2日即被迫退出,并被广东军所击败。贺叶南昌起义失败之原因,虽由于当时反动势力的强大,但领导革命部队南征的指导者之策略上的错误,亦为引起失败的重要原因。

此次运动,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起义的领导者没有赞助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却仅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口号,而结果连这个口号也没有加以实行。

起义的革命部队,并未与农民运动树立联系,并未发动农民斗争与武装农民,在革命军所过之地,亦并未毁灭旧的政权机关而另建立新劳动群众的政权,正由于这些错误(政治领导者谭平山因此被党开除),贺叶南征,便完全带着军事动作的性质而终于遭受失败。

结果,只有几团残部冲破了敌人的重围,这几团部队,在朱德同志领导之下,与广东福建,江西三省边界上的农民游击运动,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成为以后强大的中国红军基本部队之一部。

八、广州公社

1927 年秋,南方一带掀起了农民起义的浪潮,这些零散的农民斗争,只在少数地方获得较长期的胜利。如在广东的仁化,农民群众的斗争,曾一时获得了极大的胜利,他们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并且实行分配地主的土地。在海陆丰一带,自 1927 年 11 月至 1928 年 3 月,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没收地主土地,毁灭田界,将地主土地及财产分给农民。

但是,这些区域里的农民斗争,并不能代表全国的形势,反革命势力在各地都团结自己的力量,向着工农的革命营垒进攻;正在这样的条件之下,爆发了广州工人的武装起义——坚持革命所得胜利的最坚强英勇的企图。1927 年 12 月 11 日夜间,在革命军委员会底英勇主席张太雷同志领导之下,广州工人的武装队伍与当时转变到革命方面来的教导团队伍,在广州开始了革命的起义,起义群众占领了广州之后,随即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在广大的半殖民地国家内,苏维埃政权的旗帜便第一次变为实际行动的口号。

广州公社,虽然存在不久,虽然经过约三昼夜英勇抗战之后,就遭受失败,可是它已在全世界面前,正式宣布了中国苏维埃政权之真正革命的纲领。它颁布了许多根本改善工农群众生活的法令;它颁布了关于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关于无代价没收地主土地转交给农民,关于废除一切苛刻债务佃租契约等等法律。

苏维埃一成立,便由监狱中赦放出 30 名以上的政治犯,便着手组织红军,便着手没收军阀的房屋与财产,分配给城市贫民,以及对于失业工人实行国家救济办法等等。

广州公社的世界历史意义,正如共产国际世界六次大会决议中所说的:它是“中国革命之新的苏维埃阶段的旗帜”。但广州公

社武装起义并未开辟新的革命高潮,反之,它本身正是在革命力量实行总退却的时候,在革命浪潮下降的时候产生的,广州起义的失败,正如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决议中所说的在客观上成为中国革命“退兵时的一战”。

虽然广州起义的工人兵士,进行了极端卓绝的英勇的斗争,可是中国军阀在帝国主义帮助之下,利用自己优越的兵力,终于把广州公社镇压下去了,同时,领导方面的缺点,尤其是没有充分向劳动群众实行事前的政治动员与选举苏维埃政权机关,同样也是公社失败的重要原因。

广州公社存在的时期虽然很短,但它确是中国革命伟大的收获,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以及苏维埃之为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政权形式,第一次在中国得到了具体的实现。

自广州公社遭受摧残后,最狂暴反动的时期便接着开始了。反动势力自打败广州英勇卓绝的无产阶级以后,更加巩固自己的势力,更加团结自己的队伍。

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体大会在分析中国状况时,曾指出:中国工农运动之第一伟大革命浪潮,已成过去。“……在许多工业中心里,因遭受反动势力屠杀压迫的结果,工人运动是有相当消耗”。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体会议,在其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曾着重地说:中国党目前对于不可免的新的革命浪潮,应当进行准备,在现实条件下,应当将工作重心,放在争取千百万的工农群众上面。在政治上教育这些群众,以及将他们组织在党和党的口号的周围。又说:“在现时情况之下,最大的危险就是在于工农运动的先锋队,曾根据自己对于现时环境的错误的估计,而轻视敌人的力量,以至于脱离群众,跑在群众前面分散自己的力量,而使敌人易于各个的击破。”

第五章 新革命高潮前的中国共产党

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广州公社失败后，中国所有一般政治情况，正符合于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的估计与指示，中国革命之主要收获尽被反革命取消，群众运动遭受摧残，帝国主义与中国统治阶级的地位，一时大形巩固，共产党之许多地方组织，几乎完全遭受摧残，因此，党与群众的联系，也削弱了。

在这种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于1928年夏天，召集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对于中国革命的第一个浪潮中的教训与经验，作了一个详尽的总和与归纳，它详细分析了中国1925—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原因，特别仔细揭发了当时中央领导机关之机会主义的政策，大会驳斥了几个同志之所谓中国革命不断向上发展的理论。在估计当时一般环境时，第六次代表大会认为工农运动第一个浪潮，大都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这个浪潮，已经完结，因为工农受着极严重的失败，他们的革命组织受到极大的摧残（工会、农民协会、共产党党部），最好的干部遭受屠杀，工农的先锋队遭受很大的损伤，现时的形势一般的说来，是没有广泛的群众的革命的高潮。

但同时第六次代表大会又指出中国革命之新高潮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认为当时已有了一些新高潮的最初的征兆。第六次代表大会根据这种时局估计，便认为现在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史失败而退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的势力还超过工农，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

这一个政治立场，大会在其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中，关于军事工作的决议中，以及关于青年妇女问题的决议案中，更将其具体化了。

在指出党内有害的倾向时,六次大会特别着重指示说明盲动主义的危险,盲动主义的倾向,使一些党的组织走上过早的毫无准备的,显然要遭受失败的武装斗争的道路。同时大会又着重提出,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危险,并没有完全铲除,因此,同样也必须与之作坚决的斗争。

其次,第六次代表大会又通过了土地纲领。在这纲领当中,规定无代价没收地主一切土地,分给农民,并提出土地国有的口号,同时又说明,土地国有口号,只有在全国或首要区域成立工农苏维埃政权,且获得基本农民群众对于这一步骤的赞助时才可实行。关于党对农民问题的基本策略立场,大会则决定如下:无产阶级在乡村中的主要支柱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可是大会对于富农问题,则给了不明确的措辞,以致后来党的个别负领导工作的同志,竟把它解释为好似必须取联合富农的立场。但关于富农问题上的错误,在1929年6月共产国际关于农民问题致中国共产党的信中,也将其改正了。

在总结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全部工作时,必须指出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当时环境的估计,对于革命解放斗争前途的指示,对于党的重要任务与巨大工作纲领的规定是完全正确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基本立场,在以后不久的共产国际的第六次世界大会上,完全得到了批准中国共产党根据这次大会的决议,开展了自己的工作,并很快的获得了巨大的成绩。

二、南京国民党的政策

自中国1925—1927年大革命遭受失败后,国际帝国主义者遂乘机恢复与巩固在华已经动摇的统治,在这里公开投降帝国主义的南京政府,对帝国主义又给了直接的帮助,在大革命时期由民众夺回的汉口、九江的英租界,英帝国主义者很容易的就重新由南京政府手中收回去了,汉冶萍公司被日本资本家所侵夺了,1928年5

月,日本帝国主义,又公然出兵山东,占领济南和胶济路。

南京政府依照帝国主义者的指示,于 1927 年 12 月 15 号,与苏联断绝了邦交,至 1927 年底,所有苏联在中国南部的的外交工作人员,一律离开中国,甚至还在绝交以前,在镇压广州公社之后,国民党即行逮捕拷打与枪杀苏联广州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副领事哈西斯同志,即于此时被难。

在革命刚一失败后,国际帝国主义者,即利用中国国民党军阀为其工具,来向中国无产阶级生活水平实行最疯狂的进攻。工人阶级在革命时期所争得的胜利,一律被取消了,过去所定的团体契约,一概宣布无效了,工资锐减而工作时间则特别延长,此外工人的休息与例假,劳动条件方面的改善,以及厂主对于工人待遇上的改善也都被废除了。

外国资本日益积极侵占中国的工业,在实业方面,外国资本在 1923 年为 54%,而 1928 年则增至 72%,在五金工业方面,外国资本在同一时间内,则由 70%增至 90%,在纺纱业方面,1925—1927 年大革命前,外国资本占 50%,而在革命失败后,外国资本也同样增长,至 1930 年时,外国资本已达 80%。

南京政府虽然完全无法限制外国资本对于中国幼稚工业的排挤,1928 年 2 月 1 日,虽宣布了实行新关税则,可是在这一新税则里,入口税之增加,只限于次要的物品和奢侈品,而棉纱品、水门汀、煤、纸、火柴等,并不包含在内,因之,新的税则协定,实丝毫不能满足民族工业发展的需要。

这样,就使中国工业处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之下,在 1928—1929 年一年当中,许多工业部门的生产都缩减了,甚至有不少企业完全关门停业,如在 1929 年底,上海 106 家丝厂都关闭了,几乎所有的面粉厂也都停止生产,其它如烟业、火柴业、纺织业、皮业等等方面的危机,也日益加深。

日益深入的农业危机,对于全部国民经济的恶化,更有极大的

影响,南京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联盟所有的政策,不但未能减弱,反而更其加强这种延绵不断的危机,苛捐杂税的增加与军阀地主苛刻的剥削,使中国广大农民群众日益陷于贫困饿死的状态,饥民灾民的数目,日益增加,如1927年为900万人,在1928年为2700万人,而在1929年则竟达5700万人之多。

固然,南京政府企图装着愿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模样,其次它并采取一些办法使人觉得南京国民党,也是在进行改良内政与减轻人民负担似的,例如它曾高喊什么取消不平等条约;而帝国主义者当然不管它喊得如何响亮,却更加巩固其在华的统治。此外它还起草什么土地法劳动法等等,而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具体实现,南京政府所玩弄的这些把戏,结果统统失败而破产了。

统一中国的任务,南京政府也没有解决,固然,1928年6月,南京军队占领了北京,表面上看来,南京政府已成为全国的政权,然而在实际上真正的统一,并没有成功,实际的政权,仍为各省军阀所把持,此种新军阀割据的局面,仍与过去各省督军各自为政的制度一样,中央政府依然无法干涉其政权。

军阀混战亦仍继续破坏全国政治经济的生活,南京与奉系的战争,于1928年夏,方告结束。1929年3、4月间,即有蒋介石与桂系的战争;1929年9月,又有蒋介石与张发奎的战争;1929年10月,蒋冯战争,又正式爆发;同年12月,又有蒋介石与石友三、唐生智等的战争;及至1930年春,大规模的蒋与阎冯的战争;复重新爆发,所有这些事实,都充分证明中国反革命内部的危机在增长着。

三、中东路事件

国民党军阀,武力强夺中东铁路的冒险行为之遭受完全失败,更加速了中国反动势力瓦解的过程。1929年7月10日,在国际帝国主义的怂恿之下,国民党军阀实行以武力强占中东铁路,撤换

与逮捕大批苏联的铁路工作人员,中东铁路本是苏联财产,而且苏联早已把它变成纯粹经济性质的企业,根据 1924 年之中苏协定(此协定乃中国第一次按完全平等原则及由苏联尽量尊重中国人民利益而签定的条约,而是唯一的平等条约)苏联政府更自动吸收中国政府来和苏联共同管理中东铁路事宜。

可是,中国军阀却公然违反中苏协定实行无理挑衅,强占中东铁路;虽然如此,而苏联政府却仍用尽一切可能以求达到和平解决,但是国民党军阀并不停止其反苏联的行动,最后,苏联之红军远东特别军,乃不得不给与国民党军阀以严重的打击,而使之不得不恢复冲突以前之中东铁路原有情况。国民党军阀因受帝国主义愚弄而企图强夺中东铁路的结果,遂更丧失其在广大民众中间的威信,而中国工农群众之积极性,则因中东路冲突之发生而更加提高了。他们以罢工示威(如 1929 年 7 月 26 日以及“八一”纪念日上海两次伟大的示威),表示出中国劳动群众对于苏联的同情。

第六章 新的革命高涨与为建立苏维埃的斗争

一、工农运动之高涨

中国反革命势力之一切内政外交政策,都遭受破产,资产阶级地主联盟,不仅未能解决——甚至未能丝毫减弱产生中国革命的任何矛盾,国际帝国主义不仅没有放弃,而且更其巩固和加强了它在华的特权与统治,中国仍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中国军阀制度依然保存其势力,土地问题亦丝毫没有解决,广大民众仍然与以前一样,处在丝毫没有权利的地位。

反革命的南京政府,加强了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殖民地的剥削和军阀地主对于劳苦群众的强盗的掠夺,结果,中国经济完全陷于破坏的深渊,广大民众更加遭受穷困破产,同时阶级矛盾亦日趋紧张,于是,新的革命高潮,便必然发展起来。

工人运动很快就克服了自己在1925—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所有的消沉状态,尤其是自1928年下半年起,罢工浪潮,更特别显著的复兴起来。1928年,罢工工人,约近40万,而1929年,却已增至75万,最初,罢工运动尚多带经济性质,但工人罢工斗争越向前发展,则其政治色彩,便愈加浓厚,要求释放被捕工人领袖,要求解散国民党工会,要求组织工会的自由,以及提出反对国民党,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等等的口号,便一天一天的增多了,在1929年劳动节时,上海约有5万工人,参加五一罢工,而在同年八一国际反战日,则有10万以上的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与领导之下,在各地举行游行示威。至1930年,工人罢工斗争,更继续发展,并更加带有奋勇坚持及有组织的性质。

不仅城市的工人运动如此,而且农民运动亦开始高涨起来,极端穷困和义愤填胸的中国农民群众大批走上与地主资产阶级统治武装冲突的道路,农民游击运动汹涌澎湃,一天高涨一天,中国工农红军之最初队伍,亦先后形成,而且屡战皆捷,在游击运动相当巩固的地方,苏维埃区域亦建立起来了。远在1927年底,海陆丰之农民群众,即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推翻地主政权,并解除其反动武装,而建立了存在数月之久的中国第一个苏维埃区域。海陆丰苏维埃政府的领袖,即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最著名人物,农民群众所最爱戴的领袖彭湃同志,他于1929年被蒋介石秘密枪毙于上海。

当托洛斯基派联合右倾机会主义的叛徒们——陈独秀派拼命进行反对共产党的斗争,当着他们高喊中国革命死亡与预言资产阶级地主统治长期稳定之时,英勇的中国共产党则高举革命的旗帜在极端秘密环境之中,教育和准备广大群众走向新的伟大的决斗。

在建造中国红军的事业上,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彭德怀同志,黄公略同志,彭湃同志,方志敏同志,以及贺龙、林彪等同志有着特别伟大的功绩——他们真是英勇卓绝的战士,不屈不挠的布

尔什维克，他们不怕任何牺牲与艰苦，他们无时不为共产党的事业，为全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而奋斗。

毛泽东、朱德、方志敏以及现时中国红军几十个有名的智勇双全的军事将领，同全党一起并站在全党的最前线，经过了中国的近十年来，中国所有革命斗争火焰的锻炼，他们在革命的时期，在大革命时期，曾动员与领导群众向前冲锋陷阵；同样在革命低落时期，在 1925—1927 年大革命暂时失败以后，在异常困难的时期，他们则领导群众作有组织的退却；他们与群众一起，并站在群众面前，经过了残酷的阶级斗争的学校，他们才真正不愧称为大无畏的赤胆忠心的战士；他们用尽了自己的心血，以准备群众走向新的革命高涨，因此毫不奇怪的，正是毛泽东，朱德，方志敏以及其他许多忠勇卓绝的布尔什维克，都成了发展胜利的中国苏维埃运动最初的组织者与领导者。

他们团结了广大劳动群众，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中国反革命势力的武装斗争，他们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最初的队伍，他们知道中国红军是民族革命的可靠的与不可击破的支柱。他们努力扩大红军的队伍和巩固红军与广大民众的联系。在他们精明老练的领导之下，中国红军在无数次斗争中，经常获得伟大的胜利，创造永垂不朽的奇绩。毛泽东，朱德，方志敏等乃真正全中国人民所公认的民族英雄，他们伟大的奇绩，虽敌人亦无敢否认者。

中国红军的基本核心，为当时的红四军，1928 年它在毛泽东和朱德两同志直接领导之下，初在江西井冈山一带险要区域里活动，不久即乘胜东征，进占福州西部。1928 年冬，领导平江起义之彭德怀、黄公略同志，率领所部战士，于井冈山与红四军部队会合，彭德怀同志被任为新成立的红五军军长。彭德怀同志在以后无数次战役中，成为中国红军英勇善战与智勇双全的伟大领袖之一，中国红军就是这样逐渐壮大与巩固起来的，其骁勇善战的将领，就是这样锻炼出来的，1928 年红军人数约近 1 万人，而在 1929 年，则

已增至 2.2 万余人了。

1930 年初,已有 19 个苏区,每一苏区,由一县至四县不等,在苏维埃区域内,到处实行土地革命与武装工农,中国中部南部各省,因 1925—1927 年大革命已培植下革命根基,苏维埃运动之成功,特别显著,至 1930 年 5 月,中国共有红军 13 军,约 6.2 万人,而且大半战士,皆携带有新式枪械。

二、立三路线与四中全会

工农运动之开始高涨,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极其复杂的任务,党在这个时候,已大大的巩固了自己队伍和党与群众的联系,1930 年 1 月,党员已增至 65528 人,全党之思想水平,亦已提高,党克服了脱离工农群众的冒险倾向,同时,又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以及对自己队伍中悲观失望的情绪,以及对于革命失败而灰心丧气,丧失革命前途而转到取消立场的分子。在中东路事变当中,党进行了广大的拥护苏联的运动,具体表明了自己的国际主义的精神,以及对于工人阶级之革命任务的正确的认识。

直至 1930 年夏季以前,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执行了正确的路线,并在各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成绩,可是,1930 年夏季,当革命斗争开始高涨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则被李立三路线——与共产国际路线完全相反的路线——所暂时统治了。李立三之整个立场,完全以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同时很快成功的前途为孤注,他硬说全中国革命形势已经到处成熟,于是就引导党来到处组织武装起义——连主要中心城市也在内,结果也只是酿成完全冒险的盲动。

李立三认为革命立刻就会在全国范围内胜利,因之他就完全忽视工农日常的斗争。他并借口准备武装起义而解散职工会,说在武装起义的时候,那里还需要职工会的组织。其次,他又实行取消游击运动的方针,认为游击运动的斗争,已经是过去的阶段。此外,他还向苏区领导同志发出组织集体农庄,苏维埃农庄,禁止自

由贸易及土地买卖的指令。

立三路线的实行结果,给予党以很大的损害,党与群众联系是削弱了,革命职工运动,特别遭受严重的损失。而且李立三公然隐蔽共产国际底立场,不让全党同志知道以实行其反共产国际的路线。这样的情况,当然是不能长久保持的。上海党的组织在陈绍禹(王明)同志领导之下,首先开始了反半托洛茨基的李立三路线的斗争,为正确路线而进行的斗争,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在绍禹同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有威望和最有天才的领袖之一,周围团结了党的最好的干部,他协同党内其他优秀的领导者——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于1933年因遭受虐待病死于北平陆军监狱内),沈泽民(因积劳成疾而死于鄂豫皖苏区),陈原道(于1932年被国民党秘密枪杀于南京)等同志,在两条战线斗争上,坚持了正确的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路线,可是,因为三中全会(1930年9月)采取了调和立场的结果,党在当时,还未能走上正确的道路。可是,再过不久,在扩大的四中全会上(1931年1月)党中央底政治路线,即已经完全纠正了。四中全会,革新了党的领导,揭发了立三路线反列宁主义的实质,同时又坚决排斥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要党走上失败退却道路的企图。四中全会在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事业上,起了极大的作用。

三、中国红军势力之增长

因为共产党本身日趋巩固的结果,苏维埃运动便获得了新的伟大的胜利。中国红军,击破了国民党军阀对于苏区的第一次“围剿”。这次“围剿”开始于1930年12月,参加“围剿”的部队约10万人。至1931年1月间红军即击溃了南京五师部队,使所有参加“围剿”的国民党的部队,不得不仓皇退却。1931年4月,国民党的军阀又开始进行第二次进攻。虽然国民党的“围剿”部队,有其数量上技术上的绝对优越形势,但中国红军在劳苦群众英勇赞助

之下,又把“围剿”冲破了。

当红军反对敌人“围剿”的军事动作时,苏区内部同时进行了残酷的肃反斗争。剥削分子在苏区内建立了自己的反革命组织(如 AB 团,即反布尔什维克团等),他们混入苏维埃职工会以及党的机关里面,以企图从内部来进行其反革命的活动。1931 年在许多苏区内,都发现了这一反革命的组织。中国苏维埃在中共领导之下,完全打破了这种内部的反革命势力。因肃反胜利的结果,苏区的势力及地位,更大形巩固与强大了。特别应当指出,在肃反的伟大的胜利中,邓发同志——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领导者,是有很大功绩的。

因中国红军作战胜利的结果,苏维埃政权的领域,遂大形扩展了。红军本身也长成强大的力量。1931 年,正式红军,已约有 10 万人,其次,赤卫队,也有约近 10 万人的组织。而苏区 90 万工农青年,已都加入了军事性质的青年组织,即少年先锋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日本帝国主义者开始了侵占东三省的行动,在帝国主义奴役瓜分中国史上,开始了更新的一页。

四、日本之占领东三省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始了它的强盗掠夺的战争。几天内,日本军队就把东三省所有一切重要中心城市占据了。结果,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了超过其本国面积一倍半的领土——东三省。它使东三省 3000 万中国人民沦于殖民地奴隶的地位。至于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军事进攻的表面上的借口,是非常易于找到的。还在 1931 年夏天,日本帝国主义者即挑拨了流血的鲜案和万宝山惨案^①。不久,又有所谓中村失踪案的发生。最后

^① 这里指这年 7 月日本侵略者在长春万宝山强租民田、屠杀中国农民和挑拨中朝关系的流血事件。——原编者

在日军开始掠夺战争时，则更捏称曾有中国士兵毁坏南满铁路之事件，日本帝国主义者，就借口所谓保护日人权利及维持秩序，而侵占东三省了。

所谓这些表面上的缘由，显然是无关重要的。日本侵占东三省的真正原因，实与日本地主资产阶级之一般帝国主义侵略计划相联系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之侵占中国东三省，其目的在借以扩展其在亚洲大陆的势力，欲利用东三省以作为自己的军事根据地，以便继续进攻中国，以便加强太平洋上以至在全世界上的地位。

日本帝国主义者之强暴侵略，并未遇到中国军阀方面的抵抗。自强占东三省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更是得寸进尺，垂涎北方，进袭上海，1932年1月21日，日本帝国主义迫令中国当局解散反日团体，镇压抵货运动，并于1月28日实行以武力进占上海。

为回答日寇野蛮的侵占，抗日怒潮，遂在全国各地普遍高涨起来。沈阳及鞍山之总罢工、上海日本纱厂工人之总罢工，以及全国各地之罢工罢课反日示威等，都明显证明，无产阶级及全体中国人民之拥护祖国完整独立的斗争决心，是如何伟大。

同时，东三省之游击运动，亦汹涌澎湃，普遍发展起来。参加游击战争的群众，日益增加，且一天天给予日寇以新的困难。自上海方面，因工人学生及广大民众与19路军官兵英勇抗日，鏖战月余，致使日寇无法占领上海。只因南京国民党军阀之出卖投降签订淞沪协定，日寇的强盗目的始行达到。

可是，无论南京政府如何多方摧残与压迫，而反日运动则仍继续向前发展，城市小资产阶级又被吸收到反帝战线上来。北平、上海、南京、济南等处学生群众，组织了伟大反日反国民党的示威，尤其在南京城内，南下示威运动特别激烈，示威群众捣毁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机关，并烧毁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馆。

五、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中国苏维埃运动,在全国这样条件之下,获得了特别显著的胜利。于1931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在江西瑞金举行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此以前,英勇红军击破了蒋介石军队之第三次“围剿”。此次“围剿”开始于1931年7月2日,当时蒋介石动员30万南京军队,向苏区进攻。蒋介石参谋部以及在该军每一部队里,均有德国军事顾问,指挥助战。然而此次战争结果,红军又获得最大胜利,南京部队,遭受极大惨败。被红军击溃部队,有17师之多。红军所夺获之机枪,共计2.5万支。在苏大会开幕时,红军枪支已增至15万支以上。

在第一次苏大会时,中国苏维埃运动所普及之领土,共计300余县,包含人口已达几千万人之多。参加大会者,有所有一切苏区代表,共610人,大会空气,异常热烈,其所通过之文件,多含纲领性质,而为苏维埃共和国政策之基础。大会通过了宪法草案,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等极其重要的文件;以及关于红军问题,关于苏维埃建设问题和关于民族问题等等的决议。大会正式选举了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同志当选为中央政府主席,张国焘、项英二同志当选为副主席。

宪法草案规定中国苏维埃目的如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根本法(宪法)的任务,在于保证苏维埃区域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和达到它在全中国的胜利。这个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地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的农民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

六、中国苏维埃的土地政策

苏大会在所通过的法令中,明白规定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各方面工作的政策,尤以土地法有特别重要意义。中国的工农民

主专政，究竟怎样实行以革命方法解决土地问题呢？在苏区已实行无代价的没收地主及其他大私有者的土地，被没收的土地，概归农民分配；取消一切口头上或书面上封建奴役的高利贷的契约，废除一切债务（农民与城市贫民对高利贷者的债务）；一切恢复债务与奴役关系的企图，概遭受革命法令严格的制裁。革命的雇农工会和贫农团，具有自由活动的权利，他们是中华苏维埃政府在乡村中实行土地革命的支柱。所有过去一切苛捐杂税，概行废除，而代以统一的累进税；而今后所有一切捐税重租，均由富家剥削分子担负。

同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又特别注意于改进农业技术，扩大耕地面积，改善耕种方法以及提高收获等。苏维埃机关实行选择优良种子供给农民，组织肥料供给，进行改良水利与修理农具，以及动员群众参加收获运动等。因为实施所有这些办法的结果，苏区农民生活，遂大形改善。

第一次苏维埃大会以前，在个别苏区里，在实施土地政策时曾犯过严重的错误。例如有些地方个别地主竟能多方借口，照旧把持其原有土地；有些地方，有人借口保持乡村无产阶级的柱石，而不分给雇农以土地；甚至还有不分配土地给红军战士的企图；以为红色战士如分得土地，即不愿参加战争了。此外，在各别区域里，尚有不管农民愿意与否，而用纯粹行政手段实行平分土地的事实；在某些地方，甚至有人企图勉强设立集体农庄及苏维埃农庄；可是，自第一次苏大会举行以后，此种错误及曲解，却已日益少见了。

七、劳动法与文化建设

苏区工人，亦取得极大成绩，凡在苏区境内，到处都实行八小时制；农业工人之工作时间，则另由契约规定；青年工作时间，比成年工人更短，并实行同劳同酬的原则。劳动条件及企业主于对工人的待遇，更非旧时所能比拟，工人工资，有很大的增加，极大部分

工人都加入了职工会的组织。

中华苏维埃政府为拥护工农利益而实施的各种措施使广大劳苦群众,更其积极参加政治生活,他们的组织性与政治觉悟性迅速增长起来,各种社会团体,亦非常活跃,下层民众之革命创造性,日益发展。尤其是因为苏维埃政府实行解放妇女,与实行各民族劳动者一律完全平权等等设施,下层民众之创造性,当然更其发展了。

苏区工农群众,对于学习方面,表示极大的热情。教育文化机关普遍设立。例如江西苏区之宁都县,在革命以前,小学数目,本来寥寥无几,而自苏维埃政权成立以后,初级小学,竟达 350 余所,夜校数目,且在 580 以上,此外还有 13 个俱乐部以及许多扫除文盲的小组。

苏维埃运动之伟大成绩与中国红军之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胜利,使中国“在殖民地世界之民族革命运动中,占着第一个位置”(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决议)。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中国工农所获得的这些胜利,更加巩固起来;并且指出了更加改善劳动群众状况的道路。

八、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1934 年 1 月 22 日在瑞金召开,参加大会代表共 821 人,与会来宾约 1500 人。根据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之统计,大会代表之社会成分如下:产业工人 8 人,手工业工人 244 人,苦力 50 人,店员 2 人,雇农 122 人,贫农 303 人,中农 25 人,小商人、学生及自由职业者及其他共 64 人。

在第一第二两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之间,中国红军击破了国民党军阀四五两次“围剿”。大家都知道,南京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毫未加以抵抗,却集中一切力量以镇压中国苏维埃运动。1932 年 2 月,国民党即开始进行四次“围剿”;同年秋,又开

始组织五次“围剿”。但结果，四五两次“围剿”统统遭受失败，而红军之实力及威望，则更加增长，苏区地位，亦更加巩固。

第二次苏大会的中心工作，为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的报告。报告人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他把过去几年来英勇斗争作一个详细的总结，并指出了动员群众去反对敌人六次“围剿”的具体步骤。

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关于苏维埃和红军积极准备抗日的热情加以明白的叙述；关于苏区工人所获得的成绩如劳动条件的改善，工资的增加等等列举了许多显著的数字；因实行土地革命的结果，农民群众的生活亦有显著的改善，例如农民的收成，一年之内就增加了20%……“农民的生活比较国民党时代是至少改良一倍。农民的大多数过去一年中有许多时候吃不饱饭，困难的时候有些竟要吃树皮，吃糠粃，现在则一般不但没有饥饿的事，而且生活一年比一年丰足了。过去大多数农民每年很少吃肉的时候，现在吃肉的时候多起来了，过去大多数农民衣服穿得很烂，现在一般改良，有些好了一倍，有些竟好了两倍。

哪一种生活，哪一种政权，是农民群众愿意的呢？让一切国民党区域的农民群众自己答复这个问题吧”。

在第二次苏大会所选出的中央政府委员中，除其他同志外还有中国革命的老战士与有名的政治家，如林祖涵、吴玉章、徐特立、何叔衡等同志，以及中国共产党最优秀卓绝的组织家之一的赵容同志，中国职工运动最老战士刘少奇同志等。

中国苏维埃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克服了一切因苏区经济落后，连年战争以及经济封锁而产生的极大困难，在改善民众生活方面，得到了伟大的胜利，因此，中国红军就得到中国千百万劳苦群众英勇的赞助。在二次苏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在其报告中曾说：“广大工农群众，以手执武器保卫苏区与发展苏区为自己神圣的责任，而大批的不断的涌向前线去，其中如江西的长冈乡，16岁至45岁的

全部青年成年男子 407 人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去了 320 人,留在乡间的 87 人,去的与留的成分为 80 与 20 之比。福建的上才溪乡,全部青年成年男子 554 人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 487 人,留在乡间的只 67 人,去与留之比例为 88% 与 12%。”

中国红军之伟大的胜利,首先就是因为他获得了广大群众这样热烈的赞助。红军之所以强大有力,就是因为他与劳动人民有不可分离的联系;红军之所以强大有力,就是因为他是由铁的自觉的纪律所团结一致的革命军队;因为每个红色战士都知道他是为拥护全体人民利益,为自己血肉相关的事业,为全国人民之民族和社会解放而奋斗。最后,红军之所以强大有力,是因为他有共产党的领导,因为共产党员在红军及民众中进行着巨大政治教育工作。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红军,便能以一当百,杀敌制胜,粉碎那数额众多而技术精良之国民党军阀的部队。

九、福建事变

苏维埃区域之强固,红军威望之增长,乃促进了国民党军队之瓦解。同时,在国民党军队内部,无论士兵群众,无论爱国军官,对于南京当局步步卖国降日政策之义愤,亦与日俱增。此种义愤及不满情绪,在一二八抗日战争中获得无上荣誉,后来则被迫移闽参加“剿共”战争的 19 路军中,曾表现得特别显著。19 路军拒绝与中国红军作战,并于 1933 年冬,在福建举行反对南京政变,而与红军订立抗日军事协定。

依照协定条件,19 路军表示愿意进行抗日反蒋战争,释放一切政治犯,允许一切群众团体公开活动,以及与苏区维持亲善关系等等。19 路军在福建成立了独立的“人民革命政府”,并宣称准备解决土地问题。

蒋介石深恐 19 路军抗日反蒋运动,普及于其他部队,遂决意立刻设法“解决闽变”。蒋介石一面调遣大批部队入闽,一面则实

行收买 19 路军之个别军官，结果终于达到了他自己原定的目的，19 路军，并未给蒋军以严重抵抗，遂于 1934 年初完全遭受失败。

中国共产党员，没有好好利用因福建事变而形成的环境，有些党员，当时显然还不懂得成立人民反帝统一战线任务的意义。因此，在对于 19 路军的关系问题上，表示动摇。共产党轻视了中国红军与 19 路军双方协定的意义，因之也就犯了严重的错误；红军没有积极的行动来给予 19 路军以及时的应有的帮助，而为着进行反对共同敌人蒋介石的斗争。为着进一步瓦解军阀部队并使之转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战线上来，红军对于 19 路军的这一及时的实际的帮助，完全是必要的。

十、国民党第六次“围剿”苏区

蒋介石自打败 19 路军以后，遂乘机集中全力来继续进行反对红军的战争，实行大规模的六次“围剿”。在国际帝国主义者各方面帮助之下，国民党在反对苏区的战线上，集中了 70 万左右的兵力。六次“围剿”延长到一年以上。结果，中国红军主力，为保存实力计，乃离开江西苏区而开始英勇的西征，经过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等省，进至四川、甘肃、陕西，在中国西北部开展自己胜利的活动，不管蒋介石花费了怎样巨量的物力及人力，可是他那包围与消灭红军的计划，却终于完全破产了。

红军主力自开始由江西西征，至与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同志所创导的四川红四军团会合为止，共经过八月半之久。在不可想象的极端困难条件之下，中国红军作了 5000 公里（1 万余里）的英勇的远征。红军主力在中国人民及其红军的最好领袖——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陈云、彭德怀、林彪、董振堂、刘伯承、罗炳辉等同志领导之下，在西征中，沿途经过无数的战争，跋过最大的山脉，渡过最大的江河，穿过羊肠小道与走过天险绝地，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永垂不朽的长途远征中，中国红军之指挥员与战斗

员表现了群众英勇与光荣牺牲的模范,表明了他们对于中国人民利益的无限忠实。

红军在数量上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在坚持到底英勇鏖战中,大大发展了自己的实力,巩固了自己的部队。由于此次西征的结果,已创立更加顺利的条件,以便建立更巩固坚实的苏区,并使红军能实行更积极而更灵活的动作,更加推广苏维埃运动与成立更多的苏区。

随着中国革命力量的增长,国民党军阀内部则自趋于瓦解,国民党区域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日寇更进一步的侵占中国北部。蒋介石为反对日益增长的革命运动,采取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形式与方法。国民党区域劳动群众的生活地位,已恶化到万分。他们对于现在军阀制度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凡此种种,都必然促进“苏维埃区域不断的增长,而且无论中外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势力,如何联合抵抗,都是无法制止这一增长的”。

第七章 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统一战线而斗争

一、日本帝国主义之有加无已的侵略

一方面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有加无已的侵略,另一方面由于苏维埃运动之勇往直前的发展,在中国便造成了一种新的政治形势,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变本加厉的掠夺,由热河而山海关和长城各要塞,由山海关和长城各要塞而“滦东非战区”,由“滦东非战区”不断进攻中国本部各省。它利用所设立之“冀察政务委员会”与“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名义,实际上已开始占领北方五省了。

日本帝国主义者将其所已占领的区域,变成继续扩大其侵略行动的军事根据地,它把它所占领的地区以内的中国民众,陷入痛苦不堪的境遇。它公开强占铁路、银行、轮船公司及其他企业等,实行垄断一切商业贸易,以及强占中国人民肥沃的土地。它把它

所占领域内的一切中国人民，完全变为毫无权利的殖民地的奴隶。它轰炸与毁灭不甘被人征服的中国农民的村落与房屋，它在“满洲国”以及在其他占领领域内所实行的殖民地的掠夺政策，显然是与中国民族生存利益水火不能相容的。

而且中国所有其他省份，也都有遭受同一命运的危险。日本对华的侵略，使整个中国都遭着变为殖民地的危险。因此中华民族目前所遇的严重的民族危机，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有史以来，所未曾见过的。

二、中国经济之变本加厉的破产

除日寇残酷的进攻，给予广大民众以空前的浩劫之外，则还有变本加厉的经济破产所酿成的极严重的结果。受着世界经济危机影响的中国工业农业的危机，达到了异常尖锐的地步，只要拿 1929—1932 年在世界经济危机直接影响之下，中国物品价格降落的情形来说说就够了，例如在这几年内黄豆价格由每担美金 2.3 元落至 0.83 元，丝价则由每担美金 625 元降至 156 元，同样茶叶则由 43.8 元落至 12 元，鸡蛋由 18.5 元落至 7.6 元，棉花由 19.6 元降至 10.4 元，落花生由 5.31 元降至 2 元。因之，几千万农民完全陷于贫穷破产饥寒交迫的地位，饥民普遍于全国，1929 年中国共有饥民 5400 万，至 1931 年，陷于饥饿死亡的难民则竟达 7000 万人。

中国 1935 年的收成，比 1934 年减少 20%。根据中国银行统计，1935 年上半年，上海工厂关门者达 250 家；中国丝业则因无法与日本人造丝竞争，几乎完全陷于停工状态；如在 1935 年，上海 113 家丝厂中，继续营业者仅 23 家，浙江的丝厂也多半关门停业。对外贸易也是一年一年减缩，国家预算，日益亏空，而且预算 80% 以上，概作军费支出及偿付债款之用，（军费占 49.7% 而债款偿付则占 22.6%）。

日本的侵略,则更促进了中国经济的破产,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整个广大领土的占领,已使中国国民经济更加陷于解体。而且,日本帝国主义者复在华实行倾销政策,使中国商场上完全充斥了最贱的日货,他们以廉价收买陷于破产的中国企业,并以自己的货币和对外贸易的政策,来更加加深中国经济的动摇与紊乱。中国近年来所达到的异常惊人范围的群众失业与贫困,显然是帝国主义,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中国的结果,是封建军阀制度存在的结果。

中国广大民众对于这个问题是日益看得清楚了,他们是不能而且不愿甘心去当亡国奴的;他们是不会坐视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伟大中华民族,被帝国主义的强盗任意宰割的;几年来中国民众所积极的反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在华走狗之义愤,已爆发而为革命的怒潮。广大民众,一批一批的参加抗日救国的斗争,参加争取中国政治经济独立的斗争,参加争取中国人民之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斗争;或者抵抗,或者灭亡,或者坚决斗争,或者继续被受浩劫——这是中国广大民众现时开始认清的问题。

三、民族解放斗争浪潮之汹涌高涨

由于日本的侵略以及因此而引起的中国经济的破坏,在中国便产生了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的汹涌澎湃的高潮,东三省之反日游击运动并未因李杜、马占山、王德林、苏炳文等抗日部队的失败而消灭;在民族英雄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吴义成、李华堂、谢文东、柴世荣等领导之下正胜利地开展着。“滦东非战区”之3万余农民反日的斗争,更是日人占领区域内农民运动发展的征兆。同时中国无产阶级的罢工运动亦在继续发展着。

大部分罢工斗争,最初虽多带经济斗争的性质,但在斗争过程中,很多都转成为政治的斗争;而有些斗争一开始便带着很明显的

政治性质。在所有这些斗争中,特别重要的有上海老怡和新怡和纱厂1.3万人的罢工,上海法租界4万人力车夫的罢工,奉天抚顺煤厂2300工人的反日罢工,本年(1936)1月,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的罢工,引起上海宣布戒严的上海海员壮烈的反日示威(有60余人被捕),以及1935年末,武汉三镇之工人参加反日游行示威等。

1935年冬与1936年春,不顾国民党当局残酷的压迫,学生运动由平津开始而发展到最广大的范围,而普及于全国一切的重要的城市,在学生运动高涨的影响之下,城市小市民阶级,先进的资产阶级文化界以及有爱国天良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积极的起来参加全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了。

各种各样的反日团体,如雨后春笋一般,到处产生与发展起来。学生会,各种文化团体,律师公会,记者联合会,职工会,各界救国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等,一致奋起,反对日寇的侵略,反对南京政府卖国投降的行动。国民党内部的危机亦日益增长了,对国民党上层领袖政策,表示失望的下层党员群众,日益感觉到有坚决实行抗日的必要,有团结全中国人民一致进行救国斗争的必要。

同时,这一反帝斗争的高涨,又促进了中国军队的革命化,不仅在士兵群众中,而且在军官当中,坚决反日的情绪都在日益发展。1932年(一二八)之上海抗日战争,1933—1934年之福建事变,国民党26路军在董振堂同志领导之下实行革命起义加入红军,许多部队不愿和拒绝进行反对红军的内战,吉鸿昌(中共党员,1933年入党,在国民党的屠刀之下,光荣的牺牲了),方振武,冯玉祥,孙殿英等在察哈尔武装抗日的义举,在第25师,王以哲部以及29军中官兵反日情绪之高涨,西南数十将领的抗日救国通电,在南京部队的军营中反日传单的散发,日益获得更大的同情,以及中国个别军事政治派别分子的抗日爱国的斗争,更加成为经常的现象等等,都是最明显的例子。

在所有这些民族解放斗争中,充分表现着:团结中华民族的一

切力量,争取中国独立与领土完整,日益成为广大群众的迫切需要与斗争目标。因此,这便造成了组织中国人民反帝统一战线——即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特别良好的基础。

四、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

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会上,季米特洛夫同志在其有历史意义的报告中,曾说:“在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因为国际环境和国内情况的改变,反帝统一战线问题,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一指示对于中国特别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华民族之命运,已被日本强盗陷于千钧一发的地步,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全体人民现在最主要的死敌。只有动员和团结一切力量,中国人民方能打破日寇强夺的计划及打退日寇变本加厉的进攻。正因如此,所以中国人民反帝统一战线的建立,就成了抗日救国之最重要的条件,只有建立这样的战线,中国人民方能脱离完全陷于殖民地奴隶的命运。

要知道,因日本野蛮侵略的结果,在中国已形成完全特殊的形势了。为着反对共同的敌人,各种完全不同的力量,不同的阶级利益,甚至完全相反的政治社会趋向,都一致联合起来。这在历史上是有不少先例的。即以俄国1917年2月的情形来说:“1917年特别错综的条件下,乃使各种最不同的社会力量都联合起来,集中火力反对沙皇专制。”(《列宁选集》第21卷第31页)。革命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同盟者,“这样就使革命的爆发,出乎大众意料之外,我们的同盟者,不仅有俄国的资产阶级而且有英美的资本家。”(《列宁选集》第20卷第175页)。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极大部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显然有所改变,他们日益努力寻找抗日救国的道路;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内部各省继续向前发展,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受着直接的威胁,于是日本与英美帝国主义者的冲突,亦

更加强起来。所有这些复杂的条件,乃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提出了极端重要的任务,吸收所有爱国分子,利用一切直接的间接的后备军到全民反日阵线上来,以开展整个中华民族的胜利的神圣的战争。

经过无数次战斗的锻炼而巩固扩大的红军之存在,大大的便利了全中国人民反日斗争之开展,中国红军乃是全民反日统一战线之最可靠的武装力量。

当季米特洛夫同志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会上,讲到这个任务时,他曾说:“在中国,一方面人民运动的发展,已使好些个苏维埃区在中国广大的领土上面建立起来,强大的红军组织起来了,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南京政府的卖国贼已经危及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民族生存。中国苏维埃区域成为反抗帝国主义者奴役和瓜分中国的斗争的团结中心,成为集中一切反帝国主义力量来完成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卫的团结中心。

所以我们赞成我们英勇的中国兄弟党的创议,即联合中国境内所有那些愿意为救国救民而真正斗争的有组织的队伍,来建立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中国代理人的非常广泛的统一战线”。

五、中国苏维埃在新环境中的斗争

季米特洛夫同志这一指示,在中国苏维埃面前提出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任务。中国苏维埃,原来是在土地革命中发展起来的,中国苏维埃前此政策之主要内容,是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没收地主一切土地,分给农民。因此,在过去苏维埃区域主要的是土地革命的根据地,而在现时新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底正确政策,却是要使中国苏维埃区,首先就成为反帝斗争的最可靠的根据地,苏维埃政府,成为反帝人民统一战线的引导力量。

同时,为适应新环境的要求,中国红军的领导者,为谋扩大中国红军的成分;中国苏维埃和红军的领导者,在同其他部队和政党

派别订立协定以及实行联合共同反对日寇及其在华走狗等方面，正表现极大的提倡发起的作用。

同样，中国红军最近的行动，亦以方针为出发，由英勇善战的贺龙和萧克两同志所指导和在任弼时(中共政治局委员)同志领导之下的二、六军团，由湖南西进而抵达川康，并与名震天下的朱德、徐向前同志等所统率之红军主力会合。

同时，红军之另一主要部队(一、三军团)，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在林彪、彭德怀等同志率领之下，则由四川北上而进达陕北，与徐海东同志所领导之下红二十五军和刘子丹同志所领导之红二十六军等取得会合；大大巩固了陕北苏区。不久，毛泽东同志复亲率部队，渡河入晋，直接逼近日寇所占领之区域。所有这些伟大的行动，都如日月经天一般，表明中国红军抗日救国的战斗决心。而且，为时不久，毛泽东同志即在晋陕一带新创立五师红军部队，此种事实，即为红军近来斗争胜利及其威信提高之最好证明。

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会，在其根据季米特洛夫同志报告所通过的决议中，规定中共任务如下：“中国必须把扩大苏维埃运动与巩固红军的战斗力，与在全中国开展人民反帝运动联结起来。这个运动应在下列口号之下进行，武装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强盗，首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苏维埃应当成为全中国人民底解放斗争的团结的中心”。这一指示，应成为中国共产党这一历史时期全部政策及其所有一切措施基本方针。

六、中国共产党之新政策

当日本刚开始侵占东四省时，中国共产党便立即提出“武装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以保障中国的民族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之口号，党在积极开展与领导反帝斗争中，进行了极大的工作。党曾努力组织充满民族义愤的广大群众，走上反

对帝国主义及其在华走狗的道路,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的活动并非没有结果的。而中国共产党对于 1933 年的(一二八)上海英勇抗日防卫战争的积极参加,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淞沪战役经过不久,中华苏维埃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即向全国一切军事部队,发表宣言,表示在三个简单条件之下:(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权利——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三)允许民众有组织抗日义勇军和武装的自由,愿与全国任何武装队伍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战斗协定。

可是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充分估计到政治环境的一切变化,以及阶级力量相互关系所发生的变动,所以还没有在所有策略方面都实行应有的转变。这在福建事变当中,显然可以看出,结果,中国共产党在准备和发展革命民族防卫战争的事业上,在动员广大民众与建立全民反日统一战线的事业上,就显然没有获得应有的成绩。

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会,在中国共产党策略转变方面,表现了伟大的作用,在这次大会上,以王明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已将中共的新政策与新策略之基础充分的发展了,中共新政策与新策略之目的,是建立抗日救国的人民统一战线,要在中国红军和苏维埃周围,团结一切最彻底最强有力的反帝力量,团结全国广大民众,共同来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

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 1935 年 8 月 1 日共同签名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为认真应用这个新政策的具体表现。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上,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在这个宣言内,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号召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组织全中国的抗日联军,在这个宣言内说:

“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作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立即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教育会、新闻记者联合

会、教职员联合会、同乡会、致公堂、民族武装自卫会、反日会、救国会等等)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

不仅如此,在这个文件内,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且恳切声称自己绝对尽力赞助这一政府的建立。并绝对执行其一切关于保护中国领土完整与中国人民切身利益的一切决议。同样,在这个八一告同胞书中,曾提出了下列关于国防政府的行政方针:

(一)抗日救国,收复失地。

(二)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三)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一切财产,充作对日战费。

(四)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粮食,土地,交给贫苦同胞和抗日战士享用。

(五)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发展工农商业。

(六)加薪加饷,改良工农商学各界生活。

(七)实行民主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八)实行免费教育,安置失业青年。

(九)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护华侨在国外生命财产居住和营业的自由。

(十)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众(日本国内劳苦民众,高丽、台湾等民众)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作同盟,与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保持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

中国共产党目前还不过刚开始实行自己的新政策,因而现时还很难说新政策执行的成绩如何,可是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只有彻底执行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只有勇敢而大胆实现中共的新政策,才能把强有力的反日人民战线建立起来,并借这一统一战线来获得中国民族革命伟大的胜利。

七、中国苏维埃经济政策之修改

为适应中国新形势与党的新政策，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苏维埃的经济政策，乃有更加确切的规定以至部分的改变。

在土地政策方面，要实行消灭封建残余的路线，但同时必须注意尽可能建立最大的人民反日统一战线，根据现有的材料，中共在这方面的决定如下：

(一)对于那些由劳动积蓄得到土地的小土地所有者——虽然他们自己不耕种而将其土地出租，但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并非地主阶级，而属于小资产阶级(如自由职业者、教员、医生、学生、小商人、手工业者等)，绝不没收他们所有的土地，对他们的土地，或者允许他们继续出租(当然不是在残酷奴役的条件下出租)，或者因农民群众要求而将他们的土地拿出来平时，国家应当给他们相当的代价报酬。

(二)富农的土地及其所谓多余的生产工具，均不没收。如果在基本农民群众要求之下，实行平分一切土地时，富农土地应当也拿出来平分。

(三)一切真正手执武器参加抗日救国斗争的军人的土地，不在没收之列。

(四)如果商人同时是大地主，只限于没收他们的土地，不侵犯他们的商业机关。

中国共产党在工商业政策方面，在苏区劳动问题方面，同样亦有许多变更。例如，苏维埃不仅要尽量发展群众的合作事业和国家的企业，而且也要用各种办法去奖励私人资本投到工商业方面来，并设法帮助和奖励私人工商业发展，要取消对于自由贸易与工业发展的限制，要设法发展苏区的工商业，要修改妨害私人工商业的各种税则。在提高工人雇农物质生活，法权地位和文化程度方针之下，在苏区内要避免提出一些实际上不能执行的，或者要加

强经济破坏与增加失业人数的过分要求,以及在苏区内现时不实行工人监督生产的办法(在目前苏区内并没有具备这样的条件)等。

中国共产党誓以身作则,在苏区内最彻底实行国防政府的纲领,表示愿为一切赞成和参加国防政府的党派的榜样;可是,这并不是说,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内的行动,要完全限制于国防政府纲领的范围;根据苏区广大群众之情绪与要求,中共应实施比较国防政府纲领更进一步的办法;但同时必须顾及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民族解放斗争的利益。

八、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区域内的活动

中国现时的政治环境,在国民党区域内的共产党组织面前提出极其复杂的任务。共产党员应当消灭民族解放运动中现有的极大弱点,铲除反帝斗争中的零散现象;共产党员应在最短期内,统一现有一切反日团体,并集中反日斗争的指导;中国共产党要坚决改善自己在军阀部队中工作,不仅要把广大士兵群众,而且要把军官争取到人民反日战线上来。共产党员应巩固党在广大群众中的联系与影响,应经常揭露敌人诬称共产党为阴谋小组的企图。中国共产党人应争取合法活动的机会,要利用一切机会来向全国人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忠实的爱国主义者,是争取中华四万万民众之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先进战士。

中国共产党应力谋实现中国职工运动的统一,加紧进行农民中间的工作,积极领导知识分子,特别是学生群众反对卖国汉奸而进行的爱国运动,同时,党应力求工人农民学生斗争的配合与联系,应使所有这些斗争汇合成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华走狗的全民斗争的巨潮。共产党应组织反对日寇每一具体侵略行动的共同斗争,在经过这些共同斗争来达到全国人民力量巩固的联合,以达到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统一的抗日联军的建立。党应无情的反

对和揭露一切反日人民统一战线的敌人和反对者，同时，要绝对履行自己与任何政治派别或团体所订立的协定，以及努力吸收一切反日势力，甚至暂时的动摇的与不可靠的同盟者到人民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方面来。中国共产党人应当最积极参加一切反日运动，巩固党在群众中的威望，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是为全民利益而斗争的最彻底的战士。

九、中国共产党底旗帜乃是胜利的旗帜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 15 年以来，已经过了伟大发展的道路，已经过了最严的考验。在 1925—1927 年大革命之前，它曾准备广大群众去参加这一革命的事业。自 1925 年大革命爆发后，它又及时站在中国工农群众运动的前面，组织与领导了最强有力的反国际帝国主义的光荣伟大的战斗。而在中国革命暂时失败的困难年代中，中国共产党又学会了实行退却的艺术，它积聚了自己的力量，巩固了自己与群众的联系并准备群众去作新的更伟大的冲锋。中国共产党所有这些努力，并不是没有结果的。而且正是中国共产党准备了 1930 年开始发展的新的革命高潮，党深切相信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因之它为独立的强大的自由的苏维埃中国进行了胜利斗争，它在自己的旗帜之下，团结了中国千百万的劳苦群众。

政治环境日新月异的变化，在党的面前提出了日益复杂的任务。中国党研究了本身所犯错误的教训，积累了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消除了自己的弱点并在实际行动上改正了自己的缺点，结果便保证了本身在思想上组织上的发展。而在不调和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中，中国党在理论上与实际上更其锻炼和布尔塞维克化了自己的队伍。

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在特别艰难的环境中进行自己的工作，几千几百的布尔塞维克战士，在反革命的野蛮残酷的白色恐怖下牺牲了，为中国人民事业而英勇牺牲了许多最著名的人物：有苏兆

征、向忠发、杨殷、王荷波、刘华、许白昊等这些工人阶级最有名的领袖，有自第三次党大会以后历届连任的中央委员，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同志；有著名的党的领袖与全国闻名的政治家李大钊同志；在反革命的屠刀下慷慨就义的，有中国劳苦群众的最有才能的卓绝的领袖陈延年同志和赵世炎同志；有极广阔之眼界及极坚定之意志的罗亦农同志；在伟大斗争中英勇牺牲的，有青年团的创造者与广州公社的领导者张太雷同志和最受中国青年群众爱戴的恽代英同志；此外惨遭敌人屠杀枪毙而光荣牺牲的，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蔡和森同志和罗登贤同志；以及中国农民运动伟大的领袖“农民大王”彭湃同志。而在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期，在全国人民必须空前团结自己的一切力量以抵御日寇的时候，则有为抗日救国而壮烈忠勇牺牲的方志敏同志及其战友红军第七团团长寻淮洲同志等等。

中国红军创造者之一，黄公略同志，在苏维埃革命战线上，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光荣牺牲了；中国最受痛苦的妇女群众之优秀代表，中国共产党最老的干部向警予同志，被国民党的刽子手所残杀了；黄埔系中最优秀的代表，卓绝的军事家，中国共产党底忠勇战士，熊雄、孙炳文、李之龙、蒋先云以及刘云等同志，亦都先后壮烈牺牲了；而在有名的上海抗日防卫战中，孙小宝、傅维钰二同志在闸北前线上，英勇为国捐躯了；在东北反日游击战争中，金伯阳、童长荣、何思美、李斗文(中共党员韩国人)等同志英勇的战死疆场了；此外惨遭屠杀的则有中国回族优秀子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五四时代最有名的学生领袖，我们的马骏同志；以及在双重压迫下的苗族优秀子弟，红色游击队最忠勇的领袖，我们的韦拔群同志。

近几年来，不经任何法律手续而遭受反革命刽子手屠杀牺牲的共产党员，最优秀的中华民族子弟，约在3万以上。成千累万的中国共产党员，真正不愧称为民族英雄，他们始终坚定为民族利益

而斗争。在东三省，他们进行反对日伪的英勇活动，在中国红军为全中国人民之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事业的光荣斗争当中，约有 10 万余共产党员，忠勇为国捐躯了。

中国共产党，不顾如何艰难和困苦，始终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它在力谋恢复敌人所给予自己组织的创伤中，巩固了自己与群众的联系，它学会了如何把为劳苦群众切身要求的日常斗争与为解决历史的国家重大问题的斗争联系起来的艺术。它在战斗中培养了忠于革命事业的干部；它有尽心竭力，不惜牺牲生命来为党的建设与巩固而斗争的战士；他们永久记着如果没有这样巩固的党，中国人民是没法争得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造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切工作都建筑在自觉的基础上，他们深切了解只有中国共产党具有真正战斗的力量，并与广大群众有着紧密联系，乃是中国人民争取独立与解放斗争中最基本的与有决定意义的条件。中国共产党吸收一切最英勇的战士加入自己的队伍，这些战士的特性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的一样，具备着：“有清楚的目标，有不达目的不止的坚决精神，有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性格”。

中国共产党受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学说的熏陶与鼓舞，坚信自己最后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因为是照这个学说的指示，并稳稳站在这个坚固的思想基础上，所以就能正确解决中国民众解放斗争一切迫切的问题。它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忠于列宁斯大林的共产国际之精神，教育它所领导的广大群众，使之感觉国际无产阶级的胜利与自己有血肉相关的联系。

中国很有名的政治家，在不久以前还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可是在其最近的一篇论文当中，却不能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实为中国最优秀青年之菁华。固然，在中国党的队伍中，是有不少白发苍苍的人物，可是他们也与所有的共产党员一样，是属于前途无量的青年的党，属于为救国救民及改造中国社会而英勇奋斗的党；属于不顾任何牺牲，非达到这一目的不止的党。

强大的中国的党,乃是中国人民民族和社会解放斗争胜利的
最好保证。中国共产党底旗帜,乃是胜利的旗帜。中国共产党高
举着这面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华走狗的斗争的旗帜,力谋全民抗
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实现,一定会获得全中国民众更热烈的爱戴与
更伟大的拥护。

所有中国人民中忠诚的先进的分子,正一致团结在中国共产
党战斗旗帜之下,并一定会在中国英勇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之下,在
最近将来的决斗中,获得完全的胜利。

此文根据北方文化出版社的中译本
刊印。原中译本无出版年月,约在 1937
年出版。

(录自《米夫关于中国革命的言论》,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9
月版。)

伟大的十月革命和中国

(1937年11月)

米 夫

十月革命的胜利奠定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开端,也为中国人民争取本国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斗争开辟了新时代。

斯大林同志在《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及其对于殖民地和附属国革命运动的影响时,写道:

“俄国同帝国主义决裂并摆脱掠夺性的战争;公布密约,庄严地废除侵占别国领土的政策;宣布民族自由,承认芬兰独立;宣告俄国为‘苏维埃民族共和国联邦’,苏维埃政权向世界发出对帝国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战斗呼声,——所有这一切不能不对被奴役的东方和流血殆尽的西方发生重大影响。

果然,十月革命是世界上第一个打破了东方被压迫民族劳动群众数百年来沉睡并把他们卷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斗争的革命。”^①

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对中国的反帝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涨产生了极大影响。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恰恰就在这个时期中国人民看到,国际帝国主义者,首先是日本侵略者再次无耻掠夺他们的国家,再次伤害他们的民族感情。日本帝国主义者攫取了山东半岛与青岛港,并在向中国提出奴役性的“二十一条要求”之后,又公开准备进一步对中国人民进行殖民奴役。同一切帝国主义列

^① 《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146—147页。——原编者

强截然相反,苏维埃俄国自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就立即对中国采取友好政策,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对苏维埃国家的深切同情。

的确,在十月革命后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中国人民未能正确了解这个革命的真正性质。俄国革命的消息没有立即传入中国。由于高尔察克匪帮、捷克军团和日本干涉者设置障碍,中国同苏维埃俄国被隔绝开约有一年半之久。此外,资产阶级文痞们,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阵营的资产阶级文痞们,大肆造谣和恶意中伤,千方百计诽谤苏维埃政权的内外政策,企图使中国人民对苏维埃政权产生错误的看法。

但是,红军击溃了所有的白卫军和驱逐了所有的干涉者。随后,关于苏维埃俄国的真实情况才开始传到中国。人们开始得知,红军反击帝国主义干涉者和俄国白卫军取得了胜利。中国人民得悉,在前沙皇俄国的领土上已彻底消灭了民族压迫、社会与民族的不平等,苏维埃政权已废除了沙皇政府以前强加给中国的一切奴役性的掠夺条约。

在这些令人信服的事实影响下,中国人民根本改变了对俄国的态度。中国人民理所当然地憎恶沙皇俄国,他们把沙皇俄国视同洪水猛兽,认为它是使中国遭受残酷剥削和殖民奴役的最凶恶敌人之一。而苏维埃俄国给全世界带来的是解放,它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威望与日俱增。

“过去,俄国在被压迫民族的眼里是压迫的旗帜,现在,它成为社会主义的俄国以后,已经成了解放的旗帜,这种情况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十月革命的领袖,列宁的名字在殖民地和不享有完全平等权利的国家中,现已成为被宰割、受压抑的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称颂的受人尊敬的名字,这个情况也不是偶然的。”

与沙皇俄国时代相比,对华政策的根本变化也反映在1919年7月25日苏维埃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历史性宣言中。这份宣言庄严宣布废除沙皇政府用以奴役中国人民的一切密约。苏维埃政府

放弃沙皇俄国的一切特权,并建议中国本着完全平等的原则同苏维埃国家建立睦邻关系。

在帝国主义长期掠夺的年月里,一个外国强国第一次同中国这样讲话,它伸出的不是侵略者的魔掌,而是人民的友谊之手,这个人民尊重其邻国中国的民族感情和利益。1920年9月27日,苏维埃政府再次向中国政府建议,尽快在完全平等和互相尊重两国利益的基础上建立苏维埃俄国和中国的友好关系。同时,为了发展1919年7月25日宣言中确立的原则,苏维埃政府提出了协定的要点。这个宣言的第一点重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①

7月25日和9月27日的声明在中国产生了巨大反响。虽然中国社会进步人士热烈欢迎两个声明,但北京政府按照帝国主义列强的旨意,竭力拒绝同苏维埃俄国谈判,直到1924年5月31日才签署了中苏条约。这个条约是中国在完全平等和真正友好的基础上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当然,中国人民对这个条约感到欢欣鼓舞和真诚地感激苏联人民。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为之生机蓬勃。中国的激进知识分子中间,开始成立了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俄国革命经验以及其他问题的各种小组和团体。俄国的、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翻译本的传播日渐广泛,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觉醒和组织性迅速提高了,中国革命者的思想武装起来了。由于这一切,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十月革命坚定了中国革命者的胜利信心,鼓舞他们去为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进行忘我的、坚定的

^① 见《中俄边界条约集》,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37页。——原编者

斗争。苏联劳动者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给予 1925—1927 年中国革命的援助,极其鲜明地表明了苏中两国人民的真挚友谊。

伟大的中国革命家孙中山博士正确地评价了十月革命的意义,接受了这个革命的教益。孙中山在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遗书中,总结其 40 年来致力于中国解放的不倦斗争时写道:

“亲爱的同志: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取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孙逸仙。”^①

孙中山的这份遗书表达了全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的思想和愿望。的确,国民党曾几何时听从了国际帝国主义的挑拨,违背了该党的缔造者和独一无二的领袖孙中山的遗言,走上了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的道路。但中国人民对此做法坚决反对。国民党自己也很快领悟到这个政策对中国来说是一条绝路,它完全违背了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由于国民党的过错而中断了的两个伟大国家

^① 《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972 页。——原编者

之间的正常关系又得到恢复,这对中国在全世界国际关系中加强其地位是有利的。

苏联甚至在中东铁路冲突期间对中国也表现出睦邻态度。早在 1924 年,苏联政府就自愿同意苏中共管这条俄国在革命前修建的铁路。但时过五年,中国地方军阀在帝国主义者唆使下强占了中东铁路。苏联政府当时尽了一切可能,以期和平解决冲突。然而,由于中国军阀孤注一掷,恣意横行,苏联政府才不得已用武力来约束他们。不过,苏联政府即使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也没有采取可能间接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任何步骤。苏联政府恢复了以前在完全平等基础上签订的条约,再次表明其对华政策与其他大国根本不同。

1937 年,正当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进行掠夺性侵略战争正酣之际,苏联政府与中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就再度证明苏联对华友好政策是一贯的。

因此,苏联多年来始终不渝地执行对华友好政策,不止一次地令人折服地证明,苏联人民深切同情中国劳动群众要求民族解放的愿望。

※ ※ ※

中国有苏联这样一个强大的邻邦,这个邻邦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上尊重中国领土不受侵犯、国家完整和民族独立。但苏联不是中国唯一的邻国。中国的另一个邻国是帝国主义日本。苏联和日本现存的国家制度有根本区别,这就决定这两个国家采取截然相反的对华政策。只要对近几年的日中关系稍加研究,就不难看清这一点。

日本帝国主义者早就看中中国是满足其侵略贪欲的对象。日本帝国主义者利用中国积弱和所处的不平等地位,有步骤地实施其掠夺计划,奴役和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中国人民。但日本帝国主义者大大扩大其侵略规模,则自 1931 年 9 月占领满洲始。

从这时起,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步步进逼。在占领满洲之后,日本帝国主义者随即占领热河省,尔后,占领山海关和长城一线的各战略要地,即所谓“滦东非军事区”。日本帝国主义者接连占领这些地区之后,就将其变为进一步侵略行动的基地。他们不断向中国的腹地推进。他们一手制造了“冀察政务委员会”^①和冀东“防共自治政府”^②,并以此为招牌,开始了占领华北五省的实际行动。

日本帝国主义者置占领区的中国人民群众于水火之中。他们攫取了一切铁路、水运、银行、耕地和企业。日本侵略极其沉重地打击了中国经济。日本帝国主义者夺取了中国大片地区,滥施倾销,按亏本价格抛售商品以充斥中国市场,低价收买倒闭的中国企业,并且通过金融和外贸政策加重整个中国国民经济的瓦解。近来,中国人民群众的贫困更加不可言喻,这首先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实行掠夺政策和进行猖狂侵略的结果。

1937年7月起,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华的强盗战争急剧扩大。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沿海集结海军,向中国领土调遣大量陆军,使中国的肥沃土地和重要工业城市陷于火与剑的洗劫之中。日本军阀疯狂屠杀,野蛮无耻,人性灭绝,激起了全体进步人类的义愤。

日本的侵略使中国人民遭受无穷的苦难。日本侵略者穷凶极恶。日本军阀大批屠戮手无寸铁的中国和平居民。古老的大学、学校、博物馆和图书馆这些中国的文化中心尽遭毁灭。日本帝国主义者使中国的大量城镇化为瓦砾和废墟。

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掠夺性扩张触及伟大中国人民的切身利

① 1935年12月,国民党指派宋哲元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满足日本“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原编者

② 1935年10月,日本策动汉奸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推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此处米夫译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原编者

益,使其命运陷于风雨飘摇之中。日本帝国主义者已占据中国大片领土,而其他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大有可能遭到彻底的殖民奴役之势。

不过,应当指出,这个民族有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人民,这个国家有着近五千年的历史。当时与其同一时期存在的巴比伦和亚述等古国已然泯灭,而中国犹存。古罗马和希腊、美洲的印加帝国、亚洲的大蒙古帝国,以及长期留存于人类历史上的上百个其他国家已然泯灭,而中国犹存。

多少世纪以来,中国产生了卓越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声名赫赫的统帅和杰出的发明家。中国人民在各个知识领域内创造了大量文献。中国人早在欧洲人之前就学会制造和使用火药、罗盘和纸,等等。中国人民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成就辉煌。正是这个拥有巨大的人力资源、雄厚的地下宝藏和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目前面临着蒙受全部殖民奴役的威胁。

※ ※ ※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肆无忌惮地侵略,中国人民目前遇到了几千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面临着沦为无权的殖民地奴隶的危险。因此,无怪乎日本侵略激起了中国全民性的拯救祖国和争取中国民族独立的强大斗争高潮。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不愿意、也不可能甘愿做殖民地奴隶。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为了讨好日本侵略者而坐视国家沦亡。

近几年来,中国的抗日运动怒潮不断高涨。敌占区的农民骚动已成为屡见不鲜的现象。在满洲,游击队克服重重艰险,不断出击,取得胜利。同时,日资企业中的中国无产阶级罢工运动继续发展和扩大。学生的抗日运动也有很大规模。城市小资产阶级、进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中国的一部分爱国资产阶级更加积极参加全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抗日斗争的高涨日甚一日地对军队产生有力影响。不仅在士兵群众中,而且在官长中也滋长着一种有

利于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斗争的情绪。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抗日运动的全民性质愈益鲜明地显示出来。中国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了解到,日本帝国主义是全体中国人民当前不共戴天的大敌,只有把全国的一切力量团结起来,投入斗争,中国人民才可能打退这个敌人的进攻。所以,中国人民群众开始强烈要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强烈要求联合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以保卫他们的切身利益。

因此,已经形成了建立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极其有利的基础,并进而创造了彻底粉碎日本侵略者和将其驱逐出国土的最重要的前提。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掠夺性侵略不仅触及了中国人民的利益。日本军阀使太平洋上的国际矛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张复杂,它正以自己的行动挑动一场新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英国、美国和法国资产阶级不可能不把日本军阀的侵略行动视为对其利益的直接损害。事情还不仅仅在于,日本侵略威胁到英国和美国在华的巨额投资,破坏了这些国家的正常贸易,虽然众所周知,美国和英国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事情还不仅仅在于,美国和英国受到威胁,有丧失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巨大潜力、可以倾销商品、采购廉价原料和进行投资的市场。除去所有这一切,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就可能意味着日本在亚洲大陆站稳脚跟,日本在太平洋和全世界的地位得到空前加强,简而言之,可能改变力量对比,而这是美、英、法等国所不能允许的。

尽管英、法、美等国的资产阶级显然会寻求一切妥协途径,勾结日本,牺牲中国,但依然无可置疑的是,日本军阀进一步扩大侵华的行动,将会激起全世界劳动者更强烈的义愤,英、美、法等国的明智人士就会更加强烈地要求约束日本军阀,抑制它的侵略野心。因而,中国人民就有可能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得到补充力量和间接后备军。

日本侵略所造成的中国国内外形势有利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利于中国人民顺利开展争取切身利益和拯救祖国的斗争。

但是，团结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抵抗日本侵略的事业进展得还不顺利。这是为什么呢？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远非轻而易举的事情。中国人民群众还得在这条道路上克服不少障碍。有许多因素拖延和阻碍着建立统一战线和联合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去抵御日本侵略者。

属于这种阻碍因素之列的，首先当推国家的不统一和中国的封建军阀割据。中国有许多地区的政权至今仍为各派军阀所把持，他们不服从中央政府，视各省为自己的领地。这种情况当然就极大妨碍了中国人民一切力量的联合。

而且，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计划，就是要广泛而精心地利用中国各自为政的现象和各军阀集团间的纷争。日本帝国主义者唆使和多方设法煽动军阀冲突，千方百计地挑起中国内战，借内哄战争来削弱中国人民的抵抗力量。与此同时，不管此事多么反乎常情，日本帝国主义者甚至打算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个别部队的抗日情绪的增长，他们怂恿一些中国部队去打另一些部队，竭力诱使这些部队脱离抗日斗争，破坏中国人民一切力量的大联合。1936年12月著名的西安事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这一政策表现得最为明显。

直接帮助日本侵略者的是中国托派。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28年中国托派就伙同右倾叛徒陈独秀分子反对共产党，反对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些年来，中国托派只要有可能就把英勇的中国共产党人出卖给反革命屠夫。其中，中国红军的卓越组织者之一、红十军军长方志敏同志就是这样牺牲的。中国托派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公开采取敌对立场。

中国托派分子尽其所能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者挑起中国内战。西安事变期间，托派匪徒杀害了光荣的爱国志士和忠诚的抗日将

领王以哲^①，企图以此挑起南京和西安之间的战争，以便于日本帝国主义者进一步实现其侵略计划。中国托派分子极其卑鄙地诋毁苏联，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炮制的所谓“布尔什维克的危险”和“赤色帝国主义”威胁着中国人民的荒诞无稽的恶毒谰言，他们随声附和，大做文章。中国托派分子散布这些流言，就是替日本帝国主义者完成了乱人视听的任务，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恰恰就是想拿这些“论据”来遮盖和掩饰其侵华行动的。

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这批托派走狗千方百计企图在中国散布恐日心理。这些出卖灵魂的文痞们企图证明，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似乎没有希望，如果中国一旦走上武装保卫自己权利的道路，等待它的将是阿比西尼亚那样的命运。有一个托派无耻之徒竟然劝告中国人民要俯首切帖耳地匍匐在嗜血成性的日本奴役者面前，他写道：“既然抗日条件尚不具备，则需同日本妥协”。按照日本侵略者的旨意，以为人所不齿的黄公度为头子的一伙卑鄙的中国托派分子，准备在广西这个后方地区制造混乱和利用桂系军队开赴抗日的时机，企图在背后釜底抽薪，打击中国人民。

不难理解，中国托派分子的全部活动是为了谁人的利益服务的。这些活动再一次证实了斯大林的话，他说：现代的“托洛茨基主义已成为遵照外国侦探机关所给予的任务而活动的狂暴的无原则的暗害者、破坏者、间谍和杀人凶手的匪帮”。^② 中国托派的全部活动迎合了法西斯走狗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协助日本帝国主

① 王以哲，东北军爱国将领，1933年2月任西北“剿”副总司令张学良属下的陆军67军军长，参加古北口、滦东长城抗日战役。1936年西安事变后，东北军主战派主张待张学良回西安，才可接受蒋介石编遣，王当时主持东北军军务，主张和平解决。1937年2月2日，被东北军主战派刺死于西安寓中。——原编者

② 斯大林：《论党工作的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分子及其他两面分子的办法》，1937年3月29日与4月1日《真理报》，见人民出版社单行本，1952年版第11页。——原编者

义者占领中国的总计划。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忠诚儿女过去和现在都在同中国人民的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忠实奴才进行毫不调和的坚决斗争。

在团结本国各种力量和建立全国抗日战线的道路上，中国人民还要克服另一个障碍，这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某种动摇。中国资产阶级通过满洲和其他沦陷区的事例，业已看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对于它的利益是一种多么严重的威胁。所以，中国资产阶级日益倾向于抵抗日本军阀，并为此目的同其他社会力量妥协。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中国资产阶级对于 1925—1927 年的革命记忆犹新，他们担心，人民群众会不会起而独立斗争，会不会冲出有利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框子。

中国当权人士和国民党领导人相当长时间的犹豫不决也说明了这种矛盾，他们长期以来无视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共产党关于建立统一战线，停止内战和联合一切力量抵抗日寇的号召。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再次发动空前大规模的侵略，这就使以前各种动摇的社会力量也加入了全民抗日的斗争。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所预言的那种前景已开始实现了。斯大林同志说：

“另一些人认为应当对某一个军事方面软弱而市场广大的国家发动战争，例如对中国发动战争，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并不能称为真正的国家，它不过是一个需要由强国去占领的‘无组织的地区’。他们显然想完全瓜分中国，靠牺牲它来改善自己的状况。假定说，他们发动了这样的战争，由此会得到什么结果呢？大家知道，在 19 世纪初叶，人们对意大利和德国的看法正像现在对中国的看法一样，就是说，他们认为意大利和德国是‘无组织的地区’，而不是国家，并对它们进行了奴役。可是由此得到了什么结果呢？大家知道，结果是德国和意大利都进行了争取独立的战争，都统一成了独立的国家。结果是这两国人民对奴役者的仇恨心理加强

了,其后果直到现在还没有消除,而且大概也不会很快就消除。试问,有什么可以保证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发动战争不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呢?”^①

近来,中国的联合是大大地推向前进了。可以不必怀疑,这种联合将会在武装抗日的节节胜利的过程中顺利实现,中国人民不畏牺牲的斗争必将赢得民族独立和国家自主。

※ ※ ※

日本侵略使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极其复杂而重要的任务。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要求共产党在策略上也必须急速转变。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是共产党的一项极重要任务。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共产党应当动员自己的全部力量,应当表现出特殊的灵活机断。它在联合一切抗日力量的斗争中,在建立全民族抗日战线的斗争中,会遇到各种障碍和困难,中国共产党应当坚定不移、始终不渝的去克服这些障碍和困难。

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各地分布不均,所以出现了上述种种困难。在苏区,共产党无论在人数或在组织方面都是强有力的,更何况它还领导着许多坚强的武装部队。而在中国其他地区,共产党的组织还很薄弱,在这种情况下,要成为建立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倡议者和带头人,迥非易事。

共产党曾犯过的一些错误,主要是“左”倾宗派主义错误,更不容忽视,有一些过去妨碍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错误,至今尚未为全党所克服,因而就很难在反对主要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利用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其中包括利用拥有可观力量的暂时同盟者。

但是最大的困难在于,正当中国内战最激烈之际,满洲沦陷了。多年来,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中国红军和南京军队之间连续

^①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62页。——译者

不断地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近几年,虽然日本帝国主义者进行掠夺侵略,但这个斗争仍未停止。与此同时,已日益看清,中国的内战如再拖延下去,只能对日本侵略者有利,他们就会火中取栗,借以分化和削弱中国的抵抗力量。

国内新的政治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改变其过去的政策。共产党执行了同国民党妥协的路线来代替同国民党进行武装斗争的路线,以期共同抵御日本侵略者。共产党转而采取以统一的民主共和国为基础联合一切抗日力量的口号,转而采取新的政策,支持南京政府抗击日本侵略者。

在继续内战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要根本转变自己的全部政策,是非常困难的。长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颇有对新任务理解不足的现象。确实,自日本军阀侵略伊始,中国共产党曾十分积极地扩大和领导了抗日战线。共产党力图把中国人民日益增强的义愤引导到同日本奴役者进行武装斗争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向中国的各部队和各政治团体发出呼吁,号召联合全国力量,共同斗争,拯救祖国。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季米特洛夫同志在这次大会上所做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报告,对于中国共产党转变自己的全部政策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起了很大作用。中国共产党根据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明确的方针,开始更坚决、更大胆、更彻底地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而且,最近在这方面已取得了颇为重要的成绩。

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文件对于国共合作抗日救国、对于建立全国国防政府和全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等等,都十分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新立场。共产党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已采取步骤来加速联合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其中包括一切抗日的武装力量。党已调动红军北上,到靠近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的地区,以便使红军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武装支柱和先头部队。党运用自己的全部影

响,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因而,打乱了日本侵略者的计划,实际上促进了抗日力量的统一。

多少个月来,共产党向国民党、向中国其他政治和军事集团呼吁联合,一无反响。尽管这些呼吁令人颇有石沉大海之感,但共产党并不气馁。共产党坚持不懈地继续解释抗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共产党始终不渝地争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使得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愈益同情共产党和支持它所提出的口号。

共产党终于把同国民党的谈判引上轨道,使当前中国这两股最主要的力量实际达成战斗的协议。共产党和国民党已经达成协议^①。可以期望,国民党将会依照人民的意志,把南京政府改组为全国国防政府,将会进一步实现政权民主化等等。这已经为建立强大的全国抗日战线和复兴中华以及沉重打击猖狂的日本军阀奠定了基础,采取了重大步骤。国际无产阶级可以为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的成就而感到骄傲,可以为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开始结出硕果而由衷高兴。

据报载可知,南京政府在签订协议后已开始采取有利于组织全民抗击日本侵略者斗争的一系列措施。南京政府着手释放政治犯。它开始吸收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知名活动家参与讨论中国国防的迫切问题;它允许“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②和其他抗日群众组织自由活动;它同意中国红军编入全国军队,为其组成部分,但作

① 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7月17日,国共代表在庐山举行会谈。根据国共双方协议,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发表了蒋介石关于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和国共合作的讲话。至此,中国共产党竭力敦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原编者

② 即1936年5月沈钧儒、邹韬奋等人领导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该会发表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原编者

为一个有组织的单位，仍保留自己的指挥人员。而最重要的是，南京政府正在认真地为组织武装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者而进行斗争了。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自 1937 年 7 月 7 日始，中国军队就已在卢沟桥，尔后又以更大规模的战斗，开始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了，从那时起，就已开始了为复兴中华而斗争的新的历史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把希望寄托在闪电战的效果上，但却遇到了中国人民武装力量的日益壮大、日益顽强的抵抗。特别是，他们一旦同传奇式的统帅、国民革命军八路军现任领导人朱德同志兵戎相见，他们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战争不仅规模巨大，而且旷日持久。日本军阀已泥足深陷，他们要不带创伤活着挣脱出来已是日甚一日地更加困难了。战争的持久性质，中国人民全力以赴的投入斗争，以及全世界真正民主的力量对中国人民的热烈支持，决定日本帝国主义者必将彻底失败。

※ ※ ※

自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的 20 年间，中国连续发生了许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这些年来，中国人民的革命解放运动经历了漫长的道路。这些年来，英勇的中国共产党在为建立独立、民主、自由而幸福的中国而奋斗的历史上，写下了不少的光荣篇章。目前，它和全体中国人民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抵抗日寇或者死亡，坚决进行武装斗争或者毁灭，这就是极其尖锐地摆在中国人民群众面前的问题。可以不必怀疑，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的年代里已经历过解放斗争的严峻和深有教益的考验，他们一定会有足够的力量使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妄为受到应有的惩罚，定能捍卫国家自主、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

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十周年之际，谈到十月革命对殖民地和附属国革命的影响时写道：

“安然剥削和压迫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解放革命的时代,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觉醒的时代,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掌握领导权的时代已经到来了。”^①

日本帝国主义者想奴役中国并将其变为侵略苏联的战略基地。可以坚信,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是绝不允许的。中国不是砧铁。相反,中国是将日本帝国主义者砸成齏粉、置之于死命的榔头!

译自《布尔什维克》杂志,1937年第
21期,第92—102页。

王福曾译 郑 禄校

(录自《米夫关于中国革命的言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版。)

^①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07—208页。——原编者

四、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电关于和平解决西安 冲突的必要性问题^①

(1936年12月16日)

答复你们的来电,我们建议采取以下立场:

1. 张学良的发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有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2. 既然这次发动已成事实和应当顾及事实,中国共产党要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一冲突:

① 通过吸收几名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办法改组政府;

② 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

③ 停止执行消灭红军政策并与红军建立联合抗日关系;

④ 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此外,我们建议不提同苏联联合的口号。

书记处

按档案文件发表

^① 这份电报是由季米特洛夫校阅签发的,部分已在《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杰出的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一书发表。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电——关于中共领导在 西安事变之后的方针问题

(1937年1月19日)

我们认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具有特殊意义,但是这种解决办法可能受挫,这不仅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极力挑动内战的走狗在搞阴谋,而且也是因为你们党采取了错误的步骤。

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党以前的方针(即力图通过排除蒋介石和推翻南京政府的方法建立统一战线)的错误,虽然最近党对自己的政策作了一些修改,但是还没有彻底摆脱这种错误方针。中央在蒋介石被释放后作出的指示尤其证明了这一点。实际上党在执行分裂国民党而不是同它合作的方针。同蒋介石和南京达成的协议被视为蒋介石和南京的投降。同西安人的合作搞成了反对南京的联盟,而不是同他们联合行动,反对共同的敌人。所有这一切,助长了亲日派的气焰。

现在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切实停止内战,首先是争取使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放弃消灭红军的政策,争取同南京共同抗日,即使初期没有正式协议。因此,党应该公开宣布和坚决执行这样的方针:支持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旨在停止内战、联合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反对日本侵略、捍卫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措施。

同张学良、杨虎成(城)等人的军队的合作问题,应服从于完成这一主要任务的需要,并应在这方面向这些军队施加各种影响。

在西安人的地区,不应组织共产党的公开行动;不应就蒋介石在西安的承诺大发议论;不应提出立即对日宣战要求;不宜强调同苏联结盟口号。

同时,在全国、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必须加强群众运动,争取实现全国的统一和和平,以反对外来侵略,并且必须要求制止亲日集团所策划的“围剿”行动。一旦“围剿”军派出,你们的任务则是自卫,但是你们自己无论如何不要为这种事态转折提供借口。

在各种情况下,尤为重要的是保持共产党和红军的统一,因为这是顺利克服一切困难的保证。

要认真注意托洛茨基分子的阴谋,他们在西安同在全国一样,试图以其挑拨活动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事业,他们是日寇的走卒。

我们觉得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行为相当可疑,应该取消她以共产党人名义或以共产党人的所谓可靠人士的身份露面的机会。应该在报刊上严厉批评她的行为。

请确认收到此电。我们等待关于你们本着本指示精神所采取的具体措施的通报。

书记处

按档案文件发表

(录自《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

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

(1936年12月19日)

一、西安事变产生前的形势

(一)在绥东局部抗战开始后,在全国以及西北各大城市(如西安、太原、绥远),抗日运动突飞猛进,不但使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与绝大部分的中等资产阶级参加,即大资产阶级内部也发生着决定的分化;

(二)南京政府正面对着这一迅速发展着的抗日运动,它被迫着很迟慢的与不坚定的改变着它过去对日退让的政策。在这转变过程中,它还是对日力求妥协,对绥远局部抗战表示不积极,对全国抗日运动,采取压抑政策,对红军不肯停止进攻;

(三)东北军及17路军将士,在全国与西北人民及共产党苏维埃红军的影响与推动之下,抗日情绪特别高涨,因此要求迅速停止进攻红军,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但他们的这种要求,为蒋介石所严拒。

二、西安事变的意义

(一)这一发动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因此,这次发动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进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

(二)但是因为这一发动采取了多少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而造成了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内战的可能。因此,这一发动又妨害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

三、西安事变发展的两个前途及其拥护者

(一)或者由于这一发动使内战爆发,使南京中派(民族改良派)一部或大部主观上与客观上走向亲日,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以致造成了日寇侵略的顺利条件。这一前途是日德意国际侵掠阵线,特别是日本,及中国亲日派所造成^①的。

(二)或者由于这一发动结束了“剿共”的内战,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而得到早日的实现,使全国的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反而更迅速的实际建立起来,这一前途,是国际和平阵线,全国人民,全国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所竭诚拥护并要使之实现的。

四、为实现第二个前途中共的基本方针是

(一)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二)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

(三)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

(四)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严重的打

^① 《六大以来》版此处为“特别是日本及中国亲日派所欢迎的”。

击,促其反省,这种防御战不是为了要以扩大内战的方针代替一致抗日的方针,而依然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

(12月19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 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①

(1936年12月19日)

南京孔庸之,孙哲生,冯焕章,陈立夫等先生及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西安张汉卿,杨虎城,王鼎芳,孙蔚如先生,暨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诸先生勋鉴:

自西安提出抗日纲领以后,全国震动,南京的“安内而(后)攘外”政策,不能再续。平心而论,西安诸公爱国热心,实居首列,其主张是立起抗日。而南京诸公,步骤较缓。可是除亲日分子外,亦非毫无爱国者,其发动内战,当非心愿。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当此危机存亡之秋,本党本政府谨向双方提出如下建议:

(一)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

(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

(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① 本通电于1936年12月19日还全文向全国人民及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发表,文字基本相同。

(四)会议地址暂定在南京。

上述建议,实为解决目前紧急关头之合理有效办法,南京诸公,望立即决定国策,以免置此国家混乱中日寇竟乘虚而入也!并望全国人民各党各派,立即督促当局召集和平会议,讨论一定国策,共赴国难!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致周恩来

(1936年12月21日)^①

恩来同志：

(甲)目前局势是日本与南京右派联盟,企图夺取蒋系中派,造成大内乱,另一方面是南京与各地左派企图调和而中派在动摇中。

(乙)我们与西安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

(丙)请与张、杨商量立即采取如下步骤：

(一)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在下列基础上成立和平。

(第一)南京政府中增加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排除亲日派,实行初步改组。

(第二)取消何应钦等之权力,停止讨伐,讨伐军退出陕甘,承认西安之抗日军。

(第三)保障民主权利。

(第四)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第五)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第六)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并在上述条件下赞助中国统一,一致对日。

^① 本文原件无年月,年月是根据文内提到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等内容判定的。

(二)依上述条件与阎锡山、宋子文、于右任、黄埔左派、二陈^①派等谈判。

(三)对阎锡山迁蒋至山西办法应表示可以考虑。

(四)招致一切愿意和平之人来西安谈判。

(五)招致英美顾问再来西安,经过他们使英美赞助和平。

(六)巩固西安军事阵地,使尽可能持久,以待政治谈判之成功。

(七)对陕甘之黄埔军官,如胡宗南、樊松甫、董钊等进行接洽。

(八)兄应以共产党代表资格,公开与蒋、陈、宋、阎、于等,基于上述条件与谈判,调停双方。

中央书记处

廿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① 指陈果夫、陈立夫。

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

(1936年12月27日)

蒋介石、宋子文的接受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之新阶段的开始。但要澈底的实现抗日任务，还须要一个克服许多困难的斗争过程。这个过程的实质，即是中国抗日派与中国亲日派的剧烈斗争，也即是世界和平阵线与世界侵略阵线的斗争之一部分，并在斗争中推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间派最后结束他们的动摇地位，而坚决走上改革内政对外抗战的道路，这个过程的快慢，首先决定于抗日派力量的壮大。因此，我们目前必须：

(一)宣传此次和平解决的胜利及日寇与亲日派挑拨内战阴谋的失败，号召全国人民与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亲密的联合起来，实行改革国内政治与对日抗战；

(二)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所许诺的条件，即停止内战，改组国民政府，改组国民党，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共产党，召开救国会议，联合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与实行对日抗战等条件；

(三)巩固西安发动的胜利，巩固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的团结，赞助张杨改造东北军西北军成为最好的抗日军队，发动与组织西北民众，联合西北少数民族，扩大与巩固红军，把陕甘两省首先成为抗日根据地与策源地；

(四)继续推动各地实力派参加对日抗战对内民主的运动，同西北民主抗日力量实行合作，以促进南京的改革与抗战的发动。

在南京政府中,推动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实行改组南京(政府);

(五)努力扩大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吸收广大的下层群众到运动中来,消灭严重存在着的缺乏组织性的弱点;

(六)在严肃基础上发展与巩固共产党的组织;

(七)党应准备实现一切政治上与组织上的必要的改变,以适合于全国统一战线建立后的新环境。

(十二月廿七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关于西安事变的三十四份文电

(1936年12月—1937年2月)

原编者按：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由于不满蒋介石的内战政策，要求团结御侮，一致抗日，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经过各方面的斗争和调解，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发生，是国民党爱国将领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深的形势下，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作出的意义深远的选择，而事变的和平解决，最终促使蒋介石停止“剿共”，枪口对外，结束了十年内战，为全民族抗战的开展以及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使得西安事变成为中国抗日战争时局转换的枢纽。我们在50年后回顾这次著名的事变，仍然为当时的时局转换感到惊心动魄，对当时爱国志士仁人的救国热忱无任钦敬。在此，本刊与中央档案馆合作编辑了有关西安事变的34份文电，供研究参考，并志纪念。

军委主席团电

(1936年12月12日)

(一)西安抗日起义详情如下：

12日六时已将蒋介石、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邵力子、晏道刚及其他中央人员全部俘虏，蒋孝先、邵元冲及宪兵一团长阵亡，钱大钧受伤，马志超及城防之宪兵警察和一部分中央军全部缴枪，除蒋死卫士20多人外，西安城内冲突小小，可谓完全胜利。已宣布政治主张及十大政纲。

(二)向全军宣布加紧准备、待命行动。

军委主席团

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电

(1936年12月13日)

李毅^①兄鉴：

文寅^②电悉。

元凶被逮，薄海同快。目前任务，在全国者已见致汉年^③电，昨已奉达，并祈转沪；在西北者略陈如次，敬祈酌夺。

(甲)重兵置于潼关、凤翔、平凉，潼关尤要，严拒樊崧甫。

(乙)号召西安及西北民众起来拥护义举，对全国亦然。弟等认为，只有将全部行动基础置予民众之上，西安起义才能确定的发展其胜利。

(丙)宜即逮捕或驱逐部队中法西斯分子，对全军奉行广大深入的政治动员，向全体官兵宣布蒋氏卖国残民罪状，政治上团结全军，此着是最紧急任务之一。

(丁)胡、曾、关^④等军向南压迫时，红军决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如何部署，请随时电知。此外，国际方面弟等已有所布置，详容后告。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并求杨虎城兄电知延安驻军密为保护，如何盼复。请令电台时刻联络。

弟东、来^⑤叩

元午^⑥

① 指张学良，有时也作李宜、毅、宜，均不另注。

② 文，韵目代日，指十二日；寅，旧式计时法指三时至五时。

③ 指潘汉年。

④ 指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

⑤ 指毛泽东、周恩来。

⑥ 元，韵目代日，指十三日；午，旧式计时法指十一时至十三时。

毛泽东等致张学良、杨虎城电

(1936年12月14日)

汉卿、虎臣^①两将军勋鉴：

(甲)文^②日举义，元凶就逮，抗日救亡，举国同情，弟等率领全部红军与全苏区人民坚决赞助二将军领导之革命事业，谨就所见略陈如次。

(乙)日本决定压迫南京扩大内战，俾遂其灭亡我国之谋。南京一部分亲日分子接受日本指示，继续发展蒋氏对外和平对内战争之政策，准备向西北大举压迫。然而全国民众、国民党之大多数、各省有力军人无不渴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热烈欢迎西安之抗日起义，反对日本与中国汉奸之阴谋。

(丙)我们行动方针似应立即进行如次各项，应急变：

(一)立即宣布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之组成，以张学良为西北抗日援绥联军总司令；东北军编为西北抗日援绥联军第一集团军，张学良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17路军编为第二集团军，杨虎臣为总司令；红军编为第三集团军，朱德为总司令。设立西北抗日援绥军事政治委员会，以三个集团军高级将领为委员，每集团军三人至五人，以张学良、杨联军虎臣、朱德三人为主席团，张为主席，杨、朱^③为副，统一军事政治领导。以上组织如荷同意，立即以三方抗日救亡联席会议名义向全军全国宣布。此外，极力争取阎锡山先生及全国其他爱国将领加入，推阎锡山先生为全国抗日援绥联军总司令。

(二)目前军事步骤：抗日援绥联军三部主力应集中于以西安、

① 指张学良、杨虎城，下同。

② 文，韵目代日，指十二日；寅，旧式计时法指三时至五时。

③ 以下如不另注明，张、杨均指张学良、杨虎城；朱指朱德。

平凉为中心之地区,发扬士气,巩固团结,与敌决战,各个击破之。在目前三星期内,由杨兄所部固守西安城,张兄所部及弟部担任野战。如荷同意,弟部主力可于一星期内到达西峰镇,尔后或增援西安,或增援固原,依情况决定;弟军一部则在定、盐、环钳制胡^①敌,另一部则在肤、甘钳制汤^②敌。王以哲兄部仍在固原防御胡敌,于学忠部仍守兰州。只要打得几个胜仗,即可大大开展战局,即有若干失利,亦于大局无碍。以上第一个步骤实现之后,依情况再决第二步。

(三)目前第一要务是巩固内部,战胜敌人,提议:

(子)在联军三部分中一致提出下列十个口号:东北军、17路军、红军联合起来;抗日军队同抗日人民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召集救国会议,建立救国政府;争取人民自由;反对日本灭亡中国,反对汉奸扩大内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保卫中国而战,为援助绥远而战,为收复东北而战;抗日联军万岁!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万岁!

(丑)在部队中进行热烈的政治鼓动。

(寅)肃清部队中之亲蒋分子。

(卯)鼓动全军战斗勇气,造成至死不屈精神。

以上各项作为弟等之提议,敬祈需择,时机迫切,稍纵即逝,倘承英断采纳,合作幸甚,革命幸甚,并乞电复。

弟毛泽东 朱德 周恩来 张国焘 彭德怀
贺龙 萧克 林彪 徐海东 徐向前 同上

12月14日

① 指胡宗南。

② 指汤恩伯。

毛泽东致张学良电

(1936年12月17日)

李毅兄：

筱^①电奉悉，集力抗战甚妥。惟对敌意见，弟认胡宗南、汤恩伯均不过一支队，各以一部箝制之可也，敌之要害在南京与京汉、陇海线，若以二万人之战略迂回部队突击京汉、陇海取得决定胜利，则大局立起变化，此点祈考虑。我们对远方^②已作几个报告，尚无回报。兄令刘鼎将每日民众运动情形电告一次，若远方知此次事变及事变后之进展不是单纯军事行动，而是与民众联系的，估计当寄以同情。惟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恩来在肤施城外等候，请速飭肤施民团让出该城。如何盼复。

弟赵东^③

17日

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央电

(1936年12月17日)

毛^④并中央：

(甲)我率罗、杜^⑤等九人今乘机抵西安，即与张面谈，并住张公馆。

(乙)张同意在内战阶段不可避免围攻西安前行最后手段。

(丙)刘峙已以五个师入潼关，围华县，逼渭南，如急进，应战无

① 筱，韵目代日，指十七日。

② 指共产国际。

③ 指毛泽东，下同。

④ 指毛泽东，下同。

⑤ 指罗瑞卿、杜理卿(即许建国)。

把握。张拟以杨部控西安,东北主力集渭水北备战,决战必须红军参加。

(丁)刘多荃、董英斌及何柱国两师需一周内方能集中,沈克已开动,王以哲只三个师、留固原、平凉,拟压迫沈久成师离会静。13师离咸阳经华阳趋汉中。17路向西安潼关线集中。张意我以主力打胡^①一部,接肤、甘,准备胡北退后,我以主力出渭水北下游,侧击蒋敌。

(戊)我与张商定红军主力仍先开庆、环,便机动,胡退可继进,请至少以一军去肤、甘,便南下策应。

(己)蒋鼎文今早放出,持蒋信令停止内战,宋子文、于右任明日来,我们商定条件:

(一)立停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

(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敌。

(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

(四)成立抗日联军。

(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

(庚)为缓和蒋系进兵,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

(辛)东北军抗日情绪高,西北军杨亦有七八分把握。我明日见杨。冯^②动摇。张同意以西北三角团结成推动全国中坚。西北临时军委红军加入。余续告。

恩来

17日

① 指胡宗南。

② 指冯钦哉。

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央电

(1936年12月18日)

毛并中央：

情况：(一)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指何、汪^①)，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

(二)晋阎^②向张提议，将蒋送山西，冯^③亦企图利用此事变。

(三)鲁韩^④认南京现在办法不能解决西安问题。宋哲元、刘湘尚无表示。

(四)李、白^⑤表示张之出此乃逼不得已，余、何^⑥企图骗钱，表示拥护中央。

(五)蒋态度开始表示强硬，现亦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对张有以西北问题、对红军求降求合完全交张处理之表示。

恩来

18日9时

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央电

(1936年12月18日)

毛并中央：

(一)宜极愿听我们意见，尤愿知国际意见，彼衷心甚虑因此内战绵延，有碍抗战。我已明告国际及苏联意见虽尚不知，但如日本

① 指何应钦、汪精卫。

② 指阎锡山。

③ 指冯钦哉。

④ 指韩复榘。

⑤ 指李宗仁、白崇禧。

⑥ 指余汉谋、何键。

及汉奸硬要挑起内战,我们只有在坚决防御下坚持抗日动员,争取同情,分化南京,孤立汉奸,缩小内战,并连接到抗战上去。

(二)杨认开火可团结内部,失利可放弃西安,以甘为后方,但对持久战则无把握。杨知其部下不固,又不敢急切改造,现须多下功夫。

(三)国际有电来请即告我。

恩来

18日午^①

(群众运动另电告)

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

(1936年12月18日)

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蒋介石在此次被幽,完全是因为蒋氏不肯接受抗日主张,不肯放弃攘外必须安内的错误政策所致。本党致贵党建议书及许多通电曾舌敝唇焦,一再向贵党与蒋氏提议,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奈蒋氏对于日寇的步步进攻,依然是一再退让,对于绥东阎、傅^②两将军的英勇抗战,仍然坐视不救,对于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摧残不遗余力,调集大军进攻苏维埃与红军,最后并欲压迫提议抗日的东北军与17路军,以继续扩大内战。此种举动诚为错误已极。在此情形之下,贵党果欲援救蒋氏,则决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不能奏效,实属显然。在日寇加紧侵略晋绥危急关头,此种扩大内战行动决不能为爱国人民与爱国军人所见谅,即贵党明达之士,想亦不愿以蒋氏一人而致中华民族以万劫不复的病患。试看日寇自蒋氏被幽以来,尽其造谣挑拨之能事,以鼓动内战,甚阴毒计,昭然若

^① 午,旧式计时法指十一时至十三时。

^② 指阎锡山、傅作义。

揭。想贵党决不至如此轻举妄动，中日寇之奸谋。退一步，即对于援救蒋氏个人，亦非武力所能解决。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故本党认为，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贵党必须毅然决然立刻实行下列处置：

(一) 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

(二) 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 17 路军的抗日要求；

(三) 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战；

(四) 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

(五) 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

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否则糜烂横政，民族生存与贵党生命均将为贵党错误的政策而断送干净也。时机紧迫，敢贡芻蕘，尚希明察。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

(1936 年 12 月 19 日)

(一) 西安事变产生前的形势

(1) 在绥东局部抗战开始后，在全国以及西北各大城市（如西安、太原、绥远）抗日运动突飞猛进，不但使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与绝大部分的中等资产阶级参加，即大资产阶级内部也发生着决定的分化。

(2) 南京政府正面对着这一迅速发展着的抗日运动，也被迫着很迟慢的与不坚定的改变着它过去对日退让的政策。在这转变过程中，它还是对日力求妥协，对绥远局部抗战表示不积极，对全国

抗日运动采取压抑政策,对红军不肯停止进攻。

(3)东北军及17路军将士,在全国与西北人民及共产党苏维埃红军的影响与推动之下,抗日情绪特别高涨,因此要求迅速停止进攻红军,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但他们的这种要求,为蒋介石所严拒。

(二)西安事变的意义

(1)这一发动,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因此,这次发动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

(2)但是,因为这一发动采取了多少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而造成了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因此,这一发动又妨害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

(三)西安事变发展的两个前途及其拥护者

(1)或者由于这一发动,使内战爆发,使南京中派(民族改良派)一部或大部主观上与客观上走向亲日,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以致造成日寇侵略的顺利条件。这一前途是日德意国际侵略阵线、特别是日本及中国亲日派所欢迎的。

(2)或者由于这一发动,结束了“剿共”的内战,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而得到早日的实现,使全国的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反而更迅速的实际建立起来。这一前途,是国际和平阵线,全国人民,全国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所竭诚拥护并要使之实现的。

(四)实现第二个前途的基本方针

(1)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2)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

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

(3)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

(4)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严重的打击,促其反省,这种防御战不是为了要以扩大内战的方针代替一致抗日的方针,而依然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

(1936年12月19日)

南京孔庸之,孙哲生,冯焕章,陈立夫等先生,及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西安张汉卿,杨虎城,王鼎芳,孙蔚如先生,暨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诸先生勋鉴;

自西安提出抗日纲领以后,全国震动,南京的“安内而后攘外”政策,不能再续。平心而论,西安诸公爱国热心,实居首列,其主张是立起抗日;而南京诸公,步骤较缓,可是除亲日分子外,亦非毫无爱国者,其发动内战,当非心愿。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本党本政府谨向双方提出如下建议:

(一)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

(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

(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四)会议地址暂定在南京。

上述建议,实为解决目前紧急关头之合理有效方法,南京诸公,望立即决定国策,以免值此国家混乱中日寇竟乘虚而入也!并望全国人民各党各派,立即督促当局召集和平会议,讨论一定国策,共赴国难!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央书记处致周恩来电

(1936年12月21日)

恩来同志:

(甲)目前局势是日本与南京右派联盟,企图夺取蒋系中派,造成大内乱,另一方面是南京与各地左派企图调和,而中派在动摇中。

(乙)我们与西安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

(丙)请与张、杨商量立即采取如下步骤:

(一)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在下列基础上成立和平。

(第一)南京政府中增加几位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排除亲日派,实行初步改组。

(第二)取消何应钦等之权力,停止讨伐,讨伐军退出陕甘,承认西安之抗日军。

(第三)保障民主权利。

(第四)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第五)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第六)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并在上述条件下赞助中国统一,一致对日。

(二)依上述条件与阎锡山、宋子文、于右任、黄埔左派、二陈^①

^① 指陈果夫、陈立夫。

派等谈判。

(三)对阎锡山迁蒋至山西办法应表示可以考虑。

(四)招致一切愿意和平之人,来西安谈判。

(五)招致英美顾问再来西安,经过他们使英美赞助和平。

(六)巩固西安军事阵地,使尽可能持久,以待政治谈判之成功。

(七)对陕甘之黄埔军官,如胡宗南、樊崧甫、董钊等进行接洽。

(八)兄应以共产党代表资格,公开与蒋、陈、宋、阎、于^①等基于上述条件,与谈判调停双方。

中央书记处

周恩来致毛泽东电

(1936年12月21日)

毛:(亲译)

(一)军事计划已照你19日12时电商定,(电发报24号)请即照你19日13时电实行,主力十天内集中长武、邠县,再十天集中咸阳、兴平,能快更好,其他尾追与东开部队亦照来电,请勿再改。

(二)此间力求坚守渭南、临潼线待红军来会战。

(三)保卫西安,我正在各方动员。

(四)红军向西安附近开,与接防甘、延,请发政治训令,宣布东北军、17路军及其指挥下的民团为抗日同盟军,以友军相待,对陕甘省政府统治地区不变更其行政组织与我党在这些地区的政策路线,均请说明,并告我。

周

21日24时

^① 指蒋介石、陈立夫、宋子文、阎锡山、于右任。

周恩来致中央书记处电

(1936年12月23日)

中央书记处：

西北联军局面，张、杨及其部下左派均望早日宣布以坚定内部（有成为闽变之续者），影响国内（李、白^①、刘湘均以此观望），其办法完全同意我们提议。我因顾及外交及缓廷内战，故主张暂缓发表，但红军现向西安附近集中，迟早必须宣布。我提议：

（甲）红军过邠县后，应即对外发表宣言。

（乙）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方面亦应发表联合宣言，说明联合抗战保卫西北的意义，并坚决抗拒企图侵占西北、破坏统一战线的任何敌人，最后宣布成立抗日联军西北军政委员会，并推举张为总司令统一指挥。此电稿请即拟定告我，以便磋商。

（丙）抗日联军西北军政会我方推毛、朱、周、彭、贺、刘、宋、宋^②。

（丁）红军即为抗日联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朱。

（戊）军政会参谋长拟推剑英（张要他）。

（己）军政会下各种组织，我方应准备伯渠、尚昆、瑞卿、季壮^③来参加。

（庚）红军加入抗日联军后，其给养薪饷补充应有初步改变，并由西北军政会统筹。

（辛）地方武装一概以抗日义勇军名义出现，其供给仍由地方筹给。

① 指李宗仁、白崇禧

② 周、彭、贺、刘、宋、宋指周恩来、彭德怀、贺龙、刘伯承、宋时轮、宋任穷。以下周、彭不另注。

③ 指林伯渠、杨尚昆、罗瑞卿、叶季壮。

(壬)在全国民主政权未建立前,苏区政府仍旧只名义上冠以抗日字样。

(子)红军在抗日地区行动的政策请考虑我前电建议,速定出宣布。

(丑)在抗日联军宣布后,共产党应在群众中公开活动。

(癸)以上各项,速审后复。

周
漾^①

周恩来、博古致中央书记处电

(1936年12月24日)

书记处:

(甲)博、剑^②已到。

(乙)今日蒋答复张:

(子)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

(丑)委托孔、宋^③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孔、宋与张商组府名单。蒋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

(寅)蒋先回京,后释爱国七领袖。

(卯)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

(辰)蒋意开国民大会^④。

(巳)他主张联俄联英美。

(丙)蒋目前在西安环境中,有抗日愿望,但南京环境不改,他又

① 漾,韵目代日,指二十三日。

② 指博古、叶剑英,下同。

③ 指孔祥熙、宋子文。

④ 原抄件如此。

将回到动摇中去,现正从撤兵、组府、与我方秘密协商及公开宣传上找保证。

周、博

24、19 时半

周恩来、博古致中央书记处电

(1936年12月25日)

中央书记处:

(甲)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

(子)孔、宋^①组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②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队已退)。

(寅)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辰)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③商办法。

(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申)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

(酉)宋表示要我们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

① 指孔祥熙、宋子文。

② 指宋子文、宋美龄。

③ 指宋庆龄。

他秘密接洽。

(乙)蒋已病,我见蒋,他表示:

(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丑)由宋、宋、张^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

(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

(丙)宋坚请我们信任他,他愿负全责去进行上述各项,要蒋、宋今日即走。张亦同意并愿亲身送蒋走。杨及我们对条件同意。我们只认为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

(丁)估计此事,蒋在此表示确有转机,委托子文确具诚意,子文确有抗日决心与改院布置。故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转好的。

(戊)现在军事布置仍旧,并加紧戒备。

(蒋临行时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

周、博

25日19时

毛泽东致彭德怀、任弼时电

(1936年12月25日)

彭、任^②:

在五个条件下,恢复蒋之自由,以转变整个局势的方针,是我们提出的。谈判结果,蒋与南京左派代表完全承认。昨晚电恩来,待先决条件履行及局势发展到蒋出后不再动摇才释放。但他们今日已经释放蒋介石,宋子文、张学良、宋美龄今日同机飞洛。依情

① 指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

② 任指任弼时,下同。

势看,放蒋是有利的,是否达成有利,当待证实后告。

野战军仍速开咸阳集中。

毛泽东

25日

周恩来、博古致毛泽东电

(1936年12月26日)

毛转中央书记处:

(甲)蒋、张昨经前线赴洛,与樊崧甫今午会面,中央军退潼关以东,西安已派人去监视。

(乙)西安发表蒋接受张、杨救国主张:

(子)停战撤兵,西北军事归张、杨主持。

(丑)改组南京政府。

(寅)联合各党各派抗日,停止剿共。

(卯)释放爱国领袖,保障民主权利。

(辰)改变外交方针,联合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国家。

(丙)张陪蒋走后,东北军颇团结,更接近我们;17路军杨、孙^①亦好,只其左右甚动摇,现正加紧解释,并请杨主持一切。

(丁)军事部署正在加紧中。

恩来、博古

26日

周恩来、博古致中央书记处电

(1936年12月30日)

中央书记处:

(一)情况:(1)蒋回京后,黄埔、CC均听命无动静,亲日派颇

^① 孙指孙蔚如,下同。

活跃,并引日寇自重,宋氏兄妹^①在奋斗中,张须待特赦令下始回,蒋、宋^②今回奉化,似有促进政变可能。

(2)李、白^③来电表示愿与西北联络,并有新代表来,刘湘代表已回,阎、傅、宋、韩^④无电来。

(3)西北以加紧援绥的准备、提高士气影响全国。

(二)我们目前政策,以团结西北联络各方,推动黄埔、CC及欧美、元老各派,打击亲日派,以加强和促成蒋停战组府和抗日的决心。

(三)我们现在正与杨等商议派人去阎、傅、宋、韩处,王以哲、胡公冕去见胡宗南并带周给胡信,特别重要是到南京活动,以黄埔、CC为中心来赶走亲日派。

(四)请你们从南京电台电告汉年,要其推动两陈^⑤助蒋赶走亲日派,建立抗日政府。

周、博

30日亥^⑥

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电

(1937年1月5日)

周、博:

南京报复派现在没有政治口号,只能偷偷摸摸的干,希望吓一吓把杨虎臣、于学忠、王以哲等吓得就范,然后慢慢宰割,孤立红军。目前只要三方面团结,真正的硬一下,并把红军的声威传出

① 指宋子文、宋美龄。

② 宋指宋美龄。

③ 指李宗仁、白崇禧。

④ 指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韩复榘。

⑤ 指陈果夫、陈立夫。

⑥ 旧式计时法指二十一时至二十三时。

去,使中央军不敢猛进(猛进时消灭其一部),有可能释放张学良,完成西北半独立局面。你们速发拥蒋迎张通电。我们把朱老总谈话在上海散播。彭、任速令十五军团出陕南。

洛甫、泽东

1月5日21时

并告彭、任

周恩来致张学良信

(1937年1月10日)

汉卿先生:

自兄伴送蒋先生入京后,此间一切安然,静候蒋先生实践诺言,由兄归来主持大计。及撤兵令下,特赦呈文发表,愈是使大家认识蒋先生信义和宽宏。乃事未及周,蒋先生休假归里,中央大军重重复压境,特赦令转为扣留,致群情惶惑愤懑不可终日。尤以整理西北部令,直视西北如无物。杨先生虽力持慎重,但一般将士之义愤填胸,兼之以中央军着着进逼,战机危迫已在眼前。弟居此仍本蒋先生及兄在此时所谈之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的一贯方针,尽力调处。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作战。若进入潼关之中央军必欲逼此间部队为自卫而战,则红军义难坐视。时机危迫,兄虽处不自由之地,然一系西北安危,请即商量蒋先生乃依前令撤入陕甘之兵,立保兄回西北主持大计,则和平可坚,内战可弭,一切人事组织都好商量。弟纵处客位,亦当尽力之所及,为赞助蒋先生完成抗日统一大计,而首先赞助兄及杨先生完成西北和平伟业也。至一切西北赤化谎言,蒋先生及兄均知之,必能辨其诬。弟敢保证,凡弟为蒋先生及有关诸先生言者,我方均绝对实践。只有蒋先生依预定方针逐步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大业可立就也。非者,任令人兵进逼,挑起内战,不仅西北糜烂,全国亦将波及无疑,而垂成之统一局面而又复归于破碎。此事之至痛者,

徒供日寇及少数亲日分子所称快。吾望蒋先生及兄有以制止挽救之也。临颖神驰，伫候明教，并希为国珍摄万岁！

周恩来

10号

周恩来致蒋介石信

(1937年1月11日)

蒋先生：

自汉卿先生陪送先生回都后，此间一切安然，静候先生实践诺言，完成和平统一大计。及撤兵令下，特赦呈文发表，愈使大家认识先生顾全大局之心，钦佩无所。乃事未及周，先生请假归里，中央军竟重复开入陕境，特赦令转为扣留，致群情愤激不可终日。尤以处置西北善后之部令与先生意图完全相违，虎城先生虽力持慎重，但一般将士实已愤慨万分。来居此仍本共产党红军历来主张之对内和平、对外抗战之一贯方针，尽力调处。来敢保证，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内战。但默察现状，中央军进入潼关者已达十二师，正向西安迈进，窥敬之^①部长意图似有非逼成内战不止之势。现先生虽假中，但战机危迫，先生以一系全国安危，待先生力排众议，坚持前令，尽撤入陕甘之兵，立释汉卿先生回西北主持，则内战可弭，和平可坚，一切人事组织、政府主张、抗战筹备均将循先生预定之方针前进，统一御侮之大业必可速就。虽然者，一部分主战之士将不顾大局，挑起内战，不仅西北糜烂，全国亦将波及无疑，而垂成之统一局面又复归于破碎，此事之痛，除日寇及少数亲日分子称快外，不特为全国同胞所反对，想亦为先生所不忍见不愿为也。

来承召淡，只以大兵未撤，汉卿先生未返，暂难抽身。一俟大局定，当即入都应约。如先生认为事宜速决，请先生以手书见示，保证撤

^① 指何应钦。

兵释张,则来为促进和平、赞助统一,赴汤蹈火亦所不辞。至一切西北赤化谎言,先生及汉卿先生均知之,审必能辨其诬。凡来为先生及夫人与张、宋^①诸先生言者,我方均绝对保证实践。且为外交计,来及党人在此遵先生约,均守秘密,更无向外广播之可能。盖凡能为对内和平、对外抗战尽力者,我方愿举全力为先生助也!专此奉达,伫候回教,并颂起居佳胜!不一。

蒋夫人均此不另。

周恩来

1月1日午^②

周恩来致毛泽东电

(1937年1月12日)

毛呈中央并告彭、任:

(一)款、弹如何分送肤施、庆阳,请速电复。

(二)情况:(1)我已面见南京派来之吴、王^③两人,告其有和平希望,即再来。(2)汉年已面,各事均妥告。(3)洛阳派祝绍周来,此间有人同去商两方各守原防、候蒋、张直接谈判。(4)广西来电:川桂主和通电正联合晋绥粤同发,如不可能,拟先发。(5)我已去电桂川联络。(6)宣传工作仍未统一,且时出乱子,正纠正中。

(三)来电所述方针正努力执行,惟因两方一怕蒋,一缺政治斗争经验,故不敢放手做,同时了解差,且欠活泼,致外强内荏的事常见。

周

文巴^④

① 指张学良,宋子文。

② 午,旧式计时法,指十一时至十三时。

③ 指吴瀚涛、王化一。

④ 文,韵目代日,指十二日;巴,旧式计时法指九至十一时。

周恩来、博古致中央书记处电

(1937年1月12日)

(万万火急)中央书记处:(绝密,请勿下达,勿公布)

(甲)情况:

(子)蒋接张、宋^①去华北面谈,日本广播在宣传蒋、张、宋成立默契三相会议。

(丑)蒋与杨留京人面谈痛器^②并带信回,大意:(一)张须缓回;(二)进兵为释外间惶惑,决不至内战,但要统一勿割据;(三)要此间接收中央命令,军事善后布置可改变,12号以后非常组织取消,宣传复常态;(四)中央与陕西不可分,国防计划只能在西安、重庆、长沙;(五)剿共已不提,只言反动派;(六)一切与顾^③商办,顾可合作。

(寅)何应钦信亦言军事布置可商量。

(卯)陈诚到潼,电话告何柱国要从国防上找办法。

(辰)蒋、何^④均注意问西安提何办法。

(乙)窥蒋中心在分化与压迫,不成乃运用妥协控制西北,不成改为共管。因此,顾之行营主任及中央军一部驻西北,乃蒋所必争。

(丙)现商定:

(子)以鲍文樾及杨的人去宁见张、宋,与商妥,然后见蒋。

(丑)所持条件见今早电告,但第三条改为两案:一行营主任张,副杨、顺;或行营主任顾,驻洛阳,陕甘绥靖主任张,副杨。

(寅)此外一切善后所需军队及经费、编制、饷,请另案办理。

(卯)关于防地,草拟东北军在咸阳、平凉、固原、兰州、凉州、天

① 指宋子文。

② 原抄件如此。

③ 指顾祝同,下同

④ 指何应钦。

水地区,实际上中央军全部退至甘肃,17路在韩城、华县、西安、泾阳地区,红军在两延、肤、鄜、凉北、庆阳地区,一部在雒南,一部在凉州西。

(辰)铁路警备至多三四团。

(巳)以上为解决西安善后(如案),政治方案照旧不变。

周、博

周恩来、博古致洛甫、毛泽东电

(1937年1月15日)

(万万火急)洛、毛:

(甲)情况:

(子)米春霖携蒋、张函,大意为友张决不能即回,敦劝此间接受中央命令,至军事善后,可于张之二方案中任择其一,至于张之政治主张,可于三中全会公开讨论。

(丑)张函之二方案为:(甲)东北军入甘,中央军驻陇海线,17路军驻陕西(铁路线外),西安可酌留一部,如有顾虑,绥署可设三原。(乙)17路入甘,东北军调豫、皖,于^①安徽主席,王^②绥靖主任。对方案如有意见可补充,并云中央16日待复电。

(寅)张抵奉化二日,未见蒋、汪^③有去奉化息。

(卯)杨对作战胜利无把握。

(乙)我们以为,(一)为求得和平解决着想,须先由杨、于通电就职。(二)依我们前日电告条件派人去奉化见蒋。对乙方案坚决拒绝,对甲方案可基本接受,但须中央军全部出甘,西安得留东北、17各一部,东北军前伸至咸阳。(三)主要的是在

① 指于学忠,下同。

② 指王以哲,下同。

③ 指汪精卫。

军事上三单位之靠拢，政治上利用三中全会。（四）关于红军问题，得开^①兄回音，拟不同时提出。

（丙）正与各方协商中，你们的意见如何，盼告。

周、博
删戌^②

并告彭、任（勿下达）

周恩来、博古致中央书记处电

（1937年1月16日）

（万万火急）中央书记处：（密译，勿下达）

（甲）情况：

（子）杨、于、孙就职，取消一切临时组织，通电已发，并给蒋电，说明救国主张提三中全会，请蒋入京，张返陕。

（丑）鲍、米、李^③三人今午飞宁向蒋谈判（如前电所告），中心在放张与防区分配，并试探张意。

（寅）川、桂和平通告已发，亦请蒋入主中枢，勿逼此间太急。

（卯）此间左派在坚主强硬，但少具体办法，对军事又少了解。

（乙）现三方商定：（子）仍本和平方针，一切救国主张统提三中全会，并联络川、桂、粤、晋、绥、直、鲁等省及南京抗日派共提，以促成改变国策、改组政府。

（丑）防区分配与放张要同时进行，张不回，我方军队即不复员。

（寅）加紧政治解释、作战准备，并应计算到西安不守时的作战计划。

① 指潘汉年

② 删，韵目代日，指十五日；戌，旧式计时法指十九时至二十一时。

③ 指鲍文樾、米春霖、李志刚。

(丙)请中央电告津、沪并转晋、绥、直、鲁、川、桂,进行向三中全会提案运动,提案内容请拟一大纲电告,一致步骤。

周、博
铤申^①

并告彭、任

周恩来、博古等致毛泽东、洛甫电

(1937年1月21日)

毛、洛:(绝密)

情况:(甲)今晨派李志刚携杨函飞奉化,接受蒋之第一提案,但困难尚多,特由李面告蒋:

(一)中央军暂退华阴,以便部队运动,免生误会。

(二)潼宝铁路线不驻多兵。

(三)东北军留一部在陕境西兰公路之线,另留一小部在西安,以便维护三万多东北家属。

(四)张如难返陕,请给以名义。

(五)17路留一个师在西安。

(六)关于红军问题同意蒋意见,雒南方面不驻红军,三中全会未开会前红军接济由杨负责。

(乙)杨对不打的决心,仍均主愈延愈好,可以利用时,向阎多做活动。

(丙)军事方面仍积极准备,明日叶、左、周士梯^②去前方视察。今午孙蔚如召集城防会议加紧布置,期限20天。

21日19时

^① 铤,韵目代日,指十六日;申,旧式计时法指十五时至十七时。

^② 指叶剑英、左权、周士弟。

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电

(1937年1月21日)

周、博：

(甲)问题在于是否有保证让步而确能停止战争。让步而依然是战争，且能出比西安事变前更坏之局面，则不能让步。

(乙)无论和战，应使杨、孙、何、王、于、缪、刘^①及左派自己打定主意，我们处在建议与赞助。地位，免致不利时招怨。

(丙)无论和战，红军主力应按前定计划出至陕南，处在川陕之间。除二方面军留渭北外，其余应准备在数日内向南出动。请即调查山阳、柞水、镇安、洵阳、安康、紫水、汉阴、石泉等城驻军情形，并要求杨同意让出各该县。

(丁)西路军东进，徐、陈^②电士气尚旺，十天可达古浪处，如该军不再遭挫折，尔后当位于文、武、成、康地区，如此我主力在陕南、甘南，便可破坏南京把联军围困于渭水以北之计划。

(戊)汉年从南京来长电述蒋答复周信之意见，内容与米春霖、李志刚所述略同，我们复电要求保证。

洛、毛

21日20时

并告彭、任

周恩来致潘汉年电

(1937年1月28日)

汉年同志：

即转蒋先生：

① 何指何柱国，缪指缪激流，刘指刘多荃。

② 指徐向前、陈昌浩。

(甲)我们在西安已尽最大努力,杨虎城已决心服从蒋先生,惟东北军多数干部痛于张汉卿不能回陕见面一次,决不肯先撤兵,恩来及何柱国、王以哲等向之说服亦无效。

(乙)除我们继续努力向他们说服外,务请蒋先生抚念此流亡之师,以手书告东北军将领,保证撤兵后,即给张恢复公权,发表名义,许张出席三中全会,并许张来陕训话一次,以安东北军之心。

(丙)请蒋先生许张汉卿写亲笔信给杨、于、孙,何^①、王及东北军将领,坚其撤兵之决心。

(丁)请蒋先生许可西安及东北军派代表见张一面,然后撤兵。

(戊)时机紧迫,请蒋先生速允办,否则忍令此抗日之师互耗国力,必非蒋先生之所愿。

(己)蒋先生有抚慰东北军其他办法,我们无不赞同。

周恩来

俭亥^②

洛甫致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电

(1937年1月29日)

毛、周、博:

(甲)杨的动摇,使张慕陶极兴奋与影响形势,使西北造成了更多的困难。

(乙)我们应为和平尽最大努力,尽调解的责任,特别争取杨及东北军稳健派,坚决站在和平方面,力争左派一部或大部。

(丙)在和平尚未绝望时期,红军仍不采取单独行动,同东北军、17路军完全处于对立地位,但应明白表示自己的和平立场。

^① 指何柱国。

^② 俭,韵目代日,指二十八日;亥,旧式计时法,指二十一时至二十三时。

(丁)如和平绝望,战争或部分接触发生,红军应公开表示为求得全国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主张的实现,不愿参加内战,宣布我们在西安事变中为和平而努力的经过,并且愿为和平继续努力奋斗。

(戊)目前我方应先告诉南京此间的具体情况及其我们的和平方针与努力,但要求南京万勿操之过急,酿成国家民族的巨大不幸,并使我们的调解发生困难。

(己)不知兄等意见如何,我现在前敌总司令部。

洛甫

周恩来等致毛泽东等电

(1937年1月30日)

毛、朱、张、张、凯、陈^①同志:

(甲)我们主张接受甲案实现和平,在接受甲案后,南京如继续进攻,则我方实现自卫战。

(乙)但本党主张未能说服西安左派,也未能使杨虎臣及稳健派同意,他们不论红军参加与否均主抗战。

(丙)我们现在只有两个方案:或者友军打我们不参加,因此同友军完全处于对立地位;或者我们同他们一同打。但不论打与不打,我们为和平奋斗的基本方针仍不变。

(丁)我们在力求和平中仍不愿与友军处于对立地位,使友军变为敌军。因此,我们今天只有同他们一同打,在打的过程中仍同南京谈判和平,如打得好和平仍然有望,如打败则使友军从实际经验中相信我们和平主张,在更不利条件下接受和平。

(戊)红军仍同南京进行和平谈判,要求南京放张学良回西安,则我们可保证甲案的实现,使西安问题和平解决。

^① 张、张、凯指张国焘、张浩、凯丰,陈所指不详。

(己)打有二个可能前途,即迅速结束内战与延长内战的前途,我们应力争第一前途的实现。

(庚)你们意见如何,望立复。

周,博、彭、任、王、洛

30日22时

毛泽东等致周恩来等电

(1937年1月30日)

周、博、洛、王^①、彭、任:

我们意见如下:

(甲)和平是我们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

(乙)但我们与张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我们不能独异失去张、杨。

(丙)向张、杨两部表示我们始终同他们一道。在他们不同意撤兵以前,我们不单独行动,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

(丁)用以上态度争取最后的和平。

毛、朱、张^②

30日24时

周恩来、博古致毛泽东等电

(1937年2月2日)

毛、彭、任、徐、程^③:

东北军本日发生内变,将主和首领枪决(王已死,何^④在追索

① 王所指不详。

② 张指张国焘。

③ 徐、程指徐海东、程子华。

④ 指何柱国。

中)。请在原地战备,集结待命。

暂勿外传说。

周、博

2月2日13时

周恩来、博古致彭德怀、任弼时电

(1937年2月3日)

彭、任:

(子)东北军前线已撤退,和平前途谅可逐步实现。

(丑)毙王事件东北军高级将领均欲惩办祸首,现少壮派已悔过认罪,离队远避。

(寅)请毛下令彭、任从明4日起,各军团即向预定地域转移,十五军团由周令其经咸阳到叱干镇集结。

(卯)博今日往彭、任处,周、叶^①暂留西安办善后。

周、博

3日14时

周恩来致洛甫、毛泽东等电

(1937年2月4日)

(万万火急)洛、毛、朱、张^②、博、彭、任:(绝密)

(甲)情况:(子)克农^③由潼回,情形见另电。

(丑)东北军因王以哲遇难愈分化,少壮派趋极端而右派纷

① 叶指叶剑英。

② 张指张国焘。

③ 指李克农。

纷投降反攻刘多荃甚至对西安警戒,对潼关接头,扣留少壮旅、团长,给蒋、顾以大好利用机会,张更难回来,东北军甚至有被调开危险。

(寅)17路一时不会分化,但我们恐难公开立足。

(卯)顾允我们设西安办事处,由杨掩护,陈先瑞仍驻陕南,军饷待面商。

(辰)顾的任务只能做到此,以后问题尚待蒋决。

(乙)判断:(子)三中全会只能做到宣布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估计容共案不能提出。

(丑)蒋对西北领导必着着进逼,最后有取甘肃可能。

(寅)内战有避免可能,但政治分化必加紧,对红军必给更多困难。

(卯)分化目标首在东北军,张回来希望极少。

(辰)对西北民运必有相当压迫和分裂。

(丙)我们方针:

(子)三位一体,团结到底,但东北军不能信于、何,须推董^①主持合作,并派人见张,征同意(合作条件见另电)。

(丑)目前东北军必力求团结,少壮派须以取消组织减少右派攻击目标,实际则秘密团结,徐图发展。张如不回,宁让步开甘,以避免分裂,对右派宜反对分化,以团结真正爱东北军、拥护张分子,造成新的中心。现拟劝董、高(崇民)、卢^②为主持者。

(寅)红军防地照前电(如一号夜电)暂驻,陈先瑞移驻柞水、镇安。西路军除要顾电二马^③外,并拟托于、邓(宝珊)设法,以便送

① 指董英斌。

② 指卢广绩。

③ 指马步芳、马鸿逵。

钱去接济，须与顾面商，其他则须去宁解决。

（卯）17路能留者仍进行团结工作，并给杨以帮助。

（辰）民运宜以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口号欢迎中央军，避免对立，但同时须加紧内部组织与团结。

（巳）此间对三中全会提案仍以八项主张征各省同意，我党提案请速商定告我。

恩来
支午^①

（录自《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① 支，韵目代日，指四日；午，旧式计时法，指十一时至十三时。

中国发生事变

(《真理报》社论)

(1936年12月14日)

陕西省发生了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根据各国通讯社发自中国的不完整的消息称,驻陕西省的张学良部队发动了反对南京中央政府的兵变并将政府首脑蒋介石将军扣作人质。

中国西北发生的这一事变是极其值得注意的征兆。值此日本对华侵略日益严重之际,张学良部举行兵变并扣押蒋介石,其性质尤为特殊。

渴望中国统一的各种力量正在实行空前规模的联合。这一联合过程是在最近几个月来日趋激烈的抗日运动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抗日斗争阵线包括了各个社会阶层和社会团体。参加这一阵线的有资产阶级的代表、学生、工人和农民。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广大的士兵群众也纷纷投入这一阵线。因为造成中国四分五裂、使人们遭殃的毫无意义的军阀内战的重负正是压在这些士兵群众的肩上。面对发动进攻的日本侵略者,这种内战只能削弱和破坏抵抗力量,使侵略者更易于进一步“蚕食”中国。

南京政府当务之急是要努力谋求中国的统一,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各个地区联合起来,团结全中国人民同外国侵略者作斗争。可是,反动势力在中国人民的敌人的代理人唆使下,竭力破坏这种努力。

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

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臭名昭著的日本走狗汪精卫的名字同陕西省发生的张学良兵变紧密相连,这也绝非偶然。汪精卫这个南京政府的前主席,曾企图将中国的民族利益公开出卖给外国强盗,所以理所当然地被中国人民斥之为叛徒。中国某些爱国者曾试图将其暗杀,此后,他才不得不出走他国。

这个死心塌地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的走狗在流亡国外期间依然不忘为其主子效力,他纠集各种反动势力反对中国实行统一。汪精卫利用张学良部队中的抗日情绪,挑动这支部队反对中央政府。他在日本主子唆使下,力图在中国制造混乱,以利于中国的敌人实现其掠夺计划。

上述说法道出了发生兵变的内幕,是极为可信的。张学良握有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足够兵力。他的部队也充满着抗日决心。可是,就是这个张学良却一贯奉行为日本军国主义帮忙的对外不抵抗政策。过去,在他统治满洲的时候,他几乎毫无抵抗地将中国东北最富饶的几个省份送给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如今,他又利用抗日运动以营私,名义上举起抗日旗帜,实质上制造国家分裂,使中国继续混乱下去,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外国侵略强盗的牺牲品。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南京政府在日益高涨的抗日运动的推动下,开始采取一系列旨在促使国家统一,使四分五裂的力量联合起来的措施。将华南军阀的政治中心广州置于南京政府管辖之下,便是上述措施之一。使日本人感到高兴的内战,在华南地区遇到了严重的阻碍。高喊抗日口号,实际上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的粤系军阀被彻底击败并被赶出了广州。

华北日军司令部不久前公布的一本官方的小册子,反映了日本实行对华侵略所惯用的典型手法。日军司令部在这本小册子中指责南京政府鼓励怂恿形形色色的反日活动,声称“蒋介石及其一伙一日不倒,反日事件必将继续重演”。

众所周知,一心想奴役全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过去和现在都把挑起军阀之间的战争看作是它在中国制造混乱局面的最可靠的手段。日本军国主义有理由认为,以蒋介石政府为核心统一中国的进程正在发生并取得了重大进展,这对日本实现其变中国为殖民地的计划将造成极为严重的威胁。因此,它过去和现在都挑唆一些中国将领起来反对南京政府,必要时甚至利用某些反日口号也在所不惜。

日本帝国主义有计划地在中国推行使中国陷入封建军阀割据状态的政策。它散布不和,制造内哄,从而使中国处于无力抵抗其侵略的分裂状态。这种政策有利于为侵略者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扫清道路。

日本帝国主义在实现其对中国的掠夺政策的时候,企图利用反苏挑衅为这一政策作掩护。

在中国组织形形色色的“自治”政府,这是日本人惯用的手法,现在这一手法又得到了新的运用。日本报纸《日日新闻》迫不及待地传出消息说,“12月12日下午”张学良成立了“自治政府”。令人十分惊讶的是,日本报纸驻上海的记者距陕西远在千里之外,它是怎样获得这个消息的呢?《日日新闻》的消息过于灵通,反而泄露了陕西兵变的真正组织者。

为了掩盖日本代理人的恶迹,这家在挑衅和造谣方面训练有素的《日日新闻》采取了嫁祸于人的手法。它嚎叫什么“张学良自治政府同苏联”已订立了一项“攻防同盟”。《日日新闻》的恶毒攻击和挑拨阴谋是掩盖不了事实真相,也是欺骗不了任何人的。日本无法掩盖其挑拨者的形迹。由于他们干得十分拙劣,所以不管他们使多大的劲,也免不了露出马脚。

苏联始终恪守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政策。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侵占中国的领土,于是扶植种种所谓“自治政府”和建立“傀儡国”,这种政策对于苏联来说是格格不入的。

广大的中国人民群众是不会继续受日本挑拨者和卖国分子的欺骗的。东京侵略者们赤裸裸的侵略政策一次又一次地擦亮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眼睛,使他们看清了日本帝国主义明目张胆地企图奴役伟大中国人民的事实。分裂和奴役中国的政策,制造对敌人有利的混乱局面的政策,正遇到团结和联合一切力量以捍卫中国真正的独立的政策的对抗。

(高和平、武进译,马宝华校)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二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中国的抗日运动

(1936年12月15日)

Ar. 哈马丹

1935年12月9日,北平街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示威游行和群众集会。中国劳动群众多年来郁积于胸中的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和愤懑都在这一天迸发了出来。当局的不抵抗政策更给群众的不满情绪火上加油,他们反对向日本侵略者作出“任何让步”。

到1935年12月时,老百姓已经是忍无可忍了。根据日本的要求,在中国古老的首都北平建立了由清一色亲日派组成的冀察政治委员会。日本人在坚持成立这一委员会时给它规定的任务是负责筹备华北同早先成立的“国家”——“满洲国”的合并。

1936初年在北平举行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散发的抗日传单,揭露了这个被称之为妥协行动的性质,传单写道:

“同胞们!这是日本人惯用的蚕食政策。大家一定记得,他们开始时占领我东三省(即满洲),后又占我热河全境。事过不久,察哈尔和河北两省一半土地被占。现在,日寇魔爪正伸向北平、天津、张家口、绥远和山东。强盗们正孤注一掷,华北危在旦夕!

同胞们!快起来抵抗日寇的进攻,反对日本建立的卖国组织——冀察政治委员会!”

尽管当局实行种种残酷迫害,发出一道道禁令,最近以来抗日运动依然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千百万群众纷纷投入这一运动,公开而勇敢地发出抗议日本占领、反对对侵略者实行“让步”政策的

呼声。

参加这一斗争的不仅有大量小资产阶级群众，而且有相当数量的中等资产阶级。最近一段时期，中国大资产阶级内部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分化现象。中国统治阶级中这一部分人是在日本不断扩大其侵略范围的情况下，逐步转到抗日的运动方面来的。

满洲的教训已使中国大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军阀将领们看到，他们指望在奴役四万万人民的活动中充当买办角色的打算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此外，伴随日本进攻而来的是破坏性极大的经济侵略。而如果外国资本继续拼死与日本对抗，争夺中国市场，那么，十分虚弱的中国民族资本将被日本人轻而易举地挤出国家国民经济一切主要的经济部门。

据英国驻华商务参赞 1935 年报告资料统计，^①日本几乎控制着中国 65% 的纺织工业产品、75% 的冶金工业生产、65% 的采煤业等等。日本人夺占中国重要经济部门这一事实不能不影响到中国大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立场。因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采取的是赤裸裸的公开方式。这种侵略使任何人，甚至使那些一贯主张同日本接近的人，只要他不是东京的爪牙和走狗，都不再怀疑，这种侵略者在彻底剥夺中国政治和经济上的一切独立。

日本资本及满洲日本当局采取的实际措施表明，一旦日本得以实现其既定的扼杀中国独立、奴役整个中国的方针，等待中国民族资本的将是多么悲惨的命运。与此同时，近几年来中国国内也出现了颇有意义的经济发展动向。这在铁路和公路建设方面尤为显著。这种趋势促进了中国资产阶级新的年轻阶层的出现。

十分清楚，所有这些现象不可能不对国民党中国的领导集团产生重大的影响。蒋介石将军领导的南京政府面对着有中国各社会阶层广泛参加的蓬勃发展的抗日运动。在全民抗日运动和民族

^① 载《中国之声》杂志。——作者注

资产阶级切身利益的双重压力之下,南京不得不摆脱(诚然,它是十分缓慢地和毫无把握地)其原先的对侵略者不抵抗和让步的政策。但是,新的方针只有在使四分五裂的国家得到统一的基础上才能顺利实现。只有实现了统一的中国,而不是虚弱的、四分五裂的中国,才能抗击侵略者们的攻击。

众所周知,南京政府统一全国的意图遇到了各军阀派系的顽固抵制,这些军阀集团都有不同外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感兴趣的不仅仅是保持中国原已存在的混乱局面,而且还想制造新的更加混乱的局面。

引人注目的事例是,中国某些唯外国主子之命是听的军阀集团正以抗日的口号掩盖其抵制国家统一事业的行径。他们要求立即对日宣战,而实际上目的在于继续分裂国家,这种做法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特别有利。

1936年6月粤系军阀反对与南京联合的行动就是这种挑衅性活动的例子。他们的反抗已被粉碎。广州已被置于南京势力范围之中。在同南方将领的斗争中查明,他们接受日本的借款、武器和顾问等等,是按日本主子的意志行事的。^①

中国西北陕西省新近发生的暴动事件^②显然属于同样的性质。臭名昭著的日本走狗汪精卫的名字同张学良军队的暴动紧紧连在一起,这一事实充分暴露了这一事件的真实性质。汪精卫在担任南京政府主席之时,即已公开出卖民族利益,奉行亲日的投降政策。在遭到爱国者暗杀幸免于死后,汪精卫被迫离开中国。但是,出走以后,他依然不折不扣地执行着东京老板交代的任务,继

① 《真理报》的这篇文章对两广事件的指责是不符合实际,十分错的。——原编者注

② 指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本文对张、杨及西安变变的攻击也是完全错误的。——原编者注

续不断在中国挑拨离间和制造混乱。

张学良 1931 年 9 月前是满洲的统治者。1931 年,当日本入侵满洲时,张学良不作任何抵制,拱手将中国这块辽阔富饶的地区交给了侵略强盗。他带领残部逃到华北。广大士兵群众对自己的司令奉行不抵抗政策极为不满。后来,由于张学良的军队存在抗日情绪,很快就被调往中国西北,驻于甘肃、陕西及河北西部地区。现在,张学良军队总共约 13 万至 14 万人。这支军队奉派到西北前线同中国红军作战,斗志“消沉”,不愿打仗。据中国报刊报道,该军队的士兵和相当一部分指挥官都要“北上”抗日。

一些亲日分子便利用这种激烈的抗日情绪,唆使张学良军队反对南京。而外国侵略者及其代理人则煽动新的内战,借以达到其破坏中国统一及继续削弱和分裂中国的目的。

※ ※ ※

中国的抗日运动具有极其广泛的全民性质。这正是它主要本质和意义之所在。

中国人民解放运动新阶段另一典型特点在于,这一运动的矛头不是反对一般的帝国主义,而是反对具体的、本阶段主要的掠夺者和奴役者——日本帝国主义。这一斗争性质使人民可以不分散自己的力量,而是相反,集中全部力量把打击矛头指向本阶段的主要目标。

在抗日运动提出的主要口号中,有必要指出下列诸口号:“立即停止内战!一致对日!”“全民武装,保卫华北!”“严惩卖国贼!”

抗日运动已超越分散性的示威游行、举行群众集会和发表演说、递交抗议书的范围。这一运动在组织上得到了发展和巩固。所有的城市都成立了“民族救国联合会”、“祖国解放协会”、“除奸委员会”(除奸委员会的使命是揭露日本间谍、特务以及他们在中国官员和高级官僚中的同谋者等)。

不能不指出最近几个月以来还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向。我这里

指的是,国民党中国不少大人物,其中有军政界的要人也公开地提出同日本作战的问题。前不久,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颇有名气的冯玉祥就曾发表声明谈及此点。去世不久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汉民也曾断然提出对日宣战。他在《三民主义》杂志上发表的宣言中写道:

“联合中国之一切力量,共同抵抗侵略,此乃予之天职……日本要求我共同对付赤党,此点应引起我等严重注意。此项要求如被采纳,中国必将沦为类似福摩萨^①和朝鲜那样的日本殖民地。”^②

日本帝国主义者力图通过煽动新的内战进一步分裂和削弱中国,指望借此破坏中国的抗日运动。但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解放斗争的最为出色之处正在于,它有能力扫除自己前进道路上的一切人为的障碍。

(马宝华译)

(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二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① 指我国领土台湾。——原编者注

② 《人民论坛》1936年1月号。——作者注

国际述评

(1936年12月17日)

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证实,张学良兵变无非是日本在中国挑起的又一事端,其目的是阻挠中国的统一和破坏日益高涨的抗日人民运动。从中国和国际舆论的初步反应来看,凡不受警察的命令或戈培尔一类当局限制的各国社会舆论都对西安事件持有这种评价。

同时,世界各国报刊的反应还十分有说服力地告诉人们,日本报刊企图嫁祸于人,把张学良兵变描绘成是“出自莫斯科之手”的说法已遭到破产。

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反日运动挑起事端,从而达到其分裂中国的目的,这已非首次。日本帝国主义进行这个冒险勾当也非首次,但它不可避免地将玩火自焚。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这次挑起的事件只会进一步激起抗日运动的发展,增强抗日运动的力量,这一运动已迫使南京政府(不管其愿意与否)愈来愈注意去争取实现中国人民渴求统一和组织有力的抗日运动的意志。

张学良兵变是德日协定签字的直接后果,而德日协定的目的和使命就是进行战争煽动,促使战争早日爆发。日本人挑起的这次事件,便是这一协定既定手段的形象化表演。毫无疑问,这种经过周密策划制造可怕的挑衅事件的手法将不仅在亚洲,而且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继续采用。日本对华侵略的升级和挑拨活动的加剧清楚地表明,德日协定在实际上带来的是什么后果。看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是正确的,它在评述德日协定时曾写道,无论是日

本还是德国,甚至两国加在一起,也无力打击任何一个大国,特别是像苏联这样的大国,德日协定的直接后果将是进攻较弱的大国和小国。日本早就在推行侵略中国的政策。现在,它同德国签订了协定,更是急不可待地要对中国实行彻底的奴役,将其变为自己的殖民地。

观察家

(1936. 12. 17.《真理报》)

(选自《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为在中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1935—1937)(摘录)

A·C·基托夫

蒋廷黻会见李维诺夫

1936年12月15日,苏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应蒋廷黻之请求与蒋会晤。蒋向李维诺夫表示,他已将《消息报》和《真理报》刊登的文章中有关能说明苏联政府对南京政府友好态度的文字摘录寄给本国政府。与此同时,蒋廷黻向李维诺夫表示,苏刊文章将张学良的行动和汪精卫的阴谋活动挂钩,这显然不妥,因为汪不可能与此事发生任何关系。

李维诺夫在回答蒋廷黻上述谈话时对中国目前的局势深表关切,他说:“我们……认为张学良的行动是一种极大的不幸。我不认为张学良是与日本人直接勾结采取行动的,我更倾向于这种推测:张是受到了某些人心怀叵测的恶意指唆。我们一贯赞成中国统一,对中国将领们的内讧从未表示过同情。对于最近时期为扩大南京政府基地和加强抗击日满蒙联军的种种努力,我们尤其表示欣慰。我担心的是日本会不会利用最近的事态发动新的侵略。不管怎么说,近来正处于紧急状态的日本政府很可能因此次事件而得救。”(N·杰克:《谈西安事变》,载《共产国际》1936年第18号)

[转译自A·C·基托夫:《为在中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5—1937)》]

苏外交人民委员部给斯皮尔瓦涅克的电报

1936年12月16日,苏外交人民委员部给苏驻南京政府外交代表斯皮尔瓦涅克发去电报,要求斯皮尔瓦涅克紧急会见孔祥熙或张群并发表如下声明:

“(一)苏联政府得悉发生西安事变的消息后(见1936年12月14日《消息报》)当即表示明确而肯定的立场,谴责张学良这一客观上只能有利于企图分裂和奴役中国人民的一切敌人的行为。

“(二)苏联政府……不仅与西安事变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不言而喻的事),而且自日军占领满洲之时起,从未与张学良保持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三)鉴于各种虚假和诽谤性报道仍不断出现,苏联政府……不能对中国红军的行动负任何责任。

“(四)中国国内少数人士和少数报刊一再重复中国的敌人散布的无耻谰言,似乎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有某种牵连,苏联政府对此感到无比惊讶和愤慨。苏联政府对此提出抗议并期待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制止此类诽谤谣言的传播。”

1936年12月19日,斯皮尔瓦涅克回电向苏外交人民委员部报告称:“当日晨张群接见了。在听取苏政府抗议后,张群作了如下答复:(1)还在发动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就曾散布消息,说他与苏联有联系,与中国红军建立了联盟关系,他在莫斯科派有代表,中共则在西安派有代表;(2)张群本人以及其他政府成员和首脑十分清楚,这类传说纯系谣言和捏造;(3)中央政府极为珍惜同苏联的友谊,高度评价它的支持和友善态度,因此,决不会相信也决不相信张学良或其他第三者散布的流言蜚语;(4)张群本人将力尽所能,制止来自中国国内第三者之口的种种暗示性诽谤的扩散。”(《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第19卷)

[转译自 A·C·基托夫:《为在中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5—1937)》]

西安事变结束后苏政府采取的外交步骤

在获悉蒋介石被释放并回到南京之后,苏外交人民委员部当即委托 И·И·斯皮尔瓦涅克向南京政府表示:“对这次冲突不经流血和内战而获得解决表示我国政府十分满意的心情,并再次声明,我们真诚地希望全中国的完全统一和巩固”。(《苏对外政策文件汇编》第 20 卷)

1937 年 4 月 3 日,蒋介石在上海秘密会见苏驻华使节鲍格莫诺夫时请他转告苏联政府,对苏联新闻界在西安事变期间采取的立场表示感谢。蒋介石说,他高度评价这一友好态度,并答应他将采取一切措施改善中苏关系。

为发展同中国的关系,苏政府多次向其驻华外交代表发出指令,表示苏对华关系所采取的态度:

“(一)委托鲍格莫诺夫同志向蒋介石表示,我们同过去一样赞成苏中合作,共同对敌。我们认为,苏中两国以签订双边互助条约形式进行合作尚为时过早,建议根据本决定第二款所述条件签订内容较广泛的友好条约,也可根据下列各点中所述情况进行事实上的合作。

“(二)政府认为同南京政府签订友好条约是适宜的。条约可将日德秘密协议中的类似内容和文字列入条款,如缔约一方保证不采取任何可能给第三国处于有利地位而给缔约另一方造成进攻威胁的措施,也不缔结任何此类协定。在条约中还可规定缔约双方协商采取措施以保护共同利益。此点还可规定:双方将承担义务全力促进太平洋地区互助条约的早日签订,规定从太平洋地区互助条约生效之日,苏中友好条约将自动失效。

“(三)政府认为在军事方面同南京政府签订包括下列内容的

军事技术协定也是适宜的:(1)根据我们已向南京政府作出的原则性承诺,出售飞机、坦克和其他军事技术装备,为此目的,可向南京政府提供 5000 万美元的贷款,贷款可在二至三年内使用,中国则在十年内以本国商品,如锡、钨以及茶、丝等抵偿所得军事物资的价款。(2)根据我们原先的承诺,在我国为中国培养飞行员和坦克手。在特殊情况下也可向中国西北某一地方相应的中国军校派遣我国的教官。(3)在唯一沟通中苏联系的甘肃境内的交通线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在中国军队指挥部就这类情况提出请求时,我们可派出航空兵和坦克兵团连同我方驾驶人员一起加入中国军队,以保护这条交通线。

“(四)为了保障我们和中国东部地区的联系,为了更好地实现上述各项措施,应恢复并扩大鲍格莫诺夫 1935 年 3 月 19 日向南京政府提出的关于在对等原则基础上成立苏中航空公司,共同管理从苏联边界经乌鲁木齐、哈密、兰州、西安、南京至上海的航线的建议。”(《苏外交文件汇编》第 20 卷)

鲍格莫诺夫在向莫斯科报告与蒋介石历次会谈的良好气氛时说:“从多次会谈中可以得出结论,蒋介石确实对我们西安事变时采取的立场表示感激”。

[转译自 A·C·基托夫:《为在中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5—1937)》]

(译者单位: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

五、共产国际与第二次 国共合作的形成

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

(1935年8月1日)

国内外工农军政商学各界男女同胞们!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进攻,南京卖国政府步步投降,我北方各省又继东北四省之后而实际沦亡了!

有数千年文化历史的平津,有无限富源的直、鲁、晋、豫各省,有最重要战略意义的察、绥区域,有全国政治经济命脉的北宁、平汉、津浦、平绥等铁路,现在实际上都完全在日寇军力控制之下。关东贼军司令部正在积极实行成立所谓“蒙古国”和“华北国”的计划。自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由东三省而热河,由热河而长城要塞,由长城而“滦东非战区”,由非战区而实际占领河北、察、绥和北方各省,不到四年,差不多半壁山河,已经被日寇占领和侵袭了。田中奏折所预定的完全灭亡我国的毒计,正着着实行;长此下去,眼看长江和珠江流域及其他各地,均将逐渐被日寇所吞蚀。我五千年古国将完全变成被征服地,四万万同胞将都变成亡国奴。

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然而最痛心的,在我们伟大民族中间,却发现少数人面兽心的败类!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等卖国贼,黄郛、杨永泰、王揖唐、张群等老汉奸,数年以来,以“不抵抗”政策出卖我领土,以“逆来顺受”主张接受日寇一切要求,以“攘外必先安内”武断宣传来进行内战和压迫一切反帝运动,以“十年生聚”、“十年教养”、“准备复仇”

等骗人口号来制止人民抗日救国行动,以“等待世界第二次大战来了再说”的狡计来迫使我国人民坐以待亡。而最近以来,汉奸卖国贼等在“中日亲善”、“中日合作”和“大亚细亚主义”等口号之下,所作的降日卖国之露骨无耻行为,简直是古今中外未有之奇闻!日寇要求撤退于学忠、宋哲元等军队,这些军队便立刻奉令南下西开去进行内战了;日寇要求撤退某些军政长官,某些军政长官便立刻被撤职了;日寇要求河北省政府迁出天津,省政府便立刻搬到保定了;日寇要求封禁某些报章杂志,那些报章杂志便立刻被封禁了;日寇要求惩办《新生》等杂志主笔和新闻记者,《新生》主笔和许多记者便立刻被逮捕监禁了;日寇要求中国政府实行奴化教育,蒋贼便立刻焚书坑儒了;日寇要求中国聘请日本顾问,蒋贼的军政机关便立刻开门揖盗了;甚至日寇要求解散国民党党部,北方厦门等地国民党党部便立刻奉命解散了;日寇要求解散蓝衣社组织,蓝衣社北方领袖曾扩情、蒋孝先等便闻风潜逃了。

中国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认为日寇和汉奸卖国贼对我国这些行动,是中华民族的无上耻辱!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郑重宣言:我们不仅对于日寇对我国的领土侵略和内政干涉,表示激烈的反抗;就是对于日寇提出解散国民党党部和蓝衣社组织底要求,也表示坚决的抗议。在共产党及苏维埃政府看来:一切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无论国民党和蓝衣社卖国殃民的罪恶如何滔天,但其应否存废问题,日寇绝无置喙的余地。

领土一省又一省地被人侵占,人民千万又千万地被人奴役,城村一处又一处地被人血洗,侨胞一批又一批地被人驱逐,一切内政外交处处被人干涉,这还能算什么国家!?!这还能算什么民族!?

同胞们!中国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民族就是我们全体同胞!我们能坐视国亡族灭而不起来救国自救吗?

不能!绝对不能!阿比西尼亚以八百万人民的国家,尚能对意大利帝国主义准备作英勇的武装反抗,以保卫自己的领土和人

民；难道我们四万万人民的泱泱大国，就能这样束手待毙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深切相信：除极少数汉奸卖国贼愿作李完用、郑孝胥、张景惠、溥仪第二去醜颜事仇而外，我绝大多数工农军政商学各界同胞，绝不不甘心作日寇的牛马奴隶。苏维埃政府对日宣战，红军再三提议与各军队共同抗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艰苦奋斗，19路军及民众的淞沪抗日血战，察哈尔、长城及滦东各地军民英勇杀贼，福建人民政府接受红军提议联合抗日，罗登贤、徐名鸿、吉鸿昌、邓铁梅、伯阳、童长荣、潘洪生、史灿堂、瞿秋白、孙永勤、方志敏等民族英雄为救国而捐躯，刘崇武、田汉、杜重远等爱国志士为抗日而入狱，蔡廷楷[错]、蒋光鼐、翁照垣、陈铭枢、方振武等抗日部队艰苦奋斗，宋庆龄、何香凝、李杜、马相伯等数千人发表中华民族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数年来我工农商学各界同胞为抗日而进行排货、罢工、罢市、罢课、示威等救国运动，尤其是我东北数十万武装反日战士在杨靖宇、赵尚志、王德恭[泰]、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吴义成、李华堂等民族英雄领导之下，前仆后继的英勇作战，在在都表现我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在在都证明我民族抗日救国的必然胜利。到现在：我同胞抗日救国事业之所以还未得到应有胜利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日寇蒋贼的内外夹攻，另一方面是由于各种抗日反蒋势力互相之间，存在有各种隔阂和误会，以致未能团结一致。

因此，当今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

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此外,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现在更进一步地恳切号召:

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

一切有爱国天良的军官和士兵兄弟们!

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神圣事业的党派和团体的同志们!

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们!

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

中国境内一切被压迫民族(蒙、回、韩、藏、苗、瑶[瑶]、黎、番等)的兄弟们!

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

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作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教育会、新闻记者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同乡会、致公堂、民族武装自卫会、反日会、救国会等等)、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谈判结果所成立的国防政府,应该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这种国防政府,应当设法召集真正代表全体同胞(由工农军政商学各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团体、以及国外侨胞和中国境内各民族,在民主条件下选出的代表)的代表机关,以便更具体地讨论关于抗日救国的各种问题。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绝对尽力赞助这一全民代表机关的召集,并绝对执行这一机关的决议,因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是绝对尊重人民公意的政府和政党。

国防政府的主要责任在于**抗日救国**，其行政方针应包括下列各点：

(一)抗日救国收复失地。

(二)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三)没收日帝在华一切财产、充作对日战费。

(四)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粮食、土地，交给贫苦同胞和抗日战士享用。

(五)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发展工农商业。

(六)加薪加饷、改良工农军学各界生活。

(七)实行民主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八)实行免费教育、安置失业青年。

(九)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护侨胞在国内外生命、财产、居住和营业的自由。

(十)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日本国内劳苦民众、高丽、台湾等民族)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对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

抗日联军应由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合组而成，在国防政府领导之下，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这种总司令部或由各军抗日长官及士兵选出代表组成，或由其他形式组成，也由各方代表及全体人民公意而定。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尽抗日救国天职。

为的使国防政府真能担当起国防重任，为的使抗日联军真能担负起抗日重责，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号召全体同胞：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供献专门技能，以便我全体同胞总动员，并用一切新旧式武器，武装起千百万民众来。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坚决相信：如果我们四万万同胞有统一的国防政府作领导，有统一的抗日联军作先锋，有千百万武装民众作战备，有无数万东方的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民众作声

援,一定能战胜内受人民反抗和外受列强敌视的日本帝国主义!

同胞们起来:

为祖国生命而战!

为民族生存而战!

为国家独立而战!

为领土完整而战!

为人权自由而战!

大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

中国苏维埃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

1935年8月1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铅印件刊印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版。)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 任务决议(瓦窑堡会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 1935 年 12 月 25 日通过)

(一)目前形势的特点

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史上划分了一个新时期,这表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中国革命准备进入全国性的大革命,在世界是战争与革命的前夜。

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并吞了整个华北,而且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这是目前时局的最基本的特点。

日本帝国主义鉴于直接公开的武装占领东北四省,曾经引起了全中国反日的怒潮,这次他就采取比较隐秘的方式,即用国民党南京政府下命令委任中国某些卖国的军阀政客,作为他在华北的代理人,以进到直接武装占领华北。这种方式虽是比较“九一八”的方式更为奸猾与凶恶,但仅是过渡到直接武装占领与建立“华北国”及其傀儡政府的步骤,第二个“满洲国”傀儡政府是其必然的归宿。作为中国汉奸卖国贼集团的主要成分的许多军阀政客土豪劣绅,银行资本家,特别是其中的亲日派,是这个傀儡政府的组成分子及其赞助者,没有这一大群汉奸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是不能如此顺畅的。

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并准备吞并全中国的行动,向着四万

万人的中华民族送来了亡国灭种的大祸,这个大祸就把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充汉奸卖国贼的中国人,迫得走上一条唯一的道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战争。一切爱国的中国人为保卫自己的国家而血战到底,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亡人之国灭人之种的冒险事业的前进路上必然得到的回答。日本帝国主义于吞下了东北四省这个较小的炸弹之后,又着手吞下中国本部这个绝大的炸弹了。

日本帝国主义单独吞并中国的行动,使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程度。美国帝国主义完全为着他自己的帝国主义的目的,是同日本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太平洋战争是必然的结果。而英国却忘[妄]在求得日本的某些让步与妥协,使他的主要力量能够拿了去对付他的主要敌人:苏联美国与意大利。

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本部的行动,促进了中国反革命统治,首先是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的统治之削弱与崩溃。一贯的卖国政策不但使蒋介石丧失了某些社会的与群众的基础,而且缩小了他的地盘。同苏维埃红军的长期斗争,尤其是五次“围剿”与对于中央红军的追击,使他的兵力消耗了,疲劳了,分散了。以法西斯蒂统一中国的梦想,是宣告了最后的破产。国民党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实际上是不利于蒋介石的分赃会议,蒋介石只有更加依靠出卖中国,以维持垂死的统治。但是他的出卖,更促使他的统治加速度的走向死灭。这种情形,也就更加加深了蒋系军阀与其他军阀间的矛盾与冲突,增加了以新的形势与新的性质而出现的反蒋战争的爆发之可能性。

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行动,正当中国苏维埃运动转入了一个新局面的时期。自从中央红军退出中央苏区,长江下游的一些苏区受到了部分损失之后,现在是各地红军的新胜利,新根据地的创造,老苏区的游击战争的开始转入反攻,与新的游击战争蓬勃

发展的时期。困难的关头已经过去了。中央红军以 12 个月工夫，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战胜了蒋介石的长追，宣告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突破了历史上军事远征的纪录。并以宣传队的作用向着他所纵横驰骋的 11 个省区二万万以上民众，指出了解除痛苦，救己救国的道路。以播种机的作用，散布了许多的革命种子。中央红军与廿五、六、七军会合之后，对于向着陕甘苏区进行的敌人第三次“围剿”之彻底的粉碎，更加表示了苏维埃运动新时期的到来。他同目前总的革命形势的新局面相会合，成为中国革命新形势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指明：在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吞并，挽救中国出于亡国灭种大祸的伟大力量中，有着苏维埃红军铁一般的中坚力量。

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行动，重新推醒了全中国人民，懂得了亡国灭种大祸临头的危险形势，掀起了新的民族革命高潮。这种民族革命高潮，在中国革命经过历史上无数次的锻炼之下（主要的是 1925 至 1927 的大革命）产生的，是在目前中国已经有了苏维埃革命根据地与革命形势存在之下产生的，是在世界革命与战争的新周期即将来临的形势之下产生的，是在苏联已经有着一切力量，足以战胜侵略国家援助被压迫民族的形势之下产生的。因此，他就将以特别广大，特别坚决，特别与世界革命因素互相影响与互相帮助的性质而出现。

无疑的，新的反日的民族革命高潮，不但推醒了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中更落后的阶层，使他们积极参加革命斗争，而且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与知识分子，现在又转入了革命。中国国民经济的总崩溃，千千万万人民的失业失地，千千万万的灾民难民，更使得新的反日的民族革命高潮，同群众救死求生的日常斗争密切的联系起来，大大的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群众基础，广大民众的革命义愤是在全中国一切地方酝酿着，并已经在普及各大城市的学生反日示威运动中再一度的开始表现出来了。在反革命营垒中，是

新的动摇分裂与冲突,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以至一部分军阀,对于目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的。民族革命战线是扩大了。

目前的世界是处在**大革命与大战争的前夜**形势中,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以及由此产生的革命危机,使得帝国主义除了战争找不出第二条挽救死亡的出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与意大利帝国主义大举进攻阿比西尼亚的冒险战争,无疑的存在着引导到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而中国与阿比西尼亚的民族革命战争,各帝国主义国家,及其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危机的成熟,无疑的要引导到世界的大革命。在目前革命与战争的前夜时期,已可明显看到世界反革命力量的削弱,与世界革命力量的增涨。在将来就是大战争与大革命,葬送世界上的一切反革命。这一形势使得中国革命脱离了过去的孤立。**世界革命是中国革命有力的帮手**。同时中国革命现在就已经成了世界革命的伟大因素,将来则要以全民族的雄伟阵势帮助着世界的革命。

这在日本同中国的关系上也是一样。在有力量的日本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日本工农及被压迫民族(朝鲜台湾)正在准备着伟大力量,为打倒帝国主义日本,建立苏维埃日本而奋斗。这就把中国革命同日本革命在共同目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础之上会合起来。**日本革命民众是中国革命民众的有力帮手**。

苏联也是一样。今日的苏联是有战胜敢于向他开火的帝国主义的力量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即将完成,红军的威力),在向日本帝国主义使用一切和平方法无效(屡次提议订立互不侵犯条约等)而日本反积极向苏联挑战的情况之下,苏联是准备着打击这个野蛮侵略者的。这就把中国革命,日本革命和苏联反对侵略者的斗争会合在共同目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础之上。**苏联是中国革命最有力量**的帮手。

中国革命是处在有利的环境中,中国革命有着光明灿烂的前

途。但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尤其是目前凶横直进的日本帝国主义，是准备了决心和力量来对付中国革命的。在中国反革命集团方面，由于其统治力量之更加减弱，而不得不更加为虎作伥，投靠于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向着革命的民众作绝望的进攻与决斗。把这一形势同目前依然存在着的中国革命不平衡发展的形势合起来看，就知道中国革命保存了一种持久性。他向中国革命民众及其首领中国共产党指明：准备着长时间同敌人奋斗罢，为着同敌人作持久战而准备自己的艰苦工作罢，没有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军，是不能最后解决敌人的；一切策略，一切努力，向着组织千千万万民众进入伟大的民族革命战场上去，准备了伟大的力量，就是准备了决战的捷报。

(二)党的策略路线

目前的形势告诉我们，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行动，震动了全中国与全世界。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民族革命战线与民族反革命战线是在重新改组中。因此，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保持中国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

当然，不同的个人，不同的团体，不同的社会阶级与阶层，不同的武装队伍，他们参加反日的民族革命各有他们不同的动机与立场。有的只是为了保持他们原有的地位，有的为了要争取运动的

领导权,使运动不至超出他们所容许的范围以外,有的真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正因为他们的动机与立场各有不同,有的在斗争开始时,就要动摇叛变的,有的会在中途消极或退出战线的,有的愿意奋斗到底的。但是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只有这种路线,我们才能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去对付全国人民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头子蒋介石。

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依然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革命的智识分子是民族革命中可靠的同盟者。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坚固联盟,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的基本力量。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与军阀,不管他们怎样不同意土地革命与苏维埃制度,在他们对于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斗争采取同情,或善意中立,或直接参加之时,对于反日战线的开展都是有利的。因为这就削弱了总的反革命力量,而扩大了总的革命力量。为达到此目的,党应该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不但如此,即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由于中国过去是许多帝国主义互相竞争的结果,产生了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互相竞争的卖国贼集团,他们中间的矛盾与冲突,党亦应使用许多的手段,使某些反革命力量暂时处于不积极反对反日战线的地位。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以外的其他帝国主义的策略也是如此。

党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人民的力量,以反对全中国人民的公敌时,应该坚决不动摇的同反日统一战线内部一切动摇,妥协,投降与叛变的倾向做斗争。一切破坏中国人民反日运动者,都是汉奸卖国贼,应该群起而攻之。共产党应该以自己积极的彻底

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反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也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反日运动，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反日战线中的广大民众，应该满足他们的**基本利益的要求**（农民的土地要求，工人，兵士，贫民，知识分子等改良生活待遇的要求），只有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才能动员广大的群众走进反日的阵地上去，才能使反日运动得到持久性，才能使运动走到彻底的胜利。也只有如此，才能取得党在反日运动中的领导权。

（三）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反日反卖国贼的民族统一战线之最广泛的与最高的形式，就是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由于不同意苏维埃制度与土地革命而同意于反日反卖国贼的分子的存在，由于中国政治经济不平衡而产生的地方割据状态，由于中国苏维埃政权现在还只在中国一部分领土上胜利，此外，还由于汉奸卖国贼等民族反革命为日本帝国主义帮凶的严重性，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

中国人民反日反卖国贼的方式，是多样的，参加斗争的分子的觉悟程度，也是不一致的。共产党员应该不放松一切机会去发动，组织与领导各种方式与各种程度的斗争，把这些斗争引导到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阶段。一切反日反卖国贼的分子，不论他们代表哪一阶级，哪一政治派别，哪一社会团体，哪一武装队伍，都可以加入国防政府。一切反日反卖国贼的武装队伍，都可以加入抗日联军。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是全中国一切反日反卖国贼力量的**联合战线的政权组织**，也是反日反卖国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统一领导机关。在阶级意义上说来，他是在反日反卖国贼共同目标之下的**各阶级联盟**。

为了使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迅速组织起来，为了使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有更广大的群众基础与武装力量，共产党的策略不是

等待着那些自然发生的抗日人民团体与抗日武装力量已经存在了,才去把他们组织起来,而是指导自己的党员从各方面努力去推动一切爱国的分子,团体,阶层,阶级,党派,生产的与商业的,文化的与教育的,学生的与教员的,工农的与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城市与乡村的,新式的与旧式的,社会的与政治的,武装的等等力量,发起各种各样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团体(抗日会,抗日联合会等),组织各种各样反日反卖国贼的军队(抗日义勇军,人民革命军,新的 19 路军等),政权(县市区抗日政府,人民革命政府等),把这些团体,军队,政权,集合起来,加上苏维埃与红军的力量,这就是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组成之后,在他的行动过程中,每日都要去发动新的团体,新的地方政府与新的军队。一面不断淘汰动摇叛变分子,一面不断涌进新的力量,使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成为不是腐朽的,而是有朝气的,不是软弱的,而是有伟大战斗力量的政府与联军。对于有些地方因为党的力量的薄弱,所以没有经过党的推动与领导,或是因为离开苏区与红军较远,所以没有苏维埃与红军参加,而自动产生的抗日政府与抗日联军,那里的党同样应积极的援助拥护与参加。这就是共产党实现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具体的工作路线。

因为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是反日反卖国贼的最广泛的与最高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所以他应该有最广泛的行动纲领。这纲领如下:

- (一)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作抗经费。
- (二)没收一切卖国贼及汉奸的土地财产分给工农及灾民难民。
- (三)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 (四)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
- (五)加薪加饷,改良工人士兵及教职员的生活。
- (六)发展教育,救济失学的学生。

(七)实现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

(八)发展生产技术,救济失业的知识分子。

(九)联合朝鲜,台湾,日本国内的工农,及一切反日力量,结成巩固的联盟。

(十)对于中国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

共产党必须在抗日战斗的过程中,求得这些纲领的实现。并经过这些纲领,以求得党的十大政纲的实现。

(四)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最广泛的反日反卖国贼的统一战线,在今天有着他的特殊的意义,就是苏维埃已经在中国的许多地方胜利了。这是同 1925 至 1927 年的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基本上不相同的。九年以来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在中国许多地方的胜利,使得新的反帝高潮得到了基本的力量,使得全国人民有了靠望,有了从帝国主义和卖国贼手里争取自由解放与独立的活榜样,使得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有了坚固基础与根据地,保证了在新的大革命中能够坚持下去与走向彻底胜利,使得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有了中心支柱。

为了使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加广大的与强有力的基础,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把自己的政策,即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政策的部分,改变到更加适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情况。

这些政策的改变,首先就是在更充分的表明苏维埃自己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基本利益,在于中国的自由独立与统一,而这一基本利益,只有在苏维埃的坚决方针之下,才能取得,才能保持,才能彻底战胜反对这种利益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卖国贼。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宣告,愿意把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团结

到自己的周围。一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苏维埃愿意给予以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一切为帝国主义及中国反革命所打击的城乡小资本工商业,苏维埃尽自己的政策与权力所及去保护他们,苏维埃老早就废除了国民党军阀的一切苛捐杂税,宣布了有利于一切小生产者的统一累进税。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宣告,一切同情于反日反卖国贼的知识分子,不问他们过去是否是国民党员,或在国民党政府工作,都能享受苏维埃政府的优待,苏维埃给予他们以工作,救济他们的失业,给予他们以发展文化,教育,艺术,科学及技术天才的机会。一切受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国民党政府所驱逐,轻视,与虐待的智识分子,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技术人员,与新闻记者,苏维埃给予以托庇的权利(一切这些人都可到苏区来)。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技术人员,与新闻记者(不问他们的出身是地主,富农,或资本家),苏维埃给与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宣告,一切白军官长(不分官级)士兵,凡愿反日反卖国贼者,都有受苏维埃优待的权利。一切被国民党卖国政府所排斥裁遣的失业军人,苏维埃红军愿意给以工作。即使同红军作战者,一经解除武装,不问官兵,一律优待。其负伤者,一律医治。一切白军官兵愿意在红军服务忠心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之事业者,苏维埃给予以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及其红军向全国愿意参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之事业的个人,团体,政治派别,与武装队伍提议,共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不问何种武装部队,苏维埃及红军愿与他们订立抗日讨卖国贼的协定,如过去苏维埃红军与19路军订立抗日反蒋协定一样。但过去红军没有能够及时的用实力直接帮助19路军(19路军也没有积极要求),击破蒋介石对福建的进攻,这是不对的。今后对一切抗日讨卖国贼之友军,必须尽可能的给予以实力的援助,直至直接配合作战。要达到反对共同敌

人的目的，苏维埃红军不但需要自己的胜利与发展，而且需要同盟的友军之胜利与发展。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变对待富农的政策。富农的财产不没收，富农的土地，除封建剥削之部分外，不问自耕的与雇人耕的，均不没收。乡村中实行平分一切土地时，富农有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之权。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用比较过去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在双方有利的条件下，欢迎他们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领土内投资，开设工厂与商店，保护他们生命财产之安全，尽可能的减低租税条件，以发展中国的经济。在红军占领的地方，保护一切对反日反卖国贼运动有利益的工商业。使得全国人民明白：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不但是政治上的自由，而且是发展中国工商业的最好的地方。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对海外华侨宣告，称赞他们历来帮助中国革命的爱国举动。蒋介石辈虽然久已叛变革命了，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及全民族爱国人民却继承了太平天国以来的英勇事业，决心挽救中国于危亡，而致之于富强隆盛之域。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在全国胜利之日，即华侨得到解放之时。一切国民党政府引导华侨沦于奴隶牛马的政策，均当彻底铲除，而代之以积极保护华侨的政策。在目前，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排斥驱逐的华侨同胞，苏维埃给予以托庇的权利，并欢迎华侨资本家到苏区发展工商业。

所有这些政策的改变，是为了一个基本的目的：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求得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与独立，争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为了顺利的执行这些政策，为了很快的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为了保证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党与苏维埃自始不变，但须更加努力，更加使之适合于民族统一战线之要求的政策，那就是扩大

抗日红军,扩大抗日游击队,扩大作为抗日根据地的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粉碎卖国贼军队的进攻,肃清抗日道路,巩固抗日后方,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争取工农的大多数,争取卖国贼军队和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士兵,向少数民族提议建立共同斗争的联盟,执行灵活的外交政策等等。

红军是抗日的先锋队,只有这个先锋队的扩大巩固与善于使用,才能保证反日战争的胜利。为扩大百万红军而斗争的口号,在今天须使之紧密联系到挽救危亡迫不及待的反日战争的时机。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卖国贼,须扩大数百万红军才能济事,首先是扩大一百万。不但每个红色指挥员,战斗员,地方党[干]部,苏维埃人员,而且是全国革命的人民,对于这一任务的积极努力,是十分重要的。红军技术条件的提高,技术与战术教育的进步,政治工作之深入与普遍,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的集中,物质供给的保证,尤其是战略与战役指挥之合乎正确的原则(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都是战胜敌人不可缺少的条件。

游击战争应在全国发展起来,而着重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区域,附近区域,卖国贼蒋介石的区域,红军抗日根据地(苏区)及其附近区域的发展。一切游击队应以民族战争的面目而出现,密切的联系于农民群众的土地斗争。要使游击战争在反日反卖国贼战争中担负起战略上的伟大作用,党应使游击队都成为抗日根据地(苏区)的创造者,应使一切游击队所在区域建立脱离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统治的抗日人民革命政权(县区乡抗日政府,革命委员会以至苏维埃),应使游击队迅速扩大而成为抗日革命军,应使卷入反日浪潮的青年学生与革命士兵,大量加进游击战争中去。应把党所领导的与非其所领导的游击队,在共同的基础上统一起来。

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卖国贼,不扩大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即抗日红军的根据地,是不能成功的。只有把卖

国贼统治着的土地，大块的变为苏维埃领土，红军才有依靠，抗日战争才有后方。苏维埃领土中许多工作要力求做到完善的程度，实行正确的政策，把他铁一般的巩固起来，使之成为全国人民羡慕爱护与仿效的地方。

一切卖国贼军队进攻这种抗日战争根据地的与人民政权模范区的企图，应该予以无情的打击。粉碎与破坏这种反革命进攻，不但是抗日红军与全苏区抗日人民的责任，而且是全中国抗日人民的责任。党应号召全中国全苏区一切抗日人民为保护自己的根据地而奋斗，号召这些人民反对卖国贼捣乱抗日战争的后方，反对卖国贼拦阻抗日红军的去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是党指导革命战争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没有千千万万在日本与卖国贼统治之下的工人，农民，兵士，贫民与革命民众大多数起来进行坚决的斗争，是不能成功的。党和苏维埃红军的反日反卖国贼的民族统一战线，要扩大到一切有群众的地方去。应使一切群众斗争从初级提到高级，从地方提到全国，从经常程度提到反日反卖国贼的政权与武装程度。只有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内的同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外的这两种斗争相会合，才能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

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不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是不能成功的。在中心城市与主要企业中建立巩固的堡垒，利用一切公开的与半公开的可能建立广大的群众组织；从估计具体环境，争取胜利结果（即使是很小胜利）的观点出发，去发动组织领导工人群众经济的与政治的斗争；注意保护与教育企业中的干部，积蓄工人群众的雄厚力量，以准备决定胜负的战斗；争取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权，这是党在工人运动中的基本原则。

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卖国贼，不争取占中国人口 80% 的农民参加斗争的战线，是不能成功的。共产党与苏维埃

一定要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为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解决农村封建压迫而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动员几千万几万万农民群众武装走上抗日讨卖国贼的阵地上去,才能使民族革命战争有源源不绝的补充,才能使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反革命对于中国的主要掠夺对象——农民,变为反掠夺的中华民族革命军。在日本占领区域,及其附近区域,首先是没收汉奸卖国贼的土地财产分配给农民,然后从斗争过程中依据于群众自己的经验,把斗争深入下去,进行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党的基本原则,就是把土地革命同民族革命结合起来。

没有士兵的援助,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数百万的军队,也是不能成功的。我们应该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之上去进行士兵的工作。党应号召一切苏区人民,白区人民,红军战士,游击队战士,为瓦解卖国贼军队而努力。几千万几万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向着几十万几百万不愿当亡国奴的兵士官长苦口劝说,亲友招致,书函责备,与口号鼓动,是没有不能感动他们的。我们的口号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武装保卫中国,红军白军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愿意回家的发路费,愿意耕田的分土地,愿意抗日的当红军当义勇军。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拿自己的榜样和真诚的口号给蒙古人,回人等被压迫民族看,你们也组织自己的国家呵!日本帝国主义及中国卖国贼,是我们共同的敌人,联合起来打倒这个敌人呵!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建设于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的胜利的基础之上,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等等的交涉。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及其政府并不是不择目标而随便放矢的,谁愿为着自己的利益而同时有利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抗日讨卖国贼的斗争者,苏维埃政府均愿与之发生友谊的关系。

一切政策，一切努力，为着反日反卖国贼的胜利，一切与此目标相违背者，均在排弃之列。这就是共产党与苏维埃的策略路线。

(五)党内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

要战胜中国人民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共产党员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参加与领导一切群众的，民族的与阶级的斗争。这里，主要的关键是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广泛的统一战线，一方面是在集中最大的力量，去对付最重要的敌人，另一方面，是在使广大的群众根据于他们自己的政治经验，来了解党的主张的正确，争取他们到党的旗帜之下。

必须更深刻的了解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共产党要在中国革命中取得领导权，单靠党的宣传鼓动是不够的，必须使他的一切党员在实际行动中，在每日的斗争中，表现出他们是群众的领导者。只知道如何在下层群众中间进行工作(这是主要的)，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同别党别派和下层群众有关系的上层领袖进行谈判，协商，妥协，让步，以期争取其中可能继续合作的分子，以期在群众前面最后的揭穿那些动摇欺骗与叛变分子的面目，而以群众的力量把他们驱逐出去。党的领导权的取得，单靠在工人阶级中的活动是不够的(这是要紧的)，共产党员必须在农村中，兵士中，贫民中，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中，以至一切革命同盟者中，进行自己的活动，为这些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斗争，使他们相信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的代表者。只要有群众的地方，不论那里的领导者是怎样的反动，共产党员应该参加到里面去进行革命的工作。只有当共产党员表现出他们是无坚不破的最活泼有生气的中国革命的先锋队，而不是空谈抽象的共产主义原则的“圣洁的教徒”，共产党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

为了更大胆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以争取党的领导权，党必

须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做坚决的斗争。在目前形势下,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关门主义的来源,第一,是由于对目前新的政治形势的不了解,因此,就不了解变更自己的策略,以适合于新的形势的必要。第二,是由于不会把党的基本口号与基本政纲同目前的行动口号与行动政纲,在实际行动中联系起来。第三,基本的是由于不会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活泼的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體环境中去,而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变成死的教条。这种关门主义倾向,实质上表现出惧怕敌人,惧怕群众,与对于自己力量的不相信,因此就惧怕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这种关门主义的倾向,实质上是同右倾机会主义相同的。关门主义继续的结果,必然是使党脱离群众,使党放弃争取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的任务。因此党必须坚决反对“左”的关门主义,大胆的运用广泛统一战线,深入到千千万万的群众中去,不怕可能发生的某种错误,从斗争中去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

当然,党在反对“左”的关门主义的斗争中,丝毫也不要放松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右倾机会主义压抑群众的切身利益的斗争,牺牲农民夺取土地,工人兵士贫民改良待遇的要求,去适合民族资产阶级与富农的利益,去适合同盟者的部分利益,对同盟者惧怕使用言论批评的武器,惧怕率领群众逼迫同盟者走上革命的更高阶段。右倾机会主义接受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以及乡村富农的政治影响,而把自己变成他们的尾巴。1927年时期的陈独秀主义,在新的大革命中,在部分的党部与党员中的复活,是可能的。毫无疑问,党应该向着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但在目前说来,“左”的关门主义,是党内主要危险。目前的反对右倾,正是为得要顺利的克服“左”倾,彻底的击破关门主义,使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正确的大胆的运用到一切工作中去,使党不落在群众斗争的后面,使群众从争取日常的与切身的利益出发,提高到反对中国人民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

卖国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位置。

(六)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

为了完成中国共产党在伟大历史时期所负担的神圣任务，必须在组织上扩大与巩固党。在新的大革命中，共产党需要数十万至数百万能战斗的党员，才能率领中国革命进入彻底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一切在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中的英勇战士，都应该吸收入党，担负党在各方面的工作。由于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与殖民地，农民分子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常常在党内占大多数，但这丝毫也不减低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的地位。事实证明，这样成分的党，是能够完成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国际所给与的光荣任务的，是能够艰苦奋斗百折不回的。在世界各国共产党中，除联邦共产党外，中国共产党站在光荣的先进的地位。

必须同党内发展组织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做斗争。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与共产主义的教育，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党在思想上的布尔什维克的一致，是党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领导之具体表现。不从积极的战斗需要出发，而从恐惧观念出发的组织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必须彻底的击破。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的伟大战斗，已经涌出和正在涌出无数的积极的分子与群众领袖，党的组织应以热烈欢迎的态度，向他们开门。党不惧怕某些投机分子的侵入，党用布尔

什维克的政治路线与铁的纪律,去保证党的组织的巩固。党不惧怕非无产阶级党员政治水平的不一致,党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到先锋队地位。

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成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的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不是把领导才能每条都教好了才给干部以工作,而是放这些干部到斗争中去,使他们从斗争中去学习。不是以如同使用机械一样的态度,去使用干部与党员,而是爱护他们,信任他们,分配他们以适当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天才与自动性。不是以官僚主义的态度去对付干部与党员,而是以对于任务的解释说服,对于工作的具体指示,把党的领导机关,同他们活泼有生气的联系起来。对于干部与党员在思想上与工作上的错误,不是轻易的给以打击,加上机会主义帽子,以及轻易的处罚他们,而是给以耐心的一次又一次的说服教育。思想上与工作上的错误,是免不了的,错误是可以改正的,列宁主义的学习精神,与从斗争中求锻炼[炼],是改正错误的最好方法。党内斗争的火力,应该向着那些坚持错误观点,不愿学习锻炼[炼],不受指导教育的同志。一定限度的组织上的结论,也仅仅对于那些错误严重与无法说服的同志才是必要的。但一切必要的党内斗争与组织结论,仍然是带着对于本人与全党的教育性质。只有对于那些有一贯错误路线的机会主义者,党才不应该因为他们的一时表现改正,而轻易给他们以重要的工作。

伟大斗争时期,党的干部坚固地团结于党的领导机关的周围,是有决定意义的。党要团结全党领导最广大群众走上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的战争,没有很多的与很好的干部作纽带,是不能成功的。正确的组织路线与干部政策,是完成这个任务的前提。

中国共产党中央号召全党及其干部为坚决执行党的策略路线而斗争。把统一战线运用到全国去,把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建立起来,把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变成全民族的国家,把红军变成全民族

的武装队伍,把党变成伟大的群众党,把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结合起来,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万岁!中国的自由独立与统一万岁!苏维埃新中国万岁!

根据 1936 年 1 月 14 日出版的西北
中央局《斗争》第 81 期刊印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0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

关于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

(1936年4月20日)

洛甫

去年共产国际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与中共中央十二月的决议都明显的指出中国共产党目前最中心的任务是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创立。

根据国际的与中国党的经验,在创立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中,我们应该注意下列的一些问题:

第一,必须集中力量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

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全中国人民最大的敌人,抗日是全中国人民最迫切的要求。所以要创立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必须集中力量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但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一方面依靠于他自己的武装力量,另一方面依靠于他的走狗汉奸卖国贼的帮助。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必须同时反对他的走狗汉奸卖国贼。

我们所以要讨伐蒋介石,因蒋介石是把中国出卖给日本的主要负责者,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但汉奸卖国贼不只是蒋介石。在殷汝耕公开宣布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时,全国人民都起来反对他,因为他是最露骨的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第二傀儡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中的宋哲元、肖振瀛等都是这一类的家伙,是谁都知道的了。反对这些汉奸卖国贼也是中国所有抗日人民的迫切要求。

在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中,我们到处看到汉奸卖国贼指使

他们的军警、侦探、流氓向抗日的大众进攻，利用枪杀、鞭打、酷刑、逮捕来残暴的对付自己的同胞，汉奸卖国贼是到处存在着的。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同时必须同当地的汉奸卖国贼做斗争，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事实。

我们提出“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创立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等口号，完全不是要停止同汉奸卖国贼的斗争，而正是为了要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去顺利的开展反对他们的斗争。反对汉奸卖国贼的斗争即是抗日斗争中的必要的与有机的一部。而打汉奸卖国贼的战争，即是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的活的统一的关系。

这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的斗争愈是坚决，愈是彻底，则全中国人民的斗争的目标愈是明显，斗争的力量愈是集中，各帝国主义与中国反动统治内部的动摇、分裂与分化愈是加深，因此愈是便于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创立。

第二，必须把抗日反汉奸卖国贼的斗争同群众直接的政治的与经济的利益联系起来。

只有把抗日反汉奸卖国贼的斗争同群众直接的政治的与经济的利益联系起来，我们才能吸收最广大的群众到运动中来，才能使运动有着雄伟的力量。

当平津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开始发动的时候，立刻就提出了民主自由权利的要求。这种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的要求的实现是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必要条件。同时更因为这种要求，是在长期的法西斯蒂的白色恐怖的统治下窒息着的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最迫切的要求，所以抗日救国运动与为民主权利的斗争的联系，更能吸收广大的人民群众到运动中来，使抗日救国运动成为伟大的群众运动。

当河北直南的盐民开始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时候，他们第一个要求就是取消盐警，取消使他们不能忍受的苛捐什税。斗争从

他们直接的经济要求开始,而这种斗争迅速的转变为伟大的抗日反汉奸卖国贼的数十万盐民群众的暴动与游击战争。从他们直切的切身的痛苦开始,他们懂得要解决他们自己的痛苦,只有最坚决的起来同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做斗争。

显然的,为了吸收最广大的群众参加斗争,共产党员不能以抗日救国的号召与宣言为满足,而应该告诉他们为了开展抗日反汉奸卖国贼的斗争,他们今天应该做些什么。共产党员应该根据于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使抗日反卖国贼的斗争同群众最迫切的政治的与经济的要求在一定的形式中联系起来,并且随着斗争的开展,随着群众觉悟程度与组织力的提高,这种联系的形式也应该随之而改变。

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联系的形式,在各种不同的具体环境下是不相同的。但在抗日反汉奸卖国贼的斗争过程中把农民的斗争最后提高到土地革命的实现,是中国民族革命彻底胜利的必要条件。因为中国的民族革命以其社会实质说来,即是农民的土地革命。

第三,必须依据具[体]环境规定统一战线的条件并使之成为共同行动的纲领。

统一战线的形式是依照各种不同的环境而变化的。概括的说来有:(一)上层的统一战线,(二)下层的统一战线,(三)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的同时并用。但不论哪一种形式的统一战线,必须有一定的具体的条件,这些条件应该成为实行统一战线的各方面的共同行动的纲领。

因为各地的环境不同,因为实现统一战线的对象不同,所以大家虽是在抗日反汉奸卖国贼的一点上是共同的。但是在大家为了抗日反汉奸卖国贼的总的目标而斗争时,今天应该做些什么?这是到处不相同的。共产党员就应该清楚的审慎的依照各种不同的环境提出各种不同的今天能够实现的条件。在一定的环境下提出

过高的条件，就会使统一战线不能建立，或是使统一战线成为不能行动的空谈，而过低的条件，则就使统一战线失去了应有的作用。这些对于统一战线都是不利的。

比如以上层统一战线的例子来说，某某将军虽是同意于我们抗日救国宣言，然而他现在认为时机未到不便发动，那末我们就应该提出现在他所能实行的“互不侵犯”或其他条件作为共同行动的纲领。再如以下层统一战线为例子，某某工厂中的工人领袖，虽是同意于我们抗日救国的总的纲领，然而他们认为今天迫切的问题是反对开除，那我们即应以“反对开除”成为我们共同行动的纲领。只有这样，一切抗日反汉奸卖国贼的口头的宣言变成为实际的行动。

所以虽是我们同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各武装部队，在抗日反汉奸卖国贼的一个共同点上成立统一战线，而我们订立的协定可以是各种各色的、部分的、地方性的，而协定的时间可以是长期或短期的。共产党也就是这样推动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各武装部队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行动起来，以实现共产党在抗日民族革命运动中领导者的作用。

第四，必须使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成为统一战线坚强的核心。

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首先应该拿他自己的彻底的抗日反汉奸卖国贼的主张与积极的坚决的行动以创立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是要在行动中在斗争中去推动、创造与扩大抗日人民统一战线，我们是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火车头与推动机。我们反对一切消极与等待的倾向。我们自信：没有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的坚强的统一战线的创立，是不可能的。

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应该最忠实地遵守统一战线的协定的每一条文，而且应该是为了这些条文的实现而最积极奋斗的人。我们应该及时的揭露个别人员或组织对于共同行动的消极怠工与破坏协定的行为的错误，不疲倦的为着统一的行动而斗争。共产

党、苏维埃与红军应该是实行统一战线的模范。

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在统一战线中决不抛弃自己的立场。我们对于一切改良主义的思想决不放弃严肃的确实的批评，我们以最诚恳的同志态度，以最具体的实际的材料，向自己的同盟者指出，只有共产党的主张是最彻底的最革命的主张，以诱导他们同我们为更进一步的合作，但我们认为只有在行动中，在合作的过程中，我们更能影响与诱导同盟者走上正确的道路。

但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在统一战线中应该对于自己的同盟者有最清楚的了解与确当的估计。我们应该知道谁是民族革命中的朋友，谁是半途要退出的同路人，与谁是一天两天的暂时的同盟者，换句话说，我们应该知道谁是民族革命中的左派，谁是中派，谁是右派。我们的方针应该是同左派结成坚固的同盟，联合中派而孤立右派。只有我们同左派的联盟愈是巩固，我们愈是能够使中派倾向于同我们联合，愈是能够孤立右派。同时，只有当我们同右派的斗争愈是坚决，愈是能够揭破他们的每次的动摇、欺骗、出卖与叛变的事实，我们愈是能够使中派脱离右派，使左派同我们结成巩固的同盟。在这里，我们共产党员的坚定的、不动摇的、明确的、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对于统一战线策略的能否彻底实现有着决定的作用。

共产党，苏维埃与苏维埃红军，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实行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是为了发动与争取最广大的群众到彻底的抗日反卖国贼的旗帜之下，最广大的群众是我们最后的依靠，是我们力量的泉源。因此不论是上层的或是下层的统一战线的协定，我们必须力求公开，力求能够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讨论、宣传与解释，以取得最大多数群众的拥护。即使暂时是秘密的协定，我们也必须准备必要时的公开，凡是破坏协定的行动，我们应该向着群众申诉，使群众知道谁是破坏协定的负责者，谁是真正为协定而奋斗的人，使群众反对破坏者而拥护我们。一切统一战线的组织，如国防

政府与抗日联军,或是各党各派的人民阵线都应该在群众中进行公开的选举,并吸收群众中大批积极的、勇敢的与坚决的分子参加领导工作。

最后,共产党必须在统一战线的行动中,猛烈扩大自己的核心的组织,灵活地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联系起来。

第五,必须使统一战线成为准备与组织大规模的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主要关键。

一切抗日反汉奸卖国贼的统一战线,都应该向着一个目标前进,即是准备与组织大规模的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以致取得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共产党员首先应该在思想上在实际上证明中国的有力抗日,揭破各种各样中国无力抗日的亡国奴的理论。有这样众多的人口中国,有这样广大的土地的中国,再加上誓死奋斗的勇气与决心,那抗日战争是必然会胜利的。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共产党员在开展统一战线的斗争中应该把斗争提高到武装人民的阶段,提高到人民的武装自卫队伍的组织的阶段。没有这些人民的武装队伍,抗日战争是不能有力的开展并使之得到胜利的。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共产党员应该把争取白军的官兵到抗日战线上来,在目前形势下当做比职工运动还要来得重要的任务,没有几百万白军官兵的参加,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将发生极大的困难,这是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的统一战线应该同时并进与互相配合。只有当对方成为抗日友军或可能成为抗日友军时,我们才能不使下层统一战线走到反对压迫与阻止抗日运动的军阀的起义。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共产党员应该推动一切抗日反汉奸卖国贼的斗争,走向抗日的人民政权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建立。没有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大规模的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展开是不可能的。

估计到中国革命形势的存在,苏维埃与红军的胜利,以及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产生的主要条件是:(一)某些地区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已强烈地麻痹化了,因而无力阻止这种政权的建立,(二)最广大的群众已经狂热的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但还未进至争取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三)一部分愿意抗日的当权者与广大群众公开要求同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联合一致抗日讨……^①

显然的,这些条件正在迅速的成熟着。抗日反汉奸卖国贼的统一战线愈是扩大,愈是坚强有力,则这些条件的成熟愈是迅速,而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产生也必愈快。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与红军应该以争取迅速对日直接作战,作为自己的当前任务。苏维埃与红军在实际行动中表现他们是抗日的先锋队的时候,他们才能成为整个中国人民在解放斗争中的团结的中心。

最后共产党员在准备与组织大规模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应该为学习如何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掠与保卫中国的防御的口号下组织进攻,在进攻中知道如何巩固自己的阵地,如何组织源源不绝的后备军走上前进阵地,如何使先锋队与后续队密切的联系起来,并且同可能发生的保守主义或冒险主义做斗争。抗日战争不是几天几个月就能决定胜负的,这是一个持久战。在这中间我们应该运用一切作战的方式,以对付顽强的敌人,以取得最后的胜利。

第六,必须在党内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中以保障统一战线的正确执行。

共产国际七次大会决议指出:“统一战线的确实的建立,要求着共产党员克服自己队伍内的高慢的宗派主义(即关门主义)。”

^① 原文此处不清楚。

中央的十二月政治决议同样指出：“为了更大胆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以争取党的领导权，党必须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做坚决的斗争。”

共产国际的决议更指出：“高慢的宗派主义在现在的许多时机内与许多场合中已不是共产主义的幼稚病，而已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罪恶。”同样，中央的决议上也指出：“在目前说来，‘左’的关门主义，是党的主要危险。”

共产国际与中央的指示，一直到今天依然是完全正确的。

不去克服“左”的关门主义或高慢的宗派主义我们决不能以最大的决心与勇气去创立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中国党在创立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中已经得到了初步的成绩，然而在许多地方对于统一战线的策略还表示怀疑、犹豫与恐惧，似乎统一战线的门一开什么复杂的分子都会跑到里面来，使我们无法领导运动走上正确的革命的道路。显然的，这种怀疑、犹豫与恐惧的根源，正是关门主义或高慢的宗派主义。这种关门主义或高慢的宗派主义正是表现在不会拿群众的领导方式去代替狭窄的党的小组领导方式，拿领导群众的艺术去代替抽象的宣传与“左”的教义，拿适合于各地具体环境的口号与策略去代替不顾一切具体环境的口号与策略的公式化与机械化，以推动与率领各种各样复杂的人民群众走上抗日反卖国贼的阵地上。

此外，也像国际决议与中央决议所指示的，当我们大胆的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时，我们应该严密的注意到右倾危险的各种各样具体形态的表现。这种右倾的每一表现都会使统一战线的策略成为降低或甚至放弃党的领导作用的投降的策略，因此同时也成为关门主义者或宗派主义者用来反对统一战线的策略的彻底执行的口舌。

所以在大胆的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时，我们应该不断的纠正一切可能发生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种纠正丝毫不

是为了恐吓同志们,使他们对于统一战线的策略发生怀疑、犹豫与动摇,而是要帮助与教育他们更有把握的去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使他们坚决的自信他们是能够抓住这一统一战线的策略的中心环节,来完成党在目前形势下所给与[予]他们的伟大的历史的任务!

共产党员必须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学习如何正确的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错误是免不了的。但错误决不能使我们消极。我们要在积极行动中学习,要在积极行动纠正一切可能发生的错误,大踏步的勇敢的前进!

(录自《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 1985 年版。)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

(1936年4月25日)

中国国民党、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党、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中华民族解放委员会、中国大众生产党、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同盟、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回教徒联合会、全国公教联合会、全国青帮、红帮、哥老会、理门、全国学生联合会、全国总商会、全国邮务总工会、全国律师工会、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妇女界救国会、世界语学会、上海大众生活社、上海世界知识社、中苏文化协会、中山文化教育馆、平津新闻学会、平津抗日同志会、北平独立评论社、北平教职员联合会、北平自由评论社、旅平东北同乡会、南京留俄同学会、黄埔同学会、励志社、复兴社、边疆评论社、蒙藏学校、广东明德社、西安东望社、复东社、太原中外论坛社及全国各党、各派、各报馆、各军队、各工会、各农会、各商会、各学生会、各团体、各会社、各帮、各业的全体同胞们！

中国共产党年来为抗日救国而奔走呼号，而艰苦奋斗，其精诚保国的决心，谅早为全国同胞所洞悉。不久以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东征，更给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以当头棒喝，响应了全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了全中国人民以极大的鼓励与振奋。但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全中国各党各派的共同奋斗，全中国人民及武装部队的总动员，我们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以致命的打击，而取得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

因此,在全中国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向全中国各党各派郑重宣言:不管我们相互间有着怎样不相同的主张与信仰,不管我们相互间过去有着怎样的冲突与斗争,然而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都是中国人,抗日救国是我们共同的要求。为抗日救国而大家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是所有我们中国人的神圣的义务!

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以至诚特向全中国各党各派提议:创立抗日的人民阵线,以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盗匪们的长驱直入,以反对汉奸卖国贼丧心病狂的无耻行为。并提出下列条件作为共同行动的纲领:

(一)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讨逆。

(二)全国红军与全国海、陆、空军集中华北打日本。

(三)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四)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信仰的完全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五)实行外交公开。

(六)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与国家。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欢迎各党各派的中央与地方组织,能接受我们的提议,互派代表同我们与我们的地方组织共同协商具体进行办法,组织各党各派的中央的与地方的行动委员会,以创立中央的与地方的抗日的人民阵线,为上述的纲领的彻底实现而奋斗。

各党各派抗日人民阵线万岁!

中华民族的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选自《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

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1936年5月5日)

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体海陆空军，全国各党、各派、各团体、各报馆，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同胞们：

自从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渡河东征以来，所向皆捷，全国响应。但正当抗日先锋队占领同蒲铁路，积极准备东出河北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之时，蒋介石氏竟以十师以上兵力开入山西，协同阎锡山氏阻拦红军抗日去路，并命令张学良、杨虎城两氏及陕北军队向陕甘红色区域挺进，扰乱我抗日后方。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先锋队，本当集中全力消灭蒋氏拦阻抗日去路的部队，以达到对日直接作战之目的。但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且在蒋介石、阎锡山两氏的部队中，不少愿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军人，目前接受两氏的命令，拦阻红军抗日去路，实系违反自己良心的举动。

因此，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进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每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仍然将人民抗日先锋队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在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

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诸公进言，在亡国

灭种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的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语云:“千夫所指,无疾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诸公深思熟虑之。

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更号召全国凡属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团体、党派、人民,赞助我们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促进会,派遣代表隔断双方火线,督促并监视这一主张的完全实现。

(录自《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

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

——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6年6月20日)

中国国民党二中全会全体执监委员先生们：

当着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的最后一瞬间，我们已顾不得你们对于我们怀着何等深刻的仇怨，还是集中全力向红军和苏区进攻，并在全国各地拘捕杀戮我们的同志，为了集中全国的力量，以挽救伟大的中华民族之灭亡，我们在屡次提议停止内战合作御侮救亡被你们拒绝之后，再一次的向你们正式提议：立即停止你们与我们之间互相残杀的内战及一切仇杀的行为，并立即联合起来，为挽救中国民族的灭亡进行神圣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保卫中国，驱逐华北、内蒙的日兵并收复东北失地。

一切对外投降、退让与不抵抗的政策，是招来亡国灭种大祸的根本原因。为要挽救中国民族的灭亡，只有立即动员全国对日武装抗战。这已经是不可争辩的真理，全国民众一致的要求。你们对于这个极明显的真理，当然比别人看得更明白。然而你们政府的负责人，如果不是甘心背叛伟大的中华民族，为什么不立即动员全国对日武装抗战？为什么要用一切力量去阻止与镇压其他军队和全国人民对日抗战？为什么尽撤华北、内蒙一切的军队和党部，继续承认日本一切无理的要求，对日屈辱退让到底？

你们中有人说：“红军妨害你们抗日”。然而红军从“九一八”以来，已屡次宣言，向你们及全国各党派和军队提议：“愿意抛开一切仇怨，与你们联合一致抗日。”你们为什么屡次拒绝红军的这个

提议?为什么继续集中全国的军队和资源去进攻红军,阻止红军抗日?

我们现在再一次向你们及全国民众宣言: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立即动员全国对日抗战,并实现民主自由与制裁汉奸,我们和红军不仅不妨害你们抗日,而且用一切力量援助你们,并愿和你们密切合作。

我们欢迎贵党领袖冯玉祥先生的抗日言论与李宗仁先生的抗日主张;我们同意贵党西南执行部及许多领袖的抗日救国通电;我们拥护西南抗日救国军的动员令与改编;我们还欢迎国民党中任何领袖任何党员来参加与领导抗日救国的神圣战争!

我们愿意以全力支持西南诸领袖抗日救国的英勇事业,只要西南诸领袖坚决执行抗日反汉奸的政策到底,并实现民主自由。我们愿意在一切抗日反汉奸的斗争中与西南诸领袖密切合作。今后国民党中任何领袖任何委员起来抗日救国,我们同样愿以全力支持他们。

我们与红军不妨害任何人抗日救国的行动,我们坚决拥护全国抗日领袖与抗日民众诚意的团结起来实现中国的统一。

我们认为用“破坏统一”与“内战”的罪名,去责备西南抗日的英勇行动,是无理由的。如果没有人执行帝国主义的意志用武力去阻止西南的抗日行动,内战就不会发生。而国家的真正统一,只有在全国对日抗战的一致中才能求得。我们反对强迫西南取消对日抗战来实现统一,但我们赞成南京及全国各地,立即宣布对日作战去与西南统一。因此我们反对任何进攻西南的军事行动!

不立即动员全国对日作战,国家任何形式上的统一纲纪,都是不能维持的。因为政府任国家沦亡而不急起挽救,且多方镇压人民的救国运动,这就是政府最大的背叛国家民族的行为,就是严重的破坏了国家民族的纲纪。人民对这样的政府,是再没有义务来遵守他的法律命令,人民为着救国有权利来推翻这样的政府。

对日立即抗战与否？是目前解决中国内外一切问题的关键。现在已经到了决定问题的最后一分钟。日本帝国主义也已明白的告诉你们：“你们只有在投降与抗战中找一条路走”。如果有人决心要走投降的可耻的死路，那我们不去说他，让他去继续“剿共”与“讨伐西南”，在各种借口之下消灭(?)他一切的政敌与抗日的力量，让他去继续对日“提携”“合作”，用“长期抵抗”、“秘密准备”、“等待机会”等言词去欺骗民众。

然而民众是要走着抗战的生路的，民众也热烈的盼望你们之中任何人走上抗战的生路。这就要求你们立即接受西南抗日救国的请求与我们对于你们的提议，立即停止进攻红军与对西南的军事监视，立即将军队开入华北内蒙对日作战，肃清汉奸，废除一切屈辱的条约，并立即实现民主自由，释放政治犯，另颁民主的宪法，召集全国各党各派的救国会议，组织抗日的国防政府，联合苏联与世界一切的反日力量。只有这些要求的完全实现，才能团结全民族的力量，取得全国民众的拥护与世界反日力量的帮助，创立最强有力的威权政府，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我们相信贵党有不少的军政领袖与党员，同样是中华民族最好的子女，没有忘记孙中山先生伟大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精神，能够为中国的自由平等而英勇奋战。我们盼望这一切的民族英雄与忠诚的爱国志士，立即同我们诚意的携手，抛开以往一切的仇怨，在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神圣事业中共同奋斗！我们随时都准备同贵党任何组织、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军政领袖进行关于合作救国的谈判。我们伸着手向着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人们！

我们盼望你们对于我们这个诚恳的提议给以善意的考虑！我们等候你们对于我们这个提议的任何答复！最后，向你们致以民族革命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录自《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 1985 年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电报

(1936年8月15日)

得悉你们1935年12月25日决议^①与电报内容后,我们基本同意你们通过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②不过我们认为,贵党和红军的领导应当清楚地认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质和特点,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会给中国劳动人民带来致命的后果。

1.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前提,绝不是削弱苏维埃,把红军融合在共同的抗日军队中,把共产党融合在中国某一个一般性的政治组织中。

在政治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当是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其他团体之间在保持各自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独立的情况下,在共同的抗日立场上的联合。在军事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该是红军和其他武装力量愿为组织抗日联军而实行的联合,同时,各武装力量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对所在的战区负责,但为完成总军事

① 即瓦窑堡会议决议。——原编译者

② 1935年12月25日,当时设于陕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了解到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建议后,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中明确了组织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然而,决议也不乏极为矛盾之处。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当时日本侵略者是主要敌人这一点提出了不仅能争取各路军阀而且能争取蒋介石的各派系都来参加统一战线的问题。

计划中的任务均应服从统一的指挥。国防政府应当是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政党与团体的名副其实的代表机构。

我们特别强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的前提是想尽各种办法巩固党和红军。因此,你们决议中的一些话使我们殊感不安。决议中说,一切愿意入党的人,不管他们的社会出身如何,都可以入党,^①“党不惧怕某些投机分子的侵入”^②。你们的报告中甚至还说要接纳张学良加入共产党。^③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维护党的队伍的纯洁性与党的团结。要有步骤地吸收党员,特别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加强这一工作,同时,必须避免大批接纳党员的做法,应只把工农和学生中优秀的信得过的分子吸收入党。

我们认为,不加选择地把大学生和其他军队的[旧]军官吸收到红军中来,也是错误的,因为这会破坏红军的统一与团结。

我们同意你们的看法,即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应该对过去的经济政策作一些重大改变:停止不必要的没收,特别是不再没收出租土地的小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不再没收积极参加抗日的官兵的土地;允许自由贸易。

不过,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允许有产阶级的代表参加苏区的政治管理是不对的,因为他们会从内部破坏政权机关。

2. 中国现时的国内外形势向党提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保卫中国领土完整和防止中国人民完全沦于殖民奴役这一直接的最重要的任务。

鉴于这种情况,适当的做法便是由中国共产党声明:它主张建

① 瓦窑堡会议决议中这段话的原文是:“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见《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44页。——原编译者

② 同上书,第745页。——原编译者

③ 1936年春,中共中央领导曾与张学良密谈,结果是张停止了进攻红军的军事行动。

立全国统一的民主主义共和国；在普选的基础上召开全国的国会；建立全中国的国防政府。在目前条件下，这是团结中国人民的一切民主力量保卫祖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好的办法。

中国共产党还可以声明，在建立全中国的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过程中，苏区将纳入全中国统一的民主主义共和国之中，将要参加全中国的国会，并在苏区实行适用于全中国的民主制度。

3. 我们认为，把蒋介石与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①是不对的。这个观点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主要的敌人，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此外，不可能左右开弓，既顺利进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又顺利进行反蒋斗争。^② 同样，也不能认为整个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军队全都是日本的同盟者。要真正武装抗日，还必须要有蒋介石或他的绝大部分军队参加。

根据这种情况，应该采取的方针是：停止红军与蒋介石军队间的军事行动，同蒋军达成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具体协议。必须这样做，尽管蒋介石和国民党至今依然害怕同任何人缔结抗日协定。

我们觉得，为了做到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首长必须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立即开始停战谈判和签定共同对日作战协定的建议。共产党和红军首长应该说明愿立即派代表团前去谈判或者在苏区接待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团。

在谈判中应予讨论的我们的要求大致可如下述：

1) 停止内战，联合中国人民的一切武装力量真正抗击日本侵略者。

① 瓦窑堡会议决议中是这样说的：“因此，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六大以来》（上），第737页。——原编译者

② 类似的提法见上引书第736、737、740、741页。——原编译者

2)建立总指挥部,制定对日作战的总计划,同时保存红军在政治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红军负责对日作战的某些战区。

3)向红军提供相应的根据地和必要的武器装备。

4)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地区停止对共产党员的迫害。

如果蒋介石不顾谈判的建议,不理睬我们为签署协定而作出的一切努力,仍继续攻打红军,那么红军就应被迫自卫,回击蒋介石部,同时继续活动,继续为同国民党及其军队联合、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

我们认为,你们号召西南军阀反蒋的那个宣言是不正确的。从政治上说,最正确的做法莫过于坚决反对进一步加剧日本帝国主义者挑起的内战和集中火力抗日。

4. 建议你们把你们提出的“立即对日宣战”的口号也加以改动。你们的口号应该揭示日本帝国主义现在进行的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和中国人民斗争的防卫性质。因此最好提出“日本侵略者滚出中国去”的口号,提出保卫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中国人民要自由的口号。

5. 必须保持同张学良的联系,利用他在他的军队中开展我们的工作,加强我们在他的各个部队中的地位,对士兵群众和军官广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不过,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作可靠的同盟者。特别是在西南失利之后,张学良完全可能发生动摇,甚至会直接背叛我们。

我们正等待你们的代表前来,以便详细讨论你们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并给予全面回答。

书记处
据档案刊印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1936年8月25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诸位先生并转中国国民党全体党员大鉴：

自从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发表抗日救国宣言以来，忽已一年多了，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倡议组织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界一致抗日的主张，虽然得到了全国爱国领袖与爱国人民的拥护，但因贵党及贵党政府迟疑不肯采纳，致使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直到今天还未发动。而日寇则已乘虚直入，得寸进尺，沦亡惨祸，迫在目前，全国彷徨，不可终日。这种全国全民族的绝大危险，完全是由于贵党及贵党政府的错误政策所招来的。现在是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了，本党不得不向贵党再一次的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如果你们还要继续内争，不把向内的枪口转到向外，不把退让的政策转到抗战，不把分离的局面转到团结，不把涣散的情况转到统一，则祸患之来，不堪设想，而诸位先生千秋万世的罪名，亦将无可以挽回。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特以诚恳的态度致书以诸位先生及中国国民党全体党员之前。

读了贵党二中全会宣言及蒋委员长的报告之后，认为贵党二中全会对于全国人民日夜焦虑的救亡图存问题，依然没有肯定的答复，对贵党五中全会“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的对外政策，并没有作彻底的改

变,这对于全国爱国人民,不能不是非常失望的。

蒋委员长的报告,曾经对贵党五全大会的政策作了新的解释,说:“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害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蒋委员长的这种解释是非常需要的,因为中国人民始终不了解如何方可称为“和平的绝望时期”与“牺牲的最后关头”的最低限度。我们承认蒋委员长的这种解释,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我们诚恳的欢迎这种进步。然而蒋委员长的这种解释,基本上依然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因为蒋委员长在自己的报告中,又认为:“半年来外交的形势,并未达到和平绝望的时期,与其说是绝望,反不如说是这半年来较之以前的形势还有一线希望,我敢说最近外交的途径,并未达到最后关头。”因此蒋委员长依然不愿提出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依然拒绝了立即发动神圣的抗日战争,以阿比西尼亚的失败为藉口,继续了自己的退让政策。这是非常可惜的,这是非常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的。在全国人民看来,东北四省的沦亡,察哈尔大部的失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猖獗,冀察政委会的傀儡化,日本大军的进驻冀察,华北经济权的丧失,泛滥全国的公开走私,民族工商业的陷于绝境,国家财政的趋于破产,海关权的破坏,华北以至西北各省日本特务机关的遍设,日伪蒙军对于绥远的大举进攻,内蒙独立政府的成立,敌机在我领土上无限制的飞行,日本浪人的横行无忌,学生爱国运动与人民爱国言论遭受日寇直接间接的干涉,大批工农群众的遭受屠杀,许多爱国人民,爱国军人,爱国警察,爱国记者,甚至许多贵党的要员与贵党的官吏,无不遭受不堪的侮辱,守土军队的被迫撤退,青岛的告警,华南自治运动的策动等等,无一而非中国领土主权的极大损失。

在全国人民看来,《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华北防共协定》,以及其他没有宣布的成文与不成文的协定,无一不是丧权失地的条约。因此在全国人民看来,和平早已绝望,牺牲早已到了最后关头,除了发动全国人民全国武装力量的坚决的自卫战争外,中国领土主权的全部沦亡是无法挽救的。

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强盗计划,除了动员全中国的力量给以坚决的击破之外,是决不会改变的,它的侵掠方式的变换,侵掠方向的转移,以及所谓“经济提携”的表示,丝毫不是因为他要停止侵略,而正是为了便利于侵略。所以如果以为冀察进兵之后,日寇一时着重于华北五省的经济侵略,而即以为和平途径有了希望,这是自欺欺人之谈。如果以为日寇的侵略会停止于黄河以北,而我们可偏安于黄河以南,也是完全的幻想。看吧,正在先生们高谈和平尚未绝望的时候,察北的日伪军又大举向绥远进攻了。绥远、宁夏、内蒙、甘肃各地遍设特务机关之后,又在这些地方建立航空总站与许多分站了。在四川强设领事馆,激动了残杀爱国同胞的巨变。华北增兵之后,凶横的日军蠢蠢欲动,29军的防线时有小接触,华北局势日趋险恶。日寇军事考察团经济考察团等侦察集团遍行各地,无孔不入。日寇的侦探网遍布全国,并且遍布于贵党、与贵党政府的各种组织中。所有这些,只是指明日寇灭亡中国的形势,是十分危险!和平绝不可能,抗战绝不可免,已经是明白无疑的事实,先生们的想法是完全错了。

贵党二中全会宣言中曾郑重申说:“御侮之先决条件,乃在集中一切救国力量于中央指挥之下,齐一其步调,巩固其阵线,故御侮救亡需求统一与纪律,实为不可动摇的铁则,而军政军令之统一,尤为近代国家之最低限度”。我们完全承认为了发动全国人民的最大抵抗力量,为了取得抗战的彻底胜利,集中与统一全国的救国力量,是绝对必要的。还在九一八事变时,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即已号召全国人民与全国军队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

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曾向围攻苏区的所有贵党及贵党政府的武装队伍提议，立刻停战议和，共同抗日。华北事变之后，我们又提出了迅速组织全中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最广泛抗日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无数次的请求贵党及贵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提议立即召集由全国人民及全国愿意抗日的武装队伍选举出来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抗日救亡大计，由此大会选举统一全国的国防政府与组织抗日联军，实行大规模的抗日战争。并坚决声明苏维埃政府愿意成为这样的国防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红军愿意服从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指挥，担任一定的战线，并保证每一作战任务的完成。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的所有这些主张，是完全符合于全国人民的要求的，是救亡图存唯一正确的政策。全国人民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要求停止内战，集中统一，以便一致抗日的了。只有日寇及其代理人，才会煽动中国的继续分裂与继续内战，因为这只能给日本强盗造成灭亡中国的条件。

然而贵党二中全会所说的“集中统一”，实在未免本末倒置。须知十年以来的内战与不统一，完全是因为贵党及贵党政府依赖帝国主义的误国政策，尤其是“九一八”以来一贯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在贵党及贵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之下，进行了连年不绝的内战，举行了无数次对于苏维埃红军的围攻，不遗余力的镇压了全国人民的爱国运动与民主运动。直至最近，还是放弃东北与华北不顾，忘记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的最大敌人，而把一切力量反对苏维埃与红军，从事贵党自己营垒之业，放在坚固不拔的基础之上，否则任何好听的名词，均决然无补实际，决然不为全国人民所同意，贵党及贵党政府历来所召集的各种会议之失败，就是最好的明证。

贵党二中全会宣言又说：“险阻之来，本可意计，断不因国事之艰虞，而自懈其应尽之职责”；“本当对于国家兴亡，必当尽其心思

才力,贯彻始终”。诚然,贵党是中国最大部分领土中的统治的政党,一切过去实施的政治责任,不能不由贵党负担。在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府之下,国民党决不能逃避其责任。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来,贵党违背全国民意,违背全民族利益,执行了绝对错误的政策,得到了丧失半个中国的结果,这个责任是绝对不能推诿于任何别人的。然而在我们及全国人民看来,半个中国由贵党而沦亡,决不能不课督贵党以恢复领土主权的责任。同时贵党中许多有良心的分子,现在也确然憬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而开始了新的转变,开始了对于自己党中祸党祸国分子之愤怒与不满。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情于这种新的转变,热烈的欢迎这些有爱国心的有良心的,保存着并正在激发着中华民族英雄气概的中国国民党员的志气与觉悟,欢迎他们在民族危亡面前愿意牺牲奋斗与勇于革新的精神。我们知道,在贵党中央及各省党部中,中央及各省政府中,在文化界,在科学界,在艺术界,在新闻界,在实业界,在妇女界,在宗教界,在医药界,在警察界,在各种民众团体,尤其在广大的军队,国民党的新旧党员与各级领袖中,实在有很多觉悟与爱国之士,并且这样的人还在日益增加着,这是非常可喜的事情。中国共产党随时准备着同这些国民党人携手,组织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反对全民族的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希望这些国民党员能够在国民党中迅速形成一种支配的势力,去压倒那些不顾民族利益实际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代理人,实际成为亲日汉奸的最坏与最可耻的国民党员——那些侮辱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精神,重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农工三大政策,把自己的“心思才力”去“贯彻”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的“始终”,“贯彻”孙中山先生革命遗嘱的“始终”,坚决的担负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责任,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爱国领袖与爱国人民一道,坚决的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挽救中国于危亡而斗争,为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利而斗争,为发展中国国民经

济解除最大多数人民的痛苦而斗争,为实现中华民主共和国及其民主国会民主政府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向一切中国国民党人宣言:假如你们真正这样干的时候,我们坚决的赞助你们,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 1925 至 1927 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诸位先生及国民党全体党员,还没有忘记上次大革命时两党合作的光荣历史吧。因为有了这个合作,一切民族压迫者与封建压迫者,都在我们面前发抖起来了。那时的民族压迫者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深悉我们的合作会要进到彻底的胜利,会要使中国得到完全的解放,他们就挑拨离间,威迫利诱,无所不用其极。而且终于挑动了合作的一方,葬送了这个第一次的统一战线。先生们清夜扪心,也应该喟然兴叹吧。现在是谁也明白,如果那时中国国民党,能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到底,那中国就绝不会有像现在这样任人宰割沦亡及半的惨状,而决然是独立自主的中国了。现在全国人民盼望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之心是迫切到了万分。他们相信,只有国共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然而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则一定会又一次的来破坏这种合作,因为他们明显的知道,这种合作会要给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们以致命的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向贵党政府提出的以“防共”作中心的所谓“三大原则”,就是这种预防及准备破坏国共合作的企图。但是问题是很明白的,还是同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们一道,建立防共统一战线即亡国统一战线呢?还是同中国共产党及全国人民一道,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即救国统一战线呢?现在是已经到了决定的关头了,一切犹豫动摇,只是国家民族的损失,只是成全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国共合作的关键,现在是在贵党的手中。诚如贵党二中全会所说:国家兴亡贵党有责,

如果贵党真正愿意担负救亡图存的责任,那末现在是要下决心的时候了。等到做了亡国奴的时候,再讲什么合作,那就会悔之无及了。至于我们方面,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的遵守这个协定。

假如你们同我们的统一战线,你们我们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统一战线,一旦宣告成功的话,那末你们我们及全国人就有权利高呼,让那些汉奸卖国贼以及一切无气节的奴才们,在日本帝国主义暴力前面高喊中国无力抗日吧,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子孙是誓不投降,誓不屈服的。我们要为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最后一点一滴血!中国决不是阿比西尼亚!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华民族,终会有一天,在地球上的东方,雄壮地站起来,高举着民族革命最后胜利的旗帜,同全世界一切自由解放的民族携手,连那个帝国主义成分除外的日本民族也在内,统治着整个的地球,统治着光明灿烂的新世界。让我们的敌人在我们的联合战线面前发抖吧,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专此谨致
民族革命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录自《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

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 民主共和国的决议

(1936年9月17日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通过)

(一)日本帝国主义自去年策动华北独立以来,对于中国的侵略没有一刻停止的,不论它侵略的方法与方式怎样(随)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然而它并吞全中国的基本政策,是始终不变的。在华北进兵之后,高唱着的“经济提携”实际上不过是以经济的侵略与方法巩固已得的阵地,并给新的进攻准备基础。平津与察北的增兵,绥东的进攻,城[成]都,北海,海口,上海丰台等地的挑衅,表示出日寇的新侵略行动又将开始。民族危机,较之过去,是更加严重了。这指出保卫华北,保卫西北,保卫中国,收复东北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民族革命战争的任务,更加严重的放到革命政党与全民族身上了。

(二)一年来全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广大发展,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发动,已经给了日寇侵略计划以相当的打击,暂时的阻止了日寇建立“华北国”与建立“防共统一战线”的实施,这是中国人民一年来抗日救亡运动的胜利。然而由于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还不够广泛,他的力量还不够雄伟,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有组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时还[不]仅在开始的阶段,最大的政党——国民党及其领导与影响下军队还没有参加这个战线,国民党的政策还没有基本的转变,因之,民族革命战争还没有能够发动,以致我们不但没有能够停止日寇的继续侵略与保持中国领土主权的再不受到损害,而且日寇不[还]巩固了他在华北的地位,获

得了对于中国领土主权的新的侵占,并准备新的大举进攻。这证明:日本帝国主义是能够战胜的,但是需要全中国各党各派各军各界的共同行动与艰苦卓绝的奋斗。

(三)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进攻之下,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现在已竟[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主要的表现在全国工农小资产阶级广大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继续增长,中国共产党苏维埃红军抗日救国主张的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的赞助与全国主力红军的集中于西北抗日前进阵地,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开始转向抗日战线,国民党军队官兵中广大成分抗日情绪的增长,和在这些基础上产生的国民党及其南京政府分化与动摇。国民党南京政府内外政策的摇摆不定,其言行的自相矛盾,与其各派间关于抗日问题上的争论,明显的表示出他现在是在动摇的中间。在日寇继续进攻,抗日救亡运动继续发展,国际形势新的变动等条件之下,国民党南京政府有缩小以至结束其动摇地位,而转向参加抗日运动的可能。

(四)为着集中全国力量去抵抗日寇的侵掠,驱逐日寇出中国,我们不仅要收复[集]更广泛的民众的力量,和一切真正革命的,觉悟的纯洁的分子,而且要争取统治阶层中一切可能的部分到抗日斗争中来,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扩大起来,更加增强自己的阵容与力量。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是实行全国性大规模的严重的抗日武装斗争之必要条件。但这绝对不应放松对于国民党南京政府一切违反民族利益的错误政策的严厉的批评与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使]国民党南京政府内部的抗日倾向日渐发展,扩大抗日分子的影响,克服其本身的动摇,战胜亲日派,而走向抗日救国的大道。中央必须着重指出:共产[党]在为着实现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中不但对于统一战线之公开的或秘密的敌人,应该进行严厉的斗争,而且对于口头上赞成而实际上消极的假抗日分子,以及各种各种[样]的同盟者,应该保持

批评有完全自由。同时中国共产党赞助一切真正的抗日战争之发动，即[使]这种发动是部分的。但是主要的，应用尽一切方法与力量，最迅速的促进与[组织]大规模的全国性的真正对日武装抗战。为此目的，共产党应继续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反对一切在民族危亡面前自相残杀的内战。

(五)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式[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残[惨]祸的最好方法，而且这也是从广大的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苏维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因此便更能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同时民主共和国不但能够使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而且也给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首领共产党为着将来的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以自由活动的舞台。因此中国共产党宣布积极赞助民主共和国运动。并且宣布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建立，依据普选权的国会实行召集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将成为他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将选派代表参加国会，并将在苏区内完成同样的民主制度。

(六)中央着重指出：只有继续开展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扩大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作用，极大的巩固苏维埃与红军，同一切丧权辱国及削弱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言论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方能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走向抗日，才能给民主共和国的实现准备前提。没有坚苦的持久的斗争，没有全中国的人民的发动与革命的高涨，民主共和国的实现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在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过程中，应该使这个民主[共]和国从实行本党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开始，一直到中国民主资产阶级

革命的基本任务彻底的完成。

(七)去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决议上所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大半年来党在执行这一总路线下,虽然得到了许多成绩,主要的在于苏维埃红军的力量是加强了,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是扩大了,向各党各派各界各军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是进步了,这些成绩应当成为今后工作的有利基础。[但是]许多党的组织极不善于具体的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派别,每一个社会团体,每一武装队伍,每一阶级与阶层,常常不善于根据他们不同的情况,不同的需要与要求,在抗日救国的总方针下,同他们接洽协商,谈判,以求订立各种地方地[的],局部的,暂时的,或长久的,成文的,或口头的,这种具体实际的行动纲领,并在为着实现这些纲领的共同斗争中,引导推动与组织他们走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全国抗日救国代表会议(或国防会议)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以至民主共和国。我们许多党的组织不善于这样做,而仅仅满足于一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满足于少数先进分子的活动,以抽象的,刻板的与机械的方法方式去对付各个具体的问题。同时在统一战线一时不能建立的场合,却又表现出:“共产党员以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群众,动员群众与组织群众的独立工作”之放松或不足。这些弱点,是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直到今天还没有成为千千万万抗日大众实际参加的主观上的重要原因。

(八)中央认为必须及时纠正那种以为阶级斗争的发动会妨碍民族统一战线的观点。民族革命的胜利决不是少数上层分子所能完成的。不吸收成千百万工人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就不能形成抗日救国的雄厚力量,就不能推动与逼迫动摇的游移的上层分子与当权者走向真正的抗日的道路,就不能实现民主共和国。而领导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日常经济政治的斗争,解决他们迫切的生活要求,是组织他们进入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关键。但在领导这种日常经济政治的斗争中，共产党员要同样的善于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吸收最广大的群众到斗争中来。并根据于他们的觉悟的程度，与组织力量，把群众的日常斗争提到更高的阶段，使这种斗争成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续扩大，继续发展与继续前进的力量，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实的基础。

(九)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实现民主共和国的斗争过程中，绝对不应该削弱苏维埃红军的力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是苏维埃红军在一定纲领上同其他政权及武装力量所成立的政治军事协定，但并不与其他政权及武装力量相混合，可以在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统一指挥之下，但并不取消苏维埃红军组织上与领导上的独立性。须充分注意于红军的扩大与巩固，那种不经过选择的允许学生及其他军队的旧军官加入红军的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样足以破坏红军的统一和团结。必须充分注意加强苏维埃的领导成分，那种允许资产阶级参加苏区政治管理的意见，也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可以从内部来破坏苏维埃机关。即在民主共和国建立之后，共产党也决不放弃对于苏区人民与原有武装力量的绝对的领导，相反的，党在坚决领导全中国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与日常经济政治斗争中要坚持着扩大与巩固自己的政治的与军事的力量，保障抗日战争与民主共和国之彻底的胜利，争取社会主义前途的实现。

(十)扩大与巩固共产党，保障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完全独立性，和内部的团结一致性，是使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主共和国得到彻底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因此在苏区内特别在非苏区内有系统的征收党员是非常必要的，但必须避免大批入党的办法，而只吸收经过考察的工人农民与革命知识分子入党。在这个意义上，去年中央十二月决议中“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的社会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与“党不怕某些投

机分子侵入”的意见是不正确的。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采取实际办法培养党的工作干部,因为不论在苏区与非苏区,在彻底实现党的政治路线上,有独立工作能力的优秀干部,有着决定一切的意义。动员成千成万的共产党员到一切无组织与有组织的群众中去争取千百万的群众在自己的周围,正确的建立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是中国共产党在为着完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政治[任务]面前一刻不可放松的任务。在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过程中,对于忽视党的政治上与组织上的独立性,忽视巩固苏维埃与红军,放松对于广大下层群众的日常经济政治斗争的领导,对同盟者批评不够等等右的机会主义倾向必须及时的给以纠正。但在目前说来“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依然是彻底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主要的危险。正确的党内思想斗争的发展,将是完成党的一切政治任务的有力武器。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

(1937年1月20日)

鉴于中国国内外形势豹变,特别是日本侵略咄咄逼人,你们是否认为在你们割据的地区放弃苏维埃制度转而在民主的基础上采取人民革命的管理制度是适当的、及时的?

这首先意味着:1)把苏维埃政府改为人民革命政府;2)把红军改为人民革命军;3)只在城市中心保留苏维埃,但不将其作为政权机关,而作为群众组织;4)放弃普遍没收土地的做法。

在方针上做这样的改变是否会有助于中国人民一切力量联合救国的事业和建立全中国的民主主义共和国的事业?

请你们极其认真地考虑和讨论这个问题,将你们的意见报来,尔后在这里也要仔细讨论这个问题。

书记处
据档案刊印

(载《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莫斯科1986年版。)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

(1937年2月5日)

我们觉得,你们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①最好仅限于申明共产党和红军的决心:支持国民党和南京政府一切旨在停止内战、集中国力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措施。说明共产党和红军愿意同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签署协定,以便本着民主原则改组苏区的体制,在承认南京政府为全中国的政府的基础上调整南京中央政府和苏区政府的关系。

建议你们暂时不要就我们在苏区政策上的根本改变作具体声明。这个问题要予以认真讨论,要求各党派、接近我们的人士和人民群众对我们政策的急剧转折做好最充分的准备。祈速告为此而采取的措施。

书记处
据档案刊印

(载《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莫斯科1986年版。)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① 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于2月10日发出。——原编译者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 就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事致中国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

(1937年3月5日)

我们觉得,对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决议大致可用以下形式给予回答:本着中国人民渴望国内和平团结抗日的心愿,中国共产党愿意以三中全会提出的条件为基础,为调整两党相互关系和两党合作以准备与实施共御外侮而开始具体的谈判。红军和苏维埃改名并受军事委员会和中央政府统一指挥等,此前已在中国共产党给国民党全会的电报中做出规定。至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过去也没有认为是不能接受的,并且党现在愿意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的实施而奋斗。至于阶级斗争问题,中国共产党已不止一次地证明,本党真诚渴望与中国各阶层人民结成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侮。为此目的,中国共产党已不止一次地呼吁停止内战,自愿宣布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等等。

书记处

据档案刊印

(载《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莫斯科1986年版。)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中央关于同蒋介石谈判经过 和我党对各方面策略方针 向共产国际的报告

(1937年4月5日)^①

国际书记处：

(甲)恩来从杭州见蒋回来，其经过如下：

(子)关于谈判内容，我方以书面提出者有下列各项：

第一部、共产党方面承认：

(一)拥护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

(二)取消暴动政策及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运动。

(三)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现在红军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边区，执行中央统一法令与民主制度，其行政人员由地方推荐中央任命，行政经费另定之。

(四)取消红军名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军委及蒋委员长之统一指挥，准备国防需要时调赴前线参加作战，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统照国军同样待遇，其各级军政人员由其部队长推荐呈请中央军委任命。

(五)改编现在红军中之最精壮者为三个国防师，计六旅十二个团，及其他直属之骑兵、炮兵、工兵、通信、辎重等部队，在三个师上设某路军总部。

① 本文原件无年代，年代是根据本文提到恩来从杭州见蒋回来其经过如下等内容判定的。

(六)其余处置:原苏区地方部队改编为地方民团及行政区的保安队,编余的精壮人员改编为徒手工兵队担任修路工程,老弱残废由中央给资安置,红军学校俟办完本期后结束。红军中的医院工厂保留。

第二部、要国民党方面保证者:

(一)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全国停止“剿共”。

(二)实现民权,释放政治犯,在全国各地分批释放共产党员,不再拘捕共产党员,容许共产党在适当时期公开。

(三)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及选举法,使各党各派、各民众职业团体、各武装部队均能选派代表参加,以制定民主的宪法。

(四)修改国防会议条例,使国防会议成为准备与指导对日抗战的权力机关,并使共[产]党亦能参加。

(五)实行准备对日抗战工作及改善人民生活的具体方案。

(丑)恩来见蒋时,口头说明中共拥蒋的立场,系站在为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纲领上的,因此中共为表示合作之诚意特承认上述书面中之六项条件,同时要求蒋及国民党给以上述五项保证并附口头声明六点:

(一)陕甘宁边区须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

(二)红军改编后的人数须达四万余人。

(三)三个师上必须设总部。

(四)关于副佐及政训人员不能派遣。

(五)红校必须办完本期。

(六)红军防地须增加(因此六点均为在西安与顾祝同谈判到最后时的争执要点)。其次复说明中共为国家民族利益谋与蒋及国民党合作,但决不能忍受投降收编之诬蔑。对各省分裂运动,我们坚决反对,但愿蒋及南京给以机会提高他们对抗日民主的认识,以彻底实现和平统一。

(寅)蒋谈话大意:

(一)承认我们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几月来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要我们检讨过去决定,并坚守新的政策,必能达到成功。

(二)承认由于国共分家致十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的局面,但分家之责他却归过于鲍罗廷。他指出彼此要检讨过去,承认他过去亦有错误,其最大失败在没有造出干部,他现在已有转变。

(三)要我们不必谈与国民党合作,只是与他合作。一个党在环境变动时常改变其政策,但一个政策必须行之十年廿年方能有效。人家都说共党说话不算话,他希望我们这次改变,要能与他永久合作,即使他死后也要不生分裂,免得因内乱造成英日联合瓜分中国。

(四)要我们商量一永久合作的办法,恩来答以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一个最好办法,他要恩来赶快进来商量与他的关系及纲领问题,恩来再三问他尚有何具体办法,他均说没有,但要我们商量。

(五)关于具体问题,他认为是小节容易解决。他说国民大会国防会议在几个月后,我们可以参加。行政区要整个的,须我方推荐一个南京方面的人来做正的以应付各方;副的以下均归我们并由我们自己干,他不来干涉。军队人数不同我们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他决不来破坏我们部队只是联络而已,粮食接济令顾^①设法,即使永久合作的办法尚未商定他也决不再打。

(卯)总观蒋的谈话意图中心在领袖问题,他明知:

(一)共产党的独立组织不能改变(宋美龄亦承认共党可在中国公开)。

(二)共产党的国际关系不能取消。

(三)共产党不会无条件的拥护他,而他又不能满足于党外合

^① 指顾祝同。

作,故他要我们想新的办法,他认为这一问题如能解决,其他具体问题自可放松一些,否则必从各方面给我们困难,企图逼我就范。

(辰)我们现商定办法如下:

(一)我方起草一个民族统一战线纲领(以抗日十大纲领及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为共同基础),征求蒋的同意,并提议在这个纲领基础上,结合新的民族联盟(或党),包含国共两党及赞成这个纲领的各党派及政治团体,共同推举蒋为领袖。

(二)我们提出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的草案,征蒋同意,如蒋同意上述统一纲领及这一修改,我们可答应赞助蒋为总统。

(三)我们准备提出修改宪法的草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民主运动以影响蒋。

(四)对其他具体问题,我们坚持在不妨碍苏区实行民主制度及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独立领导的原则之下进行一切谈判,故对行政区的问题拟接受红军改编以四万五千人为定数,地方部队编另[另编]一万人,如此除老弱妇女外便无多余精壮青年。

(五)如基本上及具体问题上均能满意解决,则我们拟以党的名义发表合作宣言,以争取公开活动,否则拟采取拖延办法,待事变发展,以便促蒋让步。

(六)恩来俟纲领起草好后即将再度南下见蒋。

(乙)目前各方情况及我党策略方针:

(子)南京方面:亲日派的活动较以前改变了一些策略,这是反映了日本解散议会以前的外交面目。欧美派的活动较前增高。抗日派对我们虽表示好意,但迄未形成政治集团力量,对蒋亦甚畏惧。西西派是我们在民众运动中在文化界教育界的强硬对手,他们最不愿意我党公开,虽然他们并不反对合作。黄埔系分为军官系与政训系,前者较易接近,后者常捣乱我们与蒋合作。士官、保定、陆大各系中亦有接近我们者。

(丑)各省方面:东北军现已陆续开往豫皖驻防,一般的对我们

关系均好,现正力助其内外团结。杨虎城部队经改编后托派分子尚未肃清,拟再向其严重提出,否则必会分裂。阎锡山与我们有商业来往,其守土抗战主张确能深入民众,惟甚限制我党活动。宋韩^①有五省联盟酝酿,韩并向蒋提议开晋绥直鲁川桂六省会议,以解决与南京纠纷,蒋恐不会允许。我们在河北活动尚较自由。广西方面现正转坏,过去因抗日而引起的民众运动现遭受摧残,胡汉民的新国民党残余入桂进行所谓“清血运动”,所有左派分子均被排斥,其策略系反对南京容共,反对我们联蒋,有接近日本可能,民族大同盟被搯,近在香港,甚无聊。托派分子拟往勾引。川刘^②与南京冲突不致发生战争,但川刘左右极落后,在各省中欲打破其割据思想而提高到抗日与民主阶段以川刘为最难,与我们关系尚保持。

(寅)民众方面:近半年来我党影响极扩大,但无组织力量巩固之。自七领袖被捕,上海及全国救联失败后,全国统一救国运动在国民党包办下左派群众尚未能加入。许多新刊物亦尚不能经常存在,尤其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因我党尚未能经常的公开发表政治领导主张,致左派刊物在民主运动中尚不能形成有力舆论,结果不能不使《大公报》及《国闻周报》的资产阶级影响扩大。上海工人斗争颇发展,国民党力图控制,我党似有一部分下层关系,但无从指导。华北为我们学生运动根据地,惟环境复杂,对统一战线策略的运用极费力量。

(卯)我们现时在各方面活动的策略中心是为着彻底的实现全国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加紧从各方面进行对日抗战的准备工作及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运动,特别是民主运动在目前内战停止抗战准备期中更有其严重意义。也只有在民主运动中才能发展

① 指宋哲元、韩复榘。

② 指刘湘。

南京抗日派的政治团结,才能提高反蒋各省的政治觉醒,才能扩大全国的抗日统一运动,才能争取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同时也才能改变一些蒋介石的独裁观念与各省军阀的割据思想,以便于抗战的发动和胜利。

中央书记处

4月5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中共中央关于与蒋介石第二次谈判 情况向共产国际的报告

(1937年6月17日)^①

国际书记处：

恩来同志第二次见蒋谈判多日，现返西安，兹将周15日来电所述谈判结果如下：

[甲]蒋在庐山的最后表示如下：

(子)两党合作部分：

(1)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蒋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量之干部合组之，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2)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关于纲领问题，亦由同盟会加以讨论。

(3)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

(4)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可与第三国际发生代替共党关系，并由此坚定联俄政策，形成民族国家间之联合。

(丑)目前有关部分：

(1)共党根据以前申明，发表对外宣言。

(2)政府在上项宣言发表后，即发表三个师的番号，并委任师长，三个师仍照12个团编制，人数可容至4.5万人，其编制办法与顾商定。三个师以上设政治训练处指挥之。朱、毛两同志须出来

^① 原文无年代，此年代是整理档案者加的。

做事。编就后部队可移防。

(3)陕甘宁边区政府,仍由中央方面派正的官长(可由共方推举中央方面的人),边区自己推举副的,可由林伯渠担任,事情可由边区政府自己办。

(4)经费,军队照人数编制的一般规定发给,行政经费亦照规定发给,善后费用可由中央另发。

(5)各边区由共方派人联络,经调查后实行编遣,其首领须离开。

(6)在狱共党,可由国方开始分批释放。

(7)国民大会之240名指定名额中,可指定共党出席代表,但不以共党名义出席。

(8)国防会议尚未规定会期,开会时可容共党干部参加。

(9)对其他各党派不必谈合作,由中央尽量收容,最近庐山训练班,即拟收容各方面人员训练,陕北如有人来受训练亦可,此外并欲拟召集各方人来庐山谈话。

(10)凡有破坏合作及与共党为难者,由蒋自负责任解决。但为避免国内外恐惧与反对,共党应避名干实,不必力争目前所不能实现之要求。

(寅)蒋又告宋子文声明:

(1)共党目前不要太大,易引起外方恐惧。

(2)共党首先取得全国信用。

(3)共党不要使蒋大为难,以便将来发展。

[乙]我因子项组织原则及丑项编制,与边区政府等问题,都不能同意,尤其是指挥与人事问题,与蒋争论很久不能解决,经宋子文、宋美龄、张冲往返磋商,仍不能解决,蒋仍坚主设政训处指挥,我只有回来讨论。我并最后声明:不能解决时,要张冲进苏区来谈判。

中央书记处

(录自《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

中央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方案问题 致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电

(1937年6月25日)

彭、任、剑英：

我们根据与蒋谈判的情形，现决定进行方案如下：

[甲]两党合作问题：

(一)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以便奠定同盟会及两党合作之政治基础。

(二)同盟会组织原则，在共同承认纲领的基础上，可同意国共两方各推出同数干部组织最高会议，另以蒋为主席，承认其依据纲领有最后决定之权。其组织原则，由我方拟出草案与蒋商定。

(三)关于同盟会将来发展之趋势及与第三国际关系问题，我们可不加反对(不使之成为合作之障碍)，但目前应着重保持共党之独立组织及政治宣传和讨论之自由。

(四)我们运用同盟会使之成为在政治上两党合作的最高党团。

[乙]目前具体问题之解决：

(五)准备七月中发表宣言(在拟)，其内容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及上次交蒋方案为根据。

(六)在宣言发表后，如蒋同意设立总的军事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即于“八一”自行宣布改编，采用国民革命军暂编军师名义，编三个正规师，共4.5万人。每师以编至1.4万人上下为标准。每师仍两旅两团，每团等于过去红军的师，约

2700人。其他编师直属队,总部编3000人,另外地方部队编1万人,保卫队在内。工厂医院另编。抗日军政大学另行解决,本期毕业后力求继续办一学校。在此编制下编余之老弱残废妇女及机关工作人员约三四千人,另设法安置。军委改为党的秘密组织,领导全国军事工作(红军在内)。红军中政治工作及党的组织准备改变形式。

(七)陕甘宁边区民主选举在七月内自动实行,并向蒋推荐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择一人任为边区行政长官(仅为挂一名义,蒋甚坚持),林伯渠同志为副长官。其下各行政部门由我方推荐负责人选,将来由边区参议会推出,请行政院任命。县长及其下各局长,则由县议会选出。边区将订出自己的经济和教育计划,并即起草各种条例及法规,以便与南京磋商。

(八)对其他各游击区,原则上一律停止没收土地及建立苏维埃政权,取消红军名义,改以抗日义勇队名义出现。用款向富户捐募。政权则建立自己的联保、保甲长及区乡公所。大的游击区在停止双方攻击后,争取大的部队编成各省独立团或保安团,小的编成保安队或民团保甲,不成则不受改编。小的游击区可争取为上述形式的存在。

(九)即着手调查各省在狱共党及一般政治犯名单,俟宣言发表后交蒋实行分批释放。

(十)与蒋及国民党谈判,在全国公开发行《解放》周报(现在延安出版)。

(十一)朱、毛出外问题,力争朱为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人,军事或政治名义可不拘,原则上毛不拒绝出外做事,但非至适当时机,则托故不去。

[丙]全国政治活动问题:

(十二)我们对国民大会民主选举的基本原则并不放弃,但估计到蒋及国民党不会再修改其已经修改的选举法,我们应联合各

民众政治团体。

(子)推出 240 个指定名额的倍数候选人,要求国民政府聘任(力争不用指定)。

(丑)讨论宪法草案,并提出具体的修改方案。

(寅)讨论并产生解决国难的提案,要求国民大会讨论和通过。

(卯)对各地国大选举,我们应影响推选人提出抗日及我们分子为候选人,在复选地方,我们应发动选民选举候选名单上之抗日左倾分子(现无我们分子)。

(十三)我们利用蒋、汪在庐山函请各方谈话的机会,在沪港平晋各地推动能向蒋建议的人,扩大召请范围普及于抗日领袖及左倾教授,以加强蒋之转变与扩大统一战线。

(十四)再次见蒋加上博古、林伯渠、董必武与周同去,以便讨论纲领与蒋切实商谈国防计划及修改和召开国防会议问题。

(十五)宣言发表后,如得蒋同意,即组织我们考察团赴各地考察,扩大影响。

中央书记处

(录自《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 1985 年版。)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①

(1937年7月15日)

亲爱的同胞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以极大的热忱向全国父老兄弟诸姊妹宣言，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了。这对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前途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民族团结的基础已经定下了，我们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前提也已创设了，中共中央特为我们民族的光明灿烂的前途庆贺。

不过我们知道，要把这个民族的光辉前途变为现实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仍需要全国同胞，每一个热血的黄帝子孙，坚韧不拔地努力奋斗。中国共产党愿当此时机，向全国同胞提出我们奋斗之总的目标，这就是：

(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

(二)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

(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

^① 这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宣言。此宣言起草于1937年7月4日，7月15日由中共中央交付国民党，至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才发表。

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

凡此诸项,均为中国的急需,以此悬为奋斗之鹄的,我们相信必能获得全国同胞之热烈的赞助。中共愿在这个总纲领的目标下,与全国同胞手携手地一致努力。

中共深切知道,在实现这个崇高目标的前进路上,须要克服许多的障碍和困难,首先将遇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阻碍和破坏。为着取消敌人的阴谋之借口,为着解除一切善意的怀疑者之误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披沥自己对于民族解放事业的赤忱之必要。因此,中共中央再郑重向全国宣言: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亲爱的同胞们!本党这种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与委曲求全的态度,早已向全国同胞在言论行动上明白表示出来,并且已获得同胞们的赞许。现在为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分,如苏区取消、红军改编等,立即实行,以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

寇深矣!祸亟矣!同胞们,起来,一致地团结啊!我们伟大的悠久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屈服的。起来,为巩固民族的团结而奋斗!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

抗日战争胜利万岁!

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录自《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
1986年版。)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讲话^①

(1937年8月10日)

王明同志的报告^②多少带些鼓动性,有点乐观了。因为我更直接负责中国问题,同王明谈过不止一次,所以他很了解,中国党面临的问题异常复杂,而党的处境十分特殊。

请想想看,近两年发生了多少事情。曾作为中国红军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重要转折。你们找不到共产国际的任何一个支部,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面临如此复杂的局面并在几年之内于政策和策略上完成了如此重要的转折。它为在中国建立苏维埃、为建立苏区而奋斗,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建立了军队,为实行苏维埃化争取了蒋介石的部分军队,等等。

党的干部,党的经费,党的力量——可以说,如果不是百分之百那也是百分之九十五集中在这些苏区。它在反对南京政府的武装斗争中培养了干部,优秀的干部成长起来了,一批政治活动家也成长起来了。

然而,现在要离开这个方向,党的政策和策略要在这个时候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那么还是这些干部,不是别的政党,不是

① 这份文献曾摘要公布于《共产党人》杂志1982年第9期(第80—81页)上。——原编者

② 1937年8月1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举行特别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王稼祥、邓发与会。王明作了关于中国局势和中共任务的报告。

新换的人,还是这些党员,这些群众,却要去执行另外一种政策。

这种政策对不对呢?是对的。它符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总方针,适合中国革命的发展。现在中国的问题已经不是苏维埃化了,而是要保卫中国人民,不被日本帝国主义亡国灭种。务必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把强大的中国人民的力量团结起来,以保证中国人民的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在这种情况下,党应当——它基本上已做到了——转到另外的立场上,不是转到争取中国苏维埃化的立场上,而要转到争取民主化,争取在民主基础上团结全中国人民的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日本侵略的立场上。

现在,同国民党、蒋介石的对话和谈判正在进行。^①我们党对此已经早有准备,已着手实际改组,改建苏区为实施民主制度的地区,把这些地区的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不是改变成苏维埃红军,而是改编成全中国总的反帝军队的一部分,等等。

这样一来,我们中国同志和中国党就会遇到很大的艰难险阻,因为蒋介石及其亲信会耍弄种种手腕。不难想象,我们党面临的是何等严重的险象环生的局面。这就必须给与帮助,派人去帮助,从内部加强中国的干部队伍。要帮助中国共产党,使它能在国民党地区把自己的力量组织起来,加强党在国民党地区对工人阶级的影响。

要知道中国红军是一支农民军队,工人的比例很小,在党内工人占的比例也很小。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不要把中国工人群众、工人阶级置于国民党或其他政治团体的影响之下,而置于共产党影响之下,使党不仅能依靠现有的武装力量,而且还能够以这样

^① 国共两党谈判的结果是1937年9月22日公布的两党合作的宣言(见是日《中央日报》)。——原编译者

那样的形式依靠国民党地区的、上海的、广州的和中國其他大城市的工人阶级。

国外现在有这样的干部，他们能够帮助党。特别重要的是应向华北输送干部。这是我们应该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能够稍微详细地剖析中国党的文件，那么我们还能再指出一些不妥当的观点，它们包含着使党和党的干部堕落，解除思想武装的危险，会使党在一定程度上迷失方向。这里有些东西应予纠正，但我们在这里是鞭长莫及。为此必须派一些新生力量，一些熟悉国际形势的人去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本身也需要得到帮助。况且现在正是战争时期——战争在进行，战争将继续下去。这不会仅仅是一时一地的偶然事件，占领华北就鸣金收兵了。不会的。

王明同志在这里谈了他自己的想法。他说，即使在这方面有过某种间歇，但占领[华北]就意味着日本军国主义加强了它进一步攻占中国的阵地，且不说它加强了进攻苏联的边界哨所^①阵地。

问题在于党中央、中央委员、中央机关及周围的人是否有能力进行工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中国同志们^②应当切实抓紧并尽一切可能巩固党的领导和保证党中央委员会有一批积极分子，建立党中央与广大党员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更加密切联系。我想，我们将和中国同志一道在一个小规模的委员会里单独讨论这个问题。应该制定具体的建议，而不要持这样乐观的态度。形势不坏，但是要考虑到种种困难，要估计到各种情况，而不要把希望寄托在空中楼阁上，那样做无论对中国同志还是对我们都没有好处。

另一个问题是——日本情况怎样？它国内形势如何？难道具

① 原文如此。

② 《共产党人》杂志 1982 年第 9 期第 80—81 页恢复了这几个字。

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无产阶级就找不到什么办法去影响群众情绪,去利用日本国内肯定存在的反战情绪吗?这也是一个具体问题,而且解决了这个问题定会对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助一臂之力。我们据可靠材料得知,日本国内现在财政拮据,所以日本政府在竭力设法借外债。它向英国借债,但是英国不提供,因为德国签订了反苏条约,……^①日本在伦敦没有得到贷款,又设法在巴黎、纽约借款。我们作为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无产阶级,难道就不能掀起一场运动,设法阻止向日本军阀贷款,或者把向它贷款、让它用以去对中国人民宣战变成不得人心的事吗?可以掀起这样一场运动。法英等国都有发行量很大的报纸。把同情中国人民的舆论界名流动员起来,在议会和报纸上提出问题,使日本军阀不那么容易得到贷款。诸如此类的措施都可以给予中国人民国际主义声援。

我认为,所有这些具体问题都可以在委员会里提出来,而王明同志那个较好的报告应该改写成一篇文章,^②不过要把我们在这里讲到的内容加进去。要把这个报告写成文章登在共产国际的刊物上,以此动员群众保护中国人民,但不要写什么都写得十全十美,好像中国的全民抗日战线已很顺利,万事大吉了。为此还要进行经常的斗争。我们在西班牙的斗争已经坚持了很久,至今尚未结束。据说,最关键的保卫西班牙共和国的战役将到[明年]春进行,如果西班牙是这个状况,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中国的情况,这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还会持续多久,会发展到多大规模……^③

① 删节号系原文所有。——原编译者

② 会后不久,王明写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新阶段和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一文,集中反映了这篇发言的精神。——原编译者

③ 删节号系原文所有。——原编译者

据档案刊印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援助中国和西班牙人民的决议”节录

(1937年10月3日)

继德意法西斯强盗般地入侵西班牙之后,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也向中国发动了进攻。西班牙人民和中国人民正在进行反侵略的保卫战,以自己英勇的斗争打击和平的破坏者德意日,保卫和平事业。法西斯国家追求的是侵略性目的,他们的目的是奴役中国和西班牙人民。中国和西班牙共和国进行的是反对外来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战争。德意企图把法西斯制度强加于西班牙,而日本则企图把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统治强加给中国。西班牙人民正在为自由、为反对外国干涉、建立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而战,中国人民则正在为争取当家作主的权利、为在民主基础上改造本国的政治制度而战。如果日本在中国获胜,德意法西斯在西班牙获胜,那么蛮横无耻的法西斯国家掠夺侵略的新时期就会来临。在欧洲,这将意味着德国法西斯进攻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丹麦;意味着法西斯会包围法国并对它宣战;意味着意大利法西斯的统治势力在地中海的扩大和向非洲的渗透;意味着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直接威胁法属印度支那^①、印度、澳大利亚、菲律宾,而日、德、意法西斯则要瓜分英国的殖民地而大动干戈;意味着对和平自由和社会主义的堡垒苏联开战;意味着法西斯活动的嚣张和各资本主义国家法西斯的新进攻。所以,各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反对

^① 原文如此。

德意干涉西班牙的斗争,就是各国人民保卫和平的斗争,是反对本国法西斯的自卫战。所以,各国人民群众应该尽一切力量,使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在中国遭到失败,使德意对西班牙的干涉遭到失败……^①

一、国际援华运动的性质

援华运动应声势浩大,绝不能使它只具有狭隘的共产主义性质并基本上靠共产党本身的力量进行。应当利用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后备力量援华,利用欧美各阶层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反感。为了奠定最广泛的援华运动的基础,必须把人民阵线的一些委员会、和平之友协会、国联之友协会、反法西斯委员会、工会、妇联和学联等组织发动起来,还要把那些与之合作的、可通过某种形式有益于援华运动的政党也发动起来。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要利用那些在经济上与维持中国秩序、稳定和保持正常经济生活条件有利害关系的团体和个人。

二、运动的形式

应采取的形式有:群众大会,游行示威,向国会提要求,利用报刊作宣传,向各社会团体发呼吁书,派出专门的代表团(鼓动队)等等。

为了更好地开展运动和协调援华活动,要在欧美各国(条件允许的地方)设立专门的援华委员会。在尽可能密集地建立援华委员会网的同时,要争取把政界、舆论界、科学界的名人,把工会和其他组织的代表吸收进来,但不要过分强调共产党人在这些委员会中的作用。

^① 删节号系原文所有。——原编译者

三、运动的目的

运动的目的——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全面援助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为此必须做到:1)要求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停止给予日本帝国主义任何外援(贷款、原[料]、^①提供各种武器、贸易等等);2)同时必须力争给中国政府以实际援助(提供武器,向中国自由运送武器,给中国政府财政援助:贷款、借款、贸易等等)。

四、运动的内容

与目的相适应,国际援华运动应按下述口号展开:

1. 日本侵略者滚出中国去;
2. 不给日本军国主义一分一文钱;
3. 对来犯的杀害手无寸铁的和平百姓的日本军国主义实行经济制裁;
4. 抵制日货,断绝日本原料来源;
5. 民主国家采取一切政治和经济手段,反对远东和平的破坏者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

在整个宣传活动中,应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及其同谋者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辩护而提出的无耻论据的卑劣性与虚伪性;

1)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关于国民党是共产国际国外代理人的说法是无耻的谎言。中国的抗日民族战线是渴求民族独立和自由的中国人民开展极其广泛的民族运动的结果。

2)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扬言,它要争取在中国建立什么“秩序”和争取远东“和平”,这是无耻的谎言。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正倾其全力扶植中国的封建残余,不让中国建立民主制度。多年以

^① 档案原文字迹模糊。

来它一直在中国挑动内战，借助其特务去唆使这派军阀打那派军阀。日本政府煽动帝国主义在远东制造混乱、破坏秩序、劫掠远东，煽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它已退出国际联盟，拒绝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千方百计破坏旨在巩固远东和平的任何措施，例如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它同德国缔结了进攻苏联的军事同盟。

3)日本声称，因“人口过剩”而被迫向中国扩张领土，这是无耻的法西斯谎言。中国的“人口过剩”程度并不亚于日本。日本人民的贫困是残暴、寄生的封建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而不是“人口过剩”的结果。日本统治阶级本可以不向日本人民大众横征暴敛，而用提高他们生活水平的办法开辟广阔的国内市场，更无需掠夺别国人民。

还应该广泛揭露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和平百姓所施暴行的一切事实。

五、援华委员会的活动方针

应通过援华委员会和其他社会团体，要求本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破坏国际条约的无耻行径，反对它封锁中国海岸，反对日军使用公共租界和外国在华租借地进行战争，反对有助于日本侵略者的中立政策。应该向本国政府和国联提出对日实行制裁的要求，应首先要求禁止向日本出售用于战争和军备的任何材料，拒绝向它提供贷款，拒绝向它提供原料。必须要求本国政府维持同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给中国以财政援助，允许中国民众在外国租界自由开展爱国运动，坚决抗议日本侵略者对和平百姓施行惨绝人寰的暴行。

援华委员会应该广泛开展募捐、救济难民和日本侵略受害者的活动；应该号召军事专家到中国去，应该全力帮助派遣志愿积极参加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正义斗争的飞行员和其他军事专家到中国去。援华委员会应该组织和派遣赴华救护队、难民膳食供应点等

等。为了更好地向国际舆论界提供中国事态的消息,援华委员会应该组织向中国派遣权威性的代表团以及向各战场派遣记者的工作。

应当通过工会去争取海员和码头工人拒绝装卸日本船只和其他国家向日本运送武器的船只。

六、关于帮助南京官方代表团^①的活动问题

为加强欧美国家的援华运动,由五位中国社会名流组成的代表团已专程出访。应该给予这个代表团以特别关注和全面帮助。尤其应该趁代表团访问欧洲国家期间,向共产国际、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国际和其他主张和平的国际组织提出共同进行援华活动的问题。要在这个代表团的帮助和领导下,在旅欧华侨特别是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亚和美国华侨中开展最广泛的募捐和各种形式的援华活动。

据档案刊印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① 1937年4月,南京政府派孔祥熙为特使率同陈绍宽等人赴英参加英王加冕盛典。孔一行离英后先至日内瓦,后至柏林,在德期间曾与希特勒会晤,与航空部长戈林谈话。6月23日孔一行抵美,先访美财政部赫尔,后访罗斯福总统。7月10日与美签署中美金银交换协定。7月16日孔等人赴欧,8月5日孔由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引见法总理旭东,讨论远东时局。孔离法后赴瑞士、荷兰,8月14日与瑞、荷两国订贷款协定。8月18日又在捷克订立1000万英镑的借款协定。孔访欧期间适值国联大会9月9日开幕,遂列席大会旁听了后来的会议。10月孔一行经新加坡回国。——原编者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 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1937年10月10日)

I. 全中国武装抗日的开始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事业的顺利进展标志着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来临了。这一更新的局面要求中国共产党变成全中国强有力的政治因素,要求党认清全中国亿万劳动群众不断增长的实力。为此,党必须重新分配自己的人力和物力,以便在主要城市和战略中心建立党的组织,并且必须根本改变党的工作、领导和组织的形式与方法,从而使党能够以全副精力在各劳动群众组织中进行工作和发挥作用。

II. 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对原有干部进行政治、军事和新工作方法的再教育,从积极分子、群众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中首先是从工人中提拔新干部。

III. 必须通过对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施加影响的办法和群众运动的办法,争取党在所有国民党区域开展活动的合法化,并十分重视在大城市创办合法的群众刊物。

IV. 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务必要特别加强在工人和工会中的工作,并尽可能吸收他们积极参加抗日和民族统一战线。

V. 在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和全中国军队的一支部队^①的条件下,务必设法保持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它的团结和它对中国人

^① 原文如此。

民解放事业的绝对忠诚,设法扩充军队,并以战斗行动表明,这支军队是全国军队中最进步、最富牺牲精神和战斗力最强的队伍,要赢得人民的信任和在友军中的影响。

Ⅵ. 尤其重要的是应当坚定不移、始终不渝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尽一切努力全面巩固统一战线,因为它是战胜日本军国主义最重要的条件。

Ⅶ. 现在,敌人会通过瓦解、挑拨、特务活动、破坏和恐怖等手段,进一步加剧它对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破坏工作。必须最大限度地提高革命警惕性,经常审查干部和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坚决清除党和红军中一切可疑的和不可靠的分子,特别应清除暗藏的托派分子、陈独秀分子和罗章龙分子,这是一项迫切的任务。在这方面党做得还远远不够。把托派分子当成一个政党或流派加以对待是十分不对的,去年中央委员会的宣言中关于有可能把托派分子吸收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①的提法是绝对不允许的。

Ⅷ. 为了尽量加强国际援华运动,最好由中国共产党会同国民党、救国会、工会、学联、妇联、文化等国内各团体联名致书国际工人组织——共产国际、社会主义国际、阿姆斯特丹国际和一切国际反战反法西斯组织,呼吁他们支持和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选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① 这可能是指上年瓦窑堡会议决议中“一切反日反卖国贼的分子,不论他们代表哪一阶级,哪一政治派别,哪一社会团体,哪一武装队伍,都可以加入国防政府”的那段话,见《六大以来》(上),第738页。——原编译者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言(摘录)

——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20 周年

(1937 年 11 月 7 日)

全世界无产者、劳动人民和各国人民！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已经 20 周年了。

20 年前，俄国工农在列宁—斯大林的党领导下推翻了资本家和地政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工农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的 20 年不仅是苏联劳动人民的巨大胜利，而且是各国工人和全世界人民的最伟大的胜利。

……

看到社会主义在世界 1/6 土地上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群众越来越仇恨资本政权，越来越坚决地要消灭令人憎恶的法西斯主义……

西班牙人民万众一心，不仅英勇抗击法西斯叛乱者，而且抵抗着重进攻西班牙共和国的法西斯国家的联合力量……

四万万中国人民正在英勇地保家卫国，阻止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入侵。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使苏联各族人民摆脱了外国资本的统治，这场革命的范例增强了中国人民群众的民族自觉，他们正在建立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统一战线。

法国人民通过强大的民族阵线运动，击退法西斯主义一次又一次进攻，扩大了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经济成果。

无产者和劳动人民！

西班牙人民和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独立与和平的斗争是国

际无产阶级的切身事业,是各国人民的切身事业,任何一个工人、任何一个劳动者、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任何一个民主主义者都不可能不协助西班牙人民和中国人民取得胜利。这个胜利乃是自由与和平事业的胜利,是整个先进、进步人类的胜利。对于一切真诚拥护民主与和平的人来说,没有比全力促使德意法西斯在西班牙失败和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失败更为迫切的任务了。德意干涉者和日本侵略者在那里已经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作了赌注。让它们在西班牙和中国的血腥冒险成为法西斯主义在全世界灭亡的开端吧。

劳动者们,请记住,法西斯强盗能否把人类推入一场新的世界性的帝国主义大厮杀,取决于西班牙和中国斗争的结局。继侵袭西班牙和中国之后,法西斯主义还在为反对各国人民谋划新的暴行。欧洲的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比利时、巴尔干和其他国家人民正在受到打击。德国法西斯主义磨刀霍霍要去屠杀法国人民。亚洲和太平洋沿岸国家的人民也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法西斯强盗正准备从西方和东方进攻各国,进攻劳动者的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今天你们保卫西班牙和中国就是在保卫普遍和平的事业,就是在保卫其他国家人民免遭法西斯的侵袭,就是保卫自己,保卫家园和子女免遭法西斯的劫掠。

那些伪善者和骗子们说他们用“不干涉”政策在拯救和平事业。工人和劳动者们,不要相信他们。他们正借助这种政策围困西班牙共和国和中国,支持佛朗哥,帮助法西斯侵略者,唆使他們去发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

应该要求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政府进行坚决的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要求它们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遏止战争的祸首。

加强你们与苏联的兄弟联盟,忘我地保卫世界和平,保卫西班牙人民、中国人民自由和独立的事业。

把你们的队伍结成坚不可摧的国内和国际统一战线。为了保卫西班牙人民和中国人民,再也不许社会民主党的反动头领破坏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

建立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把法西斯主义的卑鄙的托派奸细从一切工人组织和民主组织中驱赶出去。根除这些叛匪是反法西斯的胜利斗争和各国人民为和平事业而斗争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让各国人民强有力的呼声响彻全世界:

法西斯干涉者从西班牙滚出去!

日本侵略者滚出中国去!

更紧密地团结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已获胜利的苏联周围!

各国男女工人们!

对于争取我们工人切身事业的国际斗争,世界上有一个不可动摇的支柱,在整个进步人类争取自由、和平和社会主义斗争的战场上,有一个强大的堡垒。地球上千百万劳动者与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各族人民紧密联合起来就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为实现这种联合,迫切要求国际无产阶级队伍的团结。你们的团结一致不仅是劳动人民战胜法西斯的最重要的条件,也是战胜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条件。用你们要求统一的意志去克服一切障碍吧!

各国劳动人民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苏联万岁!

西班牙民主共和国万岁!

自由独立的中国万岁!

反法西斯反战的人民阵线万岁!

打倒资本主义!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万岁!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载《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1937年

第 10—11 期合刊,第 9、12、13—14 页

(录自《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共驻国际 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

(1937年12月13日通过)

政治局听了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陈云三同志工作报告之后,认为在王明同志领导之下的代表团,在国际领导和特米脱洛夫^①的帮助之下,几年来所做的工作成绩,首先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的政策的确定与发展上给了中央以极大的帮助,此外如培养干部,出版报纸书籍,反对隐藏在某些党的组织中的奸细敌探,对满洲与华侨工作的直接领导和进行国际宣传等,是满意的完成了党中央与共产国际所给与他们的任务。

1937年12月12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

(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① 今译季米特洛夫。

季米特洛夫日记(摘录)

1936 年

1936 年 8 月 25 日

同库西宁、马努伊尔斯基、莫斯克文、什维尔尼克、科拉罗夫、斯莫梁斯基、什麦拉尔开会讨论有关和平代表大会^①的决定和指示。

1936 年 8 月 28 日

关于援助西班牙的问题(可能要组织国际纵队)。

1936 年 8 月 29 日

什皮涅尔和康生飞赴巴黎。^②

1936 年 8 月 30 日

多列士来电：“我抗议苏联大使馆企图对我们对西班牙问题的路线施压。”(?!)

1936 年 8 月 31 日

撰写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15 周年的文章。^③

把流亡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西班牙人派回西班牙(飞行员、物

① 同年 9 月在布鲁塞尔召开。

② 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在巴黎组织旅欧华人代表会议。中共在德、英的小组领导人以及国民党在巴黎、柏林、伦敦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下进行。

③ 该题为《纪念中国共产党 15 周年》，刊载于《共产国际》杂志 1936 年 8 月号上。

资援助)。

1936年9月2日

在克里姆林宫(在政治局——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奥尔忠尼启则)。

关于西班牙政府的问题。

商定了指示(与斯大林也通了电话)：

“争取将希拉尔政府改组成全民防卫政府，仍以希拉尔和大多数共和党人为首，有社会党党员和两名共产党员参加，也要有加泰隆人和巴斯克人的代表参加。”

援助问题将在政治局另行讨论。

1936年9月3日

西班牙形势危急(须要派专人去巴黎帮助法国人购买和运送武器和飞机)。

1936年9月7日

在克里姆林宫。

讨论中国问题。

建议：认为可以同意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计划草案(通过向宁夏和新疆运送武器支持中国红军等)。

1936年9月11日

确定对中国问题的决定：

“(1)同意中国红军的行动计划，即占领宁夏的部分地区和甘肃西部，同时明确指出中国红军不得继续向新疆方向推进，否则红军便有可能脱离中国的主要地区。

(2)提前决定在中国红军攻占宁夏地区后提供1.5万~2万支步枪、8门火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的弹药。武器将于1936年12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将通过知名的乌拉圭洋行售出，为运进宁夏作准备。”

保共国外局会议(科拉罗夫、伊斯科罗夫、斯皮利多诺夫^①、波格达诺夫):

(1)人民阵线政策;

(2)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相互关系;

(3)政治局:马列克、拉登科、斯塔依科夫、伊万诺夫、卡麦诺夫。(达米扬诺夫退出!)

1936年9月13日

多列士来。我们进行了讨论。(西班牙共产党没有完成任务。工作的组织和配合都不好。马尔蒂个人布置工作。结论:多列士和马尔蒂的协同工作不恰当)。社会党人想破坏人民阵线并把责任转嫁到共产党员身上。理由:西班牙的运动。

1936年9月14日

在克里姆林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安德列耶夫、雅戈达、乌里茨基、斯卢茨基、莫斯科文。)

组织援助西班牙的工作(通过走私的联合行动)。

法国:我们不推翻勃鲁姆的政府,但批评勃鲁姆。(这是不干预的声明:“各方都不进行干预!”)

苏联政府的立场和法共的立场可以不一致!

统一战线有困难;统一战线政策行不通的结论是不是从这里得出来的。

(莫洛托夫:“您在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已回答了这个问题。”)

1936年9月15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

(多列士、波立特、科普列尼格,美国的哈塔维等也参加了。)

讨论与西班牙有关的国际形势新动向等。进一步贯彻人民阵

^① 即特莱乔·科斯托夫(1897~1949),保党和国家领导人,遭无辜处决。

线的政策。法国同志改正错误的问题。

1936年9月16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

日程：

(1)介绍西班牙情况和法国人民阵线情况；

(2)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中心的案件有关的运动和该案件对各国共产党和整个工人运动的教训；

(3)介绍在日内瓦和布鲁塞尔召开的两次和平大会^①的情况。与多列士一起去见卡冈诺维奇。谈从法国向西班牙走私武器的问题。

为此须要做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完成。

“斯大林同志对多列士有非常好的看法。法国的工作开展得很好，多列士领导得力。他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声誉大大提高了。”

“人民阵线的成功是您(指季米特洛夫)的功劳。您的到来带来了欧洲的精神。”

1936年9月20日

与乌里茨基、阿格拉诺夫等开会讨论对中国的援助问题。

(向政治局写关于贷款等的书面报告。)

1936年11月26日

在克里姆林宫。同斯大林谈话。

“……应该改变对中国工作的决定。目前不能搞苏维埃。要建立民族革命政府，全民防卫的政府，以保卫中国人民的独立。只有在城市可以搞苏维埃，但不是作为政权机构，而是作为群众的组织。不搞没收。您起草一个初稿。我们再看看！”

^① 世界青年和平代表大会和国际和平代表大会分别于该年8、9月在日内瓦和布鲁塞尔召开。

同伏罗希洛夫谈对中国的援助。

1936年12月2日

收到政治局今天作出的决定。

1166吨箱装货物。^①

由外贸人民委员会负责提供卡车、燃料、弹药等。

已给财政人民委员会发电报,在拨出200万卢布之外,再提供:50万美元,5000卢布(其中15万美元已用于订购外国制式的飞机)。

484名相关专业的军人(驾驶员、技术员、指挥员)将进入新疆政府服役。

远征队队长为莫云科夫大校。

1936年12月3日

邓发的报告(未完!)

致多列士电报:“建议在批评政府政策和进行议会选举时应遵从这样的指导思想,即在当前情况下加强政府危机对法国工人阶级不利,而推翻勃鲁姆政府就更不利。”

1936年12月9日

博戈莫洛夫来见,谈到:

- (1)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将继续下去;
 - (2)南京不会再作出重大的领土让步;
 - (3)中国将对日作战;
 - (4)统一战线运动正在迅速发展;
 - (5)蒋介石将在对日本开战前夕并同苏联协商后才下决心同共产党和解;
 - (6)蒋介石不会在西北追剿红军。
- 宋庆龄(孙中山夫人)已近乎是共产党员。

^① 这里指向中共提供的援助。——原注

1936年12月13日

有关于张学良的部队在陕西起义的报道。逮捕了蒋介石。

斯托马尼亚科夫来见。他对张学良作出好的乐观的评价。苏联应该谨慎和巧妙地对待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反苏运动。

1936年12月14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科纽作关于法国情况的报告。交换意见——不要加强政府危机。准备更换政府。

关于中国工作的会议。把邓发的报告送给斯大林。请他对我们的中国同志的立场提出意见。建议是：

“建议他们采取自主的立场，宣布反对内讧，坚持和平解决冲突，争取和解和协同行动，在强调共产党在致国民党的信和毛泽东答记者问中所持立场的同时，争取主张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各党派发表民主宣言。”

深夜 0:00，斯大林来电话：

“中国的事件是在您的认可下发生的吗？”

（不是！这事会对日本最有利。我们也是这样看这一事件的！）

王明在你们那里做什么事？他是个挑衅者吗？他想发电报让他们枪毙蒋介石。

（我不知道有这种事！）

那我给你送去这份电报！”

随后莫洛托夫来电话：

“明天下午 3:30 请你们到斯大林的办公室来，我们一起讨论中国的工作。只有您和马努伊尔斯基，别人不用来！”

1936年12月15日

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

（有库西宁、马努伊尔斯基、莫斯克文、王明、邓发、爱尔科利、曼达利扬参加。）

1936年12月16日

到克里姆林宫见“五人小组”^①。

(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

对中国事件交换意见。

磋商后同意向中共中央发以下电报：

“复电建议你们采取以下立场：

(1)张学良的行动不论他的意图如何，客观上只能损害把中国人民的力量团结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并会鼓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2)由于这一行动已经作出，我们应该考虑现实情况。中国共产党要坚决宣布在下列基础上和平解决这一冲突：

通过主张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抗日运动的代表人物参加政府，进行政府的改组；

我们在草案中建议的文字为：‘由主张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抗日运动的最杰出活动家来改组政府’；

确保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

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同红军建立合作关系；

与同情中国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解放出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最后我们建议不要提出‘与苏联结盟’的口号。”

对法国问题，斯大林：“应该进一步继续贯彻当前的路线：在不破裂的情况下批评勃鲁姆。勃鲁姆是个招摇撞骗的人。这不是卡巴列罗。”

1936年12月20日

^① 指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掌握主要权力的五个人，即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和当时缺席的伏罗希洛夫。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讨论波兰问题。

基本问题：

- (1) 人民阵线运动的特殊形式和方法；
- (2) 党的有组织的领导工作取决于解决国内的而不是国外的日常工作问题；
- (3) 加强党作为波兰的党……

致多列士和加香电报：

“鉴于法西斯诸国对西班牙事务的干涉极度加强以及无产阶级和西班牙共和国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我们认为你们有必要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与德·勃鲁克会见，并向他提出关于建立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在援助西班牙人民的问题上的协调委员会的建议。

为此目的，建议在各国建立协调委员会。我们也准备对他们方面提出的有益于西班牙人民的关于协调两个国际的任何其他建议进行讨论。”

1936年12月22日

国际纵队——派遣 9500 人以下。

1936年12月26日

报道蒋介石获释。

1936年12月29日

白天路易·费舍尔来见（谈招募去西班牙的志愿者事宜。）

1936年12月30日

审定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西班牙的决定。

（录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1937年

1937年1月1日

《真理报》刊载我的文章《在1937年的门槛上》。

1937年1月2日

答复我们关于从美国招志愿者的建议：

斯大林的决议：“不需要更多的志愿者。我建议停止招募。”

1937年1月7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知：“准许招募和派遣国际纵队队员。”

1937年1月10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国际革命战士基金会的问题。

1937年1月11日

国际革命战士基金会的委员会举行会议。

1937年1月13日

晚上同中国人在一起。

1937年1月16日

送给斯大林致中国共产党的电报草稿(修改党对于同国民党协同行动的路线。)

1937年1月19日

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莫洛托夫、安德列耶夫、日丹诺夫、叶若夫)。

对中共中央的指示：

(1)对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旨在停止内战的一切措施采取支持

的方针——团结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为反对日本侵略而斗争。

(2)询问中央是否已认识到是从苏维埃制度向人民革命的管理制度及时转变,并由此得出一切结论的时候了。

1937年1月20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

介绍中国的情况(书记处的指示)。

关于与皮达科夫、拉狄克等人的案件有关的运动。

1937年1月23日

皮达科夫、拉狄克等人的案件开始审理。

成立了负责通报和开展运动的三人小组(爱尔科利、舒宾、波诺马廖夫)。

1937年1月31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扩大会议。

与托洛茨基反苏维埃中心的案件有关的运动。(加香、瓦扬·古久里、尤姆贝尔·德罗、林德罗特、沙尔赫尔。)

1937年2月5日

答复中共的电报(关于告国民党中央全会书)。

莫洛托夫(用专线电话)——中共中央的建议可以接受。

(我按此意思修改复电稿。)

1937年2月7日

同加香和瓦扬座谈法国和西班牙问题。

1937年2月11日

同斯大林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反托洛茨基运动的决定。

斯大林:

(1)你们不要总结说,欧洲工人以为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和托洛茨基之间的争吵,因为斯大林脾气不好。

(2)应该指出,这些人都是在列宁生前就反对列宁、反对党的。

(3)要引用列宁说反对派的原话：“在苏维埃政权下，党内任何反对派如果坚持……就会滑到白匪的泥沼。”

(4)引证庭审的速记记录。引用被告的证词。

(5)展示出他们准备苏联失败的政策和工作。

这个决定是愚蠢的。

所有你们这些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人都在帮敌人的忙……不要搞决定，决定是必须执行的。致各党的信更好一些。

1937年2月16日

确定关于托洛茨基反苏维埃中心的案件的信的最后文稿。

1937年2月23日

晚上召开联共(布)中央全会。

叶若夫作关于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案件的报告。

布哈林发言(令人厌烦的可悲景象!)

会议休息时，卡拉汉说起：

“去年我同国王鲍里斯坐在一个火车车厢里。是土耳其驻索非亚公使介绍我们认识的。国王鲍里斯说：我们保加利亚人为季米特洛夫自豪。在案件审理期间，我收到了请我去德国访问的邀请。可是我表示：在季米特洛夫被开释之前，我不能去德国进行正式访问。因此我也为他的获释出过力……”

卡拉汉：这么说，您还帮了共产党员的忙，因为季米特洛夫现在是共产国际的总书记。

国王鲍里斯：不管怎么说，我为他说了话，自己觉得很满意。以前还有过一次，保加利亚有人要打死他，我也尽了一切努力不让它发生呢。”

(多么狡猾的国王!)

1937年3月10日

中国问题(叫蒋介石的儿子^①来一趟,然后派他回国)。

1937年3月13日

审查共产国际的预算(趋向于削减对各党的资助——要更多依靠群众!)

1937年3月14日

晚上同马尔蒂、爱尔科利去克里姆林宫。

(政治局——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后到。)

座谈西班牙问题。

把共产党和社会党合并成社会主义工人党。

(如果社会党人坚持合并后的党不加入第三国际,那么它也不得加入第二国际。)

不要打倒卡巴列罗(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当政府首脑了。)

坚决反对卡巴列罗当国防部长。

如果决定外国力量撤出西班牙,那么国际纵队就解散并留在后方,参加生产等。

招募工作进行(专门成立加泰隆人的国际纵队。)

1937年3月15日

同即将回国(去上海)的中国人座谈。

1937年3月16日

去斯大林的别墅。

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米高扬(我们有马尔蒂和爱尔科利)。

……斯大林俏皮地说:“爱尔科利总还有一支队伍;马尔蒂组织了国际纵队;只有保加利亚人哪儿都没有见到。我们让科学院去查查这是怎么回事!”

^① 指当时在苏联的蒋经国。

他好几次在这个题目上开玩笑(是偶然的吗?)

1937年3月20日

斯大林接见西班牙作家阿尔贝蒂和莱昂。据会谈时的翻译戈普涅尔介绍,斯大林的谈话要点如下:

(1)西班牙革命的性质。必须向人民和全世界说明实情——西班牙人民现在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没有有利的国内特别是国际环境。(1917年俄国的情况不同——有空间,在战争期间,资本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重重等。)西班牙宣布为苏维埃会使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团结起来,法西斯主义就会取得胜利。

(2)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西班牙是先锋队。先锋队往往有超前的倾向,从而潜藏着巨大的危险。西班牙的胜利会动摇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

(3)共产党和社会党必须团结起来。现在它们有同样的基本任务(民主共和国)。这种团结将巩固人民阵线并会对无政府主义者产生巨大影响。

(4)卡巴列罗表现了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的坚强性格和意志。卡巴列罗应该保留为政府首脑。最好总司令的工作由别人担任。

(5)总参谋部不可靠。在共和党部队进攻前夕总有叛变。

在总参谋部不知情的时候,共和党军队的进攻却取得胜利!……

(6)马德里无论如何不能放弃。马德里陷落后英国会承认佛朗哥政府,这将使共和党人士气涣散而导致彻底失败。

(7)不排除法国发生法西斯政变的可能。但是法国的条件不同——法国资产阶级对法西斯主义更有戒备。

(8)相信西班牙共和国能取得胜利。在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公开入侵后,西班牙共和国将同外国侵略者更加猛烈作战。

1937年3月23日

关于中国的会议。

给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问题的电报！

1937年3月26日

同蒋介石之子谈话。

同保加利亚志愿者(赴西班牙的指挥员)座谈。(22人)

蒋介石之子启程回国去见其父。

1937年3月28日

蒋介石之子来电：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我在旅途中向您致以最热忱的布尔什维克的问候。您的全部指示都将完成。”

1937年4月7日

法国人已经同意在巴黎召开关于西班牙问题的会议。他们已动身回国。

1937年4月12日

马努伊尔斯基、布劳德、哥特瓦尔德(梅林当翻译)来我这里起草关于讨论西班牙问题的巴黎会议的指示。

1937年4月13日

致斯大林的信，关于中国西路军^①问题。

1937年6月23日

听取特雷安关于通过法国党援助西班牙共和国和国际纵队的问题。

1937年7月7日

与刚到达的中国同志谈话：王稼祥、王明、邓发。

1937年11月7日

与斯大林谈话：

^① 西路军是中共在第四方面军内的一支有2.5万人的分队，他们从甘肃省南部向西部进军，以便在边境站星星峡取得苏联提供的军事技术援助。

“弄清关于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内的反革命活动,还有待深入研究一切必要的材料。不必零星提供情况。

克诺林是波兰和德国间谍(从很早以前直到最近)。

拉科夫斯基从革命前直到最近,一直为英国情报部门效劳。他还招募了博戈莫洛夫为英国情报部门效劳。皮亚特尼茨基是托派。所有的人都供认他是托派(克诺林、阿勃拉莫夫等)。

库恩同托派一起反对党。他极有可能还参与间谍活动。他在镇压匈牙利革命中的作用是很值得怀疑的。

安提波夫、瓦雷基斯等人是沙皇情报机关的特务。

有材料指出,托洛茨基在1904—1905年也为沙皇情报机关效过劳。这一点现在已经弄清楚了。

亚科夫列夫的妻子原来是法国间谍。她在1918年出卖了敖德萨军事革命委员会。”

中午在伏罗希洛夫家。参加者: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安德列耶夫、米高扬、叶若夫、楚巴尔、什基里亚托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布琼尼、叶戈罗夫、沙波什尼科夫、维克托罗夫、科萨列夫、什维尔尼克、弗林诺夫斯基、列登斯、达金、内务人民委员会驻红军代表、梅日劳克、克里姆林宫警卫长、伏罗希洛夫夫人、季米特洛夫。

伏罗希洛夫为斯大林祝酒。米高扬作为宴会主持人按顺序为所有的人发表了机智的祝酒词。又一次为斯大林祝酒。

斯大林:我想说几句话,也许不那么喜庆。俄国沙皇做了很多坏事。他们抢劫并奴役人民。他们为了地主的利益发动战争、攫取领土。但是,他们做了一件好事——创建了巨大的国家,一直到堪察加。我们继承了个国家。我们,布尔什维克,第一次团结并巩固了这个国家,使它成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的国家,不是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而是有利于组成这个国家的劳动者和各族人民。我们是以这样的方式统一这个国家的:

每一部分,如果它从共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分离出去,不仅要受到损失,而且不能独立存在并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外国的奴役之中。因此,每一个企图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统一的人、每一个企图从这个国家脱离出去成为单独的部分和民族,他就是这个国家、苏联各族人民的敌人,不共戴天的敌人。我们就要消灭这种敌人,哪怕他是老布尔什维克,我们要消灭他的家族、他的家庭。我们要无情地消灭每一个企图以其行动和思想(是的,还有思想)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统一的每一个人。彻底消灭一切敌人,消灭他们自己,消灭他们的家族!

(喝彩:拥护伟大的斯大林!)

斯大林:我还没有说完我的祝酒词。关于伟大的领袖们说得太多了。如果没有其他条件,事业是不能胜利的。主要是中层干部——党的、经济的、军事的。他们选举领袖,他们向群众解释形势,他们保证事业的成功。为中层干部干杯!他们谦虚克己,他们不为人知……

季米特洛夫:也为那位鼓舞他们、给他们指出道路、带领他们前进的人,斯大林同志,干杯!

斯大林:不,不。主要是这些中层干部。将军们没有优秀的军官,什么事也做不成。我们为什么能战胜托洛茨基等人?大家都知道,托洛茨基在列宁之后,在我国是最有声望的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托姆斯基也有声望。当时认识我们——我、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加里宁——的人很少。在列宁时期,我们是实干家,是他的助手。但是中层干部支持我们,他们向群众解释我们的立场。而托洛茨基根本不理睬这些干部……

季米特洛夫:……还因为您在列宁之后指出了正确的道路,坚定地、英明地继续了他的事业。历史上不乏继承者断送前辈事业的先例。

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季米特洛夫要求发表祝酒词!

季米特洛夫:对于斯大林同志关于对敌人要进行无情斗争和关于中层干部的意义的话,我没有更多好说的。这要提请各国党注意。我自己要尽一切力量在共产国际队伍中也加以注意。我应当说(这不仅是我的深刻信念,而且还是我在监狱里、在最严重考验的条件下的亲身体验),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无产阶级来说,最伟大的幸运就是:在列宁之后,斯大林同志在所有急剧转折中都如此坚定和英明地继续了列宁的事业并保证了事业的胜利。如果不把列宁同斯大林联系起来,就无法谈论列宁!(全体举杯!)

斯大林:我非常尊敬季米特洛夫同志。我们现在是朋友,而且将来也仍然是朋友。但是我不能同意他的说法。他的说法甚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事业的胜利必须有相应的条件,而领袖们是会找到的。单单指出正确的道路是不够的。从我们的观点看,英国党不是有正确的立场吗。但是它什么也没能做成,因为中层干部在工党方面。法国党执行正确的政策,而社会党仍然很强大。基本问题是中层干部。必须要注意这一点,永远不要忘记,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中层干部决定事业的成败。

赫鲁晓夫:我们这里有幸运的结合——又有伟大的领袖,又有中层干部!

1937年11月11日

在克里姆林宫同斯大林谈话。

季米特洛夫、王明、康生、王稼祥。

共产国际书记处的决定已经过时了。

“这就是人们坐在办公室里冥思苦想的结果!”

“要用一切手段加强对托派的斗争(决定中的话)。”“这是不够的。托派必须追捕、枪毙、消灭。他们是全世界的奸细、最恶毒的法西斯走狗!”

(1)对于中国共产党现在基本的问题是:融入全民族的浪潮并取得领导地位。

(2)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战争,而不是土地革命、没收土地。

(税收必须有利于战争。)

中国共产党人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以前是没收一切,现在是什么都不没收。

(3)口号就是一个:

“争取中国人民独立的胜利战争。”

“争取自由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

(4)中国人怎样打击外部敌人——这是决定性的问题。当这一问题结束时再提出怎样互相打的问题!

(5)现在中国人所处的条件比我们在1918—1920年时的条件更加有利。

当时在我们这里,国家在社会革命方面是被分割的。

在中国,民族革命、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把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了。

(6)中国有巨大的人力资源,我认为蒋介石说中国将取得胜利是对的。只是必须在已经打响的战争中坚持下来。

(7)因此必须创建自己的军事工业。

生产飞机。飞机容易生产,但是运输很困难。

(我们会提供制造飞机的材料!)必须创立飞机制造业。

还要生产坦克。

(制造坦克的材料我们能够提供!)

如果中国有自己的军事工业,谁都不可能战胜它。

(8)八路军必须要有30个师,而不是3个师。

这可以通过建立后备团的形式做到,以便补充现有的师。

必须建立新的团队。要日夜进行军事训练。

(9)在八路军还没有炮兵的时候,它的策略不该是直接进攻,而应该是骚扰敌人,把他们引进自己一方并在后方打击他们。

必须炸毁日本军队的交通线、铁路桥。

(10)不管英国还是美国,它们都不愿意中国胜利。出于它们帝国主义的利益,它们害怕中国胜利。

中国的胜利将影响印度、印度支那等。

它们希望日本由于打仗而削弱,但是不允许中国站起来。

它们希望有日本这条拴起来的狗吓唬中国,就像过去吓唬沙皇俄国那样,但是不希望这条狗有可能独吞猎物。

(11)对于中国的党代表大会来说,讨论理论问题是不适宜的。理论问题可以往后放放,等到战争结束以后。

谈论中国发展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现在比起过去,机会更少了。

(资本主义在中国不是正在发展吗!)

(12)建立民族革命联盟的问题迟迟未决。

(13)在武汉的八路军和党的合适的代表。

与斯大林的私下谈话。

我们大概要逮捕斯塔索娃。她原来是个卑鄙小人。基尔萨诺娃与亚科夫列夫过从甚密,是个坏人。

明森贝尔格是托派。他如果来,我们一定要逮捕他。您设法把他骗到这里来。

在转折关头:

(1)1905;

(2)1917;

(3)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

(4)内战;

(5)特别是在集体化这一完全新的、空前的创举中。

各种软弱分子从党的行列中淘汰了出去。他们在党的力量面前让步了,但是内心并没有接受党的路线,特别不能承受集体化(不得不向富农开刀的时候),他们就转入地下。他们自己没有力量,就同外国敌人联系,答应把乌克兰给德国人,把白俄罗斯给波

兰人，把滨海地区给日本人。它们等待战争，特别主张德国法西斯快些开始对苏战争。我们还在去年就知道了某些情况并准备处理他们，但是我们还在等待抓到更大的线索。他们本想在今年年初采取行动。但是没有下决心。他们又准备7月在克里姆林宫进攻政治局。但是又害怕了——他们对自己说：“斯大林会开始打枪，会闹出丑闻。”我们对我们的有人说，他们不会下决心行动的，我嘲笑他们的计划。

对于我们周围的某些人，我们的确疏忽了。

这对我们和对所有共产党都是巨大的教训。

1937年11月13日

同王明、康生和王稼祥的最后一次谈话。

（我们决定把王稼祥暂时留下作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

多列士的报告。

法国的形势和即将召开的党代会（12月末）。

警告我们对成绩不要产生不必要的乐观情绪和冲昏头脑……

对外政策的基本问题是，法国要有独立的政策，不能屈从于英国保守党人的意志，这样才有利于和平和坚决反对法西斯侵略者。

国内政策的基本问题是保存和巩固人民阵线以实现阵线的纲领；巩固人民阵线的基本问题是巩固同社会党及其群众和组织的联系；争取法国工人阶级的团结是基本问题。

巩固我们自己的党。

1937年11月14日

王明和康生动身。

1937年11月15日

同冈萨雷斯·佩尼亚（全国工人联盟书记和西班牙社会党主席，阿斯图里亚矿工）谈话。

他认为共产党和社会党的统一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存在着统一后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以及民主人士会减少对西班牙共和国的帮助的危险。

1937年11月16日

同保加利亚同志的会议。

(瓦西尔·科拉罗夫、博格丹诺夫、马列克、契尔文科夫、贝洛夫、斯皮利多诺夫)

取消政治局。只留中央委员会和书记处。

中央委员会的权能。

保共中央全会(1—2月)。

1938年3月下半月召开党的会议。

关于撤销基尔萨诺娃和斯塔索娃职务的决定。

任命契尔文科夫为列宁主义学校临时校长。

(录自《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六、青年共产国际与 中国青年运动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 苏区少年先锋队给中国团的信

(1932年6月1日中国共青团中央收到)

I 少年先锋队的目的与性质

一、中国的反帝与土地革命已经唤起了城市和乡村多数的劳苦青年群众起来反对地主豪绅高利贷[者]与军阀,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主要群众使用,反对不能容忍的苛捐杂税,反对农村中的奴役和一切封建的残余,反对整个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这一切的斗争已经使工农群众建立红军和苏维埃政权,与红军苏维埃同时自动地产生了许多少年先锋队的组织,少年先锋队团结在它的队伍中的成千成万的青年工农与共产青年团一道来帮助红军。少年先锋队是中国反帝和土地革命的战斗队伍,它在前线的战斗中曾经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红军与白军战争中和在苏维埃政府的一切工作中,少年先锋队都有莫大的功绩,它积极地参加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土地、肃清反革命[等工作]。

二、中国的共产青年团固然是要在少年先锋队中执行它的领导,同时应当在将来把少年先锋队造成一个群众军事化的与武装工农的组织,在共产青年团领导之下为中国的反帝和土地革命的口号而斗争。

共产青年团应当执行这种路线,把少年先锋队转变为一个包含数百万青年工人、雇农、贫农和中农青年群众的组织。

只有真正成为城市和农村中劳苦青年的群众组织,少年先锋队才能完成它在反帝和土地革命中的任务。

三、下述的任务应当是决定少年先锋队更进一步的存在与最大的发展:

1. 少年先锋队是一个工农的广大武装群众组织,是共青团一个最重要的后备军,少年先锋队在共青团领导之下,积极参加巩固和发展苏维埃的建设,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必须坚决地反对把少年先锋队变纯粹文化组织的倾向,缓缓进行教育工作,脱离了前线上斗争和苏区中的阶级斗争。

2. 少年先锋队全面地进行青年的军事训练为红军训练后备队。少年先锋队在前线上与红军共同积极地作战,少年先锋队的这种特殊性质是与目前苏区的战斗任务相适合的,而且适应参加少年先锋队的劳苦青年的需要,就是在共产党与共青团领导之下积极地反对地主豪绅、军阀、国民党、资本家和帝国主义。

3. 必须坚决地打击把少年先锋队和红军对立起来,以及把少年先锋队变成第二个青年红军等倾向,共青团必须防止少年先锋队和红军部队间的冲突,必须经常地解释少年先锋队是红军的助手,在红军司令官的军事指导之下工作。

4. 在青年团领导下的少年先锋队的一切教育工作,适当与少年先锋队的斗争和参加阶级斗争密切地联系起来,目的在使少年先锋队的队员能自觉地参加阶级斗争并且以阶级的精神去训练他们。

四、少年先锋队在组织成分上是青年工农的组织,不仅允许青工、青农、青年雇农参加,而且允许农村中的一切劳苦青年(中农)[参加]。因此少年先锋队在斗争的目的和它的任务的性质上看来,是党和青年团的一个武器,必须在少年先锋队的组织中有坚强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保证少年先锋队的这种作用。如果没有

保证青工和青年雇农在少年先锋队队伍中的领导作用，在招收新少年先锋队队员时，没有保持阶级的原则，有些少年先锋队可以从党和团的武器变成阶级敌人的工具，共青团是少年先锋队中无产阶级领导的主要传达者，应当经过少年先锋队中团的指挥人员，经过团组织来巩固团在少年先锋队中的领导作用。

少年先锋队是共青团的一种附属组织，青年团经过这个附属组织传达它对广大青年群众的影响，青年团是劳苦青年群众的先锋队，是一个在党团领导下的战斗的群众的青年工人的共产主义组织，少年先锋队应当是一个更广泛的辅助组织，吸收城市和农村中的劳苦青年到它的队伍中，一方面应当反对把少年先锋队和青年团对立起来，反对以少年先锋队代替青年团即是取消青年团，在另一方面则必须反对剥夺少年先锋队的任何独立作用，反对少年先锋队的取消倾向，各地苏维埃与其他机关等企图解散少年先锋队的组织，这明白地表示他们不能认识中国土地革命的特点，即是中国的土地革命由于争斗的农民自己的创造性而建立起来的斗争形势——游击队、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等，否认少年先锋队有存在的必要，事实上就是压迫农村中劳苦青年的革命独立与积极性，妨害中国的农民在实际上已经证明有效力的阶级斗争的方法和方式，少年先锋队中的政治领导作用应当是属于共青团，而不应当属于苏维埃机关和工会（各苏区现在就有这种现象），因为在纲领、任务、年龄、组织上，只有青年团才能是少年先锋队中党（共产党）的影响的传达者。

少年先锋队是发展共青团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共青团应该采取坚决的行动大批地吸收比较好的检验过的少年先锋队队员到团中来，要在每一个少年先锋队中建立起一个坚强的共青团核心，每一个青年团员应当加入少年先锋队，当派遣少年先锋队到前线去时，团的支部或区委应同党共同决定哪些团员应当留下继续工作。

II 少年先锋队的组织和构造

五、应当允许 16 岁到 23 岁的青年参加少年先锋队。每一个青工、青农和青年学生(劳苦阶层而来的)都可以当少年先锋队队员。在吸收非无产阶级分子的时候,必须要注意只收那些不参加剥削他人劳动的青年,主要是那些同情苏维埃,帮助党与团巩固苏维埃和红军,帮助执行党与苏维埃最重要的经济与政治设施的分子。

六、在广泛地吸收青工、雇农、贫农青年、苦力、中农青年到少年先锋队中来时,必须防止一切敌对的分子(地主、富农、豪绅等)打进少年先锋队中来,绝对地封闭他们进到少年先锋队中来的道路。必须清除少先队组织中的一切城市和乡村中的剥削分子,但不是用一次的总的洗刷(这是有害的),而是用彻底的工作揭穿和驱逐这些敌对的分子。

七、必须采取坚决的路线提拔工人、雇农、苦力、贫农到少年先锋队中的领导位置。必须反对右倾的表现,害怕选举这些青年任领导工作,共青团的任务是供给少年先锋队一个实际能执行党、团、苏维埃政府指示的无产阶级分子构成的领导(为这种目的可以开办学校,为少年先锋队训练工作人员,只有工人、苦力、雇农、贫农及受过以严格检验的中农方可以改变各地少年先锋队的领导)。

八、关于少年先锋队的构造,应当按照下列的方法来建立:

1. 少年先锋队应当在青年团的政治领导之下活动,党与苏维埃政府(政府的军事机关)经过青年团执行它们对少年先锋队的领导。但是在前线少年先锋队一切行动的军事行动应当属于红军的军事机关。然而在必需的时候,少年先锋队根据党的指示,可以出来反对那些受了阶级敌人的影响不执行并拒绝执行共产党路线和指示的苏维埃政府的个别机关。

2. 必须顺着青年团支部与委员会组织少年先锋队,每一个少

年先锋队应有一个参谋部，这个组织包括(1)总队长(团取得党的同意，指派团员充任)；(2)参谋长(由军事机关派军事工作的同志充任)；(3)党代表(由党指定同志充任)。为要配合少年先锋队的行动，少先队的区与特区的参谋部可以组织团的结构。为要执行对少年先锋队的日常领导，各级团部由上级到下级应当组织军事部负责切实地指导少年先锋队。

3. 关于改换指导机关或解散某些在阶级敌人影响下的少年先锋队等问题，应由青年团与苏维埃政府的军事机关共同决定，至于最后的决定则属于党的机关。

4. 不应当在少年先锋队的周围组织儿童队，应当由儿童团去组织儿童，儿童团是在团的直接领导之下活动。

5. 少年先锋队在它的一切工作中应与赤卫队有密切的联系。

Ⅲ 少年先锋队的任务

一、帮助红军与青年的军事训练：

1. 少年先锋队参加红军的一切斗争，在前线，少年先锋队是在红军官长直接领导之下。

2. 一遇红军官长的要求，少年先锋队应当把它最好的部队归红军派遣，少先队供给红军的后备军由他们最好的队伍中，组织红军的营、团、队等。自动地动员少年先锋队队员参加红军，少年先锋队执行侦探的工作等等。

3. 一切少先队队员(没有任何例外)应在红军教练员领导之下受军事训练(射击训练、军纪、研究红军的战略、构造与任务等等)。

4. 因为少年先锋队也要广泛地吸收妇女，所以必须从妇女中组织特别的卫生队，同时号召她们参加一般的斗争。

5. 必须用矛、刀、来福枪(不过不能妨害红军)武装少年先锋队。

二、帮助苏维埃政府：

1. 少先队应当积极地参加对苏区地域中反革命派的走狗的斗争。要把少年先锋队最好的队伍供苏维埃机关使用，在执行苏维埃政府的训令时，少年先锋队受了苏维埃政府的训令时，应当参加没收地主的土地，参加反对藏匿粮食的斗争。组织粮食的供给，执行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法令，帮助执行严厉的阶级路线。

三、关于内部的教育工作：

1. 少年先锋队是一个有阶级纪律的组织，它的目的是在共产青年团领导之下，从劳苦青年中，培养成坚决的革命者和阶级的战士。反对地主、资本家、富农、豪绅，反对整个国民党，反对一切的军阀与帝国主义。少先队斗争的目的是帮助党与团建立和发展全中国的苏维埃政府。

2. 根据这一观点，少先队应当把它的活动的每一步联系到同无产阶级与贫农在一条战线上参加斗争。

3. 因此少先队在执行前述的任务时，也必须以阶级精神进行少年先锋队队员的政治与文化教育，组织政治研究班，各种团体（如研究苏维埃法律、红军战略、苏联的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为工作人员和队员开办学校，少年先锋队必须铲除自己队伍中的文盲，应当与一般人民的宗教偏见作理论上的斗争。

4. 少年先锋队应当在共产青年团与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组织苏区劳苦青年的广大体育运动，把这一任务与军事化青年的任务联系起来，少先队也应当在自己的队伍中组织各种体育团体（如游泳、赛跑、足球、篮球、队球、掷沙袋等等）。

四、只有在下述的条件下，少先队才能顺利地执行它的任务，完成它在中国革命中的英勇作用：

1. 在少先队的一切工作中要有无产阶级领导（提拔工人、雇农、苦力，反对敌对分子侵入少先队），征调少年先锋队队员到共产青年团中来。共产青年团强有力的领导使团〔成〕为在少年先锋队中

党的影响的传达者,这是保证无产阶级领导一个最有力的条件。

2. 作不调和的斗争反对少年先锋队本身内一切脱离共产党与共产青年团路线的危险的倾向与错误,必须作坚决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一方面反对最危险的倾向(如对阶级敌人采取调和态度,容许富农、豪绅分子打进少年先锋队队伍中和它的指导机关中),反对拒绝参加阶级斗争,拒绝在前线作战,只进行纯粹的文化工作等倾向,在另一方面要反对这些错误,如不正确地反宗教的斗争(如毁灭寺庙、祖坟、佛像等),反对企图把少年先锋队变为第二个共产青年团,或者代替共产青年团的工作。共产青年团与少年先锋队的指导机关,应当进行不断与不调和的斗争,反对这一切错误倾向。

少共国际执行委员会

原载《北方列宁青年》,1932年第4期,第8—16页。

(选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 全会的总结和青年共产国际支部 争取劳动青年群众的任务的决议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十二月扩大全会通过)

(1932年12月17日—28日)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的决议,^①赞成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政治路线和实际工作。

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及其对于动员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反对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强大的国际影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革命高潮的增长,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持续深化,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对立的加剧以及所有帝国主义矛盾的空前激化和盘根错节,完全彻底地证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关于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已告结束的看法是正确的。

在这种向革命和战争新阶段的转变的条件下,劳动青年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不断增大,共青团肩负的责任也日渐增大,因它要培养青年为即将来临的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决定性革命战役做好准备。

^① 这次全会于1932年8月27日至9月15日在莫斯科举行,有35个国家的174名代表参加。全会听取和讨论了库西宁、台尔曼、冈野进和曼努伊尔斯基的报告并通过相应决议。

劳动青年的地位和革命热情的增长

在危机年代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千百万失业青年大军的形成，从未参加生产过程的失业青年阶层人数的增加，工资的不断减少和劳动条件首先是工人青年劳动条件的普遍恶化，异乎寻常地降低了含辛茹苦的青年一代的物质生活水平。

资本主义剥削为青年工人特别是为成长中的青少年制造了奴役性劳动条件，青年雇农所受的资本主义剥削尤为残酷，他们身受着地主、种植园主和农场主的无情压榨，得不到任何法律保护。

与劳动青年这种经济地位的日益恶化同时出现的，就是其文化水平的普遍降低。

资产阶级为了反对革命高涨，在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日益走上法西斯化道路的同时，又特别残酷地猛烈攻击青年工人革命组织，剥夺无产阶级为青年争取到的权利（首先是选举权、集会、出版和结社权），解散青年革命组织（如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准备在德国禁止共青团活动，在中国、南斯拉夫、波兰、意大利和保加利亚则广泛使用枪决和刑讯。

资产阶级除了加强政治恐怖以外，考虑到青年群众中深深潜伏的动乱，青年工人缺少阶级经验和由于经济危机在青年中存在一个相当大的游民阶层等情况，就依赖法律、宗教和群众性青年组织，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以便把青年的积极性引向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轨道，同时建立了强制性的青年法西斯化制度和军国主义化制度。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认为必须提请青年共产国际各支部十分严重地注意，务应在最短时间内消除共青团在反对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的斗争中和共青团在反战工作中的软弱状态，动员劳动青年群众去反对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和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

侯均初译自《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与青年运动》第1卷,第423—425页。

(录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巴黎世界青年反战和反法西斯 代表大会宣言(节录)^①

(1933年9月22日—24日)

致全世界青年书

你们,全体男女青年工人、学生、农民、职员、士兵、海员和失业者们;

你们,一切在工厂、兵营、机关、田野当牛做马受苦受难的人们,一切在街头踟蹰,疲惫不堪地伫候在职业介绍所小窗口前的人们;

你们,一切每日每时向自己提出“明天我们将是什么命运?”这个问题的人们。

我们,这些和你们风雨同舟的患难兄弟,来自你们身边但不甘忍受苦难的人,我们号召你们联合起来,团结起来。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相会在全世界青年反战和反法西斯代表大会上,讨论我们的命运和我们共同的前途。

在这个大会上,我们代表的是那些派遣我们赴会的千百万劳

① 青年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9年11月20日—26日在柏林秘密举行。十四个共产主义青年团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19名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共代表约25万名团员。制订青年共产国际的政治纲领和组织章程是大会议程中最重要的项目。此外,还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各国代表所作的报告,确定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青年组织的任务。青年共产国际赞成共产国际的政纲,作为一个支部加入了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柏林代表大会开创了青年革命运动的新阶段。

动青年和所有那些陌生人的意志。

我们代表着青年一代最迫切的需要,不仅代表他们所关心的事情,而且是他们意志的代言人,我们很和谐地制定了青年的战斗纲领。

我们调查了资本主义诸国各处青年的生活情况并确认青年一代的命运几乎到处都是个样子:受着厚颜无耻的盘剥、工资不足糊口、失业,无法参加社会和政治生活。

但是,我们同样确信,越来越广大的青年群众正起而反对这一令人切齿痛恨的状况……

现在,阿姆斯特丹和反法西斯的运动把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在反对万恶的制度这个广泛的斗争口号下采取行动,为了参加反战和反法西斯的斗争,我们探讨了战争和法西斯产生的原因,并且看清楚了,这些原因根植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我们青年应当参加这一运动,我们组织起世界青年委员会,各国和地方的委员会,因为我们认为踏踏实实从事自己的事业是义不容辞的,我们应该齐心协力地与反战和反法西斯委员会一道工作,自觉遵守纪律并吸收一切自愿和乐意像我们一样为反战和反法西斯而斗争的人们。

这就是我们向自己提出的任务。

首先我们宣告扩大我们运动的坚定意志,以便把所有奋起反战和反法西斯的劳动人民各阶层的青年,不分党派,不问信仰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我们担负起在青年群众中扩大宣传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欧洲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和世界青年代表大会决议的责任并为这些大会所提出的目标而斗争。

我们首先在自己工作的地方,在我们参加的组织里,特别是在工会中开展我们的活动,以便把越来越广泛的青年群众和全世界的成年人争取到我们方面来。

我们将和一切反对扩大统一战线或者想在任何虚伪的口号下

破坏我们统一战线的人进行不懈的斗争。

我们对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所进行的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和战争宣传宣战，不论他们采取“民主”的方式还是建立赤裸裸的法西斯专政。

我们认为自己首要的责任是每时每刻全力进行斗争，反对以任何形式准备战争。我们懂得，我们的责任乃是首先最坚决地反对本国的帝国主义。我们认为，一旦发生战争，我们的任务是以二倍、三倍的努力在本国继续这一斗争。

我们要到兵工厂去对青年工人讲：“你的剥削者让你去保卫祖国，但难道你的祖国也是他们的祖国吗？”

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将有义务保卫作为国际和平与自由之故乡的苏联。

我们指望近几个月内向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派遣我们这个运动的代表团。

我们将全力支持殖民地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同时也将为撤出殖民地的军事力量而斗争。

我们向自己提出的直接任务就是动员全世界工人，以帮助我们的各国（在这些国家里人民被法西斯专政所禁锢）兄弟用革命斗争的手段去对付本国的刽子手。

在每个国家里，我们都将揭露一切法西斯化的形式和阴谋，并将尽全力反对资产阶级阻止劳动人民为自己的权利而展开斗争和解除人民武装使之对突发的战争毫无准备的做法。

为了使我们的决议发生效力，应该每时每刻地贯彻实践这些决议。从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们反战和反法西斯的运动应把自己的积极性贯穿于下列任务：

马德里社会主义青年团

瑞典社会民主青年团

丹麦社会民主青年团

德意志—奥地利共产主义无产阶级青年团
捷克斯洛伐克克拉德诺区社会民主青年组织
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团
罗马尼亚工人青年团
瑞士社会主义青年组织

黄修荣译自《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与青年运动》，1977年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第1卷，第46—51页。

附：

青年共产国际纲领

一、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异乎寻常的增长，使资本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它意味着托拉斯、辛迪加、卡特尔和财政资本统治的建立。因销售商品和获得原料的必要性而产生的殖民政策和各国资本主义集团的竞争势必引起帝国主义战争。资本主义的社会势力无法消除 1914—1918 年战争的后果，这场战争破坏和打乱了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生活。使人胆战心惊的战争灾难：饥饿、财政和工业危机、千百万人的死亡把人类带到了绝境，摆脱绝境的唯一出路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这场革命的物质条件已经完全成熟，阶级矛盾非常尖锐。革命的胜利只取决于国际无产阶级的斗志和能力。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的特点就是革命苏维埃政权。各国无产阶级最近的任务是为推翻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精神上的统治并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如果无产阶级坚决摒弃陷于改良主义和与资本主义妥协的泥坑并以挽救旧的社会制度为目的因而成了工人阶级叛徒的第二国际，如果工人群众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领袖共产国际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只有这样，这场斗争才可望获胜。在革命时期首先应该采取进行群众斗争（示威游行、罢工、同盟罢工、武装起义）的革命方法。但在所有的革命情况下，无产阶级原则上不应该拒绝包括议会斗争在内的任何政治斗争手段。参加议会与否，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并应由每一个国家的组织根据具体条件来决定。

二、如果在资本主义桎梏下成年工人的处境可谓是极端困难的,那么养成工的处境则是绝对不能忍受的。低微的工资、过长的工时、企业主和师傅野蛮的态度,这就是青年工人处境的特点。在手工业企业中,情况更加糟糕。那里的学徒要完全驯服地听任师傅摆布,青年工人受到的这种无止境的剥削阻碍了他们体力和智力的发展。资产阶级国家让青年工人受到的教育和得到的知识只是最起码的,仅仅保证资产阶级国家能把工人当作能出力干活的可用的牲口来继续剥削。资产阶级力图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青年。学校、教权主义的、资产阶级的青年团体和军国主义抱定的宗旨是让青年脱离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将其培养成忠于帝国主义的士卒。世界大战使青年的处境更加恶化,千百万人被派往前线充当炮灰,千百万人被赶去从事资本主义生产。尽管国家和企业主从青年身上榨取了全部精髓,但青年所得到的只是最低的政治权利和人权。青年工人的这种处境迫使他们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去同帝国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

三、建立特别的无产阶级青年组织所应具备的条件是:1. 青年在生产过程中和社会上的处境,这种处境迫使青年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投入斗争(改造劳动、改造学校);2. 青年的心理特点(感情胜过理智、接受能力强、关心各种新事物、革命的气质、召之即来、不怕牺牲);3. 必须采取特殊的方法对青年进行社会主义的和革命的教育(业余工作和独立自主的组织工作、积极参加政治活动、采取各种方法使青年得以具备未来作为无产阶级战士和革命运动的代表所需的品质)。

四、工人青年是无产阶级最积极最革命的部分。当前,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最重要的任务是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孜孜不倦的政治鼓动、组织并进行政治发动,为共产主义进行直接的斗争,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统治,把青年工人培养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者。

五、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坚决反对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右翼社会

党人——资产阶级走狗(谢德曼、列涅尔、比索拉基、雷诺杰尔、亨德逊、龚柏斯、特鲁尔斯特、勃兰丁、王德威尔德,等等),反对“社会主义”中派(考茨基、麦克唐纳、罗伯特·克里姆、包维尔,等等)。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同时还要反对工团主义思想,因它不承认以争取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的政治斗争,否认政党对这一斗争的领导,否认无产阶级的集中制。它们应该反对无政府主义思想,因它不承认存在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国家,在经济领域里宣扬小资产阶级思想。它们应该反对依附于上述党派的一切青年团体。青年组织在自己的政治斗争中,应该要么站在参加共产国际的某个派别或政党的纲领的立场上,要么站在共产国际纲领的立场上。

与政党之间组织上的相互关系取决于下列两个基本原则:

1. 青年的独立自主;2. 密切联系和互相支持。

六、尽管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如同迄今为止所实行的那样,继续在它的整个思想和实践上进行反对资产阶级军国主义的斗争,然而他们并不维护自由主义的和平主义思想。它们知道,为了推翻帝国主义,为了保卫无产阶级的胜利专政不受资产阶级的侵犯,工人阶级将被迫拿起武器。反对资产阶级军国主义、主张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拥护红军——这就是共产主义青年的口号。

七、争取改善无产阶级青年经济状况的斗争是青年组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青年劳动条件的改造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有可能。当前在资本统治的现阶段,只有通过革命的阶级斗争才有可能部分地改善青年工人的处境。但是,绝对不要同企业主和资产阶级国家合作。

八、培养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战士和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建设者,是共产主义青年组织起码的任务。共产主义觉悟和战斗力的养成,一方面要靠参加政治斗争,另一方面要靠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因它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体系锐利的斗争武器。社会主义教育加

上积极参加政治斗争是培养无产阶级青年战士的方法。

九、除上述各点外,共产主义青年组织还要把用马克思主义精神教育青年,提高青年的文化水平也当作自己的任务。工人青年应该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人类知识的宝库,知识是青年人进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必不可缺的。青年应占领通向科学、文化和艺术的道路。青年的队伍中,除了诚挚肯干的工人、英勇无畏的红军战士之外,还应该培养出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学者、技术员、组织者、哲学家、诗人和艺术家。工人青年及其组织的使命是站在建设新的充满共产主义精神的无产阶级文化的最前列。

十、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应该培养无产阶级青年具有健康的体魄和精神。所以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应该关心青年的体育。这项工作目前虽然只是整个活动的一部分,但对青年工人来说有很大的意义。

十一、尽管把广大无产阶级青年群众争取过来是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利益所在,但这不应该有损于共产主义的纲领和策略。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对农业工人和最贫苦的农民进行宣传是十分重要的。

十二、青年共产国际认为单独的社会主义青年学生组织的存在已是完全多余的。青年学生中真诚的革命者应该是无产阶级青年组织的成员,完全平等,一视同仁。在一般青年组织内部,青年学生团体的建立应该同各国具体情况相适应。

十三、在当前的革命时期,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无产阶级斗争,这场斗争才能以胜利而告终。对于青年的斗争也是一样。所以青年的政治组织应该合并到青年国际当中来。青年国际的首要任务是统一领导各国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全部工作和斗争。它的决议是所有青年组织的最高法律。它的实际任务是在国际上进行鼓动的总方针,从道义上和物质上给予支持,创建新的团体,建立各国青年组织紧密的团结。

十四、青年共产国际拥护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是共产国际的一部分。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第三国际有组织上的联系，同它实行密切的战斗合作。

黄修荣译自《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与青年运动》第1卷，第51—56页。

青年共产国际章程

一、为实现构成政治纲领基础的诸原则，无产阶级青年组织联合组成青年共产国际。

二、凡承认青年国际的政治纲领并在行动中遵循本纲领和国际决议的青年组织都可以加入这个国际联合组织。每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组织作为青年共产国际的成员。

三、接受新成员由执行委员会决定，发生争议时，国际代表大会会有最后裁决权。开除某成员只能根据代表大会决议。

四、这个联合组织的机关是：1. 国际代表大会；2. 国际局；3. 执行委员会。

五、国际代表大会按顺序每年召开一次，特别会议则根据执行委员会、国际局、或三分之一成员组织的要求召开。根据代表大会的决定，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可通过表决予以确认。

六、国际代表大会的议程应由执行委员会提出建议，但可以按国际局和各团体的要求予以更改。国际代表大会代表根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选举产生，名额由执行委员会根据成员数目确定。

七、国际局由每个组织各派一人与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共同组成。代表由各组织分别指派。国际局单独建立，每年开会两次。

八、国际局在两次世界代表大会之间就一切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作出决定，监督代表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和执行委员会的活动。

九、执行委员会由代表大会选出五人组成。它单独建立。执行委员会的驻地由代表大会确定。

十、执行委员会是青年国际的执行机关。它的主要任务是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在各国进行宣传,在没有组织的地方建立组织;力求做到各青年组织有统一的纲领和策略;集中一切力量共同行动。执行委员会和国际局有权建立下属的工作委员会,或吸收某些有发言权的同志完成个别任务。

十一、执行委员会出版一个国际青年刊物,以活跃国际宣传,进行共同斗争,教育和培养青年。该刊物由执行委员会编辑。

十二、各组织每年向青年国际交纳会费,每千人交 50 法郎。不能统计成员数目的国家,按青年刊物订户的数目缴纳。

十三、加入青年国际的团体应按月向执行委员会提交有关本团体情况和活动的报告,并按时寄上本组织出版的各种报纸、小册子、传单和其他出版物。

十四、执行委员会同共产国际执行局保持经常联系,按平等权力与它互派代表团。

黄修荣译自《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与青年运动》第 1 卷,第 56—60 页。

(录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5 年版。)

库西宁关于青年反对法西斯主义 和反对战争危险斗争的报告^①(节录)

(1935年8月)

在资产阶级青年组织中进行工作

.....

在某些殖民地国家,例如在中国,也必须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如众所知,中国苏区的共青团员建树了真正神奇的英雄业绩。在靠近前线的区域,他们善于巧妙地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但是在国民党恐怖气氛笼罩的白区,他们运用这种策略却很不得力。法国著名作家马尔罗是寻找最崇高的英雄主义形象的,他应当到中国去。在那里,他会找到他要寻求的英雄的中国青年的伟大事业。然而,在恐怖气氛下要摆脱关门主义的残余,甚至对我们中国同志来说,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他们应当学会渗透到阶级敌人建立的广泛的群众组织中去,他们能做到这一点,他们是一些很有才干的人。

李玉贞译自《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1935年第5期,第101页。

① 这是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库西宁在陶里亚蒂之后所做的补充报告,库西宁着重论述了开展广泛的青年统一战线运动的问题,他肯定了美国和法国在这方面的经验。

(摘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5年版。)

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1935年9月25日—10月11日)

季米特洛夫的开幕词

(1935年9月25日)

[季米特洛夫同志登上讲坛时，全体起立；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美国、中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代表团用不同语言欢呼。掌声持续很长时间。]

同志们！我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你们致以热烈的战斗敬礼。（暴风雨般的掌声）

无产阶级和世界被压迫者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斯大林同志曾说“国际主义是贯穿共青团工作的基本思想”，他精辟的话语生动地体现在你们身上。

你们艰苦漫长道路上的任何危险，法西斯和警察的任何警戒线，都不能阻挠你们前来无产阶级的红色首都聚会，在国际主义的兄弟般友好的大家庭中讨论劳动青年力量联合的课题。

你们这次大会是焕发着革命青春和力量的朝气蓬勃的大会。这里的确是人才荟萃，许许多多为劳动青年事业而奋斗的优秀模范战士出席了你们的大会。

在你们代表席位上有英勇地参加阿斯图里街垒战，负过伤的狄艾戈。（掌声）

你们中间有经过八年铁窗生活的杨尼茨基，为了再度积极参加波兰革命青年的斗争，他越出了监狱。（掌声）

你们中间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战的英雄的中国红军的政委(原文如此)共青团员宋一平。(掌声)

.....

青年共产国际的行列里培养了一些坚强、忠诚、为工人阶级摆脱法西斯主义、摆脱资本统治而斗争的英勇无畏的战士。像莱蒙·雨奥、格林、米哈尔·沃尔弗、契莫丹诺夫这样的一些先进的青年运动的代表者在青年共产国际的队伍里成长起来了,他们今天都在座。他们以自己的战斗积极性,不仅在青年共产国际,而且在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和其他青年组织中赢得了声誉。(暴风雨般持续不断的掌声)

我代表老一代革命者,怀着自豪与爱慕的心情祝贺以你们为代表的世界各国劳动阶级的光荣的青年近卫军!(暴风雨般的掌声)

同志们!一个月之前,就在你们今天开会的这个大厅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结束了工作。

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天才学说为指导,认真讨论了国际工人运动的一切主要问题,制定了克服运动分裂和在反对剥削者和压迫者斗争中、在反法西斯和反战斗中团结劳动人民力量的途径。大会特别注意青年运动这个国际革命运动最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大会十分了解,劳动人民阶级斗争的胜利取决于青年运动健康顺利的发展和这场运动发动群众的广度。

.....

我们期待着,你们在现有经验的基础上,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为依据,定能找到正确方法去完成你们青年运动的最重要的任务——把所有非法西斯青年的力量首先是青年工人的力量联合起来的任务,与社会主义[国际]的青年统一起来的任务。

然而,如果共青团仍像过去一样,企图把自己的队伍建成青年

的共产党，如果仍将满足于宗派主义的脱离群众的生活，那么上述任务是完成不了的。

所有反对法西斯主义的青年，都愿意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因此，同志们，你们应当找出适当的工作形式和方法，保证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建立新型的群众性青年组织，这些组织应同情劳动青年的任何迫切利益；保证不照搬党的模式，而去建立那种为青年的一切利益而奋斗、用阶级斗争精神、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教育青年的组织。

这就要求本次大会十分认真地检讨和重新估价共青团的工作，以便真正做到重建青年团并大胆地摒弃一切妨碍群众工作的开展、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实行青年团结一致的种种因素。

.....

我们很高兴地指出，我们法国和美国的年青同志积极参加了顺利发展的青年统一战线的群众运动，而且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许多成绩。青年共产国际的各支部都应学习法国和美国同志的这种经验。（掌声）

.....

同志们！你们应当学习，应该边斗争，边学习。

要把你们日常的实际活动向深入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著结合起来，因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革命的实践。

你们要成为先进的、坚定的、无畏的反法西斯、反资本主义的战士。（掌声）

把争取人类解放摆脱资本主义奴役的旗帜高高举起！把共产国际的旗帜高高举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把全世界青年劳动者团结在这面旗帜周围！这面代表最伟大胜利的旗帜已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国土上飘扬了，这面旗帜定将胜利地插遍全世界！（全体起立。暴风雨般的掌声）

李玉贞译自《共产国际》俄文版,1935年第28—29期合刊,第9—12页。

关于青年统一战线任务的决议(节录)

资本主义国家青年一代劳动者的生活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空前恶化,并且正在日愈恶化。大多数青年受着残酷的压迫,处于无权地位。

目前,广大劳动青年阶层生活的特点是什么呢?

是群众性的失业;是从来就没有职业也根本不可能谋得职业的青年人的数量不断增加;是在业者受着苛重的剥削;是农民青年的贫穷化;是青年人没有政治权利和享受文化生活的权利;是受普通教育和专门教育的机会急剧减少;是前途渺茫;是青年人正常生活遭到破坏,流浪者、卖淫现象和赤贫日益严重。

.....

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法西斯主义威胁着弱小民族的独立(意大利法西斯反对阿比西尼亚的战争),加剧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压迫,特别是(德国法西斯)把军事挑衅的矛头指向苏联。法西斯主义正准备着一场惨绝人寰的夺走几百万青年人大生命的大屠杀。

然而,反对法西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运动也同时在发展着。各种团体都有越来越广泛的青年群众不分民族与宗教信仰更加努力地寻求改善生活的道路,开始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参加争取自身利益、争取自由与和平的斗争。

可是,青年的力量是分散的,因此他们的斗争不会取得决定性的成功。全部经验表明,青年如果不在反对共同敌人、反对法西斯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站在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一边,那是不可能有效地卫护自身利益的。

一、必须改变青年团的性质

1. 劳动青年的事业迫切要求把青年人联合到真正群众性的非党的青年组织中去,不仅吸收共产主义的,而且吸收社会主义的以及无党派的、民族革命的、和平主义的、信奉宗教等的青年人加入组织。这些组织除了经常关心劳动青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外,还要用阶级斗争的精神、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教育本组织的成员。

建立这样新型的、真正群众性的组织,要求根本重建共青团和完全抛弃任何宗派主义的、照搬党组织的做法。

决定青年组织的内容和活动的,不应是什么抽象的政策,而应是劳动青年一代的所有切身利益和青年的各种正常的需求。这些组织的活动安排应当完全符合青年本身的愿望和需要,让青年人在学习、组织和争取劳动阶级切身利益的过程中自己教育自己,培养为自由、为社会主义、反对反动势力、反对法西斯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精神。

2. 这些青年组织的门户应当向工人阶级、农民、学生和其他真心实意愿参加这些组织的工作和发展这些组织的青年人敞开。

这些组织的全部活动必须建立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其成员应有充分的权利民主地确定本组织的任务、工作形式和性质,这些组织的领导应通过示范和说服的方法去实施,而不能用命令的方法。领导向本组织成员特别是向新团员提出的工作要求和纪律要求,都应符合青年组织的群众性特点,而不应像是对某个宗派成员提出的那种要求。还必须放弃那些对青年人过高的,一般是向党员才提出的要求。

青年组织的独立性和非党的性质并不排除这些组织与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共产党建立经常的联系。相反,这还是劳动青年的事业所要求的。大会认为让所有成员都相信这一点,以及相信

青年共产国际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必要性,乃是极为重要的任务。

3. 各国、各地区和各城市青年团的组织形式不要求划一,而应符合青年运动的具体条件和特殊任务。青年团组织最重要的形式当为各种各样能满足青年文化、经济、职业和政治利益的俱乐部和小组,地方性的联合会,训练班,公共活动,失业者、青年农民、妇女和学生的个别小组等。

[二——六略^①]

七、青年参加反帝人民阵线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开展强有力的青年运动,为扫盲、在学校里用国语授课、为国民文化的自由、为健全日常生活和改善生活工作条件、为民主权利和自由、为反对无权地位和残酷剥削而斗争。

本着这些目的,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的团组织就应与一切群众组织首先是与青年的民族革命组织和民族改良主义组织建立密切的联系。同这些组织和其他群众性青年组织合作时,要考虑到青年中个别阶层间的差异,同一个国家各不同地区间的差异,必须在争取劳动青年利益的广泛纲领的基础上,为把年青一代的力量联合起来而建立农民的、印第安人的、黑人的、学生的、妇女的、文化的、运动的和其他的青年组织,以及在已有这类组织的地方将其扩大并联合起来。

吸收青年参加反帝人民阵线的任务,要求开始建立新型的民族解放性质的群众青年组织的工作,而不是去建立狭窄的、脱离基本群众的政治小团体。这些群众组织应能吸收最广泛的青年阶

^① 第二至六部分略去。略去部分的内容是:二、为工人青年的统一而斗争;三、为整个青年一代力量的联合而斗争;四、法西斯统治的国家里群众性青年运动的任务;五、青年在工会工作中的任务;六、体育运动中统一战线的任务。

层,以及民族革命的和民族改良主义的组织。这些组织不仅应当
在城市举行工作,而且应该在农民青年基本群众所在的地方以满
足青年的一切生活需求为基础进行工作,培养青年对帝国主义压
迫者的革命义愤,培养他们对于本国人民摆脱一切剥削和奴役的
解放事业的忠忱。

在中国,最重要的任务是在劳动青年争取改善生活的斗争中,
在为提高文化、为民主权利、为竭尽全力使青年更加积极地参加全
民反对帝国主义征服者拯救祖国的斗争中建立全体青年及其组织
的群众运动。

八、反对法西斯主义,为社会主义, 为劳动青年自由幸福的生活而斗争

大无畏的反法西斯战士季米特洛夫下面的这段话应当成为全
体革命青年斗争的指导思想:

“为了反对阶级敌人,我们要与最广大的群众找到共同语言,
找出彻底克服革命先锋队脱离无产阶级群众和全体劳动人民的途
径和克服工人阶级本身脱离自己的在反对资产阶级和反法西斯斗
争中的天然盟友的途径。”

列宁、斯大林指出了我们的道路。

共产国际的舵手季米特洛夫指出了我们的道路。这是一条以
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为基础,团结和组织青年劳动者所有力量的
道路。

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挽救青年免受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
危险之害,尽一切力量为青年人争取一个自由、欢乐和幸福
的生活。

李玉贞译自《共产国际》俄文版,1935年第28—29期合刊,第
61—65页、66—69页。

大 会 宣 言

《为青年一代的统一而奋斗》

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号召各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在本宣言的基础上为青年一代劳动者的权利而斗争。

青年应为哪些权利而斗争？

首先，应争取一个劳动者最起码的权利——靠自己的劳动生活的权利和接受职业教育的权利。

莫非当代青年已有这种权利了吗？不，几百万有能力从事创造性劳动的青年男女遭到失业，处境艰难，他们中的大多数毫无希望得到工作和学到技术……

第二，劳动青年无权享受文化生活和接受教育。

资本主义国家削减人民教育的经费以扩充军费。中等学校的大门里是不向劳动阶级的广大青年群众开放的，他们不可能去看戏和听音乐会，没有可能享受假期和很好地休息，无法利用最好的图书馆和研究伟大诗人与思想家的重要著作。

没有文化和贫穷势必导致广大青年健康恶化、道德沉沦和犯罪率增加。

因此，代表大会声明：青年有权利要求更好的生活待遇，理应捍卫健康的文化生活和受教育的权利。

第三，青年一代需要民主权利和自由。没有自由，青年们就软弱无力。

可是法西斯却剥夺了青年仅有的一点自由，践踏青年的权利，它把德国、意大利、波兰、芬兰和巴尔干变成了劳动青年的地狱。

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里，法西斯也正在抬头，它是文明的敌人，是最反动的金融资本界的工具……

因此，大会声明：青年如果要生存，就应为反对法西斯而战，为

任何些微的民主自由而战。

第四，卫护和平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与青年一代休戚相关。

和平正受到威胁，战争会使几百万人丧生。

意大利法西斯已经对阿比西尼亚进行着掠夺性战争。日本帝国主义日益卑鄙无耻地进行着反对中国的军事行动，继续反苏挑衅。德国法西斯疯狂地在欧洲备战。

在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里，为了扩大资产阶级的利益，青年人被迫加紧自身的军国主义化，被用作反对别国人民和人种。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帝国主义就是对弱小民族的压迫。

因此，大会声明：青年应当为反帝、反战、为和平与各民族团结而斗争。

因此，我们这届世界代表大会声明：赶快在每个国家里把一切非法西斯的（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的、和平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宗教的、文化和运动的）青年组织的强大力量联合成为统一战线。

这些组织的成员，成千上万的群众应该为青年一代劳动者的权利共同奋斗。现在每个人都要明白这个普通的道理：如果我们将同工人阶级并肩战斗，那么世界上任何反对我们正义事业的力量也不会得逞。可是，如果我们单枪匹马，那么法西斯的野蛮行径就会猖獗起来。

大会号召所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青年联合起来，积极参加到把最广大的非法西斯青年群众团结起来共同斗争的事业中去。

……

对于青年来说，没有比为自由、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更为崇高的理想了！

……

除了身上的锁链，我们没有什么可丢掉的，我们将获得全世界！

因此,同志们,让我们联合起来,万众一心,为反对旧的、腐朽的、衰老的资本主义世界而斗争!

几百万青年工人们,在争取社会主义社会、争取自由幸福的生活的战斗中团结起来!

劳动青年统一的国际万岁!

李玉贞译自《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1936年第1期,第21—22页。

(录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 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

(1935年12月20日)

全国各校学生们!

各界青年同胞们!

看啊!北平各校的学生们,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为了祖国领土的完整,为了四万万同胞的人权,已经挺身而出,高举着“打倒华北自治”,“坚决抗日”,“反对降日政策”的义旗!

在日寇与卖国贼的铁蹄蹂躏之下,我北平英勇热血的青年,举行了壮烈的示威。我北平可敬的青年学生们,为着抗日救国,成数十的遭枪杀了,成数百的受伤亡了,大批地被逮捕入狱了。全国各地,南京、杭州、上海、广州、武汉的学生和工人闻风响应,罢课游行,群起抗议。爱国青年的鲜血,染红着北平的街巷,抗日救国的神圣旗帜,就在各大城市飘扬起来!

亲爱的学生们!当国亡种灭大祸临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的紧急关头,爱国青年的血,决不会是白流的,全国有血气的青年,全国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必定会一致奋起,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之下,踏着爱国青年的血迹前进!

亲爱的学生们,各界兄弟们!

中国学生在抗日救国事业上有极大光荣的传统[的]!爱国学生运动的伟大历史教训,照耀着我们今日救国运动的道路:壮烈

的五四运动,伟大的五卅运动之成为中国民族革命中最光荣的伟绩,是由于当时学生表现了伟大的爱国精神,唤起了全国人民的同情,推进了工农兵商学各界同胞的大联合。九一八事变后,英勇的南下学生示威团之遭受失败,而不能达到其救国目的,就是由于当时学生组织的散漫,行动的不统一,更是没有注意深入到工农军政商学各界同胞中去,没有推动他们组织起来,以致不能把各界同胞的同情变成一致的行动,使运动形成孤立所致。所以只有本着统一的目标,建立统一的组织,实行统一的行动,才能进行坚决的战斗;只有工农军政商学各界的大团结才能胜利,这是每个爱国的学生们、青年们所不应忘记[的]流血的教训啊!

亲爱的学生们! 各界青年同胞们! 把握着这一伟大的教训啊,领会着这一伟大的教训啊!

把自己的组织巩固起来! 巩固各校学生联合会的组织,巩固各地学生救国会的组织,组织全国统一的学生救国会,组织与训练全国统一的学生救国军!

把反日救国运动扩大起来! 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 唤起他们救国的觉悟,推进他们建立救国会的组织。进一步建立各地各界救亡大会和全国救亡大会,实行全民抗日救国大联合和实行全国各界同胞武装抗日的共同战斗。

当目前民族危亡已处千钧一发的时候,团结则生,分裂则死。只有全国人民,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地域疆界,不分民族区别,实行共同奋斗,才能挽救民族的灭亡!

因此,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向全国各学校学生们、各界青年们呼吁:一切爱国的青年同胞和青年组织,大家在抗日救国的义旗之下联合起来!

我们极恳切地声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但愿意与任何抗日救国的组织合作,与一切爱国同胞实行亲密团结,共同奋斗! 而且愿意把我们的组织开放起来,欢迎一切赞成抗日救国的青年加

入我们的抗日救国青年团。换句话说：以前加入我们青年团的人，一定要相信共产主义的，现在，我们共产主义青年团改变为抗日救国青年团以后，一切爱国青年，相信共产主义的也好，不相信共产主义的也好，只要愿意抗日救国的，就可以加入我们的抗日救国青年团。

至中国民族危急存亡的今日，一切共产主义的青年，都应当是最坚决最彻底保卫祖国的战士与先锋，不实行保卫祖国的任务，便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变！

一切有血气的中国青年们，赶快抛弃一切派别上意气上的争执，在抗日救国的神圣旗帜之下共同奋斗起来！愿大家亲密团结起来！负起保卫祖国的天职！

我们高呼：

为抗日救国自由而战！

为释放被捕同学而战！

为打倒“华北自治”而战！

为打倒日寇汉奸而战！

为实行讨伐叛逆而战！

为祖国生存独立而战！

全中国青年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录自《救国时报》1936年1月14日，第二版。

（录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 关于青年争取和平、自由和进步运动 参加世界青年和平大会的决议(节录)

(1936年1月31日)

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一个异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尽一切努力在日内瓦世界青年大会上战胜法西斯的反动影响,把这次大会变成青年一代争取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广泛示威,变成反战、反法西斯、拥护苏联和平政策的广泛示威。为此,共产国际书记处做出以下决定:

1. 积极参加大会本身,积极参加大会筹备委员会和筹备过程中设立的各项委员会的工作……

2. ……应当力争民主地进行大会的筹备工作;

3. 个别国家必须立即通过各非法西斯进步青年组织首先提出筹备广泛参加此次世界大会的倡议,不要等待让国际联盟的青年组织表示主动,要建立由非法西斯青年组织代表组成的广泛的临时筹备委员会。……

4—5(从略)

6. 青年共产国际书记处应当就日内瓦世界大会的任务问题,为各支部拟定详细的指令。要系统地向共产国际汇报各国筹备工作的情况,以及日内瓦倡议委员会的工作情况。

李玉贞译自《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与青年运动》第2卷,第

138—139 页。

（录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5 年版。）

世界青年保卫和平大会致全世界青年书

(1936年2月29日—3月1日)

世界青年们！我们号召你们保卫和平！

我们，战后一代的代表，代表着23个国家来参加国际青年保卫和平大会。我们聚集在布鲁塞尔的科学宫里，讨论保护青年也同时保护全人类免遭新战争灾难的问题。

我们，虽然宗教信仰不同，世界观和政治观点各异，但坚定不移的对和平的渴望，把我们连结在一起。通过对世界形势认真、深入的讨论，我们得出一个极其令人焦虑的结论：尽管有一次次的和平宣言，世界却处于战争边沿，危险性每时都在增长。人类的瑰宝面临着在毁灭世界的大火中夷为焦土的威胁。这种危险性已迫在眉睫了。

全球性战火的血腥序幕已经揭开。墨索里尼已在东非发动了战争。52个民族一致谴责他的战争政策，但是还没有决心结束这场战争。

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政策，使远东面临着变成血腥战场的危险。它威胁着地球上这个地区的人民，有可能使他们沦于帝国主义的血腥统治之下。

由于希特勒主义的罪恶，欧洲腹心一个强大的文明民族被它不断地培养着一种仇恨的心理，被灌输着一种思想：战争是唯一值得追求的理想。希特勒主义已成为爱好和平民族的祸患。它已把德国变成了军营，变成了欧洲动乱的策源地。

欧洲、非洲和亚洲许多民族的独立均受到严重的威胁。与此

同时，整个世界也险象环生。

我们宣布，青年有自卫和被迫防御的权利，防御在任何借口下发动军事进攻或以撕毁协议相威胁的任何势力。

我们呼吁，世界青年及忠于和平事业的青年组织要意识到并确信，只有团结一致，只有用坦率的相互谅解代替令人遗憾的敌对情绪，他们才能成为保卫和平的重要因素。

应使各民族的青年了解，当他们联合起来时，他们是坚如磐石的力量；而分裂时，他们必将成为战争挑拨者的牺牲品。

让我们联合起来共同为保卫和平而斗争。

为此，我们建议首先采取下列措施。各民族的青年一代都应关注并积极参与这些措施的实施。

第一，为反对各种宣扬战争和军国主义的言论，为反对任何诽谤有色人种和民族的言论而进行无情的斗争。青年应与老一辈的志同道合者一起担负起对各种形式的社会教育和社会影响（学校、文学、出版、广播、戏剧、电影）严密监视的责任，坚决抵制战争和仇恨情绪。

第二，我们建议，各国青年竭尽全力实现裁军，直至军事工业民用化，并建立人民对军事工业的监督；青年应把禁止私人出售武器和对此建立国际监督作为自己的坚决要求，同时，应尽一切努力，使这些要求成为全体人民的坚决意愿。

第三，我们建议，各国青年对和平问题以及保证和平的最佳措施问题组织民意测验。本着这个精神向议会和政府递送请愿书，组织群众大会和邻国边境地区居民的联欢。

青年运动应把消极的人发动起来。青年运动的呼声应使受蒙蔽者迷途知返。

第四，我们建议，各国青年要求采取使一切侵略者及和平的敌人现在或将来感到畏惧的真正有效的限制性措施，监督这些措施的实现，并越来越认真地把这些措施看作自己的切身事业。

和平不是靠语言,而是靠行动才能争取到的。应每日每时地为和平而斗争。对一切口头上拥护和平的人,青年必须听其言观其行。应使所有的人意识到,对于那些把战争当作政治手段而加以鼓吹的人来说,青年是他们不共戴天的、积极的反对者。如果说,青年无论如何不可把保卫和平的事业仅托付于几个国务活动家,那么,青年仍要使国际联盟确信,后者为保卫和平所作的努力定能得到青年们全力积极的支持。

第五,我们建议,青年把社会活动家吸引到自己这边来。青年在实行为和平和青年的利益所必须的一切措施时,应该寻找助手和忠心的保卫者(特别是在立法学会成员中)。

第六,我们建议,青年们在各种地区性的、国家的、国际的会议和大会上进行接触,组织联欢,以显示自己的团结一致,并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协调行动。

我们建议,各国青年把日内瓦世界青年代表大会(1936年8月31日—9月7日)作为促进青年一代团结道路上的重要阶段而加以宣传,最广泛地参加大会,使之成为所有青年的大会。为此,各国青年组织应与国际联盟一起成立大会筹备委员会,使大会具有最广泛的群众性。

我们肩负的责任是重大的。我们知道,没有我们的努力,战争将不可避免。我们号召一切青年组织,包括那些今日尚未同我们一致的组织,意识到这个任何人、任何事物也无法推卸的重大责任,意识到,在我们积极表示的团结中蕴藏着多么巨大的潜力,而我们的涣散和无所作为对世界和平是多么巨大的不幸。

我们向受军国主义和战争煽惑等思想教育的那些国家的青年致以兄弟的敬礼,并确信,在反对战争和军国主义情绪的斗争中,我们也代表他们的切身利益。我们号召他们同我们合作,并请他们为了和平来响应我们的号召。

战争会使我们丧命,尽管种种分歧使我们彼此隔阂,但在死神

面前我们是人人平等的。

让我们实现生者携手一致，而不要死后合葬于九泉之下吧！

让我们实现统一的事业，统一的行动吧！

为了使明天属于我们，让我们也赢得今天吧！

如果各国爱好和平的青年组织能找到相互理解的道路，那么任何战争也不会将我们分离。

青年需要和平，和平需要青年！

青年们，你们是有发言权的！

说出你们的心愿吧！行动起来吧！

雷月彩译自《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与青年运动》第2卷，第143—146页。

（录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为 “五一”国际劳动节宣言

(1936年4月)

全世界青年们!

五月一日这个国际无产阶级光辉的战斗节日,召唤着在黑暗的现实中心每日每时被迫从事劳动备受摧残的千百万劳动青年集结在争取自由幸福的新生活的旗帜下,召唤他们为青年一代的切身重大权利而斗争:

为争取自食其力的基本权利而斗争!

为争取受教育和文明生活的权利而斗争!

为保卫民主权利而斗争!

为保障和平与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而斗争!

年轻的劳动者们!在“五一”节联合起来,为反对妄图消灭青年一切权利的法西斯主义而斗争。团结起来!为反对威胁着维护和平事业、威胁着青年基本生活条件的法西斯主义而斗争。

今天,新的世界大战的阴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凶险地密布在世界上空。在欧洲的腹心地区,法西斯主义是残酷暴力的化身,它正挥动着新世界大战的火炬,威胁着全世界,威胁着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独立。

在亚洲,日本帝国主义的大炮在轰鸣,它妄图剥夺伟大的中国人民的自由,把英雄的中国青年禁锢在日本外来侵略的锁链上。在非洲,墨索里尼的飞机用毒气和炸弹把阿比西尼亚的村庄与城市变成荒凉的墓地。

法西斯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签订了旨在反对苏联——和平的支柱、社会主义和幸福青年的祖国——的条约。

因此，青年共产国际号召各国青年在五月一日显示自己为保卫和平而坚决斗争的钢铁意志。

各国爱好和平的青年们！你们必须明确，谁是世界和平的敌人。是德国法西斯，日本帝国主义，是那些妄图在灭绝生灵的狂澜中让千百万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于枪林弹雨之下丧生的人。还必须看到他们在各国有其帮凶——法西斯匪徒及其组织。

法西斯主义——就是让劳动青年的一切生存权利遭到毁灭，是让一切教育和文明遭到毁灭！

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

法西斯主义——就是青年一代的死敌！

你们愿意成为它的牺牲品吗？请回忆一下 1914 年—1919 年对人民进行血腥大屠杀时期牺牲的千百万青年人吧！请回忆一下那个时期身穿士兵大衣的年轻一代吧，他们在凡尔登布满弹坑的战场上，在法兰德斯铁丝网里，在松姆河和马恩河畔的死亡地区，在世界大战的所有战场上洒着鲜血。想想这一切吧，用你们战斗的、坚定的声音向法西斯战争挑拨者厉声呼喊“不”字吧！

要制止逼近的世界大战还为时不晚。一切不承认法西斯主义的青年组织，毫不迟疑地起来为保卫和平而斗争吧！对战争挑拨者不可有丝毫的调和！让我们以爱好和平青年的强大统一战线同这些法西斯罪犯对峙吧！

青年共产国际向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呼吁：

社会主义青年们！同志们！

把五月一日这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光辉战斗节日变为全体工人青年团结的日子吧！

只有在工人青年和整个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地进行反法西斯主义和反战斗争。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让我们

坚定不移地沿着共产国际的光荣舵手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所指引的胜利道路坚定勇敢地前进吧！西班牙的英雄青年已踏上这条路程。这是一条全体工人青年团结的道路。在“五一”节，让我们鲜红的旗帜在共产主义青年和社会主义青年联合队伍的上空飘扬吧！团结的旗帜将是胜利的旗帜！

青年共产国际向一切渴望和平、自由和进步的青年组织呼吁：
朋友们！同志们！战友们！不论我们的观点有些什么分歧，让我们在“五一”节显示我们共同的斗争热望吧！在这一天，让我们向被剥夺权利的德国、意大利、日本青年，向为了反对法西斯刽子手和战争挑拨者的共同斗争而身陷囹圄，在刑讯室和致死的囚牢中遭受苦难的反法西斯战士伸出我们的兄弟之手！

让我们建立一个保卫和平、反对青年的死敌——法西斯主义的强大的、不可战胜的世界青年统一战线。在“五一”节，团结千百万劳动青年一代的队伍，为争取和平与自由而共同战斗吧！

涣散——我们则一文不值！

团结——我们能战胜一切！

让我们共同战斗吧，因为青年渴望和平！

让我们共同战斗吧，因为青年应该生存；他们渴望工作，渴望受教育和有文化！让我们为建立统一的工会，为更有成效地保卫劳动青年的生存权利而共同努力吧！

让我们共同战斗吧，因为青年希望为自己赢得一个新世界，一个更幸福的自由的新世界！

让我们为反对那个旧的，正在衰亡的资本主义剥削的世界而共同战斗吧！各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让我们在“五一”节显示我们同伟大苏联青年的紧密团结吧，今天只有在苏联青年一代才有无限优越的条件去全面发展文化。

劳动青年的团结万岁！

和平的强大支柱，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万岁！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雷月彩译自《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与青年运动》第2卷,第150—153页。

(录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 关于举行第二十二个国际 青年日活动的决议(节录)

(1936年8月)

一、据1915年伯尔尼代表大会议决一年一度举行的国际青年日活动,体现了青年争取和平、反对战争和反对战争贩子的革命运动的优良传统。

青年团应遵照这些传统在争取和平、民主自由和青年的经济文化权利的斗争中去做团结劳动青年的工作。

二、青年团应考虑迄今为止进行国际青年日活动的主要不足之处:

1. 国际青年日的内容(口号、宣言等)、组织形式和性质都是为最先进、最革命的青年拟定的,因此,实际上国际青年日成了国际共青团日。

2. 往往不正确地解释国际青年日的性质,这表现在:不考虑民族利益;反战口号与青年们的日常要求脱节。

三、(从略)^①

国际青年日的口号应当符合各国的条件,这就是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将不为这次青年日制定国际纲领的原因。

.....

^① 这一部分主要针对法国、瑞士、丹麦等国情况,说明进行青年日活动的应注意之处。

四、建议在举行国际青年日活动时，有组织地互派国际演讲员、体育代表队、剧团等。

五、建议共产党、共青团的报纸在八九两月用较多的篇幅刊载有关青年运动、青年争取和平的斗争、国际青年日的历史和传统等方面的文章。

李玉贞译自《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与青年运动》第2卷，第160—161页。

（录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中国共青团中央关于国际 青年日工作的决定

(1936年8月19日)

国际青年节是国际青年团结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日子。9月6日——是今年国际青年节。团中央关于国际青年节工作有以下决定：

一、根据青年知识国际青年节^①，并联系目前的政治形势作深入的群众的宣传解释，不但使广大青年知道国际青年节的意义，而且知道目前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攻，全国抗日斗争的新形势，特别是知道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使[从]这些解释中进行抗日战争的动员。

二、广泛的宣传迎接红军大会合，并在深入的宣传下进行拥护红军运动。

1. 以村为单位动员团与青年举行一次“优待红军家属礼拜六”；

2. 发动小队、儿童团、个人和团体(乡区县都可)写信慰问前方红军哥哥；

3. 以县为单位组织三人以上五人以下的慰问团去前方慰劳。慰劳团须带信件、慰劳品。慰问由县委派人领导其他的人。派区乡的少队儿童或妇女干部。慰问团同志须注意是会讲话和清楚本县情形的。

^① 原文如此。

三、国际青年节日地方团以乡为单位举行小队儿童检阅。以军以师(或团)为单位举行青年运动大会。

录自《红色中华》，1936年8月19日，第2版。

(录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第一次世界青年和平大会

(1936年8月31日—9月6日)

致各国青年书

我们36个国家的青年代表聚集在日内瓦,从8月31日至9月6日举行了世界青年代表大会。现在我们向全世界青年宣言。

我们来自五大洲的不同国家,大家都在这里表示了青年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厚热爱。青年是人民的子女,在人民的关怀下长大成人。青年愿意过和平生活,自食其力。但是我们坚信,特别是在我们研究了目前险象环生的时局后,我们更加相信青年一代(正是因为热爱祖国而产生的)对世界人民大团结这一宏愿的深刻尊崇和眷恋,也只有这种大团结的局面才能保证世界和平与幸福。

我们持有不同的哲学观点、不同的政见和宗教信仰,我们的看法各异。但是,避免威胁着我们青年人的战争这个共同的愿望和对人类的深厚热爱鼓舞着我们。为了共同的工作,我们聚集到一起。我们相信,这是表达我们的心声和参与关涉我们生活与未来决策的唯一手段。我们受着这些思想的激励,我们也把这些思想传达给你们,持各种政见,有各种信仰的全世界青年们。我们再次从代表着各个国家和各种倾向的代表们参加的大会讲坛上向你们发出热情的呼吁。

全世界青年们,为了和平,团结起来!

全世界青年们,为了能在和平环境(这是人类和我们这一代人最崇高、最美好的理想)中生活和发展,团结起来!

各个国家、各种信仰的青年们，在我们已为之奠定了基础的广泛的运动中，为了青年的幸福，联合起来！

为了和平，为了文明的未来，为了人类的幸福，开始青年的进军！

李玉贞译自《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与青年运动》第2卷，第174页。

大会决议(节录)

一、世界青年代表大会委员会将靠各国联络委员会以及个人捐款供给资金。

二、将出版一种新闻简报作为各国委员会和参加世界青年代表大会工作的国际组织间互相联络的刊物。

三、大会委托世界青年代表大会委员会本部解决以下问题……^①

四、大会议决同意墨西哥、美国、加拿大、中国、印度、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代表关于召开太平洋青年和平代表大会的动议。

李玉贞译自上书第2卷，第176—177页。

^① 删略的部分都是有关会务行政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

中国代表陆瑾的讲话^①

(1936年9月1日)

主席,各位代表!

今天,在这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举行一个全世界保障和平的会议,让我们马上说罢,在我们那里,世界的一部分是没有和平的。一般的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的青年是著名的和平的爱好者。我们都渴望和平,我们都要求和平。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懂得要得和平,需要怎样的代价。

为使大家明白,可以回忆一些事实:我们国家的东北三省的被武装占领和伪“满洲国”的制造,无疑是违犯了和平条约如华盛顿九国公约,凯洛克公约及国际联盟约章。假如这些神圣的条约是可以侵犯而不受到任何的制裁,那世界和平的保障在哪里?世界上的和平组织作什么用?世界和平很明显地是被危害着!世界秩序是被破坏着!从侵略者自己公然的宣言和许多事实的证明,“征服满洲是征服中国的第一步,征服中国又是征服亚洲和世界的的第一步”啊!

满洲被占领了,侵略者就威胁着北方。在河北省及察哈尔它建立了所谓自治区域,它纵庇了走私!它威胁了中国的民族工业和各国在华的利益!在东三省,它更采取了各种残暴的行动!它

① 世界青年大会在日内瓦开会,9月1日上午第一次会议各国代表报告各国青年现状,陆瑾女士代表中国代表团向大会作五分钟之报告。陆女士登台作报告时,大会听众热烈鼓掌,表示欢迎;报告毕,亦全场热烈鼓掌。此为陆女士报告之全文。——《救国时报》原说明

没收了人民的财产！危害了人民的生命！剥夺了人民的自由！同时它经常地逮捕、扰害和屠杀中国的知识分子！

各位代表们！依照着今天的议程，我们主要的工作是要报告我国青年的状况及其特征，我上面所说的话似乎离题太远。但是，我们相信诸位都完全了解这一点，那就是：在今日的中国，关于青年的一切，他们的生活状况及其特征，他们的人生观以及其倾向都和我向你们所说过的一切是不可分开地联系着和被决定着，这就是，东方侵略者的侵掠，造成了中国人的奴隶状态和悲惨的命运！我们，中国的青年，在今天，很少注意着我们个人的问题，我们的中心问题是要怎样争取我们民族的独立与自由，因为这是无疑的，在中国没有得到完全的解放以前，单单我们青年是不会有幸福的。

为了维持我们民族的独立与自由，我们是不得不采取防卫的抵抗去反对侵略者。略举几件事实，如 29 路军，19 路军，东北义勇军及其他军队的英勇的战争，风起云涌的抵货运动，以及全国广大民众甚至是儿童对于当前危机的觉醒。除此以外，著名的学生运动更取得世界的同情和加深了中国各阶层联合一致的救亡工作。这运动产生了中国学联会的组织，这就使得一切防卫的工作加速进行。这些连贯着的事实是够明白的，第一，我们都准备着保卫我们的国家；第二，我们已经预备采取一致的行动与联合战线去反抗侵略者。

不只这样，此外，为了保持世界的和平，我们是不得不去反抗侵略者。假使允许破坏神圣和平条约的侵略行动猖狂前而不立加阻止的话，它将要无疑地成为爆发未来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东三省的市场，因它的闭关政策，现已向世界关闭着。在侵略者长久希冀着独占中国煤铁矿产这一计划之下，它能够很容易地发展它的重工业以从事备战，并将完全自由使用它的新式可怕的武器来从事世界战争。

必须着重指出,就是和平的目的和范围一定是世界的。各国的经济利益是这样地互相联系着,互相结合着和互相依赖着,在世界任何一部分上的战争都会很快危害到别一部分的和平,所以和平是不可分裂的。

让我们像现实主义者一样来认识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内,侵略者手携着手威胁世界和平的消息已经传布着,这正是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共同一致为世界和平而努力的时候。

我们是坚决地为我们国家的独立与自由而奋斗,同样也就是坚决地为世界和平而奋斗。我们要帮助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同时也希望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帮助我们,我们要与全世界的青年竭诚合作来为世界和平而努力!

末了,我们要向全世界青年表示无限的感谢,感谢他们过去对于我们热烈的援助。我们相信这个会议的结果,无论站在青年互助的立场或是站在保卫和平的立场,你们都会继续不断地援助我们。

谢谢各位!

原载《救国时报》1936年9月10日,第三版。

(选自《青年共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一次代表大会 致巴黎世界学生联合会、日内瓦世界 青年和平大会及各国青年团体的通电

(1937年4月14日)

巴黎世界学生联合会转各国学生联合会，
日内瓦世界青年和平大会转各国青年团体

亲爱的兄弟姊妹们：

我们是中国西北角上 20 万青年的代表，我们在这古老的祖国中唯一能够享受自由和民主的延安城市集合着。为的是准备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献呈我们的努力与热血，请让我们向你们——为世界和平与民主战斗的青年战友们，伸出我们斗争的铁掌，与你们亲密地坚固地握手吧！世界青年的团结，这是法西斯疯狗死亡的信号。

兄弟姊妹们！让我们向你们宣告：中国的青年是不甘受法西斯的野蛮与战祸的；我们愿意同你们一起，为世界和平、为毁灭法西斯疯犬而奋斗到底。

兄弟姊妹们：让我们经过你们向西班牙的弟兄们致我们崇高的敬礼。告诉他们中国的青年愿意站在同一的战壕中去扫荡一切法西斯丑类。告诉他们中国的青年将追随他们的英雄的先例，而为民族解放的神圣事业，流自己最后的一滴血。

兄弟姊妹们！你们一定知道：有四千年历史的东方的最伟大的民族，今日已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东北四省陷危五年了，敌人

的铁蹄想要踏遍中华的每一角落。可是,亲爱的青年战友们!中国的青年是不愿做亡国奴的。我们誓将我们的骨肉来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我们誓将我们热血来收复我们失去的山河。我们不怕牺牲,不惧阻碍,立誓奉献我们的一切直至最后一口气一滴血,为着我们民族的团结统一,为着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只要这样的统一战线建立起来,我们就能够战胜日本强盗及其同盟者,——不管他们如何凶残,如何野蛮。

兄弟姐妹们!我们相信,在我们为民族解放的斗争中,你们是和我们站在一条战线上的。盼望你们的有力支援来帮助我们最快地粉碎在我们颈项上的奴隶的锁链!

民族战士的敬礼

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

录自《新中华报》,1937年4月19日第2版。

(录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世界 学联内共产党团迫切任务的决议(节录)

(1937年6月2日)

一——四(从略)

五、为了巩固中国学生与欧洲学生的国际联系,要组织世界学生代表往前往中国访问。

六——八(从略)

李玉贞译自《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与青年运动》第2卷,第204页。

(录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支持西班牙和中国人民的斗争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为
第二十三国际青年日发表的宣言(节录)

(1937年8月27日)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号召所有共青团及其兄弟的青年组织于1937年9月1日本着真诚的国际主义精神,本着保卫世界和平、支持西班牙和中国青年与人民反对野蛮的法西斯侵略的英勇斗争的精神举行第二十三国际青年日。西班牙人民和青年的自我牺牲精神与英雄气概鼓舞着全世界的青年。

.....

日本帝国主义因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对德、意侵略玩弄令人憎恶的投降主义伎俩而更加疯狂,它对中国发动了新的进攻并打算彻底破坏中国的独立,奴役中国人民和掠夺中国的财富。伟大的中国人民正在团结自己的队伍,学习英勇捍卫本国独立与自由的西班牙的榜样。

为了预防新的世界战争,保卫小国的独立,卫护民主和保证青年一代的前途,必须结束法西斯的侵略。为把德意干涉者赶出西班牙,为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而战——这不仅仅是西班牙人民和中国人民的事业,也是一切民主的人民和全世界青年的事业。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请全体青年注意不久前社会主义青年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的联合公报。

公报中说:“西班牙今天正处于争取民主、反对国际法西斯主义斗争的火线上。支持西班牙,援助西班牙是青年前途最可靠的

保证”。

应该利用国际青年日这个机会，集中一切力量去联合青年社会主义者和青年共产主义者，以实现两个国际共同提出的下述口号：“社会主义青年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认为，为西班牙正在进行的和西班牙青年在其中发扬着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令人钦佩的自我牺牲精神的那场解放斗争贡献一切力量，乃是两个国际的义务”（摘自社会主义青年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的公报）。

中国人民也应得到这样的援助。中国人民正为反法西斯而战，在这场具有世界意义的战争中，中国人民保卫着另一段战线。

.....

虽然组织9月1日的游行已成为国际青年日的传统，但共青团把青年的共同利益置于首位，把最广泛地支持西班牙和中国的群众活动置于首位，并不坚持就在这一天共同组织游行，共青团愿意与社会主义青年和其他青年一道，根据具体形势选择恰当的日子组织游行，使更多的青年群众能够参加。

李玉贞译自《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与青年运动》第2卷，第208—210页。

（录自《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1931-1937） 第十七卷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丛书名=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页数=599

SS号=12054671

出版日期=2007.9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原书定价=59.60

主题词=共产国际 关系 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 1931
1937 史料

参考文献格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共产
国际、联共（布）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1931-1937. 北京
市：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内容提要=本书共5卷，主要内容介绍了1931年9月至
1937年7月期间有关档案11份，有些文件联共（布）、共
产国际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在上海保卫战期
间对中国事态发展所持的立场，有些文件披露了莫斯科
对中国红军于1934年秋放弃中央苏区的计划及联共共产
国际对中共和中国红军领导人所持的态度等。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前的情况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议事日程的决议（1934年5月28日）

季米特洛夫就代表大会第二项日程给委员会的信（1934年7月1日）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935年7月25日）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主席团和各委员会的选举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词（1935年7月25日）&威廉·皮克

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贺词（1935年7月25日）&周和生

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摘录）（1935年7月26日）&威廉·皮克

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摘录）（1935年8月2日）&季米特洛夫

到群众中去！（《真理报》社论）（1935年8月2日）

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结束语（摘录）（1935年8月13日）&季米特洛夫

《论共产国际在帝国主义者准备新的世界大战的情况下的任务》摘录）（1935年8月13日—14日）&陶里亚蒂
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统一、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摘录）

论共产国际在帝国主义者准备新的世界大战的情况下的

任务（摘录）

在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报告时的发言（摘录）（
1935年7月28日）&（日本）冈野进

在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报告时的发言（1935年7月
29日）

在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报告时的发言（1935年7月
30日）

在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报告时的发言（1935年7月
31日）

在第二十三次会议上讨论季米特洛夫报告时的发言（
1935年8月7日）

在第二十四次会议上讨论季米特洛夫报告时的发言（
1935年8月7日晚）

在第二十七次会议上讨论季米特洛夫报告时的发言（
1935年8月9日）

在第三十一次会议上讨论季米特洛夫报告时的发言（
1935年8月11日）

在第三十一次会议上讨论季米特洛夫报告时的发言（
1935年8月11日）

在第三十二次会议上讨论季米特洛夫报告时的发言（
1935年8月11日晚）

在讨论陶里亚蒂报告时的发言（1935年8月15日）

在第三十七次会议上讨论陶里亚蒂报告时的发言（
1935年8月16日）

在讨论陶里亚蒂报告时的发言（1935年8月16日）

共产国际“七大”与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1936年
3月20日）&张闻天

争取工人阶级团结统一的纲领（《真理报》社论）（
1935年8月6日）

争取和平（《真理报》社论）（1935年8月19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言《打倒战争》（1935年10月7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声明《争取世界无产阶级行动的统一》（1935年10月16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战争危险问题的决议（1936年4月1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国际和平代表大会总结的决议（1936年9月9日）

十三年来的中国共产党（1934年11月）&王明

中国共产党15周年纪念（1936年7月）&季米特洛夫

英勇奋斗的15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纪念（1936年）&米夫

伟大的十月革命和中国（1937年11月）&米夫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关于和平解决西安冲突的必要性问题（1936年12月16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关于中共领导在西安事变之后的方针问题（1937年1月19日）

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1936年12月19日）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1936年12月19日）

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致周恩来（1936年12月21日）

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1936年12月27日）

关于西安事变的三十四份文电（1930年12月—1937年2月）

中国发生事变（《真理报》社论）（1936年12月14日）

中国的抗日运动（1936年12月15日）&Ar·哈马丹

国际述评（1936年12月17日）

为在中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5—1937）（摘录）&A·C·基托夫

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1935年8月1日）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瓦窑堡会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1935年12月25日通过）

关于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1936年4月20日）&洛甫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1936年4月25日）

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1936年5月5日）

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6月20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电报（1936年8月15日）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1936年8月25日）

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1936年9月17日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通过）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1937年1月20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1937年2月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就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事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1937年3月5日）

中央关于同蒋介石谈判经过和我党对各方面策略方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1937年4月5日）

中共中央关于与蒋介石第二次谈判情况向共产国际的报告（1937年6月17日）

中央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方案问题致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电（1937年6月25日）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1937年7月15日）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讲话（1937年8月10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援助中国和西班牙人民的决议”节录（1937年10月3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1937年10月10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言（摘录）——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20周年（1937年11月7日）
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1937年12月13日通过）
季米特洛夫日记（摘录）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苏区少年先锋队给中国团的信（1932年6月1日中国共青团中央收到）
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的总结和青年共产国际支部争取劳动青年群众的任务的决议（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十二月扩大全会通过）（1932年12月17日—28日）
巴黎世界青年反战和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宣言（节录）（1933年9月22日—24日）
附：青年共产国际纲领
库西宁关于青年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对战争危险斗争的报告（节录）（1935年8月）
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935年9月25日—10月11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1935年12月20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青年争取和平、自由和进步运动参加世界青年和平大会的决议（节录）（1936年1月31日）

世界青年保卫和平大会致全世界青年书（1936年2月29日—3月1日）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为“五一”国际劳动节宣言（1936年4月）

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举行第二十二个国际青年日活动的决议（节录）（1936年8月）

中国共青团中央关于国际青年日工作的决定（1936年8月19日）

第一次世界青年和平大会（1936年8月31日—9月6日）

中国代表陆瑾的讲话（1936年9月1日）

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致巴黎世界学生联合会、日内瓦世界青年和平大会及各国青年团体的通电（1937年4月14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世界学联内共产党团迫切任务的决议（节录）（1937年6月2日）

支持西班牙和中国人民的斗争——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为第二十三个国际青年日发表的宣言（节录）（1937年8月27日）